



---

# 卢森堡文选

# 卢森堡文选

下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人 民 出 版 社

# 目 录

俄国革命 .....	1
(1905年1月)	
在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	10
(1905年9月21、22日)	
我们想要什么?(摘录) .....	20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纲领解说	
(1906年)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	33
(1906年)	
在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112
(1906年9月26、28日)	
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118
(1907年5月8、4、12日)	
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 国际冲突”委员会上的发言 .....	147
(1907年8月21日)	
民族问题与自治(摘录) .....	151
(1908—1909年)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	196
(1910年)	

播种季节 .....	206
( 1910年3月25日 )	
疲劳还是斗争? .....	211
( 1910年5月23、6月3日 )	
理论和实践 .....	247
( 1910年7月23、29日 )	
摩洛哥 .....	294
( 1911年7月24日 )	
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政策 .....	302
( 1911年8月19日 )	
再论群众和领袖 .....	308
( 1911年8月 )	
在柏林第一国会选区的演说 .....	314
( 1911年12月19日 )	
今后怎么样? .....	317
( 1912年 )	
五一节的思想在前进 .....	326
( 1913年4月30日 )	
策略问题 .....	330
( 1913年6月26日 )	
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 .....	343
( 1913年10月 )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 .....	355
( 1913年11月21日 )	
对1913年12月13、14日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的说明 .....	357
( 1913年12月23日 )	
五一节二十五周年 .....	360
( 1914年4月27日 )	

党的纪律 .....	364
( 1914年12月4日 )	
国际的重建 .....	367
( 1915年 )	
尤尼乌斯提纲草案 .....	381
( 1916年2月 )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 摘录 ) .....	386
( 1916年4月 )	
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的政策 .....	458
( 1916年 )	
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 .....	469
( 1917年1月6日 )	
论俄国革命 .....	474
( 1918年 )	
俄国的悲剧 .....	508
( 1918年9月 )	
开端 .....	516
( 1918年11月18日 )	
国民会议 .....	520
( 1918年11月20日 )	
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 .....	524
( 1918年12月 )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摘录 ) .....	535
( 1918年12月31日 )	
领袖们在做什么? .....	562
( 1919年1月7日 )	
玩忽职守 .....	565
( 1919年1月8日 )	

领袖失灵 .....	570
( 1919年1月10日 )	
柏林秩序井然 .....	574
( 1919年1月14日 )	

# 俄国革命

(1905年1月)

它时而铿然有声地直冲云霄，  
时而又全副武装再次来到。

资本主义世界以及伴随着它的国际阶级斗争看来终于要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跨出议会争吵的漫长阶段，重新步入自发的群众斗争时期了。这一次虽然不是象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又是法国的雄鸡的放声啼鸣给欧洲的下一次革命报晓。相反，对于法国来说，议会时期的泥潭是最为危险的，而且，对阶级斗争的国际领导似乎暂时也撒手不管了。下一个革命浪潮的起点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在德国和在俄国，此刻几乎同时爆发两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斗争——两场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这两次起义将现代社会的躯体内部积聚着的革命的自发力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并象驱散轻飘飘的秕糠那样，驱散了所有那些在国际上风平浪静时期繁茂生长起来的对今后平静的、“合法的”发展进程所抱的幻想。是谁“希望”在鲁尔区举行这场总罢工？<sup>①</sup>又是谁“发动了”它呢？如果换一个任何

---

① 1905年1月7日兰根德累尔的布鲁赫斯特拉塞矿场的矿工由于抗议延长工作时间和抗议关闭矿场的计划而停工。至1月16日，其他矿场的差不多十多万名工人加入了这次罢工。在矿工的压力下，原来想使罢工局部化的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和希尔施—敦克尔矿工工会以及波兰矿业工会的领导人被迫于1月17日正式宣布罢工。自此以后，每天都大约有二十一万五千名矿工投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要求提高工资、要求矿井安全和废除对参加政治活动的一切处罚的斗争。2月9日，罢工被违反工人意志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工会领导人所把持的罢工领导机构毫无结果地中断了。——编者注

别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属教会工会，有的属自由工会，有的属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一切只会使人们宁可努力阻止起义而不会去挑起它。如果这只是一场时常爆发的大罢工和大规模的工资斗争，那么，它也许就会被阻止、推迟和瓦解。但是鲁尔区的运动的全部特征是，运动所依据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其整体来说涉及了矿山无产阶级的全部生活）是形形色色的，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并不是一场反对这个或那个局部现象的局部斗争，而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所以它就象天空中带着迅猛的自然威力的暴风骤雨一般爆发出来。这时候，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走在洪流巨浪的前头，要么就让风浪抛到一边去。因此，鲁尔区的总罢工是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在迟早会到处面临的无产阶级的起义中要担任的角色之一的典型的富有教益的范例。这个例子说明，所有关于我们是否要“制造”社会革命，或者是否要把这种“过时的”、“不文明的”斗争方式当作废物丢掉，或者是否最好还是继续努力争取将自己选入议会等等之类的惬意的笔墨官司都十分可笑的。

此刻，彼得堡给了我们另一种形式的同一历史教训。伟大的革命事件都会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它大体上可以预见，可以预料，但是一旦它们发生了，却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具体形态而总是作为斯芬克司，作为一个要求我们彻底理解、彻底探究和彻底学习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十分清楚，目前俄国的革命绝不是用什么“正在发出爆裂的轰鸣的浮冰”、“无边的草原”、“默默抽咽着的疲乏的灵魂”之类的空话就能干得了的，也绝不是按照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们的意图用同样的吵吵嚷嚷的纯文学的空话所能对付得了的。这些记者身上有关俄国的全部知识无非就是从最近上演的高



尔基的《夜店》或者从托尔斯泰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得来的那一点点罢了。他们总是以同样的好心好意的无知去观察两个半球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同意饶勒斯的《人道报》的看法，把树立一种使俄国专制主义真正感到沮丧、使世界无产阶级感到振奋的自信作为要从彼得堡革命得出的第一条和最重要的一条结论，说最后一位罗曼诺夫在彼得堡大屠杀<sup>①</sup>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的外交来说几乎可以说已经变成不体面的人，再没有哪一个同盟国家的“立宪君主”或者“共和国家元首”会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人了，那么这种收获在政治智慧方面和在历史教训方面也显然过于微薄了。

尤其是，如果西欧的社会民主党采取本·阿基巴<sup>②</sup>式的一味摇头的否定态度，认为俄国的变革是德国和法国早就“有过”的事，它纯粹是一种历史模仿，那是完全错误的。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反，有充分得多的理由可以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会重复第二遍。可是，在形式上只不过为俄国补做了半个世纪前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为西欧和中欧做过的那些事情的俄国革命，它恰恰因为是欧洲革命中迟迟到来的落伍者，因此也是完全特殊类型的革命。

俄国作为一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登上了革命的世界舞台，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发展观点来看，它无法同三月革命前的德国相对比。但是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俄国革命才与所有流行的观点背道而驰，具备了迄今为止所有革命中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当然，当前的俄国起义的直接目标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宪法的范围，这次危机也许，甚至十有八九还能够高潮与低潮迅速

---

①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十四万名工人携带着恳求沙皇改善他们生活状况的请愿书前往冬宫示威。沙皇下令向示威者开枪，一千多人死亡，约五千人受伤。这次流血事件在整个俄国掀起了罢工和农民骚动的浪潮。——编者注

② 本·阿基巴（约50—136）——收集犹太法典的犹太学者。他有一句名言：“什么事情都是已经有过的”。——编者注

交替地持续多年，而它的最后结果多半将只不过是一部可怜的立宪制的宪法而已。这次革命在历史上虽然注定要生下这个被恶神偷换后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丑怪婴儿，但它却是一次空前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首先，在俄国完全缺少一个在迄今所有现代革命中起过最大的作用即领导作用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是联系二者的革命纽带，是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激进和民主性质的先决条件，从而赢得无产阶级去充当资产阶级的作战部队，并建立起到目前为止的革命所必需的物质机制。我们指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无疑是一种有活力的粘合剂，它在欧洲革命中团结了各个很不相同的阶层共同行动。在按其历史内容来看是属于资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斗争中，它对于全体“人民”这样一种必要的虚构起了创始者和体现者的作用。这个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智力上的教育者。正是在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有阶级意识地登台演出并使自己脱离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

可是，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欧洲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尽管有一个小市民阶级，但这个阶级却偏偏是政治上最为反动、思想上最为野蛮的分子的大本营。

不过，在俄国有一个所谓自由职业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起着同西欧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几乎类似的作用，他们当中一向都有一批人致力于劳动人民的政治教育。但是这种知识分子本身并不象在德国和法国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是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再次表明它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体现者，而是反动的保守主义的体现者，或者——事实上还要糟糕——是完完全全

的反动的消极因素，就其自身方面而言，在俄国这个纷乱得野蛮可怕的社会中，自由主义并不是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这种现代资产阶级的进步倾向，而是产生于主张自由贸易、被国家大力扶植的资本主义迫使成为反对派的农业贵族。因此生前就已经注定了，这个俄国自由主义身上既不具有健康的现代的阶级运动的革命力量，也不具有当年西欧国家自由主义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存在过的那种同工人阶级的天然的亲和力和社会方面的共同点。这就使俄国农业自由主义产生病态的软弱和内在的怯懦以及它与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疏远，这也就排除了这个自由主义作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领导者和教育者的可能性。

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启蒙、训练和组织的工作在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在革命以前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政治理论家承担的，而在俄国，这个工作却成了知识分子的专有任务。不过，他们不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脱离原来阶级去充当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已经变为行动的阶级觉悟、政治成熟和理想主义的总和只能记在社会主义宣传、更确切地说，记在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几十年坚持不懈的鼯鼠式的工作的功劳簿上。

只要进一步观察一下，便可以发现，这个总和是大得出人意外的。诚然，彼得堡工人群众的第一次登台还把各种沉渣——例如信赖沙皇的种种幻想，昔日不为人所知、不在意料中的领导人——抛到表面来了。同所有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况一样，炽热的熔岩首先也把各种各样的泥浆自深处翻滚到火山口的边缘上来。但是在这些要被革命的烈火迅速抛弃的瞬间的偶然事物和传统世界观的残余中间却清清楚楚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健康地茁壮成长的、纯粹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幼芽，随之还出现了朴素的英雄的理想主义。

它没有资产阶级伟大历史时刻的那种故作姿态，也没有那种戏剧性的表情，虽然这些历史时刻是当代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一切阶级运动的一个可靠的和典型的征兆。每个比较熟悉俄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又是与西欧的先例相反，现在已经陆续卷入革命浪潮的俄国各省的无产阶级，南部、西部和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比沙皇首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高，组织得更好。

可是，毫无疑问，彼得堡工人的第一次群众起义甚至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是一种意外。这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暴动的表面领导显然不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爱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事“无能为力”。如果人们对这种说法的理解是，这次运动在规模上和速度上的自发发展都超出了宣传家们的估计，也超过了对它进行控制和领导的现有力量和手段，那么，这句话肯定也是适用于俄国当前的情况的。然而这便使得那个不忍心在相应的历史形势下把在这种意义上使它“无能为力”的鬼魂召到社会舞台上来的社会民主党叫苦连天起来。这只要换句话说来说，便可证明，社会民主党不懂得推动现实的革命群众运动，因为按计划发动、组织和妥加领导的，短时间“制造出来的”革命，只有在普特卡默<sup>①</sup>的警察或者普鲁士和俄国检察官的丰富的想象中才会存在。

但是如果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人们却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力量和奇迹本身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是一种意外，革命在迅猛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革命目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那么，社会民主党今天便正好是沙皇帝国公众生活中对彼得堡事件不是无能为力和在精神上完全可以控制局势的唯一因素了。

---

<sup>①</sup> 罗伯特·冯·普特卡默（1828—1900）——1881—1888年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他加强了俾斯麦的警察国家。他曾要求警察用严酷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编者注

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突如其来的政治性群众起义不仅对于控制着沙皇制度的匪帮中没有头脑的白痴，不仅对于那些鼠目寸光、粗野、在俄国占据着资产阶级这个位置的工业财团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对于俄国自由主义者，对那些为了赞美自由而大摆宴席、并在基辅和敖德萨的宴会上对无产阶级的演讲者报以“呸！呸！”的唾弃声和大喊“滚出去！”的先生们，也同样是晴天霹雳；还有，对于司徒卢威之流的先生们来说，也是一样，这些人在彼得堡革命的前夕实际上就已经把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看成是“抽象的范畴”，并且相信自由主义的咪咪叫喊和一些“有身份的尊贵的人物”的呜咽哀诉是推翻专制制度的这堵耶利哥城墙最可靠的办法。<sup>①</sup>

最后，它对于知识分子出身、意志动摇和不坚定的革命者阶层也同样是晴天霹雳。这些人时时刻刻都象墙头上随着风摇来摆去的芦苇一样，一会儿他们讲些令人难忘的可怕的话语，说他们只相信炸弹和左轮手枪才是拯救行动，一会儿他们又只相信盲目的农民暴动，一会儿则干脆什么也不再相信。有时候欢呼声响彻云霄，有时候却悲哀得要死。他们有如革命中活动的流沙，从恐怖主义到自由主义，又从自由主义到恐怖主义来回流动，可就是从来也不能坚定地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行动。

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僵死的教条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以及他们的门徒，只有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固执己见的集团，只有这些在国际的某些圈子里还象法国的“盖得分子”一样享有令人不愉快的尊敬的人，依靠只有一种科学的牢固的世界观才能赋予的那种坚如磐石般的镇静和自信，认为几十年来，他们早就预告了彼得堡1月22日的到来，并通过他们有意识的宣传

---

<sup>①</sup>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中说以色列人围攻耶利哥城，由于上帝的旨意，仅用号角吹奏便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编者注

为此作了准备和诱发工作。

正是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社会状况罕见的特征中有可能几乎极有把握地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预先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概轮廓，并能够在有计划的活动中的预言和兑现它的革命结果。

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发现沙皇专制下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阶级，是首先使俄国从专制制度中得到政治解放，然后又从资本统治下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未来支柱。

当人们刚刚从官方工业统计枯燥无味的语言中看出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时候，当人们刚刚统计出俄国的工厂总数的时候，当几乎每一个确定无疑的无产者都可以说是刚刚从激烈的论战中获得承认的时候，同一的马克思的“教条”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不顾任何情况都坚定不移地捍卫俄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使命和阶级政策。

后来，动摇不定的俄国知识分子又担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向“广度”而向“深度”发展，也就是担心用外国现成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能接纳的无产者的人数太少，以致俄国工人阶级对于完成它的任务来说也许在人数上显得太少了。

后来，当“社会”首先从关于大批工人涌进公共阅览室的显著报导中发现俄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存在时，简直就象发现了美洲原始森林中新的野蛮部落的存在一样。

再后来，便不顾工人阶级的存在，不顾巨大规模的罢工，而只相信大学生式的恐怖主义的政治作用了。

及至前天，在国外还是不顾俄国已经爆发了声势极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因循真正教条式的条条框框，主要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上仍然是相信沙皇帝国的自由主义运动。

到昨天，鉴于战争，人们实际上再一次不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

俄国无产者的阶级行动上，而是寄托在日本人的行动上。

直到目前，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相信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策，至少是，只相信俄国所有“革命派的”和“反对派的”政党的一种混合物，相信一种政治上的酥皮馅饼，因而认为，“从更大的着眼点出发”和“鉴于伟大时刻”，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尽快和所有其他政策掺在一起，烤出这种馅饼来。

1月22日，神降临于人间，这一天向全世界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独立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的神，是这个神，为了俄国的自由在彼得堡的街头进行了第一次伟大战斗，而这个神，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迟早总会赢得胜利。

发表于《新时代》第23年卷（1904—1905）  
第1册第572—577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  
第477—484页。

（王小华译 李宗禹校）

# 在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耶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905年9月21、22日）

（9月21日）

罗伯特·施密特<sup>①</sup>多次强调说，在德国，党和工会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立。确实，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对立。但是，如果说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容易使人们去制造和挑动这种对立的话，那么，施密特的讲话正好向我们表明，大概有人正在这样做。要不然，施密特讲话的主题就不是这样的了。施密特恳求给他一个钟头的发言时间，为他在五一节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他却利用这个时间来对《新时代》和理论进行前所未闻的诋毁。而且这次诋毁所采用的并不漂亮的手段，只有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最恶毒的敌人身上才能见识到。本来考茨基适合于为《新时代》讲几句话，可眼下他正在忙于十五人委员会<sup>②</sup>的工作。因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摆出一

---

① 罗伯特·施密特（1864—1943）——国会议员。柏林工会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② 十五人委员会是受党代表大会的委托，审查几个提案的有关事实的。这几个提案把社会民主党的几种不同报纸之间、特别是《前进报》和《莱比锡人民报》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争论说成是“蹩脚文人的争吵”，并且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争论。委员会没有采纳这个观点。——编者注



些事实来说明施密特反对《新时代》所采用的手法。就连《前进报》的指责也逐渐消失在悲伤的控诉声中：啊，很遗憾，《新时代》对群众的理论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而《前进报》又这么忙，做不了这件工作。或许罗伯特·施密特也是属于那一号人的，这些人准备随时为《新时代》发行得如此之少而表示惋惜，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十分起劲地抓住每一个时机来反对《新时代》，并要把它拉下马来。施密特说过这样的话：不再有工人阅读《新时代》，那是一种幸运。我要问，一个党员，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议员怎么能站出来胆敢发表这种反对《新时代》的言论呢？这是教育德国工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科学刊物啊！据说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新时代》刊登得太少了。我这儿有一份《新时代》去年刊登的有关工会的文章的目录，其中不包括关于群众罢工的文章。下面，我将让手中的证据来说话，因为考虑到罗伯特·施密特讲求真实，善于引证，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去年《新时代》第2期刊登了列金关于工会运动十周年的文章。第9期有翁布赖特<sup>①</sup>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文章。第20期有施内特尔关于在劳资协议中的行会思想的文章。第27期有翁拉特关于总罢工的争论的文章。第28期发表了翁布赖特关于小手工业的和平幻想的文章。第33期发表了克洛特论述工会科伦代表大会上有关总罢工和庆祝五一问题的文章。同期还发表了海尔曼·弥勒<sup>②</sup>关于工会范围内的合并的文章。第34期有亨利希·巴耶尔关于工会与党的文章。同期还有考茨基关于修订工会策略的文章。第36期有考茨基关于科伦代表大会的文章。第

---

① 保尔·翁布赖特（1868—1932）——德国工会领导人之一。工会总委员会报刊《通讯报》编辑。——编者注

② 海尔曼·弥勒（1876—1931）——1906年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于1920年和1928年两次出任总理。——编者注

41期有霍赫<sup>①</sup>关于德国基督教工会运动的文章。第47期有施特勒贝尔<sup>②</sup>关于工会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第48期有弗莱斯纳<sup>③</sup>关于党与工会的文章。但是，在这份相当长的目录中你们既找不到罗伯特·施密特的名字，也找不到胡埃<sup>④</sup>的名字，同时也找不到改变观点接受了更好的认识的冯·艾尔姆<sup>⑤</sup>的名字。你们如果想找到这些人的名字，那你们可不要到《新时代》那里去找，要到《社会主义月刊》那里或者多走一步到《新社会》那里，或者再走远一点到现在已经长眠了的由米哈尔斯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主办的《欧洲》那里去找。他们为这些刊物写文章，就是不为《新时代》写。而事后，这些用他们的思想光辉照耀了别的刊物的先生们却站了出来，说什么《新时代》没有刊登任何关于工会的文章，不再有人看它，那是一种幸运。

此外，施密特还断言，假如在《新时代》曾经有人写过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的话，那么作者肯定是一个对于工会实践一无所知的可诅咒的理论家。同时他还引用了德累斯顿著名的理论家弗莱斯纳的一篇文章作为凭证。还引用了魏玛一位更加著名的理论家即面包铺的小伙计费舍的一篇文章。而施密特是如何巧妙地引证的呢？他挑拣出这样的话：“于是，争取改善当前国家中的工人生活状况的努力势必完全合乎规律地有助于延长这个国家的存在，因为

---

① 古斯达夫·霍赫（1862—1942）——国会议员。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从事工会和议会活动。——编者注

② 亨利希·施特勒贝尔（1869—1945）——1924年起为国会议员。1900—1916年在《前进报》工作。——编者注

③ 海尔蒙·弗莱斯纳（1865—1939）——1920—1933年为国会议员。1906—1917年任《德累斯顿人民报》编辑。——编者注

④ 奥托·胡埃（1868—1922）——矿工工会领导人。反对党领导工会。——编者注

⑤ 阿道夫·艾尔姆（1857—1918）——国会议员。工人合作社运动领导人。——编者注

在一种国家制度中，各个成员的生活越是舒适，这些成员就将越不愿意导致这种国家制度的变革。”说到这里他迅速地把书本合上并接着说：喏，你们看看，《新时代》居然散播这样一种观点。然而，这篇文章并不是从这一句话开始，也不是用这一句话结束的。作者首先回答了当时很现实的问题：工会中立究竟算不算是一种新的发明，是不是新近才推荐给工会的一种处方，或者说它是否工会的一种旧的实际经验。作者先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把工会当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把它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工会总是提出抗议的。抗议的理由清清楚楚：工会任务的范围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同。”作者然后主张党与工会之间要有所分工。在施密特挑选出来的话后面他接着写道：“尽管如此，如果社会民主党现在要实行这个变革，那它就必须有能力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能给工会会员带来的好处将比他们在当前的社会里通过工会组织所能得到的要多。”<sup>①</sup>可见施密特干脆把引证的句子截掉了一半。我不知道施密特在他拿到那篇文章之前是否就已经确信，不去阅读《新时代》是一种幸运，他自己不过是偶然看见了这个断章取义的句子。如果施密特同志认为《新时代》是诋毁议会制度的专门刊物，那么这同样是他讲求真实的表现；他甚至已经把据说是《新时代》为之奋斗的法国涣散状态的可怕幽灵展示给我们看了。我倒是想请他向我指出《新时代》有哪怕是一篇诋毁议会制度的文章来。当然，或许施密特所理解的诋毁是指我们遵照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有义务进行的批判。如果他是这样理解，如果他认为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捧上天是我们的义务，那我就当然要说，《新时代》是不应受到罗伯特·施密特的赞赏的，同时我还希望，就是今后，只要考茨基在当它的编辑，《新

---

<sup>①</sup> H·费舍：《中立的还是党派的工会？》。《新时代》第18年卷（1899—1900）第2册第537页。——编者注

时代》也不应受到施密特的赞赏。<sup>①</sup>

施密特同志在发表他个人的意见时首先是责备我缺乏和蔼可亲的态度。我感到被他说中了，而且悔恨交加；幸好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它可以补救我的缺陷并教育我确立真正正确的和蔼可亲态度。因为施密特建议理论家们加入工会。我认为，这对于我确立和蔼可亲的态度实际上会是有益的。胡埃同志新近在《德国矿工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我坚信了这一点。这篇堪称党内同志之间进行和蔼可亲的交往的楷模的文章在结束时是这样写的：

“在俄国，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长久以来一直在惊心动魄地进行着。我们始终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我们那些高喊总罢工的理论家不尽快到俄国去积累实际斗争的经验并且在那儿参加斗争呢在俄国，工人正在流血牺牲，为什么那些特别是来自俄国和波兰的、现在仍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大写其‘革命’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奔赴战场呢？谁要是象我们那些不断宣传总罢工的活动家那样满怀过度的“革命”热忱，那对于他来说，现在避暑回来是到了实地参加俄国的自由斗争的时候了。讨论来，讨论去，不如实习去，你们，‘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起来吧，投身到俄国的自由斗争中去吧。”

后来牧师纳乌曼在《援救》杂志上欣喜若狂地引证这篇文章说：“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呀！国际革命家们应该说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国际主义去华沙呢”。

在胡埃同志和蔼地邀请我们前往的那个地方，检察官不久前使我的亲密战友卡斯普沙克获得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sup>②</sup>我认为，我有权希望，我在工会不仅将认识工人运

<sup>①</sup> 因为发言时间已过，罗莎·卢森堡经过重新申请后才结束了她的发言。——编者注

<sup>②</sup> 马尔岑·卡斯普沙克（1860—1905）——波兰工人革命家。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04年4月被捕 1905年8月被判处死刑。9月被杀害。1889年他曾帮助罗莎·卢森堡逃离波兰。——编者注

动的真正准则和实际策略，而且也将获得党内同志的真正的和蔼可亲的教导。

关于《新时代》，我还要补充几句。如果施密特希望尽可能少的工人去阅读《新时代》的话，那他是要大失所望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新时代》过去已经——确切地说，1902年在慕尼黑——受过最卑鄙的诋毁。而这对《新时代》的成长产生过什么影响呢？1902年上半年订户的数目是3700户，下半年是3600户。1905年上半年是4800户，下半年是5100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内同志对《新时代》的攻击同资产阶级政党对整个社会民主党的攻击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兴旺发达起来。对于那些不了解科学杂志的一般发行数量的人，我要补充说明一下。《新时代》的订户数不但没有落后于最佳的资产阶级杂志，而且甚至还超过了它们。对于一种不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科学杂志来说，这样的订户数日应该说是少有的了。

现在还要就工会和党之间的对立这个主要问题再说几句。惠特曼同志认为，他完全不理解对工会领导人的攻击是从何而来的。他完全无法想象会有不是脚踏实地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的工会领导人。让事实来说话吧。现在我想向你们介绍几份传单。这是最近，也就是在埃森选举斗争期间，由中央党针对社会民主党散发的，其中利用了大量的工会报刊反对我们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实际上不少工会人员已经不再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了，这些煽动与党对立的工会人员不是存在于梦幻之中，而是存在于可悲的现实之中。中央党散发的第一张传单的标题是“撕下假面具！”里面是这样写的：

“《德国印刷工人通讯员》因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指责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在今年第65期上写道：‘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神秘主义只能掩盖雅各宾主义的无能的政策，过去这个主义

曾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宣传力量的发展，但是从积极的和长远的效果来看，它对于政治上的创造和实际的政治力量是不起作用的。工会运动不需要伯恩施坦的历史性的启示，他的言论只不过是党在政治上束手无策的一种证明，这个党进退维谷，是因为它连手带脚都被过时的纲领捆绑在这个纲领所产生的错误政策上了。”

中央党散发的第二份传单写道：“在《专业同行》第23期上，社会民主党人爱德蒙·费舍<sup>①</sup>写道：

‘人们可能对工人保险仍然评价过低，但有一点是每一个人都将承认的，即日前领取养老金的人和领取残废补助的人比起二十五年前失去工作能力的祖父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因为不能工作的祖父不是成为子女的负担，就是感到靠社会救济过日子是一种耻辱。

虽然各种社会法令永远也不过是墙基，但它们毕竟是基础，而且通过它们便开始了人类团结的大厦的兴建。而为扩建这个大厦进行的竞争也唤起和加强了不属于工人的其他各个阶层的合作、平等和团结的思想，因而也就有利于精神生活的高尚化。’”

对于一份工会刊物这么奇妙的言论，中央党自然只要加上这么一句便够了：“这难道不是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否定政策的毁灭性判决吗？”

这些工会人员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议员不倦地予以批判的工人保险的。这些言论表明，制造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工会实践之间的不一致的工会领导人是确实存在着。实际上这种不一致并不存在于党和工会之间，而是存在于工会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党内。这就是那被少数领导人“修正了的”观点与工人群众

---

<sup>①</sup> 爱德蒙·费舍（1864—1925）——曾任《人民之声报》、《萨克森工人报》编辑。《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编者注

健康的革命观点之间的分歧。工会的会员群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都正确地认为，不论是党的利益或是工会的利益，都要求整个工人运动要充满同样的精神，它的所有部分都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他们都认为，无论是工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必须象《威廉·退尔》中的白尔达那样宣称：“使我们大家见了胆战的是同一敌人，使我们大家都得解放的是同一自由！”<sup>①</sup>

( 9 月 22 日 )

假如有人在这儿听听迄今为止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争论的全部发言，那他确实会迷惑不解，并且会问：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光荣的俄国革命时期，还是处于这个革命之前的十年呢？你们每天都阅读报纸上有关革命的报道，你们都看新闻电讯，但是你们却好象没有眼睛去看，也没有耳朵去听似的。于是便有人要求我们说说，我们将如何制造总罢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在什么时刻宣布总罢工，你们已经有了储存食物的仓库了吗？群众会饿死的呀！你们能够对流血牺牲承担责任吗？可以肯定，所有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压根儿同群众就没有接触，否则他们就不会为群众的血而如此煞费思量了。因为责任恰恰不是落在提这类问题的同志身上。施密特说，我们为了总罢工为什么就应突然放弃我们过去久经考验的策略呢？为什么我们忽然间要进行这种政治自杀？啊，难道罗伯特·施密特没有看到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由演进突变为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吗？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如果我们从中什么也学不到，那我们便是蠢驴。于是海涅便去问倍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席勒：《威廉·退尔》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01页。——编者注

倍尔，在总罢工的情况下，不仅会有我们组织得很好的人员，而且还会有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参加，你们连这种情况也考虑过了吗？那你们对这些群众也管束得住吗？从这一句话便可以看到海涅的整个资产阶级观点，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种耻辱。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表明，在革命的形势之下需要管束的不是群众而是议会制度的辩护士，以使他们不能出卖群众和革命。施密特引证了比利时的实验<sup>①</sup>和王德威尔得的言论<sup>②</sup>；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表明了会由于见识浅薄而使一场伟大的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毁灭的话，那么这次罢工便是如此。当我向王德威尔得指明，这整场伟大的群众罢工运动是由于议会同自由党的暧昧关系才遭到失败的时候，王德威尔得举不出任何事实，却力图讲些一般的空话来搪塞。（伯恩斯坦喊道：“不真实！”）呵，在这方面您懂得些什么呵？于是海涅便把鲜血淋漓的鬼魂呼唤出来，接着说，德国人民的鲜血在这个鬼魂的心目中，——这是他的原话的意思——比在小伙子倍倍尔眼中更为珍贵。谁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承担这种责任，是倍倍尔还是老成持重、有政治家风度的海涅，我想把这个个人问题撇到一边不谈。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切革命都是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全部区别在于，直到今天，人民的鲜血都是为统治阶级而流的，而现在，在谈论人民有可能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流血的时候，老成持重的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却站出来说，不行，这些血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眼下还谈不上宣布革命，甚至于连宣布群众罢工都谈不上。但是如果海涅、施密特和弗罗梅<sup>③</sup>叫我们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话，那我们将对他

---

① 指1902年4月14日比利时爆发的群众罢工。——编者注

② 罗·施密特在发言中引用了埃·王德威尔得在《新时代》上回答罗·卢森堡的《比利时的实验》一文的片断。——编者注

③ 卡尔·埃贡·弗罗梅（1850—1933）——国会议员。曾任法兰克福《人民之友报》和《汉堡回声报》编辑。——编者注



们说，这个，我们正在做，不过，我们不想按你们的意思去做！我不想按所有这些同志许久以来的做法，掩饰对立和隐瞒对立。不必这样，组织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教育工作中的革命思想！这是重要得多的事。请你们回忆一下反社会党人法的那个时期吧！人们捣毁了我们的工会，但我们的工会却如凤凰一样又从灰烬里飞向天空了。就是在将来激烈的斗争时期，情况也会如此。我们根本用不着象科伦的工会领导人那样小心谨慎。<sup>①</sup>工会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并因而成为工人的活动自由的障碍。你们学习一下俄国革命吧！在俄国，几乎还看不见工会组织痕迹的时候，群众就已经被推上了革命，现在他们才通过斗争逐步巩固他们的组织。认为在斗争之前非得先有强大的组织不可，这完全是一种机械的非辩证的观点。相反，组织自身也会和阶级觉悟一起，在斗争中诞生。针对如此浅薄的见识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那句话对于我们来说决不仅仅是群众集会上一句漂亮的空话，而要当作我们唤起群众的最认真的话：工人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发表于《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5年柏林德文版第256—257、269—271、320—321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2册第595—604页。

（王小华译 李宗禹校）

---

<sup>①</sup> 德国工会第5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5月22—27日在科伦召开，通过了否认政治性群众罢工是工会斗争的手段的提案。——编者注

## 我们想要什么？(摘录)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纲领解说

(1906年)

—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是，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共同斗争，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说，他们力求达到消灭土地、工厂、作坊和矿山的占有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把所有这些生产资料都变为劳动人民的公共财产。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英国和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在德国，工业便开始发展，在发展的初期，这些国家的工人就已经为剥削与贫困所逼，起来进行斗争了。在运动开始时，英国的工人捣毁工厂，砸坏机器，因为他们以为，工厂和机器是造成他们贫困的祸根。1831年里昂的纺织工人举行了反饥饿暴动，1844年德国和波希米亚的西里西亚家庭织工也奋起斗争，因为工厂主的剥削已使他们忍无可忍。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倚仗占优势的残暴力量，很快就把这些运动镇压下去。这仅仅是工人群众的痛苦和愤怒的早期的自发表现。当时，起义的工人既不理解他们贫困的原因，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是亿万

劳动者免除痛苦的唯一有效的法宝，这种思想当时还刚刚在少数几个天才思想家，如英国的罗伯特·欧文、法国的沙尔·傅立叶和圣西门等人的头脑中开始产生。一小撮富人游手好闲，穷奢极欲，广大劳动人民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使道德败坏之风在有产阶层中四处蔓延；工人在精神上变得粗俗野蛮——凡此种种，使这些思想家十分憎恶现在的社会制度，迫使他们去寻求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的出路。尽管这三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都确信，现存的制度是建立在极端不公平和损害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们都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私有财产是工人苦难的根源，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才是人类的救星。

但是，这些工人阶级的天才代言人没有一个能够在上世纪初指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他们把目光放在资产阶级中某些有正义感的个别人物身上，企图物色有钱的慈善家和救济家，希望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从而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是这样的救济家是没有的。即使能够找到几个，他们的努力，作为个人的努力，也会是徒劳无功的。这些天才人物谁都没有想到，唯独这些受苦、卑贱和无知的工人群众本身负有改革整个社会的使命，他们也将逐步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想是高尚的梦想，是空想，因此，我们把这些入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直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才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努力奠定了新的、坚实的基础。他们宣称，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施舍者的善举能够帮助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向全世界工人阐明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斐迪南·拉萨尔，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奠定的。他们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仅是

美好的想法和正义的要求，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机器生产和大工业的发展使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陷于贫困并完全依附于资本家。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难以糊口，往往不能供养家庭。工人的妻子和尚未成年的子女也被迫替资本家做牛做马。因此，工人的家庭生活也横遭破坏，他们的健康从小就备受摧残。不仅如此，数年一度的周期性工业危机使得生产停顿、商品滞销，成千上万勤劳的工人失去工作和面包，使得本来就有许多痛苦的劳动人民又要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未来担忧。

但是，另一方面，大工业的这一发展使工人阶级，就是说，使不满现状的大军日益集中，日益扩大。与工厂和大土地占有的竞争使小手工业师傅和耕作自己小块土地的农民破产。失去工场和土地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市和工厂区。于是，越来越多的被剥夺了财产的无产者群众在工业中心聚集起来。这就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已构成社会的绝大多数。也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剥削的牺牲品，他们的力量就在于联合和团结。

与此同时，剥削者的财产也越来越集中，但是他们的人数在人口中的比重则在下降。由于工业竞争的结果，少数拥有数千工人、产值以百万计的大工厂取代了许多中小企业和工厂。股份公司代替了许多私人企业。在股份公司中，各个资本家只是拥有他投入企业的资本所取得的股份的股东。资本家根本不参加生产，而由支薪的经理管理，但是工人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的利润却流入资本家的口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贡献，而仅仅因为他们是机器、土地和房屋的占有者而已。这样，大家便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家不过是寄生虫，他们在生产中是多余的人。

于是，工业的发展便使工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拥有全部财富，而另一方面，工人却一贫如洗，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手里，并被用来剥削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

人。剥夺私人剥削者的工厂、土地和矿山并把这些财产交给全体劳动人民共同使用，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扩大，因为相对来说，越少的占有者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生产。

虽然资本家的人数也在增长，但是正在成为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工人的增长，较之前者，简直快得无法比拟。

同时，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今天就已经起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广大群众难以逆料的生活和贫困、卖淫、军国主义等等，势必很快就会使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发生彻底的蜕化。如果听任资本继续统治下去，那么，过了一定时期，人类社会势必普遍野蛮化。因此，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同当年废除农奴制度一样，是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

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今天只需要做到一点：工人阶级必须理解到，废除资本主义是他们的使命，为了斗争，他们必须团结在一个统一的组织里。当前，这种认识和这种组织都在向前发展，而且必将和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发展一起继续向前发展。

今天，工业发展几乎遍及欧洲所有国家、北美和澳大利亚，也波及亚洲，甚至非洲腹地。它使劳动阶级的贫困和不满蔓延到整个世界和各个民族。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国际祸害。所以，世界各国的工人也必须共同和一致地反对剥削。在任何国家里，要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消灭私有制，如果不依赖其它国家，那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而工人的家里却遭受贫困的所有国家里，工人一下子起来进行共同斗争，才能带来社会主义变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以这样一个号召结束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它的宗旨是，联合

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的工人组成一支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大军。

社会主义制度将使人类社会真正摆脱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剥削人，人统治人，掠夺成性的民族压迫被奴役的民族，歧视妇女的男权统治，摆脱因宗教、教派或信念不同而进行的迫害。诚然，企图详尽地想象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面貌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切这样的试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个未来制度的主要基础在今天就已经有充分的把握可以看出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基础之上，生产不是由每个生产者自己，而是由整个社会及其选举出来的机构管理，这就足够了。这样我们就可得出结论说，在未来的制度下既不会有贫困，也不会有懒汉充斥，既不会有危机，也不会对明天心中无数。随着向私人剥削者出卖劳动力的情况的消除，造成今天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就消失了。

可见，社会主义是要实现人类几千年来所憧憬的那种社会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出现了傅立叶、欧文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在他们之前，社会主义的理想之光就已经在人类社会中闪烁可见了。二千年前，第一批使徒就联系原始基督教来宣传财产公有和富人与穷人共命运。十六世纪，在德国进行流血的农民战争期间，也就是在愤怒的农奴起来斗争期间，主要农民领袖之一，高贵的托马斯·闵采尔也宣布过财产公有的福音。

但是，要实现这种理想，迄今以前是不可能的，这要在机器大工业发展以后才能付诸实施。只有资本主义才把人类的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即依靠当前的生产技术，社会上所有的成年人甚至只要每天工作六小时，就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资料而绰有余裕。而且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出能够进行这个伟大变革的社会阶级——今天的工业和农业的无产阶级。古代希腊和罗马不幸的奴隶只能

偶尔在绝望中举行毫无结果的起义，并在实行疯狂报复的奴隶主手中痛苦地死去。中世纪的农奴只能举行自发的暴动，洗掠贵族的庄园，在受到优势力量的镇压之后，又不得不重新被人奴役。现代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能够把自己和整个人类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我们习惯于把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耶稣诞生算起，但是基督教丝毫也没有减轻被剥削群众的痛苦。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才能使人类进入一个真正的新纪元。

尽管今天还有一些所谓理智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幻景，是病态的妄想。但是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除了鼻子底下的事情，什么也看不见，并且害怕一切新生事物。在当年德国废除中世纪的行会法规时，那些可爱的行会师傅声称，取消行会，就会天下大乱。上世纪初，巴伐利亚州要修筑第一条铁路时，该州某市的一个市议员断言，坐火车旅行对人们的健康、智力和安全都有危险，因此，修铁路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历史和进步的车轮总是不管懦夫或者唯恐失掉特权的人们的警告和担忧而平稳地向前滚动的。

今天，社会主义变革已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目标，社会的进步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这个目标。要迅速达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各国工人阶级最准确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将采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 二

无产者阶级有能力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说，有能力剥夺资本家的工厂和大地主的土地。但是实现这项任务却不那么容易。很明显，如果某家工厂的工人试图“夺去”厂主的财产，其结

果只能是遭到警察的逮捕。他们会受到控告，最后被加以侵犯他人财产的罪名而锒铛入狱。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某个城市的大批工人约定时间采取共同行动，以剥夺当地工厂主的财产，那么，军队就会来援救受到威胁的资本家，并用刺刀和枪弹向工人宣布，资本家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些事例足以表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剥削是受到敌视工人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法庭的庇护的。事情还不仅如此。法庭审判工人侵犯资本家财产所依据的法律就是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那些人制定的。用来维持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的费用的税收，几乎全部都由劳动人民负担，而资本家则几乎分文不纳。国家出资开办的学校和民众教育机构主要是为培养富有的资产阶级子弟服务的；这些机构是劳动人民难以进入的，由于愚昧无知他们才会温顺地、被动地听从于资本家。甚至在靠工人群众的税金过活的教会里，神甫牧师们也劝诫工人，要他们屈从资本家的剥削，尊重资本家的财产，忍受自己的贫困和屈辱。

这样，国家所有的设施，不论是军队、行政、立法、审判权，或者是税收制度、学校、教会，都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都是他们用以对付无产者阶级的工具。全部国家政权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因此，资本家不仅掌握着生产资料，而且也掌握着国家政权。而且整个资本家阶级在国家中从政治上统治着劳动人民。

有鉴于此，如果工人不先夺取资本家的政权，不先夺取军队、立法权、行政权，就无法剥夺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只要所有这些统治和暴力手段还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私有制和剥削就可得到有力的庇护，工人就是在梦里也休想取消它们。所以，生产工具社会化的第一个前提是，工人阶级必须把国家政权，即政府、立法权、军队、税务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

夺取政府对于社会主义变革之所以必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



今天，生产是每一个私人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或者是每一个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自己随意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建立在把所有这些私有经济结合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和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确切地说，必须按照共同计划为整个社会进行生产。今天的法庭、今天的学校、今天的军队，也是根据一个社会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它们完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彻底加以改变。这样一场巨大而普遍的改革，只能从一个掌握政权和相应手段的中央机构开始进行。这样的变革，要进行象剥夺所有剥削和压迫的特权这样的改变，不可能不遭到迄今享有这些特权的个人的坚决反抗。工人阶级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就要掌握迫使这些反抗者就范的手段，掌握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进行必要改革的手段，以及彻底改革国家机构的手段。总而言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序曲，工人阶级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家中实行专制，就是说，要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

所以，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解放斗争首先必须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场为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而夺取国家统治的斗争。

今天在西欧各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不是通过其它途径取得政权的。在工业兴起之前，在中世纪，甚至到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在国家中毫无地位，而依仗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封建贵族却占据一切。不属于贵族阶级的商人、资本主义企业主、富裕的手工业者，对政府、立法、财政和农民或者工人一样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只有负担苛捐杂税的义务，手工业者和商人备受贵族的掠夺，得来的只是鄙视和屈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资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封建统治的时候才告终止。当时在西欧一些最主要的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革命。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率领巴黎人民，依靠人民的拳头把贵族赶出了政

府，废除了所有中世纪的贵族族徽和贵族血统的特权。这场革命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了许多年头之后，富人和资产阶级才完全统治了法国，直到今天。1848年德国和奥地利也发生了同样的革命。

那时候资本家阶级对革命，对流血，对暴力手段都不反感。这是关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事，但是在这些革命中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的主要是工人阶级，是他们在街垒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今天该轮到工人阶级了，他们应当为自己争取统治。

资产阶级从中世纪贵族手里夺取政权以后，对于人民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下剥削和压迫的新形式而已。“自由雇佣劳动者”的饥饿鞭子代替了农奴制度的鞭子，工厂劳动的地狱代替了贵族权杖的奴役。工人阶级谋求政权不是为了制造统治和压迫的新形式，而是为了永远根除压迫和统治。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并以严厉的手段运用它来清除今天的社会机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将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使用暴力，也是使用暴力以来第一次有利于被剥夺了遗产的广大群众。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工人阶级还没有准备好执行正在等待他们的伟大使命。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事先必须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志向，广大人民群众也必须获得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觉悟。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同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日常的、不懈的斗争来为夺取政权作好准备。为了使工人群众能够至少部分地摆脱处于剥削给他们造成的贫困程度，工会斗争是必要的。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并逐步加强对立法和全部国家政策的影响，也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但是如果工人象一盘散沙，或者作为个人，或者作为松散的团体，那是无法进行改善生活的斗争

的，也无法夺取国家政权。为此，他们必须组成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阶级政党。它无时无地不在捍卫工人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它把工人群众集成一支战斗的大军，它在群众中传播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并且力争在国家机构中获得影响。一旦各重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把大多数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敲响了。

### 三

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奋斗目标。它把法国和波兰的、德国和西班牙的、俄国和英国的、意大利和美国的工人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最合乎人性的兄弟共同体，因为它向他们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工人问题的国际性质今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每逢进行大规模罢工或者选举斗争，各个国家和各个大洲的工人组织都相互进行兄弟般的支援。

但是，为了进行日常的斗争，不同国家的工人不可能建立共同的政党，他们不得不在每个国家单独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斗争中捍卫自己在国家中的利益，并且力求使现存的国家机构逐步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是每一个现存国家其机构和政治状况是各不相同的。瑞士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在那里成年男子在普选中不仅可以选举国会议员，甚至可以选举部长，即政府成员。在德国，虽然议会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但是君主政体通过宪法的保障，可以对政府和立法机关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奥地利和比利时，连一部人人平等的议会选举法都没有，致使立法成了贵族和富有市民的特权。但是首要的一点是，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通过特殊的政府、特殊的议会和特殊的军队在进行统治的。适应国家状况的这种特殊性，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要进行反对本国的政

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的特殊的斗争，争取影响本国的国家机构。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无产阶级是俄罗斯国家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几十年来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同样受到专制主义的压迫。沙皇政权不但在物质上剥削了波兰人民，也剥削了俄国人民。这个专制政权和今天的任何政府一样，不是按民族，而首先是按照他在社会上的阶级属性来区分它的臣民的。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波兰剥削者的利益和俄国剥削者一样受到庇护和保护。而俄国工人则和波兰工人一样都在残酷的专制下呻吟。虽然波兰工人除了要忍受政治压迫外，还要忍受民族压迫和对波兰语言的迫害。但是，几百年来沙皇政府迫害俄国臣民——无论是反对祭神仪式派教徒或者是其他教派的信徒——，侵犯他们的信仰自由，其残忍程度并不亚于它对波兰人民的迫害。它用皮鞭向俄国农民榨取赋税，较之它对波兰农民的掠夺要野蛮得多。

大家共同处于无权地位，同受阶级压迫，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这对于波兰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都同样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政治斗争中波兰工人和俄国工人是一个整体的，是有一个政治纲领的一个政治阶级。

虽然就遭受异族统治这一点来说，波兰人民在俄国的处境有所不同，但是，即使波兰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民族政府，它也依然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就如同俄国无产者有自己的俄国政府或者加里西亚的波兰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波兰贵族组成的自治政府，也依然要受剥削和压迫一样。如果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所处的政治境况要比波兰工人好得多，那决不是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民族政府下生活，而仅仅是因为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早就废除了专制统治，那里的工人可以利用一种在俄国还得争取的政治自由。资产阶级统治者和贵族在进行剥削

时，是不区分本族工人和外族工人的。资本家并不尊重工人的民族特性，他们把每一个无产者都仅仅看作能够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工具，今天的各国政府都不分民族地把工人阶级仅仅看作服兵役，榨取捐税，进行资本剥削的原料。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救星。可见，如果波兰工人阶级今天不是俄国政府的臣民，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波兰，那么这个波兰国家也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地狱，就象无产阶级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所以重建波兰国家也不可能是波兰无产阶级的任务。工人阶级不是要争取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要努力废除它们；不过，首先要尽量扩大他们所在的国家的政治自由。所以，工人的利益不是要求把波兰从俄国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是要求铲除俄国的专制政权，使波兰和俄罗斯劳动人民都获得政治自由。

今天，重建波兰本身就是一种糊涂思想。从前，独立的波兰是一个贵族的国家，它还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在波兰萌芽以前，就已经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随着波兰王国工业的发展，兴起了一个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一开始就是民族起义和争取独立的敌人。波兰资产阶级在俄国既可以找到一个有利可图的商品销售市场，又可以在反对波兰工人阶级方面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援助、保护和有效的支持。现在，就连波兰贵族也能从本地的工业发展和从俄国政府向剥削阶级提供的保护中捞到好处。他们也早已放弃了起义的念头。今天，波兰资产阶级和贵族都是俄国统治的支柱，在波兰社会里，除了顶多是一小撮无能为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外，是没有哪个阶级会梦想波兰独立的。

自从俄国和波兰爆发革命以来，原先用重建波兰的糊涂思想迷惑工人的那些人，再也不敢提出民族起义的口号了，而是不得不

收起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且以这种方式承认自己的失败。波兰的资产阶级、波兰的贵族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着手去重建波兰，而且一开始就支持沙皇政权压迫波兰的无产阶级。

现在，无产阶级就更加不能提出贵族早已放弃、波兰资产阶级则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的重建波兰这个目标了。要使波兰独立，工人阶级不仅要战胜三个瓜分国的反抗，而且还要战胜波兰资产阶级的全部经济势力，这种势力是在附属于俄国的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并同这种附属关系紧密相连。换句话说，要重建波兰，工人阶级首先要在我们的国土上取得政权。但是工人阶级当权的时刻一旦到来，他们的任务就不是重建波兰国家了，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了。这种制度将保证波兰人和所有其他民族都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波兰人在沙皇政权统治下所受到的民族压迫，工人阶级不能等闲视之。它既然要消灭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压迫和统治，同样也必须消灭民族压迫。但是这种任务不是波兰无产阶级特殊的民族任务。使波兰人丧失民族特征永远是专制统治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专制统治既是俄国劳动人民的死敌，也是波兰劳动人民的死敌。因此，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同波兰无产阶级一道，为在俄国境内消灭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而共同奋斗。因此，就是争取民族文化自由的斗争也不是波兰工人特殊的任务，而是波兰和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任务。

1906年出版于华沙。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9—52页。

（黄敬甫译 黄永繁 李宗禹校）

#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1906 年)

—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主义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全部著作和言论，几乎都是在大规模地运用这一斗争手段而进行的首次历史试验——俄国革命之前发表的。因此，它们大部分都过时了。就其观点而言，它们的立场同弗·恩格斯基本上一样。1873年，恩格斯在批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制造革命的活动的文章中写道：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

---

\* 本文是根据1906年出版的手稿印本刊印的。在手稿印本封面上刊有“作为手稿刊印。受社会民主党汉堡州组织执委会和阿尔托那、奥腾森、王德斯贝克的社会主义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委托”的说明词。在1906年出版的第一版中的补充同样也见脚注，第一版删去的地方用方括号标出。—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注中一版的不同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

不过这匹马原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工作（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第234页），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sup>①</sup>

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后数十年里对群众罢工表态时所依据的论据。它完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理论的，即针对那种把总罢工当作与工人阶级日常政治斗争相对立的、发动社会革命的手段。这一论据仅限于指出下述简单的两难处境，要么整个无产阶级还没有强大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因而不能进行总罢工；要么它已组织得足够强大，因而无须进行总罢工。这种论据竟然如此简单明了，而且乍看起来又是如此无可反驳，因此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它作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胡思乱想的逻辑武器，作为在工人当中最广泛地传播政治斗争思想的工具，为现代工人运动建树了卓越的功勋。所有现代国家的工人运动近二十五年来所取得的伟大进步，光辉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捍卫的、与巴枯宁主义相反的政治斗争策略；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象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4—565页和724页注412。——编者注



今天这么强大，它之所以能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主要是始终不渝地坚决运用这一策略的直接结果。

现在，俄国革命对上述论据作了彻底的修正。它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我们下面将要进一步阐述的——总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议的政治斗争策略或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批判是错误的；相反，日前在俄国革命中创造出阶级斗争新因素和新条件的那些思想与方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的思想与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的实践也是以这些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作为群众罢工思想的第一次历史大演习，俄国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无政府主义的名誉，相反，它倒是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性清算。社会民主党近数十年来在德国的迅猛发展迫使这一思想流派处于可悲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议会政治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延续得很久来解释。在风平浪静的议会日常活动时期，完全按照“动武”和“直接行动”来设想的、把革命理解成直截了当拿起草叉就干的那种“革命”派别，毕竟可以仅仅暂时停止发展，等到直接的公开斗争时期重新到来时才在街头革命中再活跃起来，并发挥它的内在力量。尤其是俄国，似乎特别适于作无政府主义英雄们试着大显身手的天地。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毫无政治权利，组织也极为薄弱；它的人民的各个阶层形成一群乌合之众，都有大相径庭的各自利益；它的民众的教养很差，而它的统治集团在使用暴力方面却十分野蛮——所有这些，仿佛特别适于让无政府主义起来突然夺取政权，那怕这也许是短命的。最后还有一点，俄国是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诞生地。但是，巴枯宁的祖国却反倒成了埋葬他的学说的地方。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未站在斗争的前列；革命行动及群众罢工的政治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当作

“资产阶级政党”而拼命加以反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手中，或者部分地掌握在象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那类多少受社会民主党影响并与之靠拢的社会主义组织手中；还不止如此，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不是什么严肃的政治派别。只是在情况极为困难——各民族的工人混杂在一起，分散经营的小企业占主要地位，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很低——的立陶宛小城比亚韦斯托克，在七八个不同的革命小组当中也有一小撮黄口小儿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竭力助成工人中的混乱和困惑<sup>①</sup>；前不久，在莫斯科或许还有其他两三个城市里也发现了一小撮这类分子。不过，抛开这几个无政府主义“革命”小组不谈，无政府主义目前在俄国革命中的真正作用究竟如何呢？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了下贱的盗贼和抢劫犯的招牌。私人遭受的无数次失盗和抢劫，大部分都是打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旗号干的。每当不景气和革命处于暂时守势的时候，这类罪行就会象浊浪一样翻腾起来。在俄国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战斗无产阶级的理论，倒成了象尾随革命战舰的一群鲨鱼似的反革命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招牌。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大概已经就此结束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俄国，群众罢工不是作为绕过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而运用戏剧性手法去突然发起社会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首先为无产阶级创造日常政治斗争、尤其是议会斗争的条件的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证明了政治权利和政治条件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并反对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而以全力捍卫了这一观点；在把群众罢工当作最重要的武器而加以运用的俄国，劳动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正是为了争取这些政治权利和条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因此，

---

<sup>①</sup> 第一版中为：“他们竭力加强工人中的混乱和困惑”。

作为马克思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石的历史辩证法，现在已使得过去与群众罢工思想密不可分的无政府主义同群众罢工的实践本身形成了对立；与此相反，过去被看作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对立而遭到反对的群众罢工，今天却成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最强大的武器。因此，如果说俄国革命使得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罢工的旧的立场作彻底的修正，那么在这样做时获得胜利的仍旧只是以新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和观点。穆尔所爱的人只能死于穆尔之手。<sup>①</sup>

## 二

由俄国发生的事件而导致的对群众罢工问题所作的第一次修正，涉及的是对问题的一般理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象伯恩施坦、艾斯纳<sup>②</sup>等积极主张在德国搞“群众罢工”试验的那些人，还是象在工会阵营中例如由伯麦尔贝格所代表的坚决反对搞这类试验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基本相同，都是无政府主义观点。这两个表面上对立的极端不仅互相排斥，而且象常见的那样，同时又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来说，他们直接对“大崩溃”的投机，对社会革命的投机只是一个外部的、非本质的特征，他们对待群众罢工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切条件的全部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才是本质的。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搞“革命”投机的物质前提只有两样东西：首先是蓝色的空气，其

---

① 这是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角卡尔·穆尔说的话。“穆尔”在原文中为“卡尔”。参看该书中译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56页。——编者注

② 库尔特·艾斯纳（1867—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曾任《法兰克福报》、《前进报》编辑。1910年是《慕尼黑邮报》主要撰稿人。后为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人之。领导1918年1月慕尼黑反战罢工。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政府主席，不久遇刺身亡。——编者注

次就是他们要将人类从今天的资本主义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善良意志和勇气。无政府主义者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根据推理凭空想出群众罢工就是跨入美好社会彼岸的最短、最有把握、最方便的途径；近来，他们根据冥想又同样地凭空想出，工会斗争是唯一真正的“直接群众行动”，也就是唯一的革命斗争——大家知道，这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最新的异想天开。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样做时的致命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凭空杜撰的斗争方法总是打错算盘，即纯粹是些乌托邦，而且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把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糟糕现实考虑在内，所以他们在这种糟糕的现实中往往从投机革命突然变成反动派的实际帮凶。

今天，无论是近期内想在德国通过执委会决议为举行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那些人，还是象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那样想以“禁止”宣传来使群众罢工问题化为乌有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两派都是从共同的、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象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尽管群众罢工的反对者们恰恰认为自己与那些浮在空中硬是不顾严酷的现实及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不同，认为理应将认识到德国当今局势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这份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们象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的格莱德格林特先生那样叫喊着“事实与数字，数字与事实！”。工会里的反对群众罢工的人们理解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条件”是指两个因素：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弱小，另一方面是普鲁士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强大。工人没有足够的组织和储金，而普鲁士的刺刀却灼灼逼人，这就是这些工会领袖们在当前情况下制定自己实际政策时所依据的“事实与数字”。诚然，工会的储金和普鲁士的刺刀无疑是

十分物质的和十分历史的现象，但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观点却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普特卡默的警察唯物主义。资产阶级警察国家的代表也非常而且仅仅注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实际威力和刺刀的物质威力，并且仍旧能从这两类数字的比较中得出令人镇定的结论：革命的工人运动是由个别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搞起来的，因此，我们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这种令人不悦的“暂时现象。”

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煽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这种警察理论的幽默味是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早就领会了的。

几位可爱的同志自愿组成一支夜巡队来警告德国工人提防一些“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危险行为和他们的关于“群众罢工的宣传”，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同工会总委员会的某些“秘密”协议欺骗了他们，从而使德国群众罢工无法爆发，因此导演了一场哀婉动人的发泄不满的运动，但是这两件事所表现的观点却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问题取决于革命浪漫主义者点火似的“宣传”，或者取决于党领导的秘密或公开决议，那么俄国直到现在也不会爆发一次真正的群众罢工。1905年3月，我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就已强调指出<sup>①</sup>，在俄国，人们比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都更加不会想到去“宣传”或者那怕去“讨论”群众罢工，至于俄国党执行委员的那些确实宣布自愿举行群众罢工的个别决定与决议，譬如上次在今年八月解散杜马之后的尝试，几乎全都失败了。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

---

<sup>①</sup> 指发表在1905年3月3日《萨克森工人报》上的文章《证实设想的一次演习》。

——编者注

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

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凭空进行抽象的逻辑分析，可以完全同样有力地证明群众罢工是绝对不可能的，是肯定要失败的；也证明它是完全可能的，是无疑会胜利的。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中，证明的价值相同，也就是毫无价值。所以，特别是对“宣传”群众罢工的那种恐惧，它只不过是令人发笑的误会的结果，这种恐惧甚至导致对被误认为犯了这一罪过的那些人一本正经地进行诅咒。把群众罢工当作抽象的斗争方法来加以“宣传”，这是不可能的，正象不能宣传“革命”一样。“革命”和“群众罢工”的概念本身都只表示阶级斗争的表面形式，它们只有同十分确定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和内容。

假使有谁想把群众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行动方式列为正规的鼓动的内容并兜售这种“思想”，以便使它渐渐获得工人的支持，那么这将是多余的，也是无聊而乏味的，正象有谁想把革命或街垒战思想当作一种特殊的鼓动的内容一样。现在，群众罢工已成了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深感兴趣的中心课题，因为它代表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而且作为这样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又是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可靠标志。它证明德国无产者大众具有健康的革命本能和活跃的智慧，他们不顾工会领导人的顽固阻挠，以如此热烈的兴趣对这一新问题表示关注。但是，要满足工人的这种兴趣，满足这种高尚的求知欲和对革命行动的渴望，我们不能用关于群众罢工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抽象智力游戏去折磨他们，而是应该向他们说明俄国革命的发展情况，这

次革命的国际意义，阶级斗争在西欧的尖锐化，德国阶级斗争今后的政治前景，群众在即将来到的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只有以这种形式开展群众罢工问题的讨论，才能扩大无产者的思想眼界，才能加强他们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他们的思想方法，才能锻炼他们的魄力。

可是如果人们采取上述立场，那么反对“革命浪漫主义”的人要打的那场官司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他们指责有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没有准确地遵照耶拿决议的原文。“实际政治家”们对这项决议至少还是满意的，因为它把群众罢工首先同普选权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以为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应使群众罢工保持纯粹的防御性质；其二，应使群众罢工本身从属于议会政治，成为它的单纯陪衬。但是耶拿决议在这一方面的真正核心却在于：就当前的德国形势而言，反动统治者对国会选举权所搞的破坏，非常可能成为进入激烈政治斗争时期的因素和信号。在这样的斗争中，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或许将首先用于德国。然而，如果想以一项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措词对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现象和问题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历史的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和人为地规定，那么这是同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对讨论下禁令毫无二致的目光短浅的作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党代会决议中正式记录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条件由于俄国革命所发生的深刻巨变，证明了党具有革命的发展能力和对下阶段阶级斗争所提出的新要求的适应能力。耶拿决议的意义正在于此。至于说到如何在德国实际运用群众罢工，这要由历史去作出决定，正象历史曾在俄国作出了决定一样；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那些决议固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仅仅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

### 三

经常出现在德国日前的讨论中的群众罢工，是一种设想得十分明确简单、轮廓清晰的单一现象。谈到的仅仅是政治罢工。人们设想，某种影响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引起工业无产阶级搞一次伟大的罢工，而且是根据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之间及时达成协议而开始的，然后罢工就本着纪律的精神极有秩序地进行，并按领导机构及时发出的口号秩序井然地停止，而援助、费用和损失，总之，群众罢工的全部物质方面的收支平衡，则是事先就精密地确定的。

如果将这一理论模式同五年来俄国发生的群众罢工工作一番对比，那么我们必须说，已经发生的许多次群众罢工几乎没有一次符合在德国的讨论中占中心地位的那种设想；另一方面，俄国群众罢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完全不能说它们是“这种”群众罢工，即一种抽象的、符合模式的群众罢工。群众罢工的各种因素和它的特点不仅在俄国的不同城市和地区有差异，而且主要的是，它的一般性质在革命过程中多次发生变化。在俄国，群众罢工已经经过了一段历史，它还在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所以，谁要谈论俄国的群众罢工，谁就必须首先着眼于它的历史。

日前所谓的俄国革命的正式时期，理所当然地是从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奋起，即冬宫前二十万工人的队伍惨遭血洗开始的。大家知道，彼得堡的血腥屠杀是俄国第一次大批爆发群众罢工的信号，它们在几天之内横扫整个俄国，并把从彼得堡发出的革命的冲击呼号传遍帝国的每个角落和无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但是1月22日彼得堡工人的奋起也只是在这以前已经在1905年1月波及沙皇首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的最激烈的时刻。在这以前不久，在1904年12月，高加索和巴库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



工，一度曾使整个俄国处于紧张状态，而彼得堡的一月大罢工无疑是在那次总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巴库十二月事件本身又无非是1903和1904两年中象周期性地震一样震撼整个南俄的一些强大的群众罢工的最后一次强烈余震，它们的序幕则是1902年3月的巴士姆（在高加索）大罢工。这是日前象火山般爆发的一连串革命的第一次大罢工运动，而归根到底，它和1896及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声势浩大的总罢工相隔不过四、五年，即使几年的表面平静和顽固的反动似乎从外表上将这一运动同今天的革命分开了，但每个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力量达到日前这种程度的内部发展史的人，都会认为现阶段群众斗争的历史是从那次彼得堡的总罢工开始的。彼得堡的那些总罢工已经孕育着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主要因素，仅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对群众罢工问题就是重要的。

最初，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只是表现为一次纯经济的局部工资斗争。彼得堡纺织工人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是爆发那次罢工的起因：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十四甚至十五小时，计件工资少得可怜，而工厂主极端卑鄙无耻的刁难手段却是应有尽有。就是这种状况，纺织工人们也耐着性子忍受了很久，直到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冲破了他们的忍耐限度。1896年5月，日前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举行因害怕革命家而推迟了两年的加冕典礼。为此，彼得堡的工厂主们给工人强行放假三天，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但奇怪的是不给工人发这几天的工资。被激怒的纺织工人开始行动起来。大约三百名最有觉悟的工人<sup>①</sup>在叶卡特林娜公园进行磋商之后决定罢工，并提出下述要求：1. 发放沙皇加冕日的工资；2. 实行十个半小时工作日；3. 提高计件工资。这事发生在5月24日。

---

<sup>①</sup> 第一版中为“最有觉悟的工人中的三百人”。

一周以后，所有的纺纱厂和织布厂都停工了，四万名工人举行总罢工。用强大的革命群众罢工的尺度来衡量，这次总罢工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件区区小事。但在当时俄国死气沉沉的政治情况下，总罢工却是空前的，甚至是一次完整的小型革命。当然，随即开始了最残酷的迫害，约一千名工人遭逮捕并被遣送还乡，总罢工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的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但这次运动的实现却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多年鼓动的成果。在总罢工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分子站在运动的最前列，领导这次运动，并利用运动本身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鼓动。其次，从外表看，这次罢工是一次纯经济性的工资斗争，但政府的态度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却使它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政治事件。最后还有：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工人遭受了一次“失败”；但次年即1897年1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就再度举行总罢工，而且，这一次大获成功：在全俄国实行了法定的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但是更加重要得多的成果却是：1896年第一次总罢工是在既无任何组织又无任何罢工储金的情况下举行的。从那以后，俄国本土开始出现紧张的工会斗争，很快就从彼得堡波及全俄，这一斗争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并且在随后的表面上死气沉沉的时期通过隐蔽的地下活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了准备。

1902年3月爆发的高加索罢工，似乎也 and 1896年那次同样是偶然的，引起它的因素虽然完全不同，但仍旧是纯粹经济性的，局部性的。高加索罢工与严重的工商业危机有关，而这一危机又是日俄战争的前奏，两者结合起来成了正在开始的革命动乱的最大因素。危机使大批工人失业，这促进了无产者大众中的鼓动工作。为了使工人阶级安定下来，政府把“多余的人手”押送还乡。

这一措施要使大约四百名石油工人受害，因此在巴士姆引起了群众的抗议，发生了示威游行、逮捕、屠杀，最后导致一场政治审判，于是纯经济性的局部事件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性的革命事件。这场“毫无结果的”并且遭到镇压的巴士姆罢工的反响是在下新城、萨拉托夫和其它城市爆发的一系列工人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运动普遍浪潮的一次有力冲击。

作为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回响，1902年11月已经在顿河沿岸的罗斯托夫爆发了总罢工。弗拉基高加索铁路的工厂里的工资争议促成了这次罢工运动的爆发。铁路当局想降低工资，于是社会民主党顿河委员会发出举行罢工的号召，要求：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取消惩罚，解雇不受工人爱戴的工程师等等。铁路所属的所有工厂一齐罢工。随即，所有其他行业也纷起响应，于是整个罗斯托夫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各个行业都停止了工作，每天都在露天举行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工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有时会场四周还布下哥萨克的纠察线，这时，社会民主党的人民演讲员们首次公开露面，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振奋人心的演说，使听众大受鼓舞，还散发了数以万计印有革命号召的传单。在顽固的专制主义俄国的中心，罗斯托夫的无产阶级通过猛烈冲击第一次争得了自己的集会权和言论自由。当然，这里也是伴随着一场屠杀的。弗拉基高加索铁路工厂的工资争议在几天之内就演变成一场政治总罢工和革命的街头战斗。立即随之而来的反响是，在这条铁路的蒂霍列茨克车站，也发生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也引起了屠杀，并进一步引起一场审判。于是，作为一段插曲，蒂霍列茨克罢工成了由许多革命时刻结成的不可分割的链条中的一环。

1903年春天，作出了对镇压罗斯托夫和蒂霍列茨克罢工的回答；在五月、六月和七月，罢工的火焰燃遍了俄国南方，巴库、梯弗

里斯、巴士姆、耶里萨沃格勒、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沃、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处于地地道道的总罢工之中。不过这里的运动也不是从某个中心按事先拟定的某种计划发生的，而是从各处汇合起来的，并且各有各的起因，各有各的形式。起初是在巴库，那里的个别工厂和行业的一些局部工资斗争最后汇成一场总罢工。在梯弗里斯，罢工是由两千名商业职员搞起来的，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直到夜里十一点。7月4日晚上八点，他们全部离开商店绕城游行，要求店主关上店铺。他们大获全胜：商业职员的工作时间改为从早八点至晚八点。所有的工厂、作坊和办事处立即参加了他们的罢工队伍，报纸不能出版，有轨电车只能在军队保护下行驶。在叶里萨沃格勒，所有的工厂于7月10日开始罢工，提出了纯经济性的要求，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满足，罢工于7月14日停止。但两周后罢工重新爆发，这次是由面包工人发起的，采石工人、细木工人、染色工人、磨坊工人以及全体工厂工人随即响应。在敖德萨，罢工运动是以一次工资斗争开始的，由政府奸细按著名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sup>①</sup>的计划建立起来的“合法”工人联合会<sup>②</sup>也卷进去了。历史的辩证法又乘机玩了一个漂亮的恶作剧：早期的经济斗争——包括1896年彼得堡总罢工——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夸大了所谓的“经济主义”，因而在工人中间为祖巴托夫的骗局准备了土壤。可是不久，伟大的革命洪流却使这条打着假旗号的小船掉转船头，迫使它漂浮在无产阶级革命舰队的先头。祖巴托夫的联合会于1904年春天发出了举行敖德萨大罢工的口号，1905年1月又发出了举行彼得堡总罢工的口号。敖德萨的工人被政府所表示的对工人的真挚友好和对纯经济斗争的同情冲昏了头脑，打算突

---

<sup>①</sup> 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祖巴托夫（1864—1917）——曾任沙皇俄国警察司特别局局长。1901年开始创建听命于宪兵及警察当局的工人组织，当时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编者注

然搞一次演习，于是强迫祖巴托夫的“工人联合会”宣布在一个工厂里为不高的要求举行罢工。后来厂主干脆把罢工工人开除，而当他们要求联合会领导人履行关于当局给予保护的诺言时，这位先生却溜走了，置处在愤怒骚乱之中的工人于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立刻站到了前头，罢工运动波及其他工厂。7月1日，两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举行罢工；7月4日，港口工人罢工，要求将工资从八十戈比增加到两卢布并将工作时间缩短半小时；7月6日，海员也参加了运动；7月13日，有轨电车的工作人员开始罢工、于是召开了一次有七千至八千人参加的全体罢工者大会，组成一支队伍到各工厂游行，队伍象滚雪球似地很快扩展到四五万人，奔向港口，使那里的各项工作都陷于瘫痪。不久便掀起了全市的总罢工。在基辅，铁路工厂于7月21日开始罢工，罢工的直接原因也是劳动条件太差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次日，铸造工人起来响应。7月23日发生了一次冲突，成了总罢工的信号。那天夜里有两名铁路工人代表被逮捕，罢工者立即要求将他们释放，但未获满足，于是罢工者决定不让火车从城里开出。全体罢工者携带妻子儿女坐到车站的铁道上——成了一片人山人海。人们以排射威胁他们；但工人们袒露胸膛高喊：“开枪吧！”一阵排枪射向坐在地上手无寸铁的人群，倒下了三四十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听到这一消息的当天，全基辅立即掀起罢工，群众抬着遇害者的尸体，组成队伍到各处去游行。集会，演讲，逮捕和个别的巷战——基辅沉浸在革命之中。运动不久就结束了。但是印刷工人争到了缩短一小时工作和增加一卢布工资；一家酵母工厂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根据部里的决定，铁路工厂被关闭了；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其他行业还在继续坚持局部罢工。在尼古拉耶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想将罢工推迟到驻军出城进行军事演习那天举行，但在放德萨、巴库、巴图姆和梯弗里斯等地罢工消息的直接影响下，总罢工还是不顾社会民主

党的反对而爆发了。群众不容阻挠。一个工厂带头，罢工者从一个车间走向另一个车间，军队的反对只能火上浇油。这样很快就组成了许多群众队伍，高唱革命歌曲，把全体工人、职员、有轨电车人员、男的、女的都卷进去了。罢工是全面的。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面包工人和铁路工厂的工人分别于8月5日和7日开始罢工，所有其他工厂也随即罢工；8月8日，有轨电车交通中断，报纸停印。——1903年夏天南俄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就是这样发生的。局部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将沙皇俄国的整个南方变成一个为时数周的、奇特的革命工人共和国。当时，彼得·冯·司徒卢威先生的自由派刊物《解放》<sup>①</sup>的记者这样写道：“从早到晚在市内的成千上万的汹涌人群中，可以看到兄弟般的拥抱、听到狂喜与热情的欢呼、自由的歌声和愉快的笑声，体会到幽默和喜悦的心情。人们情绪高昂，几乎可以相信人间就要开始美好的新生活了。这是一派十分严肃、同时又是田园般的动人景象……”

1904年，在战争刚开始时和后来一段时间内，群众罢工运动停息下来。起初，警方搞的“爱国”游行象一股浊浪一样遍及全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被沙皇官方的沙文主义暂时击倒在地。但社会民主党很快就重新进入战斗，用工人的革命游行来对抗护国派流氓无产阶级所搞的警方游行。沙皇军队的可耻失败终于使自由派社会也清醒过来；自由化民主派召开代表大会，举行宴会和演讲会，发表请愿书和宣言的时代开始了。被战争的耻辱搞得一时狼狈不堪的专制主义无暇顾及这些先生们，只好听其自然，他

---

<sup>①</sup> 《解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秘密刊物，1902至1905年由司徒卢威任编辑在斯图加特出版。俄国的自由派君主主义资产阶级聚集在这个刊物周围，成为后来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编者注

们却已经以为自由派在今后将无往而不胜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曾占领政治舞台的前台为时半年，使无产阶级黯然失色。但是专制主义经过较长时间的消沉之后又振作起来，宫廷党积聚了力量。穿皮靴的哥萨克只是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自由派的全部行动就在十二月被赶到地洞里去了。宴会、演讲和代表大会立即被当作“放肆的无理要求”而遭到禁止，自由派突然看到自己黔驴技穷了。可是正当自由派山穷水尽的时候，无产阶级却开始了自己的行动。1904年12月，由于失业，在巴库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工人阶级又走上战场。当言论遭到禁止而沉默时，行动又开始了。在巴库，在总罢工的几个星期中间，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局势，不受任何限制。假使十二月在高加索发生的这些独特事件不是迅速地被它们自己掀起的不断高涨的革命巨浪所盖过，那么它们是会引起极大轰动的。关于巴库总罢工的惊人的、不很清楚的消息尚未传遍沙皇帝国的各个角落，1905年1月就又爆发了彼得堡大罢工。

大家知道，这次大罢工的起因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两名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因属于合法的祖巴托夫工人联合会而被解雇了。1月16日，这一处分引起全厂一万二千名工人的声援性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借此机会开始积极进行扩大要求的宣传鼓动，并坚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实行结社、言论、出版等等自由。普提洛夫工厂工人的这一风潮很快就波及了其他无产者，仅在几天之内就有十四万工人举行罢工。经过共同磋商和热烈讨论，大家制定了无产阶级的公民自由宪章，头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1月22日，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二十万工人带着这个宪章到沙皇的皇宫前游行。普提洛夫工厂两名工人被开除所引起的冲突，一周之间就演变成现代最强大的革命的前奏。

那以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月和二月，彼得堡惨案在俄国所有工业中心和城市，在波兰和立陶宛，在波罗的海

沿岸省分，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不过，只要进行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群众罢工的形式已经同前一时期不一样了。这一次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事先发出号召；到处都明确表示对彼得堡无产阶级给予革命的声援是总罢工的原因和目的；到处都同时发生游行、演讲以及同军方的搏斗。然而在这里仍旧谈不到事先的计划，谈不到有组织的行动，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号召很难同群众的自发奋起合拍，罢工领导人几乎没有时间来为向前冲击的无产者大众提出口号。再者：以前的群众罢工和总罢工都是由许多工资斗争汇合起来的，这些工资斗争在革命局势所形成的总的氛围中，受到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影响，很快就成了政治示威；斗争的起因是经济性的，工会起初也是四分五裂的，发展到末尾时却形成了统一的阶级行动，而且有政治领导。现在的运动却相反。一月和二月的总罢工本来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统一革命行动，但这种统一行动很快就分化为各地区、各城市、各行业以及各工厂的无数局部的小规模经济性罢工。1905年，从开春直到盛夏，在辽阔无比的整个俄国，几乎整个无产阶级都起来反对资本家，开展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上自所有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如商业职员、银行职员、技术人员、演员、艺术工作者，下至家庭佣人、下级警官乃至流氓无产者阶层，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同时，这场斗争又象洪流一样，从城市奔向广阔的农村，甚至冲击了兵营的铁门。

这是劳动与资本发生全面冲突的巨幅彩色图画，它反映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每个社会阶层和每个社会角落的不同水平的政治觉悟，从大工业无产阶级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所进行的正规的工会斗争，到一群农村无产者的无定形的突发抗议，到被激怒的警备队士兵们第一次模糊的冲动，从银行事务所里衣冠



楚楚的先生们斯文高雅的反抗，到被烟熏黑了的、阴暗而又肮脏的值班室不满的警察们在不象样的集会上〔七嘴八舌地、〕既胆怯又粗鲁地发泄愤懑的嘟哝，形成了很长的、程度参差不齐的系列。

按照那些喜欢按计划 and 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正”的斗争的人的理论，特别是按照那些站得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理论来看，伟大的1905年1月政治总罢工运动分散为无数经济斗争似乎是个“大大的错误”，这使那次行动“瘫痪”了，使它变成了“五分钟的热度”。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参与了革命，但革命却不是由它“造成”的，它必须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才学习革命的规模；总罢工的第一次惊涛骇浪似乎毫无结果地退了潮，这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开头的时刻也一度有些茫然。但是，犯下了这个“大大的错误”的历史却不顾这些不合格的好为人师的先生们的推理，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成就无可估量的伟大革命工作。

一月份在彼得堡事件的强大推动下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全面起义，对外部来说是向专制主义进行革命宣战的一次政治行动。但正是这第一次普遍的直接阶级行动本身，由于它象电击一样首次唤起了亿万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因而它反过来对内部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强大。被唤起的阶级感情立即使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大众突然明确而痛切地意识到，他们在资本主义锁链下耐心地忍受了数十年之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原来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大家都自发地起来甩掉和挣脱这些锁链。现代无产阶级的千百种苦难，使它想起自己旧的、流着血的伤痕。他们纷纷起来斗争，在这里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那里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这里将残暴的工头放进麻袋装到手推车上“请出去”，在另一些地方反对各种卑鄙的惩罚制度，到处都要求增加工资，有些地方则要求取缔家庭手工劳动。大城市中那些落后的下等职业，各省里

过去一直象沉睡的田园一样的小城，还带着农奴制遗迹的乡村——所有这些，都被一月的闪电惊醒了，忽然全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并狂热地想要弥补过去所耽误的一切。因此，这里的经济斗争实际上不是行动的恢复和分化，而仅仅是战线的改变，同专制主义的第一次大战突然和自然地转变为同资本的一次总清算，它采取了同它的性质相符的零星分散的工资斗争的形式。并不是政治的阶级行动由于一月总罢工蜕变为经济罢工而中断了，而是恰恰相反：在特定的革命形势下和特定的革命阶段上完成了政治行动所可能完成的革命内容之后，政治行动就蜕变为，或者更恰当地说，转变为经济行动。

实际上，一月总罢工若再进行下去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只有毫无头脑的人才会期望，只要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公式仅仅搞一次“坚持到底的”总罢工就能一举消灭专制主义。俄国的专制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去推翻，但无产阶级为此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训练、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高水平的组织。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是可以从小册子和传单中得到的，只有从活生生的政治学校里，只有通过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间，在不断前进的革命过程中才能获得。此外，专制主义不是在随便什么时刻，仅仅需要足够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精神”就能推翻得了的。专制主义的灭亡只不过是俄国社会内在的社会发展和阶级发展的外部表现。在这以前，为了能够推翻专制主义，必须先在其内部，通过现代的阶级划分建立和形成一个未来的资产阶级俄国。为此需要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党以及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政党的建立，为此需要各个人民阶层以及各个资产阶级阶层的自我思考、自我认识和阶级觉悟。但是也只有斗争中，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通过事件的活生生的教育，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冲突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通过相互之间不断的摩擦，这

些阶层和政党才能形成和逐渐成熟起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阶级分化和阶级成熟及其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行动，一方面受到无产阶级的特有的领导作用与阶级行动的制约和阻碍，另一方面又受到这种作用和行动的鼓舞和促进。革命的社会进程的各种隐流互相交叉、互相抵触，加深了革命内部的矛盾，但是〔它们〕到头来只会加速和加强革命的磅礴爆发。

因此，推翻专制主义这个看来似乎如此简单、如此明白和纯机械性的问题要求：一个完整的漫长社会过程，彻底破坏社会基础，最底层的必须升到上边，最上层的必须降到下边，把虚假的“秩序”搞乱并把这种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改造成一种新的秩序。在旧俄国的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的，不仅是第一次总罢工的一月闪电，而更多的则是接着爆发的春天和夏天的经济罢工大风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普遍的激烈斗争，以同样的程度助长了人民的各个阶层和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明确划分，促进了革命无产阶级以及自由的和保守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城市的工资斗争促成了强大的、君主主义的莫斯科工厂主政党<sup>①</sup>的建立；而里夫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则导致了著名的农业贵族的地方自治局自由主义的迅速瓦解。

同时，在1905年春、夏两季的经济斗争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跃鼓动与领导，城市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事后汲取一月序曲的全部教训，认清今后的革命任务。此外，还有一项与此有关的带长远社会性的结果：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1905年的春季罢工几乎是大获全胜。这里仅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华沙领导的几次最重要的罢工

---

<sup>①</sup> 工商业党是中央工业区大资本的反革命政党。它在1905年十月宣言发表后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底瓦解。——编者注

列举一些数字，作为从大量的、大部分还无法了解的事实材料中取出的一份样品。在李波普·劳和吕文施泰因股份公司，鲁兹基公司，波尔曼、施韦德公司，汉特克、盖拉赫和普尔斯特公司，盖斯勒兄弟公司，艾伯哈德公司，沃尔斯公司，康拉德和雅尔姆兹基维茨股份公司，威伯和达恩公司，格威特钦斯基公司，沃兰诺夫斯基电线厂，戈斯廷斯基股份公司，K·布隆父子公司，符拉盖特公司，诺尔布林公司，威尔纳公司，布赫公司，肯奈贝格兄弟公司，拉伯公司，迪特玛尔灯具厂，赛尔科夫公司，威斯屈茨基公司等二十二家华沙冶金行业最大的工厂里，经过四至五周（从1月25日和26日开始）的罢工，工人们全都争取到了实行九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及其他一些较低的要求。在卡尔曼斯基、达米基、格罗麦尔、斯采宾斯基、特洛罗夫斯基、霍恩、贝文西、托尔科夫斯基、达伯和马特恩斯等十家华沙最大的木材业工厂里，罢工者在2月23日就已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他们并不满意，坚持要求八小时工作日，又过了一周也获胜了，同时还增加了工资。整个泥水匠行业的罢工是在2月27日开始的。他们按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于3月11日争得九小时工作日、所有工种都增加工资，每周定期发放工资等等。油漆匠、车匠、马鞍匠和铁匠共同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工资并未降低。电话工作间的工人举行了十天的罢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工资也提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五。黑勒和迪特利希大型麻纺厂（有一万名工人）的工人在进行了九周的罢工之后，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小时，还增加了百分之五到十的工资。在华沙的所有其他行业，在罗兹和索斯诺维茨，我们都看到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的同样的胜利。

在俄国本土也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巴库石油工业一些工种的工人是在1904年12月取得这一胜利的，基辅市区的制糖工人是在1905年5月，萨马拉市的全体印刷工人是在1905年1月（同

时还增加了计件工资并废除了惩罚），彼得堡军用医疗器械厂、子弹厂和一家木器家具厂则是在1905年2月；另外，在海参崴的矿井里开始实行八小时一班制，国营国家证券机械厂是三月实行的，博布鲁伊斯克市的锻造厂是四月实行的，梯弗里斯市的电车职工们从五月起上八小时一班；莫洛索夫的大棉纺厂于五月开始实行八个半小时工作日（同时取消夜班并提高百分之八的工资），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轧油厂于六月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彼得堡港的锻工从七月起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而奥雷尔市的所有私营印刷厂则是在十一月实行的（同时将计时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计件工资提高百分之百，并成立了一个由劳资双方以同等人数组成的协调机构）。

在所有的铁路工厂（二月），在许多国营军事和海军工厂，在贝尔德扬斯克市的大多数工厂，在波尔塔瓦市和明斯克市的所有印刷厂，都实现了九小时工作日；在尼古拉耶夫市的造船厂、机械厂和铸造厂实行了九个半小时工作日，华沙的许多餐馆和咖啡馆的侍者经过总罢工之后也于六月争得了九个半小时的工作日（同时还使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而且每年有两周休假）。

罗兹、索斯诺维茨、里加、科夫诺、雷瓦尔、多尔帕特、明斯克及哈尔科夫等城市几乎所有的工厂工人，敖德萨市的面包工人，基什涅夫市的手工作坊工人，彼得堡的一些制帽工人，科夫诺市的火柴工人（他们的工资同时还提高了百分之十），所有国营海军工厂的工人以及所有港口工人，都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

工资提高的程度一般都不如工时缩短的程度，但幅度总还是大的。譬如：华沙市工厂管理局于1905年3月中旬决定将工资普遍提高百分之十五；在纺织工业中心伊瓦诺沃—沃斯克涅申斯克，工资提高的幅度达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在科夫诺，全体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三都增加了工资。敖德萨的一些面包厂和彼得堡的涅

瓦造船厂等等都实行了固定的最低工资。

当然，资方作出的这些让步在一些地方很快就又被收回了，但这只是促使工人重新进行更加激烈的报复斗争，因此，1905年春季的罢工时期自然地成了无数波及日渐广泛、彼此环环相扣的经济斗争的序曲，它们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革命表面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时期，来自斗争中的俄国的电讯未给世界带来任何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西欧的读者也总是失望地丢下他们手中的晨报，说俄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实际上，在整个俄国的深处，象田鼠挖掘一样的伟大的革命工作却每日每时都在不停地继续进行着。持续而强大的经济斗争，以迅速简捷的方法使俄国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和家長式过度剥削阶段进入了高度发达而又文明的阶段。今天，俄国工业部门中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不仅早已不是俄国工厂法规定的，即法定的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而且甚至比德国的实际情况更为先进了。今天，在俄国大工业的大多数部门里都已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而在德国，这被社会立法当成不可实现的目标。情况还不止于此。德国人热切向往“工业立宪制”，主张机会主义策略的人也为此想使唯一能救世的议会斗争的水域保持平静，不受任何清新空气的触动，而这种工业立宪制在俄国正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是从革命中，是伴随着政治“立宪制”而诞生的！实际出现的与其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倒不如说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在革命中不允许出现一个物质生活水平持久改善的阶段。革命既带来了惊人的经济胜利，同时也带来了资方极为野蛮的报复行动，充满了矛盾和鲜明的对比：今天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明天起大批解雇，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在革命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发展中，最可珍贵的是它的精神成果，因为这是永存的：无产阶级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飞跃发展，为它今后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不可遏止的前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还不仅如此。就

连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也颠倒过来了；自从1905年的一月总罢工和以后的罢工以来，实际上已经废除了资本家为“一厂之主”的原则。在所有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那些最大的工厂里都毫不费事地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工厂主只能同这些能就一切冲突作出决定的机构进行谈判。最后还有一点：一月总罢工之后表面上一团混乱的罢工和“毫无组织的”革命行动，竟成了蓬蓬勃勃的组织工作的起点。那些循规蹈矩的官僚主义者愠怒地守卫着德国工会的幸运之门，而历史夫人却在远处笑着嘲弄他们。在德国，万一要进行群众罢工的任何尝试，事先就应当拥有坚强的组织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它们搞得象无法攻克的要塞一样，而在俄国却恰恰相反，这类组织是从群众罢工中诞生出来的！德国工会的守卫者最怕的是这些组织会在革命的漩涡中象珍贵的瓷器一样碎成片段。但俄国却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图画：从群众罢工与街头战斗的漩涡、风暴和火焰中，产生了清新、年轻、有力和充满生活乐趣的工会，就象从大海的浪花中升起来的维纳斯一样。

这里再举一个虽小却对整个俄国都有代表性的例子。在1906年2月底于彼得堡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彼得堡工会的代表在他就沙俄首都的工会组织的发展所作的报告中曾这样说：

“荡涤了加邦联合会的1905年1月22日成了一个转折点。来自群众之中的工人，凭着事件本身学会了重视组织的意义，并且理解到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创建这样的组织。同一月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彼得堡出现了第一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被选出来拟定工资等级表的委员会制定了工会章程，从6月19日起工会就成立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办事员及会计师工会也成立了。除了这些几乎是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以外，从1905年一月至十月还出现了一些半合法和非法的工会。例如半合法的有药店伙计及商业

职员工会；非法组织中应特别提到的是钟表匠联合会，它于4月24日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议，想召开一次普遍的公开大会的全部尝试都因警察方面和业主们通过手工业协会所进行的反对而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并未阻止工会的存在。除了主席团的成员们所举行的多次会议之外，该工会还在6月9日和8月14日召开了会员秘密会议。男女裁缝工会是于1905年春在一次林中集会上成立的，有七十名裁缝到会。在讨论了建会问题之后，选出了一个负责拟定章程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想为工会争得合法存在的全部努力始终未获成功。该工会的活动仅限于在一些个别的工厂里进行鼓动和争取会员。制鞋匠工会的命运也大抵如此。六月的一天夜里，先在城外的树林里举行了一次秘密集会，参加的有一百多名鞋匠。会上作了关于工会的意义、它在西欧的历史和它在俄国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决定成立工会；有十二人被选入了委员会，负责拟定会章并召集一次广泛的鞋匠大会。工会会章是制定了，但暂时还不能印刷，也无法召开广泛的鞋匠大会。”

这是最初几次的、艰难的开端。继之而来的是十月的那些日子、第二次普遍的总罢工、10月30日的沙皇宣言<sup>①</sup>和短暂的“立宪时期”。<sup>②</sup>工人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政治自由的浪潮中，以便立即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组织工作。除了每天都举行政治性的集会、辩论并成立各种联合会以外，还立即着手扩大工会组织。十月和十一月，彼得堡成立了四十个新工会。不久又成立了工会的联合机构——“中央局”，出版了各种工会报纸，从十一月份起还出版了中央机关刊物“工会”。上述关于彼得堡情况的报告，

---

① 沙皇政府在总罢工的压力下在1905年10月30日发表宣言，承认公民自由，扩大有杜马选举权的人的范围，赋予杜马立法权力。——编者注

② 指1906年初到七月这一时期，参看本书第63页。——编者注



大体上适用于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沃龙涅什、萨马拉、下新城以及俄国所有较大的城市；至于波兰，那就更加适合了。各个城市的工会谋求互相接触，举行了几次代表会议，“立宪时期”结束，1905年12月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工会虽曾一度停止了公开的广泛活动，但它的生命之火却并未因此熄灭。作为组织，它继续秘密地活动着，同时完全公开地领导工资斗争。于是，与充满矛盾的革命形势相适应，形成了合法的与非合法的工会生活混合存在的特殊局面。但是在斗争之中，组织在十分认真地，甚至是过分认真地继续扩大。譬如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它们有代表一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的五名代表参加了上次（1906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sup>①</sup>。这些工会拥有正式的章程、印发的工会会员证和供粘贴的交费凭证等。就是这些曾在1905年1月在街垒上战斗并且在12月又准备只要彼得堡一发出号令就上街战斗的华沙和罗兹的面包匠和制鞋匠、冶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众罢工期间，在坐牢和厂方宣布停工期间，在戒严状态下，仍旧抽空十分严肃地就自己工会的章程进行深入而专心的讨论。的确，由于警方不停地追踪，那些不幸的工会会员证还不能在秘密印刷所里足够快地印出来，所以这些昨天和明天的街垒战士曾不止一次在集会上无情地斥责自己的领导人，而且还以退党相威胁。这种热情以及这种严肃性，至今仍持续不息。譬如1906年7月份的头两周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就成立了十五个新工会：科斯特罗马有六个，还有好几个在基辅、波尔塔瓦、斯摩棱斯克、车尔卡西、普罗斯库罗夫——直至省里一些最小的小城。在今年6月4日举行的莫斯科工会联合会会议上，在听取了各个工会代表的

---

<sup>①</sup>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5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6月在札科潘秘密召开。——编者注

报告之后作出了下述决议：“工会应使会员遵守纪律，使他们不搞街头暴动，因为时机不适于举行群众罢工。鉴于政府方面可能进行挑衅，工会应谨防群众涌上街头。最后，本工会联合会决定，在某一工会举行罢工之际，其他工会必须避免开展工资运动。”大部分经济斗争现在都是由工会领导的。\*

于是，从一月总罢工开始至今尚未停息的这场伟大经济斗争形成了广阔的革命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上，一再或者在这里和那里爆发一些个别的无产阶级运动，或者掀起一些普遍的、重大的无产阶级行动，与政治鼓动和外部的革命事件不断互相促进。在这样的背景上，斗争的烈火曾在几处相继燃起：1905年5月1日，华沙爆发了庆祝五一节的空前的彻底的总罢工，伴以十分和平的群众游行，游行以手无寸铁的群众同士兵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六月，罗兹的一次小规模群众游行被士兵驱散，结果在为遭士兵杀

---

\* 仅在1906年6月份的头两周就开展了下列工资斗争：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明斯克、维尔纳、萨拉托夫、莫吉列夫、唐波夫等地的印刷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星期日休息的斗争；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刻赤、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舰队、喀琅施塔得、华沙及普沃茨克等地海员为争取承认工会和释放被捕工人代表而举行的总罢工；萨拉托夫、尼古拉耶夫、察里津、阿尔汉格尔斯克、下新城、雷宾斯克等地港口工人的斗争；基辅、阿尔汉格尔斯克、比亚韦斯托克、维尔纳、敖德萨、哈尔柯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拉多姆、梯弗里斯等地面包工人的罢工；维尔西涅-第聂勃罗夫斯克、鲍利索夫斯克、辛费尔罗波尔等县、波多尔斯克、上拉、库尔斯克等省、科斯洛夫、利波维兹等县、芬兰、基辅省、叶里萨维特格勒县等地农业工人的斗争。这一时期在萨拉托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刻赤及克列门楚克等几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几乎是所有行业的罢工。在巴赫姆特，发生了全矿区煤矿工人的总罢工。在其他城市，例如基辅、彼得堡、华沙、莫斯科以及整个的伊万诺沃-沃斯涅申斯克区，工资运动在1906年6月的头两周内先后波及了所有产业部门。各地罢工的目的都是：缩短工时，星期日休假，增加工资。大部分罢工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地方的报告强调指出，有些罢工使首次参加工资运动的工人阶层卷入进来。——卢森堡注

害的数名牺牲者举行葬礼时，举行了十万工人的大游行，并再次同军队发生对抗，最后形成一场总罢工，进而演变为23日、24日及25日在沙俄帝国爆发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样在六月，敖德萨港“波将金”号装甲舰上发生的一场小事导致黑海舰队水兵的首次大暴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两地立即以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进一步响应的还有喀琅施塔得、里堡和海参崴等地的群众罢工和水兵暴动。

彼得堡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伟大尝试是在十月里进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以革命方式在彼得堡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这就是说，某一天，彼得堡的全体工人要向厂主们声明他们不愿每天干多于八小时的工作，并要在相应的时刻离开工作场所。利用这个想法开展了活跃的鼓动工作；无产阶级热烈地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付诸实行，毫不畏惧为此付出的极大牺牲。譬如对于一直每天按计件工资工作十一小时之久的纺织工人来说，八小时工作日意味着要损失相当大的一部分工资，然而他们都欣然承受这样的损失。一周之内，在彼得堡的所有工厂里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们为此欢呼不止。不过，开始时被搞得目瞪口呆的厂主们，很快就起来反攻了：到处都以关厂威胁工人。一部分工人同意与厂方举行谈判，有的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有的争得了九小时工作日。但是，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中坚——大型国营金属工厂的工人们却巍然不动，接着是厂方宣布禁止这类工人进厂做工，使四万五千至五万名工人被解雇达一个月之久。由于这样的结局，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影响到十二月份统一的群众罢工：大批解雇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次罢工的进行。

但是在这期间，作为对布里根杜马计划的回答，十月份又接着爆发了全俄第二次强大的普遍性群众罢工。这次是由铁路职工带头的。和一月份的第一次主要革命行动相比，无产阶级的第二

次主要革命行动的特征已大不相同。政治觉悟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得多。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铁路职工与管理当局在养老储金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接着发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普遍奋起却具有明确的政治思想。一月总罢工的前奏是为争取政治自由去向沙皇请愿，十月大罢工的口号却是：收起沙皇统治下的立宪丑剧吧！由于罢工立即取得了沙皇于10月30日发表宣言这一成果，这次运动并未象一月份那样为了先去补上开头的经济性阶级斗争而回过头来朝内部进行，而是向外部发展，去积极地运用刚刚争得的政治自由。罢工工人举行游行和集会，创办了一家新的报刊，组织公开的讨论，最后遭到血腥的大屠杀，继而又掀起新的群众罢工和游行——这就是十一月和十二月那些日子里风起云涌的斗争画卷。在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下，十一月在彼得堡举行了第一次示威性群众罢工，表示抗议在里夫兰和波兰所发生的血腥暴行及两地所宣布的戒严状态。短暂的立宪梦和梦醒后的残酷状态所引起的动乱终于在十二月导致了全俄第三次普遍的群众罢工。这次，运动的过程和终结与前两次相比又大不相同：与一月份不同的是，这次的政治行动并未转为经济行动；与十月份不同的是，未能再一次取得迅速的胜利。沙皇宫廷党没有再拿真正政治自由来作尝试，因此革命行动第一次全面地碰到了专制主义物质暴力的顽固之墙。持续地进行着的事件的逻辑的内部发展，使这次群众罢工变成了一场在莫斯科爆发的公开起义，一场武装的街垒战和巷战。莫斯科十二月份的那些日子是政治行动和群众罢工运动向上发展的顶点，第一个工作繁忙的革命年头就这样结束了。

同时，发生在莫斯科的这些事件作为一次小规模의 试验，全面显示了革命运动逻辑发展和它的未来：它不可避免要以一次普遍的公开起义为结局，但只有通过一系列预备性局部起义的训练，

这种普遍的公开起义才能发生，这些预备性局部起义可能暂时以局部的和表面的“失败”告终，而且单个地看来，它们可能显得是“过早的”。

1906年带来了杜马选举和杜马插曲。出于坚强的革命本能和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无产阶级抵制了整个这场沙皇立宪闹剧。有几个月，自由派重又占领了政治舞台的前台。1904年时的局面似乎又再次出现了：发表言论的时期代替了采取行动的时期，为了更加努力地从事工会斗争和组织工作，无产阶级在一段时间里退隐了。群众罢工销声匿迹，而自由派却每天都象放焰火似地哇啦哇啦发表漂亮的演讲。最后，铁幕突然哗啦一下落了下来，演员被赶得七零八落，自由派的焰火只留下一片烟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企图在全俄掀起第四次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杜马并恢复自由派演说时期，但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单纯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从群众罢工过渡到普遍的人民起义和巷战的时机又尚未成熟。自由派的插曲演完了，无产阶级的插曲又尚未重新开始。政治舞台暂时是空着的。

#### 四

前面，我们试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俄国群众罢工的历史。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展示的画面同在德国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对群众罢工所惯于描绘的那幅画面毫无相似之处。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根据最高领导机构的决议按照计划慎重地进行的干巴巴的政治“行动”的那种僵死而空洞的模式，而是一段有血有肉的、生气勃勃的生活，它根本就无法从庞大的革命整体中分割出来，而是同革命的一切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俄国革命给我们展示的群众罢工是一种可以变化的现象，它

反映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各个阶段，反映着革命的每一时期和每一瞬间。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方式的可行性，它的影响力，发生罢工的时刻，都是不断地变化的。它能在革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时突然开辟新的、广阔的革命前景；当人们满有把握地指望它时，它却遭到了失败。它有时象宽阔的海涛一样汹涌澎湃地荡及全国，有时又分成无数涓涓细流，形成一片广阔的水网；它时而象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时而又完全渗入地下。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群众罢工与局部罢工，示威性罢工与斗争性罢工，各个行业与各个城市的总罢工，和平的工资斗争与巷战、街垒战——所有这些形式的罢工是互相混杂地、互相并列地、互相交叉地进行的，它们象涨满河水的大川相互波及；这是由许多现象组成的汪洋大海，它永远都在运动着，变化着。这些现象的运动法则是清清楚楚的：它既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本身，也不寓于群众罢工的技术特点之中，而是寓于革命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对比之中。群众罢工只是革命斗争的形式。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所发生的每一变化，党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每一变化，反革命所处的地位的每一变化，这一切都会通过千百条看不见的和几乎难以控制的途径立即影响到罢工行动。但罢工行动本身却几乎一刻也不会停止。它只会改变它的形式、它的规模、它的影响。罢工行动既是活生生的革命脉搏，同时又是推动革命的强大齿轮。一句话：俄国革命向我们指出，群众罢工不是为使无产阶级斗争取得更有力的影响而冥思苦想出来的狡黠手段，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判定群众罢工问题的一些一般观点。

1. 如果认为群众罢工只是一次单一行动，那就完全错了。相反，它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那种纯政治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和结束的，短暂

的单一行动的群众罢工模式，只适合俄国四年来所发生的无数次形形色色的群众罢工中的一种，而且是次要的一种，即纯粹的示威性罢工。在长达五年的群众罢工时期的整个过程中，俄国仅发生了为数极少的几次示威性罢工，而且请注意，它们通常只局限在一些个别的城市。例如：华沙和罗兹每年庆祝五一节的总罢工——在俄国本土至今尚未发生过具有相当规模的庆祝五一节的罢工，1905年11月11日为悼念被处决的马尔岑·卡斯普沙克而举行的华沙大罢工，1905年11月为抗议在波兰和里夫兰宣布戒严状态而举行的彼得堡大罢工，1905年1月22日为纪念彼得堡血腥屠杀一周年在华沙、罗兹、琴斯托霍瓦、栋姆布罗瓦煤矿区以及在俄国几个城市的部分地区发生的群众罢工，另外还有1906年7月对因举行兵变被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的士兵们表示同情的梯弗里斯总罢工，最后还有同年九月于军事法庭审理期间因同一原因而举行的列瓦尔总罢工。所有其余的大规模的和局部的群众罢工都不是示威性罢工，而是斗争性罢工。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它们不是“有条不紊地撤退”，而是有时变成经济斗争，有时又演为巷战，有时则又自行收缩了。

在这幅总的画面中，纯粹的政治性示威罢工只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平面上个别微小的点。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特征：与斗争性罢工不同，示威性罢工所表现出的党的纪律性、有意识的领导和政治思想都是最高程度的，因而按照模式来看，它一定显得是最高的和最成熟的群众罢工形式。实际上，这类示威性罢工在运动的开始起着最重大的作用。例如：1905年5月1日华沙总罢工，作为令人惊叹地贯彻社会民主党决议的第一个例子，它是对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次事件；同样，作为有意识、有计划的群众行动的第一次演习，同年十一月彼

得堡的同情罢工也在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汉堡的同志们在1906年1月17日举行的“群众罢工演习”<sup>①</sup>，作为运用这一争议如此之多的武器的第一次新鲜尝试，而且如此大获成功并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汉堡工人阶级的战斗情绪和战斗喜悦，因此它在今后的德国群众罢工史上的作用也是杰出的。如果德国的群众罢工时期将来认真地开始的话，它肯定也将自行导致一场真正普遍的五一节大罢工。五一节自然就会作为群众斗争时代的第一次大示威而获得荣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匹“无力的老马”——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称呼五一节的——还有远大的前途，还要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是，随着严肃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这类示威的意义却在迅速地减弱。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无产阶级所受的训练，这两个因素从客观上促使按照预定计划和党的口号去进行的那些示威性罢工得以发生。现在，却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这类罢工不可能发生了；俄国无产阶级这支人民大众最得力的先锋队，今天根本不想再搞示威性罢工，工人们不想再搞任何儿戏，他们现在只想到严肃的斗争及其全部后果。如果说示威这个因素——当然不是以有意的，而主要是以本能的、自发的形式——在1905年1月的首次群众大罢工中还曾起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想在八月份掀起一场群众罢工以表示支持被解散的杜马，这个企图却因经过训练的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再搞软弱无力的不彻底行动和单纯的示威而失败了。

2. 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处于次要地位的示威性群众罢工，而是着眼于当今俄国无产阶级行动的真正主体的斗争性罢工，于是我们就又会发现，在这类罢工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无法彼此分

---

<sup>①</sup> 8万汉堡工人在1906年1月17日罢工并举行集会和上街示威以抗议对市议会选举权的限制。这是德国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编者注



开的。在这一点上，罢工的实际情况与理论上的模式也是大相径庭的。而且，一方面想从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中按照逻辑推出纯政治性群众罢工是最成熟、最高级的罢工阶段的结论，同时又要要把这两种罢工形式搞得泾渭分明，这种迂腐之见也被俄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驳倒了。这一点不仅——如果历史地看——在下述事实中表现出来：所有群众罢工——从1896至1897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第一次伟大的工资斗争直到1905年12月的最后一次群众大罢工——都令人难以觉察地由经济罢工过渡为政治罢工了，因此几乎根本无法再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且所有大的群众罢工中的每一次罢工都可以说是小规模地重现俄国群众罢工的一般历史，都是以纯经济性的或者至少是以资方同工会的局部冲突开始的，然后经过由低到高的各个阶段直至发展到政治性的大示威。我们看到，1902年和1903年俄国南方群众罢工的伟大风暴之所以形成，在巴库是因为处分失业工人所引起的冲突，在罗斯托夫是因为铁路工厂里的工资争议，在梯弗里斯是因为商业店员为争取缩短工时而进行斗争，在敖德萨是因为一个小厂里所发生的一场工资斗争。1905年1月的群众罢工是由普提洛夫工厂里的一场内部冲突演变而成的，十月罢工始于铁路职工争取养老储金的斗争，而十二月罢工则是由邮电职工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发展而成的。整个运动的进步并不表现在没有出现经济性的起始阶段，而是表现在运动从低级阶段一直发展到政治性大集会这个高级阶段是如此的迅速，表现在群众罢工向前推进的程度是如此的深远。

但是，整个运动不仅是朝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的，它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些大的政治性群众行动中的每一次行动，当它达到政治上的最高点之后，就会突然转成蜂拥而起的经济罢工。不仅每一次大的群众罢工是这样，就连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随着政治斗争的扩展、明朗化和加强，经济斗争不仅不

会削弱，反而也会亦步亦趋地扩展和加强，并使自己具有组织性。两类罢工之间有着完全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政治斗争的每一新的开始和每一新的胜利，都会变成对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政治斗争同时也在扩大自己外部的可能性，提高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内部动力和战斗热情。政治行动掀起的每一层浪花过去之后，都会留下肥沃的土壤，并立即萌发出千百株经济斗争的枝条。反过来也是如此：工人同资本处于不停的经济战状态，这使战斗劲头在一切政治间歇期间保持旺盛，可以说，它竟成了保存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永久的、新鲜的蓄水池，政治斗争随时可以从重新汲取力量；同时，无产阶级坚持不懈的经济斗争总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又在那里引起一场场激烈的冲突，从这些个别的经济冲突中又会出乎意外地爆发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一言以蔽之：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这里，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因此群众罢工时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远远不象学究们的模式所主张的那样彼此截然分开，更不是彼此排除的，不如说它们只是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彼此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它们的统一体就是群众罢工。如果那种冥思苦想的理论为要达到论述“纯粹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目的，非要在群众罢工上搞人为的逻辑切割，那么这种解剖一定也象其他解剖一样，不会使人认识现象的活的本质，而只能使现象变成僵死的东西。

3. 最后，俄国的事态发展还告诉我们，群众罢工是不能同革命分离开来的。俄国的群众罢工史也就是俄国的革命史。当然，我们德国的机会主义代表们一听到“革命”立刻就会想到流血和巷战，想到火药和枪弹，由此就会得出逻辑的结论：群众罢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革命，所以我们不应当搞。实际上，我们在俄国看到，差

不多每一场群众罢工到最后都是以同沙皇秩序的武装卫护者发生遭遇战而告终。在这一点上，所谓的政治罢工同规模较大的经济斗争是完全相同的。不过，革命不同于流血，又比流血具有更多的内容。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从这种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与罢工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它与人们通过平凡的观察所确认的群众罢工通常总以流血告终那样的关系完全不同。

上面我们看到了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机制，它是以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不停的互相影响为基础的，而这种互相影响恰恰又是由革命时期决定的。只有在革命时期急风暴雨的气氛中，劳资之间的每一场局部的小冲突才有可能发展为普遍的爆炸。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象彼得堡那样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处分，巴库那样的失业，敖德萨那样的工资冲突，莫斯科那样的争取结社权的斗争，在德国也是常常发生的，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荷兰铁路职工的总罢工就为此提供了令人惊服的证明。<sup>①</sup>它虽然赢得了极其热烈的同情，但由于国内无产阶级毫无行动，最后还是失败了。

反过来，在阶级社会的社会基础和墙垣已经松动而且时时都在变化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每一次政治的阶级行动都会在儿

---

<sup>①</sup> 荷兰铁路工人从1903年4月6日起举行总罢工，反对一项用苦役监禁惩罚罢工工人的法律草案。在国会通过这一法律草案以后，工会的防御委员会于1903年4月10日作出停止罢工的决定。——编者注

小时之内使过去从未受到触动的那些工人阶层全部摆脱死气沉沉的状态，这立即会自然而然地表现为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被政治行动的闪电突然惊醒的工人，紧接着首先从事当务之急：为反抗自己在经济上所处的奴隶状况而自卫。政治斗争的风暴使他突然以从未料到的强烈程度感觉到身上的经济枷锁的沉重压力。在德国，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例如选举斗争或关于关税率的议会斗争，对同时正在开展的工资斗争的进程和强度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觉察的直接影响；但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行动都会立即影响经济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由此可见，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这种转变就通过群众罢工表现出来。如果那些搞庸俗图式的人只在作为罢工尾声的街头流血冲突中看到群众罢工与革命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要稍微深入地观察一下俄国的事态进程就会发现一种完全相反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群众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罢工。

4. 关于对群众罢工加以有意识的领导以及在群众罢工时采取主动的问题，这只要对过去的情况加以总结就足以搞清楚了。如果群众罢工并不意味着一次个别的行动，而是意味着阶级斗争的一整个时期，如果这个阶级斗争时期也就是革命时期，那么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使举行群众罢工的决心是来自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但罢工还是不能光凭自己愿意就可以搞得起来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不能随意自如地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发动和禁止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大军的热情和耐心无论有多大，都不足以开始一个真正的群众罢工时期，使之成为一场活跃而强大的人民运动。依靠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决心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所表现的党的纪律性，固然可以举行一次短暂的示威，象瑞典的群众罢工<sup>①</sup>、最近奥地利的群众罢工<sup>②</sup>或1月17日的汉堡群众罢工

就是如此；但是这类示威同真正的革命群众罢工时期还有区别，正象外交关系紧张时那几次大家都知道的舰队到外国海港示威<sup>③</sup>还不是海战一样。由纯粹的纪律和热情所产生的群众罢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段插曲，作为工人战斗情绪的一种象征而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以后又会恢复平静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是在革命期间，群众罢工也不能从天而降，它必须由工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搞起来。在这方面，工人们的决心与决定也是起作用的，而且主动地发起罢工并且领导罢工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最有觉悟的核心即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如果革命时期已经来到，那么这种主动性和这种领导大抵只是在运用于个别的行动、个别的罢工时才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抵局限在某个个别的城市。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曾多次在巴库、华沙、罗兹、彼得堡等地直接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并且取得成功。但是，在用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运动时，上述做法就成效甚微了。而且，这种主动性和有意识的领导还受到十分确定的限制。恰恰是在革命期间，要预见并估计出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这里，采取主动和进行领导同样不是随心所欲地指挥命令，而是要尽可能灵活地适应局势和尽量密切地同群众的情绪保持联系。我们已经看到，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

---

① 在瑞典，根据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从1902年5月15日至17日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坚决要求实行选举法改革。罢工有大约116000工人参加，但没有取得成果，在国会两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在1904年提出新的选举法草案后，罢工宣告结束。——编者注

② 从1905年10月到12月，在奥匈帝国根据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举行了要求普选权的群众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编者注

③ 1898年夏天，在美西战争期间，德国曾经派一支中型舰队到马尼拉港，以支持海军和殖民部门提出的尽可能多地取得西班牙在太平洋和远东的殖民地的要求。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来到摩洛哥的海港丹吉尔市，以此表示德国帝国主义反对法国在摩洛哥取得优势地位。——编者注

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间，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象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革命——即使是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

另一方面，我们在俄国看到，革命使社会民主党难于对群众罢工发号施令，而且它喜怒无常，随时都会把社会民主党手里的指挥棒夺掉，或者把这根指挥棒塞到它的手里，但正是这一革命本身解决了在德国讨论的理论图式中被“领导”当作主要忧虑看待的所有那些困难：“口粮的供应”、“费用的支付”和“牺牲”等问题。当然，革命决不是象人们在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的一次安静的秘密会议上手里拿着铅笔处理事务那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革命使如此广大的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因而任何对群众运动所需费用作出估计和安排的做法——就象事先计算一件民事诉讼所需的费用那样——都显得是完全无望的。其实，俄国的领导组织也是设法竭力救助因斗争所蒙受的直接的牺牲的。譬如，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而遭到大批解雇的彼得堡罢工工人所作出的英勇牺牲，就曾得到长达一周之久的救济。不过在革命这本巨大的总帐上看来，所有这些措施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正的、严肃的群众罢工时期一开始，所有的“费用计算”就都变成了想用一只玻璃杯舀尽沧海这样的打算了。这是可怕的贫困与痛苦的苦海，无产者大众的每一次革命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苦海才能得来。对

于这种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它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伟大的理想。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对最艰难的痛苦也将毫无感觉。如果一个工会会员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在事先未得到万一遭到解雇肯定会受到怎样的救济的保证时，绝不参加庆祝五一节的罢工，——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群众罢工都搞不成。但正是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骤雨中，无产者从要求救济的未雨绸缪的一家之主变成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同斗争理想比起来，就连最可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也为之逊色，更不用说物质生活了。

如果说从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成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会“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对于这两种情况，俄国革命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 五

现在的问题是，从俄国群众罢工中所能汲取的全部教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德国。德俄两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完全不同的。乍看起来，就连上面所阐述的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规律可能也仅仅显得是俄国情况特有的产物，德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用加以考虑。在俄国革命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存在一种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种斗争的一致性在群众罢工时期就表现出来了。但是，这难道不纯粹是俄国专制主义的结果吗？如果一个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禁止任何工人运动的表现，如果就连最简单的罢工在那里也成了政治上的犯罪，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一次经济斗争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成为政治斗争。

另外，如果反过来说，政治革命一爆发马上就导致俄国工人同企业主的总清算，那么这同样也是下述事实的简单结果：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一直是最低的，而且他们从来没有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过任何正常的经济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讲，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摆脱自己最糟糕的境况。所以，革命一旦朝专制主义的污浊空气吹进一股清风，俄国无产阶级便立即象初生之犊那样大胆地干起来，这就不足为奇了。最后，俄国的群众罢工的暴风雨般的革命发展，这些群众罢工的以自发性和天然性为主的特征，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在政治上落后，由于首先必须推翻东方式的暴虐专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训练。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有着三十年的政治生活经验，有一个拥有三百万党员的社会民主党和一支由二十五万工会会员组成的核心部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都和在一个半野蛮



的、先要完成从中世纪进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飞跃的国家里不一样，不可能具有那样的暴风雨般的、天然自发的特征。在那些想由一个国家的成文法的条文中看出该国社会状况成熟程度的人们中间，这个想法是很流行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问题逐个地研究一下。首先，要是把革命的爆发才算作俄国经济斗争的开始，那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本土的罢工和工资斗争从九十年代起，而俄属波兰的罢工和工资斗争甚至从八十年代末起就已日渐频繁了，这些斗争终于为自己争得了实际的合法权利。当然，它们往往引起警方的残暴惩处，但它们毕竟成了日常的现象。譬如早在1891年，华沙和罗兹两地都已有相当重要的全面的罢工储金会。在那几年里，对工会的热忱甚至曾有一个短暂时期在波兰造成了那些几年后在彼得堡和俄国各地得到蔓延的“经济”幻想。<sup>①</sup>

---

① 因此，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在自己论述群众罢工的书的俄文版序言里的那种说法，是以一个事实上的错误为根据的：“固然差不多自从大工业出现以来，无产阶级（在俄国——罗·卢·）就已熟悉了群众罢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下，局部罢工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见《新时代》，1906年第33期。）不如说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在1906年2月召开的俄国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彼得堡工会联合会的报告人在他报告的一开头就这样讲道：“考虑到与会的诸位代表的情况，我无需首先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会运动并不象有些人试图断言的那样，是从斯维亚托波克-米尔斯基大公的‘自由’时期（1904年——罗·卢·）或者从1月22日起源的。我们的工会运动有着更为深远的根源，它是不可分割地同我们工人运动的整个过去联系着的。我们的工会只不过是领导经济斗争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俄国无产阶级开展这样的经济斗争已有数十年之久了。无需过分深入到历史中去，人们恐怕可以说，自从1896年和1897年的那些值得纪念的罢工以来，彼得堡工人的经济斗争总是采取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形式。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它同对政治斗争的领导很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事，这个组织当时叫‘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3月的代表会议之后它就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彼得堡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工厂、市区和近郊区组织的复杂系统，通过无数渠道把中央同工人群众联系起来，使中央能够用传单对工人们的需要作出反应，这样就能够支持和领导罢工了。”——卢森堡注

同时，如果设想革命前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简直和乞丐一样，这也是过分夸大。恰恰是目前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最活跃、最积极的那个工业和大城市工人阶层，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并不比德国无产阶级的相应阶层低多少。在一些行业里，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挣得一样多，在一些地方甚至高于德国工人。就是在工作时间上，两国大企业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大的。因此，那些错误地把俄国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估计得极低的想法，简直象是凭空捏造。人们只需略加思索就会发现，革命这件事本身和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杰出作用都驳斥了这些想法。靠乞丐是搞不成在政治上如此成熟、在思想上如此清楚的革命的；而站在斗争前列的彼得堡、华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工业工人，他们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与西欧类型工业工人相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只把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循规蹈矩的工会实践当作训练无产阶级唯一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学校的那些人的想象。虽然没有资产阶级法制的表面保障，但由于俄国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鼓舞并领导经济斗争的社会民主党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思想影响，还是完成了相当可观的文化工作。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们略微深入地观察一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就可以发现差别更加微乎其微了。俄国的伟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从一开始就唤起了无产阶级最广泛的阶层，并使之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经济斗争中去。而在德国，难道工人阶级的生活中就没有至今还只是受到工会的温暖阳光微弱照射的阴暗角落吗？工人阶级中不是有一大批人数很多的阶层至今还根本没有努力摆脱社会底层的地位，或者只是企图通过日常工资斗争的途径来做到这一点却徒劳无功吗？让我们以矿工的疾苦为例。同在其他国家甚至工会的理想之国即英国一样，矿工们的工资斗争就是在德国的平静的工作日里，在单调的议会政治的冰冷气氛中，

也已经几乎只是表现为间或出现的强大的火山爆发即具有典型性和天然自发性的群众罢工。这正好表明，德国的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是十分尖锐而巨大的。因此不能以平静的、按计划进行的、局部的工会斗争的形式零敲碎打地获得解决。在德国，矿工的疾苦连同它那在“正常”时期就已成为极猛烈的风暴之源的爆炸性土壤，每逢工人阶级规模较大的政治性群众行动时，每逢改变日常生活生活的暂时平衡的较为强烈的变动时，都不可避免会立即爆发成一场巨大的经济的和斗争的斗争。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纺织工人的疾苦。每隔数年就席卷福格特兰德<sup>①</sup>地区一次的纺织工人的工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大多毫无成果，这些斗争使人们略微能想象，受纺织资本卡特尔奴役的团结起来的广大工人群众在政治变动时，在德国无产阶级采取强大而勇敢的群众行动时，必然会以磅礴之势轰然而起。接下去再让我们看看家庭手工业者的疾苦，服装工人的疾苦和电业工人的疾苦，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风暴之源。这些行业的无产阶级在平时，在安静时期越少开展斗争，每次开展斗争时越是缺少成果，迫使他们咬紧牙关重新受奴役的资本压迫越是残酷，那么当德国在政治上—有风吹草动时就越是肯定会从这些风暴之源爆发出强大的经济斗争。

现在再来看德国许多不同工种的无产阶级，他们人数众多，在事态的“正常”发展进程中是不可能为改善自己状况而开展和平的经济斗争的，是不可能使用任何结社权的。我们首先拿铁路及邮政职工突出的疾苦作例子。在议会式法制国家的德国，这类国家雇用的工人的境况却是俄国式的——请注意，是革命前的、专制主义全盛时期的俄国存在的那种境况。1905年十月大罢工的时候，在

---

<sup>①</sup> 德国纺织工业集中地区，当时属萨克森王国，现在民主德国茨维考一带。——编者注

形式上还是专制主义的俄国，铁路职工就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行动自由来说就已经使德国的铁路职工望尘莫及了。俄国的铁路和邮政职工在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实际上已经争得了结社权，尽管审判和处罚一时象雨点般朝职工袭来，但他们的内部团结已再也无法破坏了。如果有人同德国反动派一起认为德国铁路和邮政职工的盲目服从会永远地保持下去，认为这种盲目服从就象一块无论怎样也不会磨损破碎的岩石，那么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心理学判断。尽管德国的工会领导人非常安于现状，就连这种在整个欧洲几乎没有先例的屈辱也没有使他们扫兴，他们仍旧可以略微满意地观察工会斗争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德国工业工人普遍奋起的时候，这些身穿制服的国家奴隶也不可避免地会试图发泄他们深埋在心底而且蓄积已久的怨恨。如果无产阶级中由工业工人组成的先锋队打算在群众罢工中争取新的或者维护已有的政治权利，那么铁路和邮政职工的大军也必然会感到自己的特殊屈辱，最后总有一天将奋起摆脱德国专门加给他们的这份额外的俄国式专制统治。那种想按照图式和方案去开展伟大群众运动的迂腐之见把铁路职工争得结社权看成一个必要的前提，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前提才“允许设想”在德国搞群众罢工。事情的实际的、自然的发展进程只能是恰恰相反：德国铁路和邮政职工的结社权只有在一次强大的、自发的群众罢工行动中才能真正诞生。一旦爆发一场普遍的无产阶级政治性群众行动，那么在这场罢工的影响和压力下，在德国目前状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就会突然找到完成的可能性和完成的办法。

最后谈谈最大、最重要的疾苦：农业工人的疾苦。如果说英国的工会是仅仅适合于工业工人而组织起来的，那么对于英国国民经济的特殊性以及对于农业在英国整个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微弱作用来说，这宁可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在德国，如果一个工会

组织——不管它搞得多么出色——仅仅包括工业工人，却把农业工人的整个大军拒之于门外，那么它始终只是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整个状况的局部画面。同样，假使认为农村的状况是不会改变和静止不动的，认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坚持不懈的启蒙工作还是它的一整套德国内部的阶级政策，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农业工人表面的消极性，认为在德国工业无产阶级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而采取任何较大的、普遍的阶级行动时农村无产阶级不会也跟着骚动，那么这也是一种极为有害的想法。其实，农业工人的骚动只能首先表现为一场广泛的、暴风雨般的经济斗争，表现为农业工人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德国工业和手工业行业的表格移到那些完全站在工会斗争之外、或者因其特殊的经济状况而不能被塞进小规模日常工会斗争狭隘框框里去的广大无产阶级集团那里，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似乎优越于俄国无产阶级的这幅画面就改观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大的领域，那里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那里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燃料，那里以赤裸裸的形式存在着许多“俄国式专制主义”的表现，那里应该首先补上在经济上同资本作最初步的清算这一课。

无产阶级一旦举行一次广泛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同现行制度算那些老帐。人为地布置城市无产阶级搞一次示威游行，只凭纪律和党执行委员会的指挥棒来搞群众罢工行动，当然会使更广泛的人民阶层保持冷漠和无动于衷。但是真正从革命环境中诞生出来的强大而又无所忌惮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却肯定会反过来影响那更为低下的阶层，并且恰恰带动那些在正常和平静的时期站在工会日常斗争之外的所有阶层都投身到广泛的、暴风骤雨般的经济斗争中来。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也看一下德国工业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部队，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考察一下俄国工人阶级今天在经济斗争中争取实现的那些目标，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德国的最老的工会有理由象看待已穿不下的童鞋一样蔑视这些奋斗目标。例如自1905年1月22日以来，俄国各次罢工最重要、最普遍的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日，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这肯定不是已经过时的立场，不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理想。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德国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一厂之主观点”的斗争，适用于争取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委员会、废除计件工作的斗争，适用于争取废除手工业里的家庭劳动的斗争，适用于彻底执行星期日休息制和承认结社权的斗争。是的，如果再作进一步的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目前这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的全部目标，对德国无产阶级也是非常现实的，而且正好触到了工人生活的痛处。

由此，我们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们特别乐于运用的那种纯政治性群众罢工，对于德国也只是死板的理论图式。如果群众罢工是作为城市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坚决的政治斗争从强大的革命风潮中通过自然的途径诞生的，那么同在俄国完全一样，它们也会自然地迅速转入进行自发经济斗争的一个完整时期。因此，工会领导人担心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和群众罢工时期被轻易地搁置一旁和压制下去，这是出于一种对革命事物发展进程的完全不切实际的、死搬教条的设想。不如说就是在德国，革命时期也将改变工会斗争的性质，并会使这一斗争大有发展，以致工会日前的游击战相形之下会象儿戏一样。另一方面，政治斗争也会从这种气势磅礴的经济性群众罢工风暴中不断地获得新的推动和新的力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成了目前俄国群众罢工的内部动力，同时也可以说成了无

产阶级革命行动的调节器，在德国这种相互促进作用也会自然而然地从社会情况中自行产生出来。

## 六

由于上述情况，同群众罢工问题有关的组织问题，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些工会领导人对待组织问题的态度通常充其量表现为这样一种主张：“要冒险搞进行象群众罢工这样大胆的较量，我们还不够强大。”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要通过四平八稳的数字计算去确定无产阶级什么时候才“足够强大”到可以搞什么样的斗争，这是一道无法解答的习题。三十年前，德国工会有五万名会员。很明显，根据上述标准，凭这个数字搞群众罢工是连想也不能想的。又过了十五年，工会的力量增长到原来的四倍，有会员二十三万七千人。但是假使那时间今天的工会领导人，无产阶级组织是否已经成熟得足以搞一次群众罢工，那么他们肯定会说，情况远非如此，要等工会会员到了数以百万计的时候才行。时至今日，有组织的工会会员已经达到二百万，可是工会领导人的观点却依然如故，而且这种情况显然还会无尽无休地维持下去。他们默然认定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到德国整个工人阶级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加入工会组织的时候，它才算“足够强大”到可以去冒一次群众行动的风险。即使到那时，按照老的公式，这样的群众行动很可能仍旧表明是“多余的”。工会领导人的这一理论完全是一种空想。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是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工人们，在他们能够开展某种直接的阶级斗争之前，本来应当全部组织起来；但是，在事物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在没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状况和条件却会使得某些

阶层——而且正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无产阶级的那些最重要的、处在底层<sup>①</sup>的、受资本和国家的压迫最甚的阶层——根本就不可能被组织起来。我们看到甚至在英国，在没有任何“干扰”——除去最初的宪章运动时期不算——的情况下，在未受“革命浪漫主义”任何迷惑和引诱的情况下，工会作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不倦努力，所做到的也不过是使无产阶级少数境况较佳的阶层组织起来。

另一方面，工会组织和无产阶级所有其他的斗争组织，恰恰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使自已长期存在下去，而且这里所说的斗争并非指在资产阶级议会时期的一潭死水里所搞的蛙鼠之战，而是指群众斗争的激烈的革命时期。僵死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观点只想使斗争成为组织人数达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但是，事物的活生生的、辩证的发展却反过来使组织成了斗争的产物。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伟大先例。在那里，先前几乎根本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经过一年半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初期工会组织网。德国工会本身的历史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在1878年的时候，德国工会会员有五万人。上面已经谈到，按照今天的工会领导人的理论，要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样的组织还远远不是“足够强大”的。但是当时的德国工会尽管弱小，却还是开展了斗争，即同反社会民主党人法的斗争，并且表明自己不仅“足够强大”而赢得了那场斗争，而且还在那场斗争中使自己的力量增长了四倍：在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废除后的1891年，会员人数达到了二十七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不过，工会在同反社会民主党人法的斗争中取胜的方法，并不符合和平地、象蜜蜂采蜜那样不停地扩大工会组织的理想。在那次斗争中，所有

---

<sup>①</sup> 第一版中为“处在最底层的”。



的工会组织起初全部垮了，然后再在下一个斗争风浪中出现和重生。但这正是适合无产阶级组织的特殊发展方式：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并从斗争中重生。

对于德国工会来说，即将到来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斗争时期也不会给它带来令人感到担心和威胁的毁灭，而是相反，将为它的势力范围的迅速的跳跃式扩展开辟意想不到的崭新前景。在对德国社会情况和德国工人各个阶层的状况作进一步的考察之后，上述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了。可是这个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个方面。把群众罢工当作仅仅是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严肃的政治性阶级行动来搞的计划是根本毫无希望的。如果想使一次群众罢工或者甚至所有群众罢工获得成功，如果想使群众的斗争获得成功，它们就必须成为真正的人民运动，也就是说必须使无产阶级最广泛的阶层都参加到斗争中来。早在议会形式的斗争时期，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威力就已经不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小核心，而是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的广大外围群众。假使社会民主党只靠它的几万名党员就想大打竞选之仗，那它就会自己使自己注定成为一文不值的。只要有可能，社会民主党是倾向于把它的选民大军统统吸收到党组织里来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不是党组织的发展扩大了它的选民群众，恰恰相反，是各次竞选所赢得的新的工人阶层形成了随后播种组织的土壤。在这方面，也不仅是组织为斗争提供作战部队，而且是斗争本身在更高的<sup>①</sup>程度上为组织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很明显，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直接的政治性群众运动的程度大大地高于它适用于议会斗争的程度。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核心确实是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工人运动的政治明确性、力量和统一也确实来源于这

---

<sup>①</sup> 第一版中为“更大的”。

个组织，但是永远也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理解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运动。每一次真正伟大的阶级斗争都必须以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与参加作基础，而一种阶级斗争的战略，如果不是指望有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而是只适用于无产阶级中象驻扎在兵营里的那一小部分人所搞的漂亮行军，那么它在事先就已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

因此在德国，群众罢工和政治性群众斗争不可能仅仅由组织起来的工人搞，也不能指望那种来自党中央的正规的“领导”。在这一方面又是同在俄国完全一样，关键与其说是在于“纪律”和“训练”，在于事先就尽可能细心地确定救济和费用问题，不如说是在于一次能够赢得并带动最广泛的无产者群众的——它们虽然没有被组织起来，但就其情绪和地位而言是革命的——真正革命的、坚决的阶级行动。

对组织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与错误估计，还常常佐以对未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大众及其政治成熟性的过低估计作为补充。在革命时期和伟大的、振奋人心的阶级斗争暴风雨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对最广泛人民阶层的影响所产生的教育作用才显露无遗，而根据和平时期的组织表格甚至竞选统计对此是很难想象的。

在俄国我们看到，大约两年来，工人同资方的很小的局部冲突以及政府机关在个别地方的最轻微的残暴行为，都可以立即产生伟大而普遍的无产阶级行动。这样的事每个人都看得到，而且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俄国正在发生“革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本能正处于最高度的活跃状态，所以某一小批工人那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局部性事情都被它直接地感觉为普遍性事情，全阶级的事情，于是整个阶级就会象闪电一样作出反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工会同

资方最激烈的冲突没有引起工人阶级——哪怕仅仅是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的任何广泛的行动，而在俄国，就连很小的诱因也酿成了普遍的斗争风暴。这只能说明一点——尽管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俄国的年轻、没有经过训练、接受启蒙的程度很低、组织起来的程度更低的无产阶级，它的阶级本能目前却比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有组织、有训练和经过思想启蒙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要强过千百倍。这倒不是“年轻而新兴的东方”同“腐朽的西方”相比所特有的品德，而是直接的革命群众行动的简单结果。社会民主党在经过思想启蒙的德国工人的头脑里所播种的阶级觉悟，是一种理论的、潜在的阶级觉悟：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统治时期，它通常不能表现为直接的群众行动；它在这里是竞选期间各选区同时组织的四百次行动、许多局部的经济斗争以及诸如此类的斗争的思想总和。在群众亲自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期间，阶级觉悟就成了实际的、积极的阶级觉悟了。因此，在三十年的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中不能人为地使德国无产阶级得到的那种“训练”，俄国无产阶级却在一年来的革命中得到了。当然，就是在俄国，在革命时期结束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制国家建立之后，无产阶级这种活跃的、积极的阶级感情也会大大淡薄或者不如说成为隐蔽的、潜藏的。反之，在德国出现强大政治行动的时期，这种活跃的、有行动能力的、革命的阶级感情也会掌握德国最广泛、最低下的无产阶级阶层，而且社会民主党在这以前所做的教育工作愈是强有力，那么这种情况就来得愈是迅速、愈是势不可挡，这同样是肯定无疑的。这种教育工作以及目前德国整个政策的刺激作用和促进革命的作用将表现为：现在似乎处于政治迟钝状态、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一切努力似乎是麻木不仁的所有阶层，在严肃的革命时期都会忽然起来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六个月的革命时期能完成召开群众大会和散发传单在十年里

也无法完成的工作。当在德国出现这种时期的条件业已成熟时，今天尚未组织起来的落后阶层将在斗争中自然地成为最激进、最勇猛的部分，而不是卷进来的部分。德国一旦爆发群众罢工，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说，发挥最大的行动能力的将不是那些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层（肯定不会是印刷工人），而是那些组织得不好甚至完全没有组织起来的阶层——矿工、纺织工人或许甚至还有农业工人。

这样，在关于领导的本来任务的问题上，在关于社会民主党在群众罢工中的作用的问题上，我们在德国也可以得出在分析俄国发展进程时所得出的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种人为地由党和工会指挥少数有组织的工人举行的示威性群众罢工的学究图式，去看看由于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的极度激化而以雷霆万钧之力形成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它既表现为政治的、也表现为经济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罢工）的生动景象，那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显然并不在于从技术上对群众罢工进行准备和领导，而是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应当不管时机是否恰当，不经认真考虑就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而是首先要使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懂得革命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认清导致这一时期的内部社会因素和这一时期将带来的政治结果。如果想争取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如果反过来说，社会民主党在一次群众运动中想把握和保持真正的领导并且从政治上左右整个运动，她就必须懂得在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非常明确、非常彻底、非常坚决地教会德国无

产阶级认清策略和目标。

## 七

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群众罢工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为产物，而是在当今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革命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是由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消灭专制政体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治国家。从形式上看，这和德国的三月革命以及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产生这两次形式相同的革命的条件和历史环境却与今日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与今日东方的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业已完成，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已经遍及西欧各国，而且也遍及专制主义的俄国。在俄国，大工业生产和伴随着它的一切后果即现代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现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等等已经成了主要的、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那就是从表面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现在却反过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力量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一部分已经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软弱的自由派，只有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具有坚定的反对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

就是这样被确定为领导革命的角色。但是它摈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幻想，却带着自己特有的阶级利益的高度觉悟，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投入了战斗。这种充满矛盾的情况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俄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我们从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在群众罢工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在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方面对革命群众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领导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承担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直截了当地推翻旧的政府，速决的街垒战在当时是革命斗争的恰当形式。今天，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团结起来，自己指挥，而这个革命又是既反对旧的国家权力，也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于是群众罢工不仅成了通过行动本身吸收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并使之革命化和组织化的天然手段，同时也是瓦解和推翻旧的国家权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现在是俄国革命的灵魂。可是，无产阶级要作为群众采取任何直接的政治行动，就必须首先重新集成群众，为此，它首先必须走出各个工厂、车间、矿山和矿井，必须克服自己由于日常的资本奴役而必然陷入的那种分散状态。因此，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

是具有决定性作用。街垒战，即同国家武装力量的公开较量，从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在今天的革命中只是一个最突出的点，只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瞬间。

这里，由伯恩施坦、大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象先知般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与温和化，也在这种新的革命形式中实现了。当然，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所向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与温和化，是指把阶级斗争只局限于议会斗争，街头革命干脆废弃不用。历史在一种稍微深刻、稍微巧妙的方式中，也就是在革命群众罢工的出现中找到了答案。当然，群众罢工决没有取代直截了当的残酷的街垒战，也没有使它成为多余的，而只是使它缩小成漫长的政治斗争时期的一个瞬间，同时将革命时期同一项巨大的、最准确的意义上的文化事业联系在一起：使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文明化”，从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提高整个工人阶级。

因此，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从这个观点来看，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当前的俄国革命构成了一条连续发展的锁链，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的兴衰。在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还完全没有发展，因此只有当革命到了炽热状态时才能迅速萌芽和成熟的所有那些矛盾，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强大斗争中以一种无所忌惮的激进态度不受阻碍地、无拘无束地展开。半个世纪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途中爆发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已经由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力量均势而半途而废，被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所达成的妥协所扼杀，压缩成一段奏了一半<sup>①</sup>就戛然而止的短暂而又可怜的插曲。又过

---

① 第一版为“在演奏中间”。

了半个世纪，今天的俄国革命在历史道路上所处的位置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峰，这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再会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被扼杀，反倒会发展成漫长的、巨大社会斗争的新时期。革命本身会在这样的斗争中提出许多笔新账，相形之下算清专制主义的老账成了一件区区小事。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它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如果只是站在远处把俄国革命当作一出好戏，当作某种专门是“俄国的东西”来观察，并且最多也只不过只是对战斗者的英雄气概，即对斗争的表面的附加物表示赞赏，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德国工人应该学会把俄国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情来考察，不仅是为了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团结，而主要是把这种革命当作自己的社会政治史的一个篇章，这才是更为重要得多的。认为要搞革命的群众斗争德国无产阶级还嫌“太弱”、德国的情况也还太不成熟的那些工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们，他们显然根本就不懂得，衡量德国的阶级状况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力量的标志并不在德国工会的或德国大选的统计材料里，而是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之中。过去，七月王朝时法国阶级矛盾的成熟程度和巴黎的六月战役都反映在德国的三月革命之中，反映在它的进程和失败之中；今天完全一样，德国阶级矛盾的成熟程度反映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与威力之中。德国工人运动的那些官僚主义者搜遍了自己办公室里的抽屉，去寻找表明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与成熟程度的证据，却看不见他们所要寻觅的东西就在他们眼前的伟



大历史启示之中，因为历史地看，俄国革命是国际的，因而也首先是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力量与成熟的反映。

由此看来，假使德国无产阶级只想从俄国的革命中得出这样一种教训，就是它应该——如同弗罗梅、艾尔姆和其他一些同志所希望的那样——从俄国革命中借用群众罢工这种表面的斗争形式，把它当作一尊备用的大炮，好在国会选举权废除的时候使用。就是说要阉割群众罢工，使它成为在议会斗争中消极的防御手段，那么这种看法将是俄国革命的一个十分可悲的、微不足道到可笑程度的成果。如果我们的国会选举权被剥夺，那么我们就起来自卫，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决定。但是，要作这样的决定却不必象例如艾尔姆同志在耶拿那样非要摆出一副丹东式的英雄架势不可。<sup>①</sup>因为维护已经具有的那么一点点议会权利实在与其说是一桩翻天覆地的革新，必须得到牺牲大量生命的可怕的俄国革命的鼓舞才做得出来，不如说这是每个反对党的最简单的首要义务。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全部政策决不应当仅限于纯粹的防御。德国废除普选权时的形势是否肯定会立即引起群众罢工行动，这确实是很难有把握预言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德国一旦进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行动时期，社会民主党就无论如何也不应仅仅把自己的策略死死定为在议会中采取守势，这却是完全肯定的。事先确定在德国爆发群众罢工的导因和时机，这是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能通过党的决议来造出历史的局面。但是，如果斗争一旦发生，那么说明这些斗争的政策方针并用一条坚决的、一贯的策略把这些方针表述出来，这却是社会民主党所能

---

<sup>①</sup> 阿道夫·冯·艾尔姆在1905年9月17日至23日在耶拿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说，如果统治阶级取消国会选举权，无产阶级将起来自卫并且“为自由而冒生命危险”。——编者注

做到和必须做到的。要控制历史事件，不能靠事先制定的条条框框，而是必须事先意识到这些事件的可能的、可以估计到的结果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

反动派打算发动政变来剥夺最广泛的劳动大众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国会选举权，这是目前可能发生的政治危险。若干年来，德国工人运动对它已经有了准备。尽管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会有极大的影响，但上面已经说过，我们仍旧无法肯定地说政变之后会立即爆发以群众罢工为形式的公开的人民运动，因为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在爆发一次群众运动时会共同左右局势的那些无数的情况和因素。不过，只要考虑到目前德国状况的极端尖锐化，另外再考虑到俄国革命以及未来的经过革新的俄国在国际上引起的形形色色的反作用，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因废除国会选举权而产生的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为夺回这种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上。不如说，这样的政变或迟或早会导致愤怒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同反动派进行全面的政治大清算——清算面包业的重利盘剥和人为地抬高肉价，清算通过极端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实行掠夺，清算殖民政策的腐败，清算哥尼斯堡审判<sup>①</sup>所造成的国耻，清算社会改革的停滞和铁路职工、邮政人员以及农业工人的权利被剥夺，清算对矿工的欺骗与嘲弄，清算勒布陶判决<sup>②</sup>与全部阶级司法，清算野蛮的解雇罢工工人的制度，总之，要清算易北河以东地区容克地主与大资本卡特尔二十年来联合统

---

① 哥尼斯堡审判是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对九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被告被指控向俄国运送反沙皇的非法文字材料。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为辩护律师之一揭露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当局的勾结。——编者注

② 1899年2月，在德累斯顿的勒布陶的九名矿工因抗议一个邻矿的矿工干超出规定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而被判处总共六十一年苦役监禁和徒刑；在抗议期间，曾因矿长用装了拟制弹的手枪射击而发生斗殴。——编者注

治的全部压迫。

可是只要石头一经滚动起来，那么无论社会民主党愿意与否，都无法使它再停下来。反对群众罢工的人总是拒绝接受俄国革命的教训和范例，认为这对德国根本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主要的理由是俄国必须首先完成从东方式专制政体进入现代资产阶级法制的飞跃。他们认为，可以把新旧两种政治制度在形式上的差距当作解释俄国革命如此激烈和强大的充足理由。在德国，法制国家的必要形式与保障早已具备，社会矛盾因此不能那样猛烈地爆发。由此可见，这些群众罢工的反对者们是在搞投机，他们忘记了一点：如果德国爆发了公开的政治斗争，那么由历史决定的目标将与目前俄国的斗争目标完全不同。正因为资产阶级法制在德国早已存在，因为它已经有时间发展到头并且开始没落，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制与自由主义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在德国再也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德国的公开的政治性群众斗争时期，最后的历史地必然的目标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一任务同今天德国的现实情况的距离要比资产阶级法制同东方式专制政治的距离大得多，因此这一任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同样只能在长期的伟大社会斗争中完成。

那么在我们所描绘的远景中是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呢？因为一方面说，未来的政治性群众行动时期一旦出现，德国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农业工人、铁路职工、邮政职工必须首先争得自己的结社权。必须首先割除剥削所造成的最恶劣的赘疣；而另一方面却又说这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就已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了！一方面说要开展争取工人阶级最迫切的利益、争取提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的、工会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已经要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是的，这些确实是明显的矛盾，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推理中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不是

按一条漂亮的直线，而是大起大落，曲折多变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同样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历史不会耐心地等待那些落后的国家和阶层赶上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和阶层以后，才让大家排成一支严整的队伍整整齐齐地继续前进。只要矛盾最突出、最激烈的地方的条件一旦成熟，历史就会引起爆炸。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雨中，几天、几月之内就会补上过去耽误的事，填平差距，整个社会的进步就会一下子迅猛地向前发展。

在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纲领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工人阶层的利益协调一致了，无产阶级共同的伟大阶级行动也使得无数的局部斗争联合起来了；同样，德国的条件一旦成熟，情况也会如此，不是根据最落后的而是根据最先进的发展阶段去制定自己的策略，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届时的任务。

## 八

殷切地等待着德国工人阶级的那一伟大斗争时期迟早总会到来的；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在无产者大众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执行一条坚定而又一贯的策略之外，还应具有最大的行动能力即最坚强的团结。但是刚开始为准备规模较大的群众行动作出一些微弱的尝试，就已发现了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良状况：工人运动的两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是完全分开的和各自独立的。

根据对俄国群众罢工的更为仔细的观察，并且根据德国本身的状况，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哪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行动都不能被想成是所谓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如果这样的群众行动不应单

限于搞一次游行示威，而是要成为真正的斗争行动的话。在德国，工会参与这种行动的程度将与社会民主党完全一样。这倒不象工会领导人凭空设想的那样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组织比工会小得多，必须依赖一百二十五万工会会员的合作，“没有他们”就会一事无成，而是由于一个更为深刻得多的原因：每一次直接的群众行动或者任何公开的阶级斗争时期，都必将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群众行动和阶级斗争时期。不管由于什么样的诱因，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德国爆发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那么这必将同时在德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工会斗争的时代，那时发生的事件绝对不会管德国工会领导人是否曾给运动祝福<sup>①</sup>。假使这些工会领导人对运动袖手旁观或者甚至企图抵制运动，那么这一行动的结果只能是工会领导人<sup>②</sup>干脆被事件的巨浪抛到一边，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到底。确实如此，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分离与相互独立不过是人为的产物，虽然这也是议会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产物。从一方面讲，在资产阶级社会平静的“正常”进程中，经济斗争是分散进行的，成了一大批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单独进行的斗争；从另一方面看，政治斗争也不是通过群众本身的直接行动开展的，而是适应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通过代议制的途径，通过对立法的代表机构施加压力来进行的。一旦进入革命斗争时期，就是说一旦群众身临战场，那么无论是分散的经济斗争还是间接的、议会形式的政治斗争，都会立即消失；在革命的群众行动中，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融为一体，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运动的两个分开的、完全独立的形式之间的人为界限也将被一扫而光。不过，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表现得十

---

① 第一版中为“表示同意”。

② 第一版中还加上：“正象党的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

分明显的那些东西，同样也适用于议会时期的实际情况。工人阶级并不是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一种经济的和一种政治的，而是只有一种阶级斗争，既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又是为了彻底铲除剥削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即使这种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在议会时期由于技术原因而彼此分开，它们其实并不是两种平行发展的行动，而只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两个时期、两个阶段而已。工会的斗争包含着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则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未来利益。《共产党宣言》中说，与无产者的局部利益（民族的、地方的利益）不同，共产党人所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在阶级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则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也就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终目标。<sup>①</sup>工会<sup>②</sup>只代表工人运动的各个集团的利益和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社会民主党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及其获得解放的整体利益。因此，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应当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如果说那种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在工会领导人中间如此受到赞同，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工会的本质及其在工人阶级普遍的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有着根本错误的认识。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平行地行动和“权利平等”的理论倒不全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种理论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平静的“正常”时期的一种幻想，在这样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似乎溶化在议会斗争中了。殊不知与工会斗争相对应并加以补充的议会斗争和前者一样，也无非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土壤上进行的一种斗争。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编者注

②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目前”。

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一样。社会民主党〔本身〕<sup>①</sup>正是议会斗争与工会斗争的综合，即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旨在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阶级

---

①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今天”。

\* 因为人们通常否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这样的倾向，所以机会主义派别新近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和意愿的做法就很应该受到欢迎了。今年9月10日在美因兹的一次党的集会上，通过了由大卫博士提出的下述决议：

“考虑到社会民主党并不把‘革命’一词理解为暴力颠覆，而是理解为和平的发展，即逐渐地贯彻一种新的经济原则，因此美因兹的公开的党的集会拒绝任何一种‘革命浪漫主义’。

大会认为夺取政权无非是争取人民的多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要求；争取是不能靠暴力手段的，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思想宣传和实际改良工作的途径来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我们坚信，合法手段远比非法手段和颠覆更能使社会民主党繁荣发展，所以大会拒绝将‘直接的群众行动’当作策略原则，并坚持议会改良行动的原则，这就是说，大会希望我党将一如既往地认真致力于通过立法和发展组织的途径而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一改良式斗争方法的根本前提当然是，无产的人民大众参加全国和各州的立法工作的可能性不会受到削弱，而是要扩大成为完全的平等权利。因此，大会认为，如果其他一切手段无效，那么工人为了反击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进攻并争取其他权利，而短期或长期地拒绝工作，也是无可非议的权利。

但是工人只在政治性群众罢工严格遵循合法的轨道，而罢工者方面也不授人以派出武装力量干预的借口时才能胜利地进行这种罢工，因此大会认为，为使用这一斗争手段而作的唯一必要而有效的准备工作是进一步扩充我们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保证群众罢工顺利进行的前提：“目的明确的纪律性和适当的经济后盾”——卢森堡注

斗争。

这样看来，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就不单纯是理论上的误解了，也不单纯是本末倒置了，而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倾向的表现，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假使社会民主党愿意接受关于工会同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它也就间接地默认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早已追求的那种转变。

不过要使工人运动内部状况发生这样的转变，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不可能。因为主张工会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理论，恰好在德国的实际情况中，在生动的实践中找到了极好的说明。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德国工会直接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产物。创造了德国<sup>①</sup>工会运动〔最初的〕开端的是社会民主党，培育德国工会运动成长壮大的是社会民主党，迄今为德国工会运动提供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最有力的支柱的也还是社会民主党。第二，德国工会之所以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还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工会实践的灵魂，工会同一切资产阶级的和教派的工会相比的优越性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思想，工会的实际成就和威力是它的实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超越了狭隘经验主义泥潭的结果。德国工会的“实际政策”的长处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有着深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完全应当归功于作为它的实践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求使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理论的企图寻求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相对立的“工会理论”的企图，从工会本身<sup>②</sup>的立

---

①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今天的”。

②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和它的未来”。



场看，〔这种企图是〕无非意味着<sup>①</sup>自寻死路。对于德国工会来说，工会的实践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意味着立即丧失它同所有资产阶级类型的工会相比所具有的全部优越性，它就会从目前所在的高度降到动摇不定地摸索和纯粹的、平庸的经验主义的水平。

最后还有第三点，就是直接从数量上强大这一点来看，工会也是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sup>②</sup>的产物。对于这一点，工会的领导者们已经逐渐不能理解。有些工会领导人总是以他们的会员一百二十五万而感到自豪，惯于从这个高度怀着几分得胜的心情〔和一些幸灾乐祸之意〕俯视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五十万名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并且提醒它去想起十年到十二年前的那些岁月，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对工会的发展前景还是抱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在工会会员的大数目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员的小数目这两件事实中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成千上万的工人之所以没有参加党组织，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会。从理论上讲，工人本来应当参加两种组织，出席两种集会，既交党费也交工会费，阅读两种工人报刊等等。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必须具有那种纯粹出于对工人运动的义务感而不惜每天牺牲时间与金钱的理想主义，最后还必须具有那种只有通过加入党组织才能得到满足的对纯粹的党内生活<sup>③</sup>的狂热兴趣，只有大城市的少数最有觉悟、最聪明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里的党内生活内容丰富，富于吸引力，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但在大城市的更为广

---

① 在第一版中为“是”

②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当然在有些地区工会的鼓动走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前面，而且在所有的地方工会工作也为党的工作开辟道路。从它们的效果来看，党和工会的工作是互相促进的。但是，如果考察德国阶级斗争的整体及其深刻的内在关系，那么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③ 在第一版中为“真正的党内生活”。

泛的工人阶级中间以及在偏僻的地方，在一些较小和很小的地方，政治生活都不是独立的，只是首都所发生的事情的反映，因此党的生活也是贫乏单调的，而且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也大抵十分可怜，在那里双重组织关系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对于群众中的具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工人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自然就是参加自己的工会了。因为经济斗争本身的性质决定，他只能通过加入一个职业组织去满足他在这一方面的直接利益。他在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受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向这个组织缴纳的会费，给他带来了直接而又可见的好处。但是他也可以在并不专门从属于某个党组织的情况下表现他的社会民主党思想：通过议会选举的投票，通过参加社会民主党召集的民众大会，通过密切注意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议机构中的言论的报道，通过阅读党的报刊——关于这方面，请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选民数字和《前进报》订户的数字同有组织的党员数字作一番比较。还有决定一切的一点：群众中的具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一般工人，他作为普通人不可能理解〔工会领导人的〕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sup>①</sup>两个灵魂的理论，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工会也就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尽管各工会的中央组织不挂正式的党的牌子，但是各个大小城市的普通工人看到，在自己工会中为首的同事中最积极的领导人，也是他在公众生活中认识的同志即社会民主党员：有时是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邦议会或市镇议会的议员，有时是社会民主党的受托人、选举协会理事、党报编辑、党的书记或者普通的社会民主党演讲人和鼓动者。另外，他在自己工会的鼓动中经常听到的那些喜闻乐见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状况等问题的思想，也正是他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中了解到的。的确，工会大会上露面最多

---

<sup>①</sup> 在第一版中此处有：“所谓的”。

又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也就是那些人，只有他们才使“陋室生辉”，并且使往常与会者寥寥而又气氛沉闷的工会大会具有吸引力〕，正是大家熟悉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切都使有阶级觉悟的普通工人觉得，他既然参加了工会，因而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工人党了，也就是参加社会民主党了。德国工会具有的引人入会的能力，原来就在于此。各个中央工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这样多的人数，不是因为它的表面的中立性，而是因为它实际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今天在德国，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受这种表面中立性的迷惑了〕。人们企图通过还有天主教的、希尔施—敦克尔的<sup>①</sup>等等各种资产阶级党派的工会并存这一情况来论证表面的<sup>②</sup>“中立”的必要性，但恰恰单凭这一情况就使人们不可能受表面的中立性迷惑了。一个德国工人，如果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基督教的、天主教的、福音派新教的或自由思想派的工会，却一个也没有选中，而是选择了“自由工会”或者甚至退出前面的几种工会而加入自由工会，那么他所以要做的原因全在于他认为中央工会组织是公开声明进行现代阶级斗争的组织，或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二者在德国是一回事。简言之：表面的“中立性”，对<sup>③</sup>工会领导人来说是存在的，对工会组织的群众来说并不存在。这对于中央工会组织<sup>④</sup>也是大好事。假使表面的“中立性”、即工会对社会民主党的疏远与脱离一旦成为现实，尤其是在无产者大众的眼里成为现实，那么德国工会立刻就会失去它同与其竞争的其他资产阶级工会相比的优越性，从而也

---

① 麦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敦克尔都是资产阶级进步党活动家。两人于1868年建立德国工会协会联合会。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编者注

② 在第一版中为“政治的”。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有些”。

④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运动”。

就失去了它的引人入胜的能力和勃勃的生机。上面所说的将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得到有力的证明。因为把工会在党的政治上保持表面的“中立性”当作一种吸引人的手段，这只能在这样的国家里做出突出的贡献：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毫无信用；那里，社会民主党的名声对于一个工人组织在群众心目中的作用害多于利，总之那里的工会必须首先亲自去从完全没有觉悟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中募集自己的队伍。

英国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这类国家的典型。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是最强大的政党。它的吸引入党的力量是由一支三百多万的无产者大军来体现的，要说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声是可怕的，工人的战斗组织有必要在政治上伪装<sup>①</sup>中立，这是可笑的。只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数字同德国工会组织的数字加在一起，就足以使每个小孩都懂得，德国工会并不象英国工会那样从没有觉悟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中，而是从已被社会民主党唤醒并已具有阶级斗争思想的无产者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群众中征集自己的队伍的。作为对“中立理论”的附加品，<sup>②</sup>工会领导人愤然拒绝接受那种视工会为社会民主党的新兵预备学校的思想。可是德国的情况刚好<sup>③</sup>相反——是社会民主党成了工会的新兵预备学校，这个简单的情况使得被认为奇耻大辱而其实却是对他们大加恭维的上述过分的要求〔可惜〕在德国实际上成了幻想。尽管德国工会的组织工作大抵还是十分困难而艰苦的，〔以致在工会领导人的心目中引起并滋长了一种幻想，

---

① 在第一版中为“遵守”。

②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一些”。

③ 在第一版中为“通常”。

仿佛在无产阶级的处女地上首先耕耘和首先播种的正是他们；]但不仅土地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开垦的，就连工会的种子及其播种人也还必须是“红色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才能大有收获。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不是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人数、而是将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人数去同工会会员的人数作比较（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我们就会得出与工会领导人的那种扬扬得意的胜利感<sup>①</sup>大不相同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自由工会”今天其实仍只代表德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少数，它的一百万<sup>②</sup>会员还〔根本〕不到社会民主党帮〔它〕赢得的〔赞成进行阶级斗争的〕群众的一半。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对即将到来的德国群众斗争来说绝对必要的、工会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之间的充分团结确实已经存在。这种团结体现在既是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会的基础的广大群众身上，而且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在这些群众的觉悟中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之间的表面矛盾缩小成社会民主党同上层的<sup>③</sup>工会官员的矛盾，而这同时也是工会内部<sup>④</sup>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同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群众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十五年中，特别是在1895年至190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德国工会运动有了强大的发展，这不仅使得工会大为独立了，而且也使工会有了专门的斗争方法和专门的领导，最后还出现了一个正规的工会官员阶层。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十五年的工会发展所形成的、完全可以解释的、自然的历史产物，是德国经济繁荣与政治平静的产物。它们是历史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弊病，对工会官

---

① 在第一版中为“与这一方面的流行观点”。

② 在第一版中为“一百二十五万”。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和某一部分”。

④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这”。

员阶层来说尤为如此<sup>①</sup>。不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又恰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工会组织发展到一定水平，当客观情况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的时候，这些曾经促进工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又会转向其反面，成为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

由于工会领导人的职业活动的专门化，由于同稳定时期分散的经济斗争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狭隘眼界，工会官员身上很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偏见<sup>②</sup>。但是这两种弊端表现为一系列的倾向，对未来的工会运动本身可能危害极大。其中第一个倾向就是过高地评价组织，使组织从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逐渐地变为目的本身，变为至高无上的财富，斗争的利益<sup>③</sup>〔经常〕服从它。那种因为害怕冒较大的风险、害怕会危及工会存在的莫须有的危险，害怕没有把握的较大的群众行动而公开承认的维持稳定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工会的斗争方式本身及其前景与成果的过高评价，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因来解释。工会领导人经常被小规模经济斗争占去全部精力，他们认为让工人群众明白每一项哪怕是很小的经济成果、每一次增加工资或缩短工时都具有高度价值这个道理是自己的任务，自己却逐渐发展到看不见更加广泛的关系、丧失纵观全局能力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例如德国的<sup>④</sup>工会领导人为什么十分满意地指出过去十五年取得的成果，指出工人所增加的工资共达八百万马克，却不是与此相反，去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同一时期，由于面包业的重利盘剥，由于整个税收和关税政策，由于买卖地皮牟取暴利而导致的房租极度上涨，这些又大大地压低了无

---

① 在第一版中这句话是：“它们尽管同某些弊病不可分开，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

② 在第一版中增加“和一定的狭隘性”。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应当”。

④ 在第一版中为“一些”。

产者大众的生活水平。一句话，资产阶级政策的一切客观趋势使十五年工会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又成为泡影。<sup>①</sup>社会民主党的真理是完整的，它强调要做当前工作及其绝对必要性，同时把重点放在对这种工作进行批评并指出其局限性，这种完整的真理纠正了工会的只强调日常斗争积极方面的不充分的真理。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给工会斗争划定的客观界限闭口不谈的态度，到头来又发展成对联系工人运动最终目标而指出这些界限的任何理论批评的直接敌视。一定得歌功颂德，一定得抱无限的乐观态度，这成了每个“工会运动之友”的义务。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恰恰在于反对缺乏批判精神的工会乐观主义，正如它反对缺乏批判精神的议会乐观主义一样，这就归根到底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本身也遭到反对：工会官员摸索着寻求<sup>②</sup>一种“新的<sup>③</sup>理论”，〔一种会符合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观点的理论，〕就是说寻求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相反、将为工会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开辟无限前景的理论。当然，这样的理论其实早已存在了。那就是桑巴特教授的理论。它是专门为在德国的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并将前者引诱到资产阶级的土壤上而提出的。

和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转变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方面也是完全符合桑巴特的理论的——在领导人同群众的关系上也有了变化。过去的工会鼓动工作都是由同志们自己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以同事之间的亲密态度进行的，是无报酬的，是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目前却代之以公事公办、官僚主义的领导，而且大抵都是由外地派来的工会官员担任。由于运动由这位工会官员集中

---

① 在第一版中为“被抵销”。

② 在第一版中为“有些人摸索着寻求”。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插入“工会的”。

掌握，对于工会事物的判断能力也就成了他的职业专长。广大工人同志被降低为没有判断能力的群众，他们主要是应把“纪律”这项美德也即消极服从的美德当成自己的义务。在社会民主党内，同那种带倾向性的关于“倍倍尔式的专政”的无稽之谈相反，由于存在被选举权，由于实行同志式的领导，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个行政机构，但是在工会里却在多得多的程度上存在着上司同下属群众的关系。<sup>①</sup>这一关系的突出结果是<sup>②</sup>那种鄙弃从理论上对工会实践的前景与可能性作出任何批评的论证，——因为据说这样的批评对于群众对工会的虔诚观念是一种危险。这种论证所根据的观点是：只有让工人群众对工会斗争的益处抱有盲目而幼稚的信念，才能为工会赢得并保住这些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把它的影响建筑在群众对现存制度的矛盾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全部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上，建筑在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所有时刻与所有阶段都采取批评态度的基础上；与此相反，根据上述<sup>③</sup>理论，工会的影响与威力却是以群众毫无批

---

① 在第一版中这一段文字为：“同这一理论倾向密切联系的是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中的变化。工会官员的公事公办的领导代替了地方委员会的以同事之间亲密态度进行的领导以及它的毫无疑问的不足之处。这样一来，首创精神和判断能力可以说成了工会官员的职业专长，而群众的责任则主要是保持更加消极的德行即遵守纪律。官员制度的这一阴暗面肯定也包含着对党的重大危险；由于最近的改革，由于设置了地方党的书记，如果广大社会民主党员不去操心使被任命的党的书记保持为纯粹的党的工具，而根本不是被看成地方党的生活的首创精神和领导的当之无愧的体现者，那么这种危险是很容易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内，由于事物的本质，由于政治斗争本身的性质，官僚主义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在工会生活中更加严格。在工会生活中，正是由于工资斗争在技术方面的专业化，例如缔结复杂的工资协议和诸如此类的工作，因而经常认为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能‘纵观本行业生活的全局’，并以此来论证他们缺乏判断能力”

② 在第一版中为：“这一观点尤其也成了”。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错误的”。



评和判断能力为基础的。“必须使人民保证信念”——根据这一原则，一些工会官员给对工会运动的客观上的不足之处所作的任何批评一概贴上危害工会运动本身的标签。最后，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高度独立性并和“中立”，也是工会官员的<sup>①</sup>专业化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工会组织表面上的独立性，是随着它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条件，作为在政治的与工会的斗争形式的技术分工的基础上<sup>②</sup>形成的一种状况而产生出来的。德国工会的“中立性”本身又是作为普鲁士德意志警察国家反动的结社法<sup>③</sup>的产物而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情况的本质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工会的政治“中立”是受警察强迫而形成的一种状态。后来却由此造出一种工会应自愿保持中立的理论，把这说成是基于工会斗争的本质的一种必然性。工会在技术上的独立性本来应当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内部的实际分工为基础的，却变成了工会对于社会民主党、对于党的观点和领导的独立性<sup>④</sup>，变成了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权利平等”。

但是工会的这一表面上对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sup>⑤</sup>和权利平等<sup>⑥</sup>，主要体现在工会官员身上，是由工会的行政机构培育出来的。由于除了社会民主党的行政机构、党的执行委员会、党报和党的代表大会，同时还有一整套工会官员班子、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大量的各行业工会报刊，最后还有工会代表大会，这就在表

---

①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官员中的”。

② 在第一版中为“从……技术分工中”。

③ 这一反民主性质的结社法首先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联合的，它限制了结社权。由于在普鲁士工会也被看成政治联合会，因此经常受到被解散的威胁。  
——编者注

④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脱离它的思想和领导”。

⑤ 在第一版中为“脱离社会民主党”。

⑥ 在第一版中为“处于平等地位”。

面上产生了二者完全平行的这样一种假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享有平等权利<sup>①</sup>的幻想甚至还导致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就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工会的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议程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却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不同的甚至直接相反的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工人运动的普遍利益和普遍任务，工会的代表会议所处理的却是狭隘得多的领域即某个行业的日常斗争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有人却从这两种代表大会的<sup>②</sup>分工中捏造出一种<sup>③</sup>分裂来，说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的一些相同的普遍性问题和普遍利益上存在着世界观上的分歧。〔但是这种异常状态一经形成，它就有一种不断蔓延和不断尖锐化的自然趋势。自从工会代表大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有着相同的议事日程这种怪现象出世以来，甚至连工会代表大会的存在也成了一种自然的刺激，促使人们口渐强烈地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线，去脱离社会民主党。为了通过文件向自己和向别人证明工会的“独立性”，为了不致因简单地重复党代表大会的立场而显出工会的多余性或从属性，工会代表大会——众所周知，这主要是工会官员的代表大会——必然本能地力图强调分歧的方面和“专属于工会的”方面。工会有与社会民主党平行的独立中央领导这件事本身也同样从心理上促使人们处处感到工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独立性，并且促使人们从“权限”的立场来看待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接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状况：同是一个工会运动，它在下面，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是同社会民主党完全一致的；而在上面，在工会的上层行政机构中，它却突然脱离社会民主党，确立

---

① 在第一版中为“处于平等地位”。

②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自然的”。

③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人为的”。

了自己作为独立于前者的第二支强大力量的地位。德国工人运动于是就获得了一种双金字塔的形式。塔基和塔身是坚如磐石的浑然一体，而两个塔尖却是远远地分立着。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清，唯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自然而成功地达到德国工人运动的坚实团结，无论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政治性阶级斗争还是对于工会未来发展的自身利益来说，这种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想通过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工会的中央领导之间就工人运动的各项问题举行不定期的或定期的谈判的途径来实现人们孜孜以求的团结，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和更加没有希望的了。我们看到，正是工人运动的这两种形式的最高领导组织才体现了它们的分裂与独立，这两个最高领导组织同时又是<sup>①</sup>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权利平等”和平行并存这一幻想的持有者〔和支持者〕（工会的领导尤其如此）。想通过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与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来实现两个组织的团结，这无异于想在间距最大和最难通过的地方架桥。〔假使应把党与工会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两支强大力量之间的每次谈判变成制度，那么这恰好就等于将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运动同这个运动的某一局部现象之间的联合关系奉为神圣，而作为反常现象，这种联合关系却是必须取缔的。社会民主党最高领导机构与工会最高领导机构之间的外交式的联合关系，只能促使双方关系的日益疏远和日益冷却，只能成为层出不穷的新的摩擦的泉源。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因为这种关系的形式本身就容易使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互相和谐地结合起来这个大问题变成了菩提树大街和恩格尔乌弗<sup>②</sup>的两个“领导机构”的“睦邻”关系这个小问题，使狭

---

① 在第一版中为“因此本身就是”。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设于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德国工会总委员会设于柏林的恩格尔乌弗。——编者注

隘的尊卑考虑与敏感掩盖了工人运动的重大观点。采用领导机构接触的外交方法的第一次尝试，也即党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委员会关于群众罢工问题所举行的谈判，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说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最近声明，说它和党执行委员会——有时由这一方，有时由那一方——曾几次提出并举行过对一些个别问题的磋商，那么从礼尚往来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保证也许可以令人安心和振奋；但是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严重时期，必须更为深刻地去把握自己的斗争问题，它完全有理由抛开这种中国式的大老爷风度，并且到客观情况自行提出完成任务的办的地方去寻求这种办法。〕实现工人运动的真正团结的保障不是在上面，不是在两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及其所结成的联盟，而是在下面，存在于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大众之中，在百万工会会员的心目中。党与工会实际是一个东西。它们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不同形式。由此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必然性，就是要消除社会民主党与<sup>①</sup>工会之间的〔那种疏远和〕摩擦，要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适应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这就是说，使工会重新同社会民主党结合。这样只是表明了实际发展的合题，这一发展曾使工会从原来同社会民主党结合变成脱离社会民主党，然后经过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发展时期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伟大群众斗争时期作好准备，但从而又使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为了双方的利益实现重新联合成为势所必然。

这里当然决不是说要使工会的全部<sup>②</sup>建设完全消溶在社会民主党里，而是说要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工会的领导之间，在党的代表大会与工会的代表大会之间建立那种自然的关系，这是符合

---

①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一部分”。

② 在第一版中为“目前的”。

整个工人运动与工会这个局部现象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这样的转变必将引起一部分工会官员<sup>①</sup>的激烈反对，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要学会表现出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从而证明他们为进行伟大斗争与完成伟大任务的未来时期所作的准备业已成熟；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这些群众应当是行动的集体，而领导只应当是“发言人”，<sup>②</sup>只应当是群众意志的表达者。

工会运动并不反映象一些<sup>③</sup>工会官员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荒谬的幻想中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象已被争取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广大无产者群众的意识中存在的那个样子。在无产者大众的意识中，工会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而她是什么样子，就要敢于表现出什么样子。”<sup>④</sup>

1906年9月15日于彼得堡。

手稿印本1906年出版于汉堡。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93—170页。

（白锡堃译 殷叙彝校）

---

①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领导人”。

② 在第一版中插入“也就是说”。

③ 在第一版中为“少数”。

④ 出自弗·席勒：“玛丽亚·斯图亚特”。——编者注

# 在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曼海姆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6年9月26、28日)

(9月26日)

列金的发言简直是近来某些工会领袖对待社会民主党及党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的绝妙典范。首先，他对耶拿决议<sup>①</sup>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最严厉的批评，指出群众罢工的思想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并由此向我们提出了警告，末了当然又鼓励又抚慰地保证一番：我们大家是同心同德的！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把争论进行到底了，我们可以一致通过一个决议了。但是这种一致必须以最奇特的方式建立起来，就是说，人们应该声明，那个说单纯讨论群众罢工是有害的科伦决议与耶拿决议是一致的。当我听到列金这个提议时，我对自己说，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才能指望我们赞成这个提议。当我听到党执行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提议时，我吃惊不小。我要谈谈关于列金对耶拿决议的批评！他向传统求救是具有特色的：我们大家从来就这样理解，总罢工（列金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和群众罢工等同起来）是总胡闹。然而，

---

<sup>①</sup> 1905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承认“广泛地运用群众罢工”是工人阶级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编者注

如果我们不懂得从儿童时代的思想中解脱出来，那我们就是糟糕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我们之所以是从历史发展看问题的党，就是为了我们能向历史学习。今天，面对着在今后几十年内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师表的伟大的俄国革命，如果人们仍然主要是依据正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的事情来研究群众罢工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以此表明了正是列金向传统求救所表明的东西：他们不懂得学习任何东西，也不懂得忘记任何东西。是的，你们就是不懂得从俄国革命中学习任何东西。否则你们就不敢断言，群众罢工运动是对工会生存的最大威胁。你们显然不知道，强大的俄国工会运动是革命的产儿。俄国无产阶级开始革命时一个组织也没有，今天，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健壮的组织萌芽。工会只能风平浪静地发展，这正是陈腐而僵化了的英国观点。俄国革命证明，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往往是在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的。大卫则再次从他特殊的美因兹的合法观点出发来批评群众罢工思想。他把机关枪当作稻草人拿来吓唬我们。俄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他忘了，机关枪是由活人，由士兵操作的。只要时机成熟，它们是不会失去效力的，它们同样是致命的，它们只能用来对准现存政权。列金最后一个论据无非是证明列金在某些方面确实还停留在儿童时代的理解上。他说，通过了耶拿决议，我们便做了一件欠慎重的事：我们把自己的计划泄露给了敌人。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伟大的历史运动，伟大的人民运动是通过密室的密约进行的？如果以为，总罢工的命运取决于总委员会甚至和党执委会一起在密室里所决定的东西<sup>①</sup>，那是对总罢工幼稚的想象。我还想

---

① 1906年1月16日党执委会同工会总委员会举行了秘密会谈。党执委会在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上向工会领导人作了让步。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没有得到工会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宣传群众罢工，并且如有可能应加以阻止。

——编者注

对倍倍尔的讲话也说几句，只是我没有把握是否正确理解了上的讲话，因为我坐在左边，而他今天说话总是向着右边。但是我确实是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他曾说：当然要坚持耶拿决议。如果有人要剥夺我们的普选权，我们当然要运用一切手段去捍卫它，我们也应当到此止步。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它们使我的心情感到愉快和振奋，但是在结束时他谈到了如果由于普鲁士的干预我们卷入一场同俄国的战争而在德国可能和必然会发生的事。我没有把握，我这里是否正确理解了倍倍尔的话，要是他在结束语中预防了所有误解，那我认为这就好了。就我所能达到的理解，他的话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被置于战争边缘，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如果倍倍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那我们的法国朋友将会狼狈不堪，因为我们英勇而无所畏惧的法国同志通过瓦扬宣布：如果同俄国打仗，他们将使用他们的否决权。我们的朋友创造的一句流行的名言：宁要人民起义而不要战争。这是法国无产阶级大丈夫的语言，我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也会有有一天有足够的勇气说：“不允许发生违背我们意志的事情。”倍倍尔说：你们想一想，党执行委员会能够举行群众罢工吗？当然不能，党执委会必须由群众推动。如果党执委会对它的作用没有不同的理解，它就应该也将会受到推动，我请求你们，在这种意义上拒绝执委会同总委员会背着我们签订的协议，并且赞同考茨基的提案。<sup>①</sup>

---

<sup>①</sup>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执行委员会向工会右翼领导人让步，在决议中承认举行罢工时须得到工会同意，从而使党成了和工会相平行的组织。卡·考茨基和其他32人的提案要求，党执委会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等问题的决议应当明确表明，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遵守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高和最广泛的形式。但是在机会主义者提出抗议之后，考茨基收回了提案中上述最重要的部分。——编者注



( 9 月 28 日 )

党员同志们！我认为，在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党执委会决议<sup>①</sup>的基本思想。希望我们全都站在这个立场上；中央工会是现代工会斗争的最适宜的形式，当前无政府主义在德国有如它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样，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工人在精神上误入歧途和精神堕落的结果。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采纳党执委会提出的决议是一个很大的失策。首先，以我粗浅的臣仆之见我无法弄清，这些中央工会的代表对这项决议的态度怎么能同他们对考茨基在此以前提出的决议的态度一致起来。世界上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在工会内部也应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行事，并遵守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此却有人极力反对，说是因为这样会给外面造成这样的印象：工会完全受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但是人们一定会同意社会民主党采取有利于工会的某种组织形式的有力行动。我担心，采取这样的双重态度，也许会在那个著名的农民婚约的意义上形成工会跟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订立这种婚约时，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看法一致，这就算是实现了你的意志，要是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你就得按我的意思行事。”此外，如果有人把党在某种程度上当作惩罚某个工会工作者集团的惩戒鞭使用，从而使我们在党的队伍内部不胜其烦地承受纠纷与争吵，那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毫无疑问，地方组织有很多正直的同志，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直接为工会效劳，而把争吵带到我们队伍中来，这同样是不负责任的。

---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反对地方工会组织中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的活动，并要求把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去。——编者注

我们尊重这种看法，即地方主义者不应把工会组织中的争执闹得这样严重，以致中断了工会组织的工作；但是人们应当以备受赞扬的平等权利的名义承认，至少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党。如果我们象党执委会建议的那样，把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直截了当地从党内开除出去，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可悲的先例：我们的所有精力和决心都是为了使我们党向左边不得越雷池半步，而向右边则一如既往地敞开大门。

冯·艾尔姆在这方面举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胡言乱语的例子：有人在《团结报》<sup>①</sup>上或者在地方组织的一个会议上声称，应当把总罢工看成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不言而喻，这是胡说，而不是别的。但是，在座的诸位，如果大卫宣布，合法的议会手段是社会民主党唯一的手段，这同样远离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我们的原则。有人对我们说，地方主义者、无政府社会主义者通过他们的宣传经常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准则。但是，如果各中央工会的某一个人，比如布林格曼<sup>②</sup>在你们二月会议上<sup>③</sup>声明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这同样是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准则的。无政府主义在我们队伍中不是别的，而是反对过度右倾的一种向左的反动。如果你们要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就要始终忠实于我们久经考验的原则：在我们这里谁也不会因观点不同而被开除。我们反对机会主义是要使这些人不能为害，并且埋葬整个无政府社会主义运动，因为机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真正养父。如果我们没有把

---

① 《团结报》是德国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自由联合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897年。  
——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布林格曼（1861—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之一。  
——编者注

③ 指1906年2月19—23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会议。——编者注

最右的人开除出去，那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权利把最左的人开除出去。

发表于《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会议记录》1906年柏林德文版第260—262、315—316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171—176页。

（黄敬甫译 李宗禹校）

# 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7年5月3、4、12日)

(5月3日)

同志们！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知道我要来参加你们的党代表大会时，决定借此机会，委托我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且怀着最好的愿望祝贺大会成功。

数百万有觉悟的德国无产者怀着强烈的同情和极大的关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俄国兄弟的革命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在行动上证明，它乐意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丰富的经验宝库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随着1905年的开始，在革命暴风雨的第一声惊雷在彼得堡上空响起以后，在1月9日无产阶级游行示威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重新振作起来了。这表现在对策略问题的激烈辩论上。耶拿党代表大会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是我们党从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虽然这个决议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实践中应用过，而且恐怕在最近的将来也难以贯彻，但是它在原则上的意义是有口共睹的。直到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在群众罢工问题上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一直占居上风。群众罢工被看作是一种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因而也被看作是反动的、有害的空想。然而一旦德国无产阶级从俄国工人的群众罢工中开

始看出这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这种形式并不同政治斗争对立，而是可以运用于这种斗争的一种武器，也不是为了突然跳跃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神方妙法，而是在现代的阶级国家中为争取最基本的自由而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它就迅速彻底改变了它对群众罢工的态度，并且承认群众罢工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运用于德国。同志们！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德国无产阶级感到十分光荣的是，它丝毫也不是从甚至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赞叹不已的这种斗争方式的表面成就所引起的印象出发来改变它对群众罢工问题的态度的。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在革命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伟大胜利的前一个多月，就是说，是在从专制主义手中夺得那些以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立宪让步的、值得纪念的十月的日子以前一个多月通过的。此后俄国革命斗争遭到的全是失败，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以正确的阶级本能感觉到，在这些表面上的失败背后，正在为无产阶级力量的空前壮大，为未来胜利的可靠保证作好准备。事实上，德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取得任何表面成就之前，就已经在它过去的斗争方法中添进了新的策略口号，借以对俄国革命经验迅速表示崇敬之意。这种口号已不再指望议会活动，而是指望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登场了。

俄国后来发生的事情——十月和十一月那些日子，特别是革命浪涛掀起的高潮本身，莫斯科的十二月危机<sup>①</sup>——在德国也反映出来了，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群情激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十二月和一月，在奥地利由于普选权爆发大示威之后，在德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问题是现在是否已经到了联系普鲁士、萨克森和

---

<sup>①</sup> 1905年12月20日莫斯科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沙皇统治，罢工发展到转向武装起义，但最后被沙皇军队镇压。——编者注

汉堡的邦议会的普选权斗争直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群众罢工的决议付诸实施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否定性决定，也拒绝了人为地发起一次巨大的群众运动的想法。不过，1906年1月17日作了第一次尝试，在汉堡出色地举行了半天的群众罢工，它再次提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巨大活动中心的工人群众的情绪和对自身力量的认识。

从表面上看，接踵而来的1906年给俄国革命带来只是失败。在德国这一年也是以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失败而告终的。你们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月25日的选举中几乎失去了它的一半选区。但是连这次议会斗争的失败也是同俄国革命休戚相关的。对于了解这次选举中各政党的相互关系的人来说，都不会怀疑，决定这一场运动的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俄国革命。毋庸置疑，俄国革命事变的影响及其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引起的恐惧是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层和政党（除中央党外）在唯一的口号之下联合和团结成为唯一的反动联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口号就是：打倒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机构！打倒社会民主党！拉萨尔关于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的名言从来还没有象在这一次选举中这样明显地应验过。然而选举的这种结果却迫使德国无产阶级以加倍的注意力把它的眼光投向它的俄国兄弟的革命斗争。如果要用几句话从政治上和历史上一总结一下这次帝国国会的选举，那就应该说，1907年1月25日和2月5日之后的德国是唯一的既没有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痕迹、也没有其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痕迹的现代国家：它们都最终和无可挽回地站到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派一边去了。正是自由派的背叛才使我们首先在这次选举中任凭容克反动政权摆弄。尽管日前被选进国会的自由派居于多数，但是他们现在不过是反动派的可悲的、戴着自由派假面具的走狗罢了。

与此相关，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它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你们，俄国的同志们经常思索的问题。就我所知，在俄国的同志们确定策略时起着主要作用的出发点之一是这样的观点：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存在着一定内在矛盾的任务，这就是首先要创造资产阶级制度的一些首要的政治条件，同时又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情况似乎同我们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根本不同。

同志们！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对问题的纯粹形式上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处于同样困难的形势之中。在我们德国，最近这次选举正好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势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唯一战士和捍卫者！

且不说在我们德国大多数邦议会还没有普选权，也不说我们必须忍受一大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残余，甚至连我们享有的一点点自由，例如选举帝国国会的普选权，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也没有真正的保障，经常受到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冲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同盟军，所有这些场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德国的民主发展唯一牢靠的支柱。

因此，这次选举失败便把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也可以听到少量的哀叹自由主义过早衰亡的喧闹声。因此也有人从法国向我们忠告，要我们在我们的策略中考虑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软弱地位，宽宏大量地对待它的残余，以便利用它作为反对反动派的同盟者和维护民主发展的普遍基础。同志们！我可以确认，这些为德国政治发展的结果而悲叹的声音，这些忠告，在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已经遭到了一致的和强烈的反对。我愉快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党内的某一翼，而是党的全体都在声明：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不幸结果感到遗憾，但我们一点也不允许为了自由主义而偏离我们无产

阶级的策略原则。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从这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中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如果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表明自己是如此虚弱如此动摇，以致他们每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采取比较坚决的姿态时都决意要陷入反动派的深渊，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待遇是完全公正的！在1月25日选举结果的影响下，德国无产阶级最广大的阶层逐渐认识到，由于自由主义的瓦解，无产阶级必须抛弃对自由主义协助我们反对反动派的最后一点幻想和希望。在目前，无论是在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或者是在反对反动派破坏民主发展的斗争中，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完全依靠自己。正是在这次选举中，阶级对抗前所未有的尖锐化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事情表明，德国的内部发展已达到了迄今为止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无法想象到的成熟程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所作的分析重新获得了完全明确的、较之我们所能预料的还要出色的证实。但是这也同时使大家都明白了，这种发展，这种阶级对立的尖锐化，或迟或早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德国也导致一个气势磅礴的政治斗争时期。在我们那儿，人们正以特别的兴趣，结合这种情况讨论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有关问题。

正因为如此，德国无产阶级把俄国兄弟当作他们的先驱者，当作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加以双倍的重视。根据我在选举活动中获得的不多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所有的选举集会上——我要出席一些二至三千人的集会——都会从工人中间发出“请您谈谈俄国的革命！”的呼声。这不仅流露出一种发自对战斗兄弟本能的阶级友爱的自然的同情，而且还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俄国革命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德国无产阶级寄予俄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期望是扩展和充实无产阶级策略，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阶级斗争的各种原则的应用。确实如此。德国工人阶级目前



应用的、迄今以前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主要是适合于议会斗争的，是根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情况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担负这样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的党：不是在国家生活处于正常的、平静的、议会政治的时期，而是在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应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应用于革命时期的实际政治的唯一先例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然而1848年革命过程本身并不能作为当前俄国革命的榜样。从那次革命中人们大概只能学到一点，即不应在革命中登台表演。那次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无产阶级以惯常的英雄气概参加战斗，但是却不懂得利用它的胜利；资产阶级排挤无产阶级，以便把它的斗争成果攫为己有；最后是专制主义使资产阶级垮台，以便既粉碎无产阶级，又粉碎革命。当时无产阶级的阶级分离还处于萌芽状态。固然当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宣言》这个阶级斗争的伟大宪章。固然马克思已经作为一个实践的战士参加这场革命。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担任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的角色，而必须扮演一个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角色。《新莱茵报》也不是很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机关报，毋宁说它是革命阵营最左边的哨岗。虽然以《新莱茵报》为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在德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卡尔·马克思在革命的头一年铁一般坚定地贯彻的正是这种政策。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在于马克思千方百计地支持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那么，这种支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自始至终都无情地严厉地鞭挞资产阶级政策的一切矛盾和不彻底性，鞭挞它的一切软弱性和懦弱性；表现在他毫不动摇地支持和捍卫工人群众的每一行动——不仅是支持带来第一次短暂胜利即3月18日胜利①

---

① 柏林的工人、小市民和大学生于1948年3月18日与普鲁士军队作战，筑起街垒，并打败了普鲁士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迫把军队撤离柏林——编者注

的行动，而且还支持6月14日对柏林军火库的值得纪念的冲击<sup>①</sup>，这一冲击在当时以及后来一直被资产阶级固执地认为是给无产阶级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还支持九月的那些起义和维也纳的十月起义<sup>②</sup>，即工人群众挽救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背叛而濒于失败的革命的最后几次尝试。他支持1848年的民族运动，因为他把它们看作是革命的同盟者。马克思的政策表现在他不断地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形势的极限。是的，马克思支持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但他是用鞭子和拳脚来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在3月18日取得他们第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竟容许组成资产阶级的康普豪森—汉泽曼<sup>③</sup>责任内阁，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既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因而马克思一开头便要求它实现革命的专政。他在《新莱茵报》上明确宣告：任何一种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都需要有一种极为坚决的专政。马克思对德国“杜马”——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毫无权力的状况实在是太理解了，但是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可以减轻罪责之处，而是相反，给它指出摆脱这种无权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在公开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夺取实际权力，并为此依靠革命的人民群众。

但是，同志们，马克思这个政策是怎样结束的呢？一年之后，马克思不得不离开这个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哨岗——一个完全孤立和无望的哨岗——，转向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1849

---

① 1848年6月14日柏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冲击军火库并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次暴动遭到军队和市民保卫队镇压，工人又被解除了武装。——编者注

② 在1848年10月，为了阻止驻扎在维也纳的德意志和意大利联军开赴匈牙利，镇压匈牙利的自由和独立运动，维也纳的工人、大学生和其他革命力量掀起了武装斗争。——编者注

③ 卢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德国银行家。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大卫·汉泽曼（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和银行家。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编者注

年春马克思和志同道合的同志退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协会<sup>①</sup>，决心着手创建独立的工人组织，他们也想参加由东普鲁士无产者倡议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当马克思打算改变他的政策时，革命已经到了它的最后一息，马克思还来不及运用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策略，《新莱茵报》便成了胜利的反动派的第一批牺牲品之一而停刊了。

同志们，很明显，你们目前在俄国不必从马克思开始做的事做起，而应当从他在1849年用以结束他的政策的事做起，即从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做起。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已不是处在1848年德国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萌芽状态，而是一支团结的有觉悟的政治力量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它目前的斗争中切不要感到自己是一支孤军，而要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性的世界大军的一部分。切不要忘记，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零星小战，而是国际阶级斗争总过程中的最大战役之一。同样明显的是，在我们德国，或迟或早，当阶级关系达到相应的成熟程度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同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冲突，到时候，那个德国无产阶级就不应该运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and 范例，而必须运用俄国无产阶级当前革命的经验。因此，同志们，你们对国际无产阶级是负有义务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它的斗争方式上，在坚决性上，在对其目标的明确认识上，以及在其策略的发展上，通盘考虑国际发展的结果，只有考虑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才能表明它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用它的行动指明，从1848年到1907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这种发展的整体观

---

<sup>①</sup> 指科伦民主协会。成立于1848年4月，是一个民主派团体，1849年4月马克思退出了该协会。——编者注

点来看，我们已经不是处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的开始阶段，而是毋宁说已经处于它的终结的开始阶段了。它应当指明，俄国革命与其说是十九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幕，还不如说它是即将到来的新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在这些革命中，历史决定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同它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要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德国无产阶级希望你们不仅要战胜专制制度，不仅要为欧洲的解放运动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而且还希望你们要扩大和加深无产阶级策略的前景：它希望能向你们学到，如何在公开的革命斗争时期登台演出。

可是，为了成功地演出它担任的角色，俄国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党的统一。不是表面上的纯粹机械的统一，而是内在的团结和内在的强大，当然它应当是实行一种符合无产阶级斗争内部统一的明智而正确的策略的结果。你们从德国党执行委员会自己的言词中，确切地说，从委托我呈交给你们的贺信中便可以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俄国党内的统一是何等迫切何等必要。这封信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全体代表转达的党执行委员会的问候（我在开始发言时已经转达了这一问候）之后接着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兴奋地密切注视着俄国兄弟反对专制制度和反对企图与专制制度分享政权的金融寡头的斗争。

尽管选举制度备受曲解破坏，但仍能在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这使我们内心充满喜悦。这个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自发的、无往而不胜的、什么也战胜不了的力量。

资产阶级在俄国象在一切其他地方一样，也企图与政府媾和。它妄图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它在俄国也极力要抢夺人民经过坚忍不拔的斗争得来的果实。因此，在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中，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继续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

要卓有成效地领导这场解放运动，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我们期望我们的俄国兄弟的代表们，通过你们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议实现我们的愿望和期待，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

本着这种愿望，我们向你们的党代表大会致以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威廉·普凡库赫<sup>①</sup>”

1907年4月30日于柏林

( 5 月 4 日 )

我和波兰代表团的代表们之所以如此关心正在探讨的问题<sup>②</sup>，并不是从党内派别斗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策略原则的立场出发的。我们党的右翼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构思，它依据的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的著名观点。而这个观点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极受尊敬的老战士和伟大的理论家曾经详尽而明确地表述过的一种既定公式为基础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中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在五十八年前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

---

① 威廉·普凡库赫（1841—1923）——1894—1923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② 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是党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中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分歧的焦点。——编者注

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sup>①</sup>”接着他谈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使命：“资产阶级置身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它给予帮助，并使它卷入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就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我们党的一翼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革命的全部策略正应该由论述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这种观点来决定。资产阶级是把人民群众拽入反对旧制度斗争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先锋队和 교육者。因此日前在俄国只有阴险的反动分子或者绝望的唐·吉珂德们才会去“妨碍”资产阶级得到政权。因此，在俄国立宪民主党人<sup>②</sup>取得政权之前，务必暂时放弃对俄国自由主义的攻击。因此无须给资产阶级革命设置障碍，因此，可能削弱或吓跑自由派的无产阶级策略是最粗鲁的失策，任何把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隔离起来的行为都是不折不扣地为反动派效劳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观点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仅在历史事实方面，而且在看待无产阶级策略基础本身的立场方面也急需加以审查。

“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可惜我不熟悉我们这位可敬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创作者的全部著作，但是就我所知，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牢牢记住，只有形而上学者才按照这种公式判断事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的说法都是鬼话。历史唯物主义特有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4页。——编者注

<sup>②</sup> 俄国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10月成立，主要由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编者注

的辩证思维要求人们不要以静止的眼光，而要以运动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现象。援引五十八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作用的描绘，把它应用到目前的实际中来，这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个突出的范例，是把宣言作者活生生的历史观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只要看看各政治党派的实质和情况，特别是看看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乃至整个西欧的自由主义的状况就足以明白，资产阶级早就已经停止发挥它曾经发挥过的政治上的革命作用了。目前，它已经普遍倒向反动派、倒向关税保护制度的政策，崇拜军国主义，与保守的护农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所有这一切表明，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去的这五十八年并非不留痕迹地悄悄逝去的。俄国自由主义自己的短命历史不也表明，从宣言的言词推导出来的公式很少能够用到它的身上吗？是不是回想一下，五年前俄国自由主义还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候人们或许还怀疑，在俄国究竟是否存在这个我们不应去“妨碍”其“得到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教育者”哩。直至1900年，自由主义对于专制制度的每一次压迫、对于暴政的每一种暴行，都是在默默地忍受着的。只是当受过社会民主党长年工作的训练、被对日战争唤醒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南俄大罢工和在群众示威中登上了政治舞台时，俄国的自由主义也才决定迈出胆怯的第一步。地方自治派会议上的臭名昭著的叙事诗，教授请愿书，律师宴会<sup>①</sup>才开始问世。随着自由主义陶醉于自己的能言善辩以及意外地给予它的自由，它才准备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是这部叙事诗的下场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记得那闻名于世的时刻：1904年11—12月，“自由的春天”突然阴沉下来，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主义不讲任何仪式，直截了当发布命令，禁止乱说，自由主义一下

---

<sup>①</sup> 自由资产阶级在宴会上，在地方自治派会议上和在请愿书中要求改革，要求资产阶级宪法。——编者注

子便噤若寒蝉了。<sup>①</sup>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自由主义只不过被专制主义踢了一下，抽了一鞭子，便即刻从它虚假的权力之巅峰跌落到绝望、无权的深渊中去了。自由主义对哥萨克的皮鞭的抽打根本没有还手，它缩成一团，不敢吭声，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窝囊相暴露无遗。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明显地停滞了几个星期，直至1月9日这一天，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走上街头，显示了谁才配充当这场革命真正的先锋队和“教育者”。一股生气蓬勃的力量代替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死尸。

俄国自由主义第二次抬头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迫使专制政权召集第一届杜马的时候。这时，自由派重新感到有了力量，又一次认为唯有他们才是解放运动的领袖，认为靠律师的演说就能达到一定的目的，认为他们是一股力量。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驱散杜马<sup>②</sup>。自由主义第二次一头栽进了无权的和无所作为的深渊。对于反动派的进攻它能以自己的力量作出的唯一的回答，就是臭名昭著的维堡号召<sup>③</sup>这个“消极抵抗”的经典文献。马克思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说过，这种消极抵抗同小牛犊对想要杀它的屠夫的抵抗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来，自由主义不得不丢掉对自己的力量、对它在当前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幻想了。在召开第一届杜马的时候，它不得不丢掉这种幻想：律师和议员们的能言善辩能象耶利哥的长喇叭一样

---

① 沙皇政府1904年12月颁布一道命令，许诺扩大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力，但强调专制统治和基本法令不可侵犯。同时，政府在一个法令中通告，将镇压任何要求改革和要求宪法的活动，并将对发起者给予法律制裁。——编者注

② 第一届国家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开始活动，同年7月8日被沙皇政府解散。——编者注

③ 为反对沙皇政府解散杜马，立宪民主党及杜马中的其它代表1906年7月22日在维堡集会，发了一个要求人民进行消极抵抗的号召，主要提出拒绝缴税和拒绝服兵役的口号。——编者注



摧毁专制制度的城墙。在驱散杜马的时候，它不得不丢掉这种幻想：无产阶级可以充当恫吓专制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当自由派用不着的时候，便把它藏在幕后，需要用来吓唬专制主义并加强他们的地位的时候，便向它招手，把它唤出前台。自由主义想必已经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他们手中的傀儡，它不准备老是给资产阶级充当炮灰。它是在这次革命中走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运动规律和逻辑登上舞台、独立于自由派运动的一支力量。打这之后，自由主义便断然另设他计，现在，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它在第二届杜马，在戈洛文<sup>①</sup>和司徒卢威的杜马，也就是在赞成预算案和招募新兵、赞成第二天就被用来驱散这届杜马的刺刀政策的杜马中的可耻退却。这就是有人建议我们要把它作为革命的阶级看待，不许我们去“妨碍”它得到政权的那个有资格“教育”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模样。这表明，僵化了的公式根本不能应用于今日的俄国。有人建议我们，无产阶级的策略要适应那个革命的、为取得政权而奋斗的自由主义，为了博得这个自由主义的欢心，这些人还准备降低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上述情况证明，这样一个革命的俄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不过是幻想中的东西，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幻影而已。这种政策是建筑在失去生命力的公式和虚构出来的情况之上的。它没有考虑到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而它却自称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然而，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同无产阶级的策略完全协调一致的吧！有人向俄国无产阶级建议，它的斗争策略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不要过早地削弱自由主义的力量，不要同它分手。但是假如说不这样便是“不策略的”策略的话，那么，恐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

---

① 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戈洛文（生于1867年）——1907年4—7月是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编者注

有活动和全部历史就应该说成是绝无仅有的、接连不断的不策略行为了。因为从拉萨尔反对“进步党”的鼓动开始一直到目前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壮大都是以牺牲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力量为代价的。德国无产阶级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挖掉自由主义的一块墙脚。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照这么说，巴黎公社也应该说是不策略行为了，因为它使得法国无产阶级非常孤立，同时还把全世界的自由资产阶级吓得要死。同样，法国无产阶级在著名的六月的日子里的行动也应该说是不策略的了，因为这时候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完全从资产阶级社会中“分离”出来了。而无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公开登台就更加不策略了，因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运动中以它过激的行为使资产阶级惊恐万状，把它推进了反动派的怀抱，并因此为督政府和对最伟大的革命进行清算作好了准备。最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确定无疑在历史上的诞生也应该说是最大的不策略了。因为这样一来便既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的“孤立地位”又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逐步衰落打下了基础。而且在这方面，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不是也表明，尽管有人把这些“不策略行为”当作恫吓我们的缘由，说什么我们因此将不自觉地充当反动派的帮凶，但是按照事物的本质，要无产阶级避免这些“不策略行为”是可能做到的吗？在形式上开辟了现代革命新阶段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登台——我指的是1905年1月9日——一下子就使无产阶级的策略同自由派的策略严格分开了，也使街头的革命斗争同走入了死胡同的诸如宴会和地方自治会议之类的自由派的运动分开了。此后，无产阶级每前进一步，每提出一个要求都导致自己在当前革命中的进一步孤立。罢工运动使它孤立于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八小时工作日使它孤立于小资产阶级，要求共和国制宪会议使它孤立于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使它孤立

于全世界。所以说，这里不存在着什么界线，也不可能划出界线来。倘若无产阶级害怕同自由主义分离，害怕挖自由主义的墙脚，那么，它就会合乎逻辑地必然要同全部无产阶级政策告辞，同它的西方的全部历史告辞，也得同日前在俄国的整个革命告辞。事情是这样：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历史上的特定阶段的特殊条件和特殊任务的东西——它在反对旧的专制统治的斗争条件下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从无产阶级诞生到它的终年一直伴随着它的历史发展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它们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靠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发展壮大的，并在成长过程中，通过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而日益接近于对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的。日前在俄国，无产阶级要改变这个策略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在迄今的革命中，阶级矛盾都是在革命冲突本身的过程中才暴露出来的。俄国当前的革命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充分成熟和完全意识到了的阶级矛盾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因而俄国无产阶级的策略无法人为地掩饰这一事实。

与这些对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的基本观点最密切相关的，从整体上说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和形式的观点、局部地说是关于议会政治的意义的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可敬的老战士在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sup>①</sup>的一次在某些方面算得上是典型的讲话中，对问题的这一面作了说明。下面这个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着这个讲话：只要能让我们用议会或者选举等等办法达到一种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得到某一种宪法，那我们就算懂得了该怎么进行就怎么去进行阶级斗争了，也就算是站到了积德国

---

<sup>①</sup> 1906年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联合）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党多年的经验形成的那种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牢固基础上了。但是只要没有议会，也就缺少了阶级斗争的最基本条件。也正是这位可敬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当前俄国现实生活中竭尽全力寻找阶级斗争哪怕是最微小的“苗头”——“苗头”是这个讲话中最喜欢用的术语——并且从议会制度和宪法的极其微小的尽管是漫画式的迹象中看见了这种苗头。这里实在有必要引用歌德的几句话：

一个家伙，苦思冥想，  
象一头野兽，在贫瘠的荒野上，  
邪恶的念头令他晕头转向，  
而周围却是美丽的绿色牧场。

这些苦思冥想的家伙觉得，一方面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也没有首创精神，缺乏力量，不懂得把握历史提供的可能性和远大前途。

据说，在俄国当前革命的高潮中不存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苗头”。无产阶级所有的政治要求，“甚至是共和国本身”——演讲者这样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真正表现，因为它们丝毫体现不了特殊的无产阶级的东西。但是这么说来——我们又重新提到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了——，我们在德国直至目前为止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阶级斗争了，因为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治斗争都是针对所谓最低纲领的那些要求的，其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的口号，例如普选权，不受限制的结社权等等。而我们仍然坚持这些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要求。然而甚至象劳动立法这一类的从形式来看是无产阶级的要求，显然丝毫也体现不了特殊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只表达了进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这么说来，承认在当前革命中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阶级斗争具有其特征的分析，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典范，而是一种人们习惯形容为“昏头昏脑”的心理状态的

表现了。这样的人确实需要对政治斗争的唯议会方式抱有十分固执的偏见才行，这样才能做到对目前俄国的阶级斗争的巨大高涨视而不见，非要摸索着和跌跌撞撞地去寻找它的微弱的“苗头”；才能做到不去理解日前革命中的所有政治口号也正因为它们已经或者正在同资产阶级脱离关系，而恰恰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不应该低估这种情况。只要它观察一下自身的情况和它最近的历史，便足以明白，阶级斗争在目前还面临着议会制度的情况下有着何等巨大的教育意义。只要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直到1905年1月是个什么样子，而它今天又是个什么样子，这便足够了。1905年1月以后，进行了半年时间的革命运动和罢工运动，它就从一小群革命分子，从一个弱小的派别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政党。社会民主党担心的已经不是难于找到阶级斗争“苗头”，而是相反，忧虑着难于把握和利用革命的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为它开拓的这个无限广阔的活动天地。在这次斗争中间寻求保护以及——象一个溺水的人死死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抓住议会制度最微小的征兆，把它当作我们在自由派胜利之后将面临的阶级斗争的唯一保证，这都意味着，不懂得革命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分裂为各种阶级。总的说来，企图使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之相适应的公式是一个拙劣的、在西欧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过的公式，并且不过是十分丰富多采的现实的一个拙劣的复制品而已。

当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片面地过高估计议会斗争，就象它同机械地理解革命和过高估计所谓的武装起义一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波兰的同志们和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的看法是不相同的。当俄国同志根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我们在波兰、在革命开始时必须立即考虑到，有人会试图使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带上些阴谋家的投机

行为和鲁莽的革命冒险主义的特征。我们一开始就声明——我认为，我们已成功地使这一观点在觉悟的波兰无产阶级队伍中彻底巩固下来——，我们认为非法地将广大的人民群众武装起来的计划同准备和蓄意组织所谓武装起义的计划完全一样，是一种空想的行为。我们一开始就声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要在技术上而是要在政治上作好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斗争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解释清楚，他们同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的直接冲突和普遍的人民起义是革命斗争的唯一结局，这种革命斗争是能够使起义获得胜利和它在继续向前发展时必然要进行的最后决战的保证。但是至于如何使发动继续下去，在技术上如何作准备，社会民主党就无能为力了。（鼓掌。普列汉诺夫喊道：“非常正确！”）坐在左边的同志们插话说：“非常正确！”不过我却担心，在我作出下面的一些结论时，他们就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了。因为我想，如果社会民主党要避免人们机械地理解革命，避免人们认为这个党要“制造”革命爆炸并规定这种发动，那么它为此就必须以双倍的力量和决心来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策略所依据的广阔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只有当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把这一路线的最后终点即为了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而进行的夺取政权的努力也向无产阶级解释清楚，才能使人们理解这条政治路线。而这又是同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相互作用的想法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是，我看，我的发言时间已过，我对于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各种观点的论述只好中断。现在我只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一般性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一下我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全部争论问题所持的态度。那些为我刚才分析过的观点进行辩护的同志们特别经常爱说的是，只有他们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名义传播所有这些原理，向俄国无产阶级推荐这种策

略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从成立以来便一直以马克思的学说为基础。在它的纲领和策略上都把自己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之一。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援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具有特别高的价值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运用马克思学说的这些方式，看到在策略上的这种变化无常和摇摆不定，听到对立宪议会制度的条件和对自由主义的胜利发出的这种忧伤的悲叹，看到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中还在绝望地寻找什么阶级斗争的“苗头”，看到当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从这一边到那一边来回摆动，时而为了“到群众中去”而寻找象工人大会这样的人为手段，时而为了“发动革命”而寻找人为的口号，看到当革命重新沸腾起来时，又没有本领去利用它，没有本领下决心去掌握它——当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时候，便想情不自禁地喊道：同志们，马克思的学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坚韧著称，但是也以锋利见长，它就象大马士革的宝剑一样精良，可你们却把它践踏得杂乱无章。

它是无产阶级这只雄鹰搏击腾空的学说，你们却把它变成了正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粪堆上寻觅着一颗珍珠的母鸡发出的无限忧愁的咯咯叫声。其实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分析和批判的因素，二是作为革命因素的工人阶级要有所作为的意志的因素。谁的行动仅仅是体现在进行分析，进行批判，谁就不是代表马克思主义，而是对这个学说进行可鄙的、腐蚀性的模仿。

你们，右翼的同志们，对所谓布尔什维克同志进行了很多埋怨，说他们的观点狭隘、不厚道和有点刻板（有人插话：“孟什维克才这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波兰的同志或多或少习惯于用他们从西欧运动中搬来的那些方式来思考问题，他们对这种特有的刚强可能要比我们更感到惊奇。但是，同志们，你们知道所有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吗？对于一个了解其他国家的党的内部情况的人来说，这些些

十分熟悉的特征，是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在面对着一个同样强大的流派而必须捍卫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原则时的典型的精神面貌。

刚强是社会民主党策略在一端非采取不可的形式，如果它的另一端是在事变的压力下就向四面八方飞溅的不定形的胶体的话。

我们在德国可以得到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外柔而内刚。策略的核心严厉而刚强，策略的形式则随和而宽容。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的阶级政策在我们那儿已经牢固地、不可动摇地确定下来，是因为这个原则已经有党的压倒多数做后盾，以致我们队伍里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的存在，甚至他们的活动，都完全不能为害于我们；相反，由于运动的规模宏大，自由讨论和有意见分歧恰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正是某些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在当时不能原谅我们，说我们在德国太不刚强，例如我们没有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德国转向法国党，我们就会发现，那儿的情况完全不同，至少在几年前还是这样。当时盖得的党<sup>①</sup>不就是因为它的刚强性格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而显得很突出吗？例如我们的朋友盖得曾经声明：从根本上来讲，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国家领袖由共和国总统路贝<sup>②</sup>还是由皇帝威廉二世来充当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个声明——他的政敌曾费尽心机加以利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法国朋友的面貌不是有着宗派主义的耿直和不宽容的一些典型特征吗？这些特征是他

---

① 指在由茹尔·盖得领导下的法国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组织上先是建立工人党，1901年同布朗基分子及其他派别联合成为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4月这个左派的党同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联合成为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编者注

② 埃米尔·路贝（1838—1929）——1899—1906年任法国总统。——编者注



们在反对形形色色模糊不清的和“广泛的”社会主义、捍卫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的多年斗争中自然而然获得的。尽管如此，我们当时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是和我们老在一起的——我们不怀疑真理的核心是在盖得一边，也不怀疑支持盖得分子全力反对他们的政敌是必要的。今天我们同样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看成是近几年俄国党的历史的自然结果。我们并且相信，这些特征不是那一种人为的手段可以消除得了的，而是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和革命政策的原则得到足够的巩固，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取得最后胜利时，才会自行消失。因此，我们正在完全自觉地作出努力，来保证这种政策的胜利，但是不采用你们特有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而是采用波兰社会民主党所理解和实行的方式，采用最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精神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方式。<sup>①</sup>

( 5 月 12 日 )

首先我必须对几点误会作出答复，这些误会是因为偶然情况造成的，我因为时间不够而不得不在我的发言中把阐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的部分几乎缩短了一半。我没有时间更加深入地阐明无产阶级同各小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同农民的关系，这种情况对于我的批评者是特别有利的。从这个事实中已经得出了多少大胆的推论啊！我只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这简直是把无产阶级和除

---

<sup>①</sup> 在发言的文本中没有记入这句话：“我们承认，在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理论中包含着一丁点儿被厚厚的一层派别货色掩盖着的真理。”（记录委员会附注）——1972年德文版编者注

了资产阶级之外的所有其他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作用等同起来。换句话说，这里指的是那个抹煞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并把它置于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左派联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所维护的“左派联盟”。

按照崩得<sup>①</sup>代表的发言，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我只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显然说明，我完全否定了农民的作用，否定了“左派联盟”，并把自己置于和布尔什维克同志的立场直接对立的地位。后来，崩得的另一位发言人在他的冷酷无情的推论中走得更远，他宣称，如果说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阶级，那全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味道。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推论是五花八门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我来说，它们都同样是毁灭性的。

事实上，人们必然感到有点吃惊的是我的批评者们的激动情绪，而这主要是由于我主要是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日前革命中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毋庸置疑，恰恰是这种关系，恰恰是这种首先关于无产阶级对其社会对手、即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确切阐明，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是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轴，围绕这个主轴便形成了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即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农民的关系等等。当我们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中没有也不可能起到解放运动的领导作用，按照它的政策的性质它是反革命的；当我们根据这一点宣布，无产阶级已经再不应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辅助部队，而要把自己看成是革命运动的先锋队，这支队伍的政策再也不是依靠其他阶级，而

---

<sup>①</sup> 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是1897年10月在维尔纳成立的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是犹太手工业者。——编者注

仅仅是从它自身的阶级使命和阶级利益出发来制定；当我们说，无产阶级不仅是资产阶级的马弁，而是已经有能力实行一条独立的政策；当我们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即觉悟的无产阶级要利用一切人民革命运动，要使运动服从它的领导和它的阶级政策。特别是关于革命的农民，谁也不会怀疑，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存在，也不会怀疑，我们在无产阶级同他们的关系的问题上绝不会默不作声。前几天由波兰的同志们，其中也有我，向党代表大会递交的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的指令已经十分明确而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我利用这个机会，至少用几句话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右翼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与对资产阶级问题的态度完全一样，是由众所周知的、现成的、事先就定好了的公式决定的，是要实际情况受这一公式的支配。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劳动农民不再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一个变种了，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并不是毫无理由地被我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么一来，农民便同小资产者完全一样，是社会的一个反动因素了，谁认为它是革命的，谁就是在美化它，谁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独立的政策置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上面所引用的论据是臭名昭著的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思想方式是按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的说法都是鬼话。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别的说法都是鬼话。农民是反革命阶级——别的说法都是鬼话。毫无疑问，上面引文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的评价，如果指的是在这个社会存在的所谓正常宁静的时期，这是正确的。不过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这个评价也带有很大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在德国，不但农村无产阶级各阶层，而且各小农阶层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民

主党，这表明，如果把农民说成是清一色的反动的的小资产者阶级，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单调死板的公式主义。就是在被当前革命带动起来的尚未分化的俄国农民群众中也存在这样一些重要阶层，它们不但是我们暂时的政治同盟军，而且是我们将来的天然同志。如果现在拒绝把这些阶层置于我们的领导和影响之下，这对革命的先锋队来说正是不能饶恕的宗派主义。

但是，首先把农民当作一个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模式机械地套在同样的农民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上，肯定是违反历史辩证法的。农民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对待他们的态度，同资产阶级的作用一样，都不是由这些阶级的主观愿望和意向决定的，而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俄国资产阶级尽管有自由主义的口头声明和成文纲领，却仍然是一个客观上的反动阶级，因为在当前的社会和历史形势中它的利益要求同专制制度作靠不住的妥协以尽快消灭革命运动。至于农民——不管它的要求是多么混乱和相互矛盾，不管它的意向有着何等模糊和五光十色的特征——，它却是当前革命中一个客观上的革命因素，因为它以最尖锐的方式把变革土地关系的问题提到了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就其性质而言已经是超越了这个社会的界限的问题。很可能，一旦革命的波涛平息，一旦土地问题终于按照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精神找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法，俄国农民的广大阶层就会变成类似巴伐利亚农民协会<sup>①</sup>那样的公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只要革命持续下去，只要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就不但是专制制度政治上的一个暗礁，而且也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在社会问题上的一个斯芬克司，因而是一种独立的革命

---

<sup>①</sup> 巴伐利亚农民协会是在1895年由巴伐利亚的各种农民协会联合而成的，它具有中小农的特征，提出土地和联邦制的要求。——编者注

酵素，它同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相互作用，就会使革命具有自发的人民运动所特有的那种洪大声势。由此也就产生出俄国农民运动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一色彩绝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人工培育和煽动出来的，而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有的农民大起义产生的。只要回想一下德国的农民战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名字就足以明白了。

但是，正因为农民运动是空想的，按其天性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它们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作用，在任何历史情况下都得服从另一个更积极更坚决的阶级的领导。在法国，革命的城市资产阶级有力地支持过农民起义，即所谓的扎克雷起义<sup>①</sup>。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不是落在进步的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落入反动的、不满现状的下层小贵族手里，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德国的历史进程的落后——只是以宗教改革这种可怜的意识形态形式来实现它的阶级解放的第一阶段的，是因为它——由于它的软弱——不但不拥护农民战争，反而在它面前吓得发抖并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就象现在既害怕无产阶级运动又害怕农民运动的俄国自由主义投入反动派的怀抱一样。显然，现在在俄国，对混乱的农民运动给予政治上的领导并对它施加影响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天然的历史使命。

如果无产阶级担心影响它的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而放弃起这种作用的话，那它就是再一次站在教条的宗派水准上，而不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即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全体受苦的群众的天然的历史的领导者。让我们想一想马

---

<sup>①</sup> 封建时期法国最大的农民起义，即所谓扎克雷（封建主对农民的贬称）起义于1358年5月爆发。起义的矛头指向贵族，没有明确的纲领。于1358年6月被镇压。——编者注

克思谈到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作为全体一无所有者的战士的那一段话吧！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吧！我当然不会认真地去答复崩得方面对我的指责和批评。事情表明，崩得在政治上的全部聪明才智可以归结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导原则：不必从任何固定的和明确的原则出发，只求利用各种形势中的好的方面。崩得的同志们不论是在对待我们党内各个派别的态度上，或者是在对待俄国革命中各个不同阶级的态度上，都是从这个政治上的小聪明出发的。在党内关系上，这个反对派所追求的实质上不是要起独立的政治中心的作用，而是要实行一种一开头就考虑到两个不同派别同时存在的政策，这个政策如果推广到俄国革命浩瀚的大海中去，就会导致极其可悲的结果。崩得的代表们所维护的这种政策在这里可以简化为德国机会主义者久已闻名的经典口号：奉行“从一种场合到另一种场合”<sup>①</sup>的政策，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奉行“从一次堕落到另一次堕落”的政策。为此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崩得的这种面目之所以重要和引人注目，与其说是因为它可以对崩得本身作出评价，毋宁说是因为崩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同孟什维克结盟并支持孟什维克而使孟什维克同志的政策倾向突出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指责我，说我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消失了的飘浮在云天上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普列汉诺夫同志已并不想表示亲切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亲切的，他在这一次可真正是恭维我了。为了能在事变的过程中判明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在每日每时的行情的深渊中匍匐摸索，而要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出发去通

---

<sup>①</sup> 即“随机应变”之意。在德文中这个短语的主要词“Fall”（场合）也可解释成“堕落”，因此卢森堡在下面用双关语来进行讽刺。——编者注

观全局。而可以用来观察俄国革命过程的观测站就是资产阶级阶级社会在国际上的发展及其所达到的成熟程度。普列汉诺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尖刻地责备我，说我为当前的革命设计了如此迷人 and 如此灿烂的前景，仿佛俄国无产阶级正面临着完全无限的胜利似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这个场合，我的批评者竟把一个和我完全相异的观点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一开始就有完全胜利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够和并允许大规模地坚决地推行它的斗争策略。相反，我认为，要一开始就稳操胜券才进行战斗的领导者是坏的领导者，那样的军队是可怜军队。相反，我打算对俄国无产阶级预言的可不是一系列有把握的胜利，我宁可相信，如果忠实于它的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适应越来越剧烈地展开的矛盾和不断扩展的革命前景，对它的斗争策略日益广泛地加以扩大，日益坚决地加以执行，那么它就可能陷入十分复杂的、充满困难的境地。还有，我甚至相信，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将证明能够胜任它的使命，也就是说，将通过它的行动把革命事变的过程一直推到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所给予的最大限度，那么在这个限度上等待着它的几乎不可避免地是一次巨大的暂时失败。然而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有勇气和决心去迎接历史的发展已经给它安排好了的一切。它在必要时，即使需要付出牺牲，也必须在这次革命中在无产阶级的世界大军面前起到揭示阶级斗争的新矛盾、新任务和新途径的先锋队作用，也就是必须起到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级曾经起过的那种作用。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制定它的策略时决不容许从胜败的估计出发，而必须完全从它的历史的阶级使命出发，要牢牢记住，无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斗争达到了革命的高潮而遭到的失败，只不过是它在向世界范围进军的全局中的一个局部和暂时的现象。这些失败是通向社会主义最后胜利

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梯。

发表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7—104、383—392、432—437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05—232页。

（王小华译 李宗禹校）



# 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 委员会上的发言\*

( 1907 年 8 月 21 日 )

我报名发言，是要代表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正是在讨论这一项议程时我们也必须想起伟大的俄国革命。当王德威尔得在大会开幕式上以其特有的口才向先烈们表示感激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向烈士们和战士们表示了敬意。但是，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当我后来听到某些人的发言，尤其是福尔马尔的发言以后，我不由得想到，如果俄国革命者鲜血淋漓的亡魂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不希罕你们的敬意，但请向我们学习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对革命的背叛。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群众罢工问题。大会作出的决议宣布，我们举行群众罢工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具备。但是阿德勒满怀信心地引证过的唯物辩证法将我们曾经宣布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立即付诸实现了。我不得不反对福尔马尔的观点，同时也令人遗憾地不得不反对倍倍尔的观点。他们两人说过，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比以往做到的更多的事情。可是俄国革命不仅产生于战争，而且也起了使战争中断的作用。要不然沙皇制度

---

\* 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一定会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历史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袖手旁观，直到它把成熟的果实送到我们手里。我是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信徒，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给马克思主义观点赋予一成不变的宿命论的形式是一种巨大危险，因为这样只能导致产生爱尔威主义<sup>①</sup>这样的过激观点。爱尔威是个冒失鬼，当然是一个天真的冒失鬼。福尔马尔说，考茨基只是在替他个人说话，但是这个责备用在福尔马尔身上要适合得多。事实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拒绝了福尔马尔的观点。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作出的决议证明，德国党是一个向历史学习的革命党。党在这个决议中宣布，它多年以来当作无政府主义举动而加以拒绝的总罢工，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使用的一种手段。但是游荡在耶拿大会上空的并不是多梅拉·纽文胡斯<sup>②</sup>的灵魂，而是俄国革命的红色幽灵。当然，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反对战争的群众罢工，而是想到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但是我们肯定不能发誓说，只有别人剥夺我们的选举权，我们才举行群众罢工。同样我们也肯定不能发誓说，我们将只是为了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群众罢工。根据福尔马尔的发言和倍倍尔的部分发言，我们认为倍倍尔决议有必要提得尖锐一些，而且我们还将提出一个已经草拟好的修正案。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在这个修正案中，有的地方我们甚至比饶勒斯和瓦扬同志走得更远。我们希望，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结束战争，而且还在于利用战争来加速整个阶级统治的崩溃。

---

① 根据古斯塔夫·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应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而不必考虑当时的历史形势。——编者注

② 在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多梅拉·纽文胡斯的领导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半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它要求无产阶级用总罢工来回答任何宣战并拒绝服兵役，在1891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这些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拒绝。——编者注

## 对奥古斯特·倍倍尔关于帝国主义政策

### 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提议<sup>①</sup>

(8月22日)

#### 1、倍倍尔决议<sup>②</sup>的第一段应补充以下说法：

“代表大会重新确认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

---

① 这一提议是罗莎·卢森堡、弗·伊·列宁和马尔托夫提出来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决议草案（见本文脚注<sup>②</sup>）根据这个提议进行了修改，并得到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标题是德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都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不仅要力求保障自己的销售市场，而且还力求夺取新的销售市场，其中奴役别的民族和掠夺别的国家起着主要的作用。

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在文明民族中不断培养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偏见，是有利于发动战争的。

所以，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引起的，只有铲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者，只有当军事技术的发展需要损失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扩充军备引起了人民的反抗，从而使他们起来消灭这个制度时，战争才会终止。

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首先提供了战斗人员，主要承担了物质损失，他们是战争的大敌，因为战争违背了他们的目标：创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实现人民团结的经济制度。

因此，大会认为所有工人，特别是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的职责是：竭尽全力反对海上和陆上的扩军备战，拒绝提供军费支出，与此同时，要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质，揭露它维持民族对立的动力。

大会认为，建立适合于所有人服役的民主防卫组织是防止进攻性战争和有利于消除民族对立的根本保证。

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威胁，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竭尽一切努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爆发，或者，倘若这样的一场战争还是爆发了，那就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1907年柏林德文版第85—86页〕。——编者注

这句话之后再写上倍倍尔决议的第一段。接着再补充如下内容：

“这些战争是军国主义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必然产物。军国主义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从经济上、政治上奴役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2、倍倍尔决议的第二段补充如下内容：

“以使无产阶级群众背离他们本身的阶级使命和国际阶级团结的义务。”

3、倍倍尔决议的第五段后面应加上：

“并且努力以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以使统治阶级不敢让他们充当巩固其阶级统治以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工具。”

4、倍倍尔决议的最后一段应采取如下措词：

“如果存在着爆发战争的威胁，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采取适当手段阻止战争爆发，这种手段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自然地加以改变和强化。如果战争还是爆发了，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并且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

发表于《国际社会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07年8月18—24日）。1907年柏林德文版第97—98、10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35—238页。

（曾广声译 李宗禹校）

# 民族问题与自治(摘录)

(1908—1909年)

## 一 民族自决权

### (一)

俄罗斯国家内的革命把民族问题作为问题之一提上了议事日程。迄今为止，在欧洲各国中，只有在奥匈帝国这件事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今天，这件事在俄国也已成为现实的问题了，因为革命事件的发展使一切阶级和政党从各自的政治实践立场和直接目的出发，面临着解决民族问题的需要。俄国境内所有新组建或正在组建的党——激进的、自由派的或反动的——都已看到了，必须立即在自己的纲领里表明在民族问题上的这样或那样的立场，这件事是和国家整个对内对外政策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工人政党而言，问题不仅涉及纲领范畴，而且还涉及阶级组织范畴。工人政党对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在方法上和原则性态度上必须区别于即使是资产阶级最激进政党的立场，也有别于假社会主义的小市民政党的立场。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科学方法之上的，它对待民族问题也不能例外。从另一方面讲，只有从原则方面把握这个问题，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解决和对待问题上的原则性一致，虽然还要考虑到

民族问题表现形式的整个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由于俄罗斯帝国社会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复杂性衍生的。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里，对于这种用于解决整个民族问题及其一切具体表现的定则，由第九条作了回答，它宣称，党力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要包括保证“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sup>①</sup>

俄国党的党纲确实还包含了涉及同一主题的另外两条非常重要的要求。这就是第七条，要求废除等级制和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公民权利一律平等；以及第八条，该条宣称，国家的居民应该有权上由国家拨款创办的、建立在学校自治基础之上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以及在集会上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还有在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中，本民族语言同国语平等相待。最后，与民族问题有关联的还有党纲第三条，对那些具有明显的特殊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提出广泛实行地方自治以及区域自治的要求。可是，当他们确认仍有必要补充列出赋予每个民族以“自决权”这一单独条目的时候，对于提出公民平等权、语言权以及区域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党纲作者来说，显然认为这些对于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够的。

在这个定则里，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这样的情况，即它既没有与社会主义也没有与工人政策形成任何特殊联系。“民族自决权”乍一看来，就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一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旧口号的意译：“各民族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在波兰，“享有自由是各民族的天赋权利”，这是从《民主协会》<sup>②</sup>到利曼诺

---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分册第38页。——编者注

② 全称为《波兰民主协会》，是波兰侨民于1832年在巴黎创建的民主主义组织，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其中包括摆脱沙俄奴役、争取波兰独立的要求。该协会积极参加了波兰1846—1848年革命运动。——编者注

夫斯基<sup>①</sup>的《警钟》、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警钟》<sup>②</sup>到（放弃独立纲领以前阶段的）反社会主义的《民族联盟》<sup>③</sup>等民粹主义分子的经典式定则。同样，关于“一切民族都有同等权利”享有自由的决议曾是名闻遐迩的、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全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唯一重大成果，那次大会被全斯拉夫人的刺刀文迪施格茨<sup>④</sup>驱散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民族自决权”原则具有完备的宽广性和展延性，它自然不仅适用于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居民，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居住在德国和奥地利、瑞士和瑞典、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可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政党的任何一个党纲里都找不到关于它的特殊表述。尤其是在一个居民高度混合的国家里活动的党的党纲里，民族问题对它说来具有首要意义，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可它的党纲却没有包含上述原则。

不是用任何形而上学的定则，不是按照各民族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看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只能凭借特定的国家一政治方案来解决奥地利党纲中的民族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是要求废除作为“王国和附属国”混合体的、延续至今的奥地利国家制度，这

---

① 波列斯拉夫·利曼诺夫斯基（1835—1935）——1892年建立的波兰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

② 《警钟》是《国家社会主义公社》在巴黎发行的机关刊，出版于1889—1893年，其主要撰稿人是利曼诺夫斯基。开始时，《警钟》尖锐地抨击波兰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妥协，谴责民族奴役，提出了波兰独立口号，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并认为共和国可沿着和平道路发展到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群众性工人运动。《警钟》在其后期逐步向右转，向资产阶级靠拢。——编者注

③ 《民族联盟》创建于1893年，是在俄、德、奥三国占领下的全部波兰地区活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其前身是1887年建立的波兰联盟。它在建立之初曾提出为波兰独立而斗争的口号，后向右转，成为波兰资产阶级政党国家民主党的御用工具。——编者注

④ 阿尔弗勒德·文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元帅，1848年镇压维也纳和布拉格的革命起义。——编者注

个混合体是由于哈布斯堡的王朝政策而在中世纪过程中形成和挤凑起来的，其中每个国家的领土上都包含了以不同方式杂处的几个不同民族。党要求把那个王国和附属国分割为具有民族性的区域、至少是民族性相近的疆域来取而代之以，然后使这些民族区域联合组成国家联盟。可是，由于几乎在整个奥地利领土之上的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穿插混居的，因此，为了在新的民族区域内保护少数民族，社会民主党的党纲里拟制订专门的法律。在评论上述方案的实践价值上允许持有不同意见。作为奥地利事务最有经验的通晓者之一和社会民主主义精神之父之一的卡尔·考茨基，在他最新的小册子《民族性和国际性》中极为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方案即便付之实施，也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民族冲突和困境。但是，它毕竟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党解脱这些困境的实践尝试，鉴于民族问题在奥地利的重要性，我们予以全文援引。

1899年在布隆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奥地利党的民族纲领宣称：

“鉴于奥地利的民族冲突阻碍着各民族的一切政治进步和文化发展，鉴于这些冲突首先渊源于我们的社会机构的落后性，特别是，鉴于延长冲突是统治阶级借以保证自己统治以及阻碍更有力地显示一切真正的人民利益的手段之一，代表大会声明：

按照平等和理智的精神最终地调整奥地利的民族问题和语言问题，首先是文化上的要求，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这只有在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制度下，王国和附属国内的一切封建特权都将被废止，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下，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元气的劳动阶级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要求；

保存和发展奥地利境内所有居民的民族特性只有在平等权利和废止一切压迫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应该反对一切国家



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同样也反对各国的封建特权。

在这种条件下，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在奥地利建立起民族和睦以替代民族争执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要确认下列指导性原则：

1. 奥地利应改组为民主的民族联盟的国家。
2. 应建立起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体来代替历史上的皇朝封地，这些自治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产生的民族院掌管。
3. 属于同一民族的所有自治区域共同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它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sup>①</sup>
4. 应由全国国会颁布特别法律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5. 我们不承认任何民族特权，因此我们摒弃国语的要求；如若需要中介性语言，则由全国国会来决定。

作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社会民主党权力机构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深信，在这些指导性原则的基础上，各族人民之间的谅解是可能的；

它庄严宣告：承认每个民族的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权利；

可是，只有彼此紧密团结，相互不陷入斤斤计较的纠纷，各族人民才能取得自己文化上的各方面进步，尤其是操各种语言的工人阶级，不论是涉及每一个别民族利益的事情上，还是涉及整体利益的事情上，在斗争中要坚强地保持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引导到紧密的、团结一致的行列中去。

在国际社会主义的行列中，俄国的工人政党是在其党纲中包

---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事务”，在党的管理局草案中的解释是这样的。——卢森堡注

含了保证“民族自决权”要求的唯一的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外，我们仅在“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中找到这个定则，在那里它是与国家联邦主义原则并存的；社会革命党政治声明的有关部分宣称：“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上，尽可能地广泛采用联邦主义原则；承认它们的无限的自决权”。

的确，上述定则与国际社会主义是有某种关联的；即它是1896年伦敦社会主义和工人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某一片断的意译。可是，导致接受这个决议的情况和决议的表述方法清楚地表明，如果说俄国党党纲中的第九条是作为采用伦敦决议而接受过来的，那末这也是出于误解。

一般说来，伦敦决议决不是由于打算或需要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作一种关于民族问题的表述引起的，也不是由代表大会提供或接受下来作为供不同国家的工人政党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定则，事情截然相反。伦敦决议是依据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即波兰社会党（PPS）提交代表大会的结论而作出的，这个结论要求承认重建独立的波兰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最迫切的需要。<sup>①</sup>在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于代表大会前所进行的批评的影响下，以及与此相关连的在社会主义报刊上<sup>②</sup>论争的影响下，此外，在俄国第一次出现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即1896年5月彼得堡纺织工业

---

① 上述结论宣称：“注意到，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只能有利于资本家和专制暴君，而同时既有损于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也有损于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鉴于通过奴役和瓜分波兰增强了自己内部力量和外部影响的俄国沙皇制度正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经常性危险，代表大会声明：波兰的独立既是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必不可少的政治要求，也是对波兰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政治要求”。——卢森堡注

② 参阅《波兰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罗·卢森堡、卡·考茨基、弗·梅林、帕尔乌斯等人论波兰问题的论文集，罗·卢森堡作序，克拉科夫1905年版。——卢森堡注

四万名工人值得纪念的罢工——的影响下，国际代表大会没有考虑就其论据和整个性质来说是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波兰提案。可是却接受了上述“伦敦决议”，它意味着以此种方式摒弃了关于重建波兰的结论：

决议宣称：“代表大会声明赞同实现一切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并对现在遭受军国主义压迫、民族压迫或其它一切压迫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表示自己的同情；代表大会号召这些国家的全体工人加入到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队伍的行列中来，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消灭国际资本主义和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决议在其内容上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普遍问题取代了仅局限于考虑波兰问题的位置，把问题从民族的基础上转移到了国际的基础上，决议摒弃了特定的、完全是具体的实际政策要求——即波兰社会党所要求的重建独立的波兰的结论——，而代之以宣布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一切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毫无疑问，上述原则并未被代表大会表述为国际工人运动似乎可以通过它来实际解决民族问题。相反，伦敦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际指示显然不是包含在上述引文的第一部分中，而只是在第二部分中，它“号召这些国家（遭受民族压迫的）的全体工人”加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行列并为实现它的原则和目标而奋斗。它明确无误地强调指出了，决议第一部分所表述的原则即民族自决权，只有唯一的实施方式，即只有通过实现国际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道路，只有达到最终目标之后，才能付之实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没有把伦敦决议理解为民族问题的实际解决，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把它列入自己的党纲。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尤其没有照此办理，对它来说，解决民族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为此，它于1899年为自己独立地制

订了我们援引过的实践性的“民族纲领”。最为典型的是，波兰社会党并没有照此办理，因为尽管它的目的在于扩散这样的说法，即伦敦决议似乎是符合社会爱国主义“精神”的定则，然而明摆着的事却是，这个决议恰恰摒弃了重建波兰的结论，至少把它冲淡为不具有实践性的、完全是泛指性的定则。<sup>①</sup>事情的实质是，新时期工人政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不在于宣布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原则，而仅仅在于制订这些实践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觉醒了的无产阶级需要和渴求这些改革，使之有助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和夺取自己的最后胜利。在这个特定的目标上制订出政治纲领的要求，以便使那些属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领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最迫切的问题，能直接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实际的和切实可行的解决；以便使这些要求作为日常政策及其需求的指导方针服务于无产阶级；以便使这些要求把工人政党的政治行动召唤和引导到相应的方面；还有，以使用这些要求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区分开来。

事情简单明了，“民族自决权”定则完全不具有这种性质。它不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日常政策，还是对民族问题的任何实际解决，都没有给予任何实践性的指导方针。例如，这个定则没有向俄国无产阶级说明，应该要求以何种方式解决波兰民族问题、芬兰问题、高加索、犹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代之以提出对所有与此有关的各“民族”赋予无限的全权，以便如何按照各民族中每个民族的爱好的来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对工人阶级的日常政策来说，从上述定则得出的唯一实际结论是这样的指导方针，即它的义务是反对民族压迫的一切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

---

<sup>①</sup> 只有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在它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期间认为，把伦敦决议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可行的。当它重新并入德国党时，波兰社会党无异议地承认了爱尔福特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卢森堡注

自决权，那末在逻辑结论上我们当然必须谴责一个民族主宰另一个民族的每一次尝试，一个民族用强力手段把这样或那样的民族生存方式强加于另一个民族。然而，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来说，抗议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义务根本不是来源于专门的“民族权”，例如，正象它要求男女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根本不是来源于专门的“妇女权”一样（资产阶级女权解放运动鼓吹者则为妇女权大声疾呼），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抗议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义务只是来源于对制度、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和对社会统治的总的反对态度，一言以蔽之，来源于社会主义根本立场本身。可是，撇开这一点不谈，替代性的指导方针对实际政策来说则纯粹具有否定的性质。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形式的义务丝毫也没有包含下列说明：在现今时期的俄国，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力求做到持什么样的态度，采用什么政治形式去解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人等民族问题；在当今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应当提出什么样的纲领去反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和假社会主义的纲领。一言以蔽之，从事物的本质来说，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定则不是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指导原则和纲领性指导原则，仅是回避这一问题的某种方式。

## （二）

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第九条空泛而呆板的性质已经表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格格不入的。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所有时代而具有同样正确性的“民族权”犹如“人权”和“公民权”之类一样，不是别的，仅是形而上学的空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已与此类“永恒”定则永远决裂了。因为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证明：“永恒的”真理是没有的，因而永恒的“权利”也是没有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里和此时是好的东西，那里

和彼时却是坏的东西，倒过来也是如此。”在某一场合下是正确的和理性的东西，在其它场合下却成了误会和荒谬。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每一次断定这些“永恒的”真理、权利和定则的现实性实质绝不是其它东西，仅是现实环境和现存历史时代的社会物质关系。

从这一立场出发，科学社会主义审查了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关于民主的动听言词和思想观念上的形而上学等全部遗产。“民主”、“公民自由”、“平等”诸如此类词藻对今天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早已不再是真理了，早已不再是高耸于云霄之上的权利了，早已不再是超越于民族和时间之上了。相反，马克思主义仅是把它作为某些特定的历史性关系的表现，永远变化之中的类型来研讨它和看待它的，这种永远的变化从它自己方面说，才是唯一的“永恒”真理。

当拿破仑抑或这一类专制君主为了达到独裁式的皇权主义目的，利用人民群众政治上的愚昧和经济上的依赖，采用全民投票这种极端的政治民主形式的时候，我们就毫不迟疑地以全部坚定性奋起反对这种“民主”。一丝一毫也不能以人民万能的尊严性来混淆视听，对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而上学者来说，这种人民万能的尊严性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了。

当德国的特森多尔夫<sup>①</sup>，沙皇的宪兵或“真正波兰的”国家民主党人保护工贼的“人身自由”、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道的义和物质的压力面前庇护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刻也毫不犹豫地宣布站在后者一边，承认他们有强制其尚未觉醒的竞争对手与自己团结一致的最充分的道义权利和历史权利，尽管从自由主义的形式逻辑观点出发，那些“自愿参加劳动者”方面无疑拥有“个人自由”的

---

<sup>①</sup> 海尔曼·特森多尔夫（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1885年任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权利，他们似乎按理智行事，而相对来说则是非理智驱使他们。

当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终于以“公民平等”的名义，要求与资本进行斗争的雇佣劳动者完全听凭命运摆布的时候，我们要揭露这种形而上学的欺人之谈，在它背后隐藏着最明显不过的经济不平等，我们还直截了当地要求对雇佣劳动者阶级予以国家法律的保护，而这却是对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显破坏。

在现代社会主义以此种方式审慎考察的一切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中，民族问题不应成为例外，凭借某个空泛的模式来解决它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民族自决权”对他们来说是发出如此美妙音响的定则。因为这样的定则，要么根本没有表达出什么，是空洞无物和对什么也没有约束力的空话，要么表现为要社会主义者支持民族一切要求的绝对义务，而这样做的时候是十足的谬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出发，社会主义者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首先取决于每个已知场合下的具体情况，而这在不同的国家是迥然相异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里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对事实浮光掠影的了解就足以使人确认，巴尔干土耳其国家内部的民族斗争问题与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问题相比较，具有全然不同的格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不等同的国际重要性，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构成奥地利的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纠葛与影响到形成波兰问题的这些条件是大相径庭的。同样，在每个国家里的民族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性质，随之而来的也必须变更对它的评价。自从科希秋什科战争<sup>①</sup>以来我们数达三次的民族运动，要么在持有贵族-天主教意

---

<sup>①</sup> 指在波兰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科希秋什科（1746—1871）领导下进行的1794年波兰民族起义事件。1794年3月，波兰人民发动了大规模抗俄武装起义，与入侵的俄、普军血战数月，同年11月，起义以失败告终。——编者注

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者眼里，如苏伊斯基<sup>①</sup>之流，才会相信波兰负有充当“各民族的基督”的历史使命；要么在如今的社会爱国主义“流派”不学无术者眼里，才会故技重演，说成是三次定型化重版的“被奴役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谁是使用手术刀透过外表较深入地剖析我们三次民族运动的研究者，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他就会观察到隐藏在它下面的是三次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只是由于外部情势才使每次运动都具有与入侵者斗争的雷同形式。用一个和同样的标准——“被奴役民族”的神圣权利——来衡量科希秋什科战争，还是十一月起义以及一月起义，这恰恰是缺少任何鉴别，是完全缺乏历史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表现。

历史条件的演变怎样影响到社会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评价和立场，作为显而易见的例证，可以举出所谓东方问题来。从1855年克里木战争期间起，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欧洲的同情是在土耳其一边并反对南方斯拉夫人的解放要求的。一切民族享有自由“权”并未妨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对巴尔干斯拉夫人持敌对态度并坚决地支持土耳其保持其完整性的事业。因为他们不是从某种“永恒的”令人神往的自由主义定则的观点出发，而仅是依据他们当时的观察，从构成那些民族运动内容的实质性关系的观点出发，来评价当时土耳其内部斯拉夫种族的民族运动的。觉察到巴尔干斯拉夫人的解放要求具有社会落后性，仅仅是俄国沙皇政府的阴谋诡计，其目的在于分裂土耳其，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犹豫地使斯拉夫人的民族自由事业服从于欧洲民主的利益，作为抵御俄国反动派的防卫墙，坚持要求保持土耳其的完整性。在德国社

---

<sup>①</sup> 约·苏伊斯基（1835—1883）——波兰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早年参加1863年波兰抗俄民族起义，后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曾任加里西亚地区议员、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教授。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具有保守性，相信宿命论和天命观。——编者注



会民主党中，作为传统的这一政策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中期，当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开展斗争之际，年迈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仍按照这种精神发表意见。可是，正是在此期间，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径直转变到了相反的方向。社会民主党开始公开支持土耳其境内被压迫民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取得文化存在条件的要求，摒弃了虚假地保持土耳其完整性的一切关注。引导党如此行事的，决不是出于对亚美尼亚人或马其顿人作为被奴役民族的责任感本身，而首先仅仅基于对上世纪中叶以来东方实质性关系结构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的途径得出如下信念：土耳其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它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的结果，过份地维护临时性的土耳其符合俄国专制主义反动外交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在此情况下，如同在一切其它问题上一样，不是站在违反客观发展方向的方面，而是顺应它，并利用其后果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通过既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运动，同样也通过支持土耳其本身从内部推行复兴和革新的一切意图，而不问达此目的的社会基础是多么薄弱。

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捷克与波兰民族愿望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这方面提供了第二个例证。无疑，从“民族自决权”观点来看，捷克人要求从欧洲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方面取得支持的吁请可能不会比波兰人更少些。须知马克思对这个抽象的定则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而对捷克人连同他们的解放要求大发雷霆，认为它对革命形势造成了有害的困境，更有甚者，他们受到了严厉责备，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捷克人是消亡中的民族并很快就会消灭。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宣布这些观点的同一时间内，他们呼吁一切进步和革命力量援助我们的爱国者，倾其全力保卫波兰人的民族运动。

在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刻，马克思研讨民族问题时运用了何等

清醒的现实主义，排除了一切伤感主义，这正好表明了他是用何种方式对待波兰问题、对待捷克问题的。

马克思在1851年和1852年刊载于美国《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组论文中写道：“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的，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以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为界的国家。当然，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么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末，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他们同情心的真实性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证明它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应不应该把一批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它呢？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在东方得到了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其实，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sup>①</sup>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sup>②</sup>一样重要的。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便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令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却很清楚地看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

---

① 拉脱维亚称作：叶尔加瓦。——编者注

② 波兰称作：格但斯克和埃尔布隆克。——编者注

宣布普属波兰（波兰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马克思用不少于此的政治现实主义对待捷克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也引起了一场斗争。在这个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是差不多完全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的。但自从十五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说捷克语的地区被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一部分形成了莫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做出了很大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的人数也几乎相等，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事业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第一名卫士帕拉茨基<sup>②</sup>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在说捷克语时还有错误并且带有外国腔调。但是就象常有的情形那样，最近四百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捷克民族是个垂死的民族，1848年它曾做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足以证明（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sup>③</sup>

---

①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3页。第二次的着重点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②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著名捷克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编者注

③ 同注①第544—545页。——编者注

我们援引上述片断是为了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民族问题的，这是没有把任何抽象定则计算进去的方法，而仅仅着眼于每一单独场合下的现实关系。当然，这一方法绝没有使他们避免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和在这一或那一情况下采取错误立场。事物的现今情势证明，六十年前马克思预测捷克民族灭亡是多么大的失误，捷克民族的生命力在现今的奥地利愈来愈强烈地显示出来了；与此相反，他过高地估计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国际意义，由于当时波兰本身的内部发展，波兰民族主义注定要趋于没落，而且这种没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历史的失误丝毫也没有降低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本身的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能够预先避免被错误应用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本人从未有过不犯错误的奢望，也不会说出与他的学说的精神如此矛盾的话，譬如说什么是终极的永不失误的历史性预言。马克思在他对待这些或那些民族运动的立场上可能失误。本书作者早在1896年和1897年就力图指出。在波兰问题上，如同在东方问题上一样，马克思的观点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但是，无论是在土耳其和南方斯拉夫人问题上，还是在对待捷克人和波兰人的民族运动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往昔的立场令人信服地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用一个模式、根据某一钦定的公式来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离得多么地远，其次，当论及亲眼目睹的、现实的欧洲发展事件时，他们受形而上学的民族“权”的限制是多么地少。

最后，近代社会主义政策创始人对已成为纯粹是历史陈迹的，即摆脱了一切展望和政治热情影响的十四世纪海尔凡特人解放运动的评价，提供了他们对待民族问题的更为明显的例证。瑞士旧州居民反对哈布斯堡专制主义血腥压迫的那次起义，以泰尔的历史传说面貌出现的、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想无法割爱赞美对象的起义，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7年以如下方式作

了评论：

“是瑞士旧州的居民。反对奥地利的战斗，格留特利的光荣宣誓、泰尔的英勇射击、永远值得纪念的莫尔加顿城下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顽固的牧民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对抗，是顽固保守的地方利益对全民族利益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牧民战胜了当时的文明，因此他们受到了与后来的文明完全隔绝的惩罚。”<sup>①</sup>对于这一评论，考茨基从自己方面补充了如下评注：“至于涉及到哈布斯堡君主们在十四世纪于瑞士所执行的文明使命，极可打上疑问号。然而，这是正确的；即保持瑞士旧州人的独立性却是极度保守的现象，而丝毫不是革命的现象，从后果上说，这些瑞士旧州人的自由作为工具，服务于在欧洲中心地带保持最黑暗的反动的策源地。就是这些旧州偕同其军队，在1531年把卡佩尔·兹维恩格吕城抢劫一空并以此种方式筑起了反对在瑞士推广新教的堤坝。就是它们向欧洲所有的暴君们提供军队，旧州的瑞士人曾是路易十六最忠诚的保卫者，由于他们反对革命，共和国在卢浮宫为他们竖起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物。”

从“民族自决权”立场出发，海尔凡特人的起义在一切角度上都理应博得社会主义者的好感。在此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怀疑，即从哈布斯堡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追求是“民族”即它的绝大多数人的实质性意愿的表现；此外，海尔凡特人的民族运动具有纯粹的抵抗的性质。它根本没有掺杂奴役其它民族的任何倾向，仅仅引向摆脱货真价实的外来压迫和纯粹的王朝入侵；最后，这一民族运动具有民主主义的一切外部特征，在人民共和的口号下奋起反对专制政府。

与这个运动截然相反的是1848年匈牙利人的民族起义。预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7页——编者注

溯匈牙利人获胜的历史后果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从这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来说，那将是保证居于少数地位的马扎尔人凌驾于多数混居的外来被征服民族之上的绝对统治。列举争取民族独立的这两场斗争——1848年匈牙利人的斗争和前此五百年海尔凡特人的斗争——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场斗争的矛头所向都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即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的。在这相同的背景下，通过这样的列举，更便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政策上的方法本身和观点角度本身辨别出来。不论瑞士的运动具有革命性的一切外部特征，也不论马扎尔人的运动具有不容置疑的双刃的性质，匈牙利革命者怎样帮助维也纳政府去镇压意大利革命而明显地表现得过份奴颜婢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却锋芒毕露地批评了海尔凡特人起义，把它视为反动的表征，而当1848年匈牙利起义时，他们却热烈地支持它。因此，在这两种场合下，指引他们的根本不是“民族自决权”定则，这一定则为海尔凡特人效劳的程度当然远远超越于马扎尔人之上，指引他们的仅是从历史的和政治的立场对运动的具体分析。瑞士旧州农民在十四世纪反对哈布斯堡中央集权政权的分裂性起义及其分立主义，在恩格斯眼里，是历史的反动的表征，正如按同一标准来看，集中式的，趋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权在当时是历史进步的因素。我们顺便指出，出于相似的立场，拉萨尔认为十六世纪反对形成中的王权的农民战争以及与此平行的骑士小贵族骚乱是反动的表征。然而，在184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本身已经是中世纪反动的遗踪了，匈牙利起义的锋芒正是指向它，这次起义作为德国内部革命的天然盟友理所当然地被承认为历史进步的因素。

### (三)

可是，持此种立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际上绝非出于党派利己主义抑或阶级利己主义，也决不是把一切民族奉献给西欧民主的需要和前途，正象有人可能这样感觉的一样。

的确，当社会主义者宣称给予所有现存的被压迫民族以普遍的和全世界性的自由特赦的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颇为激昂慷慨，也非常迎合青年“知识分子”丰富的想象力。可是，凭借某人大笔一挥，赠予一切民族、国家、集团和所有人间傀儡以自由权、平等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幸福，正是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时代，恰恰最能标志无政府主义空话连篇的英雄气概。

现代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决不陶醉于尽可能激进地和慷慨地陈词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首先仅仅在于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条件。

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用自己纲领性解决的“崇高性”来标榜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党经常超越于崇高性，不受制于科学的“教义”，而教义则为此在口袋里永远塞满了赠予一切人的最美好的礼物。例如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农业问题上把社会民主党远远抛在自己的后面，它在自己的对农民的条例上简直是执行立即把社会主义局部地引入农村的方案，而不是乏味地等待工业生产领域内此种转变的条件。与此类政党相较，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是桎齐的党，犹如马克思当年与自由自在的和崇高的巴枯宁相较是桎齐人一样，就好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真正的”，即“哲学的”社会主义代表们相较是桎齐人一样。可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的此种崇高性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桎齐性的奥秘在于，无政府主义类型的革命者“按照意愿来估计力量，而不是按照力量来估计意愿”，只是一味依据其投机性

来估量自己的意图，当其良知认为这些东西对于拯救人类是“美好的”和“必需的”的时候，就投机于乌托邦的荒原，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则使其意愿完全树立于历史的土壤之上，因此，它考虑到历史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它没有这样的奢望：口袋里装着缀补历史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窟窿的布片。

实质上，假如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即使立即承认了一切民族的独立权，那也毫无疑问，各民族实际的命运并不会由此而得到些微改变。民族的自由“权”，如同工人的经济独立“权”一样在现存社会条件下，其本身价值的多寡犹似每个人想在金盘里吃饭的那个“权利”一样，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及此事时写道，他随时准备卖掉它来换取一个卢布。在四十年代，宣布“劳动权”曾是当时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心目中偏爱的要求，该权具有以立竿见影的和激进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可是，该“权”经过短暂试验后在1848年革命中以骇人听闻的惨败告终。假如名扬遐迩的“国民工场”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组合，这种惨败仍是无可避免的。正如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所做的那样，对现今经济真实关系进行分析，必然会得出如下信念：即令能迫使当今政府宣布普遍的“劳动权”，那也只能是动听的空话，在一旁等候的工业后备军的任何普遍一员也不会从这个劳动权中那怕是熬出一杯羹汤来给予自己的饥肠辘辘的孩子们。

今天，社会民主党懂得了，只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废除那一刻起，“劳动权”才不再是空洞的声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经常性的失业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不是在现存制度基础上宣布或要求宣布这个臆造的“权利”，社会民主党恰恰是要求通过阶级斗争的道路废除制度本身，同时指出，工会组织、失业保险等等仅是临时性辅助措施。



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恢复和保证所有民族、种族和部族“自决”的可能性来解决一切民族问题的希望是十足的乌托邦。并非从政治力量、阶级力量外部结构的观点上说它是乌托邦，虽说这种力量结构使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中许多要求注定无法在事实上付之实施。譬如，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颇有份量的呼声以自信的口气宣称，由于统治阶级社会反动的日益强化、一般社会改革的停滞不前、强大的企业主协会的建立等等，通过法律途径普遍推行八小时劳动日的要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没有实现前景的。尽管如此，谁也没有断然声称八小时劳动日是乌托邦，因为它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渐进性发展。可是，说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一切人种集团或某些“民族”事实上“自决”的可能性是乌托邦，正是考虑到现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无需把视线返转到更久远的过去时代，在近代国家历史的黎明时光，各民族经常被抛置于这一边或那一边，联合了，融合了，分裂了，一个蹂躏另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作为这个长期的、充满了政治转折和人种演变结果的所有较古老国家，从民族观点上说，绝无例外地都是历史上混血的产物。此类转折的到处可见的历史例证就是那为数众多的残存人种，在每个现今国家里的这些残存人种证明了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全体群众遭受蹂躏的历程。当年马克思甚至断言，今天召唤这些残存民族就会成为反革命的支柱，如果革命或世界性战争的巨大风暴不把他们与大地面貌一起彻底改变的话。他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一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

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在苏格兰，盖尔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640年至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柱。

在法国，布列塔尼人就是这样，他们是1792年至1800年波旁王朝的支柱。

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唐·卡洛斯的支柱。

在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南方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这只是残存的民族，只是一千年来极度混乱的发展的产物。”<sup>①</sup>在关于对待所有斯拉夫民族独立意向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其它文章中，马克思写道：“……在欧洲几个大君主国一般地说已经成了‘历史的必要性’的时代，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预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但是现在，由于工业、贸易和交通的长足进展，政治上的集中成了比当时即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更加迫切的要求。凡是还能集中的一切，都正在集中。”<sup>②</sup>我们早已放弃了马克思当时对待南方斯拉夫人的观点，可是，一般的事实是，历史的进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趋向于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生存，恰恰是向相反方向发展，这在今天也是为大家有力地公认的，如同当年《新莱茵报》时期一样。卡尔·考茨基在他的最新论著《民族性和国际性》中，对民族的历史命运描绘了如下的简略轮廓：

“我们知道，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最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种交往，必然会在同等程度上扩大使用这同一语言的圈子。由此产生了个别民族扩展的趋势，吞噬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

---

<sup>①</sup>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2—203页。——编者注

<sup>②</sup>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3页。——编者注

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并接受了占优势民族或混血族的外来语”。

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同时形成了三支巨大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和佛教的。

“这些文化共同体中的每一个都包罗了最为纷繁的语言和民族。每个共同体内部占优势部分的文化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国际性的。然而整个世界的沟通仍在继续进行。它愈来愈扩展并到处建立起雷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什么地方较长时间内存在着较多数量民族之间交通和文化的紧密共同体，那里一个或几个民族就通过经济、军事、科学或艺术的优越性而获得优势。他们的语言就成为这个国际性文化共同体中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的了。他们的文化——经济、艺术、文学——把特性赋予整个文明圈。古代历史濒临终结时，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地中海流域就担当过此类角色，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基督教世界（其中当然包括了犹太人以及无神论者），德语、英语和法语成了世界通用语……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将把俄语作为第四语言增添到前三种语言之列。但是，同样也是可能的，它们中的一种，即英语，将成为唯一的通用语……在商人和有教养的人们建立世界通用语的图景中，正在出现各民族结合为国际文化共同体。此种联系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紧密，纯粹民族文化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少的可能性。因此，当经常只限于谈论民族文化并把向人民群众提供民族文化列为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非常令人感到惊异……当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人民群众以文化教育时，也应使其有可能掌握几种语言，几种世界通用性的语言，使之参加到整个国际性的文明中去，而不只局限于参加到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一个单独的文化中去。当我们走得这样远的时候，以至我们文明国家的人民群众除了掌握本民族语言以外还掌握一种或几种世界通用语，那时首先将为较小民族的语言逐步退让和

彻底消亡提供基础，最终使整个文明人类联合为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如同在东地中海流域居民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后统一在希腊文明、西地中海流域居民稍后融合为罗曼民族一样。”

“我们的文明圈范围内语言的多样性阻碍了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是他们文明进步的障碍。然而，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这个障碍，并需经过长期努力，首先要完全成功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如此高度的培训，以便取得显著成效。要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必须认清：我们的国际主义并非民族主义的独特类型，它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仅仅在于，它不象那边那样地表现得充满敌意，而是如同要求赋予本民族以权利一样，留归每个民族以同样的权利，<sup>①</sup>此外，承认每个民族充分的自主权 这种观点就是把无政府主义看待个人的立场照搬到民族上，是与出现于当代文明民族之间紧密的文化共同体不相适应的。从经济和文明的观点上说，它实际上最终地创立了一个唯一的社会机体，其富裕安乐凭倚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协作，而这只有通过使所有组成部分服从于整体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际不是各个自主民族的混合体，任凭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只要不侵害其它民族的平等权利就行了，一个有机体，只有当它更良好地运转时，它的各部分才更易于协调联合并按照共同的计划认识一致地行动。”<sup>②</sup>

考茨基所描绘的历史图式就是如此。他较之马克思，确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考察事物，把着重点主要放在文化方面，和平发展方面，而马克思则强调其政治方面，使用外部武力和征服方面。可是，他们两人描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命运时，不是把它看作趋向于分离和独立，而只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就我们所知道的多少而言，在较近时期的社会主义著作中，考茨基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表

---

<sup>①</sup> 此处和以后的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sup>②</sup> 卡·考茨基：《民族性与国际性》第12—17页。——卢森堡注

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说来，历史的趋势是径直地趋向于消除民族特性和文明人类融合为一个民族。

确实，这位理论家感觉到，在目前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现象表面上似乎与此相矛盾：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加强以及民族国家的需求，民族国家是“适应于近代关系的最好的国家形式，在此形式下，它最易于完成自己的任务。”<sup>①</sup>

可是，这个“最好的”民族国家不仅仅被赋予易于发展的抽象概念，并在理论上易于捍卫，可是名不符实。朝着人类文明共同体方向行进的历史发展，就象整个社会发展一样，从本质上说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但是，关系到国际文明协调增长的这个矛盾是在另一方向上，而不是在考茨基所探求的方向上，不是倾向于“民族国家”的理想，而是在那里，即马克思所指出的地方：在各民族之间残杀的斗争之中，在趋向于建立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庞大的文明圈除外并与此相反）。

作为新时期特征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而获得了愈来愈多优势的巨大国家的发展，早就已经注定了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的全体群众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地位。少数最强大的民族，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捍卫者，拥有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进行“自决”，而靠近它们的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的独立生存却愈来愈成为幻想。今天，恢复一切民族，那怕是大多数被征服民族的独立生存仅仅有这么些可能，也就是要看资本主义时期小国的生存将有多少可能性以及前景如何。与此同时，即在欧洲存在着的那些政治上独立自主、形式上享有平等权利的小国，在为资本主义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按大国的标准来说仅具有起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它们在欧洲的

---

<sup>①</sup> 卡·考茨基：《民族性与国际性》第23页。——卢森堡注

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统计数字上的角色，而最经常的却是充当替罪羊的角色。难道可以严肃认真地谈论形式上独立的门的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的“自决”吗？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瑞士人，他们的独立本身就是政治斗争和“欧洲音乐会”外交伎俩的产物。从这个方面紧紧抓住保证所有“民族”自决可能性的观念不放，至少等于在前景上从大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返回到中世纪的小国，这将是远远倒退到十五和十六世纪以前。

近代发展的第二个根本特征，即资本帝国主义，从另一方面注定了这一想法是乌托邦幻想。英国和荷兰的实例表明，在某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完全可能越过“民族国家”的过渡阶段并一下子在工场时期建立起殖民国家。追随英国和荷兰的榜样（它们在十七世纪初就开始掠夺殖民地），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愈来愈多的新的国家和民族、整个整个的大陆独立状态的无止境的毁灭，就是这一趋势的结果。

资本主义时期世界贸易发展的本身就招致了所有较古老社会不可避免的，尽管有时是缓慢的毁灭，历史地损毁了它们现存的“自决”方式，使之从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政策的破坏性变迁。恐怕只有完全昏愦的形式主义者才会断言：例如中华民族（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居民是一个或几个民族）今天能在事实上“自决”。在世界贸易的破坏性活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直截了当的瓜分或者使殖民地国家处于不同程度和广泛形式的政治从属地位。如果社会民主党竭尽全力从根本上反对殖民政策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施加全部压力力图阻止它的新进展，那末，党同时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殖民政策发展的本身，如同它的产生一样，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中；它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进展而进展，只有那些无害的资产阶级“和平”使者才会相信现今的国家有从这条道路上折回来的可能性。从此种发展及其必要性的观点

来看，在国际市场上为生存而斗争呈现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对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世界政策和殖民地的拥有“在当代条件下最适合于自己的使命”的，即最适合于资本主义剥削需要的，不是象考茨基所估计的那样的“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侵略国家。从比较各个接近于这一似是而非的理想的不同程度而言，例如，最适合于这一使命的不是法兰西国家，至少它在自己的欧洲部分的民族成分上总的说来是单一的。西班牙则更少适合于这一使命，它被剥夺了殖民地，几乎完全从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返回到“民族”国家。最适合于这一使命的，只有那些既在欧洲，也在全世界一切地方都奠基于民族奴役之上的不列颠国家、德意志国家、北美合众国，它们把压迫黑肤色居民和被征服的亚洲居民象溃烂化脓的伤口一样包藏在自己的肌体里。

在被征服民族的名单上，帝国主义趋势究竟以什么样的数字显示出来的呢，可以从以下小型表格中看出：

列举当前属于下列国家殖民地的被征服居民：

	不列颠	法国	德国	荷兰	
在亚洲	361,445,000	18,073,000	120,000	37,734,000	
非洲	40,028,000	31,500,000	11,447,000	—	
美洲	7,557,300	428,819	—	142,000	
澳洲	5,811,000	89,000	448,000	—	
	比利时	丹麦	西班牙	葡萄牙	美国
在亚洲	—	—	—	810,000	7,635,426
非洲	19,000,000	—	291,000	6,460,000	—
美洲	—	42,422	—	—	953,243
澳洲	—	—	—	—	13,000

上列巨大数字包括了近五亿居民，还应该用整个庞大的处于那种地位的国家来扩大这个数字，它们不作为殖民地出现，而事实上完全从属于欧洲国家，然后才能把这些数字的居民划分为不计

其数的民族和人种集团，以便意识到资本帝国主义迄今为止的活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和他们“自决”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这个历史进程必然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与殖民地国家经济独立趋势并接着与其政治独立趋势的矛盾。十八世纪末北美合众国脱离英国的历史，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南美国家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澳大利亚从英国那里获得自治的历史，都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然而，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评论即刻就会明白，它们都发端于相异的条件。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直到十九世纪一直是初始型殖民政策的牺牲品，这一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剥削，不如说为了欧洲国家的国库而掠夺别国和它的自然财富。这里要说的是，具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一切条件的整个大陆，它的发展也必须为摘除政治从属地位的腐朽枷锁而开拓自己的道路。如果说，此类资本主义压迫的力量在从属于英国的北美表现得较为强烈的话，那末，在迄今为止农业占优势的南美，受到来自经济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方面的阻力则远为薄弱得多。当然，在所有的殖民地中，自然条件如此特殊富饶并未形成常规。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当代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从属性远较往昔年代为少。可是，首先要说的是，北美殖民地获得独立并未在它那里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的从属性，只是把它转移到了其它民族身上，只是改变了角色。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英国王权标志下大打出手的分子并非外来民族，仅是英国移民本身，他们在红肤色的土著居民的废墟和尸骨上在北美洲定居了下来（这最适用于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英国人在那里占居民的百分之九十），他们是今天实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强有力的策源地之一。巴西、阿根廷和其它过去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这里占优势的居民是移民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之所以从欧洲国家那里争取到独立地位，首先是为了自由自在地从事黑



奴贸易并在种植园里剥削他们，还在所有殖民统治较为薄弱的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在同一图景中，最为相似的是印度方面的种种关系，最近在那里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相当严重的“民族”运动。在印度，本身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民族，它们处于社会和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相互从属关系，这对于用“民族权”的简陋标准来过份匆促地评价印度的运动理应引以为戒。

因此，这种表面上的例外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只能证实一个结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与一切民族实际上的独立协调统一起来。

说真的，可以把问题理解得更为简单明了些，在总的方面把殖民侵略问题与民族问题区分开来。这是一种经常被“民族权”捍卫者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的观点，它也同样适用于对殖民政策采取如下立场的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德华·大卫或荷兰党内的万·科尔，他们认为殖民侵略总的说来是欧洲居民传播文明使命的表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不可或缺的。此种立场可以简明地表现为路德维希·白尔尼名言中对费希特哲学原理的“欧洲式”运用：我是我，除了我，就是食品。如果仅仅承认欧洲居民才是真正的民族，而殖民地居民则是“食品”，那么在此情况下，在欧洲可以把法国、丹麦或意大利一类国家计入此类，说成是“民族国家”，那时候也只能因为仲裁民族问题而导致欧洲内部的困境。可是，在此情况下，“民族自决权”却成了统治种族的理论，并明显地暴露出其真正来源出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欧洲式的”痴呆症。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解里，这一权利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必须具有全世界的适用性，认清这一点就足以指明，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这“权利”的希望是乌托邦，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陷入直接的矛盾，而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存在，因此把所有现存国家整个恢复到分裂

为各个民族体并把它们分割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小国的形式是毫无希望的举动，是历史反动的举动。<sup>①</sup>

#### (四)

“民族权”定则作为社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依据是不充分的，这不仅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每一已知场合下历史条件（地点和时间）的整个差异性，也没有顾及世界性关系的一般发展方向，而且也因为它完全忽视了近代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阶级社会的理论。

在谈论“民族自决权”时，我们是把“民族”的概念放宽到作为整体、作为和谐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群体来看待的。然而，正是关于“民族”的这种概念是属于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范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对它予以彻底的审查，指出它在此种晦暗难明的外衣遮蔽下，如同关于“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概念一样，每一场合下都包涵着特定的历史内容。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一政治上和谐一致整体的民族并不存在，在每个民族中却存在着利益和“权利”冲突的阶级。简直

---

<sup>①</sup> 在持有民族权及其学究式定义的形式主义者头脑中，这一发展反映在“民族观念的蜕化”之中：

“第二股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在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民族的意向：它们要取得凌驾于其它民族之上的高超地位和优势。一方面，这种意向表现为颂扬过去历史上的贡献或民族性格、“精神”的现今特征，或者干脆寄某种朦胧的希望于未来发挥文化上的作用，自以为对这个或那个民族执行某种使命已宿命地降临于该民族。此类意向当前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别称。另一方面，这种意向导致了执行扩张该民族疆域的政策，通过掠夺各个外国和扩大殖民地拥有的途径，即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来巩固其世界性地位。此类运动成为民族意识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面对与民族意识始初涵义的矛盾以及面对使文明降级的不幸后果，仿佛没有从中觉察到这一意识的蜕化，然后是这一意识的死亡。显而易见，民族的世纪已告终结。必须等待一个染上新思潮色彩的新世纪的到来。”载：B·M·乌斯季诺夫《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哈尔科夫1906年版。——卢森堡注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领域，从最厚实的物质关系到最微妙的道德关系，有产阶级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会对它采取一个立场、相同的立场，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民族”整体出现。在经济关系范畴内，资产阶级在每一步上都代表着剥削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劳动的利益。在法制关系范畴内，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是私有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从私有制统治下解放无私产者。在司法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代表着阶级的“正义”，脑满肠肥者和统治者的正义，而无产阶级则捍卫归个人名下的社会收入要照顾的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资产阶级代表了战争和侵略政策，而在目前阶段则是关税体系和贸易，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普遍和平和自由贸易的政策。在社会科学和哲学范畴内，资产阶级诸学派与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学派处于明显的对立冲突之中；有产阶级和他们的世界观代表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神秘主义、折衷主义，而近代无产阶级则有自己的学派——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在所谓全人类关系的领域里，在美学、艺术观、教育观——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世界观和理想为一方，以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为另一方，呈现出两个营垒，沟深堑阔相互隔绝。即使在那些地方，即无产阶级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或其先进部分，在他们形式上的愿望和利害关系乍一看来似乎一致或吻合的地方，例如在民主愿望上，在形式和口号一致性的背后，掩藏着内容和实质性政策方面截然相反的意见分歧。

在此种结构的社会里，关于集体和个人的意愿，关于“民族”的自决，是根本谈不上的。如果在近代社会的历史上找到“民族”运动和争取“民族利益”的斗争，那它通常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和阶级运动，在此种场合下，与其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代表了其它居民阶层的利益，不如说它在“民族利益”的姿态下捍卫历史发展的进步形态，不如说在资产阶级所引导的“民族”中劳动阶级还没有从群

众中分化出来，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觉醒了的政治阶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法国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有权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出现在大革命中，甚至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尽管《共产党宣言》和在一定程度上《新莱茵报》已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独特的阶级政策的前哨阵地。在以上两种场合下，不意味着其它任何东西，只说明这样的事实，即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事业在当时社会发展阶段上，同时也曾是整个人民阶层的事业，而对着居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这个阶层仍然和资产阶级一道成为政治上一致的群体。

这种状况业已表明，“民族权”运用已不能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立场的标准。存在着这样的党本身就是证据，说明资产阶级已不再是整个人民群众的代表，说明无产阶级已不再藏匿在资产阶级的衣襟后面，而是作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愿的独立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离了出来。因为关于“民族”，关于“权利”和“民族意志”的概念作为统一的整体，正如我们已谈过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成熟的和未觉醒的对抗时期的残留物，因此，由阶级上已觉醒的和独立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来使用这个概念，将是令人惊诧的矛盾——不是关系到学究式逻辑的矛盾，而是历史的矛盾。

面对现今社会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政党首先必须估量到阶级对立。捷克民族问题对年青的小市民阶级来说具有一副模样，而对捷克无产者来说则又是另一副模样，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同时适用于地主科希切夫斯基及其在米洛斯拉维亚的雇工、华沙和罗兹的资产阶级以及觉醒了的波兰工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犹太问题反映在犹太资产阶级的头脑里是一番情景，在革命的犹太无产阶级的意识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民族问题，如同其它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对社会民主党来说首先是阶级利

益问题。

从奥秘的、伤感的社会主义观点来看（例如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曾喧嚣一时的、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和莫泽斯·赫斯所代表的观点，而在波兰，相应地代表此种观点的出版物在四十年代以后则是利曼诺夫斯基流派（参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波兰人民》和末期的《警钟》），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追求一切美好的和善良的事物。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例如利曼诺夫斯基先生以及后来的波兰社会党领袖，把波兰社会主义和重建波兰黏合在一块，借助于观察，认为社会主义无疑是美好的思想，而爱国主义——也是毫不逊色的美好思想，由此认为“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如此美好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呢”。

蕴藏在这种多伤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唯一健康的内核就是下述正确思想的乌托邦式模拟作：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意愿的最终目标，通过废除阶级统治，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上实现整个人类最高理想方面，在阶级社会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了保证。

上面援引过的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涵义正是这样的，所宣布的原则的根本意义正是这样的。正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民族自决权”才不再是空泛的议论，“劳动权”才不再是空话。社会主义制度，它要彻底铲除的不仅是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统治，而且随之而来的要铲除社会阶级存在和它们之间的对抗本身，要彻底铲除社会划分为各具相异利益和愿望的阶级本身，唯有这样，这个制度才能把社会引导到个人之间利害关系和谐和协调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体，然后再引导到具有共同的统一意志并能满足其意志的和谐的整体。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具有统一意志的“民族”成为现实，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民族在此制度下一般说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独特的社会机体，或者如考茨基所论断的，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制度使具有统一意志的

民族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其自由地进行自决的物质条件。总而言之，只有社会具有自觉地决定其经济生活、决定其生产条件时，那时社会才能获得自由地决定其民族生存的实际可能性。只有人类社会掌握自己的社会进程时，那时“民族”才能掌握自己的历史生存。

因此，虽说类比完全是失策的，可是“民族自决权”的信奉者们有时却试图在这一“权利”与言论自由权、新闻自由权、工会和集会自由权一类的形形色色的民主要求之间进行类比。他们说：如果承认自由结社权是我们作为主张政治自由的党的义务，那末，这丝毫也没有妨碍我们反对与我们为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社团，同样，正如我们承认“民族权”并未使我们对于支持每一次具体的民族“自决”方式承担义务，可是这仍然是民主的义务。以上观点完全疏忽了这一事实：此类“权利”表面上是相似的，却处于不同的历史水准上。结社权、集会权、言论权和出版权等，都是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方式在法律上的表述形式。而“民族自决权”则仅仅是信念的形而上学描述，这种信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根本难以实现的，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付之实施。

毕竟，社会主义在自己现今的实践中决不是形形色色奥秘的“高尚的”和“美好的”意愿的采集箱，而仅是特定关系的政治表现，即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以及目的在于废除现今生产方式而实行本阶级专政的意愿的表现。此项任务对于作为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主要的和指令性的，它决定了党对社会生活一切具体问题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它的历史任务应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朝着实现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革命利益的体现者。因此，有使命感的社会民主党所要实现的不是民族自决权，而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

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社会民主党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无例外地考察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制订自己的纲领性要求。无论是我们所要求的国家内部的政体问题，还是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抑或是司法问题和教育问题、税收问题或者军事问题，社会民主党不会听凭“民族”按照自己的见地和“自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一切问题一样，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的条件问题并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范畴；恰恰相反，在这些问题与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生活条件之间，通常有着最紧密的相互依存和互为因果的联系。因此，对于非常符合那个国家和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以及社会革命发展利益的，并且关系到民族政治和文化生存方式的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就不能对再次陈述这些愿望和积极要求推卸责任，但是不要把这件事留归“民族”去解决。

当我们只要把问题从抽象的烟雾中导引到具体关系的地面上时，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民族”有“权”进行自决。那么谁是“民族”和谁是权威呢？谁有“权”成为“民族”及其意志的有权威的体现者呢？用什么方式去辨认“民族”根本上究竟想要什么？难道会有一个政党，它会不认为自己与其它所有的政党迥然不同，正是“民族”意志的真正体现者，而其它一切政党仅是民族意志扭曲的、矫揉造作的体现者？从事物的本质上说，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都认为自己体现了民族的意志，攫取“民族”代表权据为自己特殊的垄断物。而且保守政党和反动政党俨然以民族意志的利益为借口并在某种范围内提出了与此相应的权利。法兰西民族意志毫无疑问的表达是法国大革命，然而拿破仑，他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中窃取了革命的成果，按照字面意义上的“普遍意志”原则作为他的整个国家改革的

基础。

在1848年，“民族”意志最初破坏了共和国临时政府，然后是国民议会，最后则是路易·波拿巴，他既废止了共和国和临时政府，还废止了国民议会。当俄国革命之际，自由主义以民族的名义企求建立“立宪民主党人”内阁，专制主义也以这个民族的名义组织了反犹太人骚乱，而革命的农民则以焚烧贵族宅院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志。在波兰，黑帮派的党即“国家民主党”借用了民族意志，它以“民族自决”的名义煽动“民族的”工人去暗杀工人社会主义者。

因此，伴随着“民族”“真正的”意志一起发生的事，恰似莱辛<sup>①</sup>笔下《智者纳旦》的楔子里关于真戒指的事一样：它丢失了，看来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它，也无法与赝品相区别。从表面上看，民主主义原则提供了辨认真正的民族意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多数人意见的测定。

民族想要的东西，就是民族多数人想要的东西。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幸而在某时承认了这个原则作为律己的指令性原则：这就等于宣判作为革命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死刑。从事物本质上说，社会民主党是代表民族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党。可是要知道，如果谈到自觉意志的表达，它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暂时还是少数的党，它仅是企求成为多数的党。须知，它不是以此种方法，即怎样在自己的意愿中，在自己的政策中，在自己的纲领中反映民族多数的意志，而是相反，走这样的道路，即怎样成为决不是全民自觉意志的体现者，而仅是无产阶级自觉意志的体现者，在此范围内，这个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不是也不奢望成为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

---

<sup>①</sup>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1729—1781）——德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剧作家。《智者纳旦》创作于1779年，是莱辛晚年表达进步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编者注



者，它所表达的仅是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中先进的、非常革命阶层的意志和觉悟性，再扩展这种意志，开拓把它扩大到劳动人民的大多数那里去的道路，然后才以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启迪他们的觉悟性。可见，“民族意志”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根本不是偶像，要在它面前屈膝膜拜；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历史使命首先在于使民族革命化，铸造“民族”的意志，这里指的是它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至于意识的传统形态，就民族的多数来说，因而也包括劳动者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表露出来的，往往都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态，是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愿望为敌的。即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已是最强大的政党，它在今天已成为拥有三百二十五万选民的少数派，面对着拥有八百万选民的资产阶级党，而有资格参加投票的总共是一千三百万人。尽管议会选民的统计数字提供得并不精确，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和平时期力量对比的概念。可见，当今德意志民族是以此种方式“自决”的：其多数人选举了保守党人、教权派和自由思想者并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交给了这些人手里。同样的情况还在更大程度上发生在所有其它国家里。

#### (五)

我们举一个“民族”应该自己尝试运用“自决”原则的具体例证。

在当前革命时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把这一原则运用于波兰的，原《火星报》编辑部应是其中之一，它在1906年以如下方式展开了关于华沙立宪议会的必要性的思想：

“如果仅仅从前提出发，即在现存的民族压迫问题上，俄国的政治组织是决定性因素，那末，必须得出结论：被压迫民族和被侵占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最积极地参加到组织全俄制宪议会中去。

如果想要做的话，那末，议会应该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砸开强暴的镣铐，沙皇政府正是借助于它来把“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捏合在一起的。

除了把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付之实施以外，没有其它任何令人满意的，即革命性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sup>①</sup>所有民族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宪议会中的任务，就是使民族问题的此种解决办法获得成功，当然，党的此项任务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在何等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运动，取决于它在制宪议会中获得的支持。

可是，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实施已得到承认的、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呢？

在那些民族问题与国家法制问题大体上相同的地方（这恰好适用于波兰），那里能够也应该建立起区域性的制宪议会，作为实施已为民族所争取到了的自决权机构，它的任务在于专门确定该“边缘区域”与国家整体之间的关系；确定该区域是继续从属于这个国家呢还是脱离它，确定它的内部管理和国家整个之间的未来联盟。

可见，波兰制宪议会应该决定，波兰是否加入新的俄罗斯的结构，它的宪法应是什么样的。波兰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竭尽全力，以便使其阶级意志能在民族自治机构的决议方面留下自己最深刻的印记。

如果我们应该要求全俄制宪议会把波兰民族问题<sup>②</sup>的积极解决交给华沙议会，那末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出于认为必须推迟召开这个议会，直到彼得堡制宪议会着手解决民族问题时为止。

---

① 此处及以下全部引文的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卢森堡注

② 这里和其它任何场合我所谈的是针对波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方式，没有涉及其它边缘地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那些变更。——参阅1906年2月7日第75期《工人》杂志。——卢森堡注

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华沙召开制宪议会的口号应该现在就提出来，与全俄制宪议会的口号并行。那个终于召集全俄制宪议会的政府，应该召开（或授权召开）为波兰专设的制宪国会。全俄议会的任务将是确定华沙国会的工作职责，还要考虑到各种社会力量将在彼得堡制宪议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种职责的授予愈充分、愈符合真实的民主原则，那末就会更坚定和更明确地说出波兰民族自己的民族意志，它就会在为决定波兰未来命运而专门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最明确不过地表达出来。依据这个国会的决议，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就能强有力地谈论捍卫确认了的自决权。

因此，同时召开全俄的和波兰的制宪议会，这应是我们的口号。

由无产阶级提出为波兰召开制宪议会的要求，在任何场合下不应意味着：波兰民族在全俄制宪议会上将派出什么华沙国会代表团。

我认为，在全俄议会上出现这样的代表团体不符合革命发展的利益。它将使波兰国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用如此的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团结一致和相互负责与他们之间利益的真实的相互关系是处于矛盾冲突地位的。

在全俄制宪议会中，即使那时有席位的话，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应由一个代表团来代表，假如从国会派代表团出席议会，所有的国会政党代表将按照名额的比例参加这个代表团。在此情况下，将是直接取消议会（它具有清除从沙皇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政治遗产的性质）中波兰无产阶级的独立代表权，也对波兰建立真正的政党造成困难。到那时，波兰制宪议会（它的主要任务将是确定波兰与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选举将无法在应有的程度上表明彼此竞争着的政党的政治面貌，尤其是社会面貌，如同全俄

议会选举所能做到的那样，全俄议会在提出地区性的、局部性的、历史上短暂性的以及特殊的民族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一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歧异。”<sup>①</sup>

这篇文章，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一翼对革命开始时期波兰社会党提出的关于华沙制宪议会的口号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批准，但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波兰社会党分裂后，这个党的所谓左派公开放弃了重建波兰的纲领，懂得了必须摒弃以华沙制宪议会口号形式出现的支离破碎的民族主义纲领。但是，这篇文章却成了在实践中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典型尝试。

在上述论据中，我们为了能从各个方面进行评论而整段加以引用，引人注目的是几个论点。首先，据作者说，一方面，“波兰制宪议会应该决定，波兰是否加入新的俄罗斯的结构，它的宪法应是什么样的”，而另一方面，“波兰的无产阶级还必须竭尽全力，以便使其阶级意志在民族自治机构的决议方面留下自己最深刻的印记”。这里，可知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与波兰“民族”的集体意志是明显相悖逆的。当然，只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即如果决议的措词是明确而清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才有可能在华沙制宪议会的决议方面烙下“自己的印记”；换一句话说，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党，必须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确定下来的纲领，它将送到华沙制宪议会上去，这个纲领将不是符合“民族”的意志，而仅仅符合波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因之，在波兰制宪议会的民族意志问题上，“无产阶级自决”的意志将起而反对“民族自决”的意志。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来说，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原则的“民族自决权”，将在事实上消失并由民族问题上确定下来的政治纲领所替代

---

<sup>①</sup> 上引论文刊于《工人》杂志（波兰社会党机关刊）——《社会民主党评论》编辑部注

由此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惊讶不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波兰问题的解决留给了波兰“民族”，而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不应做这件事，仅是竭尽全力力求按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波兰无产阶级的党在组织上加入了全国性的党，众所周知，例如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思想上一致的和统一的全俄社会民主党却在事实上有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为整体，它站在诸“民族”的立场上，而其组成部分则站在每个民族相应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此种立场却可能有极大差别，甚至可能迎头相撞。在全俄范围内，作为常规的、激化了的阶级对立到处呈现着，正如在对内政策问题上那样，同样也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与有关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相比较，无产阶级的党完全站在根本不同的立场上，在此种冲突场合下，俄国的工人政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我们举例来设想，在全国制宪议会上，波兰一方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纲领：国家民主党的自治纲领与社会民主党的自治纲领，彼此的歧异是根本性的，这就是说，从整个精神，从内在倾向以及政治性措词均是如此。对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将采取何种立场呢？承认哪一个纲领是波兰“民族”意志和“自决”的表现呢？波兰社会民主党从未萌发过以“民族”名义讲话的奢望。国家民主党则职业性地以“民族”意志体现者自诩；还可以设想这样的时刻：利用了形形色色小市民自发势力的愚昧，还利用了无产阶级一些阶层的无知，这个党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对此，难道全俄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就宣称，为了满足自己纲领中的定则而赞同国家民主党的方案，并起来反对自己的波兰同志，还是站到波兰无产阶级纲领一边，把“民族权”作为毫无约束力的空话而搁置一边？或许，为了调和纲领中的这些矛盾，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将被迫在华沙制宪议会上，如同自己在国内的宣传中一样，赞同自己的自治纲

领，而在全俄的制宪议会上，作为承认党组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赞同国家民主党的纲领，因而就反对自己的纲领？

我们另举一个例证。从纯粹以抽象形式考察问题出发，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提出整个问题的呢，为了阐述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俄国国民议会中的犹太人士（为什么只限于作者所要求的那样仅仅授权波兰成立单独的制宪议会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机缘，掌握了犹太复国主义议会党团的多数，他们要求全俄制宪议会全体犹太群众的移民基金进行投票。对此，犹太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坚定不移地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有害的、反动的乌托邦空想。面对这场冲突俄国社会民主党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从事物的本质上看，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民族自决权”等同于各有关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即等同于各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纲领。那末，在此种场合下，俄国党纲中关于“民族权”的定则仅是阶级立场神秘化了的意译。要么是，俄国无产阶级确实如此这般仅仅承认和尊重被俄国征服民族多数的意志，尽管各有关“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纲领明确地表现出反对这样多数。而在这种情况下是政治二元论的特殊类型，它所造成的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之间的意见分歧带来了令人难堪的场面，即全俄工人政党立场与组成它的各个民族的党的立场之间的冲突。

其次，专设的波兰制宪议会就是预定实施民族自决权的机构。然而，这个权利却被作者在实际上严加限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华沙的制宪议会的职责被紧缩为波兰对俄关系专题以及赋予波兰一部宪法，其次，在此范围内，“波兰民族”的决定仰赖于全俄制宪议会的批准。可是，说到批准——如果保留态度一般具有某种意义的话——议会可能予以同意也可能加以拒绝。那么，在此种条件下，不受限制的“民族自决权”就变为十足的成问题的事了。

民族主义党派人士关于单独的华沙制宪议会的口号决不是说赞同压缩其职责为波兰与俄国关系的狭隘范围，而只是冀求把波兰社会生活的对内对外关系的整个结构授权它来作最后决定。从“民族自决权”立场来说，正确性和彻底性无疑是在他们这一边。因为不晓得，为什么“自决”权仅意味着从外部来决定民族的命运以及它的宪法，而不是决定一切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除此以外，把波兰对俄关系问题以及波兰宪法问题从“一般的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那里区分开来和划分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善的构想。如果“波兰宪法”决定（姑且如此自我理解）颁布行使于波兰的选举法、结社集会法、新闻法如此等等，那末就不清楚还有什么有关波兰的政治事务适合于归全俄制宪议会去解决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只能是两种观点取其一：或者华沙制宪议会将是波兰民族自决的实质性机构，而在此情况下，它将只能是与彼得堡制宪议会完全平行的、具有无限权限的机构；或者华沙制宪议会只起地方议会的作用，在对全国议会关系上处于从属和受管辖地位，而在此种情况下，“民族自决权”与俄国“民族”的批准联结在一起了，这使人强烈地忆起了一个著名的德国式概念：die Republik mit dem Grossherzog an der Spitze。<sup>①</sup>

作者本人帮助我们猜测，从哪里去理解他的“民族权”，它在开始时以华沙制宪议会形式如此庄严宣告了的，最终却由于彼得堡制宪议会的权限和批准权而被取消了。孟什维克的政论家在此情况下遵循的态度是：华沙制宪议会将是民族利益的机构，而全国议会则是全社会利益、阶级利益的机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场所。因此，作者甚至对华沙“民族意志”机构流露出如此之多的不信任，直截了当地宣称反对这个民族国会会在彼得堡制宪议会中的代表权，而参加制宪议会则要求在波兰进行直接选举，以保障更

<sup>①</sup> 意即“以大公为首的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编辑部注

好地代表波兰无产阶级的利益。两个制宪议会的捍卫者本能地感觉到，即使是在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以进入华沙议会的情况下，其分离出来的本身就会削弱波兰无产阶级的地位，而后者与全俄无产阶级在全国制宪议会中的联合行动将会加强阶级地位及其防卫力量。由此产生了第一种立场与第二种立场之间的动摇并使“民族”意志机构屈从于阶级斗争机构的愿望。这样一来，在政治立场上重现了二元论，与此相关连，“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之间的冲突依次带来了华沙制宪议会与彼得堡制宪议会之间的对立态势。剩下的只是一个疑问：如果全国议会中的代表权对于捍卫波兰无产阶级利益更为有利的话，那末这个机构就无法解决波兰民族问题，又怎样在这方面保证波兰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可能具有的优势地位呢？把“民族”立场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联结在一起的愿望唤起了多少摇摆和矛盾。

须知，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一点：当各个民族国家是处于附属国地位还是独立地位的命运问题不是通过国会议席多数的表决来解决，而只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通过阶级的物质利益来解决，就政治的外部表征来说，即通过武装斗争、战争或起义来解决的时候，作为民族“自决”机构的华沙制宪议会的整个结构将是一所纸糊的小房子。假如在此之前通过胜利的起义从俄国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那时华沙制宪议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主宰波兰的命运。换句话说：只有当波兰人民使用暴力取得了事实上的可能性后，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自决“权”，可是到那个时候将不是在“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在可能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决。然而，当前的革命不仅没有唤起波兰的独立运动，也丝毫没有显示出波兰从俄国那里分离出来的趋向，而是相反，从根本上埋葬了此类倾向的残余，迫使一个民族主义党派，即国家民主党放弃重建波兰的纲领，而第二个，即陷于土崩瓦解的波兰社会党，多半也将被迫抛弃这个纲领。



因此，波兰民族的自决“权”就成了——在金盘里的进餐权。<sup>①</sup>

华沙制宪议会的要求，作为短暂的、仅是日趋没落的波兰民族主义试笔的即兴之作，作为转瞬即逝的肥皂泡，本身当然不具有任何政治或理论份量。这个要求作为在实践中运用“民族自决权”的例证确是方便的。这幅图景是新的论据，说明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社会民主党通过承认“民族自决权”而馈赠给各“民族”的，要么是对各“民族”依据实力状况所做出来的事情进行廉价的祝福，要么是没有任何效力的空洞说教。这样一来，此种立场就把社会民主党引向与其正确的号召相冲突的境地，这个口号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发展的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考察民族问题时唯一遵循的观点。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中保存这个形而上学的空话将是明确无误地背叛这个阶级立场，而党却力求在党纲的一切环节上维护这个立场。第九条应由符合各个民族无产阶级利益的、具体的，那怕是泛指性的定则来取代。这丝毫不意味着各有关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党纲应雷同于全国党的党纲。由全国工人政党的整体对这些党纲中的每一个纲领进行最根本的批判性评论是必要的，可是评论要从社会实际关系的观点出发，从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出发，以及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这是唯一能显示出不管是在整体上，还是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党具有统一的和一贯的立场。

发表于《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908年第6期。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选》1959年波兰文版第2卷第114—167页

（程人乾译）

---

<sup>①</sup> “在金盘里进餐”是欧洲俗语，意为很难达到的奢望。——编者注

#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 1910年 )

社会民主党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觉信徒和精神产物不承认历史上的英雄崇拜。它作为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小部分，对自己本身也不这样做。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是现代阶级国家内部的客观发展的产物，具体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强大的大工业和成为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大国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是无数的、无名的许多世代的男人女人有实效的理想主义的自觉影响的产物，是群众行动的产物。没有这无数的无名英雄，没有群众的自觉活动，就是最有天才的领袖也不能使社会民主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象：现代社会公众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力量。

但是也就在这个范围内，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特殊性质，这个党的领袖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具有历史地确定的内容，因此也就具有确定的界限。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具有自己最切身的利益，这就注定它要实施自己在广义上反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目标和政策。但是，因为群众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和活动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于是便产生了两面性。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越是能够自欺，越是能够对追随他们的群众隐瞒他们目标的真正性质，隐瞒他们的任务的历史界限，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影响，他们的行动就越大胆，越宏伟壮观，越有效。他们最伟大的领袖是由法国大革命中的各资产阶级提供的，而这次革命是其历

史后果被各种思想幻觉的彩虹般的光彩夺目的云雾掩饰起来的第一次阶级斗争。由于事物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越是衰弱，它们的领袖的水平越是降低，进行自我欺骗和欺骗群众便越不可能。请用大革命的巨人同1848年革命的侏儒进行比较，再用后者同俄国革命中使资产阶级感到懊丧的袖珍英雄进行比较，或者同德国以及整个西欧国家今天的资产阶级政党领袖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来了。

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实际上它的真正领袖是群众自己，当然这是要从党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加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整体上说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它在斗争的各个时刻代表解放的永久性利益，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的集团利益相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党内，它的领袖越是明确地和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威信。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长过程中在它的领导阶层中出现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和天才的人物。但是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能够如此高度地、浑然一体地、神奇般地具备那些由现代无产阶级阶级运动客观条件赋予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先决条件。

首先，倍倍尔的精神生活史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史是一致的。倍倍尔并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上成熟的人加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他入党时，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倍倍尔从六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他和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一起，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到无产阶级

革命观点的转变，他经历了年轻的党的运动的一切内外斗争和危机。在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最初的派别斗争中，他站在最前列。在俾斯麦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他饱尝了一切痛苦和牺牲，同样地，在随后的运动的胜利进程中，他成为运动的旗手。党在组织上的发展壮大，从起初的弱小到今天的强大，始终都是在他的积极的决定性的参与下发生的。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行动是在倍倍尔的权威领导下，从参加北德意志联邦议会<sup>①</sup>摸索性的起步发展到近几年的状况的，就象六十年代末爱森纳赫派的头一批工会组织也是在他的影响下和按照他的计划建立起来一样。此外，在运动的所有思想危机和所有思想斗争中，倍倍尔始终处于党的生活的中心，他在思想上不断成长并随着党一起成熟；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员，他既是党的产物，又是党的缔造者。

因此，除了在思想和性格上具有自己的光辉特征之外，倍倍尔和他的生活的伟大之处的真正秘密，也正是可以用以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的伟大之处的秘密。如同一切真正的伟大一样，这二者都是可以极其简单地加以说明的。既要理解无产阶级在现存的社会制度范围内去争取可以争取到的一切坚持不懈的日常实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这种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一定会变成飘荡在空中的宗派运动，也要理解党的一切行动方式的革命的原则性的准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准绳只是由于有了彻底的科学理论基础才得以制定出来，没有它，无产阶级的运动就一定会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践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废墟之间不停地来回摆动，把目前的日常斗争和革命原则结合起来，把实践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这就是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的

---

<sup>①</sup> 1867年2月12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作为第一个革命的工人政治家被选进了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编者注

关键，理解它今天之所以伟大的关键，也是理解在它身上隐藏着、到将来才会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的关键。对上述必要性的理解和对日常实际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结合的理解，同样是理解倍倍尔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发挥的无与伦比的影响的关键。只是因为他一踏上征途就是社会主义的战士，直到他的晚年始终以坚定、明确和献身精神忠于社会民主党的两颗指路明星，只是因为他时时刻刻对实践的要求和对革命的原则性的策略要求有着相同的理解，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为了运动的这一面而牺牲另一面，因为他为了从资产阶级制度的岩石里敲出几滴可怜的甘露来减轻一下群众的饥渴，从来不觉得进行这种艰苦斗争的日常辛劳太无聊，太细小，而他也从来不觉得征途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会暗淡无光，成了遥远的隐隐约约闪烁的小星，而是始终觉得它如同光芒万丈、温暖大地的太阳一样，照耀着条条小径：只是因为这样，倍倍尔才能成为千百万人民爱戴的领袖。起初是几千个，后来是几十万个，最后是几百万个德国无产者听从他，追随他，因为没有谁能够象倍倍尔那样，善于了解千百万群众为了争取每一星半点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所表现出来的不懈的战斗热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善于了解他们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善于表达这些政治品德，并把它们锻炼成行动。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他便作为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开始实践，作为作风高尚的组织者和气量宽宏的现实政治家进行活动。德国无产阶级一取得它最起码的政治武器，即选举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权利，倍倍尔便不顾别人的反对，第一个起来毫不动摇地建议使用这个武器，而且还教会这些人自己使用这个武器，从而为无产阶级开拓了进行实际工作的广阔的新天地。与此同时，倍倍尔曾就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sup>①</sup>写信给阿尔贝特·朗格，他在谈到大会孕育着不可避免的内部分裂时说：宁可要十个可

靠的协会，也不要三十个动摇的协会<sup>②</sup>！一年后他果断地使这些协会的优秀核心脱离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追随者，并且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sup>③</sup>。同年，当第一国际巴塞尔大会的决议使土地问题成为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sup>④</sup>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时，当年轻的社会民主运动的这些决议引起资产阶级的极端仇恨时，倍倍尔在爱森纳赫派中第一个起来公开承认用革命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sup>⑤</sup>，从而也就站到了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国际一边。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倍倍尔从他单独代表社会民主党那一天起，以及后来领导越来越多的议员的时候，都如同以前在北德联邦议会一样，进行了同样的坚忍不拔的战斗。他维护所有改善工人状况的主张，他实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实行的任何切合实际的议会政策。但是，当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所有猛兽都扑向已经倒下的巴黎公社的身上时，倍倍尔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上坚定地展开了一面革命旗帜，并且高声疾呼：“……请你们坚信，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和所有对自由和独立还抱有感情的人都关注着巴黎……尽管目

---

①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5—7日在纽伦堡召开。——编者注

② 1869年6月22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给弗里德利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信中写道：“我们知道，这是艰苦的斗争，可能，甚至有极大可能导致分裂。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不幸；因为十个忠于信念的可靠的协会对于我们来说胜过三十个动摇的或者追随哥达派和资产阶级的协会”。——编者注

③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于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编者注

④ 1869年第一国际巴塞尔大会讨论了土地归社会所有的问题并作出决议，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它转变为公共所有。——编者注

⑤ 1870年6月6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斯图加特大会上讲到把土地转为公共所有以争取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者的必要性：大会通过了倍倍尔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决议。——编者注

前巴黎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我提醒大家，巴黎的战斗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主要战斗还在我们前头，要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向王宫宣战，给茅屋和平，让贫困和寄生灭亡！’就将成为全欧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sup>①</sup>

在这件事上倍倍尔无疑犯了错误，后来一些傲慢的资产阶级教授对他进行过尖刻的讽刺，一些谨慎的党内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他进行过温和的责备，说他“作过预言”。这就是说，当他谈到还是把我们同劳动和资本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搏斗分隔开来的“几十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用简清明瞭的语言表示了他对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坚定信心，即不是在无限遥远的天际，而是能够在可以捉摸的、或多或少屈指可数的将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衰落时期，历史的道路与倍倍尔大胆的目光在1871年所看到的相比要延伸得长一些，就象这条道路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在一代人以前所估计的相比显得要长些一样。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倍倍尔的预言中所说的并不是一个乌托邦政治家忽隐忽现的急躁情绪，而是现实政治家对他的政策的最终目的和路线的坚定的革命信心，那么，经过后来几十年，虽然最后结局的开始还没有即将到来，但是他并没有投入失望和烦恼的怀抱，而是恰恰相反，他的信心更加增强了。二十年后，他在党的最高代表机构，即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以响亮的铿锵有力的声音重复同样的“预言”：“是的，我相信，实现我们最后的目的为时不远了，在座的只有少数人才会看不到这样的日子”。<sup>②</sup>倍倍尔的话有如表达生活、理想主义和追求事业的信心的一股带电的暖流通过会场。后来有人手里

---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1871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921页。——编者注

②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第172页。——编者注

拿着裁缝用的尺子向他精确地指出，他在目测通往社会主义大门的路程时又一次极为不幸地失误了。不过，无论是在国外、国内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一次也是理解他的：这也是要通过他的预言掀起一个“运动”，即一股复兴信仰和树立信心的潮流，这种信心不是高利贷者用干瘪的手指拿着契据顽固坚持要按承诺日期还债的信心，而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信心，这种理想主义，只要时时刻刻坚定不移地眼盯着光辉的最终目的，就可以不加计较地准备付出任何牺牲和辛劳。

由于有了这种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它不是宗教，不是感情问题，而是经过彻底研究取得科学信念的成熟果实，才使倍倍尔在党的历史上所有盛衰时期都能充当为它指明道路的罗盘。

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混乱时期也随之而来。一些自命不凡的算术大师，起初没有犯作预言的毛病，因此后来可以讽刺倍倍尔的预言才能，但他们这时却失去了方向。在尚属年轻弱小、在反动派野蛮的冲击下一下子就被击溃了的党的内部，一股危险的思潮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股思潮情愿放弃严峻的革命的阶级立场，代之以鼓吹形形色色模糊不清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些人当即坚决地起来反对这种危险，在他们当中为首的又是倍倍尔。1882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左尔格写信说：“在那些领导人中，这次倍倍尔也表现得比谁都好。”“这班先生”，他在谈到非勒克和其他人<sup>①</sup>时继续写道，“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sup>②</sup>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路易·非勒克，威廉·布洛斯，布鲁诺·盖泽尔和卡尔赫希柏格，在他们的宣传活动中要求社会民主党放弃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并把它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在1887年于圣加伦召开的德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非勒克和盖泽尔被解除党内全部重要职务。——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27页。——编者注



卑躬屈膝马上被制止了，不久党便回到了自豪而严峻的战斗立场，这一立场是符合倍倍尔1881年在帝国国会演说的结束语精神的，当时他当面斥责了耻辱法的制订人。他在说明耻辱法三年的实践情况时说：“在这场斗争中，你们的武器将会象玻璃碰撞花岗石一样被碰得粉碎。”<sup>①</sup>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本来要扼杀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残酷暴力的棍子被折断之后扔回给了资产阶级。这时候，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再次发生思想危机，这一次是双重的危机。一方面，被当作表现政治家聪明才智的“卑躬屈膝”政策抬起头来，声称在艰苦奋斗取得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存在之后，要无产阶级“伸出手来”迎接统治者的“善意”。<sup>②</sup>另一方面，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头脑混乱的人，不接受在斗争方法上势在必行的改变，并且认为，随着“革命主义”的外部手段的放弃，也必然会放弃社会民主党斗争的真正的革命核心。在巴伐利亚国家社会主义<sup>③</sup>的机会主义危险面前和在“青年派”无政府主义危险面前，必须捍卫党，这时又是倍倍尔站在最前列，和他站在一起的有李卜克内西、奥艾尔、辛格尔，他以火一般的热情，充沛的青春活力，目标明确的坚定性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以便在实际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的最终目标之间再次确立正确的关系和平衡，而这是构成社会民主党的生存基础和它的力量发展壮大的秘密所在。

在新的条件下，党的发展还不到十年，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生新的内部危机，这一次是发展中的危机，是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之后

---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4届第4次会议速记记录》1881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658页。——编者注

② 这种观点是福尔马尔首次提出来的。参看《福尔马尔文选》1984年人民出版社第127页。——编者注

③ 参看同上书第179—207页。——编者注

运动得到非常迅速的扩大和加强的必不可免的产物。这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可实现性，怀疑运动的科学理论，也就是企求在现今社会的土地上多多少少安顿下来的意愿在党内又发展成一股具有明显特征的思潮。这时倍倍尔又立即站在最前面，捍卫革命策略，捍卫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任何缺乏信心的表现。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使用了倍倍尔的“还是要坚持剥夺！”的口号。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倍倍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拒绝了机会主义，这已经成了各国觉悟的无产者的准则。最后，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的领导下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把阶级斗争的新武器——群众罢工列入了自己的武库。这些既是倍倍尔生平事业迄今的高峰和光辉顶点，也是作为无产阶级国际的先锋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迄今的高峰和光辉顶点。

把倍倍尔的活动和德国党的历史密切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赞扬自己，社会民主党愿意在倍倍尔七十寿辰之际赞颂他的荣誉。其次，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也必须利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以便使自己更明确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成长壮大和自己的胜利的条件。倍倍尔的生活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就好比一本打开的书，书中的每一页都可以读到：只有通过为争取可以从中得到具体的实际成就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胜利而进行的不知疲倦的、不间断的、不怕牺牲不怕艰苦的斗争，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斗争，通过议会行动和各种形式的群众压力，同时，只有通过始终坚定不移地按照社会主义最终日的所指示的方向来确定整个斗争路线，无产阶级事业才能冒着风浪和压力从胜利走向胜利。只要在日常的一切工作中都忠实地、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斗争一贯的革命性质，无产阶级政党不论在胜利和失败时，也不论在发展缓慢和发展迅速时就都能永葆其

内在的青春，就象倍倍尔一生所保持的一样。当然，他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青春并不是身体上的，而纯粹是精神上的：尽管他干了四十年无聊的议会工作，尽管他不断地接触过成千上万的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过某些合乎常情的失望，但是他丝毫没有沾染玩世不恭和自高自大的毛病。对于倍倍尔来说，社会主义的福音今天仍然象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第一次听到时那样新鲜，那样真切，那样充满活力。我们从这个七十岁的人身上所得到的东西是这样新鲜，这样年轻，这样充满活力，就象只有在一个热情活泼的青年人身上才能看到的一样。

发表于《平等报》第20年卷（1910）第10期第146—149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79—288页。

（黄敬甫译 黄永繁李宗禹校）

## 播种季节

(1910年3月25日)

我们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也许已经几十年来未曾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利于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形势了。霍屯督人选举<sup>①</sup>后劳动人民最广大阶层的怨气未消，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掠夺，即所谓“财政改革”又极大地激起了被掠夺和被压榨的群众的愤怒。当对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这次肆无忌惮的打击的全部影响还根本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普鲁士“选举法改革”<sup>②</sup>这出闹剧又如同粗暴的拳头打在劳动人民的脸上。而且，当社会民主党把被剥削和被剥夺权利的愤怒群众引上街头高声抗议这种罪行的时候，警察的马刀便在空中闪起，呼啸着的军刀直砍游行者的脊背，兵营里的士兵整装待命，掩蔽着的大炮装上炮弹。

---

① 指1907年1月25日和2月5日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尽管社会民主党比1903年的选举多得了24万多张选票，但是由于反动派坚持旧的选区划分办法并在复选时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只获得43个议席。当时反动派为在非洲进行反对赫罗人和霍屯督人的殖民战争而掀起沙文主义宣传，因此这次选举被称作霍屯督人选举。——编者注

② 1910年2月5日普鲁士政府向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草案。这个草案在坚持三级选举制的条件下对选举法作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政府于5月27日宣布撤销这一草案。——编者注

这样，敌人就为我们准备了千百万倍的土地，唤醒了人们的心灵，驱使漠不关心的人产生怨恨，迫使懒散的人进行沉思。我们的责任是现在就要把启蒙的种子大把大把地往地里播撒。警察的残暴，反动党派在议会里的下流无耻，是保证我们能够引起最广大群众的注意和赢得他们赞同的最近的动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只能是用来揭露这些现象的更为深刻的根源和从整个范围和全部历史意义上去宣传阶级斗争的时机。今天，已经不必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当作灰色的理论从书本中搬来了。今天，这种学说在德国已经走上街头，它高亢宏亮地向每一个人宣布它是真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联盟政策不久前刚告破产<sup>①</sup>，中央党跟着就象在反动派的一片喧闹声中，在普鲁士选举权问题上把它作为一个人民政党的最后一点声誉也丧失殆尽了。在保守的容克的领导下，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同谋与帮凶下，在堕落成为容克的擦靴小卒的政府的卵翼下，今天，恬不知耻、赤裸裸地暴露其可憎面目的资产阶级国家正在受到劳动人民的厌恶和憎恨。我们只需要揭示一下其中的内在联系、原因和作用，就可以在千百万个头脑中激起对阶级斗争的清楚认识。

所有成年人，不分性别，都获得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是保证我们在日前赢得最广泛的阶层热烈拥护的最近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现在必须宣传的唯一目标。我们为了回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选举改革玩弄的卑鄙拙劣行径而提出真正民主的选举制的口号时，纵观政局全貌，我们还仍然处于守势。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是任何真正的斗争策略的古老而有效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要在宣传中掉转枪头，全线转入猛烈进

---

<sup>①</sup> 1909年7月间在举行帝国财政改革辩论时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联盟破裂，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毕洛夫下台。——编者注

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但是，我们只有在宣传中明确地维护我们政治纲领第一条提出的政治要求，即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可以最明显最清楚地，可以说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迄今在我们的宣传中，共和国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甚小。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我们党要防止德国工人阶级对共和国产生资产阶级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例如对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曾经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至今还在流行。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坚决彻底地不是针对阶级国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形式和弊端，而是针对阶级国家本身；它没有把精力分散于反军国主义，反君主专制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不断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成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弊端和形式的死敌，不管它们是披着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外衣。经过四十年这种彻底的启蒙工作，终于使德国受启蒙的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今天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国家和堡垒。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

然而，正因为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四十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产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由于强调社会民主党共和主义的性质，我们首先便多赢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具体而通俗地说明，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原则上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阵营。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惊人的没落也特别表现在对君主政体的屈膝屈服上，在这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要比保守的容克更胜一筹。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德国内外政策的整个情况表明，君主政体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头目。毫无疑问，个人统治的半专制君主政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年甚于一年地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扩充舰队政策的动力，推行世界冒险政策的灵魂，就象它在普鲁士是容克的庇护所一样，在全帝国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鲁士政治落后性的堡垒，最后可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共和国的口号今天在德国大大超出了表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美梦，大大超出了坐在云端清谈政治的境况，它是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反对海上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政策，反对容克统治和普鲁士化的实际战斗号召，它仅仅是我们为反对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局部现象而进行日常斗争的结论和简明的概括。恰恰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为此指明了方向：容克贵族在帝国国会搞专制主义的政变威胁<sup>①</sup>，帝国首相在普鲁士邦议会对帝国国会选举权进行无耻攻击，以及在普鲁士选举法问题上通过贝特曼提出的改革方案来兑现“国王圣旨”<sup>②</sup>。

今天，实现政治民主和平等权利的要求必然要在我们的斗争中提到首位，并且在千百万群众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最好的民主改革也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长征路上的小小一段路程。因此，现在就必须加倍努力，向人们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现在赶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参加我们的游行的成群结队的心怀不满、受剥削、受奴役的人们，不仅应当从我们嘴里听

---

① 指1910年1月29日保守党议员埃拉德·冯·奥登堡-雅努绍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德皇可以随时用武力解散国会的挑衅性言论。——编者注

② 1910年2月10日普鲁士内政大臣特奥巴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普鲁士众议院对改革选举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说这是由社会民主党人为地渲染起来的一个次要问题。由此引起了持续一年之久的群众示威游行。——编者注

到猛烈抨击统治普鲁士德国的反动派的言辞，而且还应该听到社会主义的福音，了解到一个新的社会的原则。我们应该从反对贝特曼·霍尔韦格和黑—蓝联盟<sup>①</sup>的战士中募集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忠诚战士。

往后的事态，胜利或者失败，当前运动的直接成果，谁也无法事先作出估计和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充分利用现在激烈的战斗时机，不但去唤醒和激励群众，而且也去教育群众，不但去大大扩充我们的拥护者大军，而且也去提高和巩固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那么事态就会如愿以偿地发生转折，无产阶级的事业就会在运动中取得胜利。让我们大把大把地将社会主义的种子撒向开垦了的土地吧，无论如何，收获是属于我们的！

发表于1910年3月25日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第7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00—304页。  
（黄敬甫译 黄永繁 李宗禹校）

---

<sup>①</sup> 指1909年德国保守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在国会中所结成的反动联盟。因中央党教士的黑色长袍和保守党贵族的“蓝色血液”而得名。——编者注



## 疲劳还是斗争？

(1910年5月23、6月3日)

### 一

我因为忙于口头宣传，所以耽搁了很久才来答复考茨基同志。<sup>①</sup>尽管我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sup>②</sup>和我在4月间的宣传<sup>③</sup>没有得到别的什么结果，而只不过使党内展开了对策略问题的深入讨论，尤其是还突破了我们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对讨论群众罢工下的禁令，但我也就可以十分满意了。因为这首先关系到反对那种不可理解的企图：禁止在党刊上公开讨论深为广大党员关注的问题。不仅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而且还有《新时代》一开始都接受了我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甚至已经排好版，可最后却以不宜在党刊上讨论群众罢工为理由而拒绝发表。

只要想一想，这根本不象考茨基同志所描述的那样，是蓄意挑

---

①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文章《今后怎么办？》（《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3—40页和第68—80页）里，表示反对罗莎·卢森堡关于举行政治性群众罢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编者注

② 指卢森堡1910年3月14日和15日发表在多特蒙特《工人报》上的文章《下一步怎么办？》。——编者注

③ 在1910年4月3—18日期间，罗莎·卢森堡在各地许多集会上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编者注

起的讨论和某一个个人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主意，就会完全明白这种企图的错误。考茨基同志的文章通篇都是谈论我和我的宣传的，并且用这样一句话作为他的文章的开头：“卢森堡同志在我们的多特蒙特的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将群众罢工问题提出来讨论。”<sup>①</sup>事实上，还在我的文章见报之前，群众罢工问题就已经在党的好些重要活动中心和党报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哈雷和黑森—拿骚鼓动区的同志们都曾经在正式提案中建议党执行委员会着手研究总罢工问题。柯尼斯堡、埃森、布勒斯劳、不来梅的同志们，曾经决定举行有关群众罢工的报告讨论会。在基尔和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甚至已经相当成功地举行过半天的示威性群众罢工<sup>②</sup>。矿工联合会的波柯尼同志曾经在埃森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许诺了举行群众罢工，并且希望矿工在即将来临的伟大政治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甚至我们在普鲁士众议院中的议员们，也已经以群众罢工作为威胁。<sup>③</sup>在普鲁士，我们党的差不多所有刊物，以及普鲁士以外的几家报纸，都转载了我的文章。此外，在我于4月间在西里西亚、基尔、不来梅、法兰克福（美因河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和5月1日在科伦召开的十六次群众大会上，不论哪一次，群众罢工的口号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最热烈的拥护。这两种情况正好证明，讨论群众罢工根本是非常符合广大党员群众的情绪和需要的。我可以这样断言，现在就还有一个口号能够在德国的党员群众中博得同样热烈的拥护，这就是鲜明地强调我们主张共和国的立场。遗憾的是，当一部分地方报刊，从多特蒙特《工

① 同第211页注①第33页。——编者注

② 1910年2月23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5000名工人，为争取民主选举权举行半天政治性罢工；同年3月5日10000克虏伯工厂和皇家造船厂工人也举行了同样性质的半天罢工。——编者注

③ 在1910年3月普鲁士众议院二读选举法草案时，社会民主党议员保·希尔施和卡·李卜克内西宣布，在争取民主的选举法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也将采用议会以外的手段。——编者注

人报》到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在这方面也都在尽它们的义务时，这个口号却既不能在《前进报》上，也不能在《新时代》上公之于众。

可见，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为准备必要时走上街头，运用群众压力，把业已开展的选举法斗争进行到胜利的如此高昂的战斗情绪和如此坚定的意志，还有，他们对群众罢工思想如此迫切的关心，在德国都是空前未有的。对于国内的这种情绪，只有一份党报直到现在还完全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它直到今天对党的报刊上关于群众罢工的全部争论连一个字都没有报道过。这就使一部分党员，即靠《前进报》了解全国党组织的精神生活和情绪的柏林的同志们，对群众罢工的争论一无所知。尤有甚者，这个中央机关报在严格执行指示方面是如此卖力，甚至在报导柏林召开的集会时都要删掉任何涉及群众罢工的字眼。还有，在《前进报》转载4月1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报道稿件中——原报道显然是“未经编辑加工”就发表在其它党报上的——，“报告人<sup>①</sup>由于宣传群众罢工而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这句最能说明问题的话也被小心翼翼地删掉了。考茨基同志大概也是从《前进报》那里来了解全国党组织的观点的，所以他才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禁止公开讨论群众罢工是可以办到的。

再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企图禁止公开讨论群众罢工，依我看，这种企图的每一次失败迄今已足够证明，这样一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在1905年，工会科伦代表大会就禁止过在德国“宣传群众罢工”。在1904年，在奥地利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萨尔茨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员预备会议同样决定，在党代表大会上不要讨论

---

<sup>①</sup> 指罗·卢森堡。——编者注

也不要提及群众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两项决定都由于这样简单的情况而落空了：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由一小撮百依百顺的门徒组成的教派，而是一种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凡是会使它的内部引起激动的问题，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必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公开出来。

在当前的情况下，令人忧虑的不是禁止讨论群众罢工的企图本身，——我认为，对于诸如此类的禁令，与其感到怒不可遏倒不如泰然处之——，而是这种企图所依据的对于群众罢工的一般的认识。因为如果听信了那些用来论证在当前公开讨论群众罢工如何有害的论据，人们就会认为，俄国革命的道理，以及这个时期对于评价群众罢工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尤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部丰富的宝贵经验，都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而我们则仍然处在与多梅拉·纽文胡斯<sup>①</sup>以及科尔纳利森<sup>②</sup>辩论的美妙时代。

考茨基同志说，“这种事情”——即讨论群众罢工——“如果公开进行，那就等于把自己阵地的弱点通知敌人。整个讨论的目的，就象是要在敌人的听觉范围之内召开商讨该不该同敌人干一仗的军事会议。”

如此说来，群众罢工是巧妙地设想出来的手段，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说，由党执委会和工会总委员会在密室里策划出来的，用以对敌人——这里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突然袭击的一种手段。1906年汉堡的同志委托我写的论述群众

---

① 荷兰社会民主党员多梅拉·纽文胡斯代表半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用总罢工回答任何一种战争。他的观点在1891年国际布鲁塞尔大会上被多数人否决。——编者注

② 荷兰无政府主义者克里斯蒂安·科尔纳利森主张把总罢工当作推翻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唯一手段，认为由于总罢工的胜利就能一举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他尤其否认要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革命准备的必要性。——编者注

罢工的小册子<sup>①</sup>都是针对这种观点的。现在我只好重复如下的话：

“今天，无论是近期内想在德国通过执委会决议为举行群众罢工规定确切日期的那些人，还是象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那样想以‘禁止’宣传来使群众罢工问题化为乌有的那些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方法。这两派都是从共同的、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出发，以为群众罢工仅仅是技术上的斗争手段，可以随心所欲地、诚心诚意地‘决定’或‘禁止’它，就象一把刀子，可以把它折起来放在衣袋里‘以防万一’，也可以根据决定把它打开来使用。”<sup>②</sup>

考茨基同志出于这种见解，担心公开讨论群众罢工将会把我们阵地的“弱点”暴露给敌人，对此，我认为最好用曾经在《不来梅市民报》上探讨过考茨基的阵地的大多数弱点的潘涅库克同志的话来回答。

潘涅库克写道：“党除了完全公开地讨论自己的强点和弱点之外，从未采取过别的什么做法，这个事实表明，这种拿军事技术来作比较的做法是怎样把人引入迷途的。别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一种群众运动。在这里，施用密计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在这里，强与弱都取决于一般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这些情况根本不能保密，也不能通过保密使其扩大或缩小。那么，我们怎么会把我们的弱点暴露给敌人呢？敌人对我们的弱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如果它不知道我们的弱点，如果它估错了我们的和它自己的力量，其原因也在于策略上的保密根本无法加以改变的、必然的历史情况和社会情

---

① 见本卷第33—11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况。”

但是，考茨基同志暗示，公开的辩论还会造成其它有害的影响。他写道：“要是卢森堡同志的文章成功地在党的刊物上煽起一场讨论，而在讨论中，另一方则阐明他们认为群众罢工在目前没有成功希望的理由，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这些理由可能说得对，也可能说得不对，但是这样一种方式的讨论，绝不会起到促进行动的作用。”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观点，也是社会民主党迄今未曾支持过的观点。我们从未靠幻想和向群众隐瞒事情真相来达到“促进行动”的效果。如果反对群众罢工的人认为这样一种行动没有成功希望的理由说得对，那么，我们听听他们的理由并表示赞同，则是完全有益的和必要的。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么，让公众认识到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则同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进行最深入的讨论，只会好处，只会有助于党本身澄清观点，只会使我们注意运动的弱点，重视宣传或组织方面最紧迫的实际任务。

但是，如果考茨基同志在这里甚至看到这样的危险，即我的书面宣传和口头宣传会促使工会领导人走上战场，架起他们的大炮对准群众罢工这个主张，那么，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工会领导人的权力。而这样估计还是由于有点机械地把群众罢工看成是一项由“总参谋部”策划和指挥的突然袭击的计划。实际上，如果群众罢工运动是产生于当时的情况、斗争的激化和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那工会领导人就根本不可能将它禁止。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工会领导人起来反对群众的企求，被断送的就不是群众的情绪，而是工会领导人的威信。事实上，现在工人大众的战斗情绪已经十分激昂，如果工会的总参谋部公开出面加以压抑，那除了在自己的工会会员中激起批评和抗议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因此，为了“鼓励行动”，最理想不过的办法莫过于，工会领导人最终

带上自己的“大炮”亲自上阵，以使人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们的论据，并使人们可以确认工会领导人的思想感情比群众落后到何等地步。为了减轻工会领导人这种难堪的辛劳，考茨基同志本人先是反对公开讨论，反对不了，又公开站出来，以便由他作为激进主义的理论家来把群众的思想 and 兴趣从群众罢工转移到即将来临的帝国国会选举<sup>①</sup>上去，这当然会使工会总委员会非常满意。可是这样来起“鼓励行动”的作用是否合适，我是怀疑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考茨基同志发出他的警告性的呼吁呢？难道出了什么必须从中把党拯救出来的危险吗？难道或许有什么人想在一朝一夕之间就下令发动出一场群众罢工来吗？或者是存在过这样的危险，即有人在党内唤起认为群众罢工有神奇作用的毫无根据的幻想，从而轻率地驱使群众投入他们所希冀的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行动吗？就我所知，无论在集会上还是在报刊上，一点儿这样的迹象都没有。就我来说，在这方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产生怀疑的。

我写过这样一段话：“认为凭一时的心血来潮，靠党的简单命令，在某一个早上就能够把群众罢工‘制造’出来，那纯粹是幼稚的幻想，是无政府主义的妄想。但是，如果强大的工人群众的示威运动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如果形势使拥有三百万大军的党面临抉择，要么不惜任何代价继续前进，要么让群众的行动毫无成效地自行瓦解，那末由此引起的罢工，这种由觉醒群众的内心要求和决心、同时也是由已经变得尖锐的政治形势孕育而成的罢工，它本身就包含着合理性，它的效果也是极有保证的。

不过群众罢工也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成功的灵丹妙药。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群众罢工看作是一种人为的、只要按照规定和命令就可以任凭使用的、一次性的、机械的、施加政治

---

<sup>①</sup> 指1912年1月12日的德国帝国国会选举。——编者注

压力的手段。群众罢工只是行动的表现形式，这种行动有它的内在发展，有它的逻辑，有它的升级，有它的终结，它和政局及其趋势息息相关。群众罢工，特别是短暂的一次性示威性罢工，肯定不是已经开展起来的政治运动的尾声。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阶段，群众罢工是它的前奏。如果说，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持续时间、直接效果、甚至为此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不可能象交易所计算费用的帐目那样，预先用铅笔在纸上写得一清二楚，那么，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即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领导几百万人的党在政治上有责任坚决地提出唯一能够把自己发动的斗争推向前进的口号。”在文章的结尾，我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但是决不可以期望，忽然有一天，会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从党执行委员会和工会总委员会那里发出群众罢工的‘命令’。凡是要对几百万人负责的团体，在它们下定要别人去实现的决心时，本来是理所当然地要持克制态度。而且，如果要采取群众性的直接行动，也只能由群众自己来下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共产党宣言》这一指明道路的原理还有着这样的具体含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内部，每一场重大的、关键性的运动不应该由少数领导人发起，而应该来自拥护党的群众的信念和决心。就是按照普鲁士党代表大会的表示而‘采取一切手段’、当然也包括采取群众罢工这个手段把当前普鲁士的选举法斗争引向胜利，这件事也只能由拥护党的最广泛的阶层来下决心。党员和工会会员应当做到，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区表明自己对当前局势中的各种问题的态度、明确而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意愿，以便使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能够受到重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领导人肯定会象一贯所做的那样，予以注意。”



因此，主要问题在于群众都来研究群众罢工问题并对此表明态度。一场群众罢工可能与否，合适与否，必要与否，到时候进一步发展的形势和群众的态度将给以回答。真正从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来看，考茨基同志的反对态度是奇怪的。他自己把他的“疲劳战略”的整个理论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虽然不是现在，但是在明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之后，就会步入非使用群众罢工不可的境地。此外，考茨基同志甚至承认，“任何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指的是街头示威后发生的屠杀——”都可能会使群众罢工完全自发地成为必要。他甚至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自从德意志帝国诞生以来，社会的、政治的和国际的矛盾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尖锐……最容易发生的是一些意外事件。这类事件在下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之前，就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不能自制地投入它的全部力量和一切实力手段的大爆发和大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群众罢工，极有可能把现有的政权扫除掉。”

即使事情是这样，即使也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德国使用群众罢工，那么，理所当然，为了不使工人群众感到意外，为了使他们不是盲目地，也不是凭一时感情冲动，而是带着高度的觉悟，带着对自己的力量满怀信心的心情，并且有尽可能多的人投入行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群众也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就是要在今天就在尽可能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唤起对这种行动的同情。当党员群众总是以“缄口不言”为宜的时候，群众自己也应该对任何政治上的意外事件能够应付自如，应该自行决定他们的行动，而不应该“在当前的时机”等待上头的指挥棒，也不应该“相信他们的市政当局会大慈大悲，大施仁政来保卫它的国家”<sup>①</sup>马克思

---

<sup>①</sup> 亨·海涅：《回忆克莱文格尔夫村的恐怖日子》。见1961年柏林德文版《亨利希·海涅著作和书信十卷集》第2卷第241页。——编者注

的观点是尊重群众，把群众的觉悟看成是社会民主党一切政治行动的决定因素。根据这个观点的精神，政治性群众罢工也同选举法的整个斗争一样，终究不过是用来启发无产阶级的最广泛阶层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一种手段。因此，既然能够想到最近的将来可能采取这类行动，却又能够同时禁止群众研究这个问题——仿佛群众一接触这个问题就是玩火，必须防止群众玩这把火——，这从马克思学说的观点来看，简直是个谜，而且一切现代的和古代的军事战略都不可能解开这个谜。

## 二

把群众罢工理解成为一种受总参谋部的指挥棒指挥的行动这种观点一脉相承，考茨基同志还把罢工非常细致地区分为多种类型：示威性罢工、威逼性罢工、经济罢工、政治罢工。考茨基同志要求严格区分这几类罢工，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宣传得不够明确，群众就可能领会错我们的意图，把我们想举行的示威性罢工出乎意料地搞成不适宜的“威逼性罢工”；而将经济要求，甚至将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同选举运动混淆起来，就只会使后者受到损害。

按照主次对群众罢工这样严格的分门别类和严格的程式化，在纸上是可能有效的，对于一般的议会活动也可能是够用的。可是，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和政治风暴，这些门类就会被生活本身打乱了。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那里，示威性罢工是和战斗性罢工不停地交替进行的，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这正是俄国革命斗争的特征和它的内部动力的源泉。然而考茨基同志拒绝向俄国的例子借鉴，因为“俄国当时正处在革命之中”。在考茨基同志看来，既然俄国发生的事件属于“革命”这个门类，那么俄国的斗争经验对其它国家就没有意

义了。但是，就是在德国，我们愈接近无产阶级与反动统治激烈搏斗的时刻，革命形势的种种表现也就愈适合我们的情况。

然而，我们根本用不着参考俄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那种死气沉沉的模式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既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没有发生过革命的比利时，争取选举权斗争的历史也向我们说明了完全相同的道理。考茨基同志认为，“生活……迄今为止是非常认真的”，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严格区分开来，至少“在西欧的选举权斗争中，迄今为止都是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严格分开的”<sup>①</sup>。考茨基同志错了。

比利时的选举权运动开始于1866年，而且是由一场经济斗争的风暴开始的。最先是矿工举行初级罢工，这就成为举事的信号。接着便差不多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行业都发生了把工资要求列为首位的其它罢工。这些纯粹的工会斗争便在比利时产生了争取普选权的群众运动。工资要求很快就在各地变成了普选权的要求。年轻的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利用经济斗争产生出来的群情激愤，1886年8月15日在布鲁塞尔发动了第一次争取普选权的群众示威。后来又一再发生示威游行。1891年逼使政府提出选举法草案的大规模政治性群众罢工则是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是说，是在五一活动的直接推动下举行的，是一系列工会行动的产物。它也是在矿工巨大的工资斗争、钢铁厂罢工，以及细木、粗木工、码头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罢工之后发生的。在当时的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大胆而坚强的领导下，这些行业性的罢工发展成为第一次进行便取得第一次胜利的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在这次政治性群众罢工由于政府的让步而结束之后，沙

---

<sup>①</sup> 本段和上一段中所引考茨基文章均见于他的《今后怎么办？》。（《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5页。——编者注

勒罗瓦的矿工为了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还继续罢工。1892年整年，比利时的工业一直存在着潜伏性的危机。这场危机使工人甚为不安，引起了几次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并在年底造成大规模失业。1892年11月8日，即议会开幕之日，党在布鲁塞尔的所有工厂组织了一次示威性罢工。这一年的12月，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关心失业工人的疾苦，发动了几次规模巨大的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这样，示威性罢工和“威逼性罢工”，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断地相互作用，便为此后伟大的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和1893年的决定性斗争<sup>①</sup>作好了准备。尽管考茨基同志现在与众不同地指出，“比利时至今仍然没有平等的选举权”，力图以此来缩小这一胜利，但是这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却是驳斥那种把政治性群众罢工——大概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处方——吹嘘为一举就能大获全胜的神效仙方的人的一个论据。不过眼前的事实是：群众罢工无论如何算是一个良方，它使比利时的无产阶级能够进入议会，并在第一次选举时就获得了五分之一的议席；而在这个选举权运动中，经济斗争起了最突出的作用，成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出发点和基础。

而且我们自己迄今的经验，也反驳了考茨基同志的臆断。当前，我们的建筑行业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斗争。<sup>②</sup>按照上述模式，我们就得把这场经济斗争同我们的选举权运动严格地区别开来，甚至为选举权运动着想，最好把这场斗争看成是有害的而尽可能地加以避免。实际上，根本就无法进行那样的区别，而如果进行区别，恐怕可能就是我们所能干出来的最大蠢事。相反，在每一次

---

① 1893年比利时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政治性总罢工以争取普选权，结果是比利时选举权得到了扩大。——编者注

② 1910年4月15日约有160,000德国建筑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鼓动自由而罢工。在有的城市里罢工一直坚持到7月初。——编者注

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上，都很自然地谈到建筑行业开除工人的问题，我们的每一次集会和示威游行都有被解雇的工人参加。建筑资本的暴行使每一句批评现状的话都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句话，在建筑业进行的力量较量有助于提高选举法斗争的情绪；反过来，在选举法斗争中群众的普遍同情和义愤又有利于建筑工人。

我们把选举法斗争与五一活动，也就是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结合起来，把五一活动直接变成争取选举权的示威游行，这同样已经是在事实上冒犯了那个模式。但是，每个人都懂得，这种结合是社会民主党一条简单的策略准则，我们普鲁士的选举法斗争就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主义的五一口号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适当形式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把普鲁士选举权运动当作一场仅仅是政治上的宪法斗争而按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旨并同它结成同盟来开展，那么，把这场运动同所有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严格区别开来当然是合适的。但是这样一来，严格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也会象1902年比利时的群众罢工<sup>①</sup>的命运所证明的那样，不彻底的措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比利时群众罢工的命运也许能够向考茨基同志说明，为什么“另一方面比利时至今仍然没有平等的选举权”。如果我们相反，以纯粹的无产阶级策略为指导，也就是把选举权斗争当作我们一般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局部现象去进行，如果我们通过对一般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关系进行广泛的批判来说明选举权斗争，并且唯独依靠无产阶级自己的

---

<sup>①</sup> 1902年4月14日，比利时开始一场有3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罢工。尽管比利时议院于4月18日拒绝了修改选举法的要求和与此相关的修改宪法的要求，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在4月20日就提前结束了这场罢工。——编者注

力量和自己的阶级行动去进行，那就十分清楚，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斗争“严格分开”是违背斗争的目的的，是肯定行不通的。如果我们不想把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群众关心的事溶合到选举权运动中去，不想依靠这些来支持这场运动，那就意味着人为地挫伤这场运动的元气和势头，并使运动的内容贫乏不堪。

考茨基同志在这里正是为那种迂腐和心胸狭隘的、本来就曾经给我们造成危害的关于选举权运动的观点辩护。当我们在1908年和1909年经历普鲁士选举权运动的第一次示威风暴的时候，<sup>①</sup>工人大众正在饱尝经济危机带来的恐怖。严重的失业笼罩着柏林，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群情鼎沸。但是当时并没有把这场失业者运动卷入到选举权斗争的漩涡中去，也没有把人们要工作、要面包的呼声和要平等的选举权的呼声结合起来，而是与此相反，把失业者问题与选举权问题最严格地加以分开。《前进报》曾费尽一切力气，公开地把失业者从选举权运动中甩出去。按照考茨基同志的模式，这是“疲劳战略”明智的一着。按照我的见解，这就违背了对真正的无产阶级策略最基本的义务，也是促使当时的示威运动很快就停止下来的一种手段。

现在，考茨基同志又主张把选举权运动同群众的巨大经济斗争严格分开，从而在理论上正好支持了党内流行的、说明我们党的领导阶层之所以倾向于最好只让有组织的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观点，同时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把整个选举权运动理解为在上级机构的严格指挥下、按照周密的部署和指示而举行的一种演习，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的群众运动，也不是把它视为从

---

<sup>①</sup> 1908年1月德国工人在柏林举行了许多次为争取民主普选权的集会和示威，遭到警察的镇压。1909年1—3月以及将近年终的时候，在德国的许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要求让凡是年满20岁的人都享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编者注

无产阶级和掌权的阶级国家之间今天的一切矛盾因素中汲取养料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

一句话，考茨基同志在理论上正好支持了我们的领导阶层观点上的偏见和浅薄，而它们本来就妨碍着在德国掀起任何比较大型和比较大胆的群众行动，清除它们乃是当前选举权运动迫切的利害所在。

###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正题吧！

考茨基同志力图把现在在德国是否可以考虑群众罢工这个问题提到一般的战略理论的广泛基础上来认识。他认为，对革命阶级来说，“击破战略”一直到巴黎公社起义都是起决定作用的。但从那以后，它就被“疲劳战略”取而代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把它整个力量的增长和它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归功于这种“疲劳战略”。我们没有理由在现在采用群众罢工从而抛弃这种胜利的战略，转到“击破战略”上去。考茨基同志对这两种战略和对疲劳战略的优点所作的分析，显然是他的整个论证最重要的支柱。考茨基同志宣称他的“疲劳战略”是直接来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sup>①</sup>继承下来的，这使得他发表的意见更加具有莫大的权威。遗憾的是，在这里他的整个论证的依据不过是给众所周知的旧东西安上一个新的名词，贴上一个新的标签而已。如果抛开这个新的惑人耳目的名称，争论的问题就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具体地说，受到考茨基同志如此赞赏、声

---

<sup>①</sup> 卡·考茨基为了论证自己的机会主义的中派观点，在他的文章《今后怎么办？》中援引了弗·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观点并对导言作了错误的解释。——编者注

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的辉煌成就都要归功于它的所谓“疲劳战略”，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看来无非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手段去进行无产阶级日常的阶级斗争，去教育、集合和组织无产阶级罢了。还须指出，这种“新战略”不是巴黎公社以后才打下基础的，而是首先在德国，在巴黎公社之前上十年就已经通过拉萨尔的宣传打下了基础，而恩格斯说拉萨尔在这方面不过是《共产党宣言》的指示的一个执行者。实际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著名导言中，就推荐并阐明了这种策略。恩格斯当时不是象考茨基同志那样提出一般的战略模式，而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推荐的策略包含着什么内容，尤其指明，这是针对哪一种别的策略的。恩格斯说：“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sup>①</sup>因为所有这些变革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革命，所以它们是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完成的。在1848年，人们就是希望能够靠革命的少数人用同样的突然袭击的方法来发动社会主义变革的。

“历史表明”，恩格斯说，“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848年不可能“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sup>②</sup>。这就很清楚，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打下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基础，并且只有在长期不懈的日常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才能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变革的使命。“实行突然袭击的时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597、598页。——编者注



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应该拥护什么<sup>①</sup>。最近五十年来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sup>②</sup>作为这种意义上最卓越的武器，恩格斯强调利用普选权。“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sup>③</sup>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指出，与此同时，从外部来看，旧式的革命的突然袭击成功的可能性也缩小了。“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sup>④</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恩格斯在从军事技术方面对现代条件下的街垒战作了分析之后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由于利用普选权而显示出来的）（括号中的话是我加的——罗·卢·）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象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sup>⑤</sup>所以绝望的资产阶级正试图引诱我们去进行这样的冲突。防止政变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7页。这一句话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这是因为卢森堡所用版本不同。——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603页。——编者注

④ 同上书，第603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第609页。但在“所能支配的范围”之后，卢森堡的引文少了两句话。这是因为卢森堡所用版本不同。——编者注

草案<sup>①</sup>就是明证。

这就是十五年前在苦役监禁法草案<sup>②</sup>公布的时候发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恩格斯透彻、明确、具体地批判了三月革命前想要通过街垒战揭开实现最终目标的序幕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提出特别是利用议会制度的现代的、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斗争来代替它。

现在我要问：恩格斯这个“政治遗嘱”究竟和今天的形势以及我们的群众罢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已经有人打算通过群众罢工来突然实行社会主义吗？还是已经有人想起了要致力于街垒战，致力于“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吗？还是也许已经有人打算竭力反对利用普选权，竭力反对利用议会斗争了呢？

事情很明白：由于考茨基同志引用恩格斯的“遗嘱”作为反对在当前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提出的群众罢工这个口号的论据，使他又一次在想象中胜利地反对了群众罢工的无政府主义的幽灵，而这显然是多梅拉·纽文胡斯早已过时的喇叭声把他吓得突然上阵的。<sup>③</sup>但是另一方面，恩格斯的“遗嘱”，只要它是批判突然袭击

---

① 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刑法典、军事刑法典和出版法修改补充法令草案》。这一法令草案又称作防止改变法案。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警察统治制度。后因受到广大人民反对，在1895年5月11日国会二读时被否决。  
——编者注

② 这是卢森堡的笔误。1910年之前15年是1895年，当年公布的是《防止改变法案》。——编者注

③ 顺便了解德国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待群众罢工的态度是有趣的。据《柏林日报》报道，在降灵节期间在哈雷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这号人在德国似乎还有几打——胡诌了下面这些“至理名言”：

“根据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看法，单纯的示威性罢工是绝对不可取的。不达到既定目的决不复工的严肃进行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则意味着大革命的开始。但是，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来说，在当前的条件下这种革命将意味着一场灾难，因为统治阶级并不是在睡觉……而且事情几乎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发动严肃的群众罢工将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因为工会总委员会不

这种过时的策略的，那就最好不过地反对了考茨基同志本人，因为考茨基同志认为，群众罢工是由“军事委员会”秘密策划出来的一种突然袭击的行动。

有一种明若白昼的情况可以证明，考茨基同志所维护的“疲劳战略”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与考茨基同志同时，爱德华·伯恩斯坦也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在当前的局势下提出群众罢工的口号<sup>④</sup>。他采用和考茨基同志毫无二致的论据，有些地方连用词也几乎一模一样，他赞成就象严格区分工会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那样来区分示威性罢工和威逼性罢工，并且破口大骂那些现在就向群众抛出“威逼性罢工”这个危险口号的“赌徒”。他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代表来说，这样一种策略是不合适的……工人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工人阶级社会地位上升的可靠性，而且对于这个运动来说，持续的、系统的组织工作已经证明是在德国实现这种上升最有把握的手段”<sup>⑤</sup>。“当德国的工人运动在这条它一贯遵循的道路上，也许是缓慢地，然而却是不停和稳重地一步步前进的时候，的确没有理由”<sup>⑥</sup>豁出去冒群众罢工的风险。在这里，是伯恩斯坦，而不是恩格斯在替考茨基同志

---

喜欢搞严肃的群众罢工，而总委员会不喜欢干的事情，党是干不了的……

所有的代表都明白，严肃的群众罢工在目前只会恶化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而示威性罢工则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

可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结论：群众罢工是一次性的大罢工，是“大革命”，它能否举行取决于总委员会对它的“喜欢”与否。而且，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在今天人们会认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的“一场灾难”。——卢森堡注

④ 爱德华·伯恩斯坦：《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月刊》1910年第1期第428—488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第486页。——编者注

⑥ 同上书，第487页。——编者注

的“疲劳战略”辩护。那么这种“疲劳战略”与恩格斯的“遗嘱”在含义上是很不相同的。

象当前在普鲁士选举法斗争中引起辩论的群众罢工，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把它和议会斗争对立起来，而是把它看作是议会斗争的补充，甚至认为是争取议会权利的手段；也没有把它与训练、教育和组织群众的日常工作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是促进训练、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的一种卓越手段。因为考茨基同志现在把我们的久经考验的议会斗争的策略同人们设想的这种群众罢工对立起来，所以实际上他对日前和日前局势所推荐的简直就是议会主义，并不是象恩格斯那样，反对空想的街垒社会主义，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为了取得和行使政治权利而采取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群众行动。

事实上，考茨基同志在向我们强调指出，他的“疲劳战略”的主要支柱就是即将到来的帝国国会选举。可以指望，这次国会选举将会带来万般福祉。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占压倒优势的胜利，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会给我们奠定一个更加广阔的斗争基础。选举本身就能创造出我们可以考虑采用“击破战略”，也就是可以考虑干脆采取群众行动的条件，也会给“政府的整个统治制度造成灾难”。它现在就已经把“通向伟大的历史形势的大门的钥匙”装在我们的口袋里了。一句话，即将到来的帝国议会选举使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充满希望，我们将来凭选举就能取得的胜利已经稳操在“口袋里”，如果现在还要考虑什么群众罢工，那我们的轻率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我不认为用这样明朗的色彩对党描绘我们在帝国国会选举将要取得的胜利是有益的和合适的；我反而认为，我们一如既往全力以赴、而不是抱着过分的期望去迎接帝国国会选举，是更加明智的。至于我们是否胜利以及胜利的大小，那我们要等着瞧。事先

就纵情享受未来的胜利的欢乐，这根本就不是严肃的革命政党的本色。我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看法：最好是，不到时候就根本不要提诸如我们的票数会增加一倍之类的想当然的前景。

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未来帝国国会选举的胜利与今天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考茨基同志认为，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然而这个新的局面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则暂时还不清楚。如果我们不是陶醉于我们会突然获得多数议席的虚幻的希望之中，如果我们仍然呆在现实的土地上，并亲自正视一下关于我们的国会党团的席位将增加到大约一百二十五个的设想，那就会明白，这暂时还完全不会使政治情况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在帝国国会仍然是少数，仍然面对着一个抱成一团的反动的多数。考茨基同志自己也许都不相信，我们在选举上的胜利居然会对普鲁士的反动派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从而使他们突然间心甘情愿地承认我们在普鲁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既然这样，完全“新的局面”就只有一种内容了，这就是政变，就是废除帝国国会选举法。如果这样，考茨基同志认为，那我们就将采取包括群众罢工在内的一切手段。竭力反对现在采取较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疲劳战略”，是与推测在政变时我们才会采取巨大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未来的推测与一切诸如此类的推测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都是对遥远未来的渺茫的希望。如果没有发生政变，而是仍然在迂迴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磨蹭——考茨基同志自己一定会承认，这种结果是帝国国会选举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那么，“新的局面”和我们的大规模行动的全部联想也就意外悲惨地幻灭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针对帝国国会选举和政变来确定我们的策略，如果我们决不是根据对未来的一定联想去进行准备，那么，不管在下一次选举中我们获得多少议席，不管选举结束后有没有

发生政变，我们都会相当冷静。当前，只要我们时刻忠于我们的职责，抓住每个面临的形势，最大限度地唤醒群众和教育群众，并熟悉最新形势及其最新要求，那我们就会在事变的每个发展阶段都能得到好处。相反，如果跟考茨基同志那样，要以明年的、尚须首先取决于一次可能的政变的“击破战略”的伟大行动的前景来论证今天的全部“疲劳战略”，那么我们的“战略”就有点象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战略了。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曾经这样天才地刻画了这些人的特征：对于当前自己的犹豫不决和失败，他们习惯于用在下一次机会采取伟大行动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 nous verrons！〔走着瞧吧！〕’”<sup>①</sup>。

#### 四

另一方面，“疲劳战略”将其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帝国国会选举上，考茨基同志以这个战略的名义提出的抗议也为时过晚。他不应该到了现在才针对群众罢工的讨论发出警告，而是早就应该针对通过一月份普鲁士党代表大会<sup>②</sup>在普鲁士兴起的选举权运动中的街头示威，甚至是针对这一运动的整个方式发出警告。这次普鲁士党代表大会已经着重阐明了指导整个选举权运动的观点，即：实现普鲁士的选举改革不能通过议会手段——也就是既不能通过议会内的活动，也不能通过热闹堂皇的议会选举——，而唯有通过议会外的、全国各地的激烈的群众行动。在大会上，报告人在热烈的掌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6页。——编者注

<sup>②</sup> 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910年1月3—5日在柏林举行。——编者注

声中宣告：“现在是开展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的时候了，否则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将会遭到凄惨的愚弄和欺骗。而更为严重的是，人民如此受骗，我们自己将难辞其咎。”<sup>①</sup>

布勒斯劳、柏林、斯潘道-东哈弗尔区、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和马格德堡的代表，各自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全都要求使用街头示威和群众罢工这些更加激烈的手段。后来一致通过的决议答应在选举法斗争中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报告人在他的讲话中对决议作了这样的解释：“我的决议在措词上没有提到街头示威或政治性群众罢工。但是，这个决议应该意味着——我希望大会也是这样理解——，我们决心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至于何时使用这些手段，“这始终取决于我们的启蒙教育工作对群众所起的发动作用有多大。在选举法斗争中，我们的工作首先应该是为了发动群众，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上面。”<sup>②</sup>

因此，自从普鲁士党代表大会以来爆发的示威游行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和可能发生的群众罢工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把“群众发动”到可以使用最激烈手段的一种方式。于是便有人怀疑，这些示威游行已经越出“疲劳战略”而进入“击破战略”的范围，并且直接向后者过渡。

产生这种怀疑还有另一种原因。如果说，按照1895年恩格斯“遗嘱”的精神，避免任何可能与军方发生冲突的事是属于“疲劳战略”的一部分，那么街头示威本身就已经是，并且比群众罢工更加是与这种“战略”决裂了。这样一来便出现越发不可思议的情况：在考茨基同志方面还是赞成示威游行的，甚至还承认有必要“首先要继续使用街头示威的手段，不要减弱它的声势，相反，要使它的

---

<sup>①</sup> 引自海·施特勒贝尔就选举法问题发表的讲话。《1910年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0年柏林德文版第224页。——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8页。——编者注

声势越来越浩大”。可是他要的是不升级、不激化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应当“声势越来越浩大”，但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地往前走”；应当使声势“不减弱”，但不应当激化。一句话，示威游行应当不朝前走也不往后退。

这是对示威游行，总的来说是对群众行动的一种纯理论的观点，它既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实际条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活生生的现实情况。如果我们号召大量的无产阶级群众上街游行；如果我们向他们说明，在这样的局势中，要达到目的，唯有通过他们自己的群众行动，而不是通过议会行动；如果我们能够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发动起来；如果街头示威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群众的热情和战斗情绪越来越高涨，同时与执政当局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恶化越来越严重，与警察和军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么，在群众中就会自行产生这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示威游行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是群众行动的开端，而不是群众行动的终结；同时它本身也使局势尖锐化。如果由我们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要求给以下一步的指示和指出下一步的前景，那我们必须向运动指出这个前景；或者，如果我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示威运动也迟早要失败，它一定要失败。

考茨基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他援引了奥地利的情况：“在那里，选举权斗争持续了十二年以上。早在1894年，奥地利的同志就考虑过使用群众罢工，然而他们却能够在不使斗争升级和激化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出色的群众运动坚持到1905年……奥地利的同志在他们的选举权斗争中从来都没有超越街头示威的界线，然而他们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失败。”

象考茨基同志曾经弄错了比利时选举权斗争的事实那样，他也弄错了奥地利的事实。



其实，奥地利的同志并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出色的群众运动”坚持十二年以上，相反，这场运动从1897年至1905年，也就是差不多有八年之久完全处于低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奥地利的同志在这段时间举行的各次党代表大会找到可靠的佐证。从1898年到1905年，诉说群众行动失败，诉说选举权斗争处于低潮的怨言，成了各次党代表大会固定的主调。早在1898年的林茨代表大会上，维纳斯基同志就已指责在关于党的策略的报告中“几乎没有谈到普选权”，并且说明，必须“再次向这个堡垒发动进攻”<sup>①</sup>。在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上，也可以听到同样的怨言和要求。在1900年的格拉茨代表大会上，埃墨林证实：“从1897年以来，我们就完全停止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sup>②</sup>斯卡雷特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这次大会成为一个掀起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大会”<sup>③</sup>。珀勒策尔反映说：“同志们说：自从我们有了第五等级的选举权<sup>④</sup>以后，就好象将军们被施过催眠术似的，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我因此认为，必须在各地举行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示威集会。”<sup>⑤</sup>巴特尔宣称：“在党中央和中央工会的宣言中小心翼翼地发出了开展选举斗争的号召，我们在地方上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满以为，终究会有点动静了。但是到头来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们还是停留在宣言发表前那个地方。”<sup>⑥</sup>所有发言人说的都是同样的

---

① 《1898年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8年维也纳德文版第62页。——编者注

② 《1900年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格拉茨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0年维也纳德文版第79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74页。——编者注

④ 1896年奥地利政府在工人罢工和示威的压力下对选举法作了修改，在已有的4个选举等级之外加了一个第五等级，扩大了选民范围，使社会民主党代表第一次有机会进入议会。——编者注

⑤ 同注②第75页。——编者注

⑥ 同上书，第76页。——编者注

意思。1901年在维也纳、1902年在奥西希和1903年又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全都重复了同样的怨言。在1904年的萨尔茨堡代表大会上终于刮起了对选举权运动停步不前表示不满的大风暴。珀勒策尔疾呼说：“请想一想，这样究竟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同志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说要给点厉害看看，那我们就得说到做到……该是全力以赴坚决行动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光吓唬不动弹已经够久了。”<sup>①</sup>舒迈尔证实：“不容否认，在我们的队伍中，情绪已经低落，战斗热忱的火焰已经减弱。”<sup>②</sup>大家意志之消沉，人们情绪之低落，致使舒迈尔在离1905年11月的胜利风暴的到来还不足一年的时候仍然在萨尔茨堡这样宣布：“我今天确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距离取得普选权的日子都更为遥远。”<sup>③</sup>弗罗伊德利希确认，笼罩着“群众的情绪是对政治生活的悲观失望和漠不关心……其波及面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sup>④</sup>。佩尔纳施托费尔认为，甚至连街头示威都再也搞不起来了。人们要求，“我们要走上街头，要敦促我们的党员着手举行一种我们曾经举行过的示威游行。可我们现在却板着脸说，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行动将会遭到失败”<sup>⑤</sup>。维纳斯基强调说：“我们已经等待七年了。我认为，为了党的利益，现在是非结束这种等待的岁月不可了。”<sup>⑥</sup>

由此看来，在奥地利持续了十二年之久的“出色的群众运动”和没有减退的热情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当然，责任不在党的领导身上。阿德勒在林茨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详尽地指出了其中的真正原因。他说：“你们要求……，应当开展一场选举权运动……，显然，

① 《1904年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萨尔茨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4年维也纳纳文版第101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104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105页。——编者注

④ 同上书，第105页。——编者注

⑤ 同上书，第107页。——编者注

⑥ 同上书，第112页。——编者注

这是一场要靠象我们在多年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决心才能开展起来的运动。对此我向你们声明，今天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明天我们是不是必须这样做，这我就知道了。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这样做，这是明摆着的。这样的运动不是人们想搞就搞得起来的；只有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性才能产生这样的运动。”<sup>①</sup>从此以后，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都不得不重复同样的话，因为这个可以重新在奥地利开展争取选举权的群众运动的“明天”直到1905年才到来。<sup>②</sup>当时，在俄国的迫使政府公布了10月30日的变法宣言的胜利的群众罢工直接影响下，正在出席代表大会<sup>③</sup>的同志们中止了会议发言，走上了街头，决心“学习俄国的榜样”，就象他们十年前决心学习“比利时的榜样”一样。

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事实上只发动了两次群众运动的猛烈攻势就实现了选举改革：一次是九十年代初在比利时的群众罢工推动下发动的，一次是1905年在俄国的群众罢工推动下发动的。考茨基同志既否认比利时的群众罢工又否认俄国的群众罢工是普鲁士的榜样，为的是要我们把奥地利在这两次攻势之间的八年，即选举权运动作为群众行动实际上完全处于低潮的那一时期作为样板。在赢得塔菲<sup>④</sup>首相提出的普选权的等级<sup>⑤</sup>以及最近赢得的选举改革这两件事情上，奥地利的群众运动都是与举行群众罢工的决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考茨基同志大概也知道，在1905年甚至已经极其认真地做好了群众罢工的准备，其所以没有举行只是因为

---

①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在1898年5月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编者注

② 1905年9月奥地利工人举行第一次群众罢工以争取普选权。——编者注

③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5年维也纳代表大会。——编者注

④ 爱德华·塔菲（1833—1895）——1868—1870年、1879年两次任奥地利首相。——编者注

⑤ 即本卷第235页注④所说的第五等级。——编者注

在这两次事件中，倾向于进行选举改革的政府很快就作出了让步。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奥地利，每当群众运动低沉之后想要寻找使它重新活跃起来的办法的时候，也同样会重新出现群众罢工的口号。在格拉茨和萨尔茨堡，对选举权运动的辩论变成了对群众罢工的辩论。因为同志们都体会到雷泽尔在格拉茨说的话：选举权运动“只有在决心将它进行到底的时候，方能发动”<sup>①</sup>。显然，光有决心还不够，因为不管是群众罢工还是群众示威，如果政治局势和群众情绪没有经历过相应的升级，都不可以人为地凭空制造出来。但是也不应该幻想，以为没有升级，没有进行最尖锐的斗争的决心，倒可以使群众运动和示威游行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

我们自己在普鲁士开展的选举权运动迄今所走过的道路就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小。两年前，尽管无产阶级群众的热情完全没有低落，但是已经开始的第一次示威运动没有多久就停下来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在今年，运动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每当在柏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时候，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它是某些人怀着“这就把事情了结吧！”的想法而举行的。6月3日在御苑举行的气贯长虹的示威游行是2月13日示威游行向前跨出的一大步。它结束后，柏林群众的情绪更为高涨，因此，如果党确实希望示威游行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的话，它就有责任抓住下一次合适的机会，发动新的、更为有效的示威游行。而且在3月18日或者最迟在3月18日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出现了一次这样的极好机会。可是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为了避免举行这样一次示威游行，3月15日在柏林组织了三十几个集会。从当时的群众情绪来看，而且又是在3月6日之后，这些集会意味着可悲的退却。对于群众运动来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今年比

---

<sup>①</sup> 同本卷第235页注<sup>②</sup>第77页。——编者注

以往任何一年都更有意义，更具现实性，它是德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是借以唤醒群众、回顾政治、分析历史、无情批判资产阶级政党的大好日子，但是在柏林根本没有纪念3月18日这个日子。没有举行示威游行，甚至也没有召开群众大会，也没有发表纪念文章。《前进报》发表了一篇无精打采的社论，《新时代》则只字不提。这就是人们利用大好机会和大好的群众情绪举行“声势越来越浩大的示威游行”的方式。然而，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并没有明确下定要把运动不断地推向前进的决心，并没有下定不管后果如何绝不畏缩不前的决心，那么，每当出现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机会时，就会担惊受怕，而宁愿躲开这种机会。

若以柏林的群众和各省的党员同志的情绪来衡量，3月15日在柏林举行的、使3月18日白白过去的集会是直接向后倒退了一步。其实在柏林，同志们也尽量利用了3月18日这个机会，群众罢工的口号也越来越响亮。倘若这里的战斗情绪没那么高，决心没那么大，那我们就肯定不会有4月10日的示威游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多么确切。我们4月10日在柏林取得了反动派的伟大胜利，争得了上街游行的权利，这无疑是3月6日的成果，它意味着比3月6日又前进了一步。这时候，如果党本来就想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并使它“声势越来越浩大”，那么，对于党来说，竭尽一切可能利用新取得的上街权利就是不言而喻的义务。应尽这种义务的下一次机会就是五一。但是，我们在这一天看到的是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全国各地，即使是最小的地方，5月1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举行了街头示威；在较大的城市——多特蒙特、科伦、马德堡、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索林根、基尔、斯德丁、汉堡、吕贝克——这一天的街头示威在规模上和声势上都是空前的。而且，无论是从选举权运动来看，还是从庆祝五一来看，都是实实在

在在地前进了一步。然而，在柏林却完全没有举行街头杀威，既没有举行得到许可的也没有举行未得许可的游行，甚至连作这样的打算都没有。在柏林的全部庆祝活动就是开了六十个大会，这再一次涣散了柏林工人饱满的战斗情绪。

在议会审理选举法草案期间——在贵族院<sup>①</sup>和国会之间来回审理——有几个月的时间和机会举行示威游行，当时群众的情绪并没有任何低落，但是这时候却出现非常明显的迹象，仿佛我们就要过美美的“夏季休假”似的，而在夏季休假期间，要折腾我们的已经是别的事情了——考茨基同志向我们指出了即将来临的帝国国会选举——，要让示威运动平静地而且安安稳稳地上床睡觉去了。这是事物不可避免的逻辑。使党陷于进退维谷的，并不象考茨基同志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我的应受责备的宣传，而是因为客观事态。要么是这种：如果愿意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实现“不让普鲁士安宁”的口号，不断壮大示威游行的声势，那就必须抱定把事情推向极端的决心，就不要回避可能出现的局势激化，就要利用一切重大的经济冲突为政治运动服务，那就必须把群众罢工的口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它在群众中家喻户晓，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群众长久地保持自信、战斗热情和勇气。要么是这种：如果只想规规矩矩地按照命令举行几次短促的检阅式的示威游行，以避免斗争的激化，并且最终还是把人们拉回来为一年后的帝国国会选举进行久经考验的准备，那就最好不要侈谈“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不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手段”，不要在一月份的《前进报》上制造一阵震耳欲聋的斗争叫器，更不要在议会以群众罢工相威胁。还有，人们也不应当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将会使示威游行长期坚持下去，将会使它声势越来越大。不然的话，我们

---

<sup>①</sup> 由德国皇帝任命容克贵族组成。存在于1855—1918年。——编者注

就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又一次有点使人想起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法国民主派所作的描述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戏也就停止了，象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sup>①</sup>

## 五

总的来看，德国的现状究竟怎么样呢？在德国，我们终于第一次掀起了蓬勃的群众运动，第一次逾越了单纯的议会斗争的形式，惊动了地狱的幽灵<sup>②</sup>。与奥地利近十年的情况相反，我们面临的不是在普遍冷漠中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掀起群众行动的艰巨任务，而仅仅是值得花工夫又很自然的任务，即充分利用群众的昂扬斗志和激动的情绪，向群众行动提出政治口号，把这些口号变为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指明道路，走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前进。由于这种形势，也就同样最自然不过地要把群众罢工的口号摆在重要的地位上，党的责任就是要公开而明确地讨论这一口号，把它当作迟早会从示威运动的高涨和反动派的顽抗中产生出来的手段。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突然地、今天或明天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4—155页。——编者注

<sup>②</sup> 这句话来自拉丁语成语：“假如我不能感动上帝，我就要去惊动幽灵”。意思是采取各种手段。这里指掀起群众行动。——编者注

就命令在普鲁士举行群众罢工，也不是为了下个星期就“强求”举行群众罢工，而是为了结合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结合对普鲁士德国整个形势的考察，从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使群众明白，他们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盟友，不能依靠议会行动，而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依靠自己坚决的阶级行动。此外，群众罢工的口号并不是一种挖空思想出来的、有专利权的、人人夸奖的克敌制胜的手段，而是从政治教训和历史教训方面对当前的德国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而得出来的。

用这样的方式宣传群众罢工，就能够最分明地考察德国的整个政治局势、阶级和政党的营垒，就能促进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提高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唤起他们的理想主义，就能给无产阶级开拓新的视野。这样，讨论群众罢工就会成为一种卓越的手段，它可以唤醒无产阶级中漠不关心的阶层，把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中央党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使群众做好准备应付局势的任何变故，又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为帝国国会选举做好准备

如果考茨基同志现在兴师动众讨伐这场宣传，宣布讨论群众罢工是危险的，并力图使整个选举权运动都针对帝国国会选举这个唯一的目标，那就简直是要把已经在新的轨道上高歌猛进的党的运动重新拧回到旧的、已经踩坏了的、单纯议会斗争的轨道上去。

但是，如果考茨基同志在德国向我们鼓吹议会乐观主义和议会行动，那他则是多此一举。我们党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就是把应付帝国国会选举当作主要行动来安排的，而我们的策略本来就过多地受到国会选举这种考虑的左右。一提到帝国国会选举即将来临，周期性的关于策略问题的辩论就会被指责一番。《前进报》就由于考虑到帝国国会选举而在1907年奉行了完全错误的政策。它把一切火力都对准自由党，而对中央党则因为它在议会是反对派而



让它逍遥自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报纸，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地方报纸没有效法它，并毫无顾忌地对中央党进行了斗争，我们才成功地保住了我们的阵地。我们党的领导机构的主要目标本来就是帝国国会选举。例如，每当举行帝国国会选举时，都理所当然地要在全国开展不倦的宣传活动，出动所有的演讲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小镇召开不计其数的集会。可是在今天，在选举权运动期间，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开开会，发发传单，这不过是一些最低限度的宣传。又比如，由于议会主义观点作怪，没有利用今年的3月18日来开展宣传，而在3月15日举行的那些柏林集会，则是为了使这种活动不致和革命联系起来，而去和普鲁士众议院三读〔选举法提案〕联系起来。由于老是考虑议会斗争，加上议会斗争的习惯，结果使我们严重忽视了对共和思想的宣传，而现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进行这种宣传的。

更进一步地使我们的整个策略转向帝国国会选举，更进一步地用议会选举来吸引群众，果真是我们现在在德国的当务之急吗？

我看不见得。凡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危险”，都只是存在于那些未能摆脱对群众罢工抱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们的想象之中。考茨基同志进行反对的实际效果，不过是给党和工会的那些对无所顾忌地开展群众运动感到不快，希望给予抑制，最好是尽快回到议会和工会的日常斗争的舒适的老路上去的分子，提供了一道理论上的屏风而已。考茨基同志引用恩格斯的话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这些分子可以为自己的行径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用来使他自己希望其声势越来越浩大的示威运动又很快就遭到扼杀。

但是很清楚，现在的情况与此相反，选举权运动进一步的前景恰恰要求继续和更加有力地开展群众行动。选举法草案被议会否决，这意味着政府的失败和保守党与教会的联盟的失败。敌人的行

动暂时没有什么新的招数，无产阶级必须更加有力地行动起来。敌人正在退却，我们应该进攻。不要宽慰地期待一年半以后在选票箱旁进行辉煌的报复，而要在现在就接二连三地进攻；不要采用“疲劳战略”，而是要在全线展开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再说一遍：如果党员群众领会和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领导人也会加以注意的。“群众正在这样做”。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小段与当前情况不无相似之处的历史吧。考茨基同志否认近来使用过群众罢工的其他国家可以作为普鲁士效法的榜样。俄国不行，比利时不行，甚至奥地利也不行。“对于普鲁士当前的局势来说，援引其他国家的榜样”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考茨基同志为了请到我们的策略的合适的老师，自己却跑到古罗马人和汉尼拔那里去了。他在那里，在费边身上，在据说是运用“疲劳战略”取得胜利的这个缓进者身上，找到了德国无产阶级应该得到启迪的榜样。我觉得，追溯到古罗马人身上似乎走得远了一点。但是，既然考茨基同志这样做了，我无论如何想证实一下，在这方面所举的事实也是不完全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蒙森<sup>①</sup>已经戳穿了有关缓进者不得不采取的和取得了胜利的战略的神话。他指出，罗马兵力的“自然的和正确的使用”，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是坚决的进攻，费边的迟缓的态度——蒙森称之为“讲究方法的无所作为”，并不是某种深远的和由实际情况决定的战略部署的表现，而是元老院整个保守的、老头儿政策的结果。蒙森说，“昆图斯·费边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人，他稳重而刚毅，这被不少人认为是迟疑和固执。作为美好的古老时代以及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命令在政治上的无限权力的狂热崇拜者，他期望，除了通过献祭和祷告之外，还通过讲究方法的作战来求得国家的福祉。”蒙森在另

---

<sup>①</sup> 泰奥多尔·蒙森（1817—1903）——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编者注

一个地方又说：“大概是缺少一位善于领导又善于从其相互关系来掌握情况的政治家。到处都一样，不是管得过多，就是管得过少。如今战争打起来了，人们都听任敌人去决定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在很有理由可以充分相信自己在军事上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目标和步骤还是不知所措。”进军西班牙和非洲是上乘之策，“但是忽视了利用优势的准则也就等于忽视了荣誉的准则”。

“由于这种缓进，罗马的西班牙盟友遭受了第二次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正如缓进本身不难避免一样，”“尽管罗马方面采取守势和把成功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断绝敌人的粮秣上是聪明的战略，但是这却是一种罕见的防守体系和饥饿迫降体系，结果使敌人在同等数量的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长驱直入，横扫了整个中亚，并且通过最大规模的、有条不紊的搜集而备足了过冬的粮草。”

“最后，至于罗马军队，人们并不能说，是它迫使统帅采取这种打法的。它虽然有一部分是应征入伍的后备军，但是它的骨干力量是过惯了戎马生活的阿米努姆军团。这支军队虽然当时吃了几次败仗，但是远未丧失士气，对他们的统帅——‘汉尼拔的走狗’要他们执行极不光采的任务非常愤怒，强烈要求率领他们去御敌作战。因此，这位固执的老头在公民大会上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按照这种行文的精神，蒙森还写了很多。他直率地指出：“拯救罗马的并不是这位‘缓进者’，而是罗马的盟国坚定地顺从命运的安排。此外，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地中海西部国家对这个腓尼基人<sup>①</sup>的民族仇恨。”这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甚至连“元老院的多数都不顾由于当时的事件而给费边的缓进体系造成的某种合法性，而坚决放弃这种缓慢的但肯定会使国家趋于灭亡的打法。”<sup>②</sup>

---

① 指汉尼拔。——编者注

② 泰奥多尔·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3版第1卷第551—577页。——卢森堡注

这就是费边这个缓进者取胜的“疲劳战略”。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我们的学校里被用来对中学生进行说教的传奇，目的是用保守的思想教育他们，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造反”，谆谆教诲他们，作为世界历史的精华要牢记国民军行军时的箴言：“不要慌，不要忙。”据说这个传奇在今天，在这种形势下，也适用于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可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命运安排。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认为，高贵的昆图斯·费边的原理，即除了献祭和祷告之外，还期望通过讲究方法的作战来求得国家的福祉的原理，无论如何是在我们党和工会的最高元老院中受到热烈拥护的。就我所知，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中，不乏迟疑不决的情况，而象年轻人那样的大胆狂妄和操之过急的情况却是不多见的。阿德勒同志在格拉茨举行的奥地利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说过：“鞭策总是有好处的，我承认，对于我来说，会上那些抱怨事情做得太少的发言，远比那些劝告要明智和审慎的发言更加中听。我们已经做到了审慎，也许是做过了头了。我们不需要您来刹车！”<sup>①</sup>我想，我们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考茨基同志用他的笔和他的历史知识来鼓吹费边这个缓进者的战略，至少是一种浪费。考茨基同志，我们不需要您来刹车。

发表于《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期第257—266、291—305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44—377页。

（曾广声译）

---

<sup>①</sup> 同本卷第235页注<sup>②</sup>第83页。——编者注

# 理论和实践\*

(1910年7月23、29日)

—

在我们当前这场争论中，引起各界党员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在党刊上，特别是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给有关群众

---

\* 出人意料的巴登声明激起了许多党员和我们自己的强烈愿望：不要在《新时代》上刊登任何会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争吵的文章。此外，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在巴登事件的影响下，我们的读者对于象这里进行的讨论似乎只有淡薄的兴趣。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推迟刊登卢森堡同志的文章是有益的，并用以下编辑部的声明向她解释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声明后面还附有考茨基的公开致歉信。

“读者们：我们收到了卢森堡同志一篇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详尽的答辨文章。它的第一部分本来要发表在这一期上，并且已经排好了版。征得卢森堡同志的谅解，我们暂不发表了，因为在当前这个时刻，面临着巴登邦议会社会党党团一部分人令人发指的挑衅，面临着他们对党纪的卑鄙破坏和他们的卑躬屈膝的行径，我们党内一切革命的和真正具有共和思想的分子的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地站在一起，把所有同机会主义的分歧都搁到一边去，当然对机会主义来说，民族自由党人的好评比德国拥护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的意向和敬重更为重要。 (编辑部)”

顺此，我感到有必要在今天就来更正一个从推迟发表的卢森堡同志的文章中得到澄清的错误。引起我疑虑的关于宣传共和思想的那段文章，并不是象我认为的那样尚未发表，而是加上了新的前言和结束语，作为专文发表在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上了。因此我误以为没有发表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据了。

这件事情丝毫也改变不了我们之间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分歧的消除必须推迟到一个有利的时机。 (卡尔·考茨基)

卢森堡同志拒不同意推迟发表她的文章。她觉得她的事情极其重要，容不

罢工的讨论设置过障碍的问题。考茨基同志坚持说，他“当然是从未想到过要‘禁止’讨论群众罢工”<sup>①</sup>，从而否认有这么回事。考茨基同志在这里是存心误解我的意思。不言而喻，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考茨基同志的禁令——个别的编辑是什么也禁止不了的——，而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的禁令，就是说，指考茨基同志在他们职权范围内，在《新时代》编辑部不得不执行并不得不取消他原先要采用我的文章的决定那个禁令。至于另一个问题——宣传共和国问题——，考茨基同志也否认他曾经给我设置障碍，而且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涉及到我的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中有关共和国的一段，“其措辞”，《新时代》编辑部“觉得欠妥”。后来是我自己将我的文章<sup>②</sup>发表在多特蒙特《工人报》上。“但是要在这篇文章中找出有关共和国的那一段将是徒劳的。”<sup>③</sup>考茨基同志也“没有发现”我将这段文章发表在别的什么地方。他因此得出结论，“这么一来，卢森堡同志说我们胆小地隐瞒原则的指责就缩小到我们不赞成发表她的这一段文章了，自那以后，她便自愿地不予发

---

得半点儿推迟。要是卢森堡同志的辩论对手不是《新时代》的编辑本人的话，那我们就会由于卢森堡同志的反对而不再继续推迟发表这篇在当前这个时候只会损害无产阶级事业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如果现在还特别受到器重，其作用只会分散同志们此刻必须一致地集中在巴登的“造反者”身上的注意力。同时，这篇文章的宗旨是诋毁党执行委员会，诋毁《前进报》，尤其是诋毁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团结一致地做其后盾以对付违纪分子的同志的。

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甚至连作出单纯推迟的决定也不愿意。同志们将会理解，考茨基何以认为现在答复卢森堡同志是一个错误。现在是决定其它问题的时候。对于卢森堡同志来说，免不了要和她彻底清算，批驳她的错误主张，揭露她的引证方法。但是，这样做的合适时机，只有在整顿了巴登的违纪现象之后才会到来。目前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编辑部）——卢森堡注

①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见《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34页。——编者注

② 「下一步做什么？」。《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89—298页。——编者注

③ 同注①第337页。——编者注

表。采用这样的战略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奥克塔维娅！”<sup>①</sup>考茨基同志在叙述使我十分丢脸的事实的时候已经成为罕见的错误的牺牲品了。实际上，问题完全不是在于“一段文章”，也不在于它的“措辞”可能有什么危险性，而是在于这段文章的内容，在于提出共和国的口号和为此而作的宣传。因此，考茨基同志应该允许我这个由于他的情况介绍而陷于难堪境地的人，请他亲自来充当主证人和解围人，考茨基在收到我那篇论述群众罢工的文章之后，是这样写信告诉我的：

“你的文章很好，而且很重要。我并不同意全部观点，同时保留答辩权利。今天我没有时间在信里答辩。这样吧，如果你把第29页至结尾部分删去的话，那我将很乐意采用你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部分登出去。它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在我们的纲领中并没有谈到共和国。所以，这并不是由于差错，也不是由于编辑部的嗜好，而是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就连哥达纲领也没有谈到共和国。而马克思，尽管他批判这个纲领，在他信中也承认，公开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不合适的<sup>②</sup>。恩格斯谈到过爱尔福特纲领中同样的事。<sup>③</sup>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哪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都曾认为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不多说了，总之，你所要做的是至今一直受人反对的崭新的宣传。但是就这种新的宣传性质来说，是不宜对它进行公开讨论的。你要用文章来宣布，你要自行负责、单枪匹马地开展党所始终反对的那种崭新的宣传和行动。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用这种方式行事。任何个人，无论地位多高，都不应当自行其是地造成可能给党带来无法估量

---

① 同第248页注①。——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2页。——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6页。——编者注

的后果的既成事实。”

同样意思的话还差不多写了两页信纸。

下面是那段会给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的“标新立异的宣传”的全文：

“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都获得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是保证我们在目前赢得最广泛的阶层热烈拥护的最近目标。但是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现在必须宣传的唯一目标。在我们为了回敬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选举改革玩弄的卑鄙拙劣行径而提出了真正民主的选举制的口号时，纵观政局全貌，我们还仍然处于守势。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是任何真正的斗争策略的古老而有效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要在宣传中掉转枪头，全线转入猛烈的进攻，以回击反动统治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挑衅。但是，我们只有在宣传中明确地维护我们政治纲领第一条提出的政治要求，即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可以最明显最清楚地，可以说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迄今在我们的宣传中，共和国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甚小。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我们党要防止德国工人阶级对共和国产生资产阶级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例如对法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曾经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至今还在流行。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开始就坚决彻底地不是针对阶级国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形式和弊端，而是针对阶级国家本身；它没有把精力分散于反军国主义，反君主专制主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不断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成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弊端和任何形式的死敌，不管它们是披着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外衣。经过四十年这种彻底的启蒙工作，终于使德国受启蒙的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今天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堡垒。只不过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



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

然而，正因为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四十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产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由于强调社会民主党共和主义的性质，我们首先便多赢得了一个机会，能够具体而通俗地说明，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原则上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阵营。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惊人的没落也特别表现在对君主政体的屈膝臣服上，在这方面，自由资产阶级要比保守的容克更胜一筹。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德国内外政策的整个情况表明，君主政体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头目。毫无疑问，个人统治的半专制君主政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年甚于一年地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扩充舰队政策的动力，推行世界冒险政策的灵魂，就象它在普鲁士是容克的庇护所一样，在全帝国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普鲁士政治落后性的堡垒，最后可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共和国的口号今天在德国大大超出了表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美梦，大大超出了坐在云端清谈政治的境况，它是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反对海上军国主义，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政策，反对容克统治和普鲁士化的实际战斗号召，它仅仅是我们为反对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局部现象而进行日常斗争的结论和简明的概括。恰恰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为此指明了方向：容克贵族在帝国国会搞专制主义的政变威胁，帝国首相在普鲁士邦议会对帝国国会选举权进行无耻攻击，以及在普鲁士选举法问题上通过贝特曼提出的改革方案来兑现‘国王圣旨<sup>①</sup>’。

现在我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在这里进行这种“崭新的宣传”了，因为这段文章已经发表，而党并没有因此在其肌体和心灵上蒙受哪怕是最小的损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虽然对删去有关共和国的章节感到遗憾，但又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尽管如此，考茨基同志最后还是把关于群众罢工的整篇文章退回给我。此后，我将被他严禁发表的“第29页至结尾”部分加上前言和结束语，以《播种季节》为题，一字不改地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在3月25日布勒斯劳《人民哨兵报》上。接着，许多党报，我记得的有多特蒙特、不来梅、哈勒、爱北斐特、柯尼斯堡和图林根的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一切肯定不是我的英雄行为，而只是我的倒霉，因为考茨基同志阅读那段时间的党刊完全象他在考虑党对待共和国这个口号的态度时一样粗心。也就是说，要是他把事情考虑得更加成熟些，那他就可能不会在共和国这个问题上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反对我了。考茨基同志引证的恩格斯那篇文章是批判党执行委员会拟定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在该文的第二章“政治要求”中，恩格斯指出：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决不能达到。”<sup>②</sup>

恩格斯指出了“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sup>③</sup>，从而论证了申明社会民主党政治要求这个“主要目标”是当务之急。他接着写道：

---

① 见本卷第206—210页。着重号是卢森堡在本文中加的。——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273页。——编者注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象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一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来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

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些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sup>①</sup>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276页。——编者注

可见，恩格斯把党的纲领没有写进共和国的要求看成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只是考虑到来自德国的明确的提示——由于警方的原因“不许可”这样做——，所以他才带着明显不悦而又有几分疑惑的心情，决定咽下这颗苦果，“在万不得已时”“不提”共和国的要求。但是，他毫不拐弯抹角地宣布，必须在党的报刊上讨论共和国的口号：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他再次指出，“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在党内加以讨论。”<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对于弗·恩格斯这条“政治遗嘱”，考茨基同志无论如何是以特殊的方式去解释的，所以把关于宣传共和国的讨论的必要性当作是所谓“一贯遭到党的反对”的“崭新的宣传”，而把它排除出《新时代》。

至于马克思，他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曾经走得那么远，甚至宣称，要是不可能把共和国作为纲领最高的政治要求公开提出来，那么也就无需在纲领中罗列所有其它的、民主主义的细节要求了。他对哥达纲领批判说：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7页。——编者注

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不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注意，马克思在三十五年前，在特森多尔夫时代，在反社会党人法出现预兆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罗·卢·）——象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删节号代替马克思一个不客气的形容词——罗·卢·）<sup>①</sup>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sup>②</sup>

可见，在共和国这一点上，马克思讲的也完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由于来自德国的可靠依据——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的前夕和刚刚废除之后，才万不得已地承认，在纲领中郑重地提出共和国的要求也许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两人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在宣传中——而且仅仅是宣传罢了——提出这一要求竟然被看作是“崭新的”和闻所未闻的事情。

毫无疑问，考茨基同志的根据是，他曾在《新时代》上以“完全不同于”我现在这样天真的做法宣传过共和国。对于这一点，他肯

---

① 省去部分是：“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但中文版依据的版本和这里卢森堡所引用的版本不同，故有两处差异。——编者注

定知道得清楚些，而我却有点记不起来了。但是，难道还需要比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在实践中始终没有在这方面做些必须做的事情吗？增加普鲁士王室的费用<sup>①</sup>又一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而且同时赋与党以不可推卸的责任：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和国的口号，并努力宣传这个口号。这一法案是政府紧接着选举法草案落了个可耻结局之后提出来的，对法案中提出的无耻挑衅，本应无条件地以结束君主政体和个人统治在普鲁士德国的政治作用来回击，以强调这个政体同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社会政策停滞不前的关系来回击，以提醒关于“暴徒”、关于“盘上的糖煮水果”的著名“演说”和“言论”，提醒苦役监禁法案来回击，以揭露君主政体是全德意志帝国反动性的可见表现来回击。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对这个法案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这种动人的一致性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共和国的口号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区分阶级的口号，成为阶级斗争的口号。所有要做的事情，《新时代》和《前进报》一件都没做。我们这两家位居领导的机关刊物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增加王室费用这个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主要是金钱问题，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收入问题看待的，因而冗长地讲些多少带点诙谐的话，就是只字不提共和国的口号。

考茨基同志是一位比我更有资格的马克思专家。他一定更加清楚，马克思对这一“手法”，对这种“为警察所容许而为政治所不容许的限度内”的共和主义大概会使用哪一个被我省略的形容词。

尽管这样，如果考茨基同志说我“抱怨”受到《新时代》编辑部

---

<sup>①</sup> 1910年6月9日，普鲁士众议院不顾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通过了增加王室拨款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同意给普鲁士王室增拨三百五十万马克，这样就必须每年从国家的资金中拨出一千九百二十万马克供王室使用。——编者注

方面“不公道的对待”<sup>①</sup>，那他就搞错了。我认为，考茨基同志是不公道地对待了他自己。

## 二

现在谈谈群众罢工问题吧。为了解释他在最近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出乎意料地采取的反对群众罢工口号的态度，考茨基同志创立了关于两种战略——“击破战略”和“疲劳战略”的一整套理论。现在，考茨基同志甚至走得更远，为了同样的目的，又马上制定出一套全新的关于在俄国和在德国举行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条件理论。我们在这里首先听到的是这种一般性的考虑，说历史事例是多么令人棘手，人们只要不知慎重就几乎能从历史上为世界上一切战略、方法、方向、机构和事物找到合适的例证。这些考虑，如果泛泛而谈，倒是无害的，但是它们的不那么有害的倾向及其锋芒所指却已被表述成这样，竟然说“效法革命的榜样”是“特别危险的”<sup>②</sup>。这些按其本质使人觉得和弗罗梅同志慈父般的劝诫差不多的警告，是特别针对俄国革命的。于是便出现一种论调，它向我们指出，俄国和德国是截然相反的，并向我们证明，群众罢工的条件在俄国也许存在，但是在德国并不具备。

按照这种论调，俄国政府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软弱无能的，普鲁士政府则是最坚强有力的。俄国同一个亚洲小国打的一场战争失败了<sup>③</sup>，德国则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

---

①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35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365页。——编者注

③ 指1904—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沙皇俄国战败后，将其侵略中国所获的领土及其它权益“转让”日本。——编者注

的辉煌历史”<sup>①</sup>。在俄国，经济落后，农民直到1905年还象相信上帝那样相信沙皇；在德国，经济最为发达，代表企业主联合会的集中政权通过极端的恐怖政策镇压着工人群众。在俄国，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在德国，则有政治自由，工人能够“不冒风险地”进行多种形式的抗议和斗争，直至“充分地从事结社、集会、出版、选举的各种活动”<sup>②</sup>。这些对比的结果是：在俄国，罢工是无产阶级斗争唯一可行的形式，因此，它即使是没有计划和没有结果，罢工本身就己经是一种胜利。此外，因为罢工受到禁止，所以每一次罢工本身就是政治行动。然而在西欧——写到这里又把德国的模式扩展到整个欧洲——象这样的“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sup>③</sup>是早已过时的东西了。在这里，只是在有希望取得积极成果的时候，人们才会罢工。由此种种得出的教益是，由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示威性罢工和斗争性罢工不断相互交替和相互交错组成的、群众罢工的漫长革命时期是俄国的落后状况的一种特殊产物。在西欧，特别在德国，甚至连举行俄国式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也是极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虽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仍旧有这种情况，“而是因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sup>④</sup>才会有这种情况，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则只能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是胜利就是毁灭的那种时刻，作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最后决战来使用。

我只想顺带指出，考茨基同志对俄国的情况所作的描述，在最重要的方面几乎是完全错误的。例如，俄国的农民并不是1905年才突然开始暴动的，而是自从1861年所谓的农民解放以来（仅仅在

---

① 同第256页注①第368页。——编者注

②③ 同上，第369页。——编者注

④ 同上书，第370页。——编者注



1885—1895年间停止过），就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俄国国内的历史；而且他们的起义，既是反对地主的起义，又是反对政府机关的暴力抵抗；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内政部长在1898年发出了著名的通告<sup>①</sup>，把全体俄国农民置于戒严状态。1905年的新鲜和特别之处无非是，农民群众长期的暴动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目标明确的革命的阶级行动的伴生现象和补充，第一次获得了政治意义和革命意义，但是，更加错误的可能是考茨基同志对于问题的主要方面——俄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行动和群众罢工行动的看法。他认为俄国工人不过是因为绝望而罢工，只是为了罢工而罢工，既无目的，又无计划，既没有提出要求，也没有“明确的成果”，把他们的罢工描绘成乱七八糟的、“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这是一种荒诞的想象。俄国革命时期的罢工，它们使工资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但主要是使工时普遍减少到十小时，还往往减少到九小时；它们使彼得堡能够坚持整整几个星期的斗争，从而保住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使工人而且使铁路和邮电部门的国家职员争得了结社权，并且——只要反革命未占上风——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任何侵犯；它们打破了工厂主的一厂之主的权利，在许多比较大的企业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来处理一切与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它们废除计件工、家庭工、夜工、工厂罚款和严格执行星期天休息制度；这些罢工差不多使所有的行业都在短期内建立起很有发展前途的工会组织，这些工会过着最活跃的组织生活，拥有严密的领导机构，有基金、有章程、有象样的工会刊物；这些罢工，产生了象成为幅员辽阔的俄国整个运动统一领导机构的著名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大胆的创造物；俄国的这些罢工和群众罢工与其说是“不定形的”和“低

---

<sup>①</sup> 在戈雷姆金主持下的沙皇的内务部在1898年9月17日的一份通告中要求采取镇压农民起义的非常措施。——编者注

级的”，不如说，无论是在胆略、威力、阶级团结、韧性、物质成果方面，或者是在前进目标和组织成就方面，都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和“西欧的”任何工会运动比美的。当然，大部分经济成果在革命失败后，便和政治成果一起，逐渐地重新失去了。但是很明显，只要革命还在继续，这种情况就丝毫也改变不了罢工的性质。

这些经济的、局部的和地方性的冲突不是“制造的”，因而是“没有计划的”、“自行发生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扩大，变为普遍的政治和革命的群众罢工，而这些冲突由于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高度团结又会从罢工中重新萌发出来。就连这样一种普遍的政治革命行动的过程和每一次的结局也不是“制造的”，而是自然的，就象在群众运动中和在急风骤雨时期，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将出现的过程和结局那样。而且，如果象考茨基同志那样做法，以罢工的直接成果去衡量罢工的进步性和“罢工进行的合理性”，那么，俄国伟大的罢工时期在革命的几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成果，比德国工会运动在其存在的四十年间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所有这一切当然既不能归功于俄国无产阶级特殊的英雄气概，也不能归功于它的特殊的行动艺术，而干脆就是因为革命时期的迅猛步伐要比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框框内平稳发展的缓慢进程优越。

可是考茨基同志在他的第二版的《社会革命》的第63页是这样说的：

“虽然只有一种，但是十分经常提出来反对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异议是，俄国的情况并没有向我们西欧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前者和后者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当然，我并不是不知道情况的差别，尽管不允许将差别夸大。我们的卢森堡同志最近写的小册子就清楚地证明，俄国的工人阶级并不象人们通常所假定的那样低贱，那样落后。就象美国的工

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贬低为落后之辈的习惯那样，我们在德国也必须改变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样习惯。”他还进一步指出：“作为政治因素，英国工人今天甚至比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不自由的欧洲国家——俄国的工人的水平还要低下。生气勃勃的革命觉悟使俄国工人具有伟大的实际力量；放弃革命，局限于眼前利益，奉行所谓现实政策，使英国工人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sup>①</sup>

不过还是让我们把俄国的情况暂且放到一边，回过头来听听考茨基同志对普鲁士德国的情况所作的描述吧！奇怪的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也是令人惊讶的。例如，易北河以东手握特权的容克贵族直到现在才想方设法使普鲁士人日益意识到，他们拥有“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使我觉得有点难于理解的是，社会民主党怎么会干出这种事，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政府视为“最坚强有力的政府”。看一看贝特曼·霍尔韦格“内阁”那副令人发笑的可怜相吧！这个反动透顶的政府没有计划，没有任何政治方针，任用奴才和官僚，排斥重要的政治家，推行古怪的曲折路线，在国内是粗鄙的容克集团和宫廷恶棍厚颜无耻搞阴谋诡计的如意玩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失去负责能力的个人统治的如意玩物，前几年还是“世界上最软弱无能的政府”——俄国沙皇的可鄙的擦靴小卒，依靠的是一支大部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采用最呆板的训练方法，对士兵进行世界上最辱没人格的虐待——这就是“当代最强有力的政府”！无论如何这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奇特

---

<sup>①</sup>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的第一编《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柏林1907年增订第二版第59、63页。——编者注

的贡献，因为这种历史观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从它的落后、仇视文化、“盲从”和警察精神来推断一个政府的“强大”的。此外，考茨基同志还替这个“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做了另一件事，甚至给它编造了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战胜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的辉煌历史”。在退伍军人联合会中，人们至今也不过是靠缅怀1870年的“光荣出征”而得到慰藉罢了。而考茨基同志为了虚构他的普鲁士辉煌历史的“世纪”，显然已经把耶拿战役、以瓦德西为首的前往中国的匈奴远征以及特罗塔在喀罗塔取得的对霍屯督族的妇女和儿童的胜利也算进去了。

可是，考茨基同志在1906年12月发表的《帝国的形势》这篇好文章中，在作了长长的详尽的叙述之后结束时是这样写的：

“假如有人拿帝国初建时光辉的外部形势与今天的形势加以比较，那他就会承认，从来没有一笔这样可观的权力和威望的遗产这样快就被挥霍掉的……，自有德意志帝国以来，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没有象近来这样卑微，德国政府从没有象近来这样冒失和乖张地玩火。”（《新时代》第25年卷第1册第472页——罗·卢·）

当然，当时需要描绘我们可望于1907年选举时取得的辉煌胜利，同时需要描绘按照考茨基同志的意思必然会发生的巨大崩溃，而他现在是根据同样的必然性期待下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之后的巨大崩溃的。

另一方面，考茨基同志根据他对德国和西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论述制定了一种罢工策略，这种策略如果同现实对照一下，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考茨基同志向我们断言，“德国——以及整个西欧——的工人只是在有希望取得确定成果的时候，才会采取罢工这种斗争手段。如果没有取得这些成果，那么罢工就没有达到它的目的。”<sup>①</sup>考茨基同志这个发现对德国和“西欧”的工会的实践作出了严厉的判决。要不，例如德国罢工的

统计数字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1890—1908年，我们一共有过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六次罢工和厂主关闭工厂，其中完全没有取得成果的占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五点二），只是取得部分成果的差不多占四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完全取得成果的占一半弱（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1909年第7期的统计副刊。——罗·卢·）这些统计数字同样明显地否定了考茨基同志这一理论：由于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些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同样越来越由中央机构来集中进行”，并且因而“越来越少”<sup>②</sup>。在1890—1899这十年中，我们在德国一共有过三千七百七十二次罢工和厂主关闭工厂，但是在1900—1908这九年中，在这个雇主联合会和工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却有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次，罢工的次数非但没有“越来越少”，反而在后十年增加了四倍。参加罢工的工人在前十年总共有四十二万五千一百四十二人，而在后九年则有一百七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五人，又是四倍那么多，如果按平均计算，每次罢工差不多有同等数量的工人参加。

按照考茨基同志的模式衡量，德国所有这些工会斗争有四分之一到一半都“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然而每个工会宣传员都很清楚，以物质成就体现出来的“确定成果”根本不是并且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根本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经济斗争的唯一决定性观点，相反，“西欧”工会组织经常陷于不得不在哪怕只有取得“确定成果”的微小希望时进行斗争的困境。特别是纯粹防御性罢工的统计表明了这一点，这一类的罢工在德国，在过去十九年，整整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五是没有成果的。可是，这一类“没有成果的”罢工

---

①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69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372页。——编者注

不仅不是“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是维护工人的生活水准，保持工人群众身上的战斗劲头、阻碍雇主阶级将来新的进攻的直接的生存条件，这正是德国的工会实践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此外，众所周知，除了在物质成就方面取得了“确定成果”外，甚至是在没有取得这种成果的情况下，“西欧”的罢工最重要的结果或许就是作为组织工会的出发点；特别是落后地区和难以组织起来的工作部门，往往正是从这些“没有成果的”和“未经考虑的”罢工中不断地产生工会组织的基础的。以伟大的克里米乔的罢工<sup>①</sup>为其最著名的篇章的福克特兰特纺织工人的斗争史和苦难史就是这方面一个无以伦比的证据。如果采用考茨基同志现在设想出来的“战略”，非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行动，而且也决不会有日常的工会运动。

上述“西欧的”罢工模式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缺陷，而且正好出现在应当如何就群众罢工问题，也就是就我们的本题来考虑经济斗争这一点上。因为这个模式完全排除了这样的事实：正是“在西欧”，持续愈大、声势愈大、没有什么“计划”的罢工都是在大量受剥削的无产者同资本或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的优势相对抗的地方象雷电交作的狂风暴雨一样爆发的。这样的罢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它们大都以完全没有取得“确定成果”而告终。但是尽管是这样，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是这样，它们作为一种直接转移到政治领域的深刻的内在矛盾的爆发而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矿工周期性的罢工，意大利、加里西亚农业工人自发的群众罢工，还有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爆

---

<sup>①</sup> 1903年8月，在克里米乔大约有8000纺织工人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警察的干预和对克里米乔宣布小戒严，使罢工具有了政治性质。只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违背罢工者的意志进行干预，才迫使工人们于1904年1月无条件地复工。——编者注

发的铁路工人的群众罢工，都属于这类罢工。但是，考茨基同志在评论1905年鲁尔矿区《矿工罢工的经验教训》这篇杰出著作中写道：

“对于矿工们来说，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达到长足的进步。反对矿主的罢工是没有出路的；罢工一开始就必须作为政治性罢工出现，它的要求，它的策略必须考虑到是否会触动立法……”。考茨基同志接着说：“这一新的工会策略是政治性罢工的策略、是工会行动和政治行动相结合的策略，是矿工唯一还能采用的策略。一般来说，它是旨在使工会行动和议会行动重新活跃起来，并使两者都提高攻击能力的策略。”

人们可能会觉得，在这里，“政治行动”也许只能理解为议会行动，而绝不能理解为政治性群众罢工。考茨基同志下面十分明确的解释，打消了人们的任何疑团：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伟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将越来越依靠各种方式的政治性罢工去坚持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进展比理论来得快。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性罢工并为其寻求理论上的阐述和论证的时候，自发的、由群众自己点燃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或者说，每一次群众罢工都会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大的政治较量都会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在意大利等国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780、781页。）

这是考茨基同志在1905年3月11日写的一段话。

在这里，我们把“由群众自己点燃”和工会出面领导、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群众罢工和革命、俄国和西欧都乱七八糟、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了，把模式中的所有事项都融合在一个为猛烈的社会风暴所冲击的伟大时期生动的内在联系之中了。

看起来，“理论”不仅是比实践“进展”得慢，而且有时还会令人

遗憾地向后翻筋斗。

### 三

前面我们扼要地检查了考茨基同志关于俄国和西欧的最新理论的事实根据。但是这一最新的创见的要害是它的一种普遍倾向：虚构在革命的俄国和议会的“西欧”之间截然相反的情况，把政治性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说成是俄国经济和政治落后的产物。

但是，在这里考茨基同志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提出的证明太多了，在这个场合少说一点也许会更恰当一些。

首先，考茨基同志没有注意到，他现在的理论推翻了他过去的“疲劳战略”的理论。“疲劳战略”的核心是提醒人们注意即将来临的帝国国会选举。我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在当前的普鲁士选举法斗争中群众罢工是适宜的，而考茨基同志则宣称，在明年帝国国会选举时我们将要取得的巨大胜利，会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那时候群众罢工才可能是必要的和适宜的。于是考茨基同志便以最理想的明确性来证明，在整个德国，乃至整个西欧，还缺少政治性群众罢工时期的条件。“由于有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政治自由”，在西欧甚至连举行象俄国的那种规模、那种声势的简单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也几乎是不可能了。可是，果真这样，那么帝国国会选举后的群众罢工的前景就相当成问题了。事情很清楚，使群众罢工在德国根本行不通的所有条件，诸如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及其显赫的威望、国家雇用的工人的盲目服从、雇主联合会不可动摇的顽固势力、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孤立等等，断然不会到明年就突然消失。如果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理由，不再在于还要求实行“疲劳战略”的目前形势，而是恰恰在于



“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和政治自由”的结果，在于“西欧”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发达，那么，把群众罢工的期待从现在推迟到明年帝国国会选举之后，正好证明它仅仅是一块“疲劳战略”的廉价遮羞布，“疲劳战略”的唯一的真实内容是向人推荐帝国国会选举。我在我的第一篇答辩文章<sup>①</sup>中已经试图阐明，“疲劳战略”实际上是“唯议会主义”。考茨基同志通过他在理论上的深化现在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则，考茨基同志虽然把大的群众行动推迟到帝国国会选举之后，但是同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日前形势下，政治性群众罢工“随时”都可能有必要，因为“自从德意志帝国存在以来，社会的、政治的、国际的矛盾从未象现在这样紧张”<sup>②</sup>。既然一般说来，“西欧”尤其德国的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成熟程度使群众罢工行动成为不可能，怎么同时又能“随时”发动这样一种行动呢？示威时警察的暴力挑衅，群众的流血，可能会突然使群众的忿激情绪大为强烈并使形势激化，但是显然不可能成为那种突然推翻德国整个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最强有力的诱因”

考茨基同志还作了多余的论证。如果德国一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就是不可能产生俄国那样的群众罢工行动，如果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得到扩大是特殊的俄国式的落后状况的结果，那么，不仅在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使用群众罢工成了问题，而且连耶拿决议也是成问题的了。直到现在，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国内外都被看作是一份极其重要的通告，因为它正式宣布从俄国革命的宝库中借用群众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并把它纳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但是有的人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决议并且解释说，

---

① 见本卷第211—246页。——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今后怎么办？》。（《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80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宣布，只是在帝国国会选举法修改得更糟的时候才使用群众罢工。不过无论如何，考茨基同志以前并不是这一类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在1904年就明确地写道：“学习了比利时的榜样，我们就会确信，如果我们要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比方说，在目前的帝国国会选举法修改得更糟的时候（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宣布举行政治罢工，那对于我们身居德国的人来说，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sup>①</sup>事实上，耶拿决议的主要意义，它的真正内容，并不在于这种形式主义的“规定”，而是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榜样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在于支配我党耶拿代表大会的俄国革命的精神。如果考茨基同志现在偏要从俄国的落后状况去推导群众罢工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并借此虚构在革命的俄国和议会的“西欧”的情况相反，如果他极力就革命的榜样和方法发出警告，如果他甚至暗示应把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失败归咎于使无产阶级“最后必然要精疲力竭”的伟大的群众罢工行动——简言之，如果考茨基同志现在一清二楚地宣称：“但是不管情况怎么样，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俄国群众罢工的模式都不适合于德国的国情”<sup>②</sup>，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俄国革命正式借用群众罢工作为新的斗争手段，就显然是不可理解地误入歧途了。从根本上说，考茨基同志现在的理论是对耶拿决议的一种粗暴的、彻底的修正。

为了替他在最近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中采取的独特、错误的态度辩护，考茨基同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抛弃了俄国革命向德国和西欧的无产阶级提供的经验教训，抛弃了这些在过去十年中

---

① 卡·考茨基：《关于革命者的杂论》。《新时代》第22年卷第1册第736页。——卢森堡注

②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编者注

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无产阶级策略。

#### 四\*

透过从考茨基同志的最新理论得出的结论，才会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就是十分错误的。从俄国落后的社会状况去推论俄国无产阶级在当代阶级斗争史上空前的群众罢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俄国的“落后状况”去解释城市大工业无产阶级在俄国

---

\* (新时代)编辑部在上一期既无证据却又尖刻的攻击(见该刊378页脚注。——罗·卢·)以及它认为我的文章“在当前这个时候只会给无产阶级事业造成损失”的说法，这使我作出如下的回答：

1. 我断然拒绝编辑部的说法，好象这里讨论的是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我的事情”。普鲁士选举权斗争和在其中运用的策略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事情。

2. 选举法问题被列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巴登事件发生之后也没有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勾掉。因此，全面弄清楚这个问题来为党代表大会的辩论作准备，乃是党的报刊，尤其是党的理论探讨的机关刊物理所当然的义务。

3. 指责我煽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需要向公众隐瞒严重的、客观存在的意见分歧的帮派。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不应当把它和我们少数几个人等同起来，它是一种在公开的、自由的思想斗争中成长起来、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才能防止僵化的世界观。

4. 编辑部的声明宣称，我的文章是“以诋毁党执行委员会、(前进报)、尤其是那些分子为宗旨的”，这无非是要断言，谁要是批评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和由它们执行的政策，谁就是蓄意“诋毁”。这是和迄今工会领导人试图用以反击对工会的任何批评，特别是用以反击(新时代)编辑的批评在遣词用语上都一式一样的论据。党的探讨理论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纵使自己偶尔也是受批评者，也决不应该对党内的批评者采取狭隘的怀疑态度。

5. 编辑部考虑到巴登的预算表决，希望我停止讨论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这意味着把我们集合起来，全力以赴，进行自己队伍内部的斗争，而把反对资产阶级敌人的斗争问题无限期地往后挪。因为来自机会主义方面的进攻十几年来根本就没有停过，所以，如果每当我们的修正主义者高兴再一次搞恶作剧

革命中的突出意义，即领导作用，就是直接颠倒事物的本末。不是俄国经济上的落后，而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和交通的高度发展，给那些声势浩大的群众罢工行动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只是因为俄国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已经人数众多、已经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已经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只是因为真正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发展，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才断然只能由这个无产阶级去进行；但是，这样的斗争并没有成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处方进行的纯粹的宪法斗争，而是在它的整个广度和深度上都成为真正的、现代的阶级斗争；它既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又争取工人的政治利益，既反对资本又反对沙皇制度、既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又争取民主的宪法。而且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和与它相关连的现代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生存条件，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才能够产生这样震撼人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效果，从而使革命和它们一起欢庆胜利，也和它们一起遭到失败，一起沉默下来。

对于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那些重要因素，眼下我还找不到

---

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关于策略的认真辩论以及一切有关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的问题都搁置起来。这简直是由机会主义来对党宣布戒严状态。装出一番如此不安的样子与编辑部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话也是相矛盾的。巴登的事件必须坚决果断地加以解决。“不过”，我们在梅林同志在同一期《新时代》的社论上读到这样一段话，“党将不会由于这个插曲而使自己的昂扬的战斗情绪低落下来。就党的报刊至今对此所发表的言论来看，还都是采取恩格斯观察‘巴登州’的孤陋寡闻之见时所惯用的那种慎重冷静的态度。”我希望《新时代》编辑部也具有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和这种“慎重冷静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

我们抱着卢森堡同志所要求的那种“慎重冷静的态度”，除了刊登她的30页的文章外，还刊登这篇声明，并放心让我们的读者自己去判断。象这里进行的一种论战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否合适，卢森堡同志强烈反对将她的答复稍为推迟几周发表，是否并不意味着过高地估计了她自己这些申述的重要性。

——《新时代》编辑部

比我在1906年论述群众罢工的那篇文章中曾经作出的更加准确的表述。

“我们已经看到”，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俄国的群众罢工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为产物，而是在当今的革命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革命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是由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消灭专制政体和建立现代的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治国家。在形式上看，这和德国三月革命、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产生这两次形式上相同的革命的条件和历史环境却与今日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与今日东方的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业已完成，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已经遍及西欧各国，而且也遍及专制主义的俄国。在俄国，大工业生产和伴随着它的一切后果即现代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现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等等已经成了主要的、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那就是从表面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现在却反过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力量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一部分已经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软弱的自由派，只有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具有坚定的反对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被确定为领导革命的角色。但是它摈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幻想，却带着对自己特有的阶级利益的高度觉

悟，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投入了战斗。这种充满矛盾的情况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俄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我们从俄国革命的发展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在群众罢工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因此，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从这个观点来看，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当前的俄国革命构成了一条连续发展的锁链条，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兴衰……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它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sup>①</sup>

考茨基同志过去也是以同样的历史观点来观察俄国革命的。1906年12月，他采用与我完全一致的观点写道：“我们大概会最早对俄国革命和它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作出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既不按照传统观念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把它看成是社会

---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87—88页和第90页，着重号是在本文引用时加的。——编者注

主义革命，而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在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界线上一个完全特殊的过程，它促进前者的瓦解，为后者的形成而作准备，并且无论如何将把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全体人类在他们的发展进程中往前推进一大步。”（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景》。《新时代》第25卷第1册第333页。——罗·卢·）

如果这样去理解群众罢工行动这种俄国革命特有的、新的斗争形式所根据的真实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而如果人们不是随心所欲毫无根据地去想象这种行动的实际进程，不是象考茨基同志把它说成是“不定形的、低级的罢工”所做的那样，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理解——，那就很清楚，对于西欧来说，由于资本主义例如在德国发达得多，因此要比俄国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成的群众罢工给予更多的考虑。

考茨基同志用来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所有前提，恰恰都是势必使群众罢工行动在德国更加不可避免，其规模更加雄伟，其威力更加强大的重要因素。

考茨基同志所援引的、“无与伦比”的雇主联合会的顽固势力和人数十分庞大的德国国家雇用工人的盲目服从，使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平静而有成效的工会行动日益困难，从而在经济领域挑起的日益巨大的力量较量 and 日益猛烈的爆发，这些较量和爆发的强烈性质和宏大规模持续愈久，其所具的政治意义就愈大。

正因为考茨基同志所援引的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正因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死心塌地支持政府，所以每一次反对政府的伟大政治斗争都同时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剥削的斗争。这两种情况向我们提供了保证，在德国，任何果断的革命群众行动都不会采取自由主义的议会斗争的形式或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从前的斗争形式——短暂的街垒战的形式，而会采取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形式——群众罢工的形式。

最后，正因为我们在德国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启蒙教育和政治自由”，所以，一旦形势成熟到群众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行动就一定会在任何政治斗争的时机把私人剥削和国家剥削的一切老帐翻出来，并在进行政治性群众斗争的同时进行经济性的群众斗争。考茨基同志在1907年写道，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轻些。相反，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加重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境况比俄国工人还是强了好几倍，那么他们为此也要付出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他们与国家的一般生活水平相适应的需要也多得多，因而使德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桎梏也许要比俄国工人感到更加痛苦。”<sup>①</sup>现在以如此斑斓的色彩描绘德国工人如何“充分地从事各种方式的结社、集会、选举活动”的考茨基同志，此刻把普鲁士德国的国家雇用工人、铁路员工、邮局职员和农业工人这些异常庞大的奴隶群众全都忘掉了。可惜他们都很少能享受到从事“各种方式的结社、集会、选举活动的愉快”，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或者说在实际上，并没有结社的权利。他已经忘记，这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受着国王陛下的普鲁士的自由的最广大阶层是地地道道地生活在“俄国式的”状况之中；因此，正是这些阶层——矿工就根本不用说了——在政治动荡的时候不可能保持盲目服从，也不可能不以大规模的群众罢工的形式把他们特殊的帐目拿出来。

再让我们看一看“西欧”的情况吧。对上述这一切考茨基同志都予以否认，但是除了我之外，他还不得不和另一个论敌——现实争论。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群众罢工，那我们将看到什么情况呢？

---

<sup>①</sup>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第一编第2版第60页。——卢森堡注



在九十年代，赢得了普选权的伟大的比利时的群众罢工，作为大胆的尝试还是一枝独秀。但自此以后，出现了怎样一种百花斗艳的局面啊！

1900年，宾夕法尼亚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按照美国同志的见证，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效果比十年的宣传还要显著。1900年，奥地利的矿工也举行了群众罢工。1902年，法国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1902年，巴塞罗纳的全部生产部门爆发了声援五金工人的斗争的总罢工。1902年，瑞典爆发争取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2年，比利时爆发争取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群众罢工。1902年，整个东加里西亚的农业工人（二十多万人）举行捍卫结社权的群众罢工。1903年1月和4月，荷兰的铁路员工举行两次群众罢工。1904年，匈牙利的铁路员工举行群众罢工。1904年，意大利爆发示威性群众罢工，抗议在萨地尼亚的屠杀。1905年1月，鲁尔矿区的矿工举行群众罢工。1905年10月，布拉格和郊区爆发争取波希米亚省议会平等、普遍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十万工人参加）。1905年10月，列姆堡爆发争取加里西亚省议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11月，整个奥地利爆发争取帝国国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意大利农业工人举行群众罢工。1905年，意大利铁路员工举行群众罢工。1906年，的里雅斯特爆发争取省议会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的示威性群众罢工，并胜利地迫使当局进行了改革。1906年，维特科维茨（摩拉维亚）的冶金工人举行群众罢工，声援四百名因参加五一庆祝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会负责人，并以胜利结束。1909年，瑞典爆发捍卫结社权的群众罢工。1909年，法国的邮电职工举行群众罢工。1909年10月，特里恩特和罗韦雷托全体工人举行示威性罢工，抗议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迫害。1910年，费城爆发群众罢工，声援电车职工争取结社权的斗争，与此同时，法国铁路

员工正在准备罢工。

考茨基同志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地证明了的在西欧发生群众罢工、特别是示威性群众罢工“不可能性”的情况就是这样。考茨基同志在理论上明确地证明了不可能把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罢工混在一起，不可能有普遍的、壮观的示威性群众罢工，不可能作为一个一再出现零星斗争的时期的群众罢工。而他忘记了我们在近十年来就生活在一个经济性和政治性、战斗性和示威性群众罢工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些罢工异常协调地波及到所有的“西欧国家”和美国，波及到象西班牙这样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国家和象北美这样最先进的国家，波及到象法国这样工会运动最薄弱的国家和象奥地利这样有严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国家，波及到农业的加里西亚和工业发达的波希米亚，波及到象哈布斯堡君主制这样的半封建国家、象法国这样的共和国和象俄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除了上面列举的之外，还有1902—1906年俄国的伟大群众罢工行动。这些行动已经指明，群众罢工的意义和规模是如何首先同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一道增长的。

“因为正当我们在讨论政治罢工和它为寻求理论上的阐明和论证的时候，不是一次接一次的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自发地、由群众自己点燃而爆发出来，就是每一次群众罢工都变成政治行动，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都在群众罢工中达到高潮，而不管它是发生在矿工中，在俄国的无产者中，还是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工人和铁路员工中和别的什么国家的什么工人中。”<sup>①</sup>

如此看来，事情就几乎是这样，即考茨基同志关于在德国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性群众罢工时期的最新理论，好象并不是证明俄国和西欧之间的情况相反，而是毋宁说证明德国同包括西欧和俄国

---

<sup>①</sup> 卡·考茨基：《矿工罢工的经验教训》。（《新时代》第23年卷第781页。——卢森堡注

在内的一切其它地方的情况相反。考茨基同志说，在普鲁士即使是举行短暂的一般的示威性群众罢工都不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普鲁士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必定是一个例外，据说，“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在我们这里，在一次反对政府的示威罢工中，郊区铁路、有轨电车、煤气厂会停止运转”，我们在德国会看到一次“改变整个街头景象并因而给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最漠不关心的阶层以最深刻印象的示威罢工”<sup>①</sup>。这样看来，在加里西亚、波希米亚、意大利、匈牙利、的里雅斯特、特里恩特、西班牙、瑞典已经证明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德国则是不可想象的了。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城市，都爆发过完全改变了“街头景象”的辉煌的示威性群众罢工。1905年11月20日，波希米亚发生了极其普遍的停工，甚至波及到农村，这在俄国也是未曾有过的。在意大利，1904年9月，农业工人、有轨电车、发电厂和煤气厂都没有开工，甚至所有的日报都不得不停刊。“这也许是”，《新时代》写道，“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总罢工：人们使热那亚这座城市整整三天没有电，没有面包，没有肉，使整个经济生活都中断了。”<sup>②</sup>在瑞典，不仅在1902年而且在1909年的第一周，首都斯德哥尔摩所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出租马车、货车、市政工作——全都停了。在巴塞罗纳，在1902年，整个经济生活停止了好几天。

在普鲁士德国，有“当代最坚强有力的政府”，有可以说明在世界上其它地方都行得通的无产阶级斗争方式在这里则无论如何都行不通的特殊的“德国情况”，可是我们终将看到同考茨基同志那时候曾经和我们其他一些人尽情嘲弄过的“巴伐利亚的”和“南

---

①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0页。——编者注

② 奥达·奥尔贝格：《意大利的总罢工》。《新时代》第23年卷第1册第19页。——卢森堡注

德的”特殊情况相类似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德国，我们有最强大的党、最强大的工会、最好的组织、最严明的纪律、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德国的“不可能性”是在这些事实面前粉墨登场的。这样，我们便事实上得出奇特的结论：社会民主党越是强大，工人阶级便越是虚弱。但是我认为：如果说，在其它各国可能的群众罢工和示威性罢工在今天的德国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要证明德国无产阶级无能，但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做过任何使它理应得到这份无能证书的事。

## 五

在考茨基同志证明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之后，他的群众罢工的理论究竟还剩下什么呢？那就是“最后的”、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了，这只是一次性的，脱离经济罢工的，而且完全是在最后才象晴天霹雳一般爆发出来的。“在我的朋友们和我之间存在着关于群众罢工的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考茨基同志说，“就在这里，就在这个观点上。他们希望有一个群众罢工时期（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而处在象德国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把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倾其全力投身进去的政治性群众罢工想象成一次性的事件（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想象成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要么把我们的敌人打败，要么将我们的全部组织和我们的全部力量摧毁或者至少使其瘫痪数年之久。”<sup>①</sup>

对于浮现在考茨基同志眼前的这幅“最后的群众罢工”的图画，现在首先可以这样说，它无论如何是一幅崭新的、但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而是凭单纯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作品。因为它不仅与俄

---

<sup>①</sup>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编者注

国的范例对不上号，而且在“西欧”或美国爆发的许多群众罢工中，也根本没有一次与考茨基同志为德国发明出来的标本大体相像。迄今所知道的群众罢工，没有一次是“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搏斗，没有一次使工人取得了完全胜利，但也并没有一次将无产阶级的“全部组织”和“全部力量”“摧毁数年之久”。成功往往只是局部的和间接的。矿工的大罢工通常是直接以失败告终，但是从进一步的后果来看，通过这些大罢工的压力实现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奥地利实行九小时工作日，法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1893年比利时的群众罢工极其重要的结果，是争得了普遍的、但不平等的选举权。去年瑞典的群众罢工从表面上看是以妥协告终的，从根本上看，却击退了联合起来的雇主们对瑞典工会发动的总进攻。奥地利的示威性罢工有力地促进了选举改革。农业工人的群众罢工在它表面的、部分的失败的情况下，增强了意大利和加里西亚农业工人的组织。所有群众罢工，不管是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是示威性的还是战斗性的，都是有成就的。奥达·奥尔贝格同志当时在《新时代》上为意大利铁路员工的罢工写的总结说得很中肯：“政治罢工的成果是无法估价的，其价值的高低变化视无产阶级觉悟的程度而定。靠力量和团结进行的政治罢工总是谈不上失败的，因为它旨在发挥无产阶级的威力，并在发挥过程中使参加斗争的人们锻炼他们的力量 and 责任感，使统治阶级意识到对手的强大。”<sup>①</sup>但是，如果说直到现在，在“西欧”和俄国都仍然是每一次群众罢工都毫不例外地与考茨基同志最新的模式截然相反，既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完全的胜利，也没有把它搞垮，而是相反，几乎总是增强了工人的组织、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他们的力量感，那么，在另一方面便出现这个问题：在德国，那种伟大的和“最后的”群众罢工，也就

---

<sup>①</sup> 奥达·奥尔贝格：《铁路员工罢工追记》。《新时代》第23年卷第2册第385页。——卢森堡注

是那种将使大树翻折，天崩地裂，墓门推开的启示录<sup>①</sup>式的群众罢工，如果不是事先通过一个完整的长久的群众罢工和经济性的或政治性的群众斗争时期，使无产阶级群众对此作好准备，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唤醒他们，怎么能搞得起来呢？在考茨基同志看来，“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都应该投入到这“最后的”群众罢工中去，而且还应该是“倾其全力”地投进去。可是，普鲁士德国的那些因“盲目服从”而在目前陷于僵化的国家雇用工人即铁路员工、邮局职员等等工人，那些没有结社权利和组织的农业工人，那些仍然留在对立派的组织中，诸如留在基督教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黄色工会中的广大阶层的工人，简言之，就是所有那些直到现在既不接近我们的工会组织也不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如果不事先通过一个时期急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示威性罢工、局部的群众罢工、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等等，使他们逐步摆脱僵化、盲目服从、涣散状态并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的行列中来，怎么会一下子就突然成熟到能够投入“最后的”、“生死存亡的”群众罢工呢？

看来考茨基同志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当然”，他说，“我不是把这一次性的事件想象成一种‘突然发生的’、孤立的行动。我也希望有一个激烈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的时期，但希望把群众罢工作为最后的武器。”<sup>②</sup>但是，考茨基同志所考虑的、应该在“最后的”群众罢工之前发生、其本身又不包括群众罢工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街头示威游行吗？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里都单搞街头示威游行。而普遍的、影响重大的示威

---

① 《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篇，描写所谓救世主再次降世和世界末日的情况。——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374页。——编者注

性罢工，按照考茨基同志的观点，在德国正是应该排除的；“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在我们这里，在一次反对政府的示威性罢工中，郊区铁路、有轨电车、煤气厂会停止运转”。经济性群众罢工同样不能完成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准备工作的。按照考茨基同志的观点，还必须将它同政治性群众罢工严格地分开。它对政治性群众罢工完全不会起促进作用，反而只会起危害作用。那么，准备时期的那些“激烈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行动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难道是“激烈的”帝国国会选举或者是作出抗议决议的群众集会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举行“最后的”群众罢工时起关键作用的、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已参加对立派组织的无产阶级广大阶层，却不参加我们的集会。这样便全然不可想象，我们到底将怎样去争取、唤醒和训练“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去进行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搏斗。不管考茨基同志愿意与否，因为他排除了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性质的群众罢工时期，所以他的最后的群众罢工恰恰是地地道道的突然发生的。

于是人们终于不得不自问：仅仅发生一次的、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必须倾其全力以进行生死搏斗的“最后的”群众罢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指在诸如争取普鲁士选举权、争取帝国国会选举权、防止罪恶战争等等的每一次伟大政治运动结束时起决定作用的、周期性的、“最后的”群众罢工呢？但是人们不可能周期性地和多次地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一场被描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而且又是“倾其全力”为“生死存亡”而搏斗的群众罢工，只能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政权的斗争，因为很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建立它的专政的斗争才可能是“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样一来，德国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便越来越往后推；先是通过“疲劳战略”让人希望在明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之后举行，现在又作为“最后的”、独一无二的群众罢工消失在我们的

视野之外，并且从社会革命的遥远天涯嘲笑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还记得考茨基同志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今后怎么办？》中附加给举行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条件：在敌人面前最严格保守准备工作的秘密，由党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作出英定、尽可能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那我们就会意外地得出一个和“最后的伟大日子”以及和按照无政府主义处方举行的总罢工极其相似的印象。群众罢工的思想经过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在其结束时期竟变成“帝国的整个无产阶级”突然间一举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一阵喧扰。

但是考茨基同志1907年在他的《社会革命》第二版第54页上却写着：

“这是胡闹。一个国家的全部工人在一声号令之下都停止工作，这样的总罢工需要以工人的一致和组织为前提，这种一致和组织在目前社会中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而如果达到了，便会势所必然地使它们无需首先发动总罢工了。何况这样的罢工不但会一下子使现存社会不能生存，而且总的说来，会使任何人都不能生存，无产者将比资本家更早地活不下去。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罢工恰好在它开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时，就不得不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从来没有、在最近时期也肯定不会采取一国工人全部罢工的形式……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用孤立的、非政治的罢工来对抗雇主组织的压倒优势，就象用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来对抗从属于资本家的国家权力的压迫一样，将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两者互相补充并从它们的互相协作中吸取新的力量，就更有必要了。

运用政治罢工，就象运用任何一种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会它。”<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sup>①</sup> 同本卷第261页注<sup>①</sup>第55页。——编者注



为了替他在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的态度辩护，考茨基同志越是把问题扯远，大作其泛泛的理论概括，就越看不到他自己近年来不遗余力地描绘的西欧和德国阶级斗争发展的普遍前景。他自己对于他现在的同过去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也已感到难堪，所以他彬彬有礼地在他针对我的答辩文章的最后部分、即第三部分中，把他写于1904年的文集《关于革命的杂论》详详细细地重述了一遍。但是，他这样做并没有清除显著的矛盾，而只是使文章的最后部分带上混乱的、叫人捉摸不透的特征，从而大大地减少了阅读这部分文章的乐趣。

可是，并不单单是那组文章才同考茨基同志现在说的话形成刺耳的不谐音。我们看到，他在《社会革命》中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完整的、长久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些斗争中，政治性群众罢工将“肯定会起巨大的作用”（第54页）。《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一整本小册子都是描述这个时期的前景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进入了革命时期。考茨基同志在这里修正了弗利德里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并且宣称，旨在合法利用现成的国家基础的“疲劳战略”的时期已经过去：

“九十年代初”，他说，“我曾经承认，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现存的国家基础上的平静发展在当时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因此如果观察今天的形势使我产生了以下这样的见解，那么人们恐怕不能责备我是由于需要陶醉于很很很革命和很很很激进的想法：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争夺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的斗争时期，这些斗争在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可能拖延几十年，它们的形式和持续的时间暂时还不可预见，但是它们极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就将造成十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权力变动，如果还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在西欧单独掌权的话。”他还

说：“但是，在这种把握不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已经阐明了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不改变它进行斗争的国家基础就不能继续前进。在全帝国，而且也在各个邦，尤其是在普鲁士和萨克森，最坚决地争取民主，这就是它在德国的最近任务；它最近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

供我们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也同任务本身一样明确。在迄今已经使用过的手段之外还有群众罢工。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群众罢工，从此我们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反复检验它是否可以使用。”<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考茨基同志在《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在《新时代》上，一再向德国工会鼓吹，要把“政治罢工”当作越来越有必要采取的“新的策略”，因为雇主联合会使纯工会性质的罢工越来越注定要归于失败。正是这种观点使他在去年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通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考茨基同志现在要将经济罢工和政治行动严格分开。他现在宣布，西欧的一切罢工绝对〔必须〕达到“预定成果”，否则就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至于“组织无产阶级、提高它的认识和力量感以及增强人民群众对它的组织的信任”的手段，他只举出“顺利地战斗到底的工资运动”。为了给群众以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比“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更加迫切需要的了。“但是，很少成果能够象选举的胜利和夺得新的议席那样，显而易见地向群众表明我们正在增长的力量。”<sup>②</sup>总之，帝国国会选举和议席

---

① 参看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71、123页。但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译的。——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9页。——编者注

——这就是摩西和先知！

我们现在听到这样的话：只能找德国工人参加“没有风险”的集会，“单纯的示威性罢工根本就不是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政治抗议的形式，“帝国国会选举的胜利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此外，针对某一件事的“真正的群众示威游行”，“并不是要求立即防止该事，而是对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不公平宣布单纯的抗议”，这样一种示威性罢工，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在德国几乎是不可能的。<sup>①</sup>考茨基同志只是没有提到，他的这种论证已经顺带提出了废除五一庆祝的最糟糕的理论依据。

考茨基同志有十足的理由指出，他“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关于革命的杂论》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但是，依我看来，问题在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只是通过理论抽象，通过可以说是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情况去描述革命斗争和它们的表面过程，去设计它们的一般模式，而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根据当时情况提出能够使无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干劲、能够最有力和最迅速地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口号。当然，考茨基同志在他的无数文章中，在他的那些小册子里，极为清楚地描绘了未来革命斗争的情景。例如在介绍群众罢工方面，他在1904年就已经如此描绘：“每座贵族私邸、每处谷仓、每个工厂、每条电报线路、每段铁路都由军队守护着”，到处都出动士兵对付群众，但是却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战斗，“因为他们去到那里，那里的群众都散开了，然后又在他们还没有去过的或者刚才去过的地方集合起来”；首先是“煤气厂和电厂停止运转，有轨电车停止行驶，最后甚至连邮局和铁路也卷进了罢工浪潮；首先是车间工人罢工，后来连比较年青的工人职员也参加罢工。”——简言之，全都描绘得形象、生动而逼真，尤其因为说的是那些空中楼阁上的事情，就更

<sup>①</sup> 同第284页注①第370页。——编者注

加值得欣赏了。但是，当问题从理论象老鹰那样悠然盘旋的高空中，第一次落到普鲁士选举权运动这块平地上的时候，突然间，不知所措和一筹莫展的普鲁士政府变成了铜墙铁壁，象《取得政权的道路》所描述的为社会革命（“乌拉！前进，前进！”）做好了准备的德国突然变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国家雇用的车间工人和工厂职员，无论是年青的或者是年老的，都参加示威游行，而“正在兴起的革命时期”则变成了对帝国国会选举的辛勤准备，因为“很少成果”能够象帝国国会的议席那样，“显而易见地向群众表明我们的力量”。

理论是一步登天的——而实践是“疲劳的”；前景是云天里最革命的——而唯一现实的前景则是帝国国会议席。考茨基同志是以迫切需要挽救群众罢工的思想使其免受损害为理由对我进行讨伐的。我倒几乎担心，如果不搞这种挽救行动，说不定不但对群众罢工思想而且对考茨基同志都会好一些。

## 六

我们回过头来谈普鲁士的问题吧！

3月初，鉴于选举权运动业已开始和示威运动正在高涨，我曾声明，党如果要把运动继续向前推进，就必须把群众罢工的口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举行一次示威性群众罢工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我认为，党正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它不把选举权运动升级到更加激烈的方式；运动就会象1908年那样，没有多久便偃旗息鼓了。正是这种情况促使考茨基同志站出来反对我。

然而我们看到什么情况呢？考茨基同志指出，我们——不管我怎么讲——看不到群众罢工的迹象。他以洋洋自得的口吻说，

我的倡议已被客观情况“扼杀”了。考茨基同志——看来似乎是——由于醉心于论战而全然没有看见，还有别的东西可惜也因此被“扼杀”了，这就是示威游行以及与之并肩前进的选举权运动本身。针对我，考茨基同志证明，示威游行的升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党并不存在进退两难的问题，主要问题是“首先继续运用街头示威游行，不要使它减弱，相反要使它声势越来越大”。<sup>①</sup>如今，自4月份以来，街头示威游行已完全停止。而且这绝不是因为群众的情绪低落或缺乏战斗的劲头，也不是因为运动内部的精疲力竭而停息下来的。事实上，街头示威游行是党的领导部门因反对地方党员的努力和尝试而干脆停止的，就象五一的示威游行以及5月间在不伦瑞克、布勒斯劳的示威游行那样，是被人故意停止的。完全象我在《新时代》上进行第一次答辩中说的，在3月底——没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没有静候形势——就已经在地方情绪的压力下，抱着“就此结束吧！”的情绪，规定了4月10日举行示威游行<sup>②</sup>。也真的是就此结束了。再也没有示威游行，甚至连集会都不再讨论选举权问题了，带有风暴气氛的有关选举法斗争的专栏从党刊上消失了。可以作为事情暂时已经过去，它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最可靠的征兆的，则是我们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央机关报已经开始研究探讨选举权斗争的策略了。“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sup>③</sup>已经暂时打发回家了。

考茨基同志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他对我是不惜引用《取笑、讽

---

① 卡·考茨基：《今后怎么办？》。《新时代》1910年4月15日第71页。——卢森堡注

② 1910年4月10日全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地区的工人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权。——编者注

③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关于选举法问题的发言。见《普鲁士社会民主党1910年柏林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0年柏林德文版第224页。——编者注

刺、挖苦和更深的含义》<sup>①</sup>的材料，而对于反对他的“不要使街头示威游行减弱”的忠告并干脆扼杀了示威游行运动的“最高当局”，敢说一句哪怕是最轻微的责备的话吗？恰好相反，考茨基同志对于它却十分欣赏，因为他只看到热情赞扬“最近的示威运动”是“成功的疲劳战略的一个榜样”<sup>②</sup>之类的言词。完全正确，“疲劳战略”在实践中就是这个样子。它在采取两个大胆的步骤之后就“松口气”。躺在荣誉上面睡大觉，使“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嘹亮高歌的序曲变成胆怯的、对帝国国会选举的准备的抱怨声。

就这样，选举权运动又被停止一年，也许是两年，而且其时机选择得非常得当，人们可以借此尽其所能地为政府效劳。

贝特曼·霍尔韦格撤回选举法草案是关键性的时机，政府完全陷于困境之中。议会对选举改革所作的修修补补和政治交易都失败了。敌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真的想刮起“争取选举权的风暴”，真的想实现“不让普鲁士安宁”的口号，真的想认真对待普鲁士党代表大会的豪言壮语，那么，政府草案的破产便是现成的时机：马上针对这次议会行动的失败，在“拿出新的草案来！”的呐喊声中，在全国发起普遍的、声势浩大的进攻，发动随后会发展成示威性群众罢工并把斗争有力地推向前进的街头示威游行。考茨基同志极为善意地建议我把例如“武装”参加在特雷普托夫公园的集会<sup>③</sup>之类想法承认是我的“战略”的运用。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说明“我的战略”实际上要什么的明确的实例。不过，我要的并不是考茨基同志指望于我的那种幼稚可笑、唐吉珂德式的

---

① 《取笑、讽刺、挖苦和更深的含义》是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一出喜剧的剧名。——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9页。——编者注

③ 1910年3月6日柏林社会民主党号召在特雷普托夫公园举行争取民主选举权的集会，后因警方干涉改在御苑举行。——编者注

行为，而是在政治上充分利用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某一种“新战略”的发明，而是任何一种革命的、即任何一种严肃的斗争策略的起码要求。这是党的任务。我这样说决不是要宣布，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每逢星期一、四都开始一个“革命时期”。但是我认为：如果党正在开始一次行动，如果它已经使风暴呼啸咆哮起来并号召武装好的人民行动起来，如果它已谈论过“最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谈论过“用一切手段”掀起风暴，那么，它就不应在两次开头之后突然乱搔后脑勺、打着呵欠宣布：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一回考虑欠周，我们回家去吧！我认为，这种用排练和命令来制造风暴的拙劣做法，是与党的伟大和形势的严峻不相称和不相宜的，它会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业已开始的选举权运动和示威运动，是一个唤醒和教育漠不关心的群众、争取具有敌对思想的工人阶层的极好机会，这是正常的宣传所绝对办不到的。党故意停止这场运动，便良好的开端之后白白地放过了这个大好机会。

但是，首先还须从政治角度去考虑。将普鲁士选举改革问题同帝国国会选举法问题机械分开，并且宣称：为了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我们的大炮不应该上阵，我们要将它们留到帝国国会选举之后对付帝国国会选举法被废除的局面，这是极为目光短浅的。有的人就是要在实际情况面前故意闭上眼睛，以便看不见，在今天的形势下，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基本上不外乎就是为帝国国会选举法的斗争。很清楚，有力的和取得胜利的普鲁士选举权运动是预先抵挡对帝国国会选举法的进攻的最可靠途径。因此，坚决和不懈地继续开展选举权斗争，同时也是对付反动派政变欲望的一种防御行动，这种行动较之被迫的防御具有进攻的一切优点。

考茨基同志现在对此提出异议说——而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既然群众罢工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并没有爆发，这就最

好不过地证明了，发自形势的群众罢工是多么少见，而我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但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说，“就已表明，形势还没有达到这种成熟程度。只要人们还能争论和研究群众罢工合适与否，那么无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愤怒情绪和力量感就还没有达到需要举行群众罢工的程度。要是在3月间已经存在必要的情绪，类似我发出的劝阻声就势必会被愤怒的抗议咆哮所淹没。”<sup>①</sup>在这里，考茨基同志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趣地来回摆动：群众罢工时而是在军事委员会秘密的帐篷里精心筹划出来的、不加声张地偷偷准备的突然行动，时而是“不能任意引起、可以期待但不能确定的自然事情。”<sup>②</sup>我认为，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构的任务既不是秘密编造“伟大的计划”，也不是“等待”自然事情的发生。群众罢工就象我明确地在多特蒙特《工人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所说的，不能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制造出来”，它们要从群众和他们正在开展的行动当中产生出来。但是在把这种在政治上标志着坚定的策略和有利的进攻的行动向前推进的时候，必须使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任务，这是党能够办到的，而且这也是党的义务。社会民主党不能人为地创造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可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它的摇摆不定的、软弱的策略，却有可能使最理想的群众行动陷于瘫痪。1902年比利时遭到失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刚开始就马上被命令停止的争取选举权的群众罢工提供了这种论据。考茨基同志本人则曾对奥地利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报道：即使群众已经作好高度的战斗准备，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刹车来有效地阻止群众罢工这种“自发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向我们介绍说，“尽管奥地

---

① 卡·考茨基：《一个新战略》。《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417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421页。——编者注



利的情况远比我们这里更加有利于群众罢工，尽管奥地利群众的激忿情绪有时候达到了我们在德国远远达不到的程度，达到了只有最大限度地竭尽全力才能阻止他们举行群众罢工的程度；另一方面，尽管到了最后一再地和最严重地受到群众罢工的威胁，负责党的策略的同志还是在这个时候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刹住了车，阻止了群众罢工的发生。”<sup>①</sup>由于我们党有组织集中制的特殊修养和纪律，因此，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阻止作用能够最有效地在德国表现出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我的《下一步怎么办？》一文中曾经写道，“在一个象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里，是举世无双地重视组织和党纪的原则的，因而几乎排除了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几乎排除了他们自发的、可以说是即时表现出来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几乎排除了一个迄今所有重大的政治斗争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党有不容推卸的义务，证明如此高度发展的组织与纪律对于大规模的行动也是有价值的，对于除了议会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斗争也是有用的。”<sup>②</sup>

普鲁士争取选举权运动迄今的命运似乎证明，我们的组织机器和我们的党纪暂时对大规模群众行动的刹车能力比带动能力要强一些。如果事先就只是胆怯和勉强地论述街头示威游行，如果对任何象3月18日和5月1日出现的、可以使示威游行成倍加强的机会都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如果对自己的胜利，例如4月10日赢得上街的权利，以及对敌人的失败，例如撤回政府草案，都同样完全不予利用，如果最终干脆把示威游行搁置起来并把群众送回家去，总之，如果想方设法制止和瘫痪群众行动，挫伤群众的斗争

---

① 卡·考茨基：《我对俄国革命的背叛》。《新时代》第24年卷第2册第856页。——卢森堡注

②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95页。——编者注

情绪，那么，理所当然，也就不会从群众中产生出必须从群众罢工才能产生的暴风雨般的运动。

当然，变成这个样子的领导机构所进行的阻止活动顶多是在群众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象在我们德国这样，群众行动尚在采取最初的步骤的时候，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革命时期还在全面开展阶段，斗争就已达至高潮，那么，党的领导人的刹车就不能取得多大的效果了，群众就会把对抗运动风暴的领导人毫不含糊地推到一边去。看来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我认为把事情朝那个方向引导既没有必要又不合乎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无论如何要等到群众的“怒吼声”把他们搞刹车的领导人轰跑之后才在德国举行群众罢工，那么，这显然是只能有损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威望的。因为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便不难想象，我们有权利引以自豪的复杂的组织机器和严格的党纪，可惜只是为了议会和工会的日常斗争的一种卓越的应急手段，在我们的领导阶层现在的状态下，它们则是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时代所需要的大规模群众行动的障碍。我们的组织状况还有一个特别的弱点可以在那个时候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确切地说，如果工会领导人不过在最近的选举权运动中公开站出来反对群众罢工的口号，那么这只能使群众认清形势，更加尖锐地给予批评。然而他们用不着这样做，确切地说，他们可以通过党的宣传工具和借助党的机构而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威望作为刹住群众行动的手段，使选举权运动因此停了下来，考茨基同志只不过是为此作了一番理论上的配乐罢了。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事业仍在前进。敌人总是不停手地替我们干活，因而，我们的麦子如果不管天气怎样都长势喜人也不算不上什么特殊的功绩了。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任务毕竟不是要不顾自己的错误而单靠其敌人的罪恶和错误过日子，而是要

通过自己的活动力加速事件的进程，要在任何时刻都不是最低限度地而是最大限度地开展行动和阶级斗争。

如果将来群众行动重新开展，党就将面临同两年前和今年春完全一样的问题。在经历了这两次尝试之后，我们广大阶层的党员必定一开始就明白，要使真正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发动起来并长时间持续下去，就只有不是把它当作枯燥无味的、按照党的领导的指挥棒进行的操练，而是当作伟大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充分利用一切重要的经济冲突把一切振奋群众的因素都卷入运动的漩涡，同时，不是回避而是采取果断坚定的策略去迎接日益紧张的形势和决定性的斗争。今天的讨论也许将对此有所裨益。

发表于《新时代》第28年卷（1909—1910）第2册第564—578页第626—64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378—420页。

（曾广声译）

# 摩洛哥

(1911年7月24日)

众所周知，由于摩洛哥事件<sup>①</sup>，在法国同志中产生过这个想法：已经是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大会来反对已开始的军国主义殖民冒险的时候了，并且应由对此负有义务的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促成此事。首先计划在两个直接参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代表之间进行会谈。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代表西班牙同志，对瓦扬和法国同志的动议表示赞同，而“豹”号炮舰被派往阿加迪尔港一事公开表明，德国军国主义同样参与了摩洛哥冒险，以此加剧了国际对立，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这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许还有英国代表看来也有必要参加计划中的国际会晤。在布鲁塞尔书记处就此征求意见时，麦克唐纳、凯尔·哈第和奎尔奇代表英国工人表示赞同，并声明他们也认为有必要召开会议。只有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不太赞同这个动议。虽然只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作为他的个人意见作出回答<sup>②</sup>，但其他委员对此显然是

---

① 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编者注

② 给国际局的回信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写的。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件和资料汇编》1967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48—350页。——编者注

赞同的，因为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方面并未进一步表示意见，国际局中的德国代表也认为开这个会是不合适的<sup>①</sup>。由于这个原因，原来计划的会议没有召开。

对于由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事件召开一次会议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问题，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怎样，这个会议不是计划马上召开的，只是要作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召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社会党代表，也只是在这个明确的意义上赞同这个动议。而德国方面拒绝“立即”召开这个会的态度却被理解为根本不赞成这个意见。于是，布鲁塞尔书记处也就建议把摩洛哥问题推到下次国际局的年会上处理。我们看得很清楚，德国党的这个态度对于其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抗议运动不会产生什么鼓舞和激励作用。了解导致我们党采取这个态度的理由因此就更加有意义了。听起来几乎难以置信，这次提出来的又是这些理由：对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的考虑。由那位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表达的这一观点在他通知国际局以后还在柏林一次公开集会上发表过。其说法如下：

“在这整个把戏里，我看出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人想以此转移大家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为国会选举制造气氛。由于对内政策，我国政府处于连狗都会同情的境地。因此，它就采取那种惯用的手段，就象1887年俾斯麦利用布朗热<sup>②</sup>和1906年毕洛夫利用霍屯督人一样。我相信，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基德伦-魏希

---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于1911年7月10日从苏黎世写信给国际局，答应参加关于摩洛哥危机的会议，但在7月12日的一封信中却认为这样的会议是不合适的。

——编者注

② 1886年，法国复仇主义政治家的代言人若尔日·布朗热担任陆军部长。俾斯麦利用这个情况，进行一次反对法国的沙文主义煽动，以此作为提出新的军队草案的理由。在这样尖锐的形势下，1887年2月21日举行了国会选举（这天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因此也称狂欢节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议席数从34个下降为11个。——编者注

特<sup>①</sup>先生什么蠢事都会干出来，也就是说，也会干出引起欧洲严重冲突那样的蠢事来。但是在摩洛哥问题上，我看这些先生还不会放手干，因为那里涉及相互冲突的资本家的利益，其中‘法国’集团在德国的势力也是比较强大的。

这个矿山争夺战已经打了好几年。大家知道，一位名叫曼奈斯曼的先生把钱给了摩洛哥的苏丹，换得了一份文件；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一小撮自称为泛德意志派的惹是生非的家伙声言：有了它，曼奈斯曼兄弟公司便获得了摩洛哥矿山的垄断权。当然，文件的内容跟阿尔几西拉斯协定<sup>②</sup>是矛盾的。曼奈斯曼和他的朋友们声称，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阿尔几西拉斯文件不能对以前的协定有什么影响。

尽管曼奈斯曼和他的朋友们在报刊上大吵大嚷，但并没有使前外交国务秘书冯·舍恩对曼奈斯曼的协定哪怕只说一句附和的话，因为他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曼奈斯曼的态度。但当他迫不得已表示看法时，说的话对曼奈斯曼先生极为不利。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曼奈斯曼的法律基础不保险，不如说是在于同他对立的资本利益。和曼奈斯曼竞争的是一家法国的矿山辛迪加，它设在巴黎，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也参加了这同一个辛迪加。但除了施奈德以外，克虏伯、蒂森和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的其它巨头在这个辛迪加中也有一份。他们说：如果摩洛哥象曼奈斯曼所声称的那样蕴藏着大量的铁矿，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去开采，不必受曼奈斯曼的剥削。在剥削这方面，这些先生愿当主体，而不愿当对象。这个抗衡

---

① 阿尔弗雷德·基德伦-魏希特（1852—1912）——德国外交家。1910—1912年任外交国务秘书。——编者注

② 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以1906年4月7日的阿尔几西拉斯协定结束。该协定保证摩洛哥形式上的独立，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暂时保持一定力量均势的表现。——编者注

力比任何法律的和国家法的理由都更重要。就曼奈斯曼这些先生钻采铁矿来讲，他们最近已经把工作移到了阿迦迪。从那儿传来了抱怨声，说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了阻碍。因此，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基德伦-魏希特在这里对曼奈斯曼及其一伙的喊叫作了让步。但我不相信这些人会继续让人施加压力，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损害钢铁企业联合会中巨头们的利益。因此简短地说，我相信我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什么蠢事都会干出来，但我不相信他们会继续这样干下去，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损害最大的资本家们的利益，而在这方面，这些人有敏锐的日光，会及时地要求‘停止’。

要是我们过早地忙于处理此事，自己把内政方面的一切问题搁在摩洛哥问题之后，使人们有可能由此造出一个有效的反对我们的选举口号，那么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在仇恨和害怕社会主义者方面，克虏伯和蒂森并不比贝特曼逊色。同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是，在讨论中不让人把国内的事情即捐税政策、大庄园主的优惠权、保险条例等等挤掉。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每一个村庄’都谈论摩洛哥问题，并以此推动这股逆流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贝特曼先生之流在这场赌博中遭到应得的失败——这很有可能，因为他们是笨得出名的，那么我们在选举时就又多了一条论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凭这样的专门知识来叙述摩洛哥事件，从中作出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满意。由这些结论得出的高明政策是：及时下令停止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这件事应该让给钢铁企业联合会的寡头们去办，我们自己应尽可能少管此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做，要搞国会选举。首先，肯定谁也没有想到要求德国党，要我们“把一切内政问题搁在摩洛哥问题之后”。最不会受到嫌疑的，应该是瓦扬和法国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就是既可以干这事又不扔下

别的事的生动例子。他们在不妨碍为反对摩洛哥的冒险而积极进行鼓动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内政问题，首先对保险提案<sup>①</sup>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同样，伊格列西亚斯及其同志们的强烈抗议行动，也没有妨碍党在西班牙的，特别是在萨拉戈萨的其它政治斗争<sup>②</sup>。

其次，处在狼狈困境之中的敌人企图利用摩洛哥喧嚣炮制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口号，搞一次类似“爱国的”狂欢节选举那样的选举，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既然如此假设，而且认为这个可笑而轻率的冒险行为本身就可能成为反对我们的“有效的口号”，那么在宣传鼓动的时候回避讨论这个问题，就恰恰显得完全不合逻辑了。既然我们必须估计到反动派企图以摩洛哥为诱饵来捞到好处，那么，要使这个口号发挥不了作用，要破坏这个阴谋诡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要尽早地、尽可能彻底地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事件的可鄙背景以及这里涉及的肮脏的资本利益。我们自己的讨论，自己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的这一新进攻的宣传鼓动，怎么会使我们失败，这是不可理解的。这里表现出对我们观点的说服力、对我们鼓动工作的吸引力如此缺少信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870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面对沙文主义的一切复仇狂，无所畏惧，毫不含糊地发表了关于和平和人民友谊的信念。即使当时他们没有“在每一个村庄”都那样做，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当时只能进入很少很少的村庄。而同曼奈斯曼公司和它在今天外交

---

① 指1911年7月3日在法国生效的工农业工人必须交付一部分养老金保险费的规定。——编者注

② 1911年7月10日，西班牙的社会党人跟共和党人一起，在瓦伦西亚举行了一次抗议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集会，大约两万人参加了大会。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等在会上发言。同一天，在萨拉戈萨爆发了一场总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16日。——编者注



部中的那些年轻人演的滑稽剧相比起来，“祖国与世仇的战争”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如果说上面讨论的那种态度是由于太不相信我们口号的取得胜利的力量而犯了错误，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它过高地估计了资本利益作为和平保证的作用。要说贝特曼和基德伦的对外政策只敢试探一下两个矿山剥削集团之间的对立有多大，这或许是对的；但是要在国际冲突这块布满火山的土地上轻举妄动，这甚至对于比这些资本主义的小伙计更大的能人说来，也是蒙起眼睛在玩火。冒险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单单由曼奈斯曼和蒂森决定的，这次冒险和一切世界政策性的进攻一样，很容易使冒险的策划者无法控制，会从用火柴棒轻浮地玩火发展为全球大火。要知道，通过某些“让步”，形势的重点就很容易转移到南非或另一个大洲，造成完全新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不是平息公众舆论，而是相反，应该激起公众舆论，警告人们，在今天的世界政策的每一个这样的冒险中都潜伏着危险。我们不当指望某一个资本家集团对和平的关心，而只能靠了解真相的人民群众的反抗这个和平因素。此外，要是去平息公众舆论，那么我们现在就显然迎合了摩洛哥政策操纵者的愿望。康蓬<sup>①</sup>和基德伦这两个殖民政策的犹太教大祭司要求公众缄默，以便在人民代议机构和公众背后不受干扰地搞他们的骗术<sup>②</sup>。这就更加启示人们：工人党的策略恰恰

---

① 茹尔·康蓬（1845—1935）——法国外交家，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驻美国、西班牙和德国大使。——编者注

② 在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驻德大使茹尔·康蓬和德国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魏希特就殖民地占有的补偿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在1911年11月4日使德法之间达成摩洛哥协定和刚果协定。在摩洛哥协定中，德国同意由法国控制摩洛哥，而法国保证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在刚果协定中达成在赤道非洲交换地区的协议，德国用乍得地区的领土换得法属刚果的一部分。——编者注

相反，要向公众舆论大声疾呼，说明有人要让它面对既成事实。在这层意义上说，譬如《前进报》起初提出来的召开国会的要求，还确实是受正确的直觉支配<sup>①</sup>的。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没有搞错的话，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看来不再继续支持这个口号了。

最后，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态度表明了对竞选的一种总的看法，我们觉得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按照这一看法，我们在宣传鼓动时应仅仅局限于内政问题，局限在捐税和社会立法上。可是，财政政策、容克地主的统治和社会改革的停顿是和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个人统治及其对外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将这些方面作任何人人为的割裂，都只能不完全地、片面地反映出我国的社会状况。首先，在国会选举时我们应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教育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德国的内政状况置于我们批评的范围之中，如果我们不讲重要的国际关系，不讲在世界各大洲继续发展的资本统治，不讲到处出现的明显无政府状态以及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那么，要开展这种教育是办不到的。我们决不能把选举的宣传鼓动搞成一本简单化的、缩写成只有几个“最有吸引力”的要点的政治启蒙课本，而必须进行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人们经常说我们迎接国会选举时的“形势很好”；同时，我们又被一再告诫，不要由于某种不谨慎的行动而毁掉这个“形势”；以前是指普鲁士选举权斗争，现在是指反对摩洛哥喧嚣的鼓动。我们认为，那个“很好的形势”不是一个表面的偶然状态，不会因为一个不慎行动就被毁掉，而是最近几十年德国内外历史总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开始纯粹从选票的角度看待整个党的生活和阶级斗争的

---

<sup>①</sup> 见《政府要做什么——一项质询》，载于1911年7月5日《前进报》第154号。——编者注

一切任务的话，那我们就会最大程度地失去这一“形势”带来的好处。

发表于1911年7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68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5—11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政策

(1911年8月19日)

党的反对摩洛哥政策的群众行动终于开始了。可是刚开始，就有人企图把它引上错误的轨道。尽管这个企图的确出于好意，但仍旧是完全错了。伯恩施坦同志的两篇文章<sup>①</sup>，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部未加任何批驳就在主要版面上登载了。他在文章中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我们反对摩洛哥方针的抗议运动提出什么具体口号。显然，伯恩施坦想搞“实际政策”。而且照他对这个政策的理解，社会民主党有责任为解决世界政策方面的困难提出“积极的”建议。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应该找到一条出路，把它作为一切观点中“最好的”观点、作为解决摩洛哥混乱最可行的办法推荐给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应该怎样去完成一项同它的性质如此不相符合的任务，去为资本主义的外交和内阁开出妙方呢？伯恩施坦在教我们怎样施展这个本领。但是，因为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样做时也是胡乱插手一件他不熟悉的工作，所以发生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事情。伯恩施坦终于把他在外交家们的桌子底下发现的一张揉成一团的破纸片当作社会民主党自己的

---

<sup>①</sup> 爱·伯恩施坦《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民主党》载于1911年8月13日及15日《前进报》第188、189号。——编者注

建议从地上捡起来，把它放在膝盖上小心翼翼地整平，兴高采烈地将它举起来，把它作为解决摩洛哥冲突唯一的最好的办法，作为符合“和平和权利均等”、符合“人类最高准则”以及符合各国人民应得的物质利益的唯一政策，作为与社会民主党及二十世纪唯一相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有谁能不笑得掉眼泪，或者至少可以说，有谁还能保持严肃的表情呢？

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是那时世界政治形势的表现，当时，法国还不能明目张胆地把摩洛哥掠夺为殖民地，而其它列强又不愿意、而且也不能为了摩洛哥的缘故采取战争行动。那时候，所有国家以“全能上帝的名义”作了国际保证，维护摩洛哥苏丹的主权，也就是维护这个国家形式上的独立，这是意味着在各个世界政策的利益之间暂时保持一定的力量均势。如果把外交部骗人的鬼话翻译成通俗的德语，那么，那个关于摩洛哥苏丹的“主权声明”就是如下的意思：这个傀儡暂时可以坐在王位上，可以用来当摩洛哥独立的招牌，因为日前来瓜分摩洛哥，这对我们还不合适，我们有别的事要操心。时候到了，就有办法，暂时分别，下次再会。

苏丹的主权和摩洛哥的独立，在签署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时，就已成了乏味的笑剧。在广大公众之中，除了伯恩施坦以外，恐怕谁也不把这当回事儿；苏丹仅仅是由德法两国交易所豺狼豢养的傀儡，摩洛哥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附庸，首先是法国资本主义的附庸。这一点，今天肯定是人人都看清楚了。但是在那以后，形势仍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发展。法国在摩洛哥进一步扎下根来，进一步把所谓的“主权”变成稻草人。而其它列强，特别是德国，对此听其自然，因为它们认为，这下子事情已经成熟，最终出卖这个国家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阿尔几西拉斯协定的使命已经完结，可以把它扔掉了。它现在被造就它的那种发展趋势抛在后面了。它成了外交上穿破了的便鞋，被扔进垃圾堆了。

伯恩施坦现在却把这件奇珍异宝作为社会民主党世界政策的旗帜举了起来！不过，伯恩施坦在这个已不中用的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道具上发现了奇妙的一面：阿尔几西拉斯协定是“合乎道德的”，损害它是不道德的，是一件违法行动。他非常详细地论述了道德和不道德，他的整篇文章浸透着道德。他说：“如果德国声明，不做肮脏交易，而是按协定得到权利，那么，德国就再正直不过了。”然而德国却在道德上如此“贬低”了自己。可是，使伯恩施坦感到痛心的是，英国的道德也不是毫无瑕疵的。“英国官方在涉及到阿加迪尔及其内地时向德国大喊‘把手拿开！’，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已失掉了这样做的一切道义上的权利，因为它允许法国，而且继续允许它在摩洛哥的最大、最文明的地区公然违背阿尔几西拉斯协定”。<sup>①</sup>伯恩施坦逐渐发现，原来所有国家都在摩洛哥进行不道德的行动。于是他现在有许多事要做。那是一幅动人的情景：伯恩施坦同志抬起眼镜，道貌岸然地看着基德伦-魏希特先生，伸起食指告诫他说：基德伦，你成了教唆犯，说真的，成了教唆犯（伯恩施坦在他的文章中连说了两遍）。基特伦，你改悔吧！要正直，要有道德！最好不过的就是要有道德！——我们担心，基德伦也许只会不耐烦地偏过脸，用他的简单明了的方式嘀咕一句：伯恩施坦先生，你见鬼去吧！

事实上这是多么无用的苛求！这是向人提出永远实现不了的无理要求。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变得“有道德”，这与要求卖淫“有道德”几乎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对卖淫只知道说“这是不道德的”，而再也说不出其它什么来，那么伯恩施坦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来的社会观点的深奥程度是和这完全一样的。资本主

---

<sup>①</sup> 爱·伯恩施坦《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和社会民主党》载于1911年8月15日《前进报》第189号。——编者注

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深刻的本质，它的核心，它的整个含义和内容，就是继续不断地将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撕成碎块，让资本主义逐渐吞食和消化。因此，如果人们要从法律条文上和伦理上理解这个历史过程，那么它从来无非就是持续进行的、被奉为法律的违法和暴力行为。争夺这一块块外国土地和外国人民，这既是战争冲突的唯一内容和目的，也是国家之间公开和秘密协定的唯一内容和目的，而这些协定只是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另一个方法，只是用书面确定这场争夺中某个时期暂时的相互力量对比。今天，哪一个有起码政治常识的人不知道，签订这些协定只是为了在这方面的力量发生变化时又撕毁它们？到现在为止，哪里有一个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协定未被撕毁？只有不知道国际形势在不断动荡，不懂得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变化、产生和消失、发展和运动这样的规律的人，才会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协定是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国际上世界政策的这一发展，毕竟不过是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另一个侧面，而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努力就是以这一发展为基础的。

现在社会民主党居然要把一直是新的对立和斗争的起点的国际外交协定的神圣性当作自己的口号！它居然要使资本主义世界信奉道德！

不过，我们要问，伯恩斯坦在这里究竟维护什么道德和什么法律？按照他的看法，阿尔几西拉斯协定就是“法律”，损害它就是“违法”。然而，伯恩斯坦在阿尔几西拉斯协定中只注意到一切“商业国家”在摩洛哥的平等权利，奇怪的是，他完全忽视了，除了欧洲的商人以外，那里还有另一个可以说也有某些“权利”的因素，这就是土著民族，就是现在正在造反的摩洛哥部族。他根本没有发现，阿尔几西拉斯协定保证了摩洛哥苏丹的主权，它却以此践踏了土著的权利，在他们背上放上了一条可鄙的、危害大众的蚂蟥，它的

作用只是为欧洲的“商业国家”吸摩洛哥部族的血，然后交易所豺狼又从它身上把血挤入自己的腰包中。原来，我们的道德说教者在这里表明他的道德观念一点也不坚定。譬如，他冷酷地说：

“在那里（摩洛哥），仅仅是欧洲人开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非洲人在欧洲人那里被雇为工人。而在苏斯等地区经营种植园和开矿的权利今天已归德国企业家所有，阿尔几西拉斯协定宣布他们在摩洛哥有和英国人、法国人平等的权利。要求严格履行这个由所有利益攸关的国家签署的协定，这不仅是帮助想在摩洛哥经商和办厂的德国人得到他们凭荣誉和理智可以要求得到的利益的最正直、最人道的途径，而且也是最方便的途径。”<sup>①</sup>

允许曼奈斯曼和克虏伯“凭荣誉和理智”要求把非洲工人当作制革的皮子出卖给他们！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允许他们在矿山、种植场有把非洲工人赶向死亡的“权利”，对于我们的伯恩施坦来说，这就是“最正直和最人道的途径”！好一个道德说教者！但我们的“实际政治家们”总是这样的：他们一心想当政治家，总想站到“建设性基础”上来，结果却两腿朝天，乱蹬一气，屁股着了地。

伯恩施坦的不幸正好证明他从错误的方面观察了这整个问题。用“权利”和“道德”是无法衡量现代帝国主义这样的现象的。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时期的趋势、根源和历史意义——搞清楚这一些，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它面目可憎，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它面目可憎，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合法产儿。这是我们必须教会工人阶级理解的东西。工人阶级必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要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掠夺别国、国际肮脏交易、违法和强权政治，只有通过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用社会革命去反对世界政策的国际

---

<sup>①</sup> 同第302页注①。——编者注



屠杀。然而，人们要是在帝国主义政策之内去寻找补救办法，寻找解决其冲突的途径，要是企图简单地硬要帝国主义退回到已经过时的状态，这样来顶住它的冲击和突进，那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毫无希望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通过对今天的帝国主义而始终维护昨天的帝国主义而已。

在我们反对世界政策的抗议运动中，道义上的反抗当然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在它同对现象的历史法则的理解联系起来时，只有在它不是针对表面形式，而是针对实质，不是反对后果，而是反对根源时，一句话，只有在它成为猛烈攻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群众的革命反抗时，它才会变成政治因素。

发表于1911年8月19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9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26—31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再论群众和领袖

(1911年8月)

从四面八方传来我们党为反对世界政策和摩洛哥政策而举行集会和示威的消息。人民群众到处都以最大的热情响应我们的号召<sup>①</sup>。这证明，我们是很好地适应了群众的感情和情绪，在政治上表述了这些感情和情绪，给它们提出了口号和指出了方向。对此，目前全党只有一种意见，即组织一次反对摩洛哥事件的群众行动，在世界政策方面进行一次强有力的宣传鼓动，是社会民主党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迫切的需要。

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项行动不是在一、两个月以前就开始呢？德国是以派遣炮舰到阿加迪尔港而正式参与摩洛哥事件的，这件事发生在7月2日。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人的抗议活动已在7月的第一周达到高潮。我们不是在那时立即全力以赴地开始鼓动，而是落在后面，在事件的热潮中慢慢腾腾，至少晚了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们在这一重要事件上的政治战斗准备有很多不足之处。这是为什么？

人们会回答说：党的执行委员会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首创

---

<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遭到党员的压力之后，于1911年8月8日通过党的报刊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摩洛哥政策和保卫和平。与此同时，还散发了考茨基写的传单。——编者注

精神。它直到8月9日才要求行动，因此集会一直到8月下半月才能开始。不错，但难道必须等着党执行委员会先发出正式号召吗？如果今天每个党员无例外地认识到反对世界政策的行动的必要性，地方党组织难道就不能凭自己的首创精神干点什么吗？比方说斯图加特人就是这样做的<sup>①</sup>。把责任完全推到党执行委员会身上，这是毫不费劲的，何况执委会方面也可能确实表现得很缺乏决心和毅力。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要算在那些总是等待从上面降下全部幸福的人的账上，甚至在如此明摆着的、无可怀疑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敢采取少许的独立活动和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当然，为了使党的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充分发挥效力，需要统一和团结，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由一个中心来发动。但是，如果党的运动的几个大的、老的中心作出榜样，它们肯定也能朝这一方向施加影响，并且带动其余的地方组织。的确，那时党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中心也就会立即认识到必须推广每一种强大的首创精神和良好的开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变成党的意志的喉舌和工具，而不是相反，象现在这样，我们巨大而坚强的各级党组织把自己看作单纯执行党执行委员会命令的工具。

也必须坦率地说：党的生活只有到那个时候，只有在改变目前不正常关系的时候，才可以建立在正常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活动、自决和首创精神的增长。但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的先鋒队，如果联合成社

---

<sup>①</sup> 1911年7月15日在斯图加特召开了抗议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报告人卡·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摩洛哥政策的决议。——编者注

会民主党组织的最优秀、最有觉悟的一批人自己作为群众没有发挥首创精神和独立性，而宁可总是在上面发布命令以前按兵不动，这些群众的行动能力和政治战斗力又怎样会发展呢？纪律和统一行动是象我们这样的群众运动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后者是以士兵群众漫不经心、毫无主见地屈从上级的命令——它所表达的是异己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因此，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发展的关键，即社会民主党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意愿要始终保持生动活泼的状态，它们能够日益使党员群众发挥主动性。当然，我们有最高权力机关即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它把全党的意志定期地确定表述出来。但是，党代表大会显然只能给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规定一般的大政方针。这些方针在实践中的运用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工作、战斗力和首创精神。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显然决不会把政治斗争中当前的任务全部包括进去，因为生活不是静止的，从一次党代表大会到另一次代表大会，天地间会发生许多事情，党对这些事情必须作出反应。打算把日常的政治警惕性和首创精神这一巨大的任务全部推给党执行委员会，而将近百万人的党组织却在消极地等待它的命令，这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看来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无疑，这正是我们的机会主义者竭力想在所有的党员不言而喻要服从全党决议这件事上发现的那种该受谴责的“绝对的盲从”。

在我们的队伍中可以经常听到对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抱怨，说这种官僚主义扼杀了生气勃勃的政治活动力，这

种抱怨也是完全合理的。只是那些发出抱怨的人恐怕很不理解这种可悲的状况大部分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任何从事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的机构都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此外，地位这样高的机构自然有一种发展得很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势必大大抑制首创精神和决心。只有全党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一种真正的补救。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要是党员群众自身干劲不足，独立的精神生活不够活跃，那么他们的中央领导机构就十分自然地不仅会产生官僚主义僵化的倾向，而且也喜欢非常错误地认为自己对于党拥有官方的权威和权力地位。我们的党执行委员会最近对各党报编辑部下达的所谓“秘密指示”<sup>①</sup>就是一个新鲜的例子。这是一次企图对党的报刊实行监护的尝试，对此无论怎样严厉地拒绝都是不为过分的。但是，这里也需要再说明一点：反对拖拉作风同反对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过分的权力幻想一样，除了依靠广大党员群众自身的首创精神、自身的思想工作 and 自身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外，再没有其他手段。

以上涉及的问题在目前引起的不仅是学术方面的兴趣。党内各个方面的人已认识到党执行委员会的当前状况需要改善，已经承认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必须补充和革新。所以，不久前，我们

---

<sup>①</sup> 1911年8月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给党的报刊编辑部发了一封秘密通知，禁止它们讨论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中的意见分歧（这是由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机构的敌视工人的决定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的一项机会主义声明引起的）和对工会领导机构的措施提出任何批评。——编者注

的爱北斐特的机关报就摩洛哥辩论写道：

“总之，必须支持《莱比锡人民报》的这一看法，即党执行委员会本来应当主动发起一次行动。

现在，我们也确信，当更进一步检验事态的时候，对党执行委员会玩忽职守的错误可以从宽发落了。党的管理机构发展得很庞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的数目已不再足以恰当地满足向领导机构提出的全部要求了。辛格尔同志的空缺还没有补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假定，一位或者甚至两位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可能因为处理党的事务或者进行鼓动而不在柏林，第三位委员也许生病了，第四位和第五位正在休假（肯定没有一个人打算阻挠异常忙碌的党的执行委员去休假），那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突然出现重要问题时不得不由极少数人作出决定，而如果整个执行委员会全体在场，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会是另一个样子。这种两难处境恐怕也可以解释这一矛盾：党的办事处把党的执行委员的信说成是写信人的个人观点，而外界却自然把它当作党执行委员会的信。耶拿党代表大会<sup>①</sup>将不得不决定加强党执行委员会。有两个选区，即特尔托-贝斯科和柏林第一选区已经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建议。”

这里阐述的需要加强党执行委员会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应当回避它在这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我们的党满足于加强党的执行委员会并且又消极地等待“新当选的人”赐给全部幸福，正象例如它曾消极地花了一个半月等待党执行委员会挥动指挥棒才去开展对摩洛哥事件的抗议活动一样，这就表明它打算用纯粹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抵制官僚主义的危害。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执行委员会能代替蕴藏在党的群众之中的、

---

<sup>①</sup> 指将于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在耶拿召开的代表大会。——编者注

党的固有的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百万人的组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着伟大的任务，却打算抱怨自己没有名副其实的领袖，那么它就是自己表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它将证明，它没有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本身，而这一本质在于：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发表于《莱比锡人民报》1911年9月29日第199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37—42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在柏林第一国会选区的演说\*

(1911年12月19日)

演说者<sup>①</sup>对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作了简明的概述。炮击声是我们迈向人民斗争的征途中的伴奏曲。演说者讲到了在英国、奥地利和其它国家里的饥荒，说这些是我们必须就其整个意义来评价的征兆。她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人民中的饥饿是一种新现象，相反，它只是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后果，在这种经济方式中必不可免的危机是同繁荣互相交替的。但新鲜的是我们在今年遇到了饥荒，而今年并没有什么危机，相反，企业界生意兴隆。可以看出，如今已经根本不再是有危机才会引起饥荒。还可进一步看出，资本主义将按照无情的逻辑向何处去！演说者讲到冶金工业中的斗争，说仅仅一次报复行动就要使大约七万人失业。<sup>②</sup>乍一看来，这只涉及到一小部分人，但是冶金工业中去年就出现过三次这样的动荡。即使已经平静下来，但要是以为我们将来再也不会受到这种威胁，那就太愚蠢了。不，工人阶级头上悬挂着解雇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不再是提高一分钱工资或缩短一刻钟工时的问題，这里涉及到原则问题。采取高压手段的人以为，通过这样的

---

\* 本文是根据报纸的报道刊印的。——编者注

① 即卢森堡。——编者注

② 指1911年11月30日柏林冶金工人罢工被镇压下去后，有60%的浇铸工和成型工被解雇。——编者注



解雇，可以挖空工会的基金，并且置工会本身于死地。然而他们估计错了。工会的力量和权力不在于它的基金，而在于它的会员乐于牺牲和团结的精神之中（暴风雨般表示赞同的掌声）。因此，这些先生的一切阴谋都会象玻璃碰花岗岩一样，在工人运动中砸个粉碎。但是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尽全力猛烈击退进攻，那么，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明天有可能在别处发生。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和平与局部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件事，它看起来涉及的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但和上面提到的问题十分相似，这就是从中国传来的革命<sup>①</sup>正在胜利推进的消息。中国和革命！这足以说明世界在变化！在中国，人们宣告成立共和国，而我们在德国却生活在中国式的官僚统治之下。既然四千年的中华帝国都再也挡不住现代的革命风暴，难道德国反动派这一小撮渣滓能阻挡进步？（长达几分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乍一看来，上面列举的现象好象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但谁要是观察得更深入一些，他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地区正连成一个紧密的、社会在进步和发展的思想包围圈。我们看到饥荒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从其它国家听到因为饥荒而革命的消息。我们这里现在没有革命，但是谁以为，因为我们没有革命，我们这儿也就不存在贫困，那他就错了。同样，有秩序这个功劳也不归于警察。如果说一切尚有秩序的话，那也只能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和教育，它不想用乱哄哄的起义去改变人民的困境，而要通过目标明确的、有计划的斗争去改变。

演说者语重心长地对妇女们讲了一番话，描绘了她们的处境，说她们没有权利，也说到她们的义务和责任。今天的老百姓中每一个能做到靠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诚实地教育自己子女的妇

---

① 指中国辛亥革命。——编者注

女，都可以胜过每一位财政部长，这就已经证明她们有资格获得选举权和表决权。演说者痛斥帝国主义，她不但从纯政治方面，而且还从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阐明了帝国主义带来的后果。她指出，唯独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地为反对这一种掠夺政策作了斗争，并且还将继续斗争下去。既然我们的爱国主义者还按计划地把一百五十万外国工人移入德国，那么，德国工人就没有理由移居到非洲去。要去，他们就让以纳乌曼为首给他们出主意的人自己去，纳乌曼可以作为牧师一起去，还有莉施内芙斯卡小姐也去，这样也可以有个女性代表。（哄堂大笑。）最后，演说者申明：帝国主义所干的只不过是为我们作准备工作而已。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等着1月12日到来。我们不象资产阶级那样主要争议席位，而更为重要得多的是选票；就是选票，我们也不能按票数衡量，而要按其精神价值衡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同路人，而是在顺利和困难的时候都支持我们的、果断坚定的和勇于牺牲的男女选民。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时期，甚至也许是非常法。尽管如此，无所畏惧：风吹得越烈，红旗飘得越欢！曾在非常法之下流血斗争了十二年的我们用不着害怕！但是，到我们队伍中来的人一定要有准备：要求他们所作的也许是比较投一张选票更多的牺牲。只要我们以这种精神开出去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高呼——正如一首歌中写得很好的那样：人民和我们在一起，胜利和我们在一起。

发表于1911年12月20日《前进报》第29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80—82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今后怎么样？

(1912年)

## 一 新形势

将近两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生活的主要方面是以国会选举为基调的。这件大事现在已过去了，我们可以环顾一下总的形势。经过国会选举，是否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否预示着新的政治前景并且也许要求改变我们至今的策略？如果人们阅读自由派的报刊，那么人们几乎要相信这一点。胜利的欢呼声和欣喜若狂的情绪尤其充满着自由思想党的报刊：黑—蓝联盟被击败了，左派在国会中已形成了反对容克地主和教会反动派的反对派多数，这一切都是自由资产阶级坚决反右的结果！报上这样写道：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在决选中的相互支持<sup>①</sup>造成了政治形势中的这个根本变化。只要工人党和资产阶级之间在国会中的盟友情谊变成持久的友谊，那么整个德国天空就会充满自由主义的琴声。这些曲调听起来可能不错，特别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的那一小撮古怪的幻想家的耳中听起来很入耳，他们很久以来就指望着德国政治中起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形成一个“从巴塞尔曼到倍倍尔的大集团”，

---

① 为了进行1912年1月的决选，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进步人民党缔结了一个选举中互相支持的秘密协定。按照协定，进步人民党应在31个国会选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而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允诺在16个国会选区中“直至决选为止不召开大会，不发传单，不向选民发选票，并且在选举日当天不进行拉票活动”。——编者注

并预言普遍以为已经灭亡的自由主义又会还魂。遗憾的是，这次由资产阶级自由派自己大喊大叫宣布的复活，也只不过是一个大骗术而已。由于它大吹大擂，也曾使不少社会民主党人产生愉快的信念，但这只是在陶醉于胜利的最初时刻才会出现。

“数字和事实，事实和数字！”正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庞得贝先生习惯说的那样。从数字和事实来看，自由派的英雄气概的传奇是什么模样？在首轮选举中，它的左翼没有获得一个议席，它的右翼得了四个议席，这就又回到了1903年的正常形势，因此，第一个肯定的事实是：自由派作为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政党已根本不再存在。社会民主党要与之手挽手地向本世纪挑战的这位神气十足的英雄豪杰，自己只有依靠社会民主党或反动派的恩赐才能活命。

接着举行决选。这时候开始了自由派真正的英雄行为。只是在巴伐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自由派选民总的来说在决选的头两天中遵守这个口号：反对右派。但在其它地区，他们的态度如何呢？决选的第一天，人民党把十六个选区交给了反动派，民族自由党在两个选区中也干了同样的勾当。在决选的第二天，人民党故意使两个选区直接落到反犹主义者手中；除了科伦和海尔布隆以外，几乎所有其它选区的自由派选民都分散了，少数赞成社会民主党，而多数投靠反动派，从背后袭击社会民主党。但在第二批决选中，我们还是取得了那么多的议席，这之所以可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把后备力量也拉出来去投票了，而且主要因为我们在首轮选举中就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优势，因此，自由派的背叛者也未能将我们击败。在决选的第三天，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更糟。在所有我们获胜的选区中，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多数投入反动派的营垒。譬如在波茨坦-东哈韦尔兰，进步党一万一千张选票中只有整一千二百票投给社会民主党，而六千二百票投给了帝国党的党员！因

此，如果我们的选民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强大优势，那么，我们在这第三天的决选中也不可能获胜。我们在后两天决选中得到的自由党人的选票，只是在极少的选区里抵消了他们反对我们而支持反动派的选票。

因此，后两天决选的结果和第一天决选的结果相比如此不同，其根源决不在于自由派的干将们在坎坷不平的正道上摔了几跤以后又坚决前进了。可以用更为简单得多的情况来解释：政府采取聪明的战略，恰恰在社会民主党占弱势的所有选区先举行选举，而在后两天的决选中，社会民主党本来就是作为较强的党领先的。如此说来，关于自由派在选举中大力救援社会民主党的无稽之谈，只有进步党人才会散布；他们有充分理由自欺欺人。不是因为自由派的帮助，而是尽管有自由派选民群众的背叛，我们还是得到了那么多的议席。在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反对我们的地方，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胜利，而且总的说来，凡是在反动派反对我们的地方，我们归根到底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自己的四百二十五万选民，即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在他们第一次猛烈的冲锋中，胜利地克服了反动派的反抗和自由派的背叛，将我们的旗帜一直扛到最后的决选。

掩盖这些事实，可能符合自由派政治家们明显的利益。与此相反，要是社会民主党支持这种由自由派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它就犯了政治斗士的最大错误：低估自己的力量。社会民主党赢得它的伟大胜利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它吸取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然力量，并且采取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态度。对于几百万向我们涌过来的热情的无产阶级群众来说，要是我们想按照自由派的思想错误地解释这次胜利，从而贬低他们的胜利，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外表看来，我们方面也有人一度搅混了主要斗争的明确路线，帮着一起鼓吹关于自由派战斗

联盟和自由派英雄行为的传说。不过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中央机关方面有些过分热心于争取自由派的支持，其次是因为在整个决选活动中，我们的领导层跟着自由党的调门把反对黑—蓝联盟的口号喊得有些太响了。但是现在，选举结果是无情的验证，它表明我们自始至终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斗争并获得胜利，还表明自由派的帮助总的来说只是个幻影而已。所谓帮助在最后显出原形来了，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德行，那就是，自由党选民不是一个不漏地反对我们，去投右翼反动派候选人的票。当然在某些还未定局的选区中，要是自由党人全部转向反动派的话，我们也不会获胜。但是，如果人们仔细看一看各个党的力量对比的话，这难道是一个可以看作可靠的战斗联盟的基础而加以吹嘘的功劳吗？这群乌合之众，这群毫无纪律的自由派选民，他们的多数随时会转向反动派，这不是一支可以靠它打败反动派的队伍。齐格弗里德唱道：“我不用纸铸剑。”自由派包括进步党人在内，多数完全不顾自己党的正式选举口号，而为反动派效犬马之劳；同样，他们也受到反动派的大力扶持。无论最近的自由派英雄史诗的吟唱者如何编造，事实是确凿无疑的。保守派和反犹主义者在十二个选区中帮助进步党人、在另外十二个选区中帮助民族自由党人反对我们而取得胜利。还有一些其它选区，他们也有大批人马出来帮忙，不过被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力量击退了。

这样，资产阶级自由派内心的怯懦以及它同反动派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次选举中仍和过去一样得到了出色的证明。自由派跟社会民主党结成的光荣战斗联盟几乎只有这个唯一的实际效果：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群众把几十个自由主义品种的议员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国会，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要是这一切会改变的话，那也就奇怪了。议会的高招和选举策略不可能改变历史事实，消除阶级利益和调和阶级矛盾。德国

大资本在最近几年中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刚刚大张旗鼓地开始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时代，不会通过议会政治的小小花样而消失。但是它的铁的逻辑会在资产阶级社会造成越来越深的裂痕，它的铁蹄将毫不怜悯地踩烂自命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那些东西的最后残余。要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德国复活过来，和社会民主党共同行动来反对反动派，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在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个时代，这也只能是迷惑人的梦幻，只能是赌博的筹码而已。只有那些有兴趣在无产阶级中搅混阶级意识的人，才会抛出这个筹码来招摇撞骗。

因此，让《柏林日报》之类的自由思想派机关报或豪斯曼先生那样的政客欢乐地翻着筋斗，在黑一蓝联盟的废墟上胜利地升起联合在一起的左派旗帜吧！这些“左派”的多数应当围绕在民族自由党的周围，而《柏林日报》自己在昨天清醒的一瞬间还刚刚把这同一个民族自由党称为“堕落的少女”！社会民主党却不能把它的希望和它的战斗阵地建筑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这些“堕落的少女”的基础上。相反，它必须以清醒的认识告诫自己：黑一蓝联盟的党派虽被击垮了，但黑一蓝联盟的政策仍占统治地位。下一个军事提案将证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国会中反对反动派时，仍会象过去一样地孤立。但是谁赞成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谁也就必须赞成间接税和关税，这好比跟在A后面的必然是B一样。在军事和殖民地问题上以一致的多数赞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捐税和关税问题上最多只会在一个家庭式的争论上受到一些震动，即围绕着遗产税这块掩盖对劳动大众掠夺的遮羞布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进行争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是今天的政治生活的中心轴，打开政治形势秘密的钥匙就在这里，而不是在部长的职责和其它纯议会主义的要求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来看，这次大的选举斗争的结果使我们认识到：政治形势依然如故，只是变得更加成熟

了。我们必须预料到的不是帝国主义的衰落，而是它的大发展以及随之变得越来越尖锐的阶级对立。与此相应，作为新国会中形势的标志的，将不是“右”与“左”的对立，而仍旧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跟社会民主党的旧的对立。使人民群众尽可能明确地认识这一点，反对自由党歪曲历史的一切胡言乱语，是我们党第一个紧迫的任务。

当然，经过上一次的选举，毕竟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事实，而且从这层意义上说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作为急剧的阶级发展的成果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的支柱，它的力量空前壮大了。力量的这种发展，使我们党担负起新的义务。支持我们的群众队伍在迅速扩大，如果不利用这个形势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争取新的胜利，不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那将证明我们不配取得这次胜利。

## 二 我们的任务

对于自由党派政治家们来说，在大的选举斗争之后最为担心的，当然是谁当国会议长这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来说，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议长职务是极无所谓的事，在这个议会中，我们在人民的一切切身利益问题上都同占四分之三的多数派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之中。我们党的力量不在议会之中，不在议会的策略和幕后活动，而在议会外的四百二十五万人民群众之中。既然这个职务会将我们置于和我们的共和制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地位，那么，我们尽管让某一个擅长议会中那一套装腔作势的自由派专家从我们这里窃取这个位置好了。几百万饥寒交迫、受奴役的人们，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信任我们，他们需要我们这方面有真正的实力地位，而不需要在我们不占



多数的议会中的装璜门面的假职位。我们党只能靠斗争策略的彻底性、尖锐性和坚定性来获得议会中真正的实力地位。作为帝国最强大的党，我们党有责任在整个战线上转入进攻，这样，使拥护我们的几百万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首要的紧迫任务是，继续有力地进行普鲁士选举权斗争。将近两年以来，我们停止了在普鲁士争取民主选举权的大规模的群众行动，为的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国会选举上。现在选举已结束，胜利是我们的，正是这个胜利责成我们要以双倍的力量重新采取群众行动，去夺取三级制议会的阵地。在社会民主党争取全国普选权的胜利进军面前，普鲁士的等级选举权制一定会象一条腐朽不堪的破船那样碎裂。现在我们应该重视发挥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将完成平毁这个政治上的阶级堡垒的事业。

而在国会本身，我们也必须对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发起进攻。由摩洛哥事件引起的、我们党团与德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辩论表明，我们反对这个敌人的议会斗争策略还不具备所必需的灵活打击力。这场反帝斗争在选举中起了如此突出的作用、在全国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如此毫无保留的支持以后，我们有责任在国会中最彻底地、原则分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在竞选中，不管到哪里，爱国的空话向我们迎面袭来。在这些空话后面，隐藏着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殖民政策、战争恐怖和个人统治，我们现在必须在国会向这些空话发起总攻击。如果我们用一项废除常备军和实行民军制的法律草案去抵制期待施行的新军事法提案和海军法提案，那就有了总攻击的最好机会。完整地、彻底地维护我们一贯的纲领要求，就可使我们同表现在各方面的帝国主义进行原则的辩论。这将会在议会中强烈地反映出几百万选民刚刚用他们的选票表达出的情绪和看法。

要保障遭到威胁的国会选举权，这就要求有力的进攻。最好

的防卫是出击。社会民主党将提出国会选举权充分民主化的动议，用这个形式进行有效的出击。它不能满足于跟自由派一起重新划分选举区，它必须使我们纲领要求的总和上升为选举权，其中包括妇女选举权的要求，所有成年人的公民权的要求在内。我们的妇女们，我们二十五岁以下的男青年都为社会民主党的光辉胜利作出了很多贡献，这证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因此理应宣告他们政治上的成年。

而处于选举斗争中心的、群众每天的面包问题，也是必须发起有力进攻的原因。四百二十五万张社会民主党选票是几百万人的呼声：粮食关税滚蛋！间接税滚蛋！我们的国会党团必须倾听忍饥挨饿的群众呼声，毫不迟疑地提出取消一切粮食关税和粮食税，这是我们的议会职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最后，在社会政策方面，也有巨大的任务期待我们去完成。广大选民群众以及做我们后盾的、三倍于选民的人民群众现在正盼望着我们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不仅仅在贯穿我们的整个说服教育工作的广义上，而且在为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进行有力的斗争这个狭义上，都进行建设性工作。德国国会最强大的党团实在有义务从我们抵挡进行煽动的反动派的不断进攻这个长期的防御地位中走出来。社会民主党有力的进攻可以最有成效地击退反对工人联合权的煽动。这里就自然要提出我们纲领上的那个要求——现代整个社会政策的基石：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

几年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没有提出过有关的法律草案，最后我们要求政府提出一个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逐步减少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实力地位要求采取比这有力得多的行动：提出自己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草案。通过这样一个草案，我们将最能说出那些以前拥护中央党而最近投向我们的无产者群众的心里话。通过这个草案，我们将大

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会，它们对我们的选举胜利起了很大一份作用，现在它们也有权利收获这个胜利的果实。对于在议会讲台上和在全国进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广泛宣传鼓动来说，可能也不会有比现在更加有利的经济形势了。我们生活在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煤炭和钢铁工业的生产大大发展，德国的进出口额去年达到了最高数字，银行资本和大股份公司资本增加，还有高额股息，这一切表明，资本又一次获得大丰收。经济形势的有利条件，加上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大发展，必将化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有力行动。这个行动需要在议会中发起进攻，我们的国会党团必须成为全国性群众鼓动的代言人和传声筒。

要全线发动进攻：在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争取廉价面包的斗争中以及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建设性工作中，我们议会内外的行动，要和我们选举的胜利一样，必须有空前的决心和明确性。我们不和自由党派的卑鄙的、一味追求席位的人去搞荒唐可笑的联盟投机，而要以独立、果断和原则性的阶级斗争策略向国际显示：无产阶级的党为了社会民主党的最终革命目标，是怎样充分利用议会斗争手段的。

发表于《平等报》第22年卷（1912年）第10期，第145—147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91—99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五一节的思想在前进

(1913年4月30日)

正当帝国主义恣意疯狂的时刻，无产阶级的世界节日的二十四周年来到了。在关于五一节的划时代决议作出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人们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在首次举行五月游行时，国际的先锋——德国工人阶级正打破耻辱的非常法的枷锁，走上自由的、合法的发展轨道。七十年代的倒闭浪潮以后国际市场上的长期不景气时期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正进入一个辉煌的高涨时期，它几乎延续了十年。同时，经过二十年的持续和平，世界摆脱了对曾经使欧洲现代国家制度受过血的洗礼的战争时期的回忆，缓过气来。平静的文明发展的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指望通过息事宁人、心平气和的讨论来解决劳资分歧的幻想和希望，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纷纷滋长起来。各种“向善意伸出手来”的建议显示了九十年代初的特点，关于不知不觉地“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预告又是九十年代末的特点。据说，危机、战争和革命已是过时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的童鞋，已穿不下了；议会和工会，国家的民主和工厂里的民主会打开通往新的、更美好的制度的大门。

事物的发展对所有这些幻想作了令人可怕的检验。九十年代末以来，没有出现宣告过的温和社会改良方面的文明发展，却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矛盾极其尖锐化、高度使用暴力的时期，在社会的基础中，出现了风云激烈、矛盾冲突、动荡不安的局面。在十年经

济高涨时期以后的十年中，出现了两次震动全球的经济危机；继二十年世界和平以后，上世纪最后十年中发生了六次血腥的战争，本世纪头十年中又爆发了四次流血革命。代替社会改革的是《防止政变法草案》<sup>①</sup>、《苦役监禁法草案》和实行苦役；代替工业民主的是资本家们纷纷组成卡特尔和雇主协会；国际上大批解雇工人。在国家政体中，民主不但没有新的发展，连最后的一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残余也已毁灭殆尽。仅仅在德国，九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就经历了民族社会联盟<sup>②</sup>的兴起和不久之后无可挽救的瓦解，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对派的分裂及其两部分在反动沼泽里的重新联合<sup>③</sup>，最后，中央党从激进的人民党变成了一个保守的执政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变动。今天到处都是革命工人阶级单独反对统治阶级团结一致的、敌意的反动行径及其险恶诡计，革命工人阶级只能靠自己。

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整个发展都是在一个标志下完成的，它的结果都是从一个公式推导来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历史轨道上不是新的因素，不是突如其来的转折。资本从其摇篮开始的历史就一直伴随着军备和战争、国际对立和

---

① 1894年12月6日政府在国会上提出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刑法典和新闻法》的法律草案。这一个所谓的防止政变法草案将在法律上认可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由于群众的抗议，特别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坚决斗争，在1895年5月11日国会的二读中草案被否决了。——编者注

② 民族社会联盟于1896年由弗里德里希·纳乌曼创立，1903年8月解散，因为1903年6月的国会选举结果表明，它并未达到通过社会福利方面的许诺和沙文主义的口号去争取工人阶级的目的。民族社会联盟的大部分成员转向了自由思想联盟。——编者注

③ 1893年6月6日德国自由思想党的一些很有影响的党员赞同军事法草案，与此相联系，该党分裂成自由思想联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1910年3月6日，这两个党和德国人民党合并为进步人民党，这是一个明显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的自由主义政党。——编者注

殖民政策。由于这些因素的极度加强，这些矛盾的集中和大量积累，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时期。随着资本的大量积累，国内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和激化，国外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和激化，帝国主义既是这一积累和矛盾激化的后果，又是二者的原因，它发挥辩证的相互作用开始了由猛烈冲击的资本用武力分割世界的最后阶段。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海上和陆地进行一系列无尽无休、闻所未闻的军备竞赛，一连串血腥的战争从非洲蔓延到欧洲，并且随时可能使星星之火变为全球大火。此外，几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再也无法祛除物价高涨、群众饥荒的妖魔。就在这样的形势特点下，将近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劳动的世界节日又来临了。这些特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五一节思想的富有生命力的真理和力量的有力证明。

五一节的创造性的主要思想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己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它是几百万劳动者的政治性群众行动，他们在平时的日常议会政治生活中，由于受到国家限制而相互分离，往往只能是用选票，通过选举他们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而法国人拉维涅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sup>①</sup>上的杰出建议：直接举行国际性群众示威，把罢工作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示威行动和斗争手段，正是对这种通过议会间接表达无产阶级意志的做法的补充。

事实上，这个思想、这个新的斗争形式在最近十年中得到了多么快的发展啊！群众罢工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斗争武器。它作为示威行动，作为战斗武器，将近十五年来以数不清的种种形式和深浅程度，在各国反复发生。它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

---

<sup>①</sup> 指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编者注

命重新兴起<sup>①</sup>的标志，作为比利时无产阶级手中顽强斗争的武器<sup>②</sup>刚刚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德国当前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普鲁士选举权问题由于至今停滞不前，很自然而然地就指明，普鲁士无产阶级日益高涨的群众行动以至群众罢工是解决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不奇怪！帝国主义最近十年的整个发展和整个趋势使国际工人阶级越来越清楚和具体地认识到，只有最广大的群众自己起来，只有他们自己采取政治行动，进行群众示威游行和群众罢工——这些迟早必然引向争取国家权力的革命斗争时期——才是无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所能作的正确回答。在这疯狂扩军备战的时刻，只有工人群众的坚决斗争的态度、采取有力的群众行动的能力和意愿，才能维持世界和平，才能延缓行将爆发的世界大战。五一节的思想是坚决采取群众行动，以此显示国际团结并把这当作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手段的思想，它越是在国际最强大的队伍——德国工人阶级中扎下根，我们对此就有更大的把握：经过迟早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劳动界将和资本界进行最后的较量并取得胜利。

发表于1913年4月30日《莱比锡人民报》第98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191—194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① 从1910年底起，俄国的工人运动显得活跃起来。工人们从防御性的罢工转为进攻性的罢工，从一个个企业的行动转为群众罢工，还首次重新举行了政治游行。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数量显著增加。它在罢工者总数中的比例由1910年的8.1%增加到1912年的75.8%。——编者注

② 1913年4月14日在比利时开始了一场争取普选权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它从1912年起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作了细致的组织准备、资金准备和思想准备。大约45万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在比利时议会表示允许在一个专设委员会中研究选举权的改革以后，比利时工人党于1913年4月24日决定结束罢工。——编者注

# 策略问题

(1913年6月26日)

## 一

如果将最近几天中我们党内策略方面提出的建议和见解综合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极不协调的音乐会。一方面妥协策略的代表人物和鼓吹者，如弗兰克和布赖特沙伊德<sup>①</sup>得到波洪《人民报》的同意，迫不及待地号召举行群众罢工；另一方面，一家持激进观点的党报，即埃森的《工人报》宣称，政治性群众罢工在德国短期内行不通，要搞这一种行动我们还远远没有成熟和武装起来。许多组织要求下届党代表大会着手“有计划地给工人阶级作群众政治罢工的教育”，甚至逐渐开始比利时那样的准备性的储金行动；而另外一些人，如梅尔费尔德同志却在《新时代》上宣称，政治性群众罢工的阶段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说早已过去，德国人搞群众罢工简直就好比熊走钢丝一样。<sup>②</sup>

从这种混乱情况可以看出两件事。第一是，一旦党感觉到需要推进自己的行动、防止停滞不前并且发挥力量时，群众罢工的思

---

① 巴登机会主义者路德维希·弗兰克和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被群众要求罢工呼声所迫，承认群众罢工是进行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手段。——编者注

② J·梅尔费尔德：《引人深思的见解》载于《新时代》第31年卷（1912—1913年）第2册第398—401页。——编者注



想总会自行冒出来，并且被人们本能地当作策略的中心问题。第二个同样确定无疑的明显事实是，对于群众罢工的运用及其条件和目的，我们队伍里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认识仍旧是极其模糊的。

例如，认为普鲁士的群众罢工可以同巴登的大联合<sup>①</sup>联系起来的想法就表明一种对群众罢工的纯粹机械的和肤浅的理解，它完全忽视群众行动更为深刻的历史联系，根本不考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群众心理。按照这种观点，在国会议员的治国艺术和外交手段失灵的地方，就可以把群众象棋子一样往前推，按照领导人的命令去吓唬敌人；而一旦与吓瘫了的敌人开始勾结和讨价还价时，群众又应迅速退出战场，乖乖地等待着，直到发出下一道命令。

如果什么办法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搞”总罢工，这正是无政府主义的粗陋的观点。事实上，群众罢工不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极端手段”，它并不象在一切其它武器都起不了作用时才从最偏僻的角落里拉出来的那种重型的备用大炮。作为无产阶级实践的群众罢工，是整个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行动的阶段，整个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一个阶段。

特别在普鲁士，各个方面的人现在之所以都运用群众罢工的思想，是因为想靠议会行动得到好处、靠自由党人来支持的一切希望全已破灭了，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整个帝国，尤其在军事法草案<sup>②</sup>

---

① 在结成“有力的多数”以对抗保守党派的借口下，巴登邦议会中的机会主义者在1910年和自由党联合。这一行动违背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并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编者注

② 1913年3月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军事法草案和抵偿法草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军备。增加的巨额军费中约十亿马克的一次性支出由国防税来抵偿。6月30日国会通过这两项法案。——编者注

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卑劣行径和反动本质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面对着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它已孤立无援了。然而当预算委员会中那些自由派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一起迫使中央党和保守党接受有进步意义的财产税，反而背着社会民主党，在捐税问题上跟中央党达成一项保护容克地主利益的妥协时，就在这同一时刻，我们却在巴登和这些自由党人结成一个以粉碎“中央党统治”为目的的选举联盟，在南德意志参加君主主义者的集会<sup>①</sup>，而在普鲁士宣称要举行群众性罢工；仅在几个月前还在帝国国会上对那位贝特曼·霍尔韦格表示，社会民主党信任他的外交政策<sup>②</sup>，而过了半年以后，又号召群众上大街游行，——这是在政治上走钢丝，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它只能既在议会中，也在大街上给社会民主党带来失败。

群众罢工本身，和竞选及任何其它斗争形式一样，不是能够创造奇迹、把社会民主党从政治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或者使一项站不住脚的政策取得胜利的手段，它本身也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但是决定斗争结果、决定其成败的，不是技术形式，而是政治内容以及所采取的整体策略。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通过广大群众亲自参与才能影响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突变、战争危险、选举权问题、工人阶级的荣誉问题都迫切需要群众采取行动。如果群众在关键时刻不站出来，党的行动就软弱无力，缺少锋芒，党会痛感自己力不从心。但是反过来说，采用群众罢工却根本保证不了社会民主党整

---

① 机会主义者，首先是巴登和符腾堡的邦议会党团的机会主义者，违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决议，利用各种机会参加表示效忠君主制的活动。——编者注

② 指爱德华·大卫1912年12月3日以社会民主党党团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说只要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它的支柱。——编者注

个行动的干劲和成效。例如，群众罢工要是和这样的策略相结合：在整个说来没有决心的情况下进行零星的猛烈冲击，把偶尔的群众行动同议会中与自由党协作的幻想结合起来，任意摆布群众，忽而将他们送上火线，忽而又在战斗正酣时叫他们退出，要是这样的话，群众罢工到头来只能成为软弱无力的试验，即使有再大的牺牲精神，也必然要遭到惨败。在这一方面，比利时十年来选举权斗争的命运应该成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鉴戒。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的整个态度中的政治攻势，这是一种策略，它在斗争时期的一切领域里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给敌人的一切挑衅以严厉的回击，每时每刻都大大提高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斗争勇气。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也就做到了：既可以使群众行动起来，还会使他们的行动得到成果。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奋勇前进的策略，会在群众中激发起必胜的信念、自信心和斗争热情；而动摇软弱、建筑在低估无产阶级力量基础上的策略，会使群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在第一种情况下，群众罢工是“自行”爆发的，而且总是“及时地”爆发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直接提出的进行群众罢工的要求却有时不会生效。

要是我们至今贯彻了一条有力的进攻策略，譬如说，在沙皇访问柏林<sup>①</sup>时举行一天群众抗议罢工，象这样的罢工在其它国家里发生过几十次了；要是在皇帝庆典<sup>②</sup>时，不是象中央机关报那样，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参加这个闹剧几乎表示歉意，而是在整个帝国举行要求实行共和制的群众游行。那么尽管这与普鲁士的选举权

---

① 1913年5月威廉二世因大婚典礼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及英皇乔治五世在柏林会见。——编者注

② 1913年6月威廉二世执政25周年庆典时进行了君主主义和军国主义性质的大规模庆祝。——编者注

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会大大增强我党的地位和我们斗争胜利的可能性，不仅在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军事法草案的斗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倘若人们对这一切卑鄙的行径听之任之，这就灭了群众的志气，而长了敌人的威风。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突然向群众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号召，那么，不是什么都搞不起来，就是胆怯上阵，这会使党十分难堪，更会使群众进一步丧失勇气。

因此，不能把群众罢工当作适用于任何政策的战略手段而随意策划。它只有作为已在进行着的行动的升级，作为群众革命能量高涨的表现，才能有威力，有效果。要想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这样的行动，那么党必须首先自己在姿态上进入全线的政治进攻。那就抛弃一切议会主义的自我欺骗的做法，抛弃一切分离主义的狭隘政策，抛弃一切对“新”老自由主义的幻想，抛弃一切想在今天靠民族自由党人的帮助去推翻中央党、明天又靠这个“货真价实的反动派”——中央党的帮助去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一切试验。如果说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是同整个德国的根本利益有关的，那么同样，整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是普鲁士的事情。不是毫无目标地提出群众罢工的口号，而应以彻底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按照在北方和南方全线发动果断进攻的方针，制定出总的策略，这是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 二

(6月27日)

现在产生了使许多一向乐于斗争的同志深感忧虑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采取富有成效的群众行动？仅仅拥有整个工人阶级一小部分这样的组织状况是否允许在德国考虑群众

罢工？最近梅尔费尔德同志发表的见解认为，德国人由于其民族特性不具备搞轰轰烈烈群众行动的能力。很明显，这种看法几乎不值一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历史发展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在主要表现形式上，它是由社会和国际的总形势所决定，而不是由民族气质之类的次要因素决定的。有影响的不如说是各国特有的政治史和与此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德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大革命的传统，因此德国无产阶级也同样如此，这一缺陷肯定一直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它使人们缺乏一定的自信心，对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警察国家的“法制”以及警察马刀的权威表现出过分的根深蒂固的敬畏。然而，即使这种心理状况也终究会在重要的时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革命形势下得到迅速改变。而且象梅尔费尔德同志在《新时代》上发出的那种关于我们已经“资产阶级化”的笼统和绝望的哀鸣是毫无益处的。某些“激进”的同志还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内心自我原谅的托词，为自己在实践中马马虎虎地对待一切作辩护，它实际上不过是我们队伍中那种把党内发生的一切总是视为完美无瑕的、糊涂的半官方观点的对应物而已。历史的发展能够扫除某些沉重的拦路石，也会克服我们四平八稳的思想。它很善于给那些极度谨慎温和的人在可能时灌输辩证法，这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印刷工人第八次全体会议<sup>①</sup>上再次获得了证明。在那次大会上，作为对生产技术变革的反响，充满着普遍不满和深深焦虑的气氛。这说明，即使很不受人信赖的德国熊，也在历史发展的灼热铁板上逐渐学着跳舞了。

很重要而且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整个无产

---

<sup>①</sup> 德国印刷工人协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1913年6月16日于但泽举行。——编者注

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对于工人从事群众行动的成熟性的最大怀疑偏偏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势力最强大的国家里，这当然是十分奇怪的。在瑞典和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法国和奥地利，瑞士和匈牙利，我们十几年来看到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群众罢工，而唯独在德国，在这个组织上、纪律上和选举胜利上都是榜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搞群众罢工居然还不成熟！如果这种观点本身不仅仅是由于严重缺乏历史观而产生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组织的评价倒真是可悲的。

按照那种说法，那我们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中的男男女女一个不漏地登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时，才是“成熟”到可以搞群众罢工。热心于组织工作固然可嘉，但是这种观点是危险地低估了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历史作用及其行动能力。人们最后一定会疑惑不解，搔头发问：至今的世界历史，在没有我们、没有选举协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情况下，是怎样走过来的呢？阶级斗争，这个偏偏在我们的队伍中时常被遗忘的事情，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相反，社会民主党自己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个产物，是它的最新产物。阶级斗争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同时存在；过去不论何时何地，一旦时机成熟，总是劳动大众在行动，是他们在战斗并决定斗争的胜负。而那时候，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选举协会，也没有党的刊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怎么会有农民战争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怎么发生的？还有宪章运动，1848年和1871年社会主义组织只有很少几个秘密团体时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运动，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一些运动，已不再象有人对农民战争完全错误地解释的那样是绝望的乌合之众的暴乱。它们是具有政治思想、毅力、顽强性、牺牲精神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严肃认真并有崇高精神的伟大运动。虽然在1848年的革命中，在巴黎公社中都曾犯过错误，做过蠢事，但是，我们的领导

人干的蠢事难道还不够多吗？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事业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阶段都能取得成熟和获得胜利，同样，它也不能保证不犯政治错误和历史错误。正象一切奋起斗争的阶层从来必须做的那样，我们也得每天重温历史，不断学习。

当然，社会民主党由于在理论上看清了斗争的社会条件，从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自觉性，并给予它明确的目标和坚持的力量；它首次建立了持久的工人群众组织，从而给阶级斗争以牢靠的支柱。但是，如果以为从此以后，人民的一切历史性行动的能力也就全部转移到社会民主党组织身上了，以为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从此变成了一锅粥，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历史累赘的话，这就大错特错了。完全相反。尽管有了社会民主党，世界历史的有生命的物质仍旧还是人民群众，而且，只有在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不断地进行血液循环，只有用同一个脉搏使这两者都活跃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能表现出采取历史性行动的能力。

如果幻想只有把全体劳动群众全都纳入党的范围后才能创造历史，那么我们便是在错误的圈子中打转了。我们的组织越是壮大，拥有几十万、几百万人，就势必加强集中主义，然而这样一来，在党的日常生活中各个组织所具有的少量思想政治内容、首倡精神和果断性，也就统统转移到一小部分人的领导集团身上，即党的选区协会执行委员会、地区执行委员会和国会议员身上。给广大党员群众剩下的就只有交纳党费、散发传单、参加选举、拉人投票、登门鼓励订阅报纸之类的义务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柏林的组织，在那里，凡属重要的领导工作和决定全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的，从下面来的主动精神，通常要经过各级领导机构的层层关卡，就象碰在一道铁丝网上一样，撞得支离破碎，毫无生气了。

但是这种想法是离奇的：不断地使数百万人只忙于去完成经

常性的义务，讨论讨论增加党费、聘用新的送报员的问题，选举第一和第二主席及司库，或者为了调剂一下生活，去处理干部中种种局部的琐碎争执，而这种争执在许多人一起工作的地方都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想法是离奇的：只要机械地把这些官僚琐事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就可以逐渐把二百万、三百万、四百万及更多的人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并且能把他们保留在组织中。

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不如说更加需要从量转变到完全另一种质。广大群众必须用自己所特有的方式活动，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高度干劲和能量，他们必须自己作为群众而活动和行动，发挥热情、勇气和决心。但是因为我们日常的组织机构没有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为此毕竟也需要不能人为创造的历史环境——，因为在我们的组织当中反而连群众最起码的精神生活也被集中主义所扼杀了，所以必须永远抛弃这种妄想：似乎我们总有一天会做到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统统变成交纳党费的选区协会会员。

把这作为大规模群众行动的先决条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所必需的只是，每当政治形势需要时，党以大胆的倡议和行动站到群众的最前列。这样，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甚至那些已参加政府组织的阶层，都会热心地跟着党走。那同一个从反面再三引起我们同志极大注意的比利时的例子仍旧可以证明。从比利时的试验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即正面的教训恰恰是这样的事实：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在重要时刻决不会不起作用，社会民主党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众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在比利时，工会以及政治的组织几乎一团糟，无论如何，它们远远比不上德国的组织，然而二十年来，在那里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了争取选举权的声势浩大的罢工。

当然，只有党的领导坚定果断和明确透彻，群众才能取得成就。如果老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话，那么群众行动最后也会一无所



获。不论怎么说，要是某一个政治行动失败了，那么出问题的不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而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党及其领导。

社会民主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该带头冲锋陷阵。但是，如果它妄自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有资格创造历史业绩，而阶级本身却微不足道，在采取行动之前，它首先必须全部转变为政党，那么，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民主党将成为阶级斗争的阻碍因素，它在时机成熟时，不得不跟在工人阶级后面，违心地被它拖着去决战。

### 三

(6月28日)

幻想通过某一次由党代表大会决定或受它委托而决定的群众罢工，即可快刀斩乱麻似地一举解决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这无论如何是个致命的错误。想象也许可以经过长期细致周密的准备，穿着最漂亮的服装在规定时刻“突然爆发”出某一个孤立的群众罢工，这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空想。用这一种方式，即按照严密的计划，听从号令，当然可以根据特殊的、暂时的理由举行短暂的示威罢工。这种罢工当然也有它的重要意义，特别在德国，作为一种崭新的行动形式可能如此。但是在普鲁士选举权问题上，如果想照搬比利时的模式，用那一套方法筹备并且刻板地举行罢工，这样来取得一些成果，那是空想。对于这种庄重宣告并经过悉心准备的群众罢工，对方会比我们作更好的准备，而且很可能随我们去罢工好了，想搞多久就多久。到头来只好完全象在比利时一样，随便找个借口中止罢工，从战场上一无所获地撤下来，并且还让人家对这种卓越的纪律性赞赏一番。在我们这里，要是把这样的群众罢工作为目的，那么，不采取任何行动肯定要好得多，因为这一种方式

在群众中所引起的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希望，孕育着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失望和沮丧。在争取普鲁士选举权的斗争中，任何一种在坚持十天或二十天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胜利的罢工，都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和尖锐的斗争时期，要根据斗争的具体变化和总的形势，发动许多长短不同、性质不同的群众罢工：示威罢工和斗争罢工、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激励群众的因素，利用一切较大规模的工会纠纷、失业者运动和诸如此类的斗争，尤其应唤起沉默的公务员、公共事业中的职工，从而把群众的所有能量都激发出来，把激荡在他们心中的一切愤怒引导到同一条政治斗争的渠道上，并且把压力提高到最大的强烈程度。这样的行动要取得成果，要把人民群众真正的全部力量都投入进去发挥作用，从来就必须具有暴风骤雨的性质。这就已经决定，不能凭一个现成的、连最细小、最琐碎的地方都制定好的战斗计划，并且在衣兜里装着一份计算好要花多少代价的帐单向这样一个斗争时期前进，不能让“合法性”变成领导的首要忧虑，把纪律性作为斗争的战斗口号。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创造历史性业绩的伟大政治斗争时，决不能象驯兽者训练野兽那样，站在铁栅栏后面，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护身棒。对我们说来，在大规模的斗争中，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狂热同领导者的动摇不定相比，整个说来危险性要小得多。

因此，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按照实践中唯一能加以考虑的那种形式来讲，运用群众罢工并不象某些同志想象的那么容易。用目光短浅的手段和畏缩不前的政策，是不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斗争的。目前，我们的责任不是“准备”某“一次”群众罢工，而是使我们的组织准备好从事大规模政治斗争的能力；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进行群众罢工”，而是教育社会民主党去发动政治进攻。

目前，使我们党感到困扰的普遍失望的状况，也不是什么新现

象，这只不过是国外政治——摩洛哥事件和国际反战行动给我们造成的困难的继续。假如人们把最近几年的经验直到现在的军事法提案的经验作一总结，那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给工人阶级以越来越沉重的政治打击，而我们的行动却往往没有达到可以与之匹敌的程度。

这也毫不奇怪。要是追究谁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罪人”，这就错了。我们的组织机构和我们党的策略，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的二十年来，基本上是按照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这一主要任务来安排的。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并在这一斗争中发展壮大。但是，帝国主义这个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任务，这些新任务，光靠议会政治、靠旧机构和老规矩是对付不了的。我们党必须学会在相应的形势下发动群众行动并领导这些行动。它至今还不懂得这样做，它迄今为止的领导准则往往在重要关头失去效用，普鲁士选举权斗争中半途而废的行动就是典型表现。尽管有种种搪塞之词，但是由于这次行动的中断，我们今天的进展同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完全一样。我们队伍中目前的见解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无能状态，按照这些见解，要象进行军事检阅一样展开“群众罢工”，要把纪律、领导、谨慎小心，深谋远虑这一套老家当——这些在工商业法院选举、区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中证明效果极好的手段，同样应用到伟大的历史性群众斗争中去。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还不能够有充分把握地指望赢得胜利，我们就不应承担象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这样重大的行动的责任，那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显得特别老成持重，但实际上恰恰说明政治上愚昧幼稚。我们且不说，要是有一个元帅只有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才去打仗，一般说来这就是个可怜的元帅。要是古往今来的革命志士受这样的准则指导，历史上就没有革命、没有胜利了。但是，这种战略特别是违反了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的历史法则。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通过失败、通过斗争带来的种种风云变幻检验自己，才能聚集自己的力量，为最后的胜利增强自己的力量。一切战斗到底的伟大斗争，不论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它在短短的时间里在阶级教育和历史经验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风平浪静时的千百篇宣传文章和千百次大会要大得多。那些只有在胜利万无一失时才去斗争的人，应该牢牢记住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里的名言：

“……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sup>①</sup>

这始终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律，在社会民主党出来领导这场斗争以后，仍然如此。因此对于它来说，作为当仁不让的群众领导者，所必需的不是为寻求确有把握的胜利而操心，而是遵循一个革命政党的基本戒律：比任何一次失败要糟糕千百倍的，是在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地方长期躲避这个斗争。

发表于1913年6月26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45号；1913年6月27日第146号；1913年6月28日第14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246—258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 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

(1913年10月)

## 一

我们党上次耶拿会议<sup>①</sup>与以前党代表大会的不同特点是，会上意见争论的中心不再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修正主义，而是在新的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两个新问题。只要我们还是不得不把党代会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就伯恩施坦对贫困化理论、灾变论、贪食奇谈的“误解”进行争论，或者和南德意志的预算案赞成者以及君主主义派群众大会的参加者进行争论——这种情况是1898年到1910年几乎所有的党代表大会的特点——，那么结果毕竟只是保护了原有的财产。当然，那些争论也不是偶然现象，而不如说是运动向纵深迅猛发展的象征，由于这一发展，一部分党员同志受到诱惑，怀疑起原来的革命原理来了。当然，如果党不打算放弃它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话，那些辩论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更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正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必要再一次维护理论的明确

---

\* 1913年10月初《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对代总编辑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采取粗暴态度，拒绝刊载本文，因此本文直至1927年才发表。——编者注

① 指1913年9月14日至20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编者注

性和原则的坚定性这一原有的财产，因而好象总是停留在原地没有进展，结果就使党内许多人情绪低落、感到厌倦。尤其是理论争论肯定会被我们党员群众看成往往只是空洞的“学究之争”，是吹毛求疵、咬文嚼字。

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却截然不同。引起辩论的争议问题是两个完全实际的问题，它们必然直接关系到每个有觉悟的工人，必然引起他们的高度注意，不管他在工会中，还是在党组织中工作。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由某一个陷入迷途的理论家在书房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或是由于我们南德议员们的别出心裁，为了震动全党而突然摆到桌面上来的。我们在耶拿不得不辩论群众罢工和捐税问题，是由于我们斗争的整个条件改变了。

就群众罢工问题来说，今年的党代表大会当然只是把1905年和1906年已经辩论过并且作出决议的一项事情拿出来辩论。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因为原则上已承认群众罢工，而且实际上谁也不打算在德国立即宣布群众罢工，所以这个讨论，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及其理论家们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在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的发言人把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说成是一场毫无用处的词句之争，甚至是有害的争论，它会把我们日前的无能状态暴露给敌人。然而，这个观点本身最好不过地证明，1905年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的耶拿决议，对于我们从事实践及理论的“领导机关”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纸空文，为了把这些法律上的文字逐渐输进党的生动的血液循环中去，进行一次新的辩论是多么必要，而且现在仍旧是多么必要。

1905年的耶拿决议是在俄国革命及其胜利推进的直接影响下作出来的。它产生于欧洲无产阶级大军进行伟大斗争、革命激情高涨和全面向前推进的时代。同年一月，德国公众就被鲁尔区矿工的大规模斗争深深触动。在奥地利，争取普遍的、平等的选

举权的斗争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掀起了最高浪潮。当时贯穿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的活跃气氛——革命的决心和对工人阶级自己力量的信心，对耶拿群众罢工的决议起了很大的影响。现在人们只需再读一下倍倍尔在党代会上重要讲话，仍旧会感觉到贯穿在整个讨论和决议之中的彻底革命的决心和极其伟大的革命传统这个强烈的音符：“看看俄国，看看六月战役，看看公社！凭这些殉难者的亡灵作证，难道你们就不能为了捍卫你们至高无上的人权而挨饿几个星期吗？”<sup>①</sup>这是最高尚的理想主义光辉，关于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在它的照耀下作出来的。

但是，要是以为那个观点在这以后，或者仅仅在当时也已受到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人士的支持，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要忘记，就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之前几个月，即1905年5月，科伦工会代表大会在群众罢工问题上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决议。群众罢工在那里作为不可使用的、甚至有害的武器被抛弃了。不仅对它的宣传，而且对它的讨论，都被当作危险的玩火行动而遭到禁止。这个禁令肯定未说出广大工会会员群众的心里话，他们是和党员群众相一致的，他们在这以后不久就在全国热烈欢呼耶拿决议和倍倍尔的发言。但是，科伦工会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要到哪儿去找群众罢工思想的主要对立面——要在工会领导人的官僚保守主义中去找。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当时就是明确地针对工会领导人而通过的，倍倍尔的讲话大部分是对科伦工会代表大会所提论证的明显反驳。但是工会领导人敌视群众罢工的态度并没有随之消失。它面对着党的坚决态度和国内的革命激情，不敢露头了。然而它作为隐蔽的消极反抗，却依然存在。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工

---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5年柏林德文版第305页。——编者注

会总委员会的正式代表鲍威尔同志的副报告就一清二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谢德曼同志的暗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行动的意志”这几个字从执行委员会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中删掉了。这显然是被共同参加起草的另一个机构，即被那同一个工会总委员会删掉的。在一些讨论耶拿党代表大会报告的党员大会上，工会领导人的发言又继续证明了这一点。典型的例子也许是波洪的党员大会。在那个会上，莱姆彼得斯之流及其他高明的人把他们的智慧归结为一个老公式：总罢工等于总胡闹，并以为这样就提供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一切。

可见1905年原则上承认群众罢工，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结果是，今天和八年前一样，不如说我们还是面临着同样的原则上的反对态度。这一点，本来任何人都不会比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更能感觉到，因为它在和工会领导人一起制定这个失败的决议时，通过自己最直接的感受一定已经确信，耶拿决议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一纸空文。

的确，就是在党员中，1905年的热情在随后几年中也明显地消逝了。俄国革命的失败在各地使那种只重视可以看见的成就、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深感沮丧。鲁尔区伟大的矿工运动的失败也同样起着令人泄气的作用。除此而外，还有1907年我们党所遭到的几十年来第一次的选举失败。所有这一切情况汇在一起，使大家的信心和斗争热情陷入低潮，这样的低潮在工人运动活跃的历史脉搏中，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从1910年以来，在帝国主义发展的形势逼迫下，人们的斗争热情才又逐渐恢复，才发生重新采用激烈手段的情况。就我们党对帝国主义突进的行动反对得还不够这一问题而进行辩论，是1911年党代表大会的突出特点。<sup>①</sup>

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而且首先不是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结



果<sup>②</sup>，而是开支浩大的军事法提案所造成的印象，以及对形势普遍尖锐化的感觉在最近几个月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罢工问题提到了党的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

现在，客观因素又使八年前原则上通过的决议重新具有活力和越来越大的意义。现在已有条件将八年前由党的四百名受委托的代表决定的东西逐渐变成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决议。

今年党代表大会的使命是，要把形势的这一变化、以帝国主义为征兆的矛盾对立的尖锐化告诉人们，要向群众大声疾呼：你们要研究最锐利的武器，因为只有当你们在思想和政治上成熟的时候，才能在必要时从中产生行动的决心，带来胜利的保证。

但是，在这里恰恰表现出我们自己“领导机关”中的转变。现在的党执行委员会没有象倍倍尔及1905年耶拿党代表大会那样，抱着明确的目标并且不顾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将党的意志强有力地重新表达出来，而是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屈服于工会机关的压力，采用一项把表现实际决心的锋芒棱角统统去掉的平平淡淡的决议，以及在辩论中，不是指挥整个阵线来反对执拗的工会领导人，而是反对奋勇前进的党员同志。谢德曼同志在他的报告以及他的结束语中，采取了恰恰与1905年倍倍尔相反的态度。倍倍尔以尖刻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反对人们对于公开讨论群众罢工的畏惧心理，反对在我们面前把群众罢工的结果描绘成血淋淋的恐怖情景；而谢德曼却使尽了他的全部口才，从政治上反对就群众罢工进行讨论，并且谈论他唯恐出现的流血灾难！

一句话，如果说倍倍尔1905年的举动是党的一次进击，目的

---

① 在1911年9月10日至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党代表大会上，辩论的中心是党执行委员会在摩洛哥危机时采取的等待政策。——编者注

② 1913年6月3日在普鲁士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取得了775171票，但由于实行反动的三级选举法，仍只得到10个议席。——编者注

是推动工会往左的话，那么1913年党执行委员会在耶拿会议上的战略，却是让工会领导把自己往右推，并且充当他们反对党的左翼的攻城槌。

如果说党代表大会的辩论先是促使总委员会的代表明确拒绝群众罢工，如果说它因此迫使党的执行委员会终于通过谢德曼的结束语表示放弃总委员会的这个观点并且又去更加强调行动的意志，那么就它这样把整个情况向全党揭露来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收获。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尽管遭到种种反对，还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而且因此将重新被带到所有的党员大会上。群众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看到，对他们的两方面的领导人能抱什么期望，他们有机会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党的斗争方式有所前进，他们多么有必要亲自给领导人施加压力，给他们加把火。这一切是少数派无可争议的成就，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正是在这里得到了胜利，尽管他们的决议被多数派否决了。

## 二

和群众罢工问题一样，税收问题由于帝国主义最近的发展，对党来说变成了现实问题。因为，德国财产税的“新纪元”表示什么呢？确实只不过表明了这个事实：德国军国主义在突飞猛进的时候，也在检修间接税这个螺栓上一些吃劲的螺纹，并且不得不部分地争取资产阶级来负担它的开支。这样一来，在英国早已实现了的对财产课税的做法就作为崭新的事实出现在我们的议员面前，并一开始就在他们当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克服这种混乱，而且由于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譬如由于已通过的决议使这种混乱感染了全党，这很可能是现在大部分同志的感觉。

事实上，在德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几乎还没有象处理税收问题

那样极其错误地处理过任何一个严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议事日程上。看来在这期间是有足够时间为彻底探讨这个问题作准备的。然而，恰好在这里，首先是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完全失去了作用。《新时代》没有去引导，而且是从未刊登出于编辑自己笔下的这方面的文章，尽管这些编辑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十分明确的表态——虽然是和现在相反的态度，而介入税收辩论了。在这份杂志撒手不管的情况下，党只好靠每日的报纸掌握方向了，尽管报纸在一些重大的、复杂的问题上是力有不逮的。在党的集会上，税收问题等于根本没有进行讨论。不仅如此，这个问题的报告人中的一个在党代表大会前不到一个月才把他的立论原则和他的决议案公布出来，而另一个报告人则根本没有公布他的这一套，因此党代表大会陷入了这样的境地：要对一个极其重要复杂的新问题作出决定，并要确定党在不远的将来应采取的策略，却又没有对于这一责任重大的角色哪怕是略微作切切实实的准备。而党代表大会的一切做法却都是适合于只让一方在这场意见争论中大讲特讲，几乎不让另一方发言，这就使这种情况无法补救了。

在如此史无前例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会带有“临时凑合”和“草草了事”的一切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党来说，税收问题并不是由于乌尔姆<sup>①</sup>的决议案就定论了，而是才刚刚提起罢了。从现在起，理应在报刊上进行充分的、系统的工作，以便把多数派的代表，特别是乌尔姆同志在我们税收策略方面临时拼凑出来的、在党代表大会上未能给予回答的一切谬论和胡说，一一加以指明和澄清。此外，现在还理应在党员大会上系统地探讨税收问题，以便

---

<sup>①</sup> 埃马努尔·乌尔姆（1857—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从事市镇政策、税收问题的研究。——编者注

使党员群众熟悉这个问题的一切复杂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以便使他们意识到，作为“蹩脚货”而通过的乌尔姆决议案必然给我们的策略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不可预测的恶果。

如果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由于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对工会领导人的保守性反抗作了一次让步，那么，由于通过了乌尔姆的决议和同意党团多数派的策略，就对议会机会主义、对休特古姆、大卫和诺斯克这些人作了一次更为大得多的让步。把“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口号提高成为原则并据此认为，放弃原则上拒绝帝国主义的立场是“较轻的弊害”；借口“既然军事法提案已是决定了的事情”，就对批准军事开支采取原则上允许的态度；所有这些，都给至今年复一年被我党以压倒的多数无情击败了的那种修正主义策略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乌尔姆挖空思想出来一个公式：只要能够通过批准用于军国主义的经费来达到哪怕只是“防止”由于更为不利的税收而造成人民负担的“目的”，那就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个公式却赋予了批准一切预算案的全权，因为当然不能想象有哪一个预算案不能被说成是“防止”一个更不利的预算案的。

看清楚这些后果，就足以认识到，尽快地由以后某一次党代表大会来修正税收问题上临时凑合的耶拿决议，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从现在起，在报刊和党员大会上必须作好系统的准备。

不过我们认为，要是从关于群众罢工和税收问题的决定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耶拿党代表大会表明党突然向右急转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成了修正主义右翼，这就错了。到上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止，右翼还只是微弱的三分之一多数，要是右翼的发展果真如此迅速，那就是个不可理解的现象了。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获胜的多数派中，至少有一半确实在税收问题上没有有意识地搞修正主义。人们对所作的决议的真正后果和真正性质了解得不够，这对许多代表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群众罢工问题上，党

的执行委员会显然不得不在最后时刻，通过更有力地强调行动意志，为它的决议争取到多数。

如此说来，我们绝无理由假设，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通常占三分之一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以那些有意识的、一贯的机会主义代言人为代表——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不知怎么地增加了。这一次，和这个三分之一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形成多数派的是那个不坚定的和动摇的中间阶层，倍倍尔在德累斯顿按照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中众所周知的称呼，把这一派称作泥潭派：

“这始终是、永远是那场旧的斗争，这边是左派，那边是右派，而中间是泥潭派。这是那些分子，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打算做什么。这是那些‘狡猾的人’，他们总是首先听一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总是在摸索多数在哪里，然后他们就站到那里去。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现在有一大批在这次讨论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人们必须揭露这种党员（喊声：揭露！？），是的，我是说揭露，这样，党员就会知道，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动摇不定的人。对于那种至少是公开维护自己的立场的人，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能同他斗争，不是他取胜，就是我取胜，但是这些动摇分子，他们总是溜走而回避任何明显的决战，他们总是重复说：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兄弟。他们是最卑鄙的人！我最反对这样的人。”<sup>①</sup>

这个泥潭派，尽管它的各个成员的观点不坚决，但在每一个政治团体里所起的作用却是十分确定的，我们党内也是如此。在和修正主义斗争的整个上一阶段中，泥潭派支持党的左翼，跟它组成反对修正主义的坚实的多数，它和左派一道，使修正主义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明显失败。促使它这样做的，是那个似乎保守却必须捍

---

<sup>①</sup>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68页——编者注

卫的因素。必须在修正主义的革新面前捍卫“久经考验的老策略”。在一切中间派分子的眼中，这场防御战之所以神圣，那是因为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党的最高机关是公认的权威。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理论性的中央机关刊物，久经考验的有名人物，象辛格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都斗争在最前列。这样，对于泥潭派分子来说就有了一切令人放心的保证，即传统的东西和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是在这一边。

但是，帝国主义时期和最近几年尖锐化了的情况，使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使这个党尽管庞大，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战斗能力和进攻力量，必须发动群众，让他们直接对重要事件起决定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去做比竭力坚持“久经考验的老策略”的表面形式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认识到，正是这个久经考验的革命老策略，现在需要有群众行动的新形式，而在新的形势下，例如在德国实行用于军国主义的财产税的情况下，也还必须坚持这个老策略。

在这方面，首先“泥潭派”就办不到。作为保守因素，它现在反对努力前进的左派，正和它迄今反对力求后退的右派一样。可这样一来，它就从党的反对机会主义的防护堤变成了危险的停滞因素。在这停止状态的温和水域里，正是这个被压抑到现在的机会主义又能繁荣滋长起来。如果仔细观察，不仅仅在税收问题上的决定告诉人们，常胜的泥潭派本身怎样在这里不自觉地使曾在十几次党代表大会上被它赶走的同一个议会机会主义获得了胜利<sup>①</sup>，而且使人们看到，反对左派的整个斗争方式，所用的一整套论据，包括系统地歪曲对方的观点以及对于所谓轻视细小的工作、低估议会斗争和合作社、盲动主义倾向和对于更多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的顽固“误解”，所有这些装备确实确实都是从修正主义派的兵

---

<sup>①</sup> 在原手稿中“胜利”为“王牌”。——德文版编者注

器库中取出来的。右派过去多年抛出来反对泥潭派的论据，现在被泥潭派在反对左派的斗争中逐字逐句应用了。

最终决定泥潭派的态度的是，“领导机关”转为反对左派了。在倍倍尔的领导之下向右派作了多年斗争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现在接受右派的支持来反对左派，捍卫保守主义了。最后还有理论杂志《新时代》，自从1910年以来，它和党的执行委员会一起改变了阵线。在它的支持者中，最近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中派”这个术语。确切地说，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派”就是表达泥潭派目前的政治作用的理论术语。依靠泥潭派，联合右派，党执行委员会和党团多数派在耶拿党代表大会的关键问题上赢得了自己的胜利。为“久经考验的老策略”在耶拿获得胜利而欢欣鼓舞的考茨基忘记了想一想这个奇怪的情况：这一次登台表演的是这一些勇士——休特古姆、大卫、诺斯克、理查·费舍，而他考茨基为了捍卫这个老策略曾经不得不跟这些人斗争了十多年。

这个新的状况并非偶然，它是因为我们党的生活的内外条件发生变化而合乎逻辑地形成的。如果没有党外的事件突然加速这一发展进程，这种状况也许会延续好几年，——我们这样估计是对的。即使这种局势对于某些同志来说很不如意，但没有丝毫理由悲观和沮丧。这个时期也和每一个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形势一样，一定会被“啃掉”。相反，我们对事物看得越清，就能够更有力地、目标更明确地、更愉快地继续斗争。从耶拿党代表大会产生的下一个任务，是系统地反对“泥潭派”，也就是反对党内思想上的保守主义。这里也只有这唯一有效的方法：动员广大党员群众，将关于群众罢工和税收问题（及一切策略上的争议）的讨论，带到党员大会、工会大会和报刊上去，以此来激励人们的思想。事物的进程本身将以历史的必然使人们一天天地更加承认左派的策略意图的正确性。如果发展的本身导致战胜党内的停滞因素，那么，耶拿党代

表大会的少数派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耶拿党代表大会已搞清了党内相反力量的对比，并首次引导左派团结一致地反对泥潭派与右派的结盟，这作为续续发展的可喜开端，当然是值得赞赏的。

发表于《国际》第10年卷（1927年）第5期第148—153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343—353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

(1913年11月21日)

我们获悉，罗莎·卢森堡同志受她在国际局里所代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委托，于本月14日向社会党国际局递交了如下建议：

“我们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列入今年12月14日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的议事日程。

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迫切，不仅是由于两年以来在俄国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受到混乱状况和派别斗争的严重牵连和损害，而且还由于如下事实：

a)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个统一的机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刚刚轻率地发生分裂。<sup>①</sup>

b) 列宁派方面还在其它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中，譬如在俄属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中，有计划地煽动分裂。<sup>②</sup>

---

①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由七名孟什维克和六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由于孟什维克占一票的多数，布尔什维克无法贯彻革命的议会策略。这六名布尔什维克议员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于1913年10月组成独立的党团，按照列宁的建议命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编者注

② 在1908年至1911年俄国反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取消派的资产阶级思潮而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在这段时间里，设在柏林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采取了处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取消派之间的中间立场，并同波兰的各组织断绝联系。1912年夏天，总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反对它的政策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组织，还宣布这个组织不再属于俄国

c) 国际局中的俄国代表的情况不符合规定。俄国代表产生的根据是：两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在1910年由统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以代表党的统一；而事实上其中一个代表从1912年以来只代表一个由他建立的特别组织<sup>③</sup>。

我们提议，国际局应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同时采取能够加速促成统一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仍旧不能生效，应当采取类似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处理法国党的统一问题<sup>④</sup>的方式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列入维也纳国际代表大会<sup>⑤</sup>的议事日程。

发表于1913年11月21日柏林《前进报》第30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356—357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社会民主工党，理由是这个组织中混进了间谍，从事分裂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对于这一诽谤，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12年8月31日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一封信中提出抗议，其中声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无权决定谁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为它本身同以列宁为代表的、在1912年1月会议上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同取消派的中央都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参看《列宁全集》第18卷第267—268页。——编者注

③ 1912年1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在俄国实际领导党的工作的俄国中央局，从而最终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编者注

④ 在1904年8月14日至8月20日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特别鉴于法国的情况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一个国家的各社会主义团体在国际代表大会所确定原则的基础上统一成一个党。后来，法国的各社会主义组织在1905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编者注

⑤ 原定1914年8月23日至29日在维也纳召开第十次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举行。——编者注

## 对1913年12月13、14日 社会党国际局伦敦会议的说明\*

(1913年12月23日)

本月18日《前进报》关于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报道<sup>①</sup>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并由于篇幅短，没有充分叙述辩论的过程，因此读者不明白意见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

考茨基的决议案里原来有这句话：执行委员会应该和一切“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达成协议，以便召开一个全面的俄国党的代表会议。我的论述是针对这句话的，而报道者却说这里涉及的是对决议作“小小的更改”，因此他是完全错误地判断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德国代表的决议案是支持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关于恢复俄国工党统一的提议的，我以赞许的态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又不得不反对决议中的上面那句话，特别坚决反对考茨基提出的论据。

---

\* 标题是德文版《卢森堡全集》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① 指1913年12月18日《前进报》第333号上的《国际局》的报道。在1913年12月13日至14日的伦敦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有一个议程是恢复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卡尔·考茨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赫尔曼·莫尔肯布尔提出的决议案，委托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组织俄国工人运动内的所有派别进行一次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为目的的讨论。这个决议对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到失败的取消派有利，因此布尔什维克拒绝接受。——编者注

我大致作了如下的论述：如果以为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俄国自顾地临时凑成一个全新的党，这就完全错了。问题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党，而是恢复原来的党。所以，必须重新联合起来的不是那些“愿意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受约束的分子，而是那些认为原来的党的纲领章程、也就是党的决议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的派别。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是一张白纸。这个统一的党已经从1906年起一直存在到不久以前，它是革命的历史产物。因此，现在想一笔勾销俄国运动最近六年的历史，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办不到的。相反，必须把上述的发展当作出发点。在俄国争论的起点恰恰是：应当把工人运动建立在老的革命的党的基础上，还是应当和过去决裂，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基础？要是国际局赞同后一种方案，那么毫无疑问，它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完成不了它的任务。

此外，这篇报道说我讲了“人们必须站在合法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在俄国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引起误解的说法。我根本没有讲到要在所谓俄国宪法的“合法基础”上活动，也就是在合法的工人协会和类似组织中活动，而是要求国际局在恢复统一的行动中应该以党内的合法性为依据。这就是说，应该尊重原来的党的基础和决议的权威性。报道说，决议正文中的改动是在拉平斯基的提议下作的，这同样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是考茨基自己把愿意同一切“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达成协议那句话改为：同“所有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派别”。他把这个改动解释为对我所发表的观点的让步。最后，至于报道中说到我似乎收回了我的修正案一事，那么我要说，我没有什么理由要把它收回，因为主席王德威尔得已经声明：执行委员会把首先必须和俄国的和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达成协议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又不愿意预先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因此它也可以同其它派别进行商谈。对此

当然无可非议，况且这首先是一次为了弄清争议之点而进行的磋商。

发表于1913年12月23日柏林《前进报》第338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德文版第3卷第360—362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五一节二十五周年

(1914年4月27日)

各国生活中的四分之一世纪好比人的一生中的一秒钟。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自从有国际五一节以来过去的二十五年，变化是多么大呀！

在1890年通过五一节而首次宣告新的国际纽带产生时，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到处给人以弱小队伍的印象。最主要国家的工人政党还只是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才成立的，它的先锋——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非常法进行了十一年的较量，刚刚取得胜利。今天，德国的党和德国的工会已有数百万成员；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强大的、组织起来的党和壮大的工会站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前哨战士在议会中为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辩护，而从那以后，它开展了大规模的议会行动，在所有国家进入了从中央议会一直到市镇参议会的整个立法机构。在这二十五年中，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系统的教育工作和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也产生了。

但是，工人阶级的不断兴起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内部深刻变化的一个反映。

资本主义的生产、世界的工业化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大踏步地前进。在一切领域中，特别在电气技术和化学工业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空中交通的开辟，得到了料想不到的发展。同时，资本

的集中、工业企业的集中、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扩大、集聚起来的银行资本的兴起及其国际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优势。

这二十五年在政治领域里受到一种新现象的影响，即帝国主义的影响。八十年代末，小小的欧洲还是抱着其曾姨婆时代的打算、使用其古老方法和手腕的国际外交的真正舞台，而现在国际资本在整个世界的五大洲和三大洋上，都埋下了它残杀人民的地雷，孕育着风暴，到处驱使它的启示录骑士，<sup>①</sup>去制造流血革命和世界血战。从此，雷声隆隆，很快地连续爆发了日中战争、西美战争、南非战争、欧洲与中国的战争、俄日战争、的黎波里战争和巴尔干战争，而俄国革命、伊朗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也在古城雉堞中接连爆发。它们使几千年的旧秩序变成硝烟弥漫的瓦砾，为的是宣布资本的世界统治，又同时宣布其末日的来临。

对于劳动大众来说，不管到哪里，这个变化只带来新的贫困、新的压迫和新的奴役。世界的工业化对他们来说，完全等于又有成百万人沦为无产阶级。技术的进步成了极大劳动强度的鞭子，无情地鞭打着无产者的肌肉、大脑和鲜血，以飞快的速度驱赶着他走向坟墓。集中起来的资本的攻城堡——卡特尔和企业家协会开创了一个大批开除罢工者的时代，发起了一场反对工人联合的无休止的战争。帝国主义的兴起给它们加上了可怕的军事装备负担。在二十五年前，世界市场上总算有很长一段时期的普遍降价和所谓的农业危机，也就是有廉价的粮食，这是资产阶级普遍悲叹的事业，而从那以后，出现了物价持续上涨的急转弯，现在还看不出它会终止。

---

① 指圣经《新约》中的《约翰启示录》中描绘的世界末日时出现的四个骑士，分别象征瘟疫、战争、饥饿和死亡。——编者注

因此，在激烈的矛盾、巨大的震动、时起时伏的斗争这一错综复杂的混乱情况中，最近四分之一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精确地证实和生动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所依据的一切认识、希望和意向。我们已走过了一段历史，它的每一步在无产阶级群众身上打下了无数痛苦的烙印，但它每前进一步，同时又向这些群众有力地宣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在迅速走向崩溃，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五一节是无产阶级斗争富有生气的搏动。它在1890年宣告了新的国际——各国工人的联合的诞生，从而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自卫行动预先与帝国主义阶段相对抗。在奥地利，它是激励人们为普选权而斗争的信号。在俄国，它起初还只是小圈子里窃窃传播的消息，而在1905年的革命中，它已经成为强大的胜利进军，突然出现在华沙大街上，后来在1911年，在彼得堡和其它城市中，通过五十万人的罢工，宣告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从反革命造成的沉重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为了五一节，法国无产者在富尔米和卡尔莫，波兰无产者在华沙和罗兹流血。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振作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层的第一声呐喊，它是蓬勃高涨的革命激情的最高浪头。

五一节的两个主要口号——八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和平，今天面对着越来越不可忍受的剥削压力和军国主义的疯狂，变得日益紧迫和生气勃勃了。

但是，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什么是最近二十五年来总的政治成果呢？什么是我们在当前形势下的特殊任务呢？这就是获得了这个认识：只有无产阶级强有力的群众行动才能够支持和发展我们今后的议会行动；在议会斗争和工会斗争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大决定性时刻，只有那些群众行动的最高压力即罢工，才能促使无产阶级的事业赢得胜利。



这就是五一节的精神，这是群众通过袖手不干而施加压力的思想，五一节就是从这个思想中诞生的，它今天越来越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式。

正因为如此，五一节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满活力。因为如此，它将经受住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升过程中一切不可避免的、令人沮丧的时刻。它永远是革命阶级斗争的火一般热情的使者。它永远是各国无产阶级兄弟友谊的环球彩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大军将通过它的光辉灿烂的彩门，向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迈进！

发表于1914年4月27日《社会民主党通讯》  
第47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3年柏林  
林德文版第3卷第435—438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党的纪律\*

(1914年12月4日)

12月2日的国会会议又使党的纪律问题受到重视了，党员们自然必须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不过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在探讨时必须尽可能作彻底的研究，而决不能停留在事情的表面。

任何以好些个人的协作为基础的团体、任何这样的较大的集体都需要纪律，也就是需要个人服从，舍此就不能合作。没有纪律，工厂就不能生产，学校就不能上课，军队和国家就不可能存在。那么，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的纪律是否就是这同一种纪律呢？根本不是！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纪律与工厂或军队的纪律在本质上和根源上是截然相反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纪律建立在外部强制的基础上，而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建立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前者为少数人对人民群众的专制服务，后者则为民主服务，也就是为同个人相对的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服务。任何人都不会被询问是否愿意当他自己国家的公民，每个人都必须纳税、服兵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人们是自愿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他们自愿服从这个党的群众意志，以便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把这个意志化为行动。

---

\* 这篇文章无署名，载于《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战争时期斯巴达克同盟地下传单汇编》，恩斯特·迈耶尔收集并作序言，1927年柏林德文版。书中称罗莎·卢森堡为本文作者。——德文版编者注

可是这个意志在每个时期意味着什么，党的纲领对此作了明确的、清楚的解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党所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也都作了说明。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纪律的真正基础、内在根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而且是它的唯一所在。它是把表现在工人党的纲领、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的意志不断化为政治行动的历史工具和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工人运动现在有各种各样为它服务的机构，在每个这样的机构中，人人都必须服从多数。但是，这些机构的纪律，譬如议会党团、党的执行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的纪律，只有一个目的，即执行党的纪律，也就是说，运用全党的党纲和决议。我们暂且设想，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突然以大多数或者几乎一致地作出决定，加入民族自由党，那么这时它是否有权利要求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呢？每个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团突然决定参加民族自由党，那么正是它自己最卑鄙地破坏了纪律，因此应该受到全党的审判。通过这个决定本身，它将会免除每个党员的服从的义务，正如甚至在今天的军队中，如果一个士兵被命令去从事违法的行动，他的服从的义务就被解除了。对于每个社会民主党员来说，党的纲领的约束力就象法律的强制性对于每个公民和士兵来说一样。在一个象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民主党里，任何一个拥有一百名同志的小集体，不管它是地方党员大会，是消费合作社还是议会党团，都没有权利强迫个人背叛党。全党的纪律，也就是对党纲的纪律，是在一切团体纪律之上的，只有它才可以使后者获得合法根据，而且也是后者的天然的界限。

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中，事情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我们假设了一个表面上一看就已表明是正式叛党的决议。但是，一个党团可

以不作出正式转入民族自由党的决议，但它可以作出对全党有严重后果的、实质上缔结为转盘党<sup>①</sup>的政策、与党存在以来的过去五十年的纲领、策略、传统、党代会的决议、所有小册子、报纸和鼓动演说直接相矛盾的决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决议，在以迄今为止面貌出现的全党面前就是对纪律极其明显的公然破坏。

党今天对8月4日和12月2日的国会会议是怎样看的，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而且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知道。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百一十个国会议员和三十至四十多个编辑的看法已公布于众。在一个象我们党这样的民主政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少数几个文人、党的干部或议员的观点和意志，而是大多数无产者、这几百万人的观点和意志，他们是经过仔细审查和公开深入的讨论作出自己的决定的。今天在戒严的情况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没有自由无阻的党的生活和公众舆论，广大党员群众根本不能表达出他们的看法。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下，个别议员可能在他们的选区之内得到的信任投票，在全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事实始终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在戒严状态的保护下，人们还在连续不断地严重破坏纪律，这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自己迄今为止的方向、它的面貌和它的目的。这种破坏纪律就表现为党的个别机构不但不为总的意志服务，也就是说，不但不为党的纲领服务，反而自作主张地歪曲这个总的意志。

只有取消了戒严状态的铁的纪律，广大党员群众才能够使他们的纪律重新发挥作用，才能够追究已经犯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

发表于1914年12月4日《社会民主党通讯》第125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15—17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sup>①</sup> 民族自由党被称作“转盘党”。——编者注

# 国际的重建\*

(1915年)

## 一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让位了，同时，社会党的国际也瓦解了。一切否认、掩盖或粉饰这个事实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只有一种倾向：要让各个社会党的那些致命的自我欺骗的行为和运动内部的那些导致崩溃的缺陷永远存在下去，把它们抬高成自觉的正常状态，使社会党的国际长久地成为虚构的和伪善的。

这次瓦解本身是所有历史时代都没有前例的。欢欣鼓舞的德国社会帝国主义者作为新改变信仰的人竟放肆到极点，胆敢胡说什么目前这场战争就其翻天覆地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同民族大迁移一样。我们无法估计这个爱国主义的夸张是否正确，但是无论如何，将来总有一天，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地必然会认为，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领导完全不起作用的情况是这场战争中最触目惊心的世界历史性事实。

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这个抉择是对工人党过去十年中政

---

\* 这篇著作按卢森堡的手稿刊印，因此和发表在1915年4月15日《国际》第1期上的已经过编辑加工的文本有一些出入。——德文版编者注

治方向的总概括。特别在德国，在无数的纲领演说中，在人民集会上，在小册子和报纸文章中，这个抉择已被表述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成为它对当前历史阶段及其趋势的看法。

随着今天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句话变成有血有肉的了，这个抉择由历史趋势变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面对自己首先承认、而且也使人民群众意识到的这个抉择，社会民主党却偃旗息鼓，未经战斗就把胜利让给帝国主义。自从有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来，自从有政党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象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在经过五十年的不断发展之后，在获得了头等重要的实力地位之后，在把几百万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之后，却在二十四小时内作为政治因素如此彻底地烟消云散了。它是国际的组织得最好的、最有纪律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先锋，正因为如此，在它身上可以最典型地证明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崩溃。

考茨基作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派”的代表，或者政治上来说，作为泥潭派的理论家，多年来就已把理论降为“党领导机关”的官方实践的顺从奴仆，从而大大促进党今天的瓦解；同样，他现在也已经想好了一个新理论，偏要为瓦解作辩解和粉饰<sup>①</sup>。按照这个理论，社会民主党虽然应该是和平的工具，但它不应该是反对战争的工具。或者如考茨基的忠实门徒们在奥地利的《斗争》杂志中深深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的混乱而多次发出叹息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在战争期间唯一妥善的政策是“沉默”；只有当和平之钟敲响的时候，它才会再开始发挥作用<sup>②</sup>。这个自愿接受阉割的理论认为，应该这样来维护社会主义的贞洁，即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决

---

① 见卡·考茨基《战争中的社会民主党》，《新时代》第33年卷（1914—1915年）第1册第1—8页；《国际主义和战争》，同上刊第225—250页。——编者注

② 见《斗争》一月号上弗·阿德勒的文章。——卢森堡注

定性时刻取消社会主义这个因素。它的根本错误是一切由于政治上无能而作出的估计都有的那种错误，也就是说，这是一厢情愿的算盘。

面临赞成还是反对战争这一抉择，社会民主党在放弃了“反对”态度的这个时刻，出于历史的强迫，不得不将其全部砝码投在赞成战争的天平盘里。在值得纪念的8月3日党团会议上，考茨基曾主张同意拨款<sup>①</sup>，“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这样自称）现在在《斗争》中也承认。社会民主党团同意战争拨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就是这些人，有时还因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而流泪，痛惜理论教育不够，特别在仔细分析“民族”概念和其它“概念”上教育不够，似乎那些失误是教育不够的过错。但是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即使在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逻辑的地方也是如此。社会民主党通过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决定支持战争以后，其它一切便以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自行发展。从8月4日起，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沉默”，而是担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职能：在当前的战争中充当帝国主义的侍从。拿破仑曾经说过，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次战役的结局，一个是“世上”的因素，这就是地理形势、武器状况和气候影响等等；一个是“神”的因素，也就是军队的精神状态，它的热忱和对自己事业的信念等等。当前战争中的“世上”因素，在德国方面大多是由埃森的克虏伯公司操心的，而“神”的因素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功绩。8月4日以来它为德国打仗所做的工作以及现在每天正在从事的工作是不可估量的。随着战争的爆发，工会放弃了一切工资斗争，后来又把大量劳力提供给农庄主，让他们去收割庄稼；工会还给军事当局防止国民骚乱的一切保

---

<sup>①</sup> 考茨基以《新时代》主编的身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914年8月3日下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78票对14票作出决定，同意战争拨款。考茨基建议以政府保证不掠夺领土作为同意拨款的条件，但遭到拒绝。——编者注

安措施罩上“社会主义”的圣光；日前又指挥其会员直接分发面包定量。社会民主党的妇女与资产阶级的爱国妇女一起分发乞丐汤，她们放弃了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安慰士兵的家眷。社会民主党用它的九十五种日报、周刊和月刊（约有五、六种是例外）把德军辉煌胜利的消息送到最广大的国民中间去，不加评论地传播军事当局的一切战略意图，心甘情愿地把这场战争宣传为民族的事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根据战局的变化，时而描绘俄国人的危险和沙皇政府的暴行，时而使人民去憎恨阴险的阿尔比翁<sup>①</sup>，时而为外国殖民地中的起义和革命欢呼，时而预言这场战争以后土耳其会重新强盛起来，时而许诺给波兰人、鲁提尼人<sup>②</sup>和各族人民以自由，时而教育无产阶级青年要有英勇战斗的英雄气概，总之，对公众舆论和人民群众施加影响，使他们完全接受战争的思想。最后还有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和党的领导人，他们不仅同意为战争拨款，而且还力图大刀阔斧地扼杀人民群众中任何使人不安的怀疑和批评，扼杀一切“存心捣乱的行为”；而他们自己又谨慎小心地亲自效劳，譬如通过充塞着十足的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小册子、讲演和文章去支持政府。世界史上有哪一次战争中发生过与此类似的事？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经如此不加任何考虑就顺从地容忍人们取消一切宪法权利？什么地方曾经有过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反对派，竟然在自己的一家报纸上给极其严酷的报刊检查唱那么好听的赞歌？还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找到过这样的品得<sup>③</sup>，从来没有哪个军事独裁得到过这样的奴仆，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把自己和

---

① 英国的古称。——编者注

② 即乌克兰人。——编者注

③ 品得是古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编者注



自己所有的一切统统如此热情地奉献给一个它曾千百次向自己和世界宣誓要与之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的事业。和这个转变相比，民族自由党人成了一批罗马的卡托<sup>①</sup>，成了Rocher de bronze<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及其备受赞扬的纪律偏偏表现在这里——这个有四百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小撮议员的指挥下，在二十四小时内回转身来，被人驾在一辆大车前面，而过去它是把猛烈攻击这辆车当作终身目标的。社会民主党五十年的准备工作在今天的战争中成为实在的力量。工会和党的领导人声称，德国方面在战争中的威势和克敌制胜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组织中“教育”群众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教育了德国无产阶级，却是为了使兴登堡能够率领它。同法国相比，德国的教育和组织越是好，越有闻名的纪律、工会及工人报刊越是扩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帮助也就越比法国社会民主党有效。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他们头脑简单的部长们在内，在耍弄民族主义和打仗这种不熟悉的手艺方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为祖国的帝国主义效劳相比，真是半瓶醋。

## 二

将马克思主义任意滥用来为党领导机关各个时期的日常需要服务、为它们的日常工作进行辩解的官方理论——其喉舌是《新时代》，企图如此解释工人党今天的作用和它昨天的言论之间的小小矛盾：国际社会主义虽然在如何反对战争的爆发这个问题上作过

---

① 指罗马政治活动家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老卡托），曾任监察官，以清廉和严格著名。——编者注

② 法文，意为“坚实的岩石”1716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曾用它来表示他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编者注

许多研究，但没有研究战争爆发以后应做些什么<sup>①</sup>。这个理论好象一位殷勤的打杂女仆向我们保证，在社会主义今日的实践和它的过去之间存在着最美好的和谐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党都不需要责备自己做过什么会使自己对国际的隶属成为问题的事情。”但同时，这个可伸缩弯曲的理论已确有把握地为连大傻瓜都看得出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态度和它过去之间的矛盾作充分的解释：国际只研究了预防战争的问题，可是象现在习惯说的那样，“仗打起来了”，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爆发以后的行为准则必须和战争爆发以前完全不同。一旦打起仗来，对于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就只有一个胜利还是失败的问题了。或者象另一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多地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观点来解释的那样：民族和任何生物一样，首先必须维持自己的生存。用好的德语来说就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科学社会主义迄今为止所宣布的那样，只有一个生活准则，而是有两个生活准则，一个用于和平，一个用于战争。在和平中，要在每个国家的国内进行阶级斗争，对外讲国际团结；在战争中，国内要讲阶级团结，对外要进行各国工人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宣言》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号召得到了重要补充，经过考茨基的修正之后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在和平中联合起来，在战争中互相厮杀！也就是说，今天“一枪一个俄国人，一刀一个法国佬”，而明天呢，签订和约以后便是“千百万人拥抱着去亲吻全世界”。因为国际“基本上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中有效的工具”。<sup>②</sup>

这个讨人喜欢的理论把转盘党团的反复无常同中央党的耶稣

---

① 见考茨基发表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上的文章——《战争中的社会主义党》，《新时代》第33年卷（1914—1915）第1册第1—8页。——卢森堡注

② 见考茨基登在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上的文章。——卢森堡注

会手腕结合起来，简直抬高为社会主义国际的基本信条，从而不仅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开辟迷人的前景，还开始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崭新的“修正”。与这个“修正”相比，以前伯恩斯坦的一切修正尝试好象一场无害的儿童游戏。无产阶级在战争爆发以前和同一场战争爆发以后的策略应该根本不同，甚至应该遵循截然相反的路线。其前提是：作为我们策略基础的社会条件在和平和战争中也是根本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迄今为止全部有文字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按照考茨基的经过修正的唯物主义观点，必须加上：除了战争时期以外。按照这个观点，因为几千年来社会的发展总是夹杂着间发的战争，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按下列公式进行的：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接着休止，这时是阶级团结和民族斗争，接下去又是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再休止和阶级团结，就这样温文尔雅地发展下去。和平时期社会生活的基础每逢战争都要颠倒一下，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基础到了和约的缔结时刻又要翻过来。人们看到，这已不再是考茨基和其他“存心捣乱者”一度反对过的那种认为社会是“通过灾变”发展的理论了；这是一种认为社会在翻筋斗中发展的理论。在这里，社会犹如漂浮在春天的水面上的冰山一样运动，当它的底面被周围温煦的水流融化以后，过了一定时间便沉下一节，然后再循环重复这同一好看的游戏。

但是，这个经过修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同迄今为止人所共知的一切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因为历史事实并没有表现出新近虚构出来的那种战争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对立，反而引人注目地显示了那种符合辩证法的、经常的转变，即战争转变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转变为战争，从而显示出它们内部本质的统一性；中古时代城市之间的战争中是这样，宗教改革时期的战争中是这样，荷兰的解放战争中是这样，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中是这样，美国的南北

内战中是这样，巴黎公社起义中是这样，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中也是这样；而且，即使纯粹从抽象的理论上来看，稍加思索就可以明白，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已经彻底毁坏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也好，战争也好，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很深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只要这些原因没有消除，这两者也就不可能周期性地消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雇佣关系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但在战争期间，雇佣关系丝毫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在军事工业的沃土上滋生起投机思想和掀起建厂热，由于军事专政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大大地增加了。同样，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也并没有在战争中停止，相反，由于取消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它已上升为赤裸裸的阶级专政。如此说来，因为在战争中阶级斗争的经济泉源和政治泉源要比平时强十倍地社会上涌现，作为其必然结果的阶级斗争又怎么会停止呢？相反，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战争是由于资本家集团的利益竞争和资本的扩展需要而产生的。然而这两个动力不仅在炮声隆隆的时候发生作用，而且在和平时期也同样起作用，正是通过这种作用来为战争作准备，并使它不可避免地爆发。正如考茨基最喜欢引用的克劳塞维茨的话所说的那样，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sup>①</sup>。正是资本的统治的这个帝国主义阶段，通过军备竞赛使和平成为幻想，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个阶段宣布了军国主义的专政，宣布了持久的战争。

这样，对于经过修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就产生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要么阶级斗争在战争中也是无产阶级的强大生存准则，而党的领导机关在战争中宣布用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是违

---

<sup>①</sup>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这句话见于他的著作《论战争》；——编者注

反无产阶级切身利益的犯罪行为；要么阶级斗争在和平中也是违反“民族利益”和“祖国安全”的犯罪行为。不管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不是阶级斗争，就是阶级调和。实际上，看得更明显的是如下抉择：社会民主党要么象我们队伍中从前那些年轻的莽汉和今天伪装虔诚的老年妇女已经悔恨地表示的那样，必须在本国资产阶级面前说：“主啊，我犯了罪”，并在和平中也彻底修正自己的整个策略和原则，以便适应它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要么必须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说：“主啊，我犯了罪”，让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符合它在平时期的原则。对于德国的工人运动来说是如此，当然对于法国的工人运动来说也是如此。要么国际在战后仍是一堆瓦砾，要么它将在阶级斗争这块它唯一能够吸取自己养料的土地上复活过来。如果它在战后仍旧拉出那架旧的手摇风琴来，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地、活泼虔诚地、自由愉快地重弹那些直至8月4日还令世人心醉神迷的老调，那么它决不会由此获得新生。只有通过“极其彻底地嘲笑自身的动摇和弱点”以及8月4日以来自己精神上的堕落，清算8月4日以来的整个策略，国际才能开始重建。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是按照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立即结束战争和缔造和平而行动。

### 三

涉及到和平问题，党的队伍中直到现在为止有两种不同的派别是引起人们突出注意的。一个派别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谢德曼和帝国国会的其他几个议员以及一些党报为代表，它作为政府的应声虫发出了“坚持到底”的口号，认为争取和平的运动是不适时的、危害祖国军事利益的运动而加以反对。这一派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客观上是设法让战争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继续打下去，“直至

获得与牺牲相称的胜利”，直至取得“有保障的和平”为止。换句话说，“坚持到底”的支持者所关心的是把这场战争的客观趋势尽可能引向实现那些帝国主义掠夺，而这些掠夺是《邮报》<sup>①</sup>、罗尔巴赫、迪克斯<sup>②</sup>和其他预言德国将会统治世界的人公开宣布的战争目的。如果这一切美梦不全部实现，如果年轻的帝国主义还长不成参天大树，那么这不会是《邮报》编辑的过失，正如也不是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支持者的过失一样。显然，对于战争的结局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议会中“反对一切掠夺政策”的庄严“声明”，而是“坚持到底”的主张。谢德曼及其同伙主张继续进行下去的这场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有资格代表这个逻辑的是那些今天在德国骑在马上资本家和农场主，而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和编辑这一些只给他们扶镫的小人物。在这个流派中，党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在法国，党的领导人也仍旧坚持“坚持到底”的口号，当然这是从一种根本不同的军事形势出发的。与此同时，争取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运动也逐渐在全世界越来越引人注目。最能典型地说明所有这些和平思想和和平愿望的，是仔细列出的、在结束战争时必须要求达到的和平保证。不仅列有不许掠夺的一致要求，而且还列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普遍裁军，或者低一些，有计划地限制军备竞赛，废除秘密外交，在殖民地中实行一切民族的自由贸易及其它等等更多的美好事物。值得敬佩的是，在所有这一切将来为人类造福的和防止未来战争的条款中有着毫不气馁的乐观主义，它从目前战争的可怕灾难中完好无损地产生出来，它在埋着老的希望的坟

---

① 《邮报。柏林最新消息》是帝国党和自由保守党的日报。——编者注

② 保尔·罗尔巴赫是沙文主义的政论家，他首先赞成东南欧—小亚细亚扩张路线。自由民主党的阿尔图尔·迪克斯同样是德国扩张政策的理论家。——编者注

墓上又栽上了新的希望之苗——决议。如果说8月4日的破产证明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证明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教训：和平的有效保证和防止战争的真正护堤不是向统治阶级提出的虔诚的愿望、巧妙地设想出来的方案和空想的要求，而只是、仅仅是无产阶级的这种坚强意志：任凭帝国主义刮起任何风暴，要永远忠于本阶级的政策，永远忠于国际团结。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是缺乏要求和公式，而是没有能力按照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意志和行动来作这些要求的后盾。今天，按照我们经历过的一切来看，把和平行动理解成冥思苦想出反对战争的最妙处方，这是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说它不管一切严酷的教训，什么也没有学到，又什么也没有忘记。

在这方面，我们在德国也可以找到典型的例子。最近在《新时代》上国会议员霍赫提出了一个和平纲领<sup>①</sup>，正如一家党报给他作证的那样，他满腔热情地鼓吹这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应有尽有，既不缺按顺序列出的“要求”单，要求用没有痛苦的、稳妥的方式预防未来的战争，也不乏颇有说服力的阐述，阐明立即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必要的和合乎人们希望的。只是少了一条，即没有说明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和平，没有说明应该用行动、而不是凭“愿望”来实现这个和平！因为作者属于党团中死硬的多数派，他们不仅两次同意战争拨款，而且每一次都把这种同意鼓吹为政治、祖国和社会主义的需要，他们在扮演新的角色时受到出色的训练，时刻准备和原来一样理所当然地同意用于继续战争的其它拨款。既主张为继续战争提供物质手段，同时又宣扬可望立即实现和平以及这一和平会带来多少好处，“一只手把剑递到政府手中，另一只手在国际上空挥舞着柔软的和平棕榈枝”，这是泥潭派政策在实践方面

<sup>①</sup> 古斯塔夫·霍赫（12月2日以后我们的任务）。《新时代》第33年卷（1914—1915）第1册第513—520页。——编者注

的杰作，而在同一个《新时代》上又从理论上宣传了这个政策。如果说中立国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哥本哈根代表会议<sup>①</sup>把在纸上制定和平的要求和方案十分认真地看作一项争取立即结束战争的行动，那么，这还是个比较无害的错误。对国际当前形势中的关键问题及国际破产原因的认识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共同精神财富。恢复和平和恢复国际的解救行动，只能由进行战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发起。在这些党方面，恢复和平和恢复国际的第一步是从社会帝国主义的轨道上转回来。如果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继续同意战争拨款，那么，他们的和平愿望和方案，他们“反对任何掠夺政策”的庄严声明，就——都同考茨基的那个“无可自责”的、每过一个时期兄弟般地互相拥抱或互相厮杀的“国际”一样了，就是说，是伪善，更糟糕的是，这是痴心妄想。同样在这里，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由于同意了战争拨款，霍赫他们就放弃了控制权，产生了与和平相反的结果，即“坚持到底”，这和谢德曼之流所做的事一样。谢德曼之流由于主张“坚持到底”，实际上把控制权交给了《邮报》的编辑们，从而造成了与自己反对“任何掠夺政策”的庄严声明相反的结果，就是说，让帝国主义的本能放纵，直至流血而死。同样在这里也只有一个抉择：不是贝特曼·霍尔韦格，就是李卜克内西，不是帝国主义，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本人身上，敏锐的历史分析家同大胆的革命家、思想家同行动家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把理论认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能力结合起来，用一方检验并

---

① 指1915年1月17日和18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瑞典、挪威、荷兰和丹麦。会议呼吁中立国政府在参战国之间调解，以便立即实现持久的和平。会上重提1910年国际社会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要求，包括设立有约束力的国际仲裁法庭等等。——编者注



丰富另一方。两者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本质，不管哪一方面，脱离了另一方面都会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半个世纪中，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中收获了最丰富的果实，用其养分抚育自己，成了一个巨人。而面临着最大的历史考验（而且在理论上它已以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样的确定的态度预见到会有这个考验，它还曾预先说明这种考验的一切重要特征），工人运动的第二个生命因素，即具有不仅要理解历史而且要创造历史的坚强意志，对它来说却没有发挥作用。它连同自己的堪称模范的理论认识和组织力量一起，被历史风暴的漩涡席卷，象一条失去控制的破船，突然转过船头，置于帝国主义的风力之下，要顶着这股风划向社会主义的救命岛。整个国际由于它的这个“先遣队”、它的经过最好训练的、实力最强的精锐部队遭到不幸，即使没有犯其他错误，它的崩溃也是确定无疑的了。

这是世界史上的头等灾祸，它使人类从滴落着鲜血和污秽的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事业严重复杂化，从而大大推迟了这个解放。但是，如果说它必然要走到这一步，那么是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一切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社会主义实践中目前的衰退状态的企图，一切要出卖它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的卖身辩护士的企图，甚至要比党的队伍中一切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的民族主义的迷惑纵欲更加危险。这些企图不但会掩盖国际严重失败的真正原因，而且还将使人们抛掉今后从这个失败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国际以及符合无产阶级事业利益的和平，只能从无产阶级的自我批评中形成，只能在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才会形成。这个力量在8月4日那天还只是一棵细细的芦苇，它受暴风雨的打击折弯了腰，可是它又挺立到本来的高度，它负有压垮社会不公正之千年檉树和搬掉这座大山的历史使命。形成这个力量的道路——不是纸上的决议——同时是通往和平和重建国际的道

路。<sup>①</sup>

——卢森堡同志二月初就已撰写了这篇文章。因为她在被捕以后无法再对文章作任何修改，我认为有责任说明以下事实：考茨基在那以后否认他曾支持过战争拨款。在一次辩论中他自己谈了他以前的态度：“我认为形势造成的困难最容易通过弃权来避免。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赞同这个方法，我觉得至少可以考虑：根据是否能得到保证来作出决定”。对于这一说法，《汉堡回声报》（它有一个或甚至两个编辑是属于国会党团的）作了如下说明：“不过有一些绝对可信赖的党员和可靠的观察家说：考茨基在被邀参加的正式讨论中根本没有认真地提出弃权的建议。如果他作过这样的建议的话，那也许是在同一些不担任负责工作的人一起喝咖啡时提出的。”对此再没有作出什么回答。见今年2月28日《汉堡回声报》第50期。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霍赫同志在3月20日属于在表决前离开国会大厅的党团少数派，因为他不愿意赞同预算，也不同意100亿新的战争拨款，而只同意50亿

——弗〔兰茨〕、梅〔林〕

发表于1915年《国际》。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0—32页。

（袁成译 常正文 殷叙彝校）

---

<sup>①</sup> 1915年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时，弗·梅林附上了这里用小体字重新印出的说明。——德文版编者注

# 尤尼乌斯提纲草案\*

(1916年2月)

1. 世界大战摧毁了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因素的革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的道义上的崇高威望，使无产阶级国际崩溃，使它的各个支部自相残杀，并且使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希望同帝国主义的航船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欧洲社会主义四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化为灰烬。

2. 由于赞同战争拨款和宣布国内和平<sup>①</sup>，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式领导人成了帝国主义的后盾，诱使人民群众耐心忍受战争带来的贫困和恐怖，并从而对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狂暴行为，对延长大规模屠杀和加重群众牺牲起了助长作用，分担了战争的责任和后果。

3. 各参战国的党、首先是至今在国际里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的正式党领导机构的这一策略，意味着背叛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基

---

\* 这个草案根据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作了几处修改，经过1916年1月1日“国际”小组代表会议的讨论，原则上得到批准，并经过编辑加工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党任务的指导原则》，以传单形式发表在1916年2月3日的《政治通讯》，第14号上，并作为尤尼乌斯小册子的附录秘密散发。——编者注

① 此词原意指中世纪贵族亲属间在城堡周围不得进行战斗的协议。应译为“城堡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来指第二国际各党放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投降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过去译为“国内和平”。今从旧译。——编者注

本的原则，背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背叛它们本国的自由和民主的利益。因此，在党的领袖忠于职守的那些国家，即俄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社会党的政策也注定是软弱无力的

4. 由于主要国家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战时放弃了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推迟到战后，推迟到和平时期，它们就给敌人即各国的统治阶级提供了时间，使它们能依靠牺牲无产阶级而从经济、政治和道义上大大巩固自己的地位。

5. 世界大战既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不是为了保卫任何一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世界大战完全是各国资产阶级为谋求统治世界和垄断对尚未被资本统治的世界的最后残余地区的榨取和剥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竞争的产物。在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能被当作欺骗的工具，用来使劳动人民群众为他们的死敌即帝国主义服务。

6. 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中不可能产生任何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小民族只是大国的帝国主义赌博中的走卒，它们同一切参战国的劳动人民群众一样，在战时被当作工具使用，在战后又将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7. 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世界大战，不管是谁失败和是谁胜利，都意味着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失败。战争的任何一种结局——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除外——都只能使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贪欲、国际矛盾、世界经济竞争和国内反动势力（大地主、煽动者、卡特尔工业、教权主义、沙文主义和君主主义）得到加强，与此相反，在一切国家中都将会削弱公众的监督和反对派，把议会降低成军国主义的驯服工具。因此，今天的世界大战归根到底只会竭力促成在一段或短或长的和平间歇之后重新爆发战争。

8. 世界和平既不能由资本主义外交家组成的国际仲裁法庭来保证，也不能通过关于“裁军”、关于所谓的“海上自由”的外交协议

来保证，也不能通过一些“欧洲的邦联”、“中欧关税同盟”、“缓冲民族国家”和诸如此类的空想的、或就其本质来说反动的计划来保证。只要资产阶级还在不受争议地行使它们的阶级权力，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就不能消除，不能杜绝。世界和平的唯一保证和唯一支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政治行动能力。

9.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的世界政治统治的最后生存阶段和最高发展，是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死敌，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斗争必须首先集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同时也是争取国内政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决定性的斗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命运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是否会振奋起来全线同帝国主义作战，以及是否全力以赴并发挥最大限度的献身精神，把“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当作他们的实际政策。

10. 为达到这一目的，今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通过一个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有统一认识的、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统一策略和政治活动能力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使无产阶级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它的这一任务是历史赋予的。

11. 第二国际由于战争而崩溃了。它在组织上的弱点已经由于它没有能力建立一个防止各民族在战争中分崩离析的、有效的道义上的防护堤，没有能力使各国无产阶级坚持采取统一的策略和行动而得到证明。

12. 鉴于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目标和利益，鉴于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国际的阵地而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是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国际必须把领导和团结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接受过来。

工人国际根据下列基本原则建立：

1. 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性解放斗争中是两个不可分离的生存准则。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和在战争时期都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否则就是自杀。

2. 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战争时期，都必须致力于铲除帝国主义和阻止战争，把这当作他们的主要目的。议会行动、工会行动以及工人运动的全部活动必须从属于这个目的：使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最激烈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随时随地突出二者之间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对立，并同时把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置于首要地位并加以实现。

3. 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重心在于国际。国际决定各民族支部在和平时期关于军国主义、殖民政策、贸易政策、五一节问题的策略，还决定战争时期应当采取的总策略。

4. 执行国际决议的纪律义务比所有其他的组织义务都更加重要。在战争中违背国际决议的各民族支部因此就把自己排除在国际无产阶级之外，并使其成员免除了一切对于它的义务。

5.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只有各国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群众才能起决定性作用。各民族支部的策略的主要注意力因此要集中在教育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活动能力，确保这些群众行动的国际联系，扩展各种政治的和工会的组织，以便随时能以这些组织为媒介，最迅速地、最有效地把国际的意志和决议变成各国最广大工人群众的行动。

6.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迫切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一束缚表现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各民族支部必须把它们在议会中和报纸上的宣传集中于揭发作为资

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的民族主义词句。今天一切真正的民族自由的唯一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际，一切其他任务都必须服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任务。

1925年7月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柏林和维也纳）第1卷第2期。第417—419  
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  
版第4卷第43—47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摘录）

（1916年4月）

## 序 言

1916年1月2日

下面这篇文章是去年4月写成的。当时的外界情况使它未能发表。

现在能出版它，是幸亏有这一情况：世界大战打得越久，工人阶级就越能看出它的推动力。

一字不动地发表这部著作，为的是让读者有可能检验一下，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如何准确地理解发展的进程。

这部著作批判性地戳穿了德国进行防御战争的神话，揭示了德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占领土耳其，它根据这些情况作出的预言此后日益得到了证实，而在今天，当世界大战的重心已在东方的时候，这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事实了。

—

情况彻底改变了。本来打算六周后就向巴黎进军，却演变成

---

\* 罗·卢森堡这部以尤尼乌斯笔名发表的著作是由弗兰茨·普费姆费尔特秘密出版的。——编者注



了一幕世界规模的戏剧；大屠杀成了老一套的日常事务，令人厌倦，而形势僵持不下，没有解决问题。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陷入困境，自己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人们再也不能支配他们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陶醉状态过去了。大街上的爱国主义喧嚣，对黄金汽车的追逐<sup>①</sup>、接二连三的错误电讯，被霍乱杆菌污染的水源，俄国大学生们向柏林每一座铁路桥梁扔炸弹，法国人经过纽伦堡仓促逃走，侦察密探的民众在街上的蛮横行为，潮涌般的人群挤向食品店，那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爱国主义歌声响彻云霄；全体城市居民变成了暴民，准备进行告密，虐待妇女，狂叫乌拉，自己也由于听信荒唐的谣言而达到神智不清的地步；这是一种杀人祭祀的气氛，一种基什尼奥夫式的气氛<sup>②</sup>，在这种气氛中只有街角上的警察才是人类尊严的唯一代表。这一切都结束了。

戏演完了。德国学者那些“漂泊不定的游魂”早已发出尖叫声。预备队伍不再受到跟在后面簇拥而来的少女的热烈欢呼，他们不再面带和蔼的微笑从车窗向人群打招呼；他们沉默不语，拎着纸板箱，慢腾腾地走过街道，而街上的人则摆出一副怏怏不乐的面孔为日常事情奔忙。

在白色恐怖日子里的死一般寂静的气氛中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合奏曲：战场上的老鹰和鼠狗发出的嘶哑的叫声。一万顶帆布帐篷，保证符合规定！十万公斤熏板肉、可可粉、咖啡代用品，只收现

---

① 1914年7月底至8月初，德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在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半官方的沃尔弗通讯社散布说，法国军官身着普鲁士军装，用汽车装载黄金经过德境运向俄国。这一说法激起人们在大街上追逐被他们怀疑的车辆并造成暴行。——编者注

② 1903年4月，沙皇政府建立的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在基什尼奥夫对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采取恐怖行动。这些暴行是沙皇政府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一种反应。——编者注

金，立即交货！榴弹、车床、子弹带、为阵亡者遗孀介绍配偶、皮带、部队供应品经纪人——这些通通都是认真的广告！八、九月间被装上车并在高呼爱国主义万岁的口号声送走的炮灰，他们的尸体在比利时、在孚日山脉、在马祖尔湖的墓地里腐烂发臭，而利润却因此急剧增长。到了把这些收获迅速入库的时候了。成千双贪婪的手臂伸向大洋的彼岸，都想捞一份。

事情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城市化为瓦砾堆、农村成了墓地，土地荒芜，居民一群群去求乞，教堂充作马厩；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联盟、最神圣的诺言、最崇高的威望，一概被碾成了齑粉；任何一个奉天承运的君主都把他在敌对方面的远房亲属视为白痴或者反复无常的小人、任何一个外交人员都把另一方的同行当作老奸巨猾的恶棍、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把别国政府看成本国人民的灾难而使之受到普遍的蔑视；在威尼斯，在里斯本，在莫斯科，在新加坡，都发生了饥民暴动，而在俄国鼠疫横行。到处是一片贫困和绝望。

面目破碎，名誉扫地，浑身血腥，遍体污垢，——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它就是这样的社会。当它打扮得干干净净、温文尔雅，装出一番尊重文学、哲学和伦理学、遵守秩序、拥护和平和以法治国的样子时，这是看不出来的。张牙舞爪的野兽，群魔乱舞的无政府状态，令文明和人类窒息的乌烟瘴气，——这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混乱之中，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历史灾难：国际社会民主党投降了。对于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者加以掩饰，那会是无产阶级所能遇到的最愚蠢、后果最严重的行为。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所有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清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

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sup>①</sup>现代无产阶级在经过历史的考验后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无产阶级的错误也象它的使命一样重大。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的那条路。历史经验是它的唯一导师，它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即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评，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当前世界大战中的堕落是没有先例的，是人类的一种不幸。但是只有当国际无产阶级不打算衡量这一堕落的程度、不想从中吸取教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毫无希望。

现在讨论的是现代工人运动发展中最近45年这一整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衡量得失，作出总结。巴黎公社的灭亡结束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一国际。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进行自发的革命、起义和街垒战（每一次无产阶级在事后都又回到消极状态），而是开始进行系统的日常斗争，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建立群众组织，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把社会主义理想同坚决捍卫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一盏严密科学学说的明灯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照亮了道路。不是在每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宗派、学派、乌托邦和进行试验，而是创立一种统一的国际的理论基础，靠它把这些国家象一本书里的各行一样连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掌握了指南针，使他们能在日常事件的漩涡中认清方向，每时每刻都把斗争策略指向坚定不移的最终目的。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5页。——编者注

这一新的方法的提出者、捍卫者和保护人过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70年的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正如法国曾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第一阶段的圣地，巴黎是那一时期欧洲工人阶级的不断搏动并且流血的心脏一样，德国工人现在成了第二阶段的尖兵。德国工人孜孜不倦地做了细小工作，付出了无数的牺牲，从而建立了最强大的堪称楷模的组织，创办了数量十分庞大的报刊，采取了最为有效的启发教育的手段，争取到最广大的选民，取得了最多的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完美无缺的体现。它作为第二国际的教师和领袖，占有而且应该占有特殊地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著名导言中写道：“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但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sup>①</sup>维也纳《工人报》在1914年8月5日写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颗明珠”。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美国的工人运动，都日益热心地沿着它的足迹前进。而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即俄国人和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则以无限钦佩、几乎毫无批判的目光仰望它。在第二国际中，德国的“突击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所有人都等着听德国人的意见。的确，正是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这些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起决定性的作用。说一句“我们德国人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609页。——编者注

通常就足以决定国际的方针。由于盲目信任，国际已经听命于令人钦佩的、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国每一个社会党人的骄傲，并足以使那里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

当重大的历史考验到来时，德国的情况怎样呢？完全堕落了，彻底破产了。哪个地方的无产阶级组织都没有象德国那样全力以赴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毫无反抗地忍受了戒严，哪个地方都没有那样压制报刊，扼杀舆论，彻底放弃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因此，必须对它本身和它的堕落进行分析，也就是必须有一个自我觉悟的过程。它的光荣义务是，率先去拯救国际社会主义，即进行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别的政党、任何别的阶级敢用批评这面明亮的镜子在所有的人面前照出自己的缺陷和弱点，因为这面镜子同时反射出来的是它们面临的历史局限性和背后的历史性灾难。工人阶级始终应当毫不畏惧地面对真理，也就是严以律己，因为它的软弱只是一种迷误，而铁的历史规律却赋予它力量，保证它取得最后的胜利。

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的权利，而且也是它最崇高的义务。我们的船上装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无产阶级是被指定为这些财富的守护人的！当资产阶级社会由于滥施屠戮，弄得声誉扫地，进一步趋向灭顶之灾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并且将会振作精神，去打捞它在世界大战的湍急漩涡中、在一个困惑和软弱的瞬间任其沉到水底的那些最宝贵的财富。

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大战是一个世界性转折点。把事情设想成，我们只需要象兔子躲在灌木下面等待风暴过去一样熬过这场战争，然后就可以轻快地重弹起老调来，这是一种愚蠢的妄想。

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的斗争条件，尤其是改变了我们自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和劳动之间生死存亡的战争，似乎会有些转变或者缓和了。就是在现在，在战争期间，在假面具撕下来的时候，朝我们狞笑的还是原来熟悉的那些面孔。但是，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而社会内部的斗争的激烈程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的任务的巨大规模，使工人运动史上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显得是宁静的田园诗了。

这场战争的历史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向前推进。马克思以他的卓识远见揭示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许许多多历史事件，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中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争取议会中的权力——罗·卢·）；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罗·卢·）；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象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sup>①</sup>

这是在1850年写出的，那个时候，英国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无产阶级是组织得最好的无产阶级，它由于自己国家经济繁荣似乎负有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使命。如果把马克思那些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编者注

话里的英国换成德国，那就成了关于目前世界大战的一个天才预见。世界大战的使命是，把德国无产阶级推到本民族的领导地位上去，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之间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在国际范围大规模进行的总清算有一个“组织上的开端”。

那么我们对于工人阶级在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设想是否有点不同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还在不久前我们通常是怎样谈到将要发生的事件的。

“那时灾变就会到来。接着，欧洲开始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将有1600万到1800万人开赴战场。他们是各国的男人中的精华，配备着最先进的杀人武器，相互敌对。但我相信，大规模的全面进军后面将是大崩溃……它不是由我们，而是由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把事情推到极端，你们酿成一场灾变……你们播种什么，你们就会收获什么。资产阶级世界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你们可以确信：这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是我们的党团发言人倍倍尔在国会就摩洛哥问题进行辩论时说过的一段话。

党的正式传单“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前几年散发了几十万份，这个传单是用这些话结尾的：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这样日益发展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要么是战争危险、物价上涨和资本主义，要么是和平、一切人的幸福、社会主义！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历史面临着大决战。无产阶级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加强自己的组织的力量，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是无产阶级能够凭它的力量使人类幸免一场世界大战这样骇人听闻

---

<sup>①</sup>（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2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268卷第7730页——编者注

的暴行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鲜血与暴力中退出历史，正象这一世界依靠鲜血与暴力从历史中诞生一样也好：工人阶级总会为历史性的时刻作好准备的，而作好准备就是一切。”<sup>①</sup>

在正式的1911年《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供上一次国会用）中，在论述预料会发生的世界大战的第42页上可以读到：

“难道我们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以为他们可以指望各国人民容忍这个怪物吗？难道各国人民不会发出惊恐、愤怒和不满的呼声，并因此去结束这场屠杀吗？”

难道各国人民不会问：这一切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受到这样的对待，或者容忍这样的对待，我们岂不成了精神病患者吗？

凡是冷静地考虑到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的可能性的人，就只会得出这里指出的那些结论，而不会得出别的。

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是迄今世界尚未经历过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是最后的战争了。”<sup>②</sup>

我们现在的国会议员就是凭这样的演说、这样的言语争取到了110份委托书。

1911年夏“豹号”开进阿加迪尔港，德国帝国主义者还大肆进行煽动，当这一情况使欧洲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8月4日在巴黎<sup>③</sup>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工人组织的代表宣布已经做好准备，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去对抗任何一国的宣战。任何派有代表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承担责任，要按照它们本国和国际

---

① 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48—49页。——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选举手册》1911年柏林德文版第42页。——编者注

③ 原稿中为“伦敦”。——德文版编者注



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行动，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罪恶活动。”<sup>①</sup>

但是，当1912年11月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当工人代表的长长队伍到达大教堂的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因面临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时刻和一场英勇的决战而战战兢兢。

沉着冷静、惯于持怀疑态度的维克多·阿德勒大声疾呼：

“同志们，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我们力量的总的源泉，我们从这里取得力量，使得每一位代表在其本国去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我们掌握的各种形式和手段，运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去制止战争罪行。如果这是要完成的事业，如果这确实是要完成的事业，那么，我们就必须关心使它成为关键问题，一个关键性的关键问题。

这就是激励整个国际的思想……

如果屠杀、战火和瘟疫在文明的欧洲蔓延，——我们想到这种事时只能感到毛骨悚然，怒火中烧。而且我们要反躬自问：今天的人类、今天的无产者难道还真的是可以任人宰割而一声不响的一群羔羊？”<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特鲁尔斯特拉<sup>③</sup>以“几个小国”的名义、也以比利时的名义讲道：

“各小国的无产阶级一定不惜生命财产为国际效劳，去完成国际为阻止战争而决定的一切任务。其次我们表示期望，一旦各大国的统治阶级为满足其政府的贪心和统治欲望而驱使无产阶级的

---

① 1911年8月4日法国工会总联合会在巴黎举行了一次示威集会，参加集会的除了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工会的代表。——编者注

②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18页。——编者注

③ 彼得·耶莱斯·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编者注

儿子拿起武器去掠夺小国的土地并使人民流血的时候，这些无产阶级的儿子在他们的无产阶级双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报刊的深刻影响下就会再三考虑，他们不能去干那种敌视文明的勾当而使我们、即他们的兄弟和朋友受到损害。”<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饶勒斯在以国际局的名义宣读了反对战争的宣言<sup>②</sup>以后，这样结束了他的发言：

“国际代表着世界上的一切道义力量！一旦要我们彻底献身的悲惨时刻到来，这种觉悟就会支持我们，使我们坚强。我们不是轻率说说，不，我们是从内心深处宣布，我们准备作出任何牺牲！”<sup>③</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这象是一次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sup>④</sup>举世注目于巴塞尔大教堂，在这里庄严而隆重地敲响了今后劳动大军和资本权力之间大会战的钟声。

1912年12月3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发言人大卫在德国国会说：

“我承认，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当大教堂的钟声伴送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队伍的时候，当红旗在教堂里的合唱声中在祭坛周围招展的时候，当管风琴的乐声对打算宣布和平福音的各国使徒表示欢迎的时候，这当然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毕竟会弄清楚的。群众不再是一

---

①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33页。——编者注

② 指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编者注

③ 《1912年11月24日和25日国际社会党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12年柏林德文版第27页。——编者注

④ 指传说中的1291年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暴政的宣誓。——编者注

群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乌合之众。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从前，群众盲目地听任那些与一场战争利害相关的人的驱使，互相戮杀，造成大量牺牲。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群众不再是某个战争得益者的没有意志的工具和应声虫了。”<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战争爆发前一周，1914年7月26日，德国的党报还写道：

“我们不是傀儡，我们全力以赴地反对那样一种制度，它使人成为盲日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没有意志的工具，资本主义正准备使渴望和平的欧洲变为一座热气腾腾的屠宰场。如果不幸的事情还是要到来，如果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将在最近几天通过强大的示威游行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平愿望仍无法阻止世界大战，那么至少应当使这场战争成为最后的战争，应当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末日。”（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

1914年7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还呼吁说：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拒绝为丧心病狂的统治阶级挑起的那些事端承担任何责任。它知道，对于它来说，新生活恰恰是要在废墟中诞生的。全部责任都要由今天的当权者来承担！

对于今天的当权者来说，这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sup>②</sup>

1914年8月4日，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这一事件是否一定要发生呢？具有这样大的影响的这一事件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肯定是有深刻和广泛的客观原因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原因也可能是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

---

<sup>①</sup>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1913年柏林德文版第286卷第2517—2518页。——编者注

<sup>②</sup> 《灾变前夕》。1914年7月30日《前进报》第205号。——编者注

党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斗志、勇气和对信念的忠诚未起作用。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越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

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这样的人民运动，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并从而把自由意志灌输到人的社会行动中去。因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sup>①</sup>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这一胜利只能通过新旧力量之间长长一系列重大的较量才会取得，而在这些较量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学习并试图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把握社会生活的方向盘，从一个被本身的历史踢来踢去的缺乏意志的皮球发展成为历史的具有明确目标的驾驶员。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向野蛮状态倒退。<sup>②</sup>从我们欧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6—267页。——编者注

洲文明的高度水平来说，“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是什么意思呢？恐怕我们大家迄今都是不加思考地阅读和复述这句话，却没有预感到它所包含的可怕的严肃意义。此时此刻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就会懂得，资产阶级社会向野蛮状态的那种倒退是什么意思了。这次世界大战就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帝国主义的胜利会导致文明的毁灭。——在一场现代战争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是偶而发生的；如果听任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世界大战时期不受阻碍地发展下去，直到得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文明的毁灭就是彻底的了。因此，正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即40年前所预见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是：或者是帝国主义胜利和所有文明遭到毁灭，就象在古罗马那样，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人种退化，一大片墓地；或者是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方法即战争的有觉悟的斗争行动取得胜利。这是世界历史的一种两难处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摆动，要由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来决定。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销这一切苦难与耻辱。

现代工人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每一点认识都是付出高昂代价而取得的。工人阶级解放的各各他<sup>①</sup>之路是充满可怕的牺牲的。六月斗士，公社的殉难者，俄国革命的烈士，一大批浴血的英灵几乎数不胜数。但是，他们是在战场上光荣阵亡的人，正象马

---

<sup>①</sup>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5章第22节。——编者注

克思在谈到公社英雄时所写的，他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sup>①</sup>。现在，操着各种语言的几百万无产者却唱着奴隶的歌曲在耻辱、兄弟残杀、自相厮打的战场上倒下了。我们也不能幸免于此。我们的确可以同那些由摩西率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比。但我们不是毫无希望的，只要我们没有丧失学习的能力，我们将取得胜利。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党如果不善于学习，那么，他们就将退出舞台，“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sup>②</sup>。

## 二

“现在我们面对战争这一铁的事实。敌人入侵的可怕情景即将到来。今天不是要我们决定拥护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要我们决定为了保卫国家需要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如果沾满本国人民优秀儿女鲜血的俄国专制政权取得胜利，那么我国人民及其自由的未来即使不会全部遭到危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危险。应当防止这种危险，确保我们本国的文明和独立。我们的确正在履行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诺言：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与国际的主张是一致的，因为国际在任何时候都承认任何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和自卫权。这正如我们在谴责任何掠夺战争方面同国际的主张一致一样……正是遵照这些基本原则，我们投票赞同了提请批准的战争拨款。”<sup>③</sup>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编者注

③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8—9页。——编者注

8月4日国会党团本着这种精神提出决定和支配德国工人在战争中的态度的这个口号。祖国在危急中，保卫国家，为了生存、文明与和平而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提出来的口号。其他的一切，诸如党的报刊和工会报刊的态度，群众的爱国狂热，国内和平，国际的突然解散，通通只是由上述口号产生的结果。这一切无非是在国会采取的那一最初方针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这真的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关系到自由，如果生存和自由只能靠杀人武器来捍卫，如果战争是一种神圣的人民事业，那么，那一切就是不言而喻和明明白白的事情，那么，那一切就是必须忍受的事情。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这种手段。战争是一场有条不紊的有组织的大屠杀。但是，为了有步骤地进行屠杀，就必须使正常性格的人产生与此相应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战争发动者历来都采用这种方法，而这是很有道理的。残暴的实践必须有残暴的思想和信仰与之配合，后者必须为前者作准备并伴随前者。于是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画，上面绘有一台德国的“连枷”<sup>①</sup>；开姆尼茨、汉堡、基尔、法兰克福、科堡等地的党报刊载一些诗歌和散文，进行爱国主义煽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切都是相应的和必要的精神麻醉剂，而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是在把致命的利剑刺向俄国、法国和英国弟兄的胸膛时，才能拯救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同那些宣称山和谷可以碰头，战争和“人道”、屠杀和博爱、批准战争经费和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可以统一起来的人相比，上述那些煽动性报纸就更加彻底了。

---

① 1914年8月28日的《实话》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德国人及其盟友挥舞连枷痛打躺在地上的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说明词是：“好！孩子们！干得好！现在最有用的就是连枷！”——编者注

但是，如果说8月4日德国的国会党团提出的口号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做时它对工人国际的评价就不只是针对这场战争，而是针对一切战争而说的了。自从有现代工人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无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以前我们一直确信，各民族的利益同无产者的阶级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发生对立。这曾经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鼓动的灵魂。难道我们在我们世界观的这个基本点上被一个不同寻常的错误束缚住了吗？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

世界大战不是对我们的国际基本原则的第一次检验。四十五年以前，我们党就经受过第一次考验。那时，1870年7月21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北德意志国会就发表过如下历史性声明：

“当前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王朝战争，就象1866年的战争<sup>①</sup>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而发动的一样。

我们不能赞同为了进行战争而要求国会批准的拨款，因为这会是对普鲁士政府的一种信任投票，而这个政府通过1866年的行动已经为当前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

我们也不能拒绝该项提请批准的拨款，因为这样做就有可能被理解成赞同波拿巴的罪恶滔天的政策。

---

<sup>①</sup> 1866年6月至7月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解决了两国争取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的对抗，其结果是有利于普鲁士的。1866年8月23日的布拉格和约规定，奥地利必须赞成解散德意志联盟并退出未来的德意志邦联。——编者注



作为原则上反对任何王朝战争的人，作为社会共和主义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这个协会不分民族地反对一切压迫者，并竭力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一个强大的友好同盟），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宣布支持当前的战争，因此我们在表决时弃权。同时我们表示满怀信心地希望，欧洲各国人民将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得到教训，全力以赴，夺取他们的自决权，并消除今天作为一切政治和社会罪恶的原因的暴力统治和阶级统治。”<sup>①</sup>

德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以上述声明明确无误地赋予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国际的特征，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具有一种民族的、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性质。大家知道，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果他在表决时已经了解到以后几年才知道的那一切情况，他会投票反对批准拨款。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那场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是，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两者都反对战争，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和绝大多数人民那时在俾斯麦的骗术影响下却认为那一战争关系到德国民族的生存利益。今天的世界大战，1914年8月4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声明，才第一次揭示了可怕的两难处境：一边是民族的自由，一边是国际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国会党团声明中的基本事实，无产阶级政策的方针原则性的改变，无论如何是一种恍然大悟。它们不过是随声附和8月4日皇帝和首相在演说中的那种说法而已。皇帝说，“驱使我们的不是掠夺的欲望，令我们鼓舞的是这样不屈不挠的意志：我们决心为了我们和今后的世代去捍卫上帝赐予我们的地盘。

你们可以从你们拿到的文件看出，朕的政府、尤其是朕的首相直到最后一刻都在致力于防止最坏的事件发生。我们诉诸武力，

---

<sup>①</sup> 奥·倍倍尔：《演说和论文选》。1970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17页。——编者注

是被迫进行自卫，我们心地纯洁，双手是干净的”。<sup>①</sup>贝特曼·霍尔韦格讲过：“先生们，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紧急自卫，紧急情况是用不着等待命令的！……凡是象我们这样受到威胁并在为其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人，就只应当想到怎样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在为我们的和平劳动成果、悠久历史的遗产和我们的未来而斗争。”<sup>②</sup>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声明的内容：1. 我们已尽了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2. 既然战争爆发了，我们就必须自卫；3. 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的国会党团的声明只是和政府声明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正象政府声明援引贝特曼·霍尔韦格在外交方面的和平努力和皇帝的电报一样，社会民主党党团援引战争爆发前的和平示威。正如皇帝的演说断然否定任何掠夺欲望一样，我们的党团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表示拒绝进行掠夺战争。皇帝和首相喊道：我们是为我们最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我不分什么党派，我只知道德国人。于是社会民主党声明中的回声这样呼应：我们的民族的一切都遭到危险，我们不会在危险的时刻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只有一点偏离了政府的模式：它把俄国专制政府对德国自由的威胁放在自己方针的主要地位。皇帝的演说谈到俄国时却表示遗憾：“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sup>③</sup>社会民主党党团对于同俄国沙皇政府断绝那种为德国政府所忠实维护的友好关系，也感到痛苦，但它是以一种高唱自由而反

---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第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2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6—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2页。——编者注

对专制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唯一的一点上，同政府声明比起来，社会民主党党团表明了自主性，利用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使这场战争具有民主的崇高意义，并罩上了人民性的灵光。

如上所述，所有这一切是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突然领悟的。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天，社会民主党党团所说过的一切都恰恰是与党团声明完全背道而驰的。当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那个点燃战火的最后通牒发表时，7月25日《前进报》这样写道：

“他们愿意进行战争，这些丧尽天良的人，他们在维也纳宫廷拥有影响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愿意进行战争，这可以从几周来进行种族煽动的报刊的放肆叫嚣声中听得出来。他们愿意进行战争，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已经使真相大白并为人所共知了……”

由于弗兰茨·斐迪南及其夫人在一个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的射击下流了血，就要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去流血，就要让一次荒唐的犯罪行为恶化成为一次更加荒唐得多的犯罪行为！……奥国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有可能成为一种引火物，由此酿成燎原大火而席卷整个欧洲！

这个最后通牒无论从其行文还是从其要求来看都是如此蛮横无理，如果塞尔维亚政府面对这一照会卑躬屈膝，它就必须考虑一下，人民群众会不会在吃一顿饭的时间内就将它推翻……

德国沙文主义报刊的一项罪行在于，它把它的可爱盟友的战争欲望煽动到极端，而且无疑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也是答应支持贝希托尔德<sup>①</sup>先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是在柏林玩弄和维也纳完全同样危险的把戏。”<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

---

① 列奥波特·贝希托尔德（1863—1942）——1912年2月至1915年1月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编者注

② 《战争？最后通牒》。《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第200号。——编者注

罗·卢·)

7月24日《莱比锡人民报》写道：

“奥地利军方……孤注一掷，因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和军国主义的沙文主义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特别是在奥地利，沙文主义分子遭到了破产，他们要用民族主义的叫嚣掩盖他们经济上的破产，要通过掠夺和屠杀去填满他们的金库。”<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德累斯顿人民报》在同一天发表了如下意见：

“日前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发动者还始终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奥地利有权利向塞尔维亚提出要求。

只要奥地利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对塞尔维亚的挑衅性的无理的侮辱就使它在整个欧洲面前显得理亏。即使塞尔维亚被证明是有过错的，即使塞尔维亚政府知道有人预谋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照会中提出的要求也是远远超出了一切正常限度。只有一个政府的可耻的战争意图才能用来解释对另一个国家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

7月25日的《慕尼黑邮报》认为：

“奥地利的这一照会是近二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文件。如果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根据调查材料而向它提出的种种要求，那就等于这个国家进行自杀。而这些调查材料的内容却至今未向欧洲公众宣布；也没有对暗杀王储夫妇的凶手进行一次公开审讯，以遮世人之耳目。”

7月24日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民报》说：

“奥地利在向塞尔维亚进行挑衅，奥匈帝国愿意进行战争，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整个欧洲有可能被淹没于血泊之中……”

---

<sup>①</sup> 《战争？》。《莱比锡人民报》1914年7月24日第168号。——编者注

奥地利正在铤而走险。奥地利胆敢对塞尔维亚国家进行挑衅，如果后者不是毫无防卫能力的话，它肯定是不能容忍这次挑衅的……

任何有文化教养的人都应当对奥地利当权者的这种犯罪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首先是工人，还有其他一切只要多少还有些热爱和平与文明的人，他们的任务在于，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在维也纳发作的那一嗜血狂热的种种后果。”

7月25日《马格德堡人民之声报》说：

“塞尔维亚的任何一届政府，哪怕只是略微表示要认真对待这些要求中的一项，那么，这届政府就会在这一时刻被议会和人民扫除。由于贝希托尔德之流是以空洞的断言面向塞尔维亚政府、从而面向欧洲的，因此奥地利的行动就更加卑鄙下流了……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能这样来策动一场将会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了。如果不想破坏整个大陆的安宁的话，人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人们是不能这样在道义上赢得人心，或者使局外人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设想，欧洲报刊，随之还有各国政府，都将坚决而坦率地劝告那些爱好虚荣而又狂妄疯癫的维也纳政治家们采取安分守己的态度。”

7月24日的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写道：

“教皇极权主义报刊发出围猎的叫器，他们把弗兰茨·斐迪南当作他们最好的朋友来悼念，并且要为他的死向塞尔维亚人民复仇；德意志本土的一部分战争贩子的言论也日益变得咄咄逼人和粗野；奥地利政府在他们的支持下，竟然接受唆使，向塞尔维亚国家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这份通牒不仅使用了一种骄横得无以复加的口气，而且也包含了一些塞尔维亚政府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

爱北斐特《自由新闻》在同一天写道：

“半官方的沃尔弗电信局<sup>①</sup>的一份电讯复述了奥地利向塞尔维

亚提出的种种要求。由此可见，维也纳的当权者正在全力以赴地急于发动战争，因为昨晚递交贝尔格莱德的照会中的要求已经有点象把塞尔维亚当作奥地利的保护国对待了。迫切需要的是，柏林的外交界要使维也纳的煽动者懂得，德国对于那种狂妄要求是丝毫不会给予支持的，因此奥地利必须撤回它的要求。”

而佐林根《矿工工人之声报》则写道：

“奥地利愿意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它只是把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作为借口，使塞尔维亚在道义上处于理亏的地位。但是，手脚却做得十分笨拙，未能做到欺骗欧洲舆论……”

但是，如果维也纳外交部的战争贩子相信，他们在一场冲突（俄国也会卷入进去）中必定得到三国同盟的伙伴意大利和德国的帮助，那么，他们的算盘是要落空的。奥匈帝国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的竞争对手，奥匈帝国的削弱对它会是很合适的，因此，它不会惹火烧身去支援奥地利。在德国，那里的当权者即使愚蠢到打算这样做，他们也不敢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罪恶的实力政策而拿一个士兵的生命去冒险，否则他们一定会使人民愤怒地起来反抗他们。”

战争爆发前仅仅一周，我们党的全部报刊，无一例外，就是那样评价战争的。根据这样的评价，这场战争并未涉及德国的生存和自由，而是涉及奥地利主战派的一次犯罪的冒险行动；并未涉及紧急自卫、保卫国家和为了自由而被迫进行神圣的战争，而是涉及轻率的挑衅行动，涉及放肆地威胁别国即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

8月4日发生了什么事，竟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表达得如此明确、流传得如此广泛的观念一下子颠倒过来了呢？只是增加了

---

① 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半官方通讯机构。——编者注

一个新的情况：同一天德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第4页上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不得不考虑到，继续坐视国界那边的频繁活动而不管，这既与君主国的尊严不相称，也不符合它的自卫的利益。皇帝和国王的政府<sup>①</sup>把这种看法通知我们并且征求我们的意见。对于我们盟友对形势的评价，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而且向它保证，如果它认为，为制止在塞尔维亚发生的旨在危及君主国生存的运动而必须采取某种行动的话，那一行动是会得到我们的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万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战争行动，俄国就会出场，这样，我们基于同盟方面的义务也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但是，我们认识到奥匈帝国生死存亡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既不能建议我们的盟友采取那种与其尊严不相称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也不能在这个严重时刻拒绝向它提供我们的援助。我们尤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利益也已受到塞尔维亚不断进行颠覆活动的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塞尔维亚人继续被允许在俄国和法国的援助下危害邻邦君主国的生存，那么，这就会使奥地利逐渐瓦解，并使全部斯拉夫民族听俄国发号施令，这样一来，日耳曼种族就会无法维持它在中欧的地位了。如果奥地利在道义上受到削弱，又由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渗透而趋向瓦解，那么，奥地利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会是我们面对东方和西方邻国日益加强的威胁态度时所需要的那种可以信赖并且可以指望从它得到帮助的盟友了。因此，我们完全放手让奥地利采取行动去反对塞尔维亚。我们没有参与这方面的准备工作。”<sup>②</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

① 即奥匈帝国政府。——编者注

② 《德国关于世界大战爆发的白皮书》，1914年图林根—珀斯内克德文版第3—4页。——编者注

8月4日，这样的论述已经摆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面前，这样的论述在整个白皮书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决定性地位，这是德国政府的简要声明，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黄皮书、灰皮书、蓝皮书和橙皮书之类，它们对于阐明战争在外交方面的前史及其最直接的动力方面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国会党团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判断形势的秘诀。在一周以前，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还在大声疾呼，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一种犯罪的挑衅行为，并且希望德国政府发挥阻挡和抑制维也纳的战争贩子的作用。整个社会民主党和整个德国舆论界深信，德国政府自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将不辞劳苦地去维护欧洲的和平。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认为，这样的最后通牒对德国政府正象对德国舆论界一样，是一场晴天霹雳。现在白皮书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1. 奥地利政府在它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是取得了德国的同意的；2. 德国政府已经完全意识到，奥地利的行动将会导致同塞尔维亚的战争，进而导致欧洲战争；3. 德国政府不是建议奥地利采取克制态度，而是相反，它说过，如果奥地利逆来顺受，受到削弱，那么，它就不再能够充当德国的高贵的盟友；4. 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以前，德国政府已向它坚决保证无论如何要在战争中给予支持；5. 尽管如此，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对世界大战是否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通牒时，德国政府却没有保留对这一最后通牒的监督权，而是“完全放手让”奥地利去行动。

这就是我们的国会党团在8月4日所经历的一切。同一天，它还从政府口头获得一个新的情况：德国军队已经进占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要进行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防御战争，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文明和自由进行一场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战争。

难道这场战争的明显背景和将战争勉强加以掩盖的帷幕，围



绕战争爆发而展开的全部外交把戏，关于敌对阵营要扼杀德国，要削弱、贬低和奴役德国的叫嚣，难道这一切能够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意外，能够对它的判断能力、对它的批判性洞察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吗？恰恰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这种情况是最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党已经经历德国的两次大的战争，而且已经能够从这两次战争中吸取值得记住的教训。

今天每一个略有历史常识的战士都懂得，第一次战争即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是俾斯麦有计划地精心准备的，他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导致关系破裂，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皇太子即后来的皇帝弗里德里希本人在他那一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首相的这一意图：

“他（俾斯麦）在接任职务时就已执意要使普鲁士同奥地利发生战争，但他却十分谨慎，避免在那时同陛下谈到这一点，或者说在他认为合适时机到来之前他根本不想过早谈到这一点。”

奥艾尔在他的小册子《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中引用了上面这段话，然后说，“现在就把威廉皇帝……‘向他的臣民’发出的号召同上面那段表白对照一下吧……”

‘祖国在危险中！

奥地利和大部分德国都在枕戈待命，准备同我国作战。

仅在数年之前，当事关使整个德意志摆脱异族统治的时候，朕不抱成见，不念旧恶，决定向奥地利皇帝伸出结盟之手……但朕的希望破灭了。奥地利不愿忘记它的王侯曾一度统治过德国；它不愿把年轻的、但在蓬勃发展的普鲁士视为天然盟友，而只认为它是一个敌对的竞争者。它认为，必须反对普鲁士的一切意图，因为，凡是对普鲁士有益的，对奥地利就会有害。昔日的带来不幸的妒忌之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要使普鲁士削弱、灭亡和名誉扫地。不应当同它再结什么盟约，而是应当不仅呼吁德意志联邦的诸侯们去

反对普鲁士，而且诱使他们毁盟。不管我们向德意志的什么地方看去，我们都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他们的作战口号是：要压倒普鲁士。’

为祈求上帝保佑这场正义战争，6月18日威廉皇帝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全国举行一次祷告-忏悔日，他在那天说道：

‘上帝不乐于使朕为了朕的臣民能蒙受和平的恩赐而作的努力取得成就。’”<sup>①</sup>

如果我们的党团没有完全忘记它自己的党的历史，那么，8月4日战争爆发时官方的伴奏音乐难道不是一定会使它清晰地回忆起早已知道的那些曲调和词句吗？

但是并未到此为止。1870年又同法国发生了战争。在历史上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无法同埃姆斯紧急公函<sup>②</sup>分开的。这个文件已成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发动战争的政治权术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值得回忆的插曲。那时就是老李卜克内西，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和责任是，向人民群众揭发并指出：“战争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顺便提一下，发动战争仅仅只是为了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这并非俾斯麦的发明。他只是以他固有的厚颜无耻的态度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权术的一个古老的、普遍的、真正国际的处方。自从所谓舆论在政府决策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以来，究竟在何时何地在一场战争时，有哪一个发动战争的集团不是说，仅仅只是为了保卫祖国和自己的正义事业，防止敌人的可耻入侵，才以沉重的心情

---

① 伊·奥艾尔：《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1895年9月4日在柏林一次集会上的讲话》1895年柏林德文版第12—13页。——编者注

② 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70年7月14日决定公布他所伪造的一件紧急公函的文本，这份文本提出了威廉一世7月13日在普鲁士同法国大使在埃姆斯浴场的一次谈话内容。埃姆斯紧急公函导致了俾斯麦所期待的宣战。——编者注

诉诸武力的呢？打仗需要这种神话正如需要火药和子弹一样。这是一种老把戏。新只新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参与了这一把戏。

### 三

但是还存在一些更加深刻的关系，有些人也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这就使我们党对于弄清这场战争的真正本质真正目的有了准备，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对这场战争感到意外。导致1914年8月4日事件的过程和动因并不是什么秘密。几十年来，世界大战的准备是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时时刻刻一步不停地进行着。如果说今天各国社会党人气愤地宣布要消灭那种在幕后策划这些残暴行为的“秘密外交”，那么他们是冤枉了一些可怜的流浪汉，认为这些人有秘密的魔力，正如野蛮人把暴风雨归咎于他所崇拜的偶像而去鞭打它一样。所谓命运的操纵者，这一次象往常一样，只不过是极其强大的历史事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地壳上的变动拨来拨去的棋子。如果说有谁始终明确地在力求理解而且能够理解这些事件和变动，那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近代史上的两条发展路线直截了当地导致了今天的战争。一条发展路线还是来自所谓民族国家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时期，来自俾斯麦反对法国的战争。1870年的战争使德国吞并了亚尔萨斯—洛林，从此法国投入俄国怀抱，欧洲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时代开始了，因此这次战争为今天的世界大火提供了第一批燃料。还在俾斯麦的军队进驻法国的时候，马克思在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中就写道：

“凡是完全没有被当前的大叫大嚷弄糊涂的人或者并不热衷于去把德国人民弄糊涂的人，都必须认识到，1870年战争必然地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将要发生一场战争，完全同1866年的战争

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我说，这是必然的，是回避不了的，除非事先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而这是未必可能的。如果不发生那一未必可能的情况，那么，现在就已必须把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看作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场战争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这个胜利者现在的态度。如果德国要取得亚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将同俄国一道对它作战。说明不幸的后果是多余的。”<sup>①</sup>

这样的预言当时是受到嘲笑的；人们以为把普鲁士同俄国联结起来的纽带牢不可破，哪怕只是设想专制的俄国有可能同共和制的法国结成联盟，就会被看作是荒诞无稽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会被看成十足的疯子。不过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一切，却完全全地应验了。奥艾尔在他的《色当纪念日》中说：“……这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它清楚地看出情况是什么样子，并从而同那种盲目拜倒在任何成就脚下的日常政策区别开来。”<sup>②</sup>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事物的联系，即认为似乎是从1870年起就该对俾斯麦的掠夺实行的报复现在使法国同德国的较量成为命中注定的事，似乎今天的世界大战的核心是法国为亚尔萨斯—洛林“复仇”这件大大遭到非难的事。这是德国战争贩子惬意的民族主义神话，他们编造说，阴森森的、一心要复仇的法国是“不会忘记”它的失败的，就象俾斯麦的普鲁士卫士在1866年编造说奥国这个被废黜了的公主“不会忘记”她从前比普鲁士这个灰姑娘更加高贵一样。实际上，为亚尔萨斯—洛林而复仇已经不过是一些爱国主义小丑在装腔作势表演时使用的一件道具，贝尔福之狮<sup>③</sup>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纹章上雕刻的动物了。

---

① 马克思1870年9月1日致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② 同本卷第412页注①第9页。——编者注

③ 法国贝尔福城的一座雕像，建于1875—1880年，是1870—1871年法国对普鲁士的抵抗运动的象征。——编者注

在法国的政策中，阿尔萨斯—洛林被兼并的事已经过去，正被新的忧虑所代替。法国政府也好，随便哪一个严肃的政党也好，都不会为了阿尔萨斯—洛林而想同德国开战。如果说俾斯麦的遗赠是给今天的世界大火添加的第一块木柴，那么不如说是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它把德国、法国、同时还有整个欧洲推上了军国主义军备竞赛的下坡路，使它们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它使法国同俄国的联盟、德国同奥国的联盟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样一来，一边是沙皇俄国作为欧洲政治的力量因素大大加强了——普鲁士德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为了取得俄国宠爱的处心积虑的竞争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的——，一边是德国同奥匈帝国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了。正象上面引用的德国白皮书上的话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情况的最后结果是今天的战争中的“战斗友谊”。

这样，1870年战争的后果是，欧洲在外交政策上以德法对立为轴心分成集团，军国主义在形式上在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但是从此以后，这种统治和那种集团就赋予历史发展以一种崭新的内容。造成今天的世界大战、使马克思的预言得到光辉证实的第二条路线，来自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国际性事件，来自近二十五年来帝国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的复苏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战争时期之后在经过重建的欧洲开始的，特别是在克服了继1873年的创设企业高潮和破产而来的长期萧条之后开始的，这一复苏在九十年代的高度繁荣中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顶点，开始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欧洲各国新的狂飙突进时期：它们竞相向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实行扩张。从八十年代起，一种新的、特别激烈的掠夺殖民地的欲望就发挥了作用。英国强占了埃及，并且在南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殖民国家，法国占领了北非的突尼斯和东亚的东京<sup>①</sup>，意

<sup>①</sup> 即越南。——编者注

大利进驻阿比西尼亚，俄国完成了在中亚的征服，并向满洲推进，德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获得了第一批殖民地，最后也轮到了美国，它占领菲律宾群岛，从而在东亚得到了“利益”。这一疯狂地瓜分非洲和亚洲的时期是从1895年的中日战争开始的，它引起几乎不断的一连串流血战争。在向中国大陆进军时达到顶点，并以1904年的日俄战争告终。

所有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在各个方面造成了新的、在欧洲以外的对立：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法国和英国在埃及、英国和俄国在中亚、俄国和日本在东亚、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这是汪洋一片的动荡的大海，尖锐对立的波涛此起彼伏，短暂的同盟时分时合，局势或紧或松，而欧洲列强之间每隔几年就出现爆发一场局部战争的危险，但战争一再被推迟了。每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损害亚洲和非洲各个民族而秘密地、悄悄地进行战争迟早要导致一场总的清算，它们在非洲和亚洲兴起的风总有一天会反转过来发展成可怕的暴风雨去袭击欧洲，尤其是因为亚洲和非洲的事件产生了使欧洲军备日益加强这一持续的效果。二、一旦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局部的和不断变换的对立集中到一个轴心，即集中到一个主要的强大对立之上，并围绕它而暂时形成集团时，欧洲的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随着德帝国主义的出现，这一局面已经形成。

帝国主义在德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的，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这种兴起的纯粹形态。帝国建立之后，这里的大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在八十年代表现出资本积累的两种典型的独特形式：这里的卡特尔是欧洲最强大的，银行业的发展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其集中程度是最高的。前者使重工业，即同国家供应物资、军备以及帝国主义企业（修建铁路、开掘矿藏等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资本部门成为国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因素。后者使金融资本聚

集起来，成为一种总是蓄积着高度能量的密集的权力，一种发号施令，支配和管理国家的工业、商业和信贷并对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同样起决定作用的权力，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跳跃式地扩大，总是渴望取得利润和采取行动，它是非个人的，因此气魄很大，敢于冒险和没有顾虑，它本来就是国际性的，按照它的整个素质来说，它是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的世界舞台相适应的。

如果再加上一个极其强大的、在政治首创精神方面最敏捷的个人统治和一种极其软弱、无力提出任何异议的议会政治，而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又团结一致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并躲在政府后面，那么可以预料，当这个年青的、浑身充满活力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帝国主义带着很大的胃口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已经几乎瓜分完毕，因此它很快必定成为无法估量的令人普遍感到忧虑的因素。

九十年代末德国军国主义政策急剧的转变已经预示上述情况即将来临。它在1898年和1899年接连提出两项海军法案，这意味着将空前地将舰队突然增加一倍，并提出一个庞大的为期将近二十年的海军建设计划。<sup>①</sup>这不仅是对德国的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所作的相当广泛的改变——1902年的关税<sup>②</sup>只是追随两项海军法案而来的影子——，而且是社会政策和全部内部阶级关系以及党派关系的进一步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海军法案首先意味着帝国建立以来的指导性外交方针的一次示范性的改变。俾斯麦的

---

① 1898年3月28日，国会通过了第一项海军法案，据此德国的舰队将大大扩大，到1904年这项开支将达4.82亿马克。这就使德、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和对立尖锐化。1900年6月通过的第二项海军法案又使1898年法案中计划建立的舰队扩大了一倍。——编者注

② 1902年12月14日国会批准的、1906年生效的关税大大提高了对一切进口商品首先是农产品的征税，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生活费用。——编者注

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的：帝国是一个陆上强国，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陆上强国，德国的舰队至多被认为是保卫沿海地区的多余的道具——国务秘书霍尔曼本人1897年3月确实曾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声称：“我们根本不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地区；海岸本身就起保卫作用。”——现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纲领：德国应当成为陆地和海上的第一流强国。这样一来，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变成了世界政策，军备的目的从防御变成了进攻。事实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以致在德国国会本身就可以找到必要的解释。中央党当时的领导人利贝尔在1896年3月11日，即在皇帝在德国建国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上发表那篇作为海军法案的先声而阐述新纲领的著名演说<sup>①</sup>之后就谈到了“漫无边际的海军计划”，认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中央党另一个领导人舍德勒1898年3月23日在国会就第一项海军法案发出呼吁说：“民众认为，我们不可能成为陆地的第一强国和海上的第一强国。如果刚刚有人对我喊道，我们根本不想这样做，——那我就说：是的，先生们，你们正在开始，而且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而当第二个法案提出时，同一个舍德勒于1900年2月8日在国会中在提到他从前的所有关于人们不想有一个新的海军法案的发言后声称：“今天的这个补充法案所倡议的既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要通过使我们的舰队在为期将近二十年内增加一倍而建立世界舰队作为世界政策的基础。”此外，政府本身公开宣布了新方针的政治纲领。当时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毕洛夫1899年12月11日在论述第二项海军法案时说：“当英国人谈到一个Greater Britain（更大的不列颠——罗·卢·），法

---

<sup>①</sup> 在1896年1月18日为庆祝德意志帝国建立25周年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威廉二世以必须保护生活在海外地区的德国人和商船以及必须使殖民地更加紧密地与帝国联系为借口，间接地要求增加经费来进一步扩充军备。——编者注



国人谈到一个Nouvelle France（新的法兰西——罗·卢·），俄国人进入亚洲的时候，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如果我们不建立一支舰队，足以……保护我们的商业和我们在外国的同胞，保护我们的使团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会危害国家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下一个世纪，德国民族将要腹背受敌。<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如果删掉保卫沿海地区、使团和商业这些空洞言词，剩下的便是一个简明的纲领：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国家，对其他民族实行铁锤政策。

众所周知，这一挑衅首先是针对谁的：新的侵略性的海军政策会使德国成为海上第一强国即英国的对手。这一挑衅在英国也是被这样理解的。海军改革伴随它的关于纲领的演说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此后这种不安一直没有减轻。1910年3月，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在英国下院就海军问题进行辩论时又说：他胆敢请任何一个人就德国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这件事提出任何一点可以想见的理由，除非说那是打算同英国展开一场斗争。双方十五年以来持续的海上竞争，最后又狂热地建造无敌舰和超级无敌舰，这已经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了。1899年12月11日的海军法案是德国的宣战书，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此作了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的这一斗争同争夺世界市场的经济竞争毫无共同之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据说束缚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今天对这一点是大讲特讲的。这也属于爱国主义的战争神话的王国，而这些战争神话也不能不谈十分严重的法国的“复仇”。那一“垄断”从八十年代起就已成了旧时代的往事，对此英国资本家是感到痛苦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印度、日本，但首先是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十九世纪前

---

<sup>①</sup>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0届第1次会议速记记录》。1900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293—3295页。——编者注

半期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垄断。除了英国之外，在最近几十年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按照其本性飞速地发展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英国的海上霸权今天甚至还在使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夜不成寐，据这些正派人物说，这一霸权的摧毁似乎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所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海上霸权——不列颠帝国向五大洲扩展的一个结果——迄今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妨碍却如此之小，确切地说，德国资本主义在它的“桎梏”下以非常快的速度长成了一个脸蛋滚圆的结实小伙子。的确，恰恰是英国本身及其殖民地是德国大工业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基础，反过来说，德国也成了不列颠帝国极其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主顾。不列颠和德国两国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不是互相妨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依为命，并且在广泛的分工中密切联系起来的，尤其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对这种关系大大有利。因此，德国的商品贸易及其与世界市场的利害关系同德国政策的改弦易辙、同海军建设毫无关系。

迄今德国占领殖民地这件事本身同样没有引起它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世界规模的对立和海上竞争。德国的殖民地并不需要一个第一海上强国来保护它们，因为它们的状况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尤其没有引起英国对德国的嫉妒。现在它们在战争中被英国和日本夺走了，掠夺使所有者易人，这是战争的一个通常的措施和结果，正如现在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比利时的胃口很大，但在从前，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只要不想被关进精神病院，就不会去阐述吞并比利时的计划。为了东南非和西南非，为了威廉的土地<sup>①</sup>或者为了青岛，德国和英国之间恐怕决不会在陆地或海上发生一场战争，而就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今天这场战争的前夕它们甚至还准备好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是要使两个大国着手心平气和地

<sup>①</sup> 指当时德国的殖民地新几内亚。——编者注

去分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①

这就是说，德国方面发展海上势力和树起世界政策的旗帜，预示德国帝国主义要在世界上进行新的和出色的巡逻了。有了第一流侵略性的海军以及与扩建海军同时接二连三扩大的陆军，就第一次为未来的政策提供了工具，而这一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为无可估量的种种可能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建设海军并扩充军备就其本身来说已经成了德国大工业的一笔了不起的大生意，同时为卡特尔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广阔的世界进一步开展活动开辟了无限前景。这样就保证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投到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民族自由党人是帝国主义重工业的精锐部队，中央党效法他们的榜样，正是随着它在1900年接受了曾被它大声疾呼地揭发的世界政策性海军法案而明确地成为政府党；自由思想党在讨论比海军法案来得晚的、让人勒紧裤带的关税率时又步了中央党的后尘；容克地主阶级是这一队伍的殿军，它从顽强反对“建立令人厌恶的海军”和开凿运河②的立场转变成热心支持海上军国主义、殖民地掠夺和与之相联系的关税政策的破落贵族和食客。1907年的国会选举，即所谓霍屯督人选举，是整个资产阶级德国的帝国主义激情发作的一次大暴露，毕洛夫的德国紧密地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感到自己负有充当世界铁锤的使命。这次选举——它连同它所制

---

① 1914年6月15日，德国和英国之间就它们在巴格达铁路方面的利益界线和获得葡萄牙殖民国家的一些部分问题举行了谈判。准备就绪的条约由于爆发了战争而没有签署。——编者注

② 由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的反对，1899年和1901年普鲁士政府向普鲁士议会提出的、得到工业界和军事界支持的关于开凿一条联结莱茵河和易北河的运河的提案没有被通过，因为大庄园主的代表们担心外国粮食廉价进口的可能性也会使粮食价格下跌。到1905年2月在政府由于容克地主再次反对而放弃开凿决定性的中间一段即联结汉诺威和易北河的一段之后，这一提案才获通过。——编者注

造的思想迫害的气氛是8月4日德国的一个前奏——不仅是向德国工人阶级的一次挑战，而且也是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次挑战，不是专门打向哪一个人而是打向所有的人的一个握起来的拳头。

## 五

而沙皇专制主义哪！它无疑对党的立场，尤其在战争爆发之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它的声明中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沙皇专制主义！”于是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展开了一场保卫整个欧洲“文明”的斗争。

法兰克福《人民之声报》在7月31日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就谴责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血腥堡垒，从马克思、恩格斯以犀利的眼光密切注视这一野蛮的统治制度的每一个动作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今天，那里的监狱关满了政治犯，这个制度害怕任何的工人运动。在德意志的战旗下同这个可怕的社会进行清算的时机现在到来了。”

路德维希港的《普法尔茨邮报》在同一天报道说：

“这是我们永不忘怀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制定的原则。这里涉及的是文明反对野蛮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也是能忠于职守的。”

《慕尼黑邮报》8月1日说：

“在履行反对血腥的沙皇专制制度这一保卫祖国的义务时，我们不要让人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

8月5日的《哈雷人民报》说：

“迄今为止的全部报道都使人感到：我们将受到俄国的侵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赞成采取一切手段进

行防御。必须全力以赴，把沙皇专制主义从我国驱除出去！”

8月18日又说：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走出了，现在我们以及所有其他德国人拿起武器，不仅是为了履行保卫祖国、维护民族自身的义务，而且也是由于觉悟到，我们在东线与之进行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切进步和一切文明的敌人……俄国的失败同时就是自由在欧洲的胜利。”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8月5日写道：

“不可抗拒的军事力量将把一切人卷进来。但是，当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东方的侵略面前保卫自己的立足之地时，他们不只是听从外部的力量，而是也受自身信念的支配。”

埃森《工人报》8月3日就喊叫道：

“如果现在这块土地受到俄国作出的决定的威胁，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这场斗争是针对沾满鲜血的、对自由和文明犯过千百万次罪行的俄国沙皇制度的，因此他们在履行义务和表现牺牲精神方面在国内将是无与伦比的……打倒沙皇专制主义！打倒野蛮的堡垒！口号就将是这样。”

比雷菲尔德《人民哨兵报》在8月4日也说：

“各地的口号都是一个：反对俄国的暴政和阴谋诡计！”

爱北斐特的党报8月5日说：

“整个西欧生存的利益在于铲除可憎的、进行无耻凶杀的沙皇制度。但是人类的这一利益由于英法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压制，因为它们要阻止德国资本迄今享有的取得利润的可能性。”

科伦《莱茵报》报道说：

“朋友们，无论命运怎样摆布你们，去尽你们的义务吧！你们是在为欧洲文明、为你们祖国的自由和你们自身的幸福而斗争。”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民报》8月7日写道：

“不言而喻，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毫无疑问，大战后我们也将有阶级斗争。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阶级斗争将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中进行，这些阶级斗争将在远为大得多的程度上局限在经济领域。如果沙皇专制制度不再存在，将来就不可能再象对待受排斥者、二等公民、政治上无权者那样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了。”

8月11日《汉堡回声报》喊叫道：

“因为我们不仅必须进行反对英国和法国的防御战，而且也必须首先进行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战争，而我们是欢欣鼓舞地进行这场战争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

而卢卑克党的机关报在9月4日还声明说：

“战争一旦爆发之后，如果说欧洲的自由得救的话，那么，欧洲必须把这归功于德国武器的威力。我们的主要斗争是对准一切民主和自由的死敌的。”

这样，德国党的报刊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

德国政府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接受了提供的帮助，它漫不经心地把欧洲文明解放者的桂冠戴在钢盔上。尽管它显然很尴尬并且在装出一副典雅仪表时显得相当笨拙，但它仍然勉力充当“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两支大军的”总司令部甚至——紧急时不择手段——学习用犹太人的腔调说德语并且在俄属波兰对“乞讨者和谋叛者”采取安抚政策。同样也给波兰人开了一张去天国的支票，这自然是给他们对他们的沙皇政府犯下的累累“叛国罪行”的报偿，而芒加·贝尔在卡麦隆却由于据说杜阿拉人要尝试与此同样的罪行，在一片战争的喧嚣声中悄悄地、未经麻烦的法律程序就被绞死了。①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参加了德国帝国主义所有这些在处于困境时耍弄的笨拙把戏。②当国会党团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

掩盖杜阿拉人酋长的尸体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充满云雀的歌声，为“德国的枪托”给沙皇专制主义可怜的牺牲者带来的自由而欢呼。

党的理论机关刊《新时代》在8月28日的那一期中写道：

“亲爱的父亲<sup>③</sup>的帝国边界居民用欢呼声向德国的先头部队致敬，因为住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总是只从腐败和皮鞭的形象中体会到祖国的概念。这些可怜的人们，真正无祖国的人们，这些受嗜血成性的尼古拉盘剥的臣仆们，即使他们激发起进行防御的热情，他们所保卫的也不外乎是自己的锁链。因此，他们现在是怀着这样的渴望和期待而生活和工作着，渴望和期待德国人的拳头所挥动的枪托尽早粉碎整个沙皇制度……当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头上骤然响起的时候，在他们心中也存在目标清楚的政治意愿：抵御东方野蛮制度在西方的盟友，以便同他们缔结光荣的和约，并集中人马竭尽全力消灭沙皇专制主义。”<sup>④</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社会民主党党团捏造说战争具有保卫德意志民族和文明的性质以后，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干脆捏造说这场战争具有解放外国民族的性质。兴登堡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了。

我们党的记忆力无疑在这次战争中对它作了一次不愉快的嘲

- 
- ① 1914年卡麦隆海岸的杜阿拉人起来反抗德国的殖民统治，起义遭到血腥镇压，酋长贝尔·芒加于1914年8月4日被处绞刑。芒加是姓，贝尔是名，正文中文森堡用的写法不同。——编者注
- ② 讽喻德帝国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欧洲文明解放者”以掩盖它在殖民地的暴行的不高明手段。——编者注
- ③ “亲爱的父亲”是对沙皇的戏称。——编者注
- ④ 《人民战争》，发表于《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2册第872页。——编者注

弄：我们的党恰恰在需要运用它全部原则、誓言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把它们统统忘掉了，而倒霉的是，它却回忆起马克思的一条“遗训”，正好在它只能被用来美化马克思曾经打算“集中兵马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时刻把它从时代的尘封下拿出来。已经凝固了的、《新莱茵报》在德国三月革命时反对尼古拉一世的农奴制俄国的号声，突然在公元191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耳边回荡起来，并让它手持“德国的枪托”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肩并肩地反对处在伟大革命中的俄国。

但正是需要在这里进行“修正”，并且根据将近七十年的历史经验来检验三月革命的口号。

1848年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确实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专制主义是俄国社会关系固有的产物，它的深刻根源在于俄国的中世纪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它是被资产阶级革命所动摇并尤其是在德国由于小邦割据而受到削弱的君主制反动势力的避难所和有权势的领导者。1851年尼古拉一世还能够通过普鲁士大使冯·罗霍夫<sup>①</sup>使柏林方面了解：他本来是希望看到1848年11月冯·弗兰格尔<sup>②</sup>元帅开进柏林时革命就被彻底扼杀的，并且说“还曾经有过另一些时刻，那时人们并不需要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另外一次又提醒曼托伊费尔<sup>③</sup>说：他“确信国王的内阁在陛下的领导下将在议会面前坚决保卫王权，并使保守的原则得到贯彻。”就是这个尼古

---

① 泰奥多尔·亨利希·罗胡斯·冯·罗霍夫（1793—1854）——普鲁士陆军将官，从1845年起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冯·弗兰格尔（1784—1877）——普鲁士元帅，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的反革命改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编者注

③ 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制度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1850—1858）。——编者注



拉还做到给一位普鲁士首相颁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表彰他“为巩固普鲁士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克里木战争使这一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战争导致了旧制度在军事上从而也在政治上的崩溃。俄国专制统治感到必须走改良的道路——使自己现代化以适应资产阶级的关系，于是把小手指伸给魔鬼，而这个魔鬼现在已经紧紧抓住它的胳膊并将最终把它整个抓走。克里木战争的结局同时是对于人们能够用“枪托”给一个受奴役民族带来解放这一信条的富有教训的考验。色当的军事崩溃奉送给法兰西一个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并非俾斯麦的大兵的馈赠，因为普鲁士当时和今天一样，可以赠给别的民族的无非是它自己的容克统治。共和国对法国来说是自从1789年以来社会斗争和三次革命内部成熟的结果。在塞瓦斯托波尔<sup>①</sup>发生的崩溃就象在耶拿<sup>②</sup>的一样：由于国内没有革命运动，这一崩溃只是使旧制度表面上得到改进和重新得到巩固。

俄国六十年代的改革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场改革也仅仅是用财力来推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些资金是由西方资本（德国的和法国的）提供的。此后，确立了新的关系，俄国专制主义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养活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再是“俄国的卢布”滚进外交部，或者象普鲁士亲王威廉<sup>③</sup>在1854年就强烈地抱怨的那样，不再“一直滚进国王

---

① 在克里木战争期间，1855年8月，塞瓦斯托波尔港的要塞在俄国士兵和水兵进行了343天的保卫战之后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占领。——编者注

② 普鲁士反动国家两支主要的军队在拿破仑第一向德国进军后不久，1806年10月4日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同时进行的两次战役中击败。——编者注

③ 指威廉一世（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编者注

的前厅”，而是相反，德国和法国的黄金滚向彼得堡，以便在那里维持沙皇的统治，沙皇的统治没有这种滋补提神的液汁恐怕早就结束它的使命了。从此以后，沙皇专制主义不再只是俄国关系的产物，它的第二个根源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从此以后，条件一再随着每个世纪而发生变动。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本身的专制统治的内部土生土长的根源受到侵蚀，而外来的、西欧的根源却在同样的程度上日益得到加强。自从1870年的战争以后，法国同德国热中于竞争，所以西欧对俄国除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外还有政治上的支持。俄国人民自身中的反对专制主义的革命力量越是增长，就越是强烈地遭到西欧的反抗，因为西欧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成了受到威胁的沙皇制度的靠山。八十年代初，旧的俄国社会主义恐怖运动曾暂时使沙皇的统治受到严重动摇，使它对内对外的权威受到打击，恰恰在那个时候，俾斯麦同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sup>①</sup>，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为它提供了后援。另一方面，德国越是在政治上追求俄国的宠爱，法国资产阶级的钱袋自然就越是无止境地同俄国敞开。专制主义在同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借助于两方面的支持来勉强维持生存。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沙皇专制制度用自己的双手抚育起来的，它最终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始了。在沙皇的统治下，本国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昔日的“欧洲反动派的避难所”看来不得不立即给自己制定“一部坏的宪法”，它现在也不得不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洪流面前给自己找一个“避难所”。它找到了这个避难所——在德国，由毕洛夫的德国来

---

<sup>①</sup> 1887年6月18日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在发生战争时双方保持“善意中立”，俄国进攻奥国或德国进攻法国时除外。德国还保证尊重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利益。1890年期满后未再续定。以后俄国就同法国接近。——编者注

偿还弗兰格尔和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过去受领的酬谢。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德国用来反对俄国革命的支援取代了俄国用来反对德国革命的援助，间谍活动、驱逐出境、引渡——在德国对俄国的自由战士展开了一场神圣同盟昔日曾经进行过的十足的“对蛊惑人心者的追捕”，而这些自由战士直到这次俄国革命开始以前一直受到这种追捕的迫害。这一迫害在1904年“科尼斯堡审判案”<sup>①</sup>中不仅达到了顶峰，它在这里还犹如电光一样照亮了1848年以来的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使人看清楚俄国专制主义同欧洲反动势力之间的关系已彻底翻转过来。一位普鲁士司法大臣用手指指着俄国沙皇制度动摇的基础对德国统治阶级说：Tua res agitur（事情关系到你）！首席检查官许采在科尼斯堡解释说：“在俄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必然对德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我的邻居的住宅失火了，那么我的住宅也有危险。”他的助手卡斯帕尔强调说：“此外，专制主义的城堡是否保持得住，这对德国的公共利益来说自然具有重大的影响。无疑，一场革命运动的火焰可以很容易地烧到德国这边来。”历史发展的鼯鼠怎样进行挖掘，使事情颠倒过来，埋葬掉“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这一老生常谈，在这里终于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欧洲的反动势力，首先普鲁士容克的反动势力现在是俄国专制主义的避难所。依靠欧洲反动势力，俄国专制主义还能维持下来，打击欧洲反动势力就可以致俄国专制主义于死命。俄国反动势力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

这场革命受到了镇压。如果人们稍微深入观察一下，它暂时失败的原因恰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是富有

---

<sup>①</sup> 9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把革命读物运往俄国，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审判案中被控对俄国犯有叛国罪、褻渎沙皇罪和秘密结社罪。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此案辩护律师之一。他谴责了俄国的残酷压迫并揭露了普鲁士同沙皇当局的勾结。——编者注

教育意义的。1905年至1906年的俄国起义虽然消耗了空前巨大的革命力量，目标明确并坚忍不拔，但是它仍旧失败了，我们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说明这一情况。一个原因是由于革命本身的内在性质，即由于它庞大的历史性纲领，由于它象一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那样提出了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其中一些如农业问题根本不是在今天的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解决得了的；还由于在全国的整个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抵抗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建立一个现代政体的困难。由此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它是一场带有资产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手段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一次矛盾冲突。这是俄国阶级关系迟缓的发展和西欧阶级关系过分成熟的结果。由此看来，1906年的失败并非它的破产，而是它的第一篇文章的自然结束，以后的篇幅一定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随后到来。第二个原因又是属于外部性质的，在于西欧。欧洲的反动势力又赶来援救它的陷入困境的被保护者。这次还没有用弹药，尽管“德国的拳头”只等待着彼得堡的示意，就会拿着“德国的枪托”开进同它毗邻的波兰。但是人们通过同样有效的援助手段——财政补助和政治联盟支援沙皇制度。它用法国的钱购买了霰弹，用它们镇压了俄国革命，它从德国那里得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以便从耻辱的深渊中爬出来，而它是被日本的水雷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拳头赶进这一深渊的。德国官方于1910年在波茨坦张开双臂迎接了俄国的沙皇。<sup>①</sup>在德意志帝国首都的大门前迎接这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人，这不仅是德国对绞杀波斯的行动<sup>②</sup>的

---

① 1910年11月，沙皇访问了德国，两国的外交大臣在此期间在波茨坦就双方在波斯（即今伊朗）的利益并就巴格达条约进行了会谈——编者注

②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波斯发生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运动，这场运动限制了专制主义，并实行了立宪政体。英国和沙俄在波斯南部和北

祝福，而尤其是对俄国反革命刽子手行径的祝福，是德国和欧洲“文明”在臆想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坟墓上举行隆重的宴会。说来奇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家乡目击这场在对俄国革命进行大屠杀之后举行的挑战性的葬后筵席时不置一词，并且把1848年时的“我们导师的遗言”忘得干干净净。在这次战争之初，在得到警察允许以后，最小的党报都曾陶醉于用极端的言词反对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但在1910年当刽子手在波茨坦受到祝贺时，却一声不吭，没有抗议活动，没有文章表示同俄国自由的团结，对支持俄国反革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确，正是这次沙皇1910年在欧洲的胜利之行比其它一切都更好地揭露出，受到镇压的俄国无产者不只是本国反动派的牺牲品，而且也是西欧反动派的牺牲品，他们今天同1848年的三月战士完全一样，不只是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同这一势力在外国的“避难所”发生了冲突，撞得头破血流。

然而俄国无产者革命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就象他们在沙皇和资本的双重皮鞭下的苦水流不完一样。在经过反革命一个时期极其违背人道的十字军讨伐后，革命又重新开始沸腾起来。1911年以来，在勒拿大屠杀<sup>③</sup>以后，工人群众又奋起抗争，潮水开始上涨并掀起波浪。按照官方的报告，1910年在俄国参加经济罢工的工人有46623人，累计256385天，1911年有96730人和768556天，1912年的最初五个月是98771人和1214881天。1912年参加政治罢工、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者共计

---

部对革命力量进行了武力镇压。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波斯的反革命势力于1911年底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编者注

③ 1912年1月29日在勒拿金矿爆发了一场罢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这场罢工发展为6000人的总罢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当1912年4月4日工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委员会时，军队开了枪，打死工人250名，打伤270名。对这场血腥屠杀全国举行了抗议罢工。——编者注

1005000人，1913年是1272000人。1914年，洪水汹涌澎湃，威胁越来越大，越涨越高。1月22日，为庆贺革命的开始，举行了一次有200000工人参加的示威性群众罢工。6月就完全象1905年革命爆发前一样，巨大的火舌在高加索、在巴库向空中腾起。这里有40000工人参加了群众罢工。火焰立即扑向彼得堡：7月17日这里的罢工工人有80000，9月20日有200000，7月23日总罢工开始向全俄扩展，构筑街垒，革命正在进展之中，再有几个月，这场革命肯定会举着飘扬的旗帜来到。再过几年，革命或许能够使沙皇制度失去作用，使它不再能够为计划在1916年举行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舞会<sup>①</sup>服务。也许整个的世界政治局面会因此改变，帝国主义会被一笔勾销掉。

然而相反，德国的反动派却又把俄国运动从革命方面的账目中一笔勾销。维也纳和柏林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把俄国革命埋葬在瓦砾中——也许又要若干年。“德国的枪托”没有粉碎沙皇专制制度，却去粉碎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它们帮助沙皇进行了俄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得人心的—场战争。这次是一切都起了提高俄国政府的道义声望的作用：德国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楚，战争是由柏林和维也纳挑起的；德国的“国内和平”和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比利时的命运，援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必要性，——专制制度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还从未获得过这样空前有利的地位。满怀希望地飘扬的革命旗帜被卷进了湍急的战争漩涡，但是它沉没得光荣，并将不顾“德国枪托”、不顾沙皇在战场上的胜利和失败，在疯狂的屠杀中重新飘扬。

---

<sup>①</sup> 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准备在1916年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由于直至1914年德国在战争准备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它尤其盼望在对手尚未准备好时发动战争。——编者注

俄国各民族的起义也没有起到作用。比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民族”显然比较少地受到兴登堡步兵队的解放者使命的诱惑。犹太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喜欢扳着手指头算简单的算术题，一下子就看出，既然“德国的拳头”甚至都没有“粉碎”它们自己的普鲁士反动势力例如一级选举制，要它们粉碎俄国的专制主义恐怕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陷于这场战争的三重地狱的波兰人固然不能够向他们在弗勒中的，把德文主祷词血迹斑斑地刻在波兰儿童身上的“解放者”<sup>①</sup>和普鲁士各个移民委员会<sup>②</sup>的“解放者”所带来的预示幸福的福音大声作出回答，然而他们却可以默不作声地把葛兹·冯·伯利欣根<sup>③</sup>的德文格言译成更加精辟的波兰文。所有的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俄国人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简单的事实：“德国枪托”是被用来打碎他们的脑壳的，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只会带来死亡。

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用马克思的遗嘱杜撰的关于解放的神话比一个蹩脚的玩笑更糟，因为这是无耻的言行。对马克思说来，俄国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转折。他的全部政治的和历史的展望都是同“只要俄国革命不在这一时期爆发”这一先决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即使在他看到的还是一个农奴制的俄国时

---

① 1901年5月20日，在当时波森省的一个县城弗勒中，波兰儿童受到一位教师的严重虐待，因为这些儿童不愿在课堂上用德语回答问题。对此表示愤怒的父母也被加以“破坏国家和平”的罪名而被判处重刑。——编者注

② 所谓移民委员会是在1886年缔结的并在1893和1902年强化了了的移民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根据这一法律，数百万马克已被投入西普鲁士和波森省“以加强德国人的成分”；这些委员会用国家的资金收买波兰人的财产并把这些财产转让给德国的大地产占有者，或者划分成小块分配给德国移民。——编者注

③ 葛兹·冯·伯利欣根（1480—1562）——德国骑士，曾是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编者注

也对俄国革命表示信任，寄予期望。革命在这一期间到来了，它没有在第一战役取得胜利，然而它已不再能被遏制了，它列在议事日程上，正在重新站立起来。而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枪托”一同突然到来，并宣布俄国革命无效，把它从历史上抹掉。他们突然把1848年的记事本取出来，上面写着：反俄战争万岁！但是1848年在德国曾经发生过革命，而在俄国却是顽固的、无望的反动势力。相反，1914年俄国却酝酿着革命，而在德国则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在进行统治。德国的“欧洲解放者”不是象马克思在1848年那样从德国的街垒出发去肩负他们反对俄国这一文明使命，而是直接从步兵的军营（一个小小的少尉把他们关在那里）出发的。他们出发时同俄国专制主义最强大的避难所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亲热地拥抱，团结成一个民族；他们同科尼斯堡的大臣们和检察官们“按照国内和平的方式”拥抱着，出发去反对沙皇，而“枪托”则打碎了俄国无产者的头颅。

不能想象有比这付出更多鲜血的历史闹剧、对俄国革命和对马克思遗嘱更加无情的嘲弄了。这是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中最黑暗的插曲。

对欧洲文明的解放同样也只能成为一段插曲。德国帝国主义很快揭下了讨厌的假面具，掉过头来公开反对法国、尤其反对英国。一部分党报也迅速跟着掉转方向。它们开始让狡诈的阿尔比翁和它的商人习气而不是让血腥的沙皇受到普遍的蔑视，并且要把欧洲文明从英国的海上霸权下面而不是从俄国的专制统治那里解放出来。但是最能明显地说明党陷入的那种不可自拔的混乱状态的、是一部分较好的报纸的疯狂努力，这部分报纸由于被反动阵线吓得胆战心惊，无论如何都要竭力迫使这场战争回到它最初的日子。

---

① 英国的古称。——编者注



的上来：紧紧抓住“我们导师的遗嘱”不放，也就是抓住党报自己即社会民主党编造的神话不放。“朕不得不以沉重的心情动员朕的军队去反对一个邻国，而朕的军队曾同这个邻国在很多战场上共同战斗。看到一种由德国所忠实地维护的友谊遭到破裂，朕感到由衷的痛苦。”这话说得朴素、坦率和真诚。社会民主党的党团和报界曾把这一段话改写成《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而现在，当战争最初几个星期的花言巧语被帝国主义的干巴巴的直截了当的文风吓跑了的时候，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作的唯一软弱无力的说明便烟消云散了。

## 七

然而尽管有这些情况，现在怎么办呢？既然我们未能阻止战争爆发，既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国家面临敌人的入侵，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毫无防卫能力的地位，把它拱手让给敌人，即德国人向俄国人投降，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向德国人投降，塞尔维亚人向奥地利人投降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自决权不是表明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来捍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吗？如果房屋着火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去救火，却是追查纵火犯吗？“着火的房屋”这一理由对德国或法国这两方面的社会党人的态度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中立国也有许多人跟着这样说：借用荷兰的说法，这就是：如果船只漏水了，难道首先不是应当设法把漏水的地方堵好吗？

当然，向外部敌人投降的民族是可耻的，正如向内部敌人投降的政党是可耻的一样。只是“着火的房屋”那里的消防队员们忘记了一点：社会党人口中的保卫祖国不是意味着让人们去充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首先来谈一谈“侵略”：难道侵略真的

是那样一种幽灵，在它面前，国内的任何阶级斗争都如同受到一种极其强大的法力的降伏，由瘫痪而消失了吗？根据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主张戒严的警察理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对保卫国家利益的一种犯罪行为，因为这种斗争会危害和削弱国家的防御力量。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被这种叫嚣吓住了。但是，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史毕竟证明，外来的侵略并不象资产阶级社会今天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它的最残酷的暴行，而是一种它非常喜欢采取的、经过考验的反对“内部敌人”的手段。法国波旁王室和贵族不就是请人入侵来对付雅各宾派吗？奥地利和教皇的反革命势力在1849年不就是请法国入侵来对付罗马、请俄国入侵来对付布达佩斯吗？1850年在法国，“秩序党”不就是公开以哥萨克的人侵入威胁国民议会，让它听话吗？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之流和俾斯麦之间不是通过1871年5月18日绝妙的协议而约定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军队并由普鲁士军队直接支持消灭巴黎公社吗？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卡尔·马克思早在四十五年以前就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战争”是个骗局。他在他的为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写的著名的国际总委员会宣言中写道：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sup>①</sup>

这就是说，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象官方的

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是对立的，入侵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表现。如果说入侵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经过考验的手段的话，那么，对于奋发向上的阶级来说，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却一向被证明是最好的反对入侵的手段。在新时代开始之际，一些城市由于无数内部变革和外来的敌对行动而动荡不安、风起云涌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米兰一百年来进行反对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内部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激情不仅不会削弱公团的对外防御力量，而是相反，恰恰是从这一斗争的烟囱中喷射出来的熊熊火焰足以抵抗任何外来敌人的冲击。而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一个范例。1793年法国的情况，法国的核心巴黎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样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如果说巴黎和法国当时没有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即来自各个方面的入侵的激流吞没，而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斗争，随着危险和敌人进攻的发展而振奋起来，日益加强抵抗，以再现的奇迹那样取之不竭的斗争勇气给予敌人的任何新的联合以迎头痛击，那么这只能归功于在阶级大清算中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来的社会内部力量。今天，在相隔一个世纪以后来看问题，十分清楚，只有那一清算的极其激烈的表现，即只有巴黎人民的专政及其无所顾忌的激进主义，才能使民族找到足够的手段和力量来维护和保卫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反对王朝的阴谋、贵族的叛国行径、教士们的诡计、旺代的暴动、将军们的背叛、六十个县和省会的反抗和欧洲君主国同盟的联合军队和舰队。这就是说，正如多少世纪的历史所表明的，不是戒严状态而是无所顾忌的阶级斗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自尊心、牺牲精神和道义力量，因此无所顾忌的阶级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8页。除最后一句中“一致”二字的着重号外，其它着重号是卢森堡加的。——编者注

斗争是一个国家反对外部敌人的最可靠的保障和最好的武器。

如果社会民主党为了论证它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而援引民族自决权的话，那么就会犯下与上述同样可悲的过失。诚然，社会主义承认各族人民享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一民族自决权的体现，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十足的讽刺。迄今这些国家之中究竟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曾经决定自己的民族的、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存在和存在条件呢？

德意志民族的自决所意味的，也就是它想要的实现的，已经由1848年的民主主义者，由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宣布和加以捍卫了：这就是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为了这一理想，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斗士血染街垒，为了实现这一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打算迫使普鲁士进行一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民族纲领，首先需要清除叫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需要结束普鲁士军事君主国以及德国的两打小君主国。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资产阶级对它自己的民主主义理想的背叛，导致了俾斯麦的统治和他的杰作：今天的大普鲁士，它把二十个国家置于一位戴盔戴帽的首脑之下，自称德意志帝国。现在的德国是建筑在三月革命的坟墓上，建筑在德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的废墟上。今天的战争的目的除了维护土耳其外，还要维护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加强普鲁士军事君主国，这场战争是再一次草草地掩埋三月的阵亡者和德国的民族纲领。而历史却开了一个真正残忍的玩笑：作为1848年德国爱国者后继人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民族自决权”的旗帜卷入了这场战争！或者说，在四大洲拥有殖民领地和在两大洲犯下残暴的殖民罪行的第三共和国难道是法兰西民族的“自决”的体现吗？或者说，拥有印度并且在南非由一百万白种人对五百万

有色民族实行统治的英帝国是这种体现吗？或者说，连土耳其、沙俄也是这种体现吗？只有把统治种族视为人类、把统治阶级视为民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在殖民地国家里谈论“民族自决”。从这一概念的社会主义意义上说，如果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的存在是建立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那就没有自由的民族，因为殖民地民族也算是民族并且是国家的一员。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承认各个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只有它才能使这样的民族产生出来，只有它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社会主义的这口号也象它的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宣布现存事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行改造的、积极的政策的指南和动力。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特别是只要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还在决定和安排国家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那么，民族自决权就同这一政策在战争和平时期的实践毫无关系。

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根本不会再有民族的防御战争，而且任何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它没有考虑到这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环境，如果它在世界纷乱中所持的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国家的孤立的观点，那么这种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

我们已努力阐明日前德国同它的对手发生冲突的背景。确切地阐明目前的战争的真正动力和内部联系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的国会党团和我们的报刊表明态度时，维护德国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这一说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是一场德帝国主义由于它的世界政策的目标准备多年、在1914年夏季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手腕自觉地发动起来的先发制人的战争。除此之外，在总的评价世界战争和它对无产阶级政策的意义时谈论防御和进攻问题、“祸首”问题，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说德国根本不是在进行自卫，那么法国和

英国同样也不是，因为它们所“保卫的”不是它们的民族的地位，而是它们的世界政治地位，它们的受到德国暴发户冲击和威胁的老牌帝国主义的财富。如果说毫无疑问是德国和奥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游弋引起了世界大火，那么法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是一块一块地为这场大火运送和堆积燃料的：法国帝国主义吞并摩洛哥，英国帝国主义准备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它对印度的暴力统治，俄国帝国主义的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政策。如果说扩军备战作为导致灾难到来的动力起了重大作用，那么这是所有国家都参加的一场竞争。如果说德国通过1870年俾斯麦的政策为欧洲的军备竞赛铺下了基石的话，那么这一政策从前却得到第二帝国的政策的庇护，后来又受到了第三共和国向东亚和非洲扩张的军事殖民冒险政策的促进。

法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在1914年7月根本没有战争意图，法国社会党人主要就是由于这一事实才陷入了“民族防御”的幻想之中。饶勒斯在他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说，即在大战前夜在布鲁塞尔人民之家的演说中保证“今天在法国任何正直和诚实的人都毫无保留地、无条件地拥护和平”。情况确实如此。当罪恶的战争强加给他们的国家的时候，愤怒支配了法国社会党人，这从心理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评价世界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和确定无产阶级政策对大战的态度，这一事实就不够了。目前的战争所产生的历史不只是开始于1914年7月，而是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那时条条线索都同一条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联系着，直到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密网遍布了五大洲。这是一个各种现象的强大的历史综合体，这些现象的根子一直达到经济发展的最深底层，它们的最远的枝杈伸向依稀可见、正在破晓的新世界。同这些现象的十分广泛的规模相比，犯罪和赎罪、防御和进攻的概念显得毫无内容。

黯然失色了。

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产物，它是资本的世界性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从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种相互关系才能认识这一整体，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摆脱这一整体的。

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对目前战争中的“民族防御”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民族国家、民族统一和独立是上一世纪中欧的资产阶级大国在建立时所依靠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旗号。资本主义同小国分立状态、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是不能相容的，它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巨大的、内部完整的国土和一种精神文明，没有这种条件，社会的需求既不能提高到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水平，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机器也不能够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能够发展成包括全球的世界经济以前，它竭力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界限内争取有一片完整的领土。这一纲领——它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棋盘上只能通过革命道路来贯彻——仅仅在法国，在大革命中被实现了。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纲领以及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是半途而废的，未完成的工作。德国和今天的意大利，仍然存在的奥匈帝国和迄今的土耳其，俄国和不列颠世界帝国，都是证明这一论断的活生生的事例。民族纲领，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勉强地在中欧大国站稳脚跟并且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必要的工具和条件以前，仅仅作为上升时期的、旨在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而发挥历史作用。

在那以后，帝国主义使各国资产阶级提出超越民族边界并且根本不考虑民族关系的向外扩张作为自己的纲领，从而彻底埋葬了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自然，民族主义的词句仍旧保留下来。但是，它的现实内容、它的作用却转向了它的反面：它只是作为帝国主义意图的牵强附会的借口和作为帝国主义竞争的战

斗口号，作为唯一和最后的能把人民群众拉去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炮灰的意识形态手段而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资本主义政策的总趋势简直就象十分强大的、盲目起作用的法则那样支配个别国家的政策，正如经济竞争的法则强制性地决定个别企业主的生产条件一样。

如果我们暂且设想，——为了检验当前主宰社会民主党政政策的那一“民族战争”的幻觉——在目前的国家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战争确实在开始时的出发点是要进行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那么它的军事成就首先也要导致对外国领土上的占领。但是在存在热中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情况下，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他们又产生了扩张的野心；战争开始时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或者潜伏状态的帝国主义趋势，随着战争本身的进程将象在温室的环境下一样发展起来，并决定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结果。其次，军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结盟几十年来支配着各国的政治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交战的任何一方在战争过程中出于纯粹防御的考虑而力求争取同盟国。因此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触动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势力范围，并造成新的势力范围。例如，一方面英国把日本拉过来，使战争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把中国的命运提上了议事日程，激发起日本和美国之间、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就是说，为未来的冲突积累了新的燃料。另一方面，德国硬把土耳其拉进战争，因此把君士坦丁堡问题、整个巴尔干和近东的问题提出来，要立即加以解决。如果有谁不了解，单从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出发点来看，它就是一场纯粹的帝国主义战争，那么他根据这些影响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在当前条件下进行的这场战争会完全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帝国主义对世界重新瓜分的过程。是的，这场战争几乎在它存在的最初一瞬间已经成为这样的过程了。交战双方之间经常变化不定的力量对比迫



使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仅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或者防止新的敌对行动的危险，也要通过民族问题和领土方面的紧张的肮脏交易去控制中立的国家。以德奥为一方，以英俄为另一方，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提出的“建议”吧！所谓的“民族防御战争”具有如此惊人的作用，以致它甚至可以引起非参战国的财富、力量对比的全面变动，而且是明确地朝着扩张的方向。最后还有这一事实本身：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战争（即使它在开始时表现为“民族的防御战争”）中只是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也被一道卷入了战争，因为任何一个交战国都企图占领对手的殖民地或者至少在那里引起骚乱——请看英国对德国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点燃起“神圣的战争”的尝试；这一事实同样会自然而然地使今天的任何战争变成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大火。

因此我们的议员们和编辑们今天所描述的那种朴素的、正派的、热爱祖国的防御战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使人们丧失历史地理解事物整体及其世界联系的能力。战争的性质既不是由所谓担负领导职务的政治家的庄严声明，甚至也不是由他们的真诚意图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军事组织情况决定的。

纯粹的“民族防御战争”的公式乍一看来也许对象瑞士这样的国家是合适的。但是，瑞士恰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对今天的各国来说不是一个典型。瑞士的“中立”状态和它拥有难得的民兵，这件事本身正是包围它的军事大国之间的潜在战争状态的消极结果，并且也只有当它能同这种状态相协调时才会维持得住。比利时的命运表明，这样一种中立在世界大战中是怎样一下子就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的。这里我们来专门谈一谈小国的情况。

今天正是塞尔维亚为检验“民族战争”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如果有哪一个国家根据一切外部的表面特征有权利说自己的一方是进行民族防御战争的话，这就是塞尔维亚。由于奥地利实行兼并，塞尔维亚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它的民族生存受到奥地利的威胁，它被奥地利强迫投入战争，因此塞尔维亚完全是合情合理地在为本民族的生存、自由和文化而进行真正的防御战争。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及其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话，那么，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上反对战争、拒绝军事拨款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恰恰是背叛了本国的生存利益。实际上，塞尔维亚人拉普切维奇和卡兹列洛维奇不仅已把自己大书特书地载入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史册，同时还表现出透视战争真正关系的锐利历史眼光，而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眼光对自己的国家、对教育他们的人民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从形式上看，塞尔维亚进行的当然是民族防御战争。但是，塞尔维亚的君主制度和它的统治阶级的意图象现今各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图一样，也是要不顾民族的边界去进行扩张，因而具有侵略性质的。这样，塞尔维亚的意图也指向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它必须在那里以阿尔巴尼亚人为牺牲而同意大利进行一场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其结局将在塞尔维亚以外由列强来决定。然而主要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后盾是俄国帝国主义。塞尔维亚本身只不过是巨大的世界政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而且如果撇开这一广泛的联系，撇开整个世界政策的背景，要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作出评价，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这一看法完全适用于最近的巴尔干战争。如果与世隔绝开来和形式主义地去观察问题，那么，年轻的巴尔干国家充分具有历史性权利来贯彻民族国家的老的民主纲领。但是，如果从导致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焦点和晴雨表这一现实的历史联系来看，那么，巴尔干战争在客观上也只不过是全面决战中的一个片段，一系列后患无穷的事件中的一个环

节，那些事件以令人痛苦的必然性导致了今天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于巴尔干社会党人坚决拒绝给予巴尔干战争以任何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并且揭露这场战争的真相而在巴塞尔热情地对他们致敬，并且以此预先规定了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对今天这场战争的态度。

但是，今天所有的小国都处于与巴尔干国家同样的情况，例如，荷兰也是这样。“如果船只漏水了，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将漏水的地方堵好。”这除了意味着纯粹的民族防御，捍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在小小的荷兰来说事实上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仅仅考虑荷兰人民甚至他们的统治阶级的意图，那么当然谈得上纯粹的民族防御。但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以历史地看问题为基础的，它不能以单独一个国家的主观意图为准则，而必须在国际范围内根据世界政治形势的整个复杂情况来制定。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也只不过是当今世界政策和外交的一整套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假如荷兰在事实上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漩涡，这一点就会立即清楚了。那时首先发生的就是，它的敌人也会竭力袭击它的殖民地。这就是说，荷兰进行的战争自然而然地就会以保护它今天的财富为目的，而维护北海的佛兰德民族的民族独立将具体地扩大成维护它对东印度群岛的马来亚人的统治权和剥削权。但是还不仅如此，假如荷兰军国主义单枪匹马地去行动，那么它在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将象一叶扁舟那样沉没，因此不管荷兰是否愿意，它将立即成为交战大国集团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一方面说，它将成为纯粹的帝国主义意图的支柱和工具。

就这样，个别国家的战争的性质一再是由现今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而这一环境造成了下述情况：今天根本不可能再有民族防御战争。

考茨基几年前也在他的小册子《爱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1907年莱比锡版）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截然对立的现象，那么毕竟会出现一些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两种爱国主义甚至有可能在一场战争中汇合起来，实行合作。

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在摆脱和防止来自一个异民族的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利益……在由这种意图产生的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经常合而为一……但是，自从无产阶级成为一种每当国家一有较大动荡就危及统治阶级的势力以来，自从一次战争结束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土战争后的俄国恐怖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以来，那些没有独立和统一或者不完全独立和统一的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也就在事实上放弃了它的民族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只有通过推翻一个政府才能达到的话，因为资产阶级憎恨和害怕革命甚于它喜爱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因此，它放弃波兰的独立，并且让奥国和土耳其这样陈腐不堪的国家结构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两个国家早在一代人以前就似乎已经注定要灭亡了。

作为革命或者战争的起因的民族斗争在欧洲的文明部分就是这样结束的。那里的那些今天也只有通过战争或者革命才能解决的民族问题，今后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求得解决。但是，到那时，这些问题由于国际的声援将立即采取一种与今天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形式。这些问题已不再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它今天的实际斗争中去过问，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用到其他任务上去。”（第12—14页）

“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有朝一日会为了维护本民族的自由合而为一的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了。”法国资产阶级同沙皇政府联合起来了。俄国不再是西欧自由的威胁，因为它由

于革命而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地方再也无法期望出现一场能够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合而为一的那种维护民族自由的战争”（第15—1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我们已经看到，在十九世纪还能迫使某些自由的民族以战争的形式来抵抗它们的邻国的那些对立不再存在了；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国主义丝毫也不再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民族利益，而仅仅是为了维护利润；没有谁在威胁一个民族，因此军国主义不是为了确保本民族的独立和不可侵犯性，而仅仅是为了确保和扩大海外征服地。今天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再也不会引起一场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来说必须坚决反对的战争（第2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从这一切可以为社会民主党在今天战争中的实际态度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难道可以声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自决权、同民族理想<sup>①</sup>不符合，因此这个国家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我们把它放弃给敌人？消极地听其自然、不加干预的态度从来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态度的准绳。既不是在统治阶级的指挥下去维护现存的阶级国家，又不是一言不发，袖手旁观，等待风暴过去，而是提出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鞭策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遇到任何巨大的危机时继续前进，促使危机发展到超出原来的范围，这是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这就是说，不应当虚伪地给帝国主义战争披上民族防御的外衣，而恰恰是要认真实现民族自决权和进行民族防御，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杠杆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民族防御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民族要把防御掌握在自

---

<sup>①</sup> 在原稿中为“理想的民族”。——德文版编者注

己手中。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是建立民军，这就是说，不仅要立即将全部成年的男性居民武装起来，而且首先也要由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其次则是说，立即废除一切剥夺政治权利的做法，因为必须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作为民族防御的基础。公布这些实际的民族防御措施，要求实现这些措施，这是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已向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证明，只有民军才能真正保卫祖国，并使祖国成为不可战胜的。现在第一次巨大的考验来到了，我们却把保卫祖国作为十分理所当然的事业交到了常备军即统治阶级控制下的炮灰的手中。我们的议员显然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怀着热烈的愿望”把这些炮灰当作祖国的真正国防军一道送赴疆场时，在他们直截了当承认普鲁士王国的常备军在國家危难的时刻是它的真正的拯救者时，他们这样做，就是公然摒弃我们的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即建立民军，使我们四十年来关于民军的鼓动的实际意义化为乌有，成为教条主义的空想的奇谈怪论，而这些奇谈怪论是再也不会有人认真加以接受了。<sup>①</sup>

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对保卫祖国的理解是与此不同的。当1871年无产阶级在遭到普鲁士人围困的巴黎取得权力的时候，马克思针对他们的行动热情洋溢地写道：

---

① 8月6日慕尼黑党的机关报写道：“尽管如此，如果现在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如果他们热烈祝愿所有出发去保卫德意志帝国的人取得成功，那么，这决不是一种‘策略措施’，这是这样一个党的态度的十分自然的结果，这个党时刻准备建立一支保卫国家的人民军队，来取代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它看来与其说是保卫民族反对疯狂袭击的意志的体现，不如说是阶级统治的体现。”

看来！！——《新时代》甚至直接把今天的战争颂扬成“人民战争”，把常备军颂扬成“人民军队”（见1914年8、9月份第20和23期）。——社会民主党的军事问题作家胡果·舒尔茨在1914年8月24日有关战争的对“生动活泼地”体现在哈布斯堡军队中的“坚定的民军思想”进行了赞扬。——卢森堡注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么，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公社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sup>①</sup>（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而我们的老导师对社会民主党在象今天这样的一场战争中的作用是怎样想的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在一次大战中所应采取的基本的政策路线时写过下面一些话：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口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382页 ——编者注

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比美。如果孔斯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在恩格斯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形势。他看到的还是老的沙皇俄国，而我們在那以后却经历了俄国大革命。其次他想到的是，德国在突然遭受袭击时反对东方和西方同时发动的进攻的一场真正的民族防御战争。最后，他象真正的战士多半习惯于过高地估计发展的速度那样，过高地估计了德国条件的成熟程度和社会革命的前景。但是尽管如此，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他所理解的作为社会民主党政党的民族防御不是支持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军事政府和它的总司令部，而是一次以法国雅各宾派为榜样的革命行动。

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在一场巨大的历史性危机中保卫自己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一个严重过错恰恰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声明中庄严宣布：“我们在危险时刻不会置祖国于不顾”，却在这同一时刻否定了它的这句话。它在最危险的时刻是置祖国于不顾了。在那一时刻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背景，揭穿编造出来的关于祖国遭到袭击的爱国主义谎言和外交方面的谎言；大声疾呼地宣告，在这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7—298页。——编者注



次战争中胜与负对于德国人民来说都同样是灾难性的；最大限度地反抗通过实行戒严压制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把人民武装起来，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强烈要求人民代表机构在战争持续期间不断举行会议，以便确保人民代表机构对政府密切实行监督，人民对人民代表机构密切实行监督；要求立即恢复一切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真正保卫它的国家；最后，以1848年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旧的真正的民族纲领、以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以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反对旨在维护奥国和土耳其，即维护欧洲和德国的反动势力的帝国主义战争纲领。本来是必须用这面旗帜来引导国家前进的，它本来会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自由的旗帜，是与德国的优良传统以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阶级政策一致的旗帜。

世界战争的伟大历史时刻显然要求有一种果断的政治行动，一个有气魄的全面的态度，一个慎重确定的国策，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担负起这些任务。但是，在那一时刻有发言权的工人阶级议员们没有这样做，可耻地史无前例地失职了。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领导——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而是根本就没有去采取任何政策，它作为具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特殊的阶级政党完全退出阵地，不加批判地把国家对外交给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可怕的灾难，对内交给了军刀的专政，而且自己还要承担战争的责任。国会党团的声明说，它只批准保证国家的拨款，却拒绝对战争承担责任。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用于这种“防御”的拨款，即用于军事君主国军队对人类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拨款，根本不需要社会民主党批准，因为拨款的使用丝毫也不取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赞成，社会民主党是以少数对资产阶级国会牢固的四分之三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自愿的赞成只做到了一点：显示了全民族在战争中的团结，宣布了国内和平，即停止阶级斗争，取消社会民主党

在战争中的反对派政策，因此它对战争也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通过自愿地赞成拨款，使这次作战具有了民主的保卫祖国战争的招牌，支持并确认了他们对群众散布的有关保卫祖国的真正条件和任务的谎言。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在祖国利益和国际团结义务之间严重地进退两难的说法，关于使我们的议员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到帝国主义战争一边的这种悲剧性冲突的说法，是不折不扣的幻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一样，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两者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开展阶级斗争和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但是，我们的党为强调它反对战争、为强调那些要求应当做些什么呢？它应当宣布群众罢工吗？或者应当要求战士去拒绝服役吗？这是通常要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采取肯定的态度是如此可笑，就好象光打算作出“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就制造革命”的决定一样。革命不是“制造的”，伟大的人民运动不是按照党的机关从口袋中拿出的技术方案发动起来的。一些小的密谋集团能够准备在一个确定的日期和钟点进行一场暴乱，能够在必要的时刻把“开火”的信号发给他们的几打拥护者。伟大历史时刻的群众运动是不能用这样的原始方式来领导的。在一些情况下，“准备充分的”群众罢工恰好会在党执行委员会发出“信号”的时候，可悲地无法发动起来，或者刚一一开始就一败涂地。是否真正举行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群众行动，这取决于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因素，取决于当时的阶级对立的紧张程度、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成熟情况，这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任何政党都不能人为地制造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危机同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在和平时期能够依靠领导“机关”的指挥棒，井井有条地进

行的那种小规模示威行动之间的差别。历史性的时刻总是要求有相应的人民运动形式，甚至不顾党的一切规章制度，创造新的形式，临时想出以前不知道的斗争手段，整理和充实人民的军械库。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作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领导者需要提出的不是可笑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性的方案，而是政治口号，是对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政治任务和利益的明确解释。因为我在论述俄国革命中的群众罢工时所谈到的那些内容，也适用于任何群众运动，这就是：

“如果说从发布举行群众罢工的号令和计算、筹措罢工经费的意义上讲，领导群众罢工是革命时期本身的事，那么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讲，对群众罢工的领导则又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事情。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不是要为群众罢工的技术方面和内在机制煞费脑筋越俎代庖，而是要在革命时期也承担政治领导。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即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斗争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重要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为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群众罢工‘自然’爆发，而且总是很‘及时’。在后一种情况却不然，领导所发出的举行群众罢工的要求有时会无人响应。”<sup>①</sup>

<sup>①</sup> 见本书第73—74页。——编者注

不是看行动的外部的、技术上的形式，而是看它的政治内容，这一点已为事实所证明，比方说，议会讲坛这个唯一自由的、声音传得很远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阵地，假如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能把它利用起来，在那里响亮地和明确地表述工人阶级在这次危机中的利益、任务和要求，那么这个讲坛恰恰就会成为唤醒人民的强而有力的工具。

群众会不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口号具有突出的意义？这是谁也不能一下子就说清楚的。不过这也根本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我们的议员在批准拨款以前并没有要求普鲁士和德国军队的将军事先作出奇特的保证，即保证他们将无条件地取得胜利而决不会战败，但是他们“深信不疑地”让这些将军发动了战争。对军国主义军队适用的道理也适用于革命军队：只要哪里发生战斗它们就进行斗争，无需事先声称有成功的把握。在最坏的情况下无非是，党的呼声起初不起明显的作用。是的，对我们党的英雄气概的报答可能就是大规模的迫害，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答。伊格纳茨·奥艾尔在他的关于1895年色当纪念日的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一个要夺取世界的党，必须珍视它的原则，而不去考虑由此会引起什么危险，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将是毫无希望的。”<sup>①</sup>

老李卜克内西写道：“逆流游泳绝不是容易的，如果水势象尼亚加拉瀑布一样湍急和猛烈，那就更加不是小事情了。

老同志们还记得‘民族耻辱’极其深重那一年的对社会党人的追捕，也就是1878年可耻的反社会党人法。那时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杀人凶手和卑鄙的罪犯，正象1870年

---

<sup>①</sup> 奥艾尔：《色当纪念日和社会民主党》第6页。——卢森堡注

把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看成叛国者和死敌一样。这种‘群众情绪’的爆发具有异常巨大的力量，因此多少有点令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喘不过气来。人们面对一种更高的权力，真正的、丝毫不容置疑的、不可抗拒的权力，感到自己没有力量。人们没有明确的敌人。这象一场瘟疫，在人们中间，在空气中，到处都是敌人。

但是1878年的发作，就其强烈程度和野蛮程度来讲，是1870年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的。不仅人们的激情的飓风把它抓到的一切东西都折断了，打倒了，撕碎了，而且还有可怕的军国主义机器以最完善、最可怕的方式在运转，而我们却置身于正在转动的铁轮之间，一接触它们就要丧生，我们活动在铁臂之间，那些铁臂在我们身边掠过，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抓过去。除了被释放的鬼怪的自发力量外，还存在着迄今世界上见过的最完善的杀人艺术的机械作用。一切都以最野蛮的方式在起作用，一切锅炉都烧到要爆炸的程度。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志愿在哪里还有呢？尤其在人们认识到自己处于微不足道的少数，在人民本身中都没有可靠的立足点时，情况更是如此。

我们的党还在发展中。在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以前，我们经历了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考验。当社会党人受到追捕这一情况到来的时候，即在给我们的敌人带来耻辱而给社会民主党带来荣誉的那一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分支很多的组织，以致每一个党员都因为意识到受到有力的支持而坚强起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相信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说，那时逆流而上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需要做什么呢？一定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那时必须：咬紧牙关，不管要发生什么事情，都等着让它发生。没有时间去恐惧……

倍倍尔和我……没有一分钟理睬过警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退出战场，我们必须坚守阵地。”<sup>①</sup>

他们坚守了阵地，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四十年来就是依靠那时它面对无数敌人发挥出来的那种道义力量维持下来的。

这一次本来也会这样过去。也许初期只能做到拯救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使千千万万的、现在在战壕中无声无息地丧生的无产者，不是思想上模模糊糊，混乱不堪，而是头脑清醒地死去，懂得他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际性的、为各族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幻影。但是我们党的勇敢的声音已经对沙文主义迷醉状态和丧失理智的人群起了巨大的清醒作用，使有觉悟的人民不致神智不清，使帝国主义毒化人民、愚弄人民的勾当难以得逞。正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十字军东征会飞速地使人民群众醒悟过来。因此，在今后的战争过程中，随着各国由于进行无尽无休、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而引起的良心上的谴责日益加强，随着战争的帝国主义马脚日益清楚地显露出来，随着嗜血成性的投机家们在市场上更加放肆地吵嚷，一切有生气的、正直的、善良的和进步的人将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那时首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在普遍的混乱、蜕化和崩溃中成为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一块岿然不动的磐石，成为国际灯塔，使其他一切工人政党很快就能凭着它辨清方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以前在整个无产阶级世界中享有巨大的道义上的威望，凭着这一威望，它无疑也能在这次普遍的混乱之中在短期内造成一次转变。随之，人民群众在各国要求和平的气氛和压力就会加大，大屠杀就会迅速结束，牺牲于屠杀的人数就会减少。德国无产阶级仍然会是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敲钟人，而这完全是一项与马克思、恩格

---

① 《1872年莱比锡叛国审判案》1960年柏林德文版第389、392页。——编者注

斯和拉萨尔的门徒相称的爱国主义事业。

1916年出版于苏黎世。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3、109—121、132—152页。

（唐春华 周家碧译 殷叙彝校）

## 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的政策\*

(1916年)

啊，愿你善恶分明！但你平平庸庸，  
善恶不分，我将把你唾弃。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党的反对派内部存在着分歧，在你们这些不赞同正式的党的现状及其上层领导的政策的人中间，有不少人看到这种分歧立刻就会感到十分忧虑。有些人不满地喊道：“又开始分裂了！”“至少所有反对国会党团多数派的人应该坚定地团结起来，一致行动，难道这不是必要的吗？我们一致的目标是：把党的运动重新纳入原则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轨道。要是我们之间再互相争吵，闹分裂，那不是削弱反对派的力量，给多数派的政策帮忙吗？”

是的，同志们！假如这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争吵，仅仅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仅仅是在一些微末细节上固执己见、漫不经心，或者是个别人的所谓“越轨行为”，若是这样一些琐碎小事导致了反对派核心内部的分裂的话，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把这看成是一种罪过，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

\* 这篇文章未由卢森堡署名。原定于1916年初作为斯巴达克派的地下丛书《抉择》的第1期发表。但后来由恩斯特·迈耶尔根据发现的校样于1925年才将该文在《共产国际》上发表。——德文版编者注



但是，同志们，事情并非如此！导致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基本的政策问题，是对用什么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党摆脱目前困境和争取党的状况好转这一问题的认识。

想一想我们面临多大的危险吧！随着1914年8月4日事件的发生，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就一起可悲地彻底破产了。我们过去五十年来向人民宣传的，当作我们最崇高的信念而庄严宣布的，我们在演说中、小册子中、报刊和传单中不厌其烦地阐明的，这一切骤然间都变成了空话。无产阶级国际阶级斗争的党陡然间就象着了魔一样，变成了一个民族自由党。我们曾为之感到自豪的强大组织竟完全表现得软弱无力。昨天我们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到敬畏的死敌，而现在却变成了我们的死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盲从的并且理所当然遭到蔑视的工具。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同样也程度不同地深深地堕落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令人自豪的老的口号在战场上竟变成了这样的命令：全世界无产者，互相残杀吧！

在世界史上还从未见过一个政党遭到如此惨重的破产，从未见过一种崇高的思想如此屈辱地被叛卖和被践踏！

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将会满怀羞愧和愤怒而流下血泪，因为他们曾是那样珍贵和神圣的一切，如今却遭到了天下人的冷嘲热讽。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渴望着挽回这一损失，洗刷党所蒙受的耻辱，使他们能够重新抬起头来，毫无愧色地享有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称号。

但是有一点每个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只有采取始终如一的、旗帜鲜明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才能使我们从这一堕落的深渊中得到拯救。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的手段而动摇不定，或者采取畏缩的随机应变的政策，那是永远无济于事的。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我们当披着社会主义雄狮之皮的民族自

由主义绵羊，那就再也别充什么反对派；要么我们就必须名符其实地做反对派的工作，我们就必须毫无畏惧地理直气壮地举起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的战士。同志们，现在看一看迄今为止的，以累德堡、哈阿兹及其同伙为代表的所谓反对派吧。在他们先后四次在国会中俯首贴耳地容忍了战争拨款，从而使自己成为叛变社会主义的帮凶，在这之后，在1915年12月21日的全体大会上，他们总算还敢站出来投反对票。工人们当时这样想：总算站出来了！总算公开拒绝民族主义的欺骗政策了，在国会中起码还有二十人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了！错觉为时不长，这种“勇敢的行动”只能使那些看问题非常肤浅、不能用批判的眼光深入探讨的人们感到十足的高兴。盖尔<sup>①</sup>一伙在国会中就拒绝战争拨款发表了一个声明，这就使他们投反对票的义举又化为乌有。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一次要反对战争拨款呢？声明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境安全了。”这些好心的先生们的话是何所指呢？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谁着想呢？他们自己心中明白。而那些局外人，不懂得可能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声明的老谋深算的外交手腕的人，便会这样想：这二十个人公开反对战争拨款，显然是因为德国的边境已经安全了。换言之，不是因为我们在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不是因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犯下了的罪行，而是因为兴登堡、马肯森<sup>②</sup>和克努克已经杀戮了足够的俄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而且在这些国家站稳了脚跟，所以才允许某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摆个排场，去反对战争预算！但这样一来，盖尔之流便在原则上站到了多数派政策的立场上去了。于是

---

① 弗里德里希·盖尔（1853—1937）——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组织领导人之一。1915年12月曾以国境已经安全为理由拒绝战争拨款。——编者注

② 奥古斯特·马肯森（1849—1945）——普鲁士将军。——编者注

把这次战争说成从第一天起就是为了保卫国境安全的防御战争这一无耻谎言，便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见他们同多数派中的差别并不在于对战争的根本态度的不同，而仅仅是对军事形势的不同看法。按照兴登堡、大卫、海涅等人的看法，德国的国境还远远没有得到巩固，而哈阿兹、累德堡、盖尔却认为已经巩固了。然而，每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认为，如果仅就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而言，那么兴登堡、大卫、海涅的立场比累德堡和哈阿兹要更加彻底一些。因为谁能担保德国军国主义今后也可以无往不胜呢？又有哪位头脑清醒的将军可以断言，战局会一成不变呢？比如说，俄国人难道就不会重返东普鲁士吗？果真如此，又将如何呢？那时累德堡、盖尔和哈阿兹之流在国会里如果要忠实履行自己的声明，就必须赞成战争拨款！由此可见，这不是原则鲜明的策略，而是随风转舵的政策，是依据一时的战局而采取的应变政策，是臭名昭著的的机会主义的随机应变的政策，恰恰是这种机会主义政策导致了党在1914年8月4日的壮举！

然而，事情还有很严重的一面，如果依照累德堡和哈阿兹的声明，德国的边界已经巩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可以反对战争拨款，那么，对于国土已被敌人侵占的法国、比利时、俄国、塞尔维亚的同志们说来，又将该如何行动呢？就连最普通的工人也会一眼看穿，声明中的这句话给其他国家的同志们提供了维护其民族主义政策的最好的依据。事实上，法国民族主义多数派的同志们，已经死死地抓住了这句话，竭力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我们又面临着国际的分裂，我们又面临着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不是使各国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地反对战争和本国的统治阶级，而是使他们完全按照帝国主义的指挥而相互敌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也不折不扣地站到多数派毁灭了我们和国际的那种政策的立场上去了。

同志们，请想一想，倘若我们认真地以批判的态度考查一下，累德堡、哈阿兹及其同伙12月20日投反对票是不是一种进步呢？是不是我们翘首渴望的、群众梦寐以求的拯救行动呢？不是的，根本不是。附有这种声明的投票是前进一步、后退一步的作法，是又一次令人愉快的骗局，好象情况会有好转，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更加痛苦的失望。

失望果真接踵而来了。显然，反对战争拨款的行动即使没有由于那个后果严重的声明而被糟蹋掉，也肯定不应当是反对派的政策的全部内容，它只能是新道路上的第一步，是可以听到的第一个信号，随之而来的应当是在整个战线上按照阶级斗争精神进行的，坚强有力的和不屈不挠的行动。但是，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累德堡、哈阿兹之流却从此躺在反对战争拨款的荣誉上高枕无忧——他们销声匿迹了。

只举一个例子说吧！在尽人皆知的“巴拉隆”事件<sup>①</sup>中，诺斯克的演说和他高喊的对英国人的流血报复，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蒙受了奇耻大辱，甚至使正直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如果说德国土地上还有这类的人的话——也要替我们脸上发烧。8月4日之后以及此后所发生的一切，看来已使我们党在泥潭中陷得不能再深了。但“经过重新学习”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却一再花样翻新，令人吃惊。他们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看来完全越出了常规。在“巴拉隆”事件中，他们在煽动残暴的战争本能方面，甚至超过了保守党人，使后者感到自愧弗如。在这闻所未闻的事件之后，累德堡这位反对派人物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不是拍案而起，痛加指斥，不是以德国无产阶级的名义公开地表示与诺斯克之流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累德堡竟加入了这种狂喊乱叫，原则上表示赞同诺斯克之流

---

<sup>①</sup> 1915年8月19日英国辅助巡洋舰“巴拉隆”号击沉一艘德国潜艇，杀死该艇遇难乘员——编者注

的报复政策，在一番犹豫之后打定主意，向人们乞求，将这种惨无人道的原则付诸实行。

现在将累德堡1月15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讲话，根据速记稿摘录如下：

“先生们，关于‘巴拉隆’事件本身，即英国人对英勇的德国海员们所犯下的罪行，我与所有的先前的发言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他们的发言，我不想再补充什么了。”<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罗·卢·）

而这些“先前发言的人”都是谁呢？他们是：社会帝国主义者诺斯克、中央党的施潘、自由思想党人菲施贝克、保守党人克努滕—厄特尔之流！而累德堡正是和所有这一伙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一致”。

这是又一次从原则上支持社会主义叛徒多数派的政策，又一次潜进了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国内和平的联合——这是装模作样地举起阶级斗争旗帜三个星期之后的事。

再举一个例子。国会议员们掌握着所谓的“简短质询”这样一件价值不可估量的武器，可以用来在军事独裁的恭顺奴仆举行的唯命是从的可悲的大会上，不断地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多数派抗衡，不断地惊扰帝国主义阵营，不断地唤醒人民大众。<sup>②</sup>如果简短质询掌握在二十个坚定的人民代表手中，就可能真正成为持久不懈地抽打帝国主义鹰犬脊背的无情皮鞭。但是，并非如此。我们看到

---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第13届2次会议速记记录》1916年柏林德文版第306卷第674页。——编者注

② 1912年在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资产阶级议员的压力下简短质询的议会手段被纳入帝国议会议事规程。从而，议员有权不必需经30名议员签名的繁琐的质询程序，短期内得到政府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答复。质询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对首相及其代表的回答不能进行讨论。战争期间，由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发展，简短质询成为革命地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一种重要形式。——编者注

的是什么呢？累德堡、哈阿兹及其同伙并不想使用这一重要的斗争手段，也一次都没有试图去运用它。他们无动于衷地让卡尔·李卜克内西单枪匹马地奋战在气势汹汹的狂徒之中，东拼西杀，保卫自己。但他们自己显然对这种独特的勇敢精神望而生畏。他们根本不敢去反抗，不敢摆脱国会党团多数派的控制。

当然，例子还很多！国会中帝国主义多数派联合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多数派发动攻势，借助国会议长的肆意裁决来摧毁简短质询这件武器。这时，累德堡、哈阿兹及其同伙却视而不见，袖手旁观！这些貌似反对派的头头们支持了这一旨在反对人民代表的权利、摧毁唤醒民众的重要手段的暴行。他们参与了国会党团多数派这一新的背叛行径。

1月17日，国会辩论军事问题，这是对刺刀专政的整个暴行和战争残暴性进行无情批判的大好时机，是阐明整个形势和提出世界危机的所有重大问题的大好时机。这时，情况又是如何呢？在这个时刻，累德堡、哈阿兹之流再次令人大失所望。12月21日，他们装出进行斗争和转变阵线的姿态，此后还不到四个星期，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如同和平时期国会里的无聊日子中那些司空见惯的装腔作势，关于鸡毛蒜皮的高谈阔论一样，这些反对派的领袖们在辩论军事问题时慷慨激昂的努力不过如此而已。同志们，这就是所谓的反对派，这就是累德堡、哈阿兹和他们的一伙对反对派的理解。他们畏首畏尾，毫无魄力，锋芒消铄，原则模糊。除了半途而废，懦弱和幻想之外，别无他物。我们看到的半途而废、懦弱和幻想实在够多了，也知道它们已把我们引到了何种地步。

没有人会怀疑累德堡、哈阿兹、阿道夫·霍夫曼<sup>①</sup>这种人的好

---

<sup>①</sup> 阿道夫·霍夫曼（1850—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后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员。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但1922年又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心。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也是完全由善良的意图铺成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力量，坚定性和勇气。而我们的敌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些来压制我们，迫使我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这种力量、坚定性和勇气，我们哪怕有一点点也好啊！我们需要的正是坚贞不屈的人，无所畏惧、坚忍不拔的战士，而不是动摇不定的政治家，不是胆小鬼，不是畏缩不前的人。

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之流恰在现在抛出了一份传单，这份传单最后完全证明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反对派是与这些要求水火不容的。

在传单中，对德国各地的不少同志作为当前历史时期认识和行动指南的那些指导原则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和否认。最后我们想在这里全面地引证一下指导原则，以使每个同志都能自己对它们作出判断<sup>①</sup>。这些指导原则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对于世界大战在工人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事实和事件作出坦率、忠实和毫无掩饰的阐述。此外，也是我党的传统原则在当前形势和任务下一贯的、坚定的应用。这些形势和任务都是同我们大家有关的，如果我们真想对国际社会主义采取严肃态度的话。

而累德堡和霍夫曼恰恰对这些准则所要达到的目标采取了断然否决的态度！他们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变成整个工人运动的起支配作用的中心，是不恰当的；限制各国中央机关自由决定对战争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把国际置于德国党和其他国家党的领导机构之上，是不恰当的，也是行不通的。如同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样，第二国际只应是各国工人党的一种松散的联合，而各国工人党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是战争时期都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策略。

同志们，这正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正是与工人运动生

---

<sup>①</sup> 即《尤尼乌斯提纲草案》，参见本卷第381—385页。——编者注

命攸关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党一样，我们党在8月4日也失效了，这正是因为国际只会讲一通空话，因为国际大会的决议已表明自己只是些空洞无力的言词。如果我们决心结束这种羞辱已极的状况，如果我们决心防止1914年8月4日的失败在将来重演，唯一的道路和唯一挽救的办法便是：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由漂亮的言词变成实实在在的、极为严肃的、神圣的生存法则，把社会主义国际漂亮的装饰变成实际的力量，把它建造成今后能够粉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恶浪冲击的坚如磐石的大坝。假如我们想从我们已经掉进去的耻辱的深渊中自拔，那么我们就必须使德国的、法国的以及其他国家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认识到：对我来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团结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业，它是我的指路明星，是我的理想，我的祖国；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不背叛这一理想！

但是累德堡和霍夫曼之流却对这一切毫不关心。他们简直想在战后让旧的悲剧重演；每个国家的党都应象以前一样，可以任意地践踏国际的决议，每隔几年我们又该看到堂皇的大会，漂亮的演说，高昂的热情，铿锵的宣言，大胆的决议。如果照此办理，国际就将再次变得毫无力量，就会在“保卫祖国”这个谎言面前后退，就象夜间的鬼魂在血腥的现实面前退走一样！这样看来，累德堡及其同伙从这场恐怖战争中什么都没有学到！但是，同志们，如果不懂得在历史的严峻的学校里学习，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对一名战士来说，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了。犯错误并不可怕，一个在世界历史性斗争的错综复杂情况中必须匆匆作出决策的人，免不了会犯错误。然而不认识已犯的错误，不能从中得到教训，反复不断地蒙受耻辱却屡教不改，这就近于犯罪了。同志们，如果甚至我们正在艰难涉过的血海和国际的这次可怕的道德堕落都没有使我们提高认识，促使我们走上坚定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便真正无颜活在世上了。



那么就让关于国际的空话，骗人的老调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通通见鬼去吧！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之后作为老的、不可救药的空话英雄们向人民群众宣传各民族兄弟般团结的理想，却又不愿严肃地对待这个理想，人民就有理由唾弃我们。

同志们，在这里也需要作非此即彼的抉择！不是象海涅、大卫、谢德曼那样对国际厚颜无耻的背叛，就是对国际采取神圣的严肃态度，把它建成一座坚固的要塞，使它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和平的堡垒。今天已不再允许采取中间道路，也不再容许摇摆不定和半途而废了。

因此，对真正的反对派成员来说，跟站在累德堡、霍夫曼之流的立场的人联合行动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不要被过去常讲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老话所迷惑。今天谢德曼和艾伯特也在从党的执委会那里兜售这句老话。是的，团结就是力量，但是这应该是坚定的、以内在信仰为基础的团结，而不是把各怀鬼胎的人机械地、在表面上拼凑在一起。力量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激励我们的精神，明确性和魄力。在战前，我们自以为很有力量，我们凭我们的四百万追随者而大吹大擂，可是，我们的力量在首次受到考验时竟立即象空中楼阁一样崩溃了，一败涂地了！应该从过去的失望中吸取教训，不能重蹈覆辙了！如果我们要想对党的正式领导的现行方针进行有力的抵制，并坚决反对国会党团多数派，就需要明确的、始终如一的、坚毅的政策，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左顾右盼，而应团结在鲜明的旗帜周围，而被累德堡之流嘲弄的指导原则，恰恰说的是这些。让所有那些半途而废和动摇不定见鬼去吧！让我们按照国际的精神，矢志不移、坚决地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吧！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团结的基础。那些真心实意的希望社会主义获得新生的人，一定会站到我们一边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同志们，在一切地方都围绕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原则上团结起来！全力以赴，把我们的理想变为行动！全国和全世界受尽剥削和奴役的无产阶级大众，都向往着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唯有这种政策才能把他们从现存状况的苦难深渊中解救出来。全力以赴，坚决地、全面地开展阶级斗争，争取这一解放时刻的早日到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为此，让我们高呼：

阶级斗争万岁！国际万岁！

发表于《共产国际》1925年第9期第952—958页。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171—180页。

（唐松阳 常正文译 殷叙彝校）

# 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

(1917年1月6日)

## 论分裂、统一和退党

自从1914年8月4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了分裂和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每日每时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如同自然发展过程一样，极其严格地、合乎逻辑地进行着。在帝国主义政策轨道上采取的每一新的步骤，居统治地位的力量为了加强其权力地位主动进行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帝国国会为现行政策效劳而召集的每一次会议和执行的每一项秘密使命，简言之，战争每继续一天，对于社会民主党就意味着它的屋梁在一次又一次的断裂，它的颓垣断壁在坍塌。因为胜利中的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每一个新的行动都是把社会民主党当作活跃的政治因素进一步排除掉，并且还越来越把这个党当作一个推行特别政策的政党、当作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机构而去根除它，消灭它，把它从德国的公众生活中排除掉。

谁要是全面地、深刻地观察这一重大历史进程，那么他不论是对政府派社会主义者谢德曼之流采取种种手段和花招力图继续统治全党的苦心经营，还是对哈阿兹、累德堡为首的温和的反对派，在感到被人怀疑有“分裂倾向”时流露出来的真诚愤懑，都只能报之以轻蔑和怜悯的一笑。这两派之间对哪一派是真正“企图分裂”

党发生了可笑的争吵，各自都竭力把令人气愤的罪行归咎于对方。这一争吵极妙地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不论是右派还是泥潭派，他们关于党的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全部观点归根结底同出一辙。谢德曼一伙和哈阿兹一伙都认为，协会、领导机构、会议、全体大会、现金帐簿和党员证就是“党”。双方都同样没有看到，当党不再执行由其本质决定的政策时，协会、机构、党员证和现金帐簿会在转瞬之间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物。双方都同样没有看到，由于这一点，他们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分裂还是统一的争吵，就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已全然不复存在了。

我们姑且想象一下，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在这座基督信念至尊无上的庙宇里，在这块极为珍贵的宗教文化的纪念碑下，有一个早晨，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爆发了一件叫人几乎不愿意用笔记下来的事情：在这个圣殿里，不是在举行天主教的礼拜，而是在搞妓院里那样的无耻淫乐。让我们再想象一下更加骇人听闻的情景吧！我们设想这些教士在淫乐之际仍旧还穿着他们过去在做大弥撒时穿过的法衣、礼服，捧着他们那时用过的香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圣彼得大教堂仍旧还是一个教堂还是完全变成别的东西了呢？当然高墙还是那道高墙，祭坛和法衣也还是旧日原物，然而任何人只要向内部瞥一眼，都会吓得倒退，惊惶地问道：这教堂到底变成什么了呀？

教堂是人们在里面向上帝祷告的一座房屋，而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政党。在正式放弃阶级斗争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以骤然发生的雪崩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陷入了它的分崩瓦解的过程。今天社会民主党的倾斜的屋顶下潜伏着分崩离析的倾向，潜伏着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阶级国家和国际各民族友爱这样的本质上极端对立的、不共戴天的因素。

应当从这一出发点来批判温和的中间反对派向世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历史状况提出的装在背心口袋里的政治计划。这一整个计划可一言以蔽之，并予以批判地表述为“回去！”他们要回到战争爆发之前存在的境况，他们要想把他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到1914年8月4日以前的样子，他们想要回到历次国会选举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久经考验过的老策略”上去；回到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同修正主义进行的胜利的战斗中去；回到为劳动的国际团结进行耐心的、柔和的宣传鼓动上去；回到他们用指挥棒安排的、在一天内“隆重地召开”四十七个群众大会去，这些大会是以“一致”通过的，轰动一时的决议，和三呼“国际的、革命的、各解放民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而结束的；回到“红色周”去，以小规模复制上帝的巨大奇迹，在七天里制造出十五万“社会民主党人”而使世界发出虔诚的惊叹。回去，回到舒适迷人的自我欺骗的美好时光去。

把芬芳的木犀草放到桌上，  
将最后的红色紫菀带到身旁，  
让我们再次把爱情诉说，  
就象昔日的五月一样……

但，遗憾的是，小计划有一个大漏洞：如“昔日的五月”一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不再存在了，有的只是8月里的那个社会民主党。从前的社会民主党连同它那“久经考验的策略”一起消失在帝国主义凯旋车的轮子下面了。这群泥潭派渴望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党，这只是一个由可怕的战争产生的极其幼稚的空想。和这一幻想差不多同样幼稚的只有一件事：令人震惊的

---

① 威廉·迪特曼（1874—1954）——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并曾任该党主席。因受纳粹迫害，长期流亡，于1951年返回联邦德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工作。——编者注

政治上的天真、泥潭派的领导人哈阿兹、累德堡和迪特曼<sup>①</sup>刚刚帮助埋葬了老的光荣的社会民主党，并在其墓旁翩翩起舞达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又凭这种天真设想把它的亡灵唤醒了。使用的办法是：他们在今日的世界大战中间，忠诚遵循“久经考验的策略”，言谈举止完全同战前一样，并且完全和很久以前一样在国会响亮地发表着老一套的演说，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

目前，一个向后看的反对派在党的前台上演着这出无辜的闹剧，因而这个反对派只将它的臀部对着当代的冲击。而此时，在党内发生了世界历史性的悲剧：德国资本的警察魔爪致命地捕捉着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部队。党和工会的领导机构，谢德曼及其同伙，列金及其同伙，他们对有组织的工人实行的统治，从本质上说，不是别的，而是德国资产阶级曾经用战斗去取得的、或者仅仅是梦寐以求的对工人阶级的最大胜利。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旗帜下为反对资本而斗争的群众，今天恰恰通过这些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受到资产阶级的枷锁的束缚，这是他们自现代资本主义关系开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那些面对工人运动的崩溃，不是致力于倒退，而是争取前进的人，根据以上情况也在党的“分裂和统一”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尽管使许多优秀分子纷纷脱离党的那种性急和愤慨是令人赞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脱离总归是脱离，对我们而言，脱离是对群众的背叛；这些群众在谢德曼和列金设下的致人于死命的套结中，被无条件地抛给了资产阶级，坐立不安，遭到扼杀。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成熟的幻想。把扔掉党证幻想为解放，只不过是作为权

力幻想的党证无限崇拜的颠倒而已。二者都是组织痴呆症的两个不同的极端，是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结构方面的这个疾病的不同极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瓦解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历史过程，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一场总清算，人们不要出于对这一战役的反感而袖手旁观，在丛林的一角悠闲地呼吸较纯净的空气。这场伟大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统治阶级把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正式的自由工会这一致人于死地的套结，套在被迷惑和被出卖的群众的脖子上。应当以团结的力量把这个套结扯下来，一直把它扯碎。应当在这场争取群众解放的最艰难的斗争中，帮助受到迷惑的群众，用自己的胸膛忠实地保卫他们。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并必须作为重大的公开的权力问题，集中一切力量，才能解决。德国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同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导机构的这一长达几十年的总清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直至最后一个人都应该是：“岗位在此，别无他途！”

发表于1917年1月6日《斗争》第31号。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232—236页

（肖辉英译 周懋庸校）

# 论俄国革命\*

(1918年)

—

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俄国的革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动摇了一切阶级关系，展示了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它按照内在逻辑的必然性顺理成章地从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向前推进到更加深入的各个阶段——推翻沙皇制度在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简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明，俄国的解放不是战争和沙皇制度军事失败的成果，并不象考茨基编辑的《新时代》在社论中所许诺的那样是“德国人手中的德国刺刀”的功劳，而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有着深厚的根源，并且内部已经

---

\*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1922年保尔·列维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本文时用的书名是《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此后出版的历次德文版单行本和英文、法文译本都以《俄国革命》为书名。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民主德国1974年出版的《卢森堡全集》第4卷中的文本，篇名是全集编者加的，编者说明这是根据原稿的照相复制件排印的。——编者注



完全成熟了。德帝国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盾牌掩盖下进行的战争冒险并没有引起俄国的革命，却仅仅是起初——在1911—1913年间它的第一次狂风巨浪的高潮之后——使它中断了一个时期，然后，在革命爆发之后，为它制造了最困难、最不正常的条件。

但是对于每一个动脑筋的观察者来说，这一过程也是反对考茨基同政府派社会民主党共同主张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据，按照这种理论，俄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实行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不成熟的。这一理论认为俄国只适合进行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一观点也产生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联合的策略，而俄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一翼，即在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的老练领导下的所谓孟什维克的理论也是这样的。双方即俄国和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俄国革命的这一基本观点（对策略的具体问题的态度是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上同德国的政府派社会党人是完全一致的：三者都认为俄国革命应当停留在推翻沙皇制度的阶段，而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神话，实现这一阶段就是德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崇高使命。如果俄国革命越出了这一阶段，如果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按照这一学说，这完全是俄国工人运动激进一翼即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而革命在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发生的一切坏事，使革命遭受损失的一切混乱，无非是这一致命的错误的结果。施塔姆普费尔编辑的《前进报》和考茨基同样都把这一学说当作“马克思主义思考”的成果来推荐，它在理论上归结为这一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现，即社会主义革命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本身的民族事务，也可以说内部事务。象考茨基这样的人当然懂得在虚无缥缈的抽象图式中十分详细地描绘资本的世界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把一切现代国家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机体。

俄国革命是国际发展和土地问题的结果，它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解决的。

在实践方面这一学说具有使国际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对俄国革命的命运的、否认这一革命的国际关联的倾向。战争和俄国革命的过程不是证明俄国不成熟，而是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对俄国革命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白无遗地揭示这一点。俄国革命的命运是完全取决于国际〔事件〕的。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的原则坚定性、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在最近十年的巨大跃进。1905—1907年的革命在欧洲仅仅引起微弱的反响。因此它始终只能停留在开始阶段。它的继续和解决是受欧洲的发展约束的。

显然，不加批判的辩解不能发掘出经验和教训的宝藏，只有详细的、深思熟虑的批判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而且这一试验是在可以想象出来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一场帝国主义国际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圈之中，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与此相反，根据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它的必要的历史前提的了解，人们不得不这样假定：在如此不幸的条件下，甚至依靠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现二者的软弱无力的、歪曲的开始阶段。

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义务正是要清楚地认识这一情况的全部深刻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因为只有根据这样一种痛苦的认识才

能衡量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命运承担的特殊责任的全部分量。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发挥其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意义，而这种国际行动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缺乏它，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哪怕具有最伟大的才能和作出最崇高的牺牲，也不可避免要陷入一片混乱的矛盾和失误。

同样不容怀疑的是，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荆棘丛生、陷阱遍地的道路上，仅仅是在内心十分疑惑并且思想上非常勉强的情况下采取许多决定性步骤的，他们自己决不可能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范例，对这种范例只应当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地模仿。

认为对俄国革命迄今走过的道路进行批判性检验就会严重地损害俄国无产阶级的威望和富有吸引力的榜样，而只有这一榜样才能克服德国群众致命的无所作为，这种担心同样是错误的。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行动能力的觉醒再也不能用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那种监护的办法，依靠对群众示意，依靠对某一毫无瑕疵的权威（无论是本国的“上级”还是“俄国的榜样”）的盲目信仰用魔法召唤出来。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行动能力是不能凭制造欢呼革命的气氛而产生的，而是相反，只有通过了解任务的全部惊人的严肃性和全部复杂性，依靠政治成熟和思想独立性，依靠群众几十年来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种种借口有计划地加以扼杀的批判的判断力才能产生出来。把俄国革命放在它的全部历史关系中进行批判的探讨，就是最好地训练德国和国际的工人去完成目前形势向他们提出的任务。

## 二

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孕育的革命力量同旧社会的桎梏进行的任何一次最初的伟大总决战的典型发展过程。

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

在1917年3月的最初时刻，领导革命的是“立宪党人”即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第一次全面高潮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卷进去了：第四届杜马是政变所产生的最反动的四级选举权的最反动产物，却突然转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机关。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右派民族主义者在内，突然组成了一个反对专制主义的严密阵营。专制主义在受到第一次冲击后几乎是不战而溃，就象一个已经死亡的机体一样，一碰就倒了。甚至自由资产阶级想至少挽救王朝和王位的短暂尝试也在几个小时内失败了。发展的进程迅猛异常，在几天和几小时之内就飞越了法国当时需要几十年才走完的距离。这证明，俄国已把欧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化为现实，尤其是证明，1917年的革命是1905—1907年的革命的直接继续，而不是德国“解放者”的礼物。1917年3月的运动在十年前的运动中断工作的地方同它直接连上了。民主共和国同革命的第一次袭击一样，都是准备好了的、内部成熟的产物。

但是现在比较困难的第二项任务开始了。革命的动力从最初时刻起就是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但他们的要求并不仅满足于政治民主制，而是指向迫切的国际政治问题：立即实现和平。与此同

时，革命还依靠同样提出立即实现和平这一要求的士兵群众和把1905年以来就已成为革命关键的土地问题提到首位的农民群众。立即实现和平和得到土地——在这两个目标上，革命阵营的内部分裂是确定无疑的了。立即实现和平的要求同以米留可夫为代言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发生了非常尖锐的矛盾；土地问题起初是让资产阶级的另一翼即土地贵族害怕的妖怪，但立刻就由于侵犯了整个神圣的私有制而成为使各资产阶级恼恨的问题了。

这样就在革命最初胜利的次日，在革命队伍内部，围绕和平和土地这两个尖锐问题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自由资产阶级开始采用拖延和逃避的策略。工人群众、军队、农民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了。毫无疑问，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制的命运本身也是同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各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一次风浪的冲击下也随着潮流前进直到接受了共和国政体，但很快就开始为向后退寻找支持并且悄悄组织反革命。卡列金的哥萨克部队向彼得堡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如果这次突击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不仅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而且民主制和共和国本身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建立军事专政以及对无产阶级实行恐怖统治，然后回到君主制，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俄国的考茨基派社会主义者即孟什维克所遵循的策略的空想性和反动本质了。

看到这个勤奋的人<sup>①</sup>在世界大战的四年间通过孜孜不倦的写作活动，泰然自若和有条不紊地在社会主义上捅出一个接一个的理论破洞，简直是令人吃惊的，这一工作的结果使社会主义成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筛子。考茨基的追随者不加批判地、平心静气地看

---

<sup>①</sup> 指考茨基。——德文版编者注

着他们的这位官方理论家勤勤恳恳地进行这项工作，把他的日新月异地发现吞咽下去，连眉毛都不皱一下，能与之相比的只有谢德曼之流的追随者，他们同样平心静气地看着谢德曼之流在实践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完满地互相补充的，而考茨基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从战争爆发以来实际上仅仅是在理论方面完成了谢德曼们在实践方面所做的事情：第一、国际，和平的工具；第二、裁军和国际联盟，民族主义；最后第三、民主制，而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死抱住捏造出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说法不放，认为目前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能进行社会革命，因而拚命坚持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也就是说坚持把由于革命发展自然的内在过程而陷于分裂和彼此发生极其尖锐矛盾的那些成分勉强结合在一起。阿克雪里罗得们，唐恩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同那些对革命及其第一个成就即民主制威胁最大的阶级和党派合作。

布尔什维克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作出了历史功绩，他们从一开始就宣布要实行那种唯一能挽救民主制和将革命向前推进的策略，并且坚定顽强地把这一策略贯彻到底。全部权力由工人和农民群众单独掌握，由苏维埃单独掌握——这实际上是使革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用挥剑斩断戈迪安之结的办法使革命走出窄胡同，为它提供不受阻碍地进一步展开的广阔战场。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唯一在那最初时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它是革命的向前推进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唯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

由此也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开始时是在四面八方受到排斥、毁谤和迫害的少数派，却在很短时期以后就能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并且把全部真正的人民群众即城市无产阶级、军队、农民以及民主派中的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左翼集合到自

己的旗帜下来。

俄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在几个月之后就归结为二者择一的问题：是反革命取得胜利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卡列金还是列宁。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在最初的狂热消逝之后立刻就会出现这样的客观形势，在俄国这是由关于和平和土地的具体的迫切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

在这一方面，俄国革命只不过证实了任何一次伟大革命的基本教训，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后面，并且被反革命扼杀。在革命中是没有静止状态的，不能原地踏步，不能满足于最初一度达到的目标而进行自我克制。谁想从议会的蛙鼠之战中把这种平庸的真理搬到革命策略上来，那只会证明，他对于革命的心理、革命的生存规律本身，正象对于全部历史经验一样，都是一窍不通的。

英国革命从1642年爆发以来的过程。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起初长老会派软弱动摇，长老会派的首领在反对保皇派军队的犹豫不决的战争中故意逃避决战和对查理一世的胜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独立派必须把他们从议会赶出去并且自己夺取政权。同样，在这以后，在独立派军队内部，士兵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里尔本的“平等派”形成了整个独立派运动的推动力。最后，士兵群众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表现为掘地派运动的走得最远的社会革命分子，他们又是民主的“平等派”的党内的酵母。

如果没有革命无产阶级分子对士兵群众施加思想影响，没有民主派士兵群众对独立派的资产阶级上层施加压力，那么长期议会既不会“清洗”长老会派，也不会胜利结束同保皇党和苏格兰人的战争，既不会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也不会废除贵族院和宣布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这里，经过四年斗争之后，雅各宾派的夺取政权表现为唯一能挽救革命成就、实现共和制、摧毁封建主义、对内和对外组织革命防御、镇压反革命阴谋、把革命浪潮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手段。

考茨基和他在俄国的思想伙伴（他们坚持俄国革命应当保持它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性质”）同上一世纪德国和英国的自由派一个模样，那些自由派把法国大革命区分为著名的两个时期：第一阶段即吉伦特派阶段的“好”革命和雅各宾政变以后的“坏”革命。自由派从自己的浅薄的历史观出发当然不需要去理解，如果“无法无天”的雅各宾派没有举行政变，那么连吉伦特派阶段最初取得的谨慎和不彻底的成就也会立刻被埋葬在革命的废墟之下；正象1793年的历史发展的铁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雅各宾专政的真正代替品不是“温和的”民主制，而是波旁家族的复辟！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由此可以说明，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由此可以说明俄国孟什维克即唐恩、策烈铁里等等所扮演的可悲的角色，他们起初对群众拥有巨大的影响，但在较长的东摇西摆之后，在竭尽全力反对接受政权和承担责任之后，他们可耻地被人们从舞台上扫除出去了。

列宁的党是唯一理解一个真正革命党的使命和职责的党，它通过提出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保证了革命向前的进程。

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解决了关于“人民的多数”那个著名问题，



这个问题从来就象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胸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痴呆症已经深入骨髓，它简单地把议会育儿室的平庸真理搬到革命中来，认为人们必须先取得多数，才能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在革命中也是：我们先要争取“多数”。但是革命的真正的辩证法却把这一鼠目寸光的议会真理颠倒过来了：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列宁和同志们在决定性时刻提出了唯一能向前推进的口号即全部权力归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受迫害、受毁谤的“非法的”少数（其领袖不得不象马拉那样藏在地窖里）成为形势的绝对主宰。

布尔什维克也立刻提出了完整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作为夺取政权的目標：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由此树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宣布为实际政治的当前纲领。

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 三

布尔什维克是英国平等派和法国雅各宾派的历史继承者。但是他们在俄国革命中取得政权后遇到的具体任务比他们的历史先驱者的任务要困难得多。<sup>①</sup>当然，为了达到摧毁大地产和使农民立刻依附革命政府这两个目的，由农民立即直接夺取和分配土地的

口号是最简短、最简单、最简练的公式。作为巩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府的政治措施，这是一个良好的策略。可惜它有两面，它的反面在于，由农民直接夺取土地几乎是同社会主义经营毫无共同之处的。

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土地关系来说要有两方面的前提。首先，大地产集中了技术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方法，因此恰恰只有对大地产实行国有化才能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的出发点。当然不需要剥夺小农的小块土地，可以让他从容不迫地决定，依靠社会经营的优越性争取他起初自愿地赞成组织合作社的方法，最后自愿地纳入社会的总经营，因此不言而喻，农村的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从大地产和中等地产开始。这一方面的经济改革首先必须把财产权交给民族，或者交给国家（这二者在社会主义政府说来是一回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按照互相关联的广阔的社会主义角度来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其次这一改造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消灭农业和工业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为两者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为按照统一的观点全面安排农业和工业生产创造条件。不管具体说来如何实际经营，是象有些人提议的那样由城市公社还是由国家中心经营，无论如何，前提是要有一次统一实行的、由中央开展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的前提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

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没有实行这一重大的改革——谁能为此责

---

① 卢森堡写在稿纸上方空白处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早在1905年。然后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农民！农民问题和国防。军队。”——德文版编者注

备它呢！要求或者期望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他们统治的短暂时期，在国内和国外斗争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状态中，在四面八方受到无数敌人和种种阻力的困扰的情况下，竟能解决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我们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最困难的任务），或者哪怕仅仅着手去解决这一任务，这可以说是开一个蹩脚的玩笑！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政权，那么我们即使在西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要在这个硬核桃上折断几颗牙齿，才能仅仅从这一巨大任务的上千个复杂的困难问题的最严重几个中摆脱出来！

但是一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如何必须做一件事：采取措施来促使后来对土地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那些基本前提得到实现，它至少必须避免做妨碍它采取这些措施的一切事情。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农民立刻占有和分配土地的口号恰好肯定会朝相反方向起作用。它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而且切断了通向这种措施的道路，它为按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土地关系制造了一大堆不可克服的困难。

由农民占有土地是按照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提出的简单扼要的口号办事的：去把土地拿过来！这种做法的结果简直是突然无秩序地把大地产转变成农民的地产。由此产生的不是社会财产，而是新的私有财产，而且是把大财产分散成中等财产和小财产，把比较进步的大经营分散成在技术上用法老时代的手段劳动的原始的小经营。还不止于此：通过这一措施以及实行这一措施的无秩序的、纯粹任意的方式，农村的财产差别并没有消灭，而只是加剧了。尽管布尔什维克要求农民组成农民委员会，以使用某种方式使占有贵族地产成为一次集体行动，但是显然这种一般的建议丝毫不能改变真正的实践和农村的真正力量对比。不管有没有委员会，

在任何一个俄国农村都实际上掌握着当地权力的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和高利贷者肯定成了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任何一个人无须思索就可以明白，分配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内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没有消除，而只有加深，那里的阶级矛盾激化了。但是这一权力转移肯定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没有好处的。

列宁的演说讲到必须实行工业的集中化，银行、贸易和工业的国有化。为什么不提土地国有化呢？在这一方面却相反，是实行分散化和私有制。

列宁自己在革命前提出的土地纲领却不是这样的。上述口号是从备受咒骂的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接过来的，或者正确些说，是从农民的自发运动接过来的。

为了在土地关系中采用社会主义原则，苏维埃政府现在企图从无产者——大部分是城市的没有工作的人——建立农业公社。但是很容易预测，如果用土地关系的全部规模来衡量，这一努力的成果一定始终会是微不足道的，在判断这一问题时根本无须加以考虑<sup>①</sup>。（在把大地产这一社会主义经营最合适的出发点分散成小经营之后，现在却试图从微弱的开端来建立共产主义模范经营了。）在现有情况下这些公社只能要求承认它们有试验的价值，而说不上是一次全面的社会改革。

从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最多遭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大地主这一个小小阶层以及极少数富裕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反抗，革命群众剥夺他们就象儿戏一样。现在，在“占有”以后，要对农业实行任何社会主义的社会化，遇到的敌人就是人数大大增加、力量大

---

<sup>①</sup>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谷物垄断加奖金。现在，在事后，他们打算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了。”——德文版编者注

大加强的有产农民群众了，他们将拚命保卫自己新获得的财产，反对一切社会主义的侵犯。现在，关于今后的农业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俄国整个生产的社会化的问题，已成为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问题。农民对城市实行抵制，不供给城市粮食，以便完全象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拿粮食来做投机买卖，这说明矛盾现在已经多么尖锐。法国的小农成了法国大革命最勇敢的保卫者，因为革命把没收来的流亡者的土地给了他们。他们作为拿破仑的士兵举着法国国旗走向胜利，走遍了整个欧洲，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摧毁了封建主义。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可能曾经指望他们的土地口号起与此相似的作用。但是俄国农民自行掌握了土地之后，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保卫俄国和把土地交给他们的革命。他们一心想着他们的新财产，听任革命受敌人攻击，国家瓦解，城市居民挨饿。

列宁的土地改革给农村的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抵抗比贵族大地主的抵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

军事上的失败转变成俄国的崩溃和瓦解，布尔什维克对此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且布尔什维克自己使这一客观的困难形势大大尖锐化了，他们把这样一个口号<sup>①</sup>提到他们政策的首要地位：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或者在这句话后面实际隐藏着的：俄国的国家分裂。这一用教条主义的顽强精神一再宣布的关于俄罗斯帝国各民族有权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直到同俄国实行国家分离”的公式，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反对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战争<sup>②</sup>时的一个特殊的战斗口号，它是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国内政策的轴心、

---

① 在原稿中“口号”为“政策”。——德文版编者注

② 指俄国临时政府决定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编者注

它是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整个纲领，是布尔什维克用来反对德帝国主义的强力地位的唯一武器。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顽固地和百折不挠地坚持这一口号，这种态度的令人吃惊之处首先在于，这一口号既同他们在其他政策上明确主张的集中主义截然相矛盾，也同他们对待其他民主主义原则的态度截然相矛盾。他们对于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集会自由、总之对于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基本自由的全部设施（这些基本自由加在一起构成了俄国本身的“白决权”）明显地采取十分冷漠的蔑视态度，却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民主主义政策的珍宝，为了它，一切现实批判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都必须停止发表。俄国选举立宪会议的人民投票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权并且在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举行的一次人民投票，他们对它却毫无敬佩之念，并且根据十分冷静的批判性的考虑，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但是他们在布列斯特却为俄国的异民族就自己的国籍举行“人民投票”而斗争，把这当作任何一种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保证，人民意志的货真价实的精髓，决定各民族政治命运问题的最高准则。

这里暴露出来的矛盾由于以下的原因就更加不可理解了：正如我们在下面还要进一步看到的，在任何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而著名的“民族自决权”却无非是空洞的小资产阶级废话和胡说。

实际上，这一权利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社会主义政策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正如它反对任何一种压迫一样，这是对社会主义政策的起码知识。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一向是冷静的和抱批判态度的政治家，他们对于任何一种空想主义的废话如裁军、国际联盟

等等都只是耸一下肩膀表示讽刺。尽管如此，他们这次却恰恰把一个完全属于这一类型的空洞词句当作自己的得意杰作，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随机应变的政策产生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是考虑到，除了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给予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许多非俄罗斯民族以极端不受限制的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更加可靠的手段可以使它们支持革命的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这同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农民的政策相类似，直接占有贵族土地的口号应当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使他们拥护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旗帜。可惜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打算都完全落空了。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指望，他们作为“直到实行国家分离”的民族自由的拥护者，将会使芬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等等统统成为俄国革命的忠实同盟者，但我们看到的场景却相反：这些“民族”一个接一个地利用刚刚赠送给他们的自由，作为俄国革命的死敌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并且在德帝国主义的保护下把反革命的旗帜打到俄国本土来了。在这方面，在布列斯特发生的与乌克兰冲突的插曲是一个范例。它使那次谈判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也使布尔什维克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整个局面发生了决定性转折。芬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各民族的行动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决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外，而是一个典型的现象。

当然，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实际上不是“各民族”实行了这一反动政策，而仅仅是同本民族无产阶级群众处于极其尖锐矛盾之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民族自决权”歪曲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阶级政策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这就正好涉及到问题的症结了——这一民族主义词句的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恰恰就在于，它在阶级社会的残酷现实中，尤其是在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时期，干脆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手段。布尔什维克应当在他

们自己和革命吃了大亏以后接受这一教训：恰恰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任何“民族”自决权，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的每一个阶级都力求按不同的方式“实行自决”，对于各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自由的观点已完全退居阶级统治的观点之后。芬兰的资产阶级同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宁可要德国的暴力统治，而不要民族自由。

希望通过一次“人民投票”（布列斯特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使这一现实的阶级关系转化成它的反面并且依靠革命的人民群众取得赞成加入俄国革命的多数票，这是不可理解的乐观主义，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是认真地这样想的话。如果只是想把这当作同德国暴力政策进行决斗时的策略花招，那会是危险的玩火。即使没有德国的军事占领，如果在边疆各国举行这样的“人民投票”，那么由于农民群众和广大的还漠不关心的无产者阶层的精冲状态，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以及资产阶级的上千种对投票施加影响的手段，完全有可能到处都得到一种会使布尔什维克很不愉快的结果。在这种就民族问题进行人民投票的事情上可以说有一个无法违反的规律：或者是这种投票不合统治阶级的胃口，他们就能加以阻止；或者是他们能够用一切大大小小的手段影响选举的结果，这样也就会使我们不能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

居然把民族意向和分离倾向的问题拿到革命斗争中来，甚至通过布列斯特的和平把这一问题放到突出的地位，并且简直赋予它以社会主义政策和革命政策的识别标志的特征，这种做法已在社会主义队伍中引起极大的混乱，并且恰恰动摇了边疆各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在芬兰，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还是作为团结一致的俄国革命阵营的一部分进行斗争时，它已经获得了支配性的实力



地位；它已在议会中，在军队中占多数，它已使资产阶级陷于完全无力的状态，并且控制了本国的局面。俄罗斯乌克兰在本世纪初年，当“乌克兰民族主义”关于卡尔鲍瓦涅茨<sup>①</sup>和“乌尼维尔萨尔”<sup>②</sup>的蠢事以及列宁关于“独立的乌克兰”的得意杰作还没有发明的时候，曾经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堡垒。早在1902年到1904年间，革命的第一批熔岩之流就是从那里，从罗斯托夫，从敖德萨，从顿涅茨地区倾泻出来，使整个俄国局部燃烧起来成为一片火海，从而为1905年革命的爆发作了准备，这种情况在日前的革命中再次出现，南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部队的精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1905年以来是最强大、最可靠的革命策源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那里起了支配作用。

那么反革命怎么会突然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取得了胜利呢？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脱离了俄国，正因如此它使无产阶级陷于瘫痪并且听任边疆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摆布。布尔什维克不是恰恰按照他们一向捍卫的纯粹国际的阶级政策的精神力图把俄国所有地区的革命力量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竭尽全力维护俄罗斯帝国作为革命地区的完整性，把俄国革命范围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一体性和不可分离性当作至高无上的政策原则来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的分离意图，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通过“民族自决权直至实行国家分离”这一大叫大嚷的民族主义废话，给一切边疆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简直就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提供了旗帜。布尔什维克不去警告边疆各国的无产者提防陷入任何一种分离主义的纯粹资产阶级陷阱，不是在分离主义意向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用铁腕扼杀它（在这一事例上使用铁腕确实是符

---

① 乌克兰人对卢布的称呼。——编者注

② 1917年乌克兰反革命政权“中央会议”的宣言。——编者注

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精神的)，反而用自己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

当然，如果没有德帝国主义的帮助，没有象考茨基的《新时代》所说的那种“德国人手中掌握的德国枪托”，乌克兰的卢宾斯基们和其他恶棍，芬兰的埃里希们和曼纳海姆们，以及波罗的海的男爵们永远对付不了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无产者群众。但是民族分离主义是把手上拿着刺刀的德国“同志们”带进所有那些国家的特洛伊木马。现实的阶级矛盾和军事力量对比招致了德国的干涉。但是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为这一反革命进军进行伪装的思想，他们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地位。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俄国革命的命运中起了如此致命作用的乌克兰。在俄国，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同捷克的、波兰的或芬兰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无非是几十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纯粹的糊涂事和傻念头，在本国的经济、政治或精神条件中没有一点基础，没有任何历史的传统，因为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国家，除了舍夫琴柯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诗歌外没有任何民族文化。这简直就象是沿海地区的人在随便哪一天早上想按照弗里茨·罗伊特<sup>①</sup>的说法建立一个新的低地德意志民族和一个独立国家一样！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用他们关于“民族自决权直到”等等的教条主义宣传把不多几个大学教授和大学学生的这一可笑的滑稽剧人为地夸大成一个政治因素。他们却赋予起初的滑稽剧，以某种重要意义，一直到这一滑稽剧成为十分认真的事情：并不是成为一个认真

---

<sup>①</sup> 弗里茨·罗伊特（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写作。  
——编者注

的民族运动，因为这种运动过去和今后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而是成为反革命的招牌和集合旗帜！德国的刺刀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孵化出来的。

词句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有时是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被选定来为反革命政策提供思想遁词，这是社会主义的不祥的命运。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时迫不及待地从马克思主义堆放废物的屋子里找出一副思想盾牌，把德帝国主义的掠夺进军打扮起来，他们宣称这次进军是我们的老导师们在1848年就已经憧憬的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解放者远征。政府派社会党人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却被注定用“民族自决”的词句给反革命的磨盘注水，从而不仅为扼杀俄国革命本身，而且为计划中的用反革命方式结束整个世界大战提供了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有一切理由从这一方面十分彻底地考察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民族自决权”同威尔逊恩赐的国际联盟和裁军加在一起，成了一个战斗口号，即将发生的国际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世界的清算就将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显然，关于民族自决的词句和目前成为对国际社会主义最大威胁的整个民族运动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谈判而特别加强了。我们还必须详细地探讨这一纲领。这一套词句在俄国革命中的悲剧性遭遇（俄国革命会陷在它的毒刺之中，被扎伤流血）应当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鉴戒。

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德国的专政。从布列斯特的和平到“补充条约”！莫斯科的二百名牺牲者！从这一局面产生了恐怖和扼杀民主。

#### 四

我们打算根据几个例子作进一步的考察。

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一措施对于他们后来的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策略的转折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这是事实。托洛茨基甚至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中说，十月革命简直是“对立宪会议的挽救”，正象它挽救了整个革命一样。他继续说：“我们说，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不是经过策烈铁里的预备议会，而是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我们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在作了这些公开的声明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一会议的入口的。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到的著作里详细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打算在这里引用他的论据：<sup>①</sup>

〔“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是群众向左转、工人、士兵和居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而这一过程在社会革命党内部表现为左翼通过削弱右翼得到加强。但是在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名单上，老的右翼党员的名字仍旧占四分之三。……”

还有这一情况，即选举本身是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内举行的。关于已经发生的变化的消息比较缓慢地象同心圆那样一层层传播开去，从首都传到外省，从城市传到乡村。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对彼得堡和莫斯科发生的情况很不了解。他们投票支持

---

<sup>①</sup> 据《卢森堡全集》第4卷原编者注，原稿中缺这一论据，也没有说明是托洛茨基那一篇著作。但从上下文看来，卢森堡仍是指《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因此1963年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的《俄国革命》单行本在这里补上了该书中的一段话，即下面方括号中的引文。——编者注

‘土地和自由’，并且投票支持它在土地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站在‘民粹派’旗帜之下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是投票支持了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而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却解散了这一土地委员会并逮捕了委员们。……这一情况使人对立宪会议已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党派组合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人们一定会奇怪，象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从上述事实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决定性转折点即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已逃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就自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正是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已经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他们不想也不应当把革命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反映了昨天的克伦斯基的俄国、反映了动摇和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的会议。那么好吧，只剩下一件事了，立即召开一个从已经更新、已经前进的俄国产生的会议来代替它。

托洛茨基不是这样做，而是根据十月间召集的立宪会议这一特殊的有缺陷的情况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从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一发展。”（托洛茨基上引书，第93页）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一般的民主机构的机制”这种说法了。针对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强调，这种对代议机构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一切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恰恰是

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任何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永远只反映它的选民正好在他们走向票箱的那一时刻的精神状态、政治成熟程度和情绪。因此民主机构总是选举日的群众的映象，正如赫歇尔<sup>①</sup>星空图所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那个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二者之间的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这同全部历史经验有多大的矛盾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为什么每当工厂、车间和大街上发出喧嚷声时，连最干枯的木乃伊有时也象年青人一样行动起来，而形形色色的小谢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脯里找到革命的声音呢？

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性对当选的机构施加的这种始终生机勃勃的影响难道恰恰会在一次革命中，由于党派标志和竞选名单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效力吗？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其极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一切革命的最初阶段的那些著名的、动人心魄的场面恰恰总是以此为基础的，那时，老的反动的或极端温和的、在旧制度下根据有限的选举权选出的议会突然成了革命的英勇代言人，成了冲锋陷阵的人。著名的英国“长期议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642年被选出和召集，坚守岗位达七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1738—1822）——德国天文学家。——编者注

年之久，在它的内部，人民情绪、政治成熟性、阶级分裂的一切变动以及直到顶峰的革命进程中的一切变动，从最初在一个跪着的“代言人”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同国王进行小规模冲突直到取消贵族院、处死查理和宣布共和国为止，都得到了反映。

难道在法国的三级会议里，在路易·菲力浦的按纳税额选举的国会里，在第四届俄国杜马里，没有重复这种同样令人惊奇的变化吗？最后这个最惊人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十分清楚的，第四届杜马是在1912年<sup>①</sup>的恢复年代、在最严酷的反革命统治下选出的，1917年2月它突然象晚年的恋爱一样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并且成了革命的出发点。

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尽管有死板的党的标志，过时的候选名单等等。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让我们再举一个惊人的例子，即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这一选举权具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不十分清楚。从托洛茨基和列宁对民主机构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那么究竟为什么又要规定普选权，这的确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这一选举权曾经以某种方式实行过；人们对于根据它而选出某种人民代表机构的事毫

---

<sup>①</sup> 原稿中为1909年，——德文版编者注

无所闻。有人推测它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产物，可以说是纸上谈兵，这倒是更有可能的；但是就它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理论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产物。对于任何一种选举权，正象一般说来对于任何一种政治权利一样，不应当按照某种抽象的“正义性”公式或者类似的资产阶级民主废话的公式来衡量，而是应当按照它所适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来衡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正是针对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一专政所作的解释的精神，只给予那些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而拒绝给予一切其他的人。

显然，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在一个经济上也有能力使一切愿意劳动的人可以依靠自己劳动获得充裕的、文明的生活的社会里才有意义。日前的俄国说得上这样吗？苏维埃俄国必须与世界经济隔绝、最重要的原料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它的经济生活普遍遭到惊人的破坏，生产关系由于在农业、工业以及商业中改变财产关系而发生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有无数的人非常突然地被赶出家园，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常轨，客观上没有任何可能在经济机构中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这不仅涉及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且也涉及小的中间等级这一广大阶层和工人阶级本身。工业的紧缩引起城市无产阶级大批流向农村，到农业中寻找栖身之处，这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就其倾向来说，它本应当只使剥削者丧失政治权利。当能生产的劳动力大批离乡背井之时，苏维埃政府反而屡次认为必须用所谓租让的办法把国有工业交给从前的资本家所有主。同样，1918年4月苏维埃政府也认为必须同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实行妥协。后来又表明，利用资产阶级专门人才是无法避免



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无产阶级中愈来愈多的阶层作为赤卫队等等由国家用公费养活。这实际上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广大的并且愈来愈多的阶层丧失权利，对于这些人，经济机构是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他们履行劳动义务的。

把选举权描述为一种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产物，这是荒谬的。正因如此，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认真的工具。<sup>①</sup>

整个中间等级、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抵制苏维埃政府达几个月之久，使铁路交通、邮政电讯、学校和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工人政府，这时不言而喻不得不采取一切镇压措施如剥夺政治权利、不发经济生活资料等等来反对他们，用铁拳来粉碎他们的抵抗。正是在这时社会主义的专政得到了表现，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不怕使用任何威力来强制实行或阻止某些措施。与此相反，如果用一种选举权宣布普遍剥夺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社会之外，而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在这一社会本身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位置，而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并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普遍的规定持久发生影响的，那么这就不是专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sup>②</sup>

但是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我们还要考察取

---

① 卢森堡写在稿纸右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一种时代错误，提早实行一种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完成时才合适，而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却不合适的法律状态。”——德文版编者注

② 卢森堡写在稿纸右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作为支柱的苏维埃以及立宪会议和普选权”。在未注号码的散页上写的笔记：“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说成是反动的，因为农民（农民代表和士兵代表）在它们中间占多数，在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以后，它们就成了人民意见的正确代表者了。但是这一突然的转变仅仅同和平与土地问题有关。”——德文版编者注

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这一问题：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要为这一侵犯自由和权利的行为辩护，上述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笨重性的论据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托洛茨基在这里自相矛盾并且同他的党内同志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矛盾。正因为这句话说得对，所以他们压制公共生活就是堵塞了政治经验的源泉，阻碍了向上的发展。否则人们就只好假定，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前，经验和发展是必需的，并且已达到了顶点，在那以后就成为多余的了。（列宁的演说：俄国已被说服，相信社会主义了!!!）

实际情况相反！布尔什维克大胆而坚决地去迎接的巨大任务恰恰要求对群众进行最深入的政治训练和积累经验。<sup>①</sup>

---

①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德文版编者注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专政理论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事，只需要努力去实现就行了<sup>①</sup>。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这要看情况而定——事情并非如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纲领里所有的只不过几条大的方针，它们指明应当按照什么方向寻找措施，而且这些方针主要是消极性质的。因此我们大致知道，为了给社会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我们必须首先取消什么；与此相反，为了把社会主义原则运用于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而在每一步骤上必须采取的上千项大大小小的具体的实际措施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并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党纲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加以说明。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同有机自然界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

---

<sup>①</sup> 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自己也不打算否认他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摸索、尝试、实验，朝各个方向试验，他们的措施很大一部分并不高明。如果我们着手去干，我们大家也都会并且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尽管条件可能不是到处都那么困难。”——德文版编者注

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的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1905年和1917年2—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见《通报》第36期<sup>①</sup>）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象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sup>②</sup>只不过他采取的手

---

① 卢森堡在原稿中误写为第29期。《俄国革命以后》一文发表在1918年12月8日的《柏林及郊区社会民主党选民协会联合会通报》第36期上。它详细转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内容，一部分是逐字译出的——德文版编者注

② 卢森堡写在散页上的笔记，未说明插入何处：“列宁关于纪律和腐化的演说：

在我们这里以及在所有的地方无政府状态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同它是不可分离的：

证据：

一、东普鲁士，‘哥萨克人’的劫掠。

二、德国普遍发生抢劫和盗窃（‘黑市交易’，邮政和铁路人员，警察，秩序井然的社会同苦役监狱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

三、证据：工会领导人迅速堕落。对此，严酷的恐怖措施无能为力。相反，他们还进一步腐化。唯一的解毒剂：理想主义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写在散页上的论述，未说明插入何处：“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同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一个本身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在德国和所有的地方也将遇到这一问题。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深深地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不仅作为特殊的阶层，作为在社会制度的墙倒塌时特别大量增长的社会废物，而是作

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

---

为整个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德国（一切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事件进程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阶层是多么容易堕落为游民。商人的投机倒把，波兰小贵族的黑市交易，空头买卖，食品掺假，诈骗，官吏贪污，盗窃，破门盗窃和抢劫等等之间的层次差别已经消融，因此可尊敬的市民同苦役监狱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当资产阶级的精华在海外殖民的条件下被移植到外国的社会基础上时通常要迅速堕落，这一现象在这里又重复出现了。随着道德和法律的因袭的界限和支柱被废弃，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地不受阻拦地干脆堕落了，因为它的最本质的生存规律就是极度的不道德：人对人的剥削。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得不到处同它的这一敌人、同反革命的这一工具进行搏斗。

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恐怖也是一把钝剑，甚至是双刃的剑。严酷的战地司法对于流氓无产阶级骚乱的爆发是无能为力的。不错，任何持久处于攻城状态的联队都不可抗拒地会趋向专横独断，而任何一种专横独断都会对社会起腐蚀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手中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

正象太阳光线的自由发挥作用对于疾病传染和病原菌是最有效的净化和治疗手段一样，革命本身及其革新的原则，由革命唤起的群众的精神生活、积极性和自我负责态度，从而也就是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唯一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太阳。”——德文版编者注

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专政还是民主”既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考茨基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它永远不能按照考茨基的善意劝告，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他们这样做就不可能不是背叛自己，背叛国际，背叛革命。他们恰恰应当并且必须立即劲头十足地、不屈不挠地、毫无顾虑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也就是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sup>①</sup>当然，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难道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如果社会主义、马

---

<sup>①</sup> 《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93页。——德文版编者注

克思主义使我们感到不方便，我们也可以象库诺-连施-帕尔乌斯那样把它扔进废物间吗？托洛茨基和列宁是这一问题的活的否定回答。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这不过是说：我们始终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内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区别开来，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权，以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可以说明这一观点的明显论据是：苏维埃政府如此大量使用

恐怖手段，特别是在德帝国主义崩溃前的最后时期，在暗杀德国大使事件发生以来这样做。革命不是用玫瑰香水施洗的老生常谈本身就是相当贫乏的。

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链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最后促成它的事情是：德国无产阶级不起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占领。如果还打算期待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成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地给自己造成损害，把自己真正的、无可反驳的历史功绩掩盖在被迫犯下的过失之下，同样，当他们打算把在俄国由于困难和压力而造成的一切谬误统统当作新的认识搬进国际社会主义的武器库时，他们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曾为国际社会主义进行过斗争和受过苦）帮了倒忙，因为那些谬误归根到底只是国际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破产的后果。

德国的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尽管可以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幅讽刺画。如果它曾经是这样或者现在是这样，那公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的一个产物，这一态度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讽刺画。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因为在一个孤



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区别开来。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的决战，在这一最后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问题（而且这简直就是迫切的当前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日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sup>①</sup>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

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和持久性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始终有着这样的不朽的历史功绩：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

1922年于柏林出版。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  
德文版第4卷第332—365页。

（殷叙彝译）

---

<sup>①</sup>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德国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3年骑上起义的参加者。——编者注

# 俄国的悲剧\*

(1918年9月)

自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来，俄国革命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布尔什维克在那时遵循的政策是一目了然的：要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争取短暂的喘息，在此期间在俄国发展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尽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革，并耐心等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同时通过俄国的榜样加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由于俄国的人民群众极端厌战和沙皇政府遗留下的军队的瓦解，继续战争看来不外是使俄国无谓地流血，所以，除了迅速缔结和约，反正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这是列宁和一些同志的打算。

这个打算的依据是两个纯粹革命的观点：坚定地相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大战唯一的出路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样坚定地决心要竭尽全力捍卫在俄国已经获得的政权，利用它来进行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变革。

---

\* 此文未署名。（原载 战争期间的斯巴达克。大战期间斯巴达克联盟的秘密传单），恩斯特·迈耶尔收集并作序，1927年柏林德文版）（斯巴达克）编辑部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如下说明：“本文说出了我们的人中间时常存在的那些忧虑。这些忧虑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客观情况、不是由它的主观态度引起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主要着眼于它的结论：没有德国革命，就无法拯救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就没有希望。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这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起义”。——德文版编者注

然而，这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厢情愿的打算，没有考虑到俄国由于单独媾和就使自己无条件地听任德国军国主义摆布了。事实上，布列斯特和约不过是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投降。当然，列宁和他的战友们谈到事实时既没有欺骗自己也没有欺骗别人。他们直率地承认是投降。他们希望能够以投降为代价换取真正的短暂的喘息，希望通过单独媾和能把自己从世界大战的烈火中真正拯救出来，可惜他们在这一点上受骗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将意味着大大加强帝国主义的泛德意志的政策，从而恰好减少了在德国举行革命起义的机会，它不会使对德战争结束，反而是这次战争的新篇章的开始。

事实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是一种幻想。俄国和德国之间未曾有过片刻的和平。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今天，战争一直在继续，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单方面进行的战争：德国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前进，布尔什维克默不作声地一步一步后退。占领乌克兰，芬兰，里夫兰，爱沙尼亚，克里米亚，高加索，越来越多的南俄地区，这是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以来的“和平状态”的后果。

首先，这意味着在俄国所有的革命堡垒中，革命被扼杀了，反革命胜利了。因为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高加索，黑海区域——这全都是俄国，也就是俄国革命的地区，不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小资产阶级空话会怎样喋喋不休地反对这种说法。

其次，这也意味着把革命地区的大俄罗斯部分同拥有粮食、煤炭、矿藏和石油的地区的联系割断了，也就是把它同革命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的联系割断了。

第三，怂恿和加强俄国内部所有的反革命分子起来激烈地反抗布尔什维克及其措施。

第四，德国对俄国同它自己的所有边远地区——芬兰，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以及同它的邻国罗马尼亚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起仲裁作用。

德国在俄国不受限制地发号施令和为所欲为的总的后果，自然大大加强了德国帝国主义对内对外的地位，从而不言而喻地把协约国的激烈反抗和战争欲望推向白热化，也就是延长和加剧了世界大战。不仅如此：面对德国得寸进尺的侵占，俄国明显地不加抵抗，这自然也一定会引诱协约国和日本在俄国的领土上采取对抗行动，以便抵销德国的巨大优势，使这个防卫薄弱的大国也同样满足它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贪欲。现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北部和东部以及整个西伯利亚都被割离，布尔什维克同最后的生命源泉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样，布列斯特和约的最后结局就是俄国革命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粮食断绝，濒于死地。

但是，就是在内地，在德国剩给布尔什维克的地区，革命的统治和政策也必然被逼上邪路。暗杀米尔巴赫和艾希霍恩<sup>①</sup>是对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暴政的可以理解的回答。当然，社会民主党从来谴责个人的恐怖行动，但不是因为它宁愿消极地容忍反动的暴力统治，只是因为它认为同恐怖行动相比，群众斗争是更加有效的手段。说这些暗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受协约国挑动或委托进行的，这自然只是沃尔弗的半官方的通讯社<sup>②</sup>的一种捏造。这次暗杀如果不是群众起义反对德国统治的信号，就只能是由于对德国

---

① 1918年7月6日，德国大使威廉·冯·米尔巴赫-哈尔弗伯爵在莫斯科，1918年7月30日，驻乌克兰德军总司令海尔曼·冯·艾希霍恩大元帅在基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编者注

② 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半官方通讯社，1849年由伯恩哈特·沃尔弗（1811—1879）在柏林创建。——编者注

血腥统治的绝望和仇恨，是在一时冲动下采取的报复行为。不管暗杀的意图是什么，它已给俄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威胁，也就是在迄今统治着的社会主义集团内部造成分裂。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即在革命队伍的两翼之间造成了深渊和深仇大恨。

当然，社会差别、有产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其他等等迟早也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和。但是直到暗杀米尔巴赫时为止，事态似乎还未发展到这种地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这无论如何是事实。没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十月革命（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驱散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迄今进行的改革恐怕几乎是不可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它的后续影响才第一次在两翼之间打进了楔子。德国帝国主义日前在布尔什维克及其昨日的革命同盟者之间的关系中以仲裁者身分出现，就象它在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边远省份及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充当仲裁者一样。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明显的：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和改革工作的本来就很强的反抗进一步加强了，布尔什维克赖以建立统治的基础大大缩小了。革命本身的不同类型的人的这种内部意见分歧和分裂多半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次向上发展的革命在不断激进化时都不可避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实际上是围绕着德国军人对俄国革命的统治出现了意见分歧。德国帝国主义是扎进俄国革命机体的一根刺。

然而危险还不止于此！世界大战的铁圈曾在东方被突破，现在又把俄国和世界团团包围住了。协约国同捷克人和日本人一起从北方和东方向前推进，这是德国从西方和南方挺进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世界大战的火焰已蔓延到俄国的土地上并且将在最近的瞬间吞没俄国革命。归根到底已经表明，俄国要想单独摆

脱世界大战，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为代价，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威胁着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的同盟，它将作为布尔什维克所走的艰险道路的终点站，象一个使人恐惧的怪影一样逼近！当然，这会是世界战争套在俄国革命脖子上的致命的锁链，即首先退却、接着投降、最后同德国帝国主义结成同盟这一过程的最后一环。因此，俄国革命只会被它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要避免的世界大战抛到相反的一端，即从沙皇统治下站在协约国一边转到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站在德国一边。

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个姿态是拒绝在法、英帝国主义招募来的军队中充当扈从，这使它留下了一个好名声。但是，从国际形势看来，为德国帝国主义服兵役还要坏得多。

据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俄国在日本和德国的占领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它将会选中后者，因为德国进行革命比日本要成熟得多。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是很牵强的。要知道，问题不仅在于德国的对手日本，而且也涉及英国和法国——关于它们，今天谁也说不清它们的内部情况是否比德国的情况更加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但是德国发生一次革命的希望和可能性恰恰由于德国军国主义任何一次得到加强和任何一次取得胜利而被堵死了，就这一点来说，托洛茨基的推理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其次，除了这些所谓的现实观点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些完全不同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帝国主义的结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说来，会是它可能受到的最可怕的道义上的打击。俄国是唯一的、最后的一个角落，那里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精神财富还受到重视，德国的以及整个欧洲的所有诚实的社会主义者都注视着那里，以便从西欧工人运动实践所引起的厌恶心情中

恢复过来，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对精神事业和神圣语言的信念来武装自己。随着列宁和兴登堡荒唐的“结合”，东方的道德光源就会消失。明摆着的是，德国独裁者用手枪威逼苏维埃政府并利用它的绝望处境迫使它接受这一骇人听闻的联盟。但是，我们希望，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将决不让步，他们面对这种无理要求将斩钉截铁地喊出：到此为止，再不多给！

社会主义革命依赖德国的刺刀，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这也许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骇人听闻的事了。而且这是纯粹的空想。且不说布尔什维克在本国的道德声誉可能被毁掉，他们也会丧失国内政策上的任何行动自由和任何独立性，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舞台上完全消失。长时间以来，每个孩子都看到，德国不过在犹豫并窥测时机，以便同米留可夫们，同随便哪一些头目们以及天知道什么神秘的大人物和傀儡一同来结束布尔什维克的良辰美景，并且在列宁和同志们象乌克兰人、柳宾斯基之流一样演完特洛伊木马的角色之后将他们本人绞死。

到那时，迄今所有的牺牲，布列斯特和约的巨大牺牲就会纯粹是白费，因为它的代价最终可能是道义上的破产。布尔什维克在反对优势敌人和不利的历史形势的诚实斗争中任何一次政治上的失败都会比这种道义上的失败要好。

布尔什维克确实在政策上犯过各种错误，也许他们目前还在犯，——请谁给我们举出一次没有犯过错误的革命吧！关于没有错误的革命政策的观念，何况是处在这种完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是如此荒唐，它只配出自德国的教师之口。如果处于非常局势之下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所谓领导人在一次简单的议会表决面前就已丧失了所谓的清醒头脑，如果他们在单凭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就可以清楚地看清道路的地方就已经心惊胆战，并且把整个社会主义就象一堂学得很坏的课程一样忘记掉——那怎么能希望一个真正

处在困难重重和史无前例的历史形势下的党（它打算在这种形势下向世界指出崭新的道路）不犯错误呢？

然而，布尔什维克目前的险恶处境连同他们的大多数错误本身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使他们面临的那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后果。在单独一个受到顽固的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包围的、受到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包围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必然要在这项任务上失败和垮台，不论它是以胜利的意志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是以自动弃权的态度来指导它的政策。

我们倒要看看那些优柔寡断的、好吵闹的人，那些阿克雪里罗得，唐恩，格里哥里维茨以及随便叫什么的人，他们现在唾沫四溅地咒骂布尔什维克，在国外到处抱怨他们的不幸，看呀！他们得到了象施特勒贝尔、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这类英雄的同情；我们倒想看看那些德国人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会怎么样！他们全部的自负当然只会归结为在国内与米留可夫们联盟，对外与协约国结盟，还要加上在国内有意识地放弃全部社会主义的改革或者放弃哪怕只是走向这种改革的初步，根据就是这个著名的经过阉割的真理——俄国是个农业国，在资本主义方面还不成熟。

今天在俄国掌握政权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作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一个部分还被这支大军的主力部队撇在一边，它就一定会遵循一种错误的策略，这正是客观形势的错误逻辑。

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归根到底要由国际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尤其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空前顽固的卑劣行径。这个党在和平时期装出带领世界无产阶级前进的样子，妄图教训并领导整个世界，它在本国至少有一千万男女支持者，然而四年以来，它象



卖身投靠的中世纪雇佣军一样，听从统治阶级的命令，一天二十四次地把社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来自俄国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处境向德国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残剩的最后一点荣誉感发出了动人心弦的呼吁。他们无动于衷地听任俄国革命被打得四分五裂，受到包围，断粮饿死。但愿他们至少在最后关头挽救俄国革命，使它避免最可怕的事件——道义上的自杀，即与德国帝国主义结盟。

解救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后方举行起义，在德国举行群众起义，作为以国际革命结束民族残杀的信号。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拯救俄国革命的荣誉同拯救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是一回事。

发表于1918年9月第11号《斯巴达克书信》。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  
385—392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开 端

(1918年11月18日)

革命已经开始。合适的不是欢呼所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是庆祝打倒敌人的胜利，而是最严厉的自我批评和钢铁般的齐心协力以继续进行业已开创的事业。因为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而敌人并没有被打倒。

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君主政体一扫而光，最高政权转到了工人和士兵代表的手中。但是，君主政体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敌人，它仅仅只是外表，是帝国主义打出的幌子。不是霍亨索伦王室发动了世界大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燃起战火并把德国引向深渊。君主政体如同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一样，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这才是必须对屠杀各国人民负责的罪魁祸首。

当前这场革命的历史性课题是取消资本统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大事。一项宏伟的事业，它不是在瞬息之间靠自上而下的几道法令去完成的，它只能通过劳动群众自己的有觉悟行动，在城市和农村实现，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极其高度的思想成熟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主义精神，才能穿过一场场暴风雨，顺利地达到目的。

革命的日标指明革命的道路，任务决定方法。把整个政权交给劳动群众掌握，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捍卫革命事业，使它

不受潜藏着的敌人的破坏。这就是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的准绳。

政府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象罗盘一样指向这个方向：

扩大和重选地方工人士兵委员会，以便通过对革命的目的、任务和道路的自觉认识的觉悟过程，克服委员会产生时所表现的最初的混乱和冲动；

经常召开这些群众代表机构的议会，把真正的政治权力从执行委员会的小委员会手中转移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更为广泛的基础上；

尽快召开工人和士兵的全国议会，以把整个德国的无产者组成阶级、组成坚实的政治势力，作为防卫队和突击力量支持革命事业。

立即把农村的无产者和小农（而不是“农民”），组织起来，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至今仍站在革命行列之外；

组建一支常备的保卫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赤卫队，并成立工人人民军，使整个无产阶级成为时刻警惕着的卫士。

将已被接管的专制主义军事警察国家的机构，从行政、司法和军队中排除出去。

立即没收王室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大地主的土地，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临时性初步措施，因为饥饿是反革命的最危险的同盟军；

立即在德国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清楚明确地指出这次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性质，因为德国革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国际、寄托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我们仅只列举了最初的、最为必要的步骤，而现在的革命政府在干什么呢？

它让国家作为行政管理机器，从上到下安稳地继续操纵在霍

亨索伦专制主义昨天的支柱、反革命明天的工具手中；

它召开立宪国民会议，以此作为资产阶级代表机构与工人和士兵代表机构相抗衡，从而把这次革命推上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篡改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

它没有为摧毁依然存在着的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权力做一丝一毫的努力；

它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抚资产阶级，宣布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证资本关系不容触犯；

它对到处都在活动的反革命听之任之，不加干涉，没有号召群众，没有对人民大声警告。

平静！秩序！秩序！平静！这是从四面八方，从所有的政府公告上传来的声音，而从所有的资产阶级阵营则欢欣鼓舞地发出回声。对“无政府主义”幽灵的高声咒骂，人们熟悉的资产阶级为钱柜、财产和利润而担忧的地狱曲，是这个日子最强的音符；而革命的工人和士兵政府却心平气和地容忍这一对社会主义发起猛攻的总进军，它甚至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加入这一总进军。

这次革命的第一星期的结果是：在霍亨索伦王室的国家里，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工人和士兵的政府充当已经垮台的帝国主义政府的代理人。它的所作所为都包含着对工人群众的恐惧。在革命获得力量和热情并开始起劲之前，革命的唯一的生命力即它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已经被篡改了。

一切正常。文明世界的反动国家，没有在二十四小时里变成革命的人民国家。昨天还在芬兰、俄国、乌克兰、巴尔干充当反动宪兵，屠杀革命无产者的士兵和任凭这些事情发动的工人，没有在二十四小时里成为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的支柱。

德国革命的情况符合德国关系的内在的成熟程度。谢德曼—艾伯特是德国革命在今天这个阶段的天造地设的政府。而那些相

信能够和谢德曼—艾伯特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立党<sup>①</sup>党员们，那些在《自由报》上郑重其事地证实，人们可以和谢德曼—艾伯特一起建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sup>②</sup>的人，他们就以此证明他们有资格在这个最初的临时阶段的商号里，充任理所当然的伙伴。

但是，革命没有停顿。它的生命规律是迅速前进、发展到超出自身的范围。第一阶段已经由于其内部的矛盾而向前发展。当前的形势，作为开端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长期的状况则难以维持。要是不让反革命在全线取得优势的话，群众必须提高警惕。

开端已经有了。接下来的事情不在那些妄图阻止革命发展、阻挡世界历史车轮转动的侏儒们掌握之中。今天，世界历史的议事日程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德国革命已进入这一光辉天体的运行轨道。它将逐步地经过狂飙突进、经过斗争和挫折、危难和胜利达到目的。

它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发表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第3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97—400页。

（唐松阳 常正文译）

---

① 指1917年4月6—8日在哥达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② 《告全党书！》，1918年11月15日《自由报》第1号。《自由报》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编者注

# 国民会议

(1918年11月20日)

从《德意志日报》、《福斯报》和《前进报》到独立的《自由报》，从雷文特洛、埃尔茨伯格、谢德曼到哈阿兹和考茨基一致地发出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并同样一致地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思想面前发出胆战心惊的叫喊声。

据他们说，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负有这样的使命：经过多数表决来决定革命今后的命运。

统治阶级的公开的和经过伪装的代理人提出这个口号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既不会在国民会议内，也不会越过国民会议去同资本主义的现金保险箱的守护人进行讨论。

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同资本的守护人站到一起去了。

象希法亭在《自由报》上所说的那样<sup>①</sup>，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使革命避免使用暴力和充满恐怖的内战。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他们把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过程设想成为这样一种形式，即不同的社会阶级聚集一堂，相互进行一种美好的、心平气和的和“有气派的”讨论，然后进行表决——或许还会采用著名的“分

---

<sup>①</sup> 参看鲁·希法亭《革命者的信仰！》。载于《自由报》（柏林）1918年11月18日第6号。——德文版编者注

门表决法”<sup>①</sup>。那时，如果资本家阶级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它作为恪守纪律的议会政党会叹息一声说：有什么办法！我们看到，我们被多数票否决了。好吧，我们认输并把我们的全部土地，工厂，矿山，我们所有的保险柜和大笔的利润都交给工人。

的确，拉马丁、加尔涅、帕赫斯、赖德律-洛兰之流的1848年小资产阶级幻想家和空谈家品种并没有绝迹；它在考茨基、希法亭和哈阿兹身上以枯燥的、学究气的和费解的德国版复活了，却没有任何新鲜的光泽、才气和魅力。

这些根底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

他们忘记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议会政党，而是一个统治阶级，它占有全部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力手段。

只有在革命政府满足于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上贴一些小小的美人痣的时候，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才会安安静静。只有在革命是规规矩矩的，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雇佣关系、利润这些资产阶级统治的生命线和动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规规矩矩。

一旦危及利润，一旦向私有制开刀，一团和气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目前的田园生活场景——狼与绵羊，老虎与羔羊就象在诺亚的方舟里一样和平地并排吃草——只会维持到开始认真地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一分钟也不会更长。

只要出色的国民会议真的决定完全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连根铲除资本统治，斗争也就会开始。如果资产阶级被射中心脏——

---

<sup>①</sup> 分门表决法是议会中的一种投票方法：投票前，议员必须先离开所在大厅，然后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组从三个不同的门分别再进入大厅以计算各组的票数 ——编者注

它的心是在现金保险箱内跳动的——，它将为它的统治殊死战斗，将千百次公开和秘密地反抗社会主义的措施。

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战胜、击退、克服它，不管有没有国民会议。人们忧心忡忡地力图从革命中排除的出去的那种“内战”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内战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别名。不用阶级斗争，经过国会多数表决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那么，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走国民会议这条路会得到什么呢？加强资产阶级的阵地，用虚无缥缈的幻想削弱并迷惑无产阶级，在狼和羊羔之间的“讨论”上浪费和损失时间和精力，一言以蔽之，给所有这些人帮忙，而这些人目的和企图是诱使无产阶级革命放弃其社会主义的目标并把无产阶级革命阉割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国民会议的问题不是时机合适与否的问题，不是更加“方便”与否的问题。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革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自觉性的问题。

在法国大革命中，决定性的第一步是在1789年7月把三个分开的等级联合成一个共同的国民会议。这项决定给事件的下一个整个进程打上了印记。它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战胜中世纪封建的等级社会的标志。

与此完全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是由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以及它本身任务的阶级特性的标志就是应当执行这一任务的政治机构——工人议会、即城乡无产阶级代表机关的阶级特性。

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代的一件道具。

今天，谁抓住国民会议不放，他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革命拖



回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他就是一个经过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

围绕国民会议的斗争是在不是民主就是专政的呐喊声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也顺从地接受了这个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二者必择其一的情况是为了煽动而捏造出来的。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象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

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

召集这样一个工人代表机构来代替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国民会议，这本身已经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行动，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的历史决裂，是唤醒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第一次公开而严峻地向资本主义宣战。

不要寻找借口，不要模棱两可，应当确定方针了。议会痴呆症昨天是一个弱点，今天是一种暧昧态度，明天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发表于《红旗报》1918年11月20日第5号。译自  
《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  
407—410页。

（于沪生译 殷叙彝校）

# 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

(1918年12月)

## 一

11月9日工人和士兵推翻了德国的旧统治。普鲁士马刀统治世界的血腥狂想在法国战场上破灭了。点燃起世界战争的大火并且把德国推入血的海洋的那伙犯罪分子智穷力竭了。被欺骗了四年之久的人民，听莫洛赫神<sup>①</sup>的差遣而忘记了对文明的责任、荣誉感和人道精神，受人利用去干出种种无耻勾当的人民，已经在深渊的边缘从四年来的麻木不仁状态中醒过来了。

11月9日德国无产阶级站起来了，挣脱了可耻的枷锁。霍亨索伦家族被赶下了台。选举了工人士兵委员会。

但是霍亨索伦家族从来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世界大战的真正的罪人——在德国和法国、在俄国和英国、在欧洲和美洲都是如此。全世界的资本家，他们是屠杀人民的真正的策划者。国际资本是贪得无厌的培阿尔<sup>②</sup>，已有成百万成百万的人被当成冒着热气的牲口投入

---

\* 这是罗·卢森堡为斯巴达克联盟起草的纲领，在作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之后，经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成为该党的纲领。——编者注

①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编者注

② 古巴比伦和腓尼基人崇拜的日神。——编者注

它的血盆大口，去满足它的欲望。

世界大战使社会处于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要就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新的战争和在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中迅速灭亡，要就是铲除资本主义剥削。

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权利。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再能把社会从帝国主义的放肆破坏后遗留下来的可怕的经济崩溃中拯救出来。

生产资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工人阶级最优秀、最强壮的骨干惨遭杀戮。在活着的人回到家乡时，等着他们的是咄咄逼人的失业的苦难。饥荒和疾病威胁着要彻底灭绝人力。由于战争债务的沉重负担，国家财政的破产不可避免。

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要摆脱这一切流血的混乱，要走出这个吓人的深渊，从其它办法得不到任何帮助，找不到任何出路，得不到任何救援。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能整顿这种混乱，才能使所有的人就业和得到面包，才能结束各国人民的相互残杀，才能给被宰割的人类带来和平、自由、真正的文化。废除工资制！这是当前的口号。合作劳动应该代替雇佣劳动和阶级统治。必须停止由一个阶级垄断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必须成为公共财产。不许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的调节和产品的分配要符合大众的利益。废除今天的生产方式，因为这是剥削和掠夺；也要废除今天的贸易，因为这只不过是欺骗。

用自由的劳动伙伴代替雇主和雇佣奴隶制。劳动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因为每个人都有劳动的义务！每一个对社会尽了自己义务的人都过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因此饥饿不再是劳动的灾难，而是对懒汉的惩罚！

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民族仇恨和奴役才能根除。只有当这样一个社会实现的时候，地球才不再会因为对人的屠杀而蒙受

耻辱。只有那时才可以说：

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战争。

在这一时刻，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救星。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坍塌的墙上，《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象发出火焰的预兆一样燃烧着：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在野蛮中灭亡！<sup>①</sup>

## 二

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过的最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要求彻底改造国家并且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行彻底的变革。

这种改造和变革是不可能由某个行政机构、委员会或者一个议会下命令来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众本身去着手和完成。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革命中，都是由人民中的极少数来领导革命斗争的。他们给斗争规定目标和方向，并为了胜利地争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而把群众仅仅当作工具来利用。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为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并只有由大多数劳动者去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

无产阶级群众所负有的使命不仅是根据明确的认识为革命确定目标和方向。它必须也由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在有意识的，自

---

<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中没有这一口号。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所述思想。——编者注

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

因此，从国家最高领导到最小的市镇，无产阶级群众都必须用自己的阶级机关即工人士兵委员会去代替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统治机构：联邦议会、国会、市镇议会，必须占领一切岗位，监督所有职务，用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来衡量所有的国家需要。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机关即工人士兵委员会之间的经常的、生气勃勃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的活动才能使国家充满社会主义精神。

经济变革的过程也只有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承担下才能完成。最高革命机关发出的关于社会化的简单的命令只是空话。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用自己的行动使语言具有血肉。在每个企业里肩并肩地进行的反对资本的韧性斗争中，工人们依靠群众的直接压力、依靠罢工，通过建立自己的常设代表机构，可以监督生产并最终实际上掌握领导。

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学会从被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死机器变成这一过程的会思考的、自由的、主动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具有公众的积极分子的责任感，而公众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唯一主人。他们必须发展这种精神：没有厂主的皮鞭，却很勤劳；没有资本家的监工，却有极高的效率；没有奴役却守纪律；没有统治却有秩序。群众从公众利益出发的最高尚的理想主义、最严格的自我约束、真正的公民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正如愚昧、利己主义、腐化堕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样。

工人群众只有通过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经验才能获得所有这些社会主义的公民品德以及领导社会主义企业的知识和才能。

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只有通过工人群众坚韧的、不倦的斗争才能全部广阔的规模上实现，在劳动和资本、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相互逼视的一切地方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

级自己的事业。

### 三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流血、恐怖、政治谋杀是各上升阶级手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不需要恐怖，无产阶级仇恨和憎恶残杀人类。它不需这种斗争手段，因为它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因为它不是抱着天真的幻想登上舞台的，而幻想的破灭必然会引起血的报复。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少数人按照他们的理想使用暴力塑造世界的绝望尝试，而是负有历史使命，要把历史的必然性变成现实的广大的亿万人民群众的行动。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又是任何一种奴役和压迫的丧钟。因此一切资本家、容克地主、小资产者、军官、所有从剥削和阶级统治得到好处的人和寄生虫都勇敢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生求生存而斗争。

相信资本家会自愿地服从一个议会、一个国民会议的社会主义的判决，相信他们会心平气和地放弃他们的财产、利润和剥削的特权，这完全是妄想。所有的统治阶级为了争夺特权都是拚命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的。古罗马的贵族和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英国的骑士和美国的奴隶贩子、瓦拉几亚<sup>①</sup>的封建贵族和里昂的丝绸厂主，他们都让血流成河，他们踏着尸体、在杀人放火中前进，他们挑起内战和背叛祖国，为的是保卫自己的特权和自己的权力。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最后一代，比他们所有的前辈更加野蛮，更加赤裸裸地厚颜无耻，更加卑鄙。他们将不择手

---

<sup>①</sup> 罗马尼亚的地名。——编者注

段地用那种在整个殖民政治史中以及在最近的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冷酷的恶毒办法来保卫他们最神圣的东西，即他们的利润和他们的剥削特权。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对付无产阶级。他们将动员农民反对城市，他们将煽动落后的工人阶层反对社会主义的先锋队，他们将同军官们一起挑动屠杀，他们将企图千方百计地以消极对抗使社会主义的措施瘫痪。他们将唆使二十个万迪<sup>①</sup>来剿杀革命，他们将把外敌、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威尔逊的杀人部队当作救星引进国内，他们宁肯把国家变成一片冒烟的废墟，也不会自愿放弃雇佣奴役。

必须用铁拳逐步地、一往无前地粉碎所有这些反抗，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坚定不移的明确目标、警惕性和时刻准备着的主动精神对付资产阶级的阴谋、诡计和捣乱。用武装人民和解除统治阶级武装的办法对付反革命威胁的危险。用工人和士兵群众的积极行动的组织对付资产阶级的议会拖延手腕。用工人阶级的集中的、团结一致的、扩大到最大限度的权力对付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所不在的千百种权力手段。全德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战线（南德无产阶级和北德的无产阶级团结、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团结、工人和士兵团结），德国革命的生动的思想领导和国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大，只有这些才能够创造建筑未来大厦的非常稳固的基础。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世界历史上见到过的最大规模的内战，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为这种内战准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学会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去进行斗争和取得胜利。

---

<sup>①</sup> 万迪是法国西部大西洋岸边的历史胜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的策源地。——编者注

用完成革命任务所需要的全部政治权力来这样地武装团结一致的劳动人民群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因此就是真正的民主。雇佣工人坐在资本家旁边，农村无产者坐在容克地主旁边，貌似平等，用议会方式辩论他们的切身问题，这不是民主。只是在亿万无产阶级群众用他们长满鬍子的拳头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以便象雷神使用他的锤子那样用这个权力砸在统治阶级的头上的地方，才有不欺骗人民的民主。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些任务，斯巴达克联盟要求：

一 为保证革命立即采取的措施

1、解除全部警察、全部军官以及非无产阶级士兵的武装，解除统治阶级全体成员的武装；

2、工人士兵委员会没收所有库存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兵工厂；

3、武装全体成年男性无产阶级居民作为工人民兵，建立由无产阶级组成的赤卫队作为民兵的常备部分，负责经常保卫革命，抵御反革命的袭击和阴谋；

4、取消军官和军士的指挥权，以士兵的自觉纪律代替军国主义的绝对服从，全体成员选举长官并有随时罢免的权利，取消军事裁判权；

5、从一切士兵委员会中清除军官和超期服役者；

6、由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受托人代替以前政权的所有的政治机关和官厅；

7、建立一个革命法庭，负责审判发动和延长战争的主要罪犯，即二个霍亨索伦<sup>①</sup>、鲁登道夫、兴登堡、梯尔比茨和他们的共犯，以及所有反革命的阴谋策划者；

8、立即征用所有的食品，以确保对人民的供给。

---

<sup>①</sup> 指威廉二世及其王储。——编者注



## 二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

1、取消各邦，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

2、废除一切议会和市镇参议会，由工人士兵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和机构接管它们的职能；

3、由城乡全体成年男女工人在全德各个企业选举工人委员会，并由全体士兵（军官和超期服役者除外）选举士兵委员会，工人和士兵有权随时罢免他们的代表；

4、由全国各工人士兵委员会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士兵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该选出执行委员会作为执行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机关；

5、目前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一次都重新选举代表，以便经常监督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并且在全国广大工人士兵委员会和它们的最高政府机关之间建立生动活泼的联系。地方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有权随时罢免和撤换它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这些代表不按照委托者的意图行动的话；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免人民代表，设立和取消中央国家机关并任命其公务员；

6、取消一切等级差别、勋章和头衔，男女在法律上和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

7、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立法，为了消除失业，并且考虑到世界大战使工人体力削弱，缩短工时，每天最多劳动六小时；

8、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和精神，立即彻底改变营养、住宅、卫生和教育事业的状况。

## 三 近期的经济要求

1、没收所有的皇室财产和收入归公；

2、宣布国家债务和其他官方债务以及所有的战争借款无效，超过工人士兵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金额的款项除外；

3、剥夺所有的大型和中型农场的土地，在全国组织由中央统

一领导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小农经营仍归原主所有，直到自愿加入社会主义合作社为止；

4、由委员会共和国没收所有的银行、矿山、冶金厂和工业、商业方面的所有的大企业；

5、没收超过中央委员会规定的金额的所有财产；

6、委员会共和国接管全部官方的交通事业；

7、在所有的工厂选举工厂委员会，应在与工人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的条件下处理工厂内部事务，调整劳动状况，监督生产，最后接管企业的领导；

8、设立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在与工厂委员会经常合作的条件下，确保正在全国开展的罢工运动有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方向并得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政治权力的有力支持。

#### 四 国际任务

立即与外国兄弟党建立联系，使社会主义革命立足于国际的基础上，并通过建立国际亲密友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实现并保证和平。

#### 五 这正是斯巴达克联盟想要做的！

因为斯巴达克联盟想要这样做，因为它提出警告和进行督促，因为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良心，所以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所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都对它痛恨、迫害和诽谤。

杀死它！为自己的保险柜担心的资本家喊道。

绞死它！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肉锅担心的小资产阶级、军官、反犹太主义者和御用记者们喊道。

绞死它！谢德曼之流喊道，他们象犹太·伊萨里奥特一样把工人出卖给资产阶级，并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银币担心。<sup>①</sup>

绞死它！象回声一样，那些受蒙蔽、受欺骗、受利用的工人阶层和士兵也喊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大发雷霆反对斯巴达克联

盟，他们就是反对自己的血和肉。

在憎恨、诽谤斯巴达克联盟的浪潮中所有那些反革命的、与人民为敌的、反社会主义的、模棱两可的、害怕阳光的、糊里糊涂的人联合起来了。这就证明了革命的心脏在斯巴达克联盟身上跳动，未来是属于斯巴达克联盟的。

斯巴达克联盟不是那种想凌驾在工人群众之上或通过工人群众而上台执政的党，斯巴达克联盟只是无产阶级的最有觉悟的部分，它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每一个步骤中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历史任务，它在革命的各个阶级代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所有的民族问题方面代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

斯巴达克联盟拒绝与资产阶级的走狗，与谢德曼—艾伯特分享政府的权力，因为斯巴达克联盟认为这样一种合作是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加强反革命和使革命瘫痪。

斯巴达克也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政权，即仅仅因为谢德曼—艾伯特破产、因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由于与他们合作而陷入绝境就去掌握政权。

除非依靠全德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明确坚定的意志，除非他们自觉地赞同斯巴达克联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方法，斯巴达克联盟绝不接管政府的权力。

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经验的各各他之路上经过多次失败和胜利才能达到完全明确和成熟的程度。

斯巴达克联盟的胜利不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而是在革命的结局：斯巴达克联盟的胜利完全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广大的儿

---

① 作者在这里借圣经中犹大为了三十个银币出卖耶稣的故事来讽刺谢德曼等人。——编者注

百万群众的胜利是一致的。

起来，无产阶级！投入战斗！应该占领一个世界，并且反对一个世界。在世界历史上这场为了实现人类最高目的的最后的阶级斗争中，这句话对敌人是适用的：报仇雪恨！

### 斯巴达克联盟

发表于1918年2月14日《红旗》（柏林）第29期。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442—451页。

（苏冰娴 周容译 殷叙彝校）

#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1918年12月31日）

## 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

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讨论并通过我们的纲领，这不仅是由形式上的原因，即我们昨天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的党，而一个新的党必须正式通过一个纲领；今天关于纲领的讨论是根据伟大的历史过程即这一事实：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整个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时刻。同志们，我们在这样做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整七十年以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始形成的思路接上了。你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把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最终日的实现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任务来论述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主张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也是国际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行动的基础。那时他们两人（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领袖人物也同他们一样）认为，人们直接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只需要完成政治革命，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就可以直接使社会主义成为有血有肉的现实。你们

---

\* 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卢森堡在1918年12月30、31日两天内4次发言，对参加国民议会、党纲和政治形势、工人运动中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组织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里选的是31日的一次发言。——编者注

知道，在这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这一观点作了彻底的修正。在1872年写的还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篇序言（刊载于《宣言》的1894年版）中，他们两人谈到自己的著作说：“现在这一段”——第二节末尾，即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措施的叙述——“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①</sup>

这个被宣布为过时的一段是怎样说的呢？我们在《共产党宣言》第23页上看到如下的这些话：“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sup>①</sup>

你们看到，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着贯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同上面所引用的是一样的，仅仅略有改变。从把那些任务作为纲领提出来的时候到日前这一时刻，经过了七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做到了使我们今天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认为错误的那些观点。资本在这期间的发展使我们达到这样的情况：那时曾经是错误的事情今天已成为真理；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面临的工作已成为今天的直接任务。在那一时刻即发展的开端同我们今天的观点和任务之间，不仅经过了资本主义的这一整段的发展，也经过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这一整段的发展，尤其是德国这个在拥有现代无产阶级方面领先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一发展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的失望之后放弃了无产阶级能够立即、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那以后，在每一个国家都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党，这些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它们宣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日常细小斗争为直接的任务，这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编者注

样才能逐渐训练无产阶级的大军，使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时能承担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这一使社会主义纲领完全转移到另一种基础之上的转变特别是在德国获得了一个很典型的形式。在德国，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直到它在8月4日的崩溃以前，爱尔福特纲领确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纲领里，所谓的当前的最低任务占有首要地位，而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在远处照耀的明星，看作最终目的。但一切并不取决于纲领中写下的是什么，而是取决于人们怎样灵活地理解纲领；而对于理解纲领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同志们，我探讨这一问题，不是单纯由于对历史感兴趣，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今天，在我们把我们的纲领置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采取的那一立场上的时候面临的一项历史职责。由于历史发展在这一期间引起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对直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8月4日破产为止在党内起决定作用的那一观点十分明确地、自觉地作出修正。应当在这里正式作出这项修正。

同志们，恩格斯在1895年，也就是在马克思已经逝世以后，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那一著名的导言时，对问题是怎样理解的呢？他首先回溯到1848年，说明那种认为人们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然后他继续描绘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sup>①</sup>



然后他阐述了从那个时期以来一切情况是怎样改变的，接着谈到了德国党的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暂时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数十亿滋润补助，简直象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勇往直前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sup>②</sup>

然后是那著名的一段，列举我们的选票如何经过一次次国会选举发展到几百万张。恩格斯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sup>③</sup>

恩格斯在这里接着对于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下无产阶级还能在大街上通过革命就获得任何成就的幻想作了详细的批评。我认为，考虑到我们正处在革命中间，正处在一场街头革命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情况中间，今天已经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即应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② 同上书，第600—601页。

③ 同上书，第603页。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直到最后时刻正式通行的、对我们在1914年8月4日所经受的事情也负有部分责任的那一观点进行批判性的探讨了。（很对！）

我并不是想说，恩格斯本人由于上述言论也要为德国发展的整个过程分担罪责；我只是说：这是一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活生生存在的或者不如说致它于死命的那一观点作了经典性概括的文献。同志们，恩格斯在这里运用他在军事科学领域也具有的全部内行知识向你们说明，认为劳动人民在今天这样的军事、工业和大城市的发展的情况下能够举行街头革命并取得胜利，这纯粹是幻想。这一反对意见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第一，与此同时，议会斗争就被看成是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行动的对立面，并且简直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从这一批评产生的是纯粹的唯议会主义。第二，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国家的最强大的组织——军队，即穿上军服的无产者大众，恰恰被认为是从一开始就对社会主义影响具有免疫力的，是接受不了这一影响的。《导言》说到，在今天军队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认为无产阶级能够对付这些用机关枪、用最新的技术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是一种疯狂的想法，那么这样说的前提显然是：只要当了士兵，就立即而且永远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支柱——根据今天的经验来评价，对于一个领导我们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简直无法理解的错误，如果人们不知道上引的历史文献是在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下产生的话。为了对我们的两位伟大导师，特别是对晚得多才去世、同马克思共享荣誉并且持同样的观点的恩格斯表示尊重，必须着重指出，大家都知道，恩格斯是在当时的国会党团的直接压力下写出这篇导言的。在那个时候，在德国——在九十年代初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左倾激进流派，它要防止党员同志们彻底陷入纯粹的议会斗争。为了在理论上击败这些激进分子并且在实践上抑制他们，为

了凭借我们伟大导师的威信使他们不致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倍倍尔和一些同志——这在当时也是可以说明我们的情况的特点的：从事议会活动的国会党团在思想上和策略上决定党的命运和任务——倍倍尔和一些同志敦促恩格斯（他住在国外并且不得不信赖他们的保证）写出了那篇《导言》，因为据说当时迫切需要把德国工人运动从无政府主义的偏向挽救过来。从那时起这一观点实际上支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直到我们遭到1914年8月4日那件倒霉的事。这是宣布唯议会主义。恩格斯没有活到看见这样应用他的《导言》的结果和实际效果。我可以肯定：如果人们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果人们了解充溢在他们所有的学说和著作中的那种生机勃勃的、革命的、纯真的、没有经过歪曲的精神，那么人们一定会深信，恩格斯会第一个出来反对从唯议会主义产生的那些偏向，反对早在8月4日以前几十年就已经在德国出现的工人运动的腐化和堕落，因为8月4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转折，而是我们在这以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的事情的逻辑结果（很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会第一个全力以赴地对此提出抗议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挽回局面，不使车轮陷入泥潭。但是恩格斯在他写作《导言》的那一年就去世了。1895年我们失去了他；遗憾的是，在他去世以后理论的领导从他手中转移到考茨基这样的人手中，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任何反对唯议会主义的行动，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来自左面的反抗，——这些反抗是由或多或少的一群对堕落进行坚韧斗争的同志进行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明白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后果——每一次这种反抗都会被贴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至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起幌子的作用，为任何畏首畏尾的态度、任何偏离真正的革命阶级斗争的行为、任何不彻底性作掩护，而这种不彻底性已经使德国社

会民主党和整个工人运动，包括工会运动在内，注定成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和基础上的长年不治的重病、丝毫不想认真地力求动摇这一社会，使它瓦解。

现在，同志们，我们今天经历着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新站到马克思身边，站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了。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纲领中宣称：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不是别的，而是——用几句话概括起来——使社会主义成为事实和行动并且把资本主义彻底消灭，那么我们就站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采取的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在原则上背离过的那一立场之上。现在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曾经为此长久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作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作威作福的马克思主义代替品（“很好！”）。你们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从那些成了艾伯特、大卫之流的副手和助手的人身上看到，它今天已经陷入什么处境。我们在那里看到那种学说的正式代表，而几十年来人们是用这种学说冒充真正的、没有掺假的马克思主义拿给我们的。不，引导人去和谢德曼之流一同推行反革命政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那些企图歪曲它的人作斗争，它象田鼠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基下面挖掘，它又使德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今天在我们的旗帜下，在革命的战旗下前进，我们在反革命表面上还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信徒和今后的战友。

同志们，这就是说，象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被历史的辩证法的过程所引导，而且经过了在这期间整整七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在重新站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第一次展开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时所站的地方。那时，也就是当人们修正1848年的错误和幻想的时候，人们认为无产阶级还要经过遥遥无际的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当然，严肃的理论家从来没有忙着去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规定某种有约束力的、确定的期限；但是人们

大致认为这段路程还很长，而正是从恩格斯1895年写的《导言》的每一行里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我们确实可以作出总结了。同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发展相比，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吗？七十年大资本的发展已足够使我们前进得这样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认真地着手去消灭资本主义了。不仅如此：我们今天不仅有能力解决这一任务，它不仅是我们对无产阶级负有的职责，而且这一任务的解决在今天根本就是挽救人类社会使它还能存在下去的唯一出路。（热烈的赞同声）。

要知道，同志们，经过这次战争，资本主义社会剩下的东西除了一个庞大的废墟之外还有什么呢？形式上全部生产手段以及许多权力手段、几乎全部决定性的权力手段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对此我们不要有错觉。但是它们依靠这些能够做到的，除了试图拚命通过血腥屠杀来恢复剥削以外，无非只有无政府状态。统治阶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人类今天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不是在无政府状态中灭亡，就是从社会主义得到挽救。资产阶级在它们的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找到摆脱世界大战的后果的任何出路。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文献中第一次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说出来的真理，即社会主义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今天已经按照这句话的最精确的意义体验到了。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必然性，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再愿意在资本家阶级给他们准备的生活条件下生活了，而且还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履行他们的阶级职责和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大家一起都要面临灭亡（热烈的赞同声）。

同志们，这是我们今天正式通过这个纲领所依据的总的基础，它的草案你们已经在《斯巴达克联盟想要做什么？》这一小册子中见到了。它有意识地反对爱尔福特纲领迄今所持的立场，有意识

地反对把间接的、所谓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最低要求同作为最高纲领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分离开来。我们抱着有意识地与此相对立的态度清算最近七十年的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我们说：对我们来说今天没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和最高纲领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贯彻的最低限度的工作。（“很好！”）

关于我们在我们的纲领草案中向你们提出的具体措施，我在这里不作详细论述，因为你们能够对它们具体表示态度，如果我们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那就要说得太多了。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在这里仅仅指出和说明那些把我们纲领中的立场同迄今的、所谓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区别开来的那些一般的、大的基本特征。我认为更加重要、更加迫切的是，我们要就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怎样估计具体的情况，必须怎样规定策略任务和实际解决办法，这些任务和办法是由政治形势、由革命的迄今过程并且由它的可以预计的今后发展的方针产生出来的。我们打算按照我已经试图说明的那一观点来讨论政治形势，就是要站在把实现社会主义当作直接任务的立场，我们方面的任何措施、任何表态都必须由这一任务来指明方向。

同志们，我认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党代表大会是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成立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偶然地，或者不如说——我本来应当这样正确地说的——并非偶然地同德国革命本身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吻合了。人们可以声称，德国革命的开始阶段已随着最近几天的事件结束了，我们现在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即进一步的阶段，我们大家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对已经做出的成绩，已经做的和没有做的事情作一次细致的批判的审查，以此作为我们今后的行动的根据，这种自我批评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更好的、更深刻的认识的源泉。我们打算对革命

的刚刚结束的第一阶段用审视的眼光看一看！

革命的出发点是11月9日。11月9日是一次充满缺陷和弱点的革命。这不奇怪。这是经过四年战争之后发生的革命，在这四年里，德国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已经明显表现出如此严重的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感到羞耻和不愿承认的态度，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榜样。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就不能期望，人们在这个曾经呈现8月4日和以后四年的那幅可怕图景的德国，会突然在1918年11月9日经历一场辉煌的、有阶级觉悟和明确目标的革命；而我们在11月9日经历的事情，有四分之三与其说是一个新的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现存帝国主义的崩溃。（赞同声。）只不过是这样的时刻来到了：帝国主义象一个泥足巨人一样内部已经腐朽，必然要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或多或少混乱的、无计划的、很不自觉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联系的纽带和持久存在的、起解救作用的原则仅仅集中表现为这一口号：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这是这次革命的口号，它立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面貌——尽管最初时刻有种种缺陷和弱点；如果有人对我们毁谤俄国布尔什维克，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对此回答说：你们是从哪里学会你们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识的呢？你们是从俄国人学来的：工人士兵委员会（赞同声）；有些家伙今天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德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领导地位上同英国帝国主义并肩合作，谋害俄国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形式上同样是依靠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因此他们必须承认：是俄国革命为世界革命提出第一批口号的。我们有把握说——这是由整个情势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德国之后不管什么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第一个姿态也将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很对！”）

我们行动的起团结作用的国际纽带正是在这里，这是使我们的革命彻底同一切从前的革命区别开来的口号：这次革命同一切其他革命一样是在辩证的矛盾中运动的，很能说明这种矛盾的特征的是：早在11月9日，当它发出第一声喊叫、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诞生时的喊叫时，它已经找到了把我们向前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那个词：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团结在这个词的周围——而革命是本能地找到这个词的，尽管它在11月9日还是如此落后。由于缺陷，由于弱点，由于缺乏自己的首创精神和缺乏对自己的任务的明确认识，它几乎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让它自己在11月9日夺取的权力手段的一半重新脱离自己的掌握。这一方面说明，今天的革命处于历史必然性的极其强有力的规律的支配之下，这一规律保证我们将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目标，尽管有种种困难、纠纷和自己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拿这一明确的口号同随之产生的有缺陷的实践相比较，那么这正是革命的儿童学步、它还必须作出巨大的成绩并且走过漫长的道路，才能成长起来，充分实现它的最初的那些口号。

同志们，从11月9日到最近几天的这一最初阶段的特征是，各方面都抱有幻想。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最初幻想是：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帜周围团结起来的幻想。11月9日革命的最初成果是，在革命爆发前两个小时还认为自己的成绩是攻击革命、使革命不能发生的那些人即艾伯特—谢德曼连同哈阿兹，成了运动的领导，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加能说明这次革命的内在弱点啊！在普遍庆祝团结的欢呼声中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联合起来的那一想法曾经是11月9日革命的格言，但它却是一个幻想，它后来自食其果，付出流血的代价，而我们只是在最近几天才做完了这个梦，醒悟过来；这在艾伯特—谢德曼方面并且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个自我欺骗——在一切方面都是。此外，资产阶级在这一结



束阶段还有一个幻想，认为他们通过与艾伯特—谢德曼的所谓社会主义政府联合，就真正能控制无产阶级群众，而社会主义革命就将被扼杀；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方面的幻想则是，他们能依靠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大众的的帮助压制工人大众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这些是形形色色的幻想，最近时期的事件也可以从这些幻想得到说明。所有的幻想都化为泡影了。已经表明，哈阿兹同艾伯特—谢德曼在“社会主义”招牌下的联合实际上无非是意味着纯粹反革命政策上的一块遮盖布，我们已经看到，象在所有的革命中一样，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自我欺骗。有一种革命的方法可以治好人民的幻想，但是可惜这种疗法是要用人民流血为代价的。正象在以前的一切革命中一样，在这里也是如此。是12月6日韶西大街的流血牺牲，是12月24日被杀害的水兵的血<sup>①</sup>，向广大群众证实了这种认识和真相：你们拼凑起来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无非是一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府，谁继续容忍这种状况，谁就是干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事情。（“很好！”）

同志们，但艾伯特—谢德曼两位先生的幻想也破灭了。他们以为依靠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帮助就能长久压制无产阶级。但是12月6日和24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察觉到士兵群众内心的觉醒，察觉到他们开始对打算把他们当作炮灰使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那些先生们采取批评的态度。这也是受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的客观发展规律支配的，工人运动的个别部队逐渐通过自己的痛苦经验而认识到革命的正确道路。人们曾把大批生力军调进柏林来当炮灰，想用他们来镇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行动——人们却看到，今天在各个兵营里都出现对斯巴达克联盟传单

---

<sup>①</sup> 1918年12月24日，阿诺德·莱克维斯少将率领的反革命军队在炮兵支援下进攻驻在柏林宫堡和御厩的人民海军师。11名水兵和莱克维斯部队的56名士兵战死。水兵得到柏林工人的武装支援，击退了进攻。——编者注

的需求。同志们，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束。艾伯特—谢德曼依靠落后士兵的帮助控制无产阶级的希望已经大部分落空。他们不得不在不太远的时候，在军营里革命观点也将日益明确，因此战斗无产阶级的队伍会扩大，反革命阵营会削弱。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还有一种人不得不丢掉他们的幻想，这就是资产阶级，即统治阶级。如果你们读一下12月24日事件以后的最近几天的报纸，你们就会注意到有一种十分明确、清楚的失望和愤怒的调子：呆在上面的那些奴才表明自己是不中用的。（“很好！”）

人们期望艾伯特—谢德曼会表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人物，可以把猛兽控制住。但是他们做到了什么呢？他们搞了几次不够格的暴动，反而使革命的九头蛇更加坚决地把头抬起来了。于是在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对彼此失望的情况！无产阶级丢掉了把艾伯特—谢德曼同哈阿兹的结合当作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艾伯特—谢德曼丢掉了依靠穿军服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能够长久压制穿工人服的无产阶级的幻想，资产阶级丢掉了通过艾伯特—谢德曼—哈阿兹欺骗德国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使它放弃自己的目的的幻想。这无非是一笔负数的帐，纯粹是一堆破烂的、化为泡影的幻想。但正是由于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后剩下的一堆这样的破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收益，因为没有什么比幻想更加对革命有害的了，没有什么比明白的、公开的真相对革命更加有益的了。我在这里可以援引德国思想的一位经典作家的意见，他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家：我是指莱辛，他在沃尔芬比特尔当图书馆员时的最后著作的一篇中写了如下的使我很感兴趣并且抱有同感的话：“我不知道，把幸福和生活奉献给真理是不是义务……但是我知道，如果人们想用真理来教育别人，他就有义务完整地教，否则就根本不要教；明确而完整地，不故作神秘，无所保留，不对它的力量和用途抱不信任态度——用

这种方式来教……因为错误愈是露骨，通向真理的道路就愈短和愈直；与此相反，精巧的错误能使我们永远达不到真理，使我们更加难于看清楚它是错误……谁只想到在形形色色的假面具和打扮之下兜售真理，那么他也许是很想给真理拉皮条，但他决不是曾向真理求爱的人。”

同志们，哈阿兹、迪特曼等等诸位先生打算在形形色色的假面具和打扮之下兜售革命、兜售社会主义货色，他们已表明自己是给反革命拉皮条的人。今天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些暧昧不明之处，这个货色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两位先生这样的粗暴的、矮胖墩的形象站在德国人民群众面前。今天连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看不出：这是反革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在我们经过发展的最初阶段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将是怎样呢？不言而喻，问题不在于作出预言，而是仅仅在于，从迄今经历过的事情得出逻辑的结论并且推断出眼前的发展大概会采取的道路，以便据此来规定我们的策略、我们自己的斗争方式。同志们，这条道路再往下走将通向何处？你们从艾伯特—谢德曼新政府的最近言论中已经看出某种色彩纯正的、没有掺假的迹象。我已经指出，所有的幻想都已消失了，那么在这以后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政府的路线能朝哪一方面移动呢？这一政府日复一日地丧失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支持，除了小资产阶级以外，只剩下少数无产者支持它，少得可怜，而且这些人还将支持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多久，是很不清楚的。他们将日益丧失士兵群众的支持，因为士兵已开始走上进行批判的、自我思考的道路，这个过程起初固然发展得还缓慢，但是不到产生十足的社会主义认识它是不会中断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在资产阶级那里也失去了信用，因为他们表现得不够强有力。那么它们的道路会怎样走下去呢？他们将很快把社会主义政策的喜剧彻底收场；如果你们读一下这些先生的新纲领，你

们就会看到，他们将开足马力进入第二阶段——揭掉面纱的反革命阶段，我甚至想把这表述为：使过去的、革命前的情况复辟。什么是新政府的纲领？是选举一位总统，他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国王和美国总统之间的中间地位（“很好！”），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一位艾伯特国王；其次是恢复联邦议会。你们今天可以读到南德意志政府独自提出的要求，它们强调了德国各个政府的联邦性质。<sup>①</sup>恢复老的规规矩矩的联邦议会以及自然也恢复它的附属品即德国国会，这只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情。同志们，艾伯特—谢德曼就这样着手采取干脆使11月9日以前的旧状态复辟的路线。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始从一个斜坡滑下去，要弄得粉身碎骨，躺在深渊的底部。因为恢复11月9日以前的旧状态这件事在11月9日已经过时了，今天的德国离这种可能性已经很远了。政府只代表一个阶级的真正的阶级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它对政府的支持由于最近的事件已明显地削弱了，政府为了加强资产阶级对它的支持，被迫实行一种日益变本加厉的反革命政策。南德各邦的要求今天在柏林的报纸上登出来了，从这些要求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的愿望，即所谓的加强德国的安全，用规范的德语来说就是：实行反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暴动主义”分子、“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也就是社会主义分子的戒严状态。艾伯特—谢德曼受情况驱使，竟实行了包括或不包括戒严状态的专政。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正是通过迄今的发展，通过事件本身的逻辑，并且通过压在艾伯特—谢德曼身上的强制力量，将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在革命的第二阶段要经历一场比过去更加尖锐得多的斗争，更加激烈得多的阶级斗

---

<sup>①</sup> 1918年12月27—28日巴登、巴伐利亚、黑森和符腾堡的政府代表在斯图加特提出以下要求：1. 在联邦制基础上重建德国；2. 建立有行动能力的全国政府和国民议会；3. 尽可能快地为德国实现和平。他们着重表示反对单一的中央政府，因为这将使各邦政府降低为省级行政机构。他们要求组成一个共同的代表团参加与美国进行的食品供应谈判。——编者注

争（“很对！”）；这是一场更加尖锐得多的斗争，不仅是因为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政治因素促使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毫无幻想地、胸膛对胸膛地、面对面地进行斗争，而且也是因为一场新的大火，一个新的火焰愈来愈从底层向全面扩展，这就是经济斗争。

同志们，有一个情况很能说明革命的第一时期的特点：人们可以说，直到我上面描绘的12月24日为止，它还是一次纯粹的政治革命，我们必须充分自觉地认清这一点；这次革命的开端性质，它的不足之处，它的不彻底和不自觉之处就在于此。这是一次变革的第一阶段，而这次变革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改变经济关系。它象小孩一样没有成见，缺乏自觉，它探索着往外走，却不知道向何处去，正如上面所说的，它具有纯粹政治的性质。只是在最后几个星期，才开始有一些完全自发的罢工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一点说出来：正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全部本质，罢工一定将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成为革命的中心点，革命的主要事情。（“很对！”）那时它就是一场经济革命，从而也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只能由群众直接地、面对面地同资本主义来决一胜负，要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无产者都起来反对他的雇主。只有那样它才会成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由于不动脑筋，当然就把这一过程设想成另一种样子。人们认为，只需要把旧政府推翻，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领导，就可以发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命令。这又只不过是幻想。社会主义没有也不能通过命令来实现，也不能通过一个哪怕是很出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来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群众，通过每一个无产者来实行。群众被资本的锁链束缚在那里，就必须在那里把锁链砸碎。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社会主义。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外部形式又是怎样的呢？是罢工，因此我们看到，发展的经济阶段日前在革命的第二时期处于重要地位。

我也想在這裡強調，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也不会有人反对这样说：我们斯巴达克联盟的人，我们德国共产党的人，在德国是唯一站在罢工的和斗争的工人一边的。（“很对！”）你们在所有的场合都曾经读到和看到，独立党对罢工是采取什么态度的。在《前进报》和《自由报》的立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在那里是这样说的：你们必须劳动，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多干活。而他们是在资本还大权在握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这样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极其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从最坏的煽动者直到独立党、直到《自由报》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要求的，只有我们共产党除外。因此，通过这一叙述就已经说明，今天凡是不站在我们的革命共产主义立场上的人，一个不剩地统统极其激烈地反对罢工。

由此得出的结果是：在即将到来的革命阶段，罢工不仅将日益扩展，而且将占据革命的中心地位、决定性地位，使纯粹政治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你们将看到，经济斗争中的形势将大大尖锐化。因为这样一来革命就发展到使资产阶级不能对它等闲视之的地步。资产阶级能在政治领域故弄玄虚，在那里还有可能举行假面舞会，在那里象艾伯特—谢德曼这样的人还能以社会主义的姿态出场，但是在涉及利润的地方就不行了。在那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就将面临二者择一的决定：要就是结束罢工，消除罢工运动有可能扼杀政府的那种危险，要就是艾伯特—谢德曼两位先生完蛋。我也认为，他们的政治措施已经会使他们很快就要完蛋。艾伯特—谢德曼非常痛苦地感到，他们在资产阶级那里没有得到很大的信任。资产阶级将要考虑，他们是否能把银鼯皮大衣披在一副土里土气的暴发户样子的艾伯特身上。如果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归根到底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光是手指沾上血还不够，而是必须在血管里流着蓝色的血（“很好！”）；如果发展到这种地步，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国王，我们不需要一个举止根本不可能

象国王一样的暴发户。（欢笑。）

因此，同志们，艾伯特—谢德曼二位先生竭力促使一次反革命运动蔓延开来。他们将无法扑灭熊熊燃起的经济斗争的火焰，他们确实将无法满足资产阶级及其意图。他们将退下去，让位给一次反革命尝试，这种反革命尝试或者会发展成以一位格勒内尔先生为主要人物的绝望的斗争，或者会发展成兴登堡统治下的明目张胆的军事专政，但或许也不得不给其他的反革命势力让路。

详细的情况无法断定，关于什么事必然会发生不能发表具体的见解。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外部形式，不在于这件事或那件事将在什么时刻发生，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今后发展的大的方向就足够了，而这个方向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后，即以政治斗争为主的阶段以后，将是一个经济斗争加强和扩大并且占主要地位的阶段，那时在短期内，或者也许经过较长的时间，艾伯特—谢德曼政府一定要销声匿迹。

国民会议在发展的第二阶段将成为什么样子，同样难于预言。有这样的可能：如果它产生了，它会成为一个新的教育工人阶级的学校；或者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国民会议根本成立不起来；无法作出任何预言。我只想附带说一句，好使你们理解我们过去是从什么观点来维护我们的立场的：我们只反对把我们的策略制定成非此即彼的样子。我在这里不想重新引起讨论，我这样说只是为了使你们中间不致有某一个人偶然听到几句话就产生这样的想法：啊，现在调子变了。我们团结一致地完全站在过去的立场上。我们不想把我们对待国民会议的策略寄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这种可能性固然会出现，但不是必然会出现，这就是国民会议化为乌有的可能性。我们打算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包括当国民会议产生时从革命角度对它加以利用的可能性。它是否会产生，这是无足轻重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得到

好处。

那么对于破产了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或者其他任何自称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执政者来说还剩下什么呢？我已经说过，无产阶级作为群众已经摆脱他们的掌握，士兵同样也不再能被用来当炮灰了。那么这些可怜的家伙为了挽救自己的处境究竟还剩下什么呢？他们仅仅还有一个机会，同志们，如果你们今天读了报纸上的报道，你们就会看到，如果双方互不相让，德国的反革命将拉出来反对我们的最后一批后备军在那里。你们大家都已经读到，德国军队已在里加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掌握着这样的文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件展望目前正在里加进行的战斗。全部事情是由第八军总司令部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袖奥古斯特·维尼希携手合作，共同安排的。人们总是把可怜的艾伯特—谢德曼说成是协约国的牺牲品。但是好几个星期以来，从革命开始以来，《前进报》就执行这样的策略，把扼杀俄国革命说成是协约国的一个正直的愿望，而协约国本身却是受它这种说法的启发才产生这种思想的。我们在这里已经用文件证实，这是以牺牲俄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为代价而进行的。第八军总参谋部部长比尔克内尔中校在12月26日的一份电报中报告了在里加为达成这一协议而进行的谈判。这份电报是这样说的：“12月23日在英国军舰‘玛加蕾特公主号’上，德国全权代表维尼希同英国政府代表、前驻里加总领事蒙桑奎举行了会谈，也曾请求德军总司令或其代表参加。因此我被指定参加。

会谈的目的：

执行停战条件。

会谈经过情况：

英国方面：

停泊在这里的军舰将监视条件的执行。



根据停战条件提出以下要求：

一、德方必须在这一地区保持足够的作战力量，以便牵制布尔什维克，不允许他们越出目前的阵地向前推进。”

还有：

“三、关于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德国军队和拉脱维亚军队目前的配置，应向英国参谋部军官送交一份表格，以便报告资历最高的海军军官。今后有关准备用来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部队的配置，均应经过同一军官报告。

四、在下列地点必须保持足够的作战力量，武装待命，以防止布尔什维克占领这些地方，或防止布尔什维克突破联结下列地方的整个战线：瓦尔克，沃尔马尔，温顿，弗里德里希施塔特，彭斯克，米陶。

五、应保护从里加通向利鲍的铁路不受布尔什维克攻击，经过这段铁路的所有英国库存物资和邮件均须享受优先处理。”

接着还有一系列要求。德国全权代表维尼希先生的回答是：尽管打算强迫使一个政府占领一个外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同寻常的，但是在这一场合这却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愿望的。——维尼希先生，这位德国的工会领袖就是这样说的！——因为需要保护德国的血统——波罗的海国家的男爵们——，我们也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这个国家，我们曾使它摆脱过去的国家附属关系。但是我们的意图要实现是有困难的，首先是由于军队的状况，他们在停战条件的影响下不再想打仗，而是想回家了，而且他们都是些老弱残兵；其次是由于当地政府——指拉脱维亚政府——的态度，它把德国人说成是它的压迫者。我们努力建立自愿的、作好战斗准备的兵团，这已经部分地做到了。

在这里进行的是反革命。你们不久以前谈到建立“铁师”的消息，这是特地为了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布尔什维克而建立起来

的<sup>①</sup>，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对此采取什么态度，过去未弄清楚。现在你们知道，是这个政府本身提出这一建议的。

同志们，还要对维尼希略微评论几句。我们可以冷静地宣布，德国的工会领袖——一个工会领袖起了这样的政治作用，这不是偶然的——，德国的工会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无耻、最大的恶棍。（暴风雨般的喝采声和鼓掌。）你们知道应当把这些人，把维尼希、艾伯特、谢德曼放到哪里去吗？按照他们自己宣布完全有效因而也可以用来审判他们自己的那个德国刑法法典，这些人应当被送进苦役监！（暴风雨般的喊声和鼓掌。）因为按照德国刑法法典，凡从事招募德国士兵为外国效力者要处以苦役监禁。而今天——我们可以冷静地说出来——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府”的人不仅是出卖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犹太，而且还是苦役囚犯，他们根本不能进入正派人的社会。（暴风雨般的赞同声。）

与这一点相联系，我将在我的报告结束时向你们宣读一项决议<sup>②</sup>，我期待你们一致对此表示赞同，以便我们能以应有的坚决态度反对现在左右德国命运的这些人。

同志们，我重新从我的叙述的那一线索谈下去。显然，所有这些阴谋诡计，铁师的建立以及特别是上面提到的同英国帝国主义

---

① 从1918年11月中旬开始，里加的陆军总司令部与德国驻波罗的海国家特派员、右翼工会领袖奥古斯特·维尼希取得协议，着手建立“铁师”之类的反革命志愿军团，要用它们来反对波罗的海各国和芬兰的工人以及波兰。在德国，这些志愿军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反革命内战部队。——编者注

② 这一决议全文如下：“全国代表会议愤怒地获悉德国政府在东方的行动。德国军队与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男爵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合作不仅意味着卑鄙地出卖俄国无产者和俄国革命，也意味着确认各国资本家反对全世界战斗无产阶级的世界联盟。党代表大会鉴于这一骇人听闻的行动重新声明：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死敌。打倒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编者注

的协定，无非是意味着用来扼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的后备军，而且基本问题即关于和平前景的问题，也是与此密切结合的。我们从这些协议里看到的除了重新挑起战争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呢？这些恶棍在德国演出一场喜剧，装出他们好象全力以赴地在恢复和平，我们似乎是捣乱分子，是煽动对协约国的不满和推迟和平的人，而这时他们却亲手准备重新燃起战火，东方的战争之火，而德国国内的战争将紧跟着发生。因此你们在这里也重新遇到这种形势，它将使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激烈冲突的时期。我们将必须在捍卫社会主义和革命利益的同时也捍卫世界和平的利益，这正是我们斯巴达克联盟的人的策略的证明书，在整个四年的战争期间又是唯有我们在一切场合都主张这一策略。和平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除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能真正恢复和平和保持和平。（热烈的赞同声。）

同志们，根据上述情况推论出来的、我们对我们最近时期的形势采取的总的策略方针是什么呢？你们从上述情况首先产生的恐怕会是这样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并且必须用一个鲜明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来代替它。不过，我不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领导层，引向上面，而是想把它引向下面。我们不应当继续鼓励和重复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1月9日阶段的幻想，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来说，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并用另一个政府来代替它就足够了。相反，只有当人们开始用到处发生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的、革命的群众斗争从下面破坏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时候，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我在这里也想提醒你们想一下德国革命的一些缺陷，这些缺陷没有随着第一阶段的结束被克服，而是清楚地说明，我们可惜还没有前进到这种地步，可以通过推翻政府就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我曾经尝试向你们说明，11月9日的革命首先是一次政治革命，而

它确实必须在主要方面还成为一次经济革命。而且它也只是一次城市革命，农村迄今几乎丝毫没有触动。想实现没有农业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幻想。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工业如果不同经过社会主义改组的农业直接结合起来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思想是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分离。这种分离，这种矛盾，这种对立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现象，如果我们要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就必须立即消灭这一现象。如果我们打算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改造，你们就必须象注意工业中心一样，把注意力也放在乡村。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连初步的初步也没有做到。现在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这不仅是从没有农业就不能实行社会化这一观点出发来考虑，而且也是因为，当我们现在列举反革命用来反对我们和我们的意图的最后的后备军时，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后备军没有列举，这就是农民。正因为农民到现在还始终没有被触及，他们仍旧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一个后备军。如果社会主义的罢工烧到了资产阶级的脚后跟，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农民，动员这些狂热的私有财产的拥护者。要反对这种面临我们的反革命力量，除了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乡村，动员无地的农业无产阶级和小农来反对农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好啊！”和鼓掌。）

由此可以推论，为了保证革命有成功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做什么，因此我想这样来概括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今后须首先朝一切方面扩大工人士兵委员会制度，主要是工人委员会制度。我们在11月9日接收的仅仅是一些微弱的开端，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甚至重新丧失了重大的权力手段。你们知道，反革命曾不断地削弱工人士兵委员会制度。在黑森，工人士兵委员会被反革命政府全部撤销了，在另一些地方它们的权力手段被剥夺了。因此我们必须不仅扩大工人士兵委员会制度，而且也把

农业工人和小农引进这一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夺取权力，我们必须把夺取权力的问题当作这样一个问题向自己提出来：整个德国的每一个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好啊！”）权力在那里，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

同志们，这是一大片需要耕耘的土地。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做好准备，使工人士兵委员会具有这样一种权力，那时，一旦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或随便哪一个与它类似的政府被推翻，这件事本身就只是一项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了。因此夺取权力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前进的，我们插进资产阶级国家，直到我们占领所有的阵地并且拚命保卫这些阵地。而且按照我的看法和我的党内亲密同志的看法，经济斗争也应当由工人委员会来进行。领导经济斗争以及把这一斗争引入日益广阔的轨道，也应当由工人委员会掌握。工人委员会应当掌握国家的全部权力。在最近时期，我们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工作，由此也可以推论，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这一任务，我们就必须预计在最近时期斗争将极大地加剧。因为在这里需要一步一步地、面对面地在每一个邦，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进行斗争，以便把全部权力手段（这是必须从资产阶级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

但是为此也必须首先训练我们的党员同志，必须训练无产者。即使在已存在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地方，仍旧缺少对工人士兵委员会应有职责的觉悟。（“很对！”）我们必须首先这样教育群众，使她们认识到，工人士兵委员会应当成为国家机器在一切方面的杠杆，它应当接收一切权力并把所有这些权力都引向同一条社会主义变革的航道。即使是已经组织在各工人士兵委员会里的那些工人群众，距离这一点还十分遥远，当然个别情况下的、人数不多的少数

无产者除外，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但这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正常的。群众必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学会行使权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教会他们行使权力。我们已经幸运地度过了必须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那些年代。——对于考茨基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年代似乎直到今天还存在。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就是说：向他们发表演说和散发传单与小册子。不，社会主义的无产者学派不需要这一切。他们在采取行动时就受到了教育。（“很对！”）在这里应当这样说：起初是行动；而要使工人士兵委员会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成为并学会成为全德国的唯一公共权力，必须有行动。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破坏基础，使情况成熟到可以实行革命，那时必须由革命来圆满完成我们的工作。因此，同志们，当我们昨天向你们作详细说明，当我特别对你们说今后你们不要这样对斗争等闲视之的时候，这并不是没有经过明确的考虑，不是没有明确的意识的。有几个同志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认为我似乎假定他们在抵制国民会议时将袖手旁观。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只不过我昨天不能再多谈这件事；在今天的范围内和联系今天的问题我有可能这样做了。我的意思是，历史不允许我们象在资产阶级革命时那样轻松自在，那时只要在中央推翻正式的权力，用几个或几十个新的人去代替它就足够了。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工作，如果说我们不是从上面夺取政治权力，而是必须从下面夺取，那么这恰恰是同我们革命在实现其触及社会制度基础的那些目标时的群众性质相符合的，是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符合的。11月9日是动摇公共权力、动摇阶级统治的尝试——一次软弱的、不彻底的、不自觉的、混乱的尝试，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完全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在下面，是个别企业主同他的雇佣奴隶相对抗；在下面，是政治的阶级统治整个执行机关

同这一统治的对象即群众相对抗；在那里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从统治者那里夺取权力手段，把它拿到我们手里。如果象我这样描绘，这一过程也许比人们在最初时刻倾向于设想的那样要拖得长一些。我认为，如果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革命的全部困难和复杂之处，这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我希望，描绘巨大的困难和堆积如山的任务，对于我也如同对你们中的任何人一样，都不会起使你们的热情和毅力有所减弱的作用；相反，任务愈巨大，我们将愈加集中一切力量；而我们不会忘记，革命善于用巨大的速度完成它的工作。我不打算去预言这一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如果只要我们付出生命就足够实现这一过程，那么我们中有谁会去计算，有谁会为此操心呢？重要的仅仅是，我们要清楚明确地知道应当做什么；关于应当做什么，我希望我已经凭我的微薄力量多少向你们讲清楚主要的轮廓了。

发表于《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会议记录》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95—222页。译自《罗莎·卢森堡文集》第4卷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88—513页

（殷叙彝译）

## 领袖们在做什么？\*

(1919年1月7日)

在革命达到白热化的情况下，人和形势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三个星期之前，在工人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闭幕时，艾伯特—谢德曼的权力还灼手可热。全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盲目地追随他们的领导。召开国民会议、禁止上“街”、把执行委员会连同工人士兵委员会一起贬低成软弱无力的傀儡——反革命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全面胜利啊！十一月九日的果实被糟蹋得丧失殆尽，资产阶级又能平静地呼吸了，群众一筹莫展，被解除武装，十分气愤，却又疑惑不解。艾伯特—谢德曼妄以为自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瞎了眼的傻瓜！此后还不到二十天，他们的虚假的权力就突然动摇了。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力、实际的权力，凭的是他们的利益，凭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凭的是历史的铁的“必要性”。人们尽管可以给群众的权力铐上枷锁，在形式上剥夺群众组织的一切权力，但群众只要激动起来，只要挺起腰来，反革命脚下的大地就会震颤。

谁要是参加了昨天在齐格斯林荫道的群众游行，谁要是感觉到群众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热烈的情绪、行动的活力，他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者通过最近几周的教育，通过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教育，政治上令人惊异地成长起来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唯一要做的只是去使用这种力量。

---

\*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一文中认为罗莎·卢森堡是作者。——编者注



艾伯特—谢德曼及其委托人即经常谩骂“叛乱”的资产阶级，在这一时刻感到失望，正如波旁王朝末代国王曾经感到失望一样：在他愤怒地大叫巴黎人民“叛乱”的时候，他的部长回答说：先生，这不是叛乱，这是革命！

是的，这是一场革命，它具有革命所有的一切外部的混乱过程，高潮和低潮互相交替，有时发动短暂的冲击去夺取政权，有时革命的浪潮也会同样低落下去。通过一切看起来蜿蜒曲折的运动，革命逐步走向胜利，革命不断地前进。

群众正是必须在斗争本身中学会斗争，学会行动。现在人们感到：柏林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了行动，他们渴望果断的行动、明确的形势和有利的措施。他们已不再象11月9日时的柏林工人阶级了，他们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

但是他们的领袖，实现他们意志的执行机关有这样的水平吗？革命工长和大工厂的受托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坚定性在这一期间也增长了吗？他们的行动能力跟上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干劲的步伐吗？

我们担心，不能痛痛快快地用“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担心，领袖们还是11月9日那时的样子，他们没有进一步学到什么。

艾伯特政府对艾希霍恩的打击已过去二十四小时了。群众热烈地响应他们领袖的号召，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让艾希霍恩复职，他们发挥主动性，自发地占领《前进报》报社，他们夺取了资产阶级编辑部和沃尔弗通讯社，他们尽一切可能武装了自己。他们在等候他们的领袖的进一步指示和行动。<sup>①</sup>

---

① 艾米尔·艾希霍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担任柏林警察总监。1919年1月4日被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免职。革命工长、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柏林领导机构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号召劳动人民和士兵以行动争取艾希霍恩复职，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并武装工人。艾希霍恩免职一事成为一月斗争的导火线。——编者注

在此期间领袖们做了什么？决定了什么？为了在紧急的情况下，在这一至少要决定下一阶段的革命的命运的情况下保证革命取得胜利，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可能工人阶级的受托人正在彻底而且深入地讨论。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艾伯特—谢德曼肯定不会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讨论上。他们肯定没有睡觉。他们在悄悄地、以反革命分子通常具有的那种充沛精力和慎重态度准备他们的阴谋，他们磨刀霍霍，要突然袭击革命，扼杀革命。

为了给“谈判”铺平道路，为了引向妥协，为了在工人士兵群众和艾伯特政府之间的血的深渊上架起一座桥梁，为了引诱革命同它的死敌实行“和解”，其他性格软弱的人肯定已经努力工作了。

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必须给群众、给革命的士兵发出明确的和迅速的指令，必须给他们的力量和斗争热情指出正确的目标。只有通过革命团体坚决的、明确的行动才能争取军队中的动摇分子支持人民的神圣事业。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勇敢地、坚决地、果断地——这是革命工长和正直的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们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武装群众，占领一切权力阵地。迅速行动起来！革命负有重任。从世界史上看，革命的一小时等于一个月，一天等于一年。革命的机关要认识到他们的崇高责任！

发表于1919年1月7日《红旗》第7期，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520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玩忽职守\*

(1919年1月8日)

自从11月9日以来，革命的浪潮周期性地冲击着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这堵墙。在八个星期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每一次革命危机中，冲突的原因、形式和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个口号是迄今的一切危机的基调，一切危机都归结为这个口号，群众把这个口号喊得越来越响亮，调子越来越齐，也越来越有力了。

这也是完全自然的。革命的继续发展由于11月9日的原则性错误而受到挫折：领导革命政府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竭尽全力阻止革命爆发，他们在革命爆发后领导革命时明确地抱着一有合适的机会就把它扼杀的目的。

如果革命要继续前进，如果革命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直到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消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必须推倒这堵挡在它面前的墙——艾伯特—谢德曼政府。

革命不能回避这个特别的任务，八周以来革命历史的全部经验都提出这个任务。艾伯特政府自己的挑衅：12月6日事件<sup>①</sup>，

---

\*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中认为罗莎·卢森堡是作者。——编者注

① 1918年12月6日，社会民主党柏林城防司令奥托·威尔斯、卫戍区司令部、国防部和外交部组织了一次由反动军官领导的部分军队的暴动。他们逮捕了柏林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夺占了《红旗》编辑部，宣布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总统，在腓西大街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14人，还有30人受伤。——编者注

卫戍部队的宣誓<sup>①</sup>，12月24日事件<sup>②</sup>，最近对警察局的打击，这一切都迫使革命群众直接面对粗暴的、赤裸裸的、毫不容情的抉择：要就是革命放弃它的无产阶级特性，放弃社会主义使命，要就是必须剥夺艾伯特—谢德曼及其追随者的权力。

柏林以及全国主要的革命中心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此也是理解的。这种明确的、敏锐的认识使几十万人每时每刻放开喉咙热情地高呼：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就是最近这些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成熟和进步。

但是还有一件事是很不清楚的，革命的软弱和不成熟还在其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怎样领导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斗争，怎样把革命已经达到的阶段即内部成熟的阶段转化为行动，并且在力量对比上表现出来。从来没有象最近三天那样明显地表现出这些弱点和缺陷。

摧毁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并不需要冲进首相官邸和驱逐或逮捕几个人，而是首先需要夺取全部实际上的权力阵地，也要牢牢掌握并且利用这些阵地。

但是这三天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真正夺取到的阵地共有：重新占领了警察局，占领了《前进报》报社、占领了沃尔弗通讯社并且占领了一些资产阶级的编辑部，这一切都是群众自发的成就。这些天领导群众的或者自命为领导群众的机构——革命工长和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根据这些做了什么呢？他

---

① 1918年12月10日由反革命军官领导的卫戍部队武装开进柏林，受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柏林市长阿道夫·维尔穆特和国防部长亨利希·朝伊希的欢迎并宣誓保卫“共和国”，由中将阿诺德·累克维斯代表他的官兵宣誓。——编者注

② 1918年12月24日反革命军队在陆军中将阿诺德·累克维斯的领导下，在炮兵部队支持下，攻击驻扎在皇宫和宫廷马厩的人民海军师。作战的海军师得到柏林工人的武装支援，因此进攻失败。——编者注

们忽略了革命行动最主要的几条原则，那就是：

1. 当群众占领《前进报》报社时，自称为柏林工人阶级的正式代表的革命工长和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是立即根据柏林革命工人阶级的意图领导编辑部的工作。编辑部究竟在那里？多依米希<sup>①</sup>、累德堡——这些著名的职业记者和编辑，现在他们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根本没有机关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抛弃群众不管？难道“讨论”比行动更加重要吗？

2. 如果群众占领了沃尔弗通讯社，工人阶级的革命机关的最迫切的任务是让通讯社为革命事业服务，向公众、向全国的党员同志发布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使他们认清形势。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建立柏林工人阶级与全国革命运动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没有这种联系，柏林和全国的革命都不能取得胜利。

3. 如果人们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就不能紧接着与这个政府“谈判”。让哈阿兹一伙：奥斯卡·科恩、齐茨<sup>②</sup>、考茨基、布赖特沙伊德<sup>③</sup>以及一切动摇分子，抓住每个机会重新迅速地同他们勉强与之分开的艾伯特之流联合起来吧！与群众保持联系的革命工长当然知道，艾伯特—谢德曼是革命的死敌。与死敌进行谈判吗？这种谈判只能有两种结果：或者是妥协、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仅仅拖延下去，而艾伯特之流将利用这一拖延来准备

---

① 恩斯特·多伊米希（1866—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1917年参加建立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任该党主席。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2年又回到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② 露易丝·齐茨（1865—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1908年进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7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③ 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1874—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18年10月至1919年1月任普鲁士革命政府内政部长。在纳粹上台后于1941年被投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在空袭时死去。——编者注

最野蛮的暴力措施。

4. 如果为了紧急戒备号召群众上街，那么必须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至少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朋友和敌人做了什么并且计划做什么。在革命处于危机的时候，群众当然应当上街。群众是革命唯一的保护者，唯一的保证。如果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现在革命就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那么无产阶级群众的责任就是在显示他们的力量的地方守卫：在大街上！他们的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就已经是对革命的所有公开和隐蔽的敌人的威胁和警告：你们要当心！

但是群众恰恰不应该只是接受号召，而是也必须在政治上积极行动。必须召唤群众来对已经做的一切和没有做的一切作出决定。难道革命工长，大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不需要把关于同艾伯特—谢德曼进行“谈判”的决定提交聚集在齐格斯林荫大道的群众吗？他们会听到一种如此震耳欲聋的回答，使他们失去任何一种谈判的兴趣！

群众准备支持任何一种革命行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赴汤蹈火。应该给他们提出明确的口号，指导他们采取彻底的、果断的态度。工人阶级的理想主义、士兵对革命的忠诚，只能通过领导机关的果断和明确的态度、通过领导机关的政策而加强。而今天的政策就是不要动摇，不要半途而废，只认准这个主导思想：打倒艾伯特—谢德曼！再吸取一次教训！

德国在组织方面是一个典范的国家，而且还是组织狂热的典范国家，甚至是以组织而狂妄自负的典范国家。人们为了“组织”而把运动的精神、目标和行动能力都放弃了。而今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在革命的重要时刻首先是受到赞扬的“组织天才”可耻地失灵了。组织革命行动恰恰与按照老规矩“组织”帝国国会选举或劳动争议审理会选举完全不是一回事。必须而且恰恰只能在革命本

身中间学会组织革命行动，正如只能在水中学会游泳一样。对此是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但是人们同样应该从经验中学习。

最近三天的经验大声号召工人阶级的领导机关：不要空谈！不要无尽无休地讨论！不要谈判！要行动！

发表于1919年1月8日《红旗》（柏林）第8期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  
卷第521—524页。

（苏冰翎译 殷叙彝校）

## 领袖失灵\*

(1919年1月10日)

柏林的情况起了变化，这引起了工人群众的极其尖锐的批评和极为严肃的思考。

最近几天我们多次公开而明确地说过，柏林群众运动的领导非常缺乏果断、活力和革命热情。我们明确地说过，领导远远地落后于成熟的、并时刻准备进行斗争的群众。我们不仅在领导机构内提出倡议和进行劝说，而且在机构之外，在《红旗》报上进行批评，尽一切力量来推动运动前进，鼓励大工厂的革命工长采取有力的行动。

然而，这一切努力和尝试终于因为那个领导机构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态度而告失败。四天以来，群众的激烈情绪和斗争热情由于完全失去领导而受到挫折，烟消云散，与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两次谈判使革命斗争的希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非常有效地加强了政府的地位。在这以后，革命工长终于在星期三到星期四的那个晚上决定中止谈判，全面展开斗争。提出了总罢工的口号并且发出号召：**拿起武器！**

但是，这只是革命工长振作起来做出的唯一成绩。

---

\* 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克拉拉·蔡特金在她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一书中认为罗莎·卢森堡是本文作者。——编者注



显然，如果向群众提出了总罢工和武装起来的号召，那么为了保证有力地执行这个口号，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但是工长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提出了这个空洞的口号后就安静下来，立即在星期四晚上决定，与艾伯特—谢德曼进行第三次谈判！

这一次是在施瓦茨科普夫工厂和其他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中开展的团结运动<sup>①</sup>，为再次破坏刚刚以各种形式开始的斗争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施瓦茨科普夫工厂、通用电气公司、柯诺尔制动机厂的工人阶级属于柏林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队伍。他们的最良好愿望是不容置疑的。但在这一情况下，工人阶级本身是受骗的对象，其幕后操纵者是哈阿兹一伙：奥斯卡尔·科恩、迪特曼和另一些人，这些人以蛊惑人心的方式，使用受人欢迎的时髦口号“团结”、“不要流血”，企图麻痹群众的斗争力量、制造混乱，使决定性的革命危机消解成与反革命的肮脏妥协。

每个不想上当的人都明白，这场独立社会民主党导演的团结闹剧可以为艾伯特—谢德曼作出在日前情况下能够设想的最大程度的贡献。社会主义的叛徒们自己还没有站稳脚跟，面临着充满风险的与工人阶级的较量而发抖，只能依靠动摇的部队三心二意的勉强支持，又遭到资产阶级不信任的指责，他们在最近几天经历了他们那短命的、美好的政权的最艰难的时刻。群众在街头的大规模行动，政府自己通过艾希霍恩事件的粗暴挑衅而引起的变化已使这些冒险家穷于应付。他们已差不多承认自己失败，最近几天他们在采取反革命措施时的那种缺乏自信的试探态度就是明显的证明。

---

<sup>①</sup> 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党人提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团结起来”，“平等”和“停止兄弟残杀”，在工厂工人中和士兵中得到巨大反响。工人没有认识到，同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意味着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以及“团结起来”反对革命。——编者注

这时提出谈判，最后又出现团结运动，对他们来说是救命的办法。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哈阿兹和迪特曼退出了艾伯特政府<sup>①</sup>，但他们仍旧在大街上继续执行充当谢德曼之流的遮羞布的政策。

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支持并参与执行这种政策！最近决定与政府进行的谈判的条件已经为革命工长接收，这就是累德堡制定的。这一方面提出的作为工人投降代价的要求中有：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和兰茨堡<sup>②</sup>退出政府。似乎这里只涉及到人，而不涉及到一种确定的政策！似乎这种办法不是只能使群众受到蛊惑和误入歧途：把谢德曼之流无耻政策的典型的有本事的代表赶出前台，用某些平庸的、微不足道的人来代替他们，而这些人始终只是这个政策的傀儡，艾伯特—谢德曼则躲在幕后指挥，并且从而逃避了群众的审判！

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倡导、革命工长参与制定的全部谈判政策就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导致革命工人阶级的投降，并掩饰了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这就是11月9日的政策，他们要把八个星期以来的已经成熟的形势和群众的政治团结向后扭转，去实行这一政策。

共产党当然没有参与这种无耻的政策并且拒绝为之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一如既往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向前推进革命事业，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制止一切制造混乱的企图，并且通过毫无保留的批

---

① 由于全德国掀起反对反革命军队暴行和反对政府敌视革命的政策群众抗议的压力，也由于右派社会民主党使政府内部的斗争尖锐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艾米尔·巴尔特、威廉·迪特曼和胡果·哈阿兹被迫于1918年12月29日退出政府。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和鲁道夫·维塞尔代替他们进入内阁。——编者注

② 奥托·兰茨堡（1886—1957）——1912—1918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1918年11月进入政府，是艾伯特的重要的谋士。——编者注

评告诫群众，要他们警惕革命工长的优柔寡断政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泥潭政策的危险。

最近几天的危机使群众想到一些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教训。日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德国首先表现为和资产阶级的保护伞谢德曼—艾伯特的清算。而同谢德曼之流的清算，要以清理艾伯特—谢德曼的保护伞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前提。

对掩盖矛盾、调和、实行泥潭政策的企图采取明确态度并进行尖锐的、毫不容情的斗争，团结群众的革命力量和创立相应的机构去在斗争中领导他们，这些是最近时期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最近五天从群众强有力的冲击和领袖极其可悲的失灵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发表于1919年1月10日《红旗》第14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25—528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1月14日)

“华沙秩序井然！”1831年塞巴斯提亚尼部长在巴黎议会里这样宣告，当时苏沃洛夫的士兵在猛攻布拉格市郊之后已经进驻波兰首都并且开始屠杀起义者了。

“柏林秩序井然！”资产阶级报纸胜利地这样宣告，艾伯特和诺斯克这样宣告，“所向披靡的军队”的军官——柏林小资产阶级平民在街上用手帕向他们挥舞，向他们欢呼乌拉——也这样宣告。德国武器的名誉和光荣在世界史上得到了挽救。那些在佛兰德尔和阿尔贡地区被可耻地击败<sup>①</sup>的人们由于在《前进报》报社对三百名“斯巴达克分子”的辉煌胜利<sup>②</sup>而恢复了名誉。德国军队第一次光荣入侵比利时的时代，列日<sup>③</sup>的征服者冯·艾米希将军的时代，同莱因哈特之流在柏林大街上的行为相比也要逊色。被杀害的谈判代表，他们本想就交出《前进报》报社事宜进行谈判，却被政府的士兵用枪托打得血肉模糊，连尸体都无法辨认；惨遭杀害的俘虏被枪

---

① 指1918年3—4月德军在法国佛兰德地区发动的进攻于4月底失利。接着又发起埃纳河地区的攻势，最后也未奏效，阿尔贡属该区。——编者注

② 占领《前进报》报社的工人和士兵在英勇地抵抗了数量和技术装备方面占优势的反革命军队之后，不得不在1月11日屈服。占领者方面派去进行移交谈判的代表遭到野蛮摧残并被杀害。不得不放下武器的三百名革命者被用鞭子和枪托痛打，一些人被枪杀。——编者注

③ 1914年8月1日德军入侵比利时，7日攻占列日。——编者注

弹打得头骨粉碎，脑浆四溅；面对如此这般的光荣行为，谁还会想到使他们在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面前丢脸的败仗呢？“斯巴达克”就是敌人，柏林成为我们的军官善于夺取胜利的地方，“工人”诺斯克成为懂得在鲁登道夫失灵的地方组织胜利的将军。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sup>④</sup>，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士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华沙秩序井然！”“巴黎秩序井然！”“柏林秩序井然！”每隔半个世纪，“秩序”维护人发布的消息就这样从世界历史性斗争的一个中心转到另一个中心。兴高采烈的“胜利者”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必须周期性地靠血腥屠杀维护的秩序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失败的历史命运。柏林最近的这个“斯巴达克周”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它教给了我们什么？还在斗争中间，在反革命的胜利喧嚣声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就已经发生的事对自己作出解释，用伟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革命要抓紧时间，它要继续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开不管，朝着它的伟大目标前进。自觉地遵循革命的路线，走革命的道路，是为国际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的首要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能期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吗？能期待

---

<sup>④</sup>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动青年组织。——编者注

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和建立社会主义专政吗？当然不能，如果充分地考虑到所有决定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的话。单是目前革命事业的弱点，即广大士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经常被军官滥用于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目的这一情况，就已经证明，在这次冲突中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另一方面，军队不成熟这一情况本身只是德国革命普遍不成熟的一个象征。

大多数士兵来自平原地区，这个地区一如既往，还几乎没有被革命触动。至今柏林仍差不多同全国完全隔绝。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在莱茵地区、沿海地区、在不伦瑞克、在萨克森，在符腾堡——固然全心全意地站在柏林无产阶级一边，但毕竟首先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进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其次，火山爆发的真正根源、为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断提供力量的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而这只不过是革命在政治上不成熟这一情况的更深刻的表现。

从上述一切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考虑到最后的、持久的胜利。上一周的斗争是否因此就是一个“错误”呢？是的，如果这里涉及的是一次有意识的“攻击”，一场所谓的“暴动”的话。但是上一周斗争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正象迄今的一切情况一样，象12月6日一样，象12月24日一样，这是政府的野蛮的挑衅行为！象从前在韶西大街反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那样，象对水兵的屠杀那样，在这一次，对柏林警察局的打击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原因。革命不是凭自己的愿望，在广阔的田野上按照“战略家们”巧妙地制定的计划行动的。革命的敌人也有主动性，的确，通常说来，他们发挥主动性的情况比革命本身要多得多。

在艾伯特—谢德曼疯狂的挑衅面前，革命的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是的，立即全力以赴地打退敌人进攻，这是革命的光荣攸

关的事情，否则反革命就会受到鼓励而继续进攻，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德国革命在国际中的道义上的信誉就要动摇。

从柏林群众中也立即自发地爆发了反抗，不言而喻，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在第一次发动进攻时道义上的胜利立即就属于“大街”方面。

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在击剑中，最好的防御是狠狠的一击。任何一种斗争的这个基本规律尤其支配着革命的每一步骤。柏林无产阶级不会因为艾希霍恩复职而平静下来，他们自发地占领反革命的其他权力阵地：资产阶级的报纸、半官方的通讯社和《前进报》报社，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证明了他们的健全的本能，他们内在的新鲜力量。所有这些措施都产生于群众的这一来自本能的认识：反革命方面在遭受失败时不会平静，而是要企图进行一场全面的较量。

我们在这里也面临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规律之一，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那种类型的、在任何斗争中只寻求退却借口的渺小的“革命家”的一切过细推敲和自以为是的论据在这些规律面前都要碰得粉碎。

一旦明确地提出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这次革命中就是推翻作为社会主义胜利的第一个障碍的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的全部现实意义就会一再表现出来，而斗争的每一个个别插曲就会按照自然规律的必然性而全面展开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尚未准备好解决这一问题，尽管革命形势还是如此不成熟。

“打倒艾伯特—谢德曼！”这个口号作为一切局部冲突的唯一的取之不尽的公式，不可避免地要在每一次革命危机中出现，并且因此自然而然地，通过它的内在的客观逻辑，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把一个个斗争插曲推向高潮。

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一些个别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代革命的全部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欧洲爆发的第一次阶级斗争，即1831年里昂丝绸纺织工人的暴动，是以严重的失败告终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是以惨重的失败告终的。巴黎公社是以可怕的失败告终的。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铺满了纯粹的失败。

但是这同一个历史一步一步地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已直接地逼近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后战役，今天我们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与革命斗争截然对立的是议会斗争。在德国四十年内，我们只有议会斗争的“胜利”，我们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结果是，在1914年8月4日伟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到一次致命的失败，空前的崩溃，史无前例的破产。迄今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完全是失败，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的最后胜利的保障。

当然要有一个条件！问题在于，各次的失败是在什么情况下遭到的，是因为群众的一往直前的战斗力由于一切不够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而受到挫折，还是因为革命行动本身由于不彻底、不坚决和内在的弱点而陷于瘫痪。



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典型的实例，一个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另一个是德国的三月革命。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行动已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德国三月革命的悲剧象一个拴在现代德国的发展的脚上的铅球。它的后续影响通过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一直涉及德国革命的最近的进程，涉及刚刚经历的戏剧性的危机。

从上述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怎样的呢？“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由于采取猛烈冲击的革命力量和形势不够成熟造成的，还是由于行动的软弱和动摇而造成的？

两种原因都存在。这次危机的互相矛盾的特点，即柏林群众的强有力的、坚决的、进攻的态度同柏林领袖的不坚定、退缩的动摇态度的矛盾是最近这次插曲的特殊标志。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

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

发表于1919年1月14日《红旗》第14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33—538页。

（苏冰娴译 殷叙彝校）



## 人名索引

### A

- 阿德勒，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第372页。
- 阿德勒，维克多 (Adler, Victor)。——第236、246、395页。
- 阿夫克森齐也夫，尼古拉·德米特里也维 (Авксенть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第495页。
-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第7、475、514页。
- 阿基巴，本 (Akiba, Ben)。——第3页。
- 埃尔茨伯格，马蒂亚斯 (Erzberger, Mattias)。——第520页。
- 埃墨林，格奥尔格 (Emmerling, Georg)。——第235页。
-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 (Ebert, Friedrich)。——第467、518—519、533、542、546、550、552—554、556—557、559、562—565、567—568、570—574、576—577页。
- 艾尔姆，阿道夫 (Elm, Adolf)。——第12、91、116页。
- 艾米希 (Emmich)。——第574页。
- 艾斯纳，库尔特 (Eisner, Kurt)。——第37页。
- 艾希霍恩，艾米尔 (Eichhorn, Emil)。——第563、577页。
- 艾希霍恩，海爾曼 (Eichhorn, Hermann)。——第510页。
- 爱尔威，古斯达夫 (Hervé, Gustave)。——第148页。
- 奥艾尔，伊格纳茨 (Auer, Ignaz)。——第203、411、414、454页。
- 奥达·奥尔贝格 (Oda, Olberg)。——第279页。

### B

- 巴特尔，亨利希 (Bartel, Heinrich)。——第235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第35、169页。
- 巴塞爾曼, 恩斯特 (Bassermann, Ernst)。——第317页。
- 巴耶尔, 亨利希 (Baer, Heinrich)。——第11页。
-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 (Börne, Karl Ludwig)。——第179页。
- 鲍威尔, 奥托 (Bauer, Otto)。——第346页。
- 贝特曼-霍尔韦格·特奥巴德 (Bethmann Hollweg Theobald)。——第209—210、251、261、288、295、297、299、332、378、404—405页。
- 贝希托尔德·利奥波德 (Berchtold, Leopold)。——第405、407页。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第17—18、114、147—149、197—205、249、298、317、345、347、351—353、371、393、402—403、422、438、454—455、541页。
- 比尔克内尔 (Buerkner)。——第554页。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第198、295、403、411—415、417—418、427—428、436、438、440页。
- 毕洛夫 伯恩哈德 (Bulow, Bernhard)。——第295、418、421、428页。
- 波柯尼, 弗兰茨 (Pokorny, Franz)。——第212页。
-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第16、18、37、138、229、302—306、343、373、514页。
- 伯利欣根, 葛兹·冯 (Berlichingen, Götz von)。——第433页。
- 伯麦尔贝格, 泰奥多尔 (Bömelburg, Theodor)。——第37页。
- 布赖特沙伊德, 鲁道夫 (Breitscheid, Rudolf)。——第567页。
- 布朗热, 若尔日-厄内斯特 (Boulanger, Georges-Ernest)。——第295页。
- 布林格曼, 奥古斯特 (Bringmann, August)。——第116页。

## C

- 策烈铁里,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 (Церетели, 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第482页。
- 查理一世 (Karl I)。——第481、497页。
- 查苏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第7页。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第170页。

## D

大卫·爱德华 (David, Eduard)。——第89、113、116、179、350、354、396、461、467、542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jacques)。——第91页。

狄更斯·查理 (Dickens, Charles)。——第38、318页。

迪克斯·阿尔图尔 (Dix, Arthur)。——第376页。

迪特曼·威廉 (Dittmann, Wilhelm)。——第472、549、572页。

敦克尔·弗兰茨 (Dunker, Franz)。——第101、280页。

多伊米希·恩斯特 (Däumig, Ernst)。——第567页。

##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第17、21、23、33—36、128—129、159、162—163、166、168—169、202、225—230、233、243、249、252、254、283、398—399、422、425、438、449、451、456—457、535、537—543页。

厄特尔·格奥尔格 (Oertel, Georg)。——第463页。

## F

法夫尔·茹尔 (Favre, Jules)。——第436页。

菲利浦·路易 (Philippe, Louis)。——第253、255、497页。

菲勒克·路易 (Viereck, Louis)。——第202页。

菲施贝克·奥托 (Fischbeck, Otto)。——第463页。

斐迪南·弗兰茨 (Ferdinand, Franz)。——第405、407页。

费边·昆图斯 (Fabius, Quintus)。——第244—246页。

费舍·爱德蒙 (Fischer, Edmund)。——第16页。

费舍·H (Fischer, H)。——第12页。

费舍·理查 (Fischer, Richard)。——第353页。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第179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 (Vollmar, Georg Heinrich)。——第147—

148、192页。

弗莱斯纳, 海尔曼 (Fleissner, Hermann)。——第12页。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 (Wrangel, Friedrich)。——第426、429页。

弗兰克, 路德维希 (Frank, Ludwig)。——第330页。

佛罗梅, 卡尔·埃贡 (Frohme, Karl Egon)。——第18、91、257页。

弗洛伊德利希, 利奥 (Frendlich, Leo)。——第236页。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第21、24页。

## G

盖得, 茹尔 (Guesde, Jules)。——第7、138—139页。

盖尔, 弗里德里希 (Geyer, Friedrich)。——第460—461页。

高尔基, 马克西姆 (Горький Максим)。——第2—3页。

歌德, 约翰·沃尔夫岗 (Goethe, Johann Wolfgang)。——第134页。

戈洛文, 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第131页。

格勒内尔, 威廉 (Groener, Wilhelm)。——第553页。

格里哥里维茨 (Grigorjanz)。——第514页。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第183页。

## H

哈阿兹, 胡果 (Haase, Hugo)。——第460—462、464、469—470、520—521、  
546—549、567、572页。

哈第, 詹姆斯·凯尔 (Hardie, James Keir)。——第294页。

海涅, 沃尔夫岗 (Heine, Wolfgang)。——第17—18、461、467页。

汉尼拔, 巴尔卡 (Hannibal, Barca)。——第244—245页。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 David)。——第124页。

豪斯曼, 康拉德 (Hausmann, Konrad)。——第321页。

赫斯, 莫泽斯 (Hess, Moses)。——第183页。

赫歇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Herschel, Friedrich Wilhelm)。——第496  
页。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第3、171页。

胡埃·奥托 (Hue, Otto) 。——第12页。

胡登, 乌尔利希·冯 (Hutten, Ulrich von) 。——第507页。

惠特曼, 亨利希 (Hüttmann, Heinrich) 。——第15页。

霍夫曼, 阿道夫 (Hoffmann, Adolph) 。——第464—467页。

霍尔曼 (Hollmann) 。——第418页。

霍赫, 古斯塔夫 (Hoch, Gustav) 。——第12、377—378、380页。

## I

伊格利西亚斯, 帕布洛 (Iglesias, Pablo) 。——第294、298页。

## J

基德伦-魏希特·阿尔弗雷德 (Kiderlen-Wächter Alfred) 。——第295、  
297、299、304页。

加邦 (Gapon) 。——第49、57页。

## K

卡列金, A.M. (Kaledin, A.M.) 。——第479、481页。

卡斯帕尔 (Caspar) 。——第429页。

卡斯普沙克, 马尔岑 (Kasparzak, Marcin) 。——第14、65页。

卡托 (Cato) 。——第371页。

卡兹列洛维奇, 特里沙 (Kazlerowitsch, Trischa) 。——第444页。

康蓬, 茹尔 (Cambon, Jules) 。——第299页。

康普豪森, 鲁道夫 (Campfhausen, Ludolf) 。——第124页。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第10—11、13、114—115、148、154、166、  
172—175、177、183、211—217、219—226、228—234、237、240、242—244、  
246、248—249、252、254—256、258—269、272—274、276—290、292、352  
—353、357—358、368—369、372—374、378、380、445、474—475、479—  
480、482、492、504、514、520—521、541、567页。

科尔纳利森, 克里斯蒂安 (Cornelissen, Christian) 。——第214页。

科恩, 奥斯卡 (Conn, Oskar) 。——第567页。

- 科希秋什科，塔代乌士 (Kościuszko, Tadeusz)。——第161—162页。
- 克劳塞维茨，卡尔 (Clausewitz, Karl)。——第374页。
-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 (Clemenceau, Georges Benjamin)。——第529页。
-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第487、494—495页。
- 克努克，亚历山大 (Kluck, Alexander)。——第460页。
- 克努滕 (Knuten)。——第463页。
- 克洛特，艾米尔 (Kloth, Emil)。——第11页。
- 孔斯坦，让·安都昂·厄内斯特 (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第450页。
- 库诺，亨利希 (Cunow, Heinrich)。——第505页。
- 奎尔奇，哈利 (Quelch, Harry)。——第294页。

## L

- 拉马丁，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第521页。
- 拉普切维奇，德拉吉沙 (Laptschewitsch, Dragischa)。——第444页。
- 拉平斯基 (Lapinskis)。——第358页。
-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第21、120、132、168、226、371、438、451、457页。
- 拉维涅，雷蒙·费里克斯 (Lavigne, Raymond Felix)。——第328页。
- 莱姆彼得斯·约翰 (Leimpeters, Johann)。——第346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第186、548页。
- 莱因哈特 (Reinhardt)。——第574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er-August)。——第521页。
- 兰茨堡，奥托 (Landsberg, Otto)。——第572页。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第199页。
- 劳埃德，乔治 (Lloyd, George)。——第529页。
- 雷文特洛，恩斯特 (Reventlow, Ernst)。——第520页。



- 雷泽尔, 汉斯 (Resel, Hans) ——第238页。
- 累德堡, 格奥尔格 (Ledebour, Georg), ——第460—467、469、472、567、572页。
- 利贝尔, 恩斯特 (Lieber, Ernst)。——第418页。
-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第378、464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第162—163、200、203、249、298、352、371、402、412、438、454页。
- 利曼诺夫斯基, 波列斯拉夫 (Limanowski, Boleslaw)。——第152—153、183页。
- 莉施内斯卡 (Lischnewska)。——第316页。
- 连施, 保尔 (Lensch, Paul)。——第505页。
- 列金, 卡尔 (Legin, Karl)。——第11、112—113、472页。
-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第477、480—483、485—492、494—495、497—498、500—509、513页。
- 柳宾斯基 (Lubinsky) ——第513页。
- 鲁登道夫, 埃里希 (Ludendorff, Erich)。——第530、575页。
- 路贝, 埃米尔 (Loubet, Emile)。——第138页。
- 路易, 菲利浦 (Louis-Philippe)。——第497页。
- 罗尔巴赫, 保尔 (Rohrbach, Paul)。——第376页。
- 罗霍夫, 泰奥多尔 (Rochow, Theodor)。——第426页。
- 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第3页。
- 罗伊特, 弗里茨 (Reuter, Fritz)。——第492页。

## M

- 马尔托夫, 尔 (Мартов, л)。——第139页。
-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第8—9、17、21、23、34—37、39、122—125、123—130、143—144、162—166、168—172、174—175、200、219、232、241、249、252、254—256、371、374、378、388—390、392、399—400、413—415、422、425—426、433—434、436、438、448、451、457、535、536—541页。
- 马肯森, 奥古斯特 (Mackensen, August)。——第460页。
- 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Paul)。——第483页。

- 麦克唐纳，詹姆斯·拉姆赛 (Macdonald, James Ramsay)。——第294页。  
曼奈斯曼 (Mannesmann)。——第296—297、299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第426、429页。  
芒加·贝尔 (Manga, Bell)。——第424页。  
梅尔费尔德，J (Meelfeld, J)。——第330、335页。  
蒙桑奎 (Monsanquet)。——第554页。  
蒙森，泰奥多尔 (Mommensen, Theodor)。——第244—245页。  
弥勒，海尔曼 (Müller, Hermann)。——第11页。  
米尔巴赫-哈尔弗，威廉 (Mirbach-Harff Wilhelm)。——第510—511页。  
米哈尔斯基 (Michalski)。——第12页。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 (Miquel, Johannes von)。——第253页。  
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也维奇 (Милу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第487、513—514页。  
闵采尔·托马斯 (Münzer, Thomas)。——第24、143页。

## N

- 拿破仑第三 (Napoléon III)。——第185—186、255、402页。  
纳乌曼，弗里德里希 (Naumann, Friedrich)。——第14、316页。  
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第43、425页。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第426页。  
纽文胡斯，多梅拉 (Nieuwenhuis, Domela)。——第148、214、228页。  
诺斯克，古斯塔夫 (Nosk, Gustav)。——第350、353、462—463、572、574—575页。

## O

- 欧文，罗伯特 (Owen, Robert)。——第21、24页

## P

- 帕尔乌斯 (格尔方德)，亚历山大·拉扎烈维奇 (Парвус [Гельфанд], Александр Лазаревич)。——第505页。

帕赫斯 (Pages)。——第521页。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ý, František)。——第165页。

潘涅库克, 安东尼 (Pannekoek, Antonie)。——第215、231页。

佩尔纳施托费尔, 恩格贝尔特 (Pernerstorfer, Engelbert)。——第236页。

普凡库赫, 威廉 (Pfannkuch, Wilhelm)。——第127页。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 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第7、127、136、139、141、144—145页。

普特卡默, 罗伯特 (Putkamer, Robert)。——第6、39页。

珀勒策尔, 约翰 (Pölzer, Johann)。——第235—236页。

## Q

齐茨 (Zietz)。——第567页。

## R

饶勒斯, 让 (Jaures, Jean)。——第3、148、396、440页。

## S

塞西尔·罗伯特 (Cecil, Robert)。——第419页。

桑巴特, 威纳尔 (Sombart, Werner)。——第105页。

舍德勒, 弗里茨 (Schaedler, Fritz)。——第418页。

舍夫琴柯, 塔拉斯, 格里夫也维奇 (Шевченко,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第492页。

舍恩, 威廉·爱德华 (Schön, Wilhelm Eduard)。——第296页。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第21页。

施密特, 罗伯特 (Schmidt, Robert)。——第10—15、17—18页。

施内特尔, F (Schnetter F)。——第11页。

施潘, 彼得 (Spahn, Peter)。——第463页。

施塔姆普费尔, 弗里德里希 (Stampfer, Friedrich)。——第475页。

施特勒贝尔, 亨利希 (Ströbel, Heinrich)。——第12、514页。

舒迈尔, 弗兰茨 (Schumeir, Franz)。——第236页。

斯卡雷特, 斐迪南 (Skaret, Ferdinand)。——第235页。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第7、48、131页。

苏沃洛夫（Суворов）。——第574页。

苏伊斯基、约瑟夫（Szujski, Jozef）。——第162页。

## T

塔菲·爱德华（Taffe, Eduard）。——第237页。

唐恩、费多尔·伊里奇（Дан, Федор Ильич）。——第475、482、513页。

特罗塔（Trotha）。——第262页。

特森多尔夫、海尔曼（Tessendorff, Hermann）。——第160、255页。

特鲁尔斯特拉、彼得·耶莱斯（Troelstra, Pieter Jelles）。——第395页。

托尔斯泰、列甫·尼古拉也维奇（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第38页。

托洛茨基、列甫·达维多维奇（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第477、483、488、490、494—498、500—501、503—505、507、512页。

梯尔比茨、阿尔弗雷德（Tirpitz, Alfred）。——第530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第436、449页。

## W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 Edouard-Marie）。——第114、148、294、29页。

万-科尔、亨利克（Van kol, Henrik）。——第179页。

王德威尔得、埃米尔（Vandervelde, Émile）。——第18、147、358页。

威尔逊、伍德罗（Wilson, Woodrow）。——第493、529页。

威廉二世（Wilhelm II）。——第138、411—412页。

威廉一世（Wilhelm I）。——第427页。

维纳斯基、列奥波德（Winarsky, Leopold）。——第235—236页。

维尼希、奥古斯特（Winnig, August）。——第554—556页。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Windischgroetz Alfred）。——第153页。

翁布赖特、保尔（Umbreit, Paul）。——第11页。

翁拉特、欧根（Umrath, Eugen）。——第11页。

乌尔姆，埃马努尔 (Wurm,Emanuel)。——第349—350页。

## X

希尔施，麦克斯 (Hirsch,Max)。——第101、280页。

希法亭，鲁道夫 (Hiferding,Rudolf)。——第520—521页。

谢德曼·菲利浦 (Scheidemann,Philipp)。——第346—348、375—376、  
378、467、469—470、472、518—520、533、546—550、552—557、559、562—  
565、567—568、570—573、576—577页。

辛格尔·保尔 (Singer,Paul)。——第203、312、352、371页。

兴登堡，保尔 (Hindenburg,Paul)。——第425、433、460—461、513、530、  
553页。

休特古姆，阿尔伯特 (S üdekum,Albert)。——第350、353页。

许采 (Sch ütze)。——第429页。

## Y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第174页。

## Z

祖巴托夫·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 (Зубатов,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第46—47页。

左尔格·阿道夫 (Sorge,Adolph)。——第202页。



封面设计：王师颀

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是李宗禹、周懋庸；负责全书校订工作的是殷叙彝、李宗禹。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西安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的部分同志参加了翻译和部分校订工作。人名索引是周懋庸编的。

卢 森 堡 文 选  
LUSENBAO WENXUAN

下 卷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75印张 446,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1—800

ISBN 7-01-000206-1/D·111 定价7.30元

ISBN 7-01-000206-1/D·111 定价 7.30 元